

第9典 宗教与民俗  
第10典 中外文化交流  
第1典 历史文化沿革

中华文化  
通志

第 2 典

【地域文化】

第3典 民族文化  
第4典 制度文化  
第5典 教化与礼仪学术  
第6典  
第7典 科学技术  
第8典 艺术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吴越文化志



董楚平  
金永平  
等撰

中华文化  
通志

第 2 卷

【地域文化】

吴越  
文化志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  
图书馆藏书章

K203  
Z669  
:2(8)

中华文化通志·地域文化典 (2—018)

宁可主编

---

---

吴越文化志

董楚平 金永平等 撰

---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印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70 毫米 32 开

字数 445,000

印张 18.25

插页 1

版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7—208—02268—2/K·487

---

---

141556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

编委会主任 萧 克

编 委 李学勤 宁 可 王 尧 刘泽华  
孙长江 庞 朴 陈美东 刘梦溪  
汤一介 姜义华 陈 昕 朱金元  
张国琦

办公室主任 张国琦

办公室副主任 王科元

策 划 姜义华 张国琦

7/10/00/2

141556



## 吴越文化志

### 作者简介

董楚平,1934年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际越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副会长。著有《楚辞译注》、《吴越文化新探》、《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等。

金永平(1957—1995年),杭州大学文学硕士。曾任浙江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副研究员,《浙江社会科学》常务副主编。著有《〈吴越春秋〉研究》等。

# 总 序

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千年的历史，起伏跌宕；哺育着差不多五分之一人类的身心，灿烂辉煌。它坦诚似天，虚怀若谷，在漫长的岁月里，广袤的土地上，有过无私奉献四面传播的光荣，也有过诚心求教八方接纳的盛事。它以直，健以稳，文而质，博而精，大而弥德，久而弥新，昂然挺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勿论东西，不分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土壤和空气，都有它自己的载体和灵性，当然也就都有它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稚气和老练。准乎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天赋权利，以及尊重异质文化同等权利的人间义务。每一民族都需要学习其他文化的各种优点，来推动自身发展；都应该发扬自身文化的一切优点，来保证自己的存在，缔造人类的文明乐园。

现在，当二十世纪的帷幕徐徐降落之际，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中华民族正在重新检视自己，以便在新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地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百

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便是我们为此而向新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做出的奉献。

《中华文化通志》全书共十典百志。

唐人杜佑著《通典》，罗列古今经邦致用的学问，分为八大门类，“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务求做到“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通典》的这一编纂方法，为我们所借用。《中华文化通志》分为十典：历代文化沿革典、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礼仪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俗典、中外文化交流典。每“典”十“志”。历代文化沿革典十志，按时序排列。地域文化典十志，主要叙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排列。民族文化典十志，基本上按语系分类排列。中外文化交流典十志，按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各大区域交往分区排列。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按内容排列。

宋人郑樵《通志·总序》有曰：“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志者，宪章之所系。”指的是，史书的编纂关系到发掘历史鉴戒之所在，所以，编纂者不能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而应在驰骋于遗文故册时，“运以别识心裁”，求其“义意所归”，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

本书以典、志命名，正是承续这样的体例和精神。唯本书为文化通志，所述自然是文化方面诸事，其编撰特色，可以概括为“类”与“通”二字。

“类”者立类。全书十典，各为中华文化一大门类；每典十志，各为大门类下的一个方面；每志中的“编”“章”“节”“目”，亦或各成其类。如此依事立类，层层分疏，既以求其纲目分明，论述精细，也便于得门而入，由道以行，俾著者、读者都能于浩瀚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探骊得珠，自在悠游。

“通”者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类相从时，复举其始终，察其源流，明其因革，论其古今。盖一事之立，无不由几及显，自微至著，就是说，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弄清楚了一事物一制度一观念的演变轨迹，也就多少掌握到了它内在本质，摸索到了它的未来趋势。

“通”者汇通。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质形态的，制度形态的，还是观念形态的，都非孤立存在。物质的往往决定观念的，观念的又常左右物质的；而介乎二者之间的制度，固受制于物质与观念，却又不时反戈一击，君临天下，使制之者大受其制。其内部的诸次形态之间，也互相渗透，左右连手，使整个文化呈现出一派斑斓缤纷的色彩。中华文化是境内古今各民族文化交融激荡的硕果；境外许多不同种的文化，也在其中精芜杂存，若现若隐。因此，描绘中华文化，于贯通的同时，还得顾及如此种种交汇的事实，爬梳剔理，还它一个庐山真面目。此之谓“汇通”。

“通”者会通。“会”字，原义为器皿的盖子，引申为密合；现在所说的“体会”、“领会”、“会心”、“心领神会”等，皆由此得义。《中华文化通志》所求之通，通过作者对中华文化的领悟，与中华民族心灵相体认，与中华文化精神相契合。

这就是《中华文化通志》依以架构旨趣之所在。是耶非耶，知我罪我，恭候于海内外大方之家。

《中华文化通志》由萧克将军创意于1990年。1991年先后两次在广泛范围内进行了论证。1992年组成编纂委员会。十典主编一致请求萧克将军担任编委会主任委员，主持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1993年1月和1994年2月，全体作者先后齐集北京、广东花都市，研究全书宗旨，商定典志体例，切磋学术心得，讨论写作提纲。事前事后，编委会更多次就全书的内容与形式、质量与速度、整体与部分、分工与协作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近二百位作者进行了创造性构思和奋斗式劳作。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编委会办公室承担了大量的日常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本书出版任务，并组织了高水准高效率的编辑、审读、校对队伍，使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得以现今面貌奉献于世人面前。我们参与这一工作的全体成员带着兴奋而又惶恐的心情，希望它能给祖国精神文明建设大业增添些光彩，更期待着读者对它的不当和不足之处给予指正。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 内容提要

吴越文化是长江下游的地域文化,本志全面叙述它七千年的发展历程及其成就。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叙述自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时期吴越地区的夷越文化。先考察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生发展、东南文明的兴起与衰落,进而论述吴越文化的形成,然后分专题讨论夷越文化诸层面的内涵,涉及吴国金文、越国金文、稻作文化、史前玉器、丝织、陶瓷与冶金、神话、艺术与文学、古越语等方面,并对吴越文化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中的突出贡献作了深刻揭示。下编叙述秦汉以后吴越地区的汉族文化。在汉文化时期,吴语在汉语方言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吴声歌曲、白话小说、戏曲曲艺为代表的文学和以音乐、舞蹈、绘画、书法为代表的艺术,两千多年间也有辉煌的成就,本志对此作了详细的阐述。此外,本志对吴越水乡的风采,吴越丰富多样的民俗有形象生动的描绘;对吴越地区学者们的思想、科技发展的成就、吴越地区的宗教有细致全面的概括。

# 《中华文化通志》编辑出版人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总 决 审	陈 昕				
总 顾 问	余志明				
总 监 制	郁椿德				
编辑部主任	朱金元				
编辑部副主任	虞信棠				
责任编辑	王有为	王界云	孔令琴	叶亚廉	朱子恩
	朱金元	汤中仁	苏贻鸣	杨承纮	李 卫
	李文俊	李远涛	吴书勇	宋慧曾	张 玫
	张 臻	张美娣	陆凤章	胡小静	郝盛潮
	秦建洲	顾兆敏	夏绍裘	唐继无	曹文娟
	曹培雷	屠玮涓	虞信棠		
责任决审	王有为	王树鸣	王界云	宋 存	严忠树
	吴慈生	张 玫	张满鸿	周琪生	柳肇瑞
	胡小静	钱雪门	高登瀛	夏国智	黄行发
	魏允和				
装帧设计	吕敬人工作室				
美术编辑	孙宝堂				
监 制	戴 弘				
技术编辑	沈树德	吴 坚	何永康	姜华生	曹伯祥
责任编辑	王秀菊	张新宇	陆永洲	陆秉熙	顾伟民
	唐毓华	谈 维	陶雪英	龚养耿	
编 务	朱玉堂	张大潮			

# 目 录

导 言.....	1
----------	---

## 上编 夷越文化时期

<b>第一章 吴越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b> .....	11
<b>第一节 太湖—钱塘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b> .....	12
一、钱塘江以南的河姆渡文化 .....	12
二、钱塘江以北的马家浜—崧泽文化 .....	14
三、钱塘江南北的良渚文化 .....	17
<b>第二节 宁镇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b> .....	18
<b>第二章 东南文明的兴起、扩散与衰落</b> .....	21
<b>第一节 文明的兴起</b> .....	21
一、天国的统一 .....	21
二、“土筑金字塔”与大型祭祀遗址 .....	26
三、良渚文化遗址群与中心遗址 .....	29
<b>第二节 文明的扩散与衰落</b> .....	35



<b>第三章 吴越文化的形成</b> .....	46
<b>第一节 越文化的诞生</b> .....	46
一、马桥文化——越文化的前身 .....	46
二、山东夏裔与江南越国的关系 .....	50
<b>第二节 吴文化的诞生</b> .....	56
一、湖熟文化——吴文化的前身 .....	56
二、周人南下与宜(吴)国建立 .....	59
<b>第三节 吴越文化的融合统一</b> .....	62
一、吴文化的中期突变(越化) .....	62
二、干越文化的加盟 .....	65
<b>第四章 吴国金文</b> .....	69
<b>第一节 吴国金文集录</b> .....	69
<b>第二节 从吴国金文看吴国的历史文化</b> .....	90
一、从吴国具铭铜器的器类、装饰看吴国的文化特点 .....	90
二、吴国的国名 .....	92
三、吴国的人名 .....	94
四、从吴国具铭铜器出土地点谈吴国的一些历史问题 .....	98
<b>第五章 越国金文</b> .....	102
<b>第一节 越国金文集录</b> .....	103
<b>第二节 从越国金文看越国的历史文化</b> .....	123
一、从越国具铭铜器的器类、装饰看越国的文化特点 .....	123
二、从铜器铭文谈越国国名 .....	125
三、从铜器铭文谈越国世系 .....	126
四、从越国具铭铜器出土地点看越国势力的消长 .....	127

<b>第六章 稻作文化</b> .....	132
<b>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的稻作文化</b> .....	132
一、各地的稻作遗存.....	133
二、罗家角与河姆渡的稻作文化.....	138
三、农具的进步.....	142
四、水利与水井.....	148
<b>第二节 夏商周时期的稻作文化</b> .....	151
一、金属农具.....	151
二、吴越水利.....	156
<b>第七章 史前玉器</b> .....	159
<b>第一节 从河姆渡时期到崧泽时期的长江下游玉器文化</b> .....	159
<b>第二节 良渚文化时期的长江下游玉器文化</b> .....	161
一、皖南地区的玉器文化.....	161
二、良渚文化玉器的流散与地层的发现.....	165
三、良渚文化玉质礼器及其母题纹饰.....	167
四、良渚文化玉器的材料与雕刻方法.....	184
<b>第八章 丝织、陶瓷与冶金</b> .....	187
<b>第一节 世界丝织发源地</b> .....	187
<b>第二节 陶器</b> .....	189
<b>第三节 原始瓷器</b> .....	193
<b>第四节 冶金</b> .....	200
一、青铜器.....	200
二、冶铁业.....	208
<b>第九章 神话、艺术与文学</b> .....	211

第一节 有关鸟的神话与艺术·····	211
一、河姆渡文化的鸟日(月)同体神话与艺术·····	211
二、良渚文化关于鸟的神话与艺术·····	213
三、“羽人”神话·····	224
四、“鸟田”神话·····	228
五、东周以后的鸟崇拜·····	229
第二节 音乐·····	231
一、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乐器·····	231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	233
三、句鑿·····	238
第三节 关于大禹、防风的神话传说·····	242
第四节 吴越诗歌·····	246
<b>第十章 古越语·····</b>	<b>253</b>
第一节 吴越两国所说古越语的系属·····	254
第二节 古越语文献解读·····	255
一、《越人拥楫歌》解读·····	255
二、勾践《维甲令》解读·····	260
三、吴越史书《越绝》解义·····	265
第三节 古吴越语词本义探释·····	267
一、古吴越地名解义·····	267
二、古吴越王名谥号解义·····	274
三、扬雄《方言》古吴越词语解·····	277
第四节 古越语的语言特点及遗存词辨识·····	280

## 下编 汉文化时期

<b>第一章 吴语</b> .....	285
<b>第一节 吴语概况</b> .....	285
一、吴语分布地域及人口.....	286
二、吴语的源流.....	287
<b>第二节 吴语的分区</b> .....	300
一、北区.....	300
二、南区.....	302
三、西区.....	303
<b>第三节 吴语的特征</b> .....	305
一、现代吴语的一般特征.....	305
二、古吴越语遗存的特征.....	310
三、吴语各区片的特征.....	317
<b>第四节 吴语与相邻方言的关系</b> .....	331
一、北部、西部吴语与官话、赣语.....	332
二、南部吴语与闽语、徽语.....	334
<b>第二章 文学</b> .....	336
<b>第一节 吴声歌曲</b> .....	336
<b>第二节 白话小说</b> .....	340
<b>第三节 戏曲曲艺</b> .....	352
<b>第三章 艺术</b> .....	366
<b>第一节 音乐</b> .....	366
<b>第二节 舞蹈</b> .....	371

第三节	绘画	380
第四节	书法	390
<b>第四章</b>	<b>江南水乡风采</b>	400
第一节	江南的园林特色	400
第二节	水乡的古桥风貌	412
第三节	吴越的民间工艺	422
<b>第五章</b>	<b>学术思想与宗教</b>	435
第一节	学术思想	435
一、	经学与哲学	436
二、	史学与方志	451
第二节	宗教与信仰	470
一、	道教	470
二、	佛教	474
三、	其他宗教信仰	479
<b>第六章</b>	<b>科学技术</b>	482
第一节	汉魏六朝时期的吴越科技成就	482
一、	汉代的化学知识与科技思想	482
二、	东吴的天文地理与生物学知识	484
三、	两晋的天文历法、化学与医学	486
四、	南朝的自然科学成就	488
第二节	隋唐五代宋元时期吴越科技的繁荣	491
一、	隋唐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及其他	491
二、	宋元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高峰	493
第三节	明清时期吴越地区科学技术的缓慢发展及西方	

---

科技的传入·····	504
一、医药学成就·····	504
二、数学成果·····	512
三、天文学的停滞与发展·····	514
四、徐霞客等地理学家的成就·····	516
五、潘季驯、陈潢对治理黄河的贡献·····	519
六、地方性农书与综合性农书的增多·····	520
七、化学及其他科技成就·····	523
<b>第七章 民俗·····</b>	<b>526</b>
<b>第一节 节日民俗·····</b>	<b>527</b>
一、岁时·····	527
二、农事·····	535
<b>第二节 生活民俗·····</b>	<b>538</b>
一、饮食·····	538
二、服饰·····	542
三、居住·····	543
<b>第三节 礼仪民俗·····</b>	<b>546</b>
一、生育·····	546
二、成年礼·····	550
三、婚姻·····	551
四、丧葬·····	556
<b>第四节 祭祀、信仰民俗·····</b>	<b>559</b>
<b>参考文献·····</b>	<b>563</b>

# 导 言

## 一

“吴越文化”这一名词,开始出现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卫聚贤等历史学家在南京、苏州、上海、杭州、湖州等地发现一些新石器、印纹陶、玉器等上古时代的遗物,提出“中国文化起源于东南”的新说,并把这种上古时代的江南文化称为“吴越文化”。1936年8月下旬在上海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选蔡元培为会长。1937年出版一本收有一二十位作者论文的《吴越文化论丛》。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吴越文化的研究随即停顿下来。

五十年代以来,长江下游地区的田野考古工作成绩斐然,考古学界又使用起“吴越文化”这个名词。但其含义与三十年代有所不同。三十年代的“吴越文化”泛指上古时代(包括新石器时代与金属时代)的江南文化,现在考古学界使用的“吴越文化”,是指吴、越建国以后的青铜文化,不包括新石器文化。考古学界关于“吴越文化”含义的界定,是以“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惯例为依据的。根据“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惯例,史前文化一般以最初发现的典型遗址所在的小地名作为该文化的名称。例如:河姆渡文化遗址已发现数十处,其中以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最早,故称那数十处遗址所表现的属性相同的文化为“河

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遗址已发现数百处,其中以余杭良渚遗址发现最早,故称“良渚文化”。这些都是史前文化。至于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一般都以国家、民族的名称来命名。例如“商文化”、“周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等。吴越文化既然以吴、越二国的国名来命名,这对考古学文化来说,自然基本上是指吴、越二国时期的文化。因此,现在考古学界使用的“吴越文化”,是指吴越地区青铜时代文化。1988年初版的拙著《吴越文化新探》,因采用考古资料较多,故就近取义,依循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惯例,其所使用的“吴越文化”,指的是吴越地区青铜时代文化。但该书的论述范围,包括新石器文化,把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文化作为吴越文化的历史文化土壤来论述。

其他地域文化,如“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等,最初也指秦代以前的该地区文化。这是因为,秦统一中国以前,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别特别明显。

我国的地域文化研究,以长江流域的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起步较早,这是因为传统史学、尤其是传统史学中的先秦史研究视野,基本上局限于黄河流域,对长江流域的先秦文化、尤其是史前文化了解甚少。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长江流域开始出现秦代以前的考古资料,其文化面貌与黄河流域判然有别,令人耳目一新。于是,“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就作为填补中华文化的空白而被提上了研究日程。

因此,地域文化研究,先从长江流域的先秦文化起步,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但是,根据中华文化的特点,地域文化研究如果停留于秦代以前的长江流域,则要重复传统史学的缺点——研究视野不够广阔,忽视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文化既基本统一又千差万别、丰富多采的特点;秦代以后,及至现代,各地文化差别虽不如秦代以前那么明显,但仍有不同程度的区域特色,中华文化的区域特色是会永远存在的。因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地域文化研究开始出现全面开花、



通贯古今的局面。

## 二

地域文化研究从先秦延伸到近、现代,甚至当代,是学术的进步,也是现实生活的需要。现在,“吴越文化”这个概念,事实上已出现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吴越文化”囊括古今,狭义的“吴越文化”限于秦统一中国以前,甚至限于青铜时代。两者只有时间幅度上的广、狭之分,并无价值取向上的是非之别,不必以此非彼。有的学者研究狭义的“吴越文化”,有的学者研究广义的“吴越文化”;有的学者既研究狭义的“吴越文化”,又研究广义的“吴越文化”。广义的“吴越文化”还是个新事物,对它更应取保护、扶持的态度。

广义的“吴越文化”取消时间限制,会不会漫无边际,丧失自己的特色呢?不会的。因为文化既从属于时代,又从属于地域环境。地域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人们在同一个自然环境中生活、劳动,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逐渐形成共同的文化现象,与其他地域的文化相比,具有特殊的地域个性。这种具有地域个性的文化现象,成为后来居住在这一地域的居民的人文环境,会世代影响他们的文化创造导向。

在中国的各支广义的地域文化中,吴越文化所经历的变异程度较大,但仍然可以找出它的历史延续轨迹和“遗传基因”。如果从河姆渡文化算起的话,广义“吴越文化”的七千年间,长江下游的主体居民,发生过一次“换了人间”的沧桑巨变。秦统一中国以前,文化创造者基本上是夷越人。秦统一中国以后,文化创造者基本上是后来所称的汉族人。这场巨变,大致从战国中期楚威王败越开始,至秦汉时期基本完成。其间,影响这一变化最为激烈的事件莫过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化首先从属于民族,由于创造文化的民族不同,语言、习俗等文

化现象也就基本不同,但因他们是生活在同一地域环境之中,前后的文化现象仍有一定的继承性。在所有的文化现象中,与民族性关系最为密切的莫过于语言。秦统一中国以前,吴越地区基本上通行多音节的古越语。秦统一中国以后,吴越地区基本上通行单音节的汉语。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语言。但是,秦汉以后入主吴越地区的汉人,在使用汉语的同时,又不得不继承古越语的某些遗存。例如:

第一、仍然大量使用古越语地名。如句章、句容、句甬东、余杭、余姚、乌伤、乌程、于潜、姑苏、无锡、芜湖、诸暨等。

第二、仍使用古越语的某些物名。壮侗语是古越语的活化石。古文献中的西南獠人是古越人的后裔。《魏书·獠传》记獠人“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浙江河姆渡遗址与罗家角遗址出有六七千年以前的干栏式建筑遗物。今壮侗语仍称“屋”或“家”为“栏”。作为汉语方言之一的吴语,称关养牲畜的地方为“栏”,如“猪栏”、“牛栏”。北方则称“圈”而不称栏。中国戏剧起源于宋元时代的浙江,当时称戏台为“勾栏”。这些“栏”字,都是古越语的底层遗存。柚是南方古越人最早种植的水果之一。今浙闽汉语方言称柚为“抛”,跟侗语“柚子”一词的语音甚近。“栏”、“抛”等例说明,汉人入主浙闽后,仍沿用越人的某些物名。<sup>①</sup>

至于其他方面的文化遗产,继承得更多。以物质文化言,稻作、陶瓷、冶金、舟楫等,入主吴越地区的汉人都继承了越人的文化成果。

以精神文化言,吴越争霸的历史,一直激励着后代的汉人。例如,鲁迅是一位最富革新精神的文学家,但仍念念不忘二千多年前的先贤勾践<sup>②</sup>。1912年1月,鲁迅在绍兴执教,撰《〈越铎〉出世辞》说:“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

①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勾践,或作句践,皆读 gōu,可通用。本书一律用勾践。

以自理。”同年2月1日,鲁迅在《越铎日报》发表《尔越人毋忘先民之训》一文,说:“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盖越自勾践以来,遗风未泯……。”无锡传说是陶朱公经商致富的地方,无锡到处有范蠡传说景点,这使无锡人富有经商致富的文化取向。无锡近代几位著名的企业家,无不得益于这种地方传统的熏陶。

总之,广义的吴越文化,虽包括前后两大不同民族集团的文化,但其间仍有继承关系。“换了人间”,却换不了共同的地域空间。这就是广义的地域文化可能存在的原因。

上下七千年的广义吴越文化,有哪些共同特征?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吴越文化有哪些个性特点?这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有些人以“开放”、“爱国”、“勤劳勇敢”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词语来概括某一地域文化的特点,恐怕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些词语同样适用于其他地域文化。温湿多水的自然环境,集约化的生产方式,深厚浓重的精神文化氛围,产生柔、细、雅的个性,似乎是广义吴越文化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尤其是北方文化的特征所在。对这一问题,笔者仅有依稀的直感,未作深入研究,先写出简单几句,供同好参考。

狭义的吴越文化,已经研究了60年,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一套自己的操作程式,结出了一些成果。而广义的吴越文化研究,还只有几年时间,尚处于提倡、起步阶段。在这个时候,不宜先定个明确的界限,让大家在既定的框子里写文章,发议论。而只能有个模糊的研究范围,让大家凭自己的见解,做起来再说。成果多了,通过切磋问学,一门新的学术门类——广义的吴越文化,就会自然形成。

本书分上、下二编。上编写的是新石器时代至秦统一中国以前的夷越文化,下编写的是秦汉至今的汉族文化。称前者为夷越文化、后者为汉族文化,都是就“基本”意义说的。春秋晚期以后,中原华夏文化已深入吴越地区,尤其是楚威王败越以后,楚人已进入“故吴地”。秦汉以后,中原华夏人更是大量南下,越人纷纷远徙海外与西南地

区。留下来的越人先后被汉人融合同化。秦汉以后吴越地区的汉族，包含着大量古越人成分，吴越地区的汉族文化包含着大量夷越文化。但就基本方面言，战国以前为夷越文化，秦汉以后为汉文化，则是不争的事实。本书上编第十章“古越语”与下编第一章“吴语”，介绍的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

关于“夷越”之称，需要作点解释。

从马桥文化到东周时期，太湖流域、浙江全境，基本居民都是古越人，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个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基本居民是不是也是古越人呢？对于这个问题，看法就有分歧，有的认为也是古越人，有的认为未必。从出土遗物的文化面貌判断，必与中原民族判然有别，这是大家一致肯定的。即使不是后来古越人的直接祖先，也应该是他们的相同族属，操相同的语言。至于宁镇地区、皖南地区、赣东北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居民，就很难说出具体族名，但与中原不同族，也是可以肯定的。在相当于夏商时期的皖南、宁镇地区的居民很可能是淮夷。在马桥文化时期，太湖平原东部来了不少东夷人。吴灭徐后，徐故地居民变成吴国臣民，并有大量徐夷流入越国。总之，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长江下游的基本居民，都不是中原的华夏人。在古代文献中，“夷”字的涵盖面比“越”大，一切异于华夏的民族，皆可称夷。因此，本书称上编为“夷越文化”，虽嫌模糊，却可确保无误。

本书的写作过程十分不幸、颇为曲折。最初是我与金永平同志承担撰写工作，我负责上编，金永平同志负责下编。1995年夏，金永平同志赴内蒙古参加一次关于编写地域文化丛书的学术会议，不幸突然患病，于7月13日在张家口去世，为研究地域文化献出了生命！金永平同志是一位品行完美、堪称楷模的年轻人，“嗟尔幼志，有以异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橘颂》）。这样好的朋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他去世后，朋友们非常悲痛，自动集资为他出了一本纪念文集。金永平同志自承担本书的撰写任务以后，即十分认真地投入工

作,他搜集的资料非常丰富,据说已基本完成草稿的撰写工作。但因居住条件不佳,资料、手稿分散各处,他去世后,家属与朋友在他的遗稿中只找到三章是完整的,这就是本书下编的第二、三、四章。后来,我又理出三篇,插入上编的第九章中,为第一节的三和第三、第四节。为了补缀残缺,郑张尚芳、叶大兵、叶建华、严军四位同志,拨冗撰写了有关篇章,使成完璧。其中郑张尚芳撰写上编第十章、下编第一章,叶建华撰写下编第五章,严军撰写下编第六章,叶大兵撰写下编第七章。对于他们的热情帮助,深表感谢!其他章节由我撰写,全书由我统稿。各人观点,不求统一,文责自负。

书虽成,人已去,谨以此书,奠祭永平同志!

**董楚平**

1996年11月28日

杭州楼内楼



上 编

夷越文化时期





# 第一章 吴越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文化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吴越文化作为长江下游统一的区域文化,是到春秋时期才形成的。在这以前,吴自吴,越自越,吴文化与越文化是两支不同的区域文化,这种区别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造成这种区别的主要原因是地理条件。

古代长江在镇江以东江面突然变宽,形成喇叭口,今南通、靖江等地当时都在泽国之中,因此,南北交通不便。镇江以西,江面较窄,南北交通方便。这使镇江以西地区容易接受江北地区的文化影响,而镇江以东的太湖平原则自成一统,其文化更具地域特色。此其一。其次,镇江地区的茅山把苏南大地隔成东西两部,西部是宁镇丘陵,东部是太湖平原。今苏州、无锡、上海、杭嘉湖平原,以及钱塘江南岸的宁绍平原,是水网交织的大平原,文化面貌比较一致,是越文化主要分布区。镇江以西的宁镇丘陵,横贯着一条秦淮河,流经南京市和江宁、溧水、句容三县,全长约 110 公里,流域面积 2600 平方公里,与安徽的滁河流域隔江相望。由于这里的江面不宽,江南的宁镇与江北的扬州、六合等沿江地带,以及长江西岸的滁河流域,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这里与徐淮、中原地区交往较多,是周人初到江南之地,是吴文

化的发祥地。

吴越中心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基本上可以苏南茅山为界,分为两大片,即太湖—钱塘江流域和宁镇地区。

---

## 第一节 太湖—钱塘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

太湖—钱塘江流域是中国新石器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十分密集。河姆渡文化的稻作遗存与良渚文化的玉雕礼器,是该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代表性遗物。

### 一、钱塘江以南的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遗址最早发现于浙江余姚罗江乡渡头村,位于杭州湾南岸,四明山之北,濒临姚江,属宁绍平原,地势低洼。1973年夏,余姚罗江公社社员在渡头村建造排涝站时,掘到一批夹炭黑陶陶片、建筑木构件和大量古动物的骨与角。浙江省考古工作者随即进行试掘,探明遗址分布范围约有40000平方米。1973年11月至1974年1月正式发掘,发掘面积630平方米,出土了石、骨、木、陶等材料制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器和装饰品等1600多件(不包括陶片和破碎不可复原的器物),发现了大批动植物遗存,揭露出大片木结构建筑遗迹,而最重要的收获还是发现大量人工栽培稻谷<sup>①</sup>。1977年10月至1978年1月,进行第二期发掘,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共发现墓葬27座,灰坑20个,出土经编号的文物

---

<sup>①</sup>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林华东:《河姆渡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页。

4712件,仍发现大量稻谷、稻秆、稻叶、谷壳、木构件、芦苇席以及其他植物的茎叶、果实。<sup>①</sup>

两次发掘表明,河姆渡遗址有四个文化层:第一层距今约5200—4700年,第二层距今约5800—5500年,第三层距今约6400—5900年,第四层距今约7000—6500年。

在河姆渡遗址的四个文化层中,第四层不但年代最早,而且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是河姆渡遗址的主要堆积层。在第四层的居住区内,堆积着大量人工栽培的稻谷遗存。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河姆渡第四层发现的稻谷遗存是亚洲年代最早的人工栽培稻。其数量丰富与保存完好,为世界罕见。第四层还发现成行排列的木桩和大量的梁、柱、地板等木构残件,总数有数千件之多,其中有大量榫卯残件,是我国最丰富的榫卯构件遗存。在第四层,还出有彩陶、木桨、玉器和象牙雕刻的艺术品。

第三文化层出土一只木质漆碗外表有朱红涂料,经科学分析,鉴定为生漆。这是全世界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涂漆制品。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现的河姆渡文化,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工作的最重大突破。它的年代略早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而它所达到的水平就总体来说并不亚于仰韶文化。更重要的是两者的文化面貌迥然不同。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在1977年明确地甄别了河姆渡文化和仰韶文化主要器物群之间的差异,从而得出结论:两者的“文化面貌”“完全不同”<sup>②</sup>。河姆渡文化证实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多源性,证实了长江下游是中国原始文化的另一个中心,有它自己独立发展的过程。

<sup>①</sup> 《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河姆渡文化初探》,第6—8页。

<sup>②</sup> 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 二、钱塘江以北的马家浜—崧泽文化

### (一) 马家浜文化

马家浜文化因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达钱塘江北岸,西北到常州一带。年代约始于公元前 5000 多年,到公元前 3900 年左右发展为崧泽文化。主要遗址有:嘉兴马家浜遗址、湖州邱城遗址、吴县草鞋山遗址、吴江梅堰遗址、常州圩墩遗址、桐乡罗家角遗址和上海崧泽遗址下层等。其中,以罗家角遗址下层年代最早。

罗家角遗址位于浙江桐乡西石门镇东北。1979 年冬进行发掘,发现四个文化堆积层,皆属马家浜文化。罗家角遗址第四、三层属马家浜文化早期,第二、一层属马家浜文化晚期。罗家角第四层的年代数据已有四个,碳-14 数据分别为距今  $6905 \pm 155$  年(起迄年代为 1950 年,下同)、 $7040 \pm 150$  年、 $6890 \text{ 年} \pm 10\%$ ;热释光数据为距今  $7170 \text{ 年} \pm 10\%$ <sup>①</sup>。四个数据如此接近,足见所测年代的可靠性,证明罗家角第四层的最早年代可能稍早于河姆渡第四层的最早年代。

农业生产是马家浜文化居民定居生活的基础。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在罗家角、草鞋山和崧泽遗址下层都出有稻谷,经鉴定有粳稻和籼稻两种。罗家角出土的稻谷,数量之多仅次于河姆渡,年代则可能稍早于河姆渡。

渔猎经济占有重要地位。在马家浜、崧泽、圩墩等遗址的下层,都有大量的兽骨堆积。马家浜遗址的兽骨堆积厚达二三十厘米。圩墩的野生动物骨骼经过鉴定,有梅花鹿、四不像、野猪、獐、貉、麂、草

<sup>①</sup> 四个数据引自《浙江省新近十年的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6 页。

龟、鼈、鲫鱼和鸟类等。其中,梅花鹿、四不像和野猪的数量较多。在一些遗址中还发现野生的桃、杏梅的果核和菱角等,这是当时居民从事采集活动的物证。马家浜文化的居民已开始家畜的饲养,罗家角出土的猪、狗、水牛骨骼,经鉴定均属家畜。

在圩墩遗址出有铲形和喇叭形等木器,在喇叭形木器的下端,有暗红色或黑色并略带光泽的涂料。

在草鞋山遗址出有三块距今 6000 多年前的残布片,经鉴定,原料可能是野生葛。这是纬线起花的罗纹织物,密度是每平方厘米经线约 10 根,纬线罗纹部约 26—28 根、地部 13—14 根。纹式有山形斜纹和菱形斜纹,组织结构属绞纱罗纹,嵌入绕环斜纹,还有罗纹边组织。这是中国迄今所知的最早纺织品。这种纬线起花的罗纹编织,不同于普通的平纹编织,表明已有比较进步的织造工艺。

在马家浜、圩墩、草鞋山等地共发现墓葬数百座,都埋葬着密集的人骨,说明是氏族的公共墓地。一般不挖墓圻,不用木质葬具,就地用土掩埋。草鞋山 106 座墓中,有 25 座无随葬品,其他的有 1—4 件;最多的为一座成年女性墓,有 9 件。随葬品大多是 1 件食器,或食器和炊器各 1 件。只有 2 座墓用生产工具随葬,各有 1 件石斧。大多是单人俯身葬。在草鞋山和圩墩,有几座同性合葬墓,死者年龄相近。以上情况说明:当时还没有贫富差别和私有观念,生产工具公有公用;妇女地位较高,处于母系氏族阶段,血缘纽带牢固;同性合葬墓反映了对偶婚的习俗。

## (二) 崧泽文化

崧泽文化因上海青浦崧泽遗址而得名<sup>①</sup>。代表性遗址有崧泽遗址中层,以及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常州圩墩、湖州邱城等遗址的相

<sup>①</sup> 《上海市青浦县崧泽遗址的试掘》,《考古学报》1962 年第 2 期;《青浦县崧泽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80 年第 1 期。

应层次。年代约为公元前 3900 年至前 3300 年。崧泽文化层普遍叠压在马家浜文化层之上,器类形制存在继承演变关系。石器品类增多,大多通体磨光。在邱城与崧泽各出 1 件体形较小的三角形石犁,这是后来良渚文化的重要农具。说明崧泽文化农业生产水平比马家浜文化进步。

马家浜文化的陶器都为手制,崧泽文化陶器普遍采用慢轮修整,有些可能已用轮制。腰沿釜是马家浜文化的代表性炊器,到崧泽文化时期,鼎发展成为主要炊器,先以釜形鼎为主,后以大口平底的盆形鼎为主。崧泽、草鞋山发现几片圆点弧线三角纹的衣黑彩陶片,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相似。

崧泽中层发现墓葬 90 多座,草鞋山的崧泽文化层中发现墓葬 89 座。两地都是平地覆土掩埋死者,盛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上海崧泽中层有个别墓是成年女性与儿童双人合葬;吴县草鞋山有 2 座墓是成年男女合葬。随葬品的数量比马家浜文化有所增多。两地都有猪下颌骨随葬。山东大汶口墓地<sup>①</sup>和甘肃秦魏家墓地<sup>②</sup>发现随葬着大量猪下颌骨和猪头骨,被考古界公认是私有财产的象征。在中国民族志材料中,黎族、佤族、纳西族都有过以猪下颌骨随葬的风俗,以此作为财富的标志<sup>③</sup>。崧泽文化的猪下颌骨随葬,可能具有同样性质。草鞋山的两座男女合葬墓,都是男左女右。其中一座男女各有木质葬具痕迹,另一座男性仰身直肢,女性侧身,同齐家文化墓葬中发现的情况相似,说明女性已成为男性的附庸。崧泽文化可能处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阶段。

① 《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1974 年版。

② 《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 年第 2 期。

③ 志远:《海南岛黎族人民的葬俗》,《考古通讯》1958 年第 7 期;李仰松:《佤族的葬俗对研究我国远古人类葬俗的一些启发》,《考古》1961 年第 7 期;宋兆麟:《云南永宁纳西族的葬俗》,《考古》1964 年第 4 期。

崧泽时期,贫富分化已较悬殊。“大约在距今 5800 年左右,便已进入贫富分化阶段。武进乌墩遗址的 9 座崧泽文化早中期墓中,8 座为随葬品少于 6 件的小墓,独有 M15,不但拥有近 40 件随葬品,而且墓坑规整,墓室敷朱,显示了墓主与一般氏族成员迥然不同的规格差别。常州圩墩崧泽文化墓葬中也有十分明显的贫富和等级分化现象,如 M121、M134 两座大墓均出土 30 余件器物。”<sup>①</sup> 近年的新资料表明,太湖地区向文明时代进发的步伐至迟在崧泽文化晚期就已经开始了,以致崧泽文化晚期与良渚文化早期往往界线模糊,难以划分。

### 三、钱塘江南北的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因浙江余杭的良渚遗址而得名,年代约为公元前 3300 年至前 2100 年。良渚文化是直接继承崧泽文化与河姆渡晚期文化发展而成的,分布范围包括钱塘江南北的广大地区与舟山群岛,传播至长江北岸的海安与淮河以北的新沂。苏南的太湖平原、上海、杭嘉湖平原,是良渚文化的发达地区。主要遗址有余杭良渚、吴县草鞋山、张陵山和梅堰龙南、武进寺墩、上海青浦福泉山、上海马桥、嘉兴雀幕桥、湖州钱山漾、杭州水田畈、昆山赵陵山等。

良渚文化农业已进入犁耕阶段,三角形石犁已较普遍。钱山漾有成堆的炭化粳稻与籼稻,并发现舂米的陶臼。在钱山漾和水田畈遗址中,还发现许多植物种子,已辨明的有花生、芝麻、蚕豆、菱、甜瓜子、毛桃核、酸枣核、葫芦等。钱山漾出土丝织品绢片、丝带和丝线,经鉴定,原料都是家蚕丝。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最早的丝织品。

---

<sup>①</sup> 《江苏昆山赵陵山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 60 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中心 1996 年版,第 34—35 页。

良渚文化早期就已经出现大型墓葬,这些大墓基本上都葬在人工堆筑的“墩”与“山”上,考古学家称这些“墩”、“山”为“土筑金字塔”。随葬品以大型玉质礼器为主。良渚文化小墓基本上不见玉器,即使有,也都是小件装饰品。良渚文化的阶级分化已很悬殊,已出现国家政权,已进入文明时代。

---

## 第二节 宁镇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

宁镇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现还不多,尚未理出该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到目前为止,该地区已命名的新石器文化还只有“北阴阳营文化”。

“北阴阳营文化”因南京市北阴阳营遗址而得名<sup>①</sup>。分布于江苏宁镇地区和安徽滁河流域。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主要遗址除南京北阴阳营外,还有南京西善桥太岗寺<sup>②</sup>、江宁湖熟镇的前岗、稜陵关神墩和陶吴镇的胥庙<sup>③</sup>、安徽滁县朱勤大山等处。

1955年至1958年,南京博物院四次发掘北阴阳营遗址。该遗址第二、三层是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第四层是新石器文化。第四层内涵最为丰富,遗址的东部是居址,西部是墓地,西部有墓葬253座,东部有墓葬13座,共266座。

陶器的牛鼻式器鬲、角状把手、弯屈的器足,构成自己的地方特色。彩陶是其代表性遗物之一,有白衣红彩、红衣深红彩、红衣黑彩

---

① 《南京市北阴阳营第一、二次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② 《南京西善桥太岗寺遗址的发掘》,《考古》1962年第3期。

③ 《宁镇山脉及秦淮河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普查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



等。在苏南太湖地区,彩陶仅偶尔见之;在浙北杭嘉湖地区,迄今未见彩陶。

石器磨制精细,有七孔石刀与穿孔石锄等进步工具。玉石和玛瑙装饰品丰富,有玦、璜、管、珠、坠饰等,工艺水平略高于同时期的太湖地区。

遗址西部是一片公共墓地,面积约700平方米,清理出墓葬253座,分布密集,上下叠压多的达4层。未发现墓坑和葬具。盛行单人一次葬,没有发现男女合葬墓。大部分墓中有随葬品,多数在10件以内,有一座墓中陶器和玉器多至40件,另有几座还用一二件猪下颌骨随葬。北阴阳营文化大致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末期,但已孕育着父系氏族社会的萌芽。

宁镇地区东邻太湖流域,西邻安徽,两方面的影响都有。但是,北阴阳营文化是一支独立的原始文化,很难归属邻近地区的某支文化,应该有自己的来源和发展序列。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南京博物院在宁镇地区发掘了句容孙头山、丹徒磨盘墩、南京营盘山、六合羊角山、丹阳王家山、句容丁沙地等遗址。丁沙地遗址年代较早一部分遗物如带足磨盘、白衣彩陶片,与裴李岗文化的同类器相似,这为我们提供了宁镇地区存在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信息。<sup>①</sup>

过去,在北阴阳营文化与早期青铜文化——湖熟文化之间,存在着缺环。近年,已发现这两者之间的过渡性文化遗存。它的代表性遗址是江宁点将台遗址下层<sup>②</sup>。在句容县城头山遗址和丹徒县赵家窑团山遗址的早期湖熟文化层之下,也“发现与点将台遗址下层相同的文化层”<sup>③</sup>。以点将台下层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的特征是:基本沿袭北

① 南京博物院:《近十年来江苏考古的新成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页。

② 南京博物院:《江宁汤山点将台遗址》,《东南文化》1987年第3期。

③ 南京博物院:《近十年来江苏考古的新成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第105页。

阴阳营文化的陶系,以红陶为大宗,但泥质灰陶、黑陶和薄胎磨光黑陶也占一定比例,不见硬陶;陶器以素面为主,少数有纹饰的陶器,与河南龙山文化的陶器纹饰相近,主要有绳纹、篮纹、方格纹;炊器以鬲为主,亦有鼎,不见鬲;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有镞、凿、刀等;目前尚未发现青铜器。点将台、城头山、团山等遗址中这一类地层上面,皆叠压着湖熟文化层,城头山遗址的这一地层还叠压在相当于崧泽晚期至良渚早期的墓葬群之上,因而其年代应早于湖熟文化。“根据陶器形制与湖熟文化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推测,其时代大致与二里头文化相当,应为宁镇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至青铜文化之间的过渡性文化遗存,它显然是湖熟文化的直接来源”<sup>①</sup>。北阴阳营文化的炊器以陶鼎为主,以点将台下层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的炊器以陶鬲为主,湖熟文化的炊器以陶鬲为主。这就是三者之间的最主要区别。

---

<sup>①</sup> 《文物考古工作十年》,第106页。

## 第二章 东南文明的兴起、扩散与衰落

---

### 第一节 文明的兴起

---

#### 一、天国的统一

从河姆渡第四层到崧泽晚期,虽都出有玉器,但都是小件装饰品,而且几乎全无纹饰,器类组合与工艺水平远不如辽河流域的同期玉器。一到良渚文化早期(张陵山 M4、福泉山 T15M3 和 T12M4 等),突然出现钺、琮等大型礼器和统一的母题纹饰,礼器从无到有,一跃而成为主要器类。瑶山与反山的玉质礼器及其母题纹饰更呈鼎盛状态,其地位相当于商代中后期的大型青铜礼器。瑶山、反山的年代属良渚文化中期偏早,这表明良渚文化在距今大约 5000—4800 年左右,已进入鼎盛时期。显然,良渚文化早中期,太湖流域的玉器文化出现质的飞跃,称之“翻天覆地”也毫不过分。这种巨变、突变,是无法以制作经验的积累来解释的。在人类历史上,文化突变往往是社会突变的反映。各地良渚文化玉质礼器母题纹饰的高度统一,更是我国各

支史前文化所绝无仅有的。这种母题纹饰过去称“饕餮纹”或“兽面纹”。对于这种母题纹饰的含义，历来众说纷纭，无一令人满意。1986年与1987年分别在余杭反山、瑶山出土大量玉质礼器，才解开了“饕餮纹”的千古之谜：它是良渚文化宗神的简化标志。

反山 M12:98 玉琮、反山 M12:100 玉钺、反山 M12:87 柱形器、瑶山 M2:1 冠形器、反山 M22:20 玉璜、反山 M22:8 串饰 D 形器、瑶山 M10:20 玉牌饰等礼器，都刻有亦人亦兽的完整神像。(图 2-1)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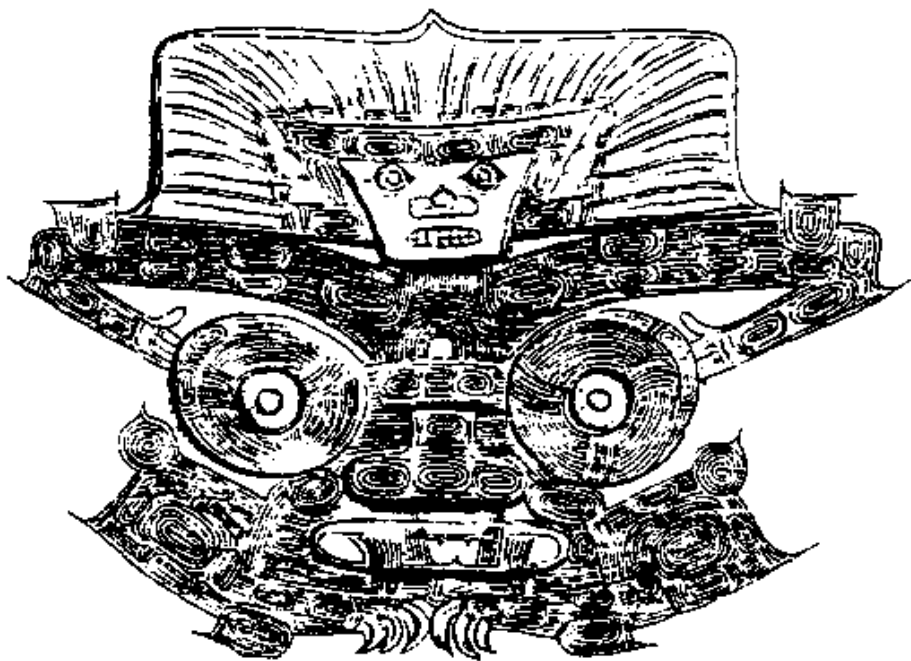


图 2-1 良渚文化宗神全身像

像包括六方面内容：(1)人的面孔；(2)头戴羽冠；(3)胸腹部饰有眼、鼻、嘴的兽面纹；(4)人的四肢；(5)人穿的衣服；(6)鸟爪。前三项(人面、羽冠、兽面纹)为凸起的浅浮雕，后三项为阴线刻纹。浅浮雕部分应该是神像的主要部分，故作凸出表现。有些玉器只刻神像的上半部，或下半部，那是以局部代表整体。大多数玉琮只刻简单的小眼纹和大眼纹的组合图案，甚至只刻小眼纹，或只刻大眼纹。小眼纹象征人面，大眼纹象征兽面，也是以局部代表整体，是神像的简化标志(符号、徽号)(图 2-2)。



图 2-2 良渚文化宗神的简化标志

上述完整神像的主要部分是：人面、羽冠、兽面纹。羽冠与兽面纹都采用象征手法。羽冠象征鸟首，身躯饰兽面纹象征兽身。那么，这是属哪一种兽呢？马承源、李学勤都认为是神兽——龙<sup>①</sup>。他们都从纹饰本身进行考察，我想举《山海经》加以印证。《山海经》卷一包括《南山经》、《南次二经》、《南次三经》，写的都是东南百越之地。《南山经》之神“鸟身而龙首”，《南次二经》的神“龙身而鸟首”，《南次三经》之神“龙身而人面”。三《经》之神不是龙身就是龙首，是《山海经》中“龙”“状”最密集的一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次二经》，写的是太湖—钱塘江流域，地名有“具区”（太湖）、“会稽之山”等，“其神状皆龙身而鸟首”。“鸟首”有良渚文化神像的羽冠为证，“龙身”应该可作良渚文化神像胸腹部兽面纹的注脚。《山海经·海内东经》最后写道：“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雷泽有二，一在山东，一在江南，此雷泽“在吴西”，显然是指太湖，其雷神“龙身而人头”。又是一个“龙身”！查遍《山海经》，神状“龙身”甚少，而两次写到太湖，两次都说其神“龙身”。在《山海经》里，龙与太湖的关系最为密切。良渚

<sup>①</sup> 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17、318 页；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东南文化》1991 年第 5 期。

文化神像龙身的最直接证据,是反山出土的两件透雕的冠状器(详见本书上编第七章第二节之三)。

良渚礼器上这个人面、鸟首、龙身的神像,通常称之为“神徽”,似欠妥帖。顾名思义,“徽”是符号的意思。相对于完整形象,其简化的符号、标志才能称“徽”。例如反山 M12:98 玉琮(即“琮王”),其凹面刻的是完整的神像,凸面刻的是大眼纹与小眼纹。后者是前者的简化标志(符号),如果要使用“神徽”这个名词,后者倒可称“神徽”,前者应径称“神像”。

这个鸟首、人面、龙身的神像是什么性质的神呢?台北故宫博物院邓淑蘋女士称它为“神祖”<sup>①</sup>,甚确。祖先崇拜压倒一切,自然神地位不高,是中华大地上各族文化的共同特点。良渚文化是夏商文明的重要来源之一,夏商周的玉琮皆源自良渚,因此,良渚文化的至上神不可能是自然神,只能是祖宗神。作为良渚文化玉质礼器母题纹饰的神像及其简化标志,应该就是良渚文化的祖宗神。

上文称良渚文化的神像为“宗神”。“宗神”即“祖神”,意思是一样的。我为什么不称“祖神”而称“宗神”呢?我想:夏、商、周三代的玉琮都来源于良渚文化,琮这名称很可能也是良渚时期所取,几千年沿用未改。好比“无锡”、“余杭”、“余姚”等地名,是几千年前的古越语地名,华夏人来到该地以后,仍沿用未改,今后大概还会永远沿用下去。今吴语称关养牲畜的地方为“栏”,今浙闽方言称柚为“抛”,也都是古越语遗存。良渚文化玉琮无一例外地都刻有祖宗神像或其简化标志,可知是祭祖神器<sup>②</sup>,良渚语言大概称祖先为“宗”,祭祖玉器也就称“琮”。“宗”(琮)很可能是良渚文化语言遗存。为了保留这一可能是

① 邓淑蘋:《考古出土新石器时代玉石琮研究》,《故宫学术季刊》第6卷第1期。

② 日本林巳奈夫认为玉琮是庙“主”,“主”又可称“宗”,琮是宗庙祭祀祖先神灵之器。琮的中孔是供祖先神灵休息的小室。见《中国古代の玉器・琮にフソマ》,《东方学报》第60册,1988年。

极珍贵的语言化石,故称“宗神”,不称“祖神”。

古氏族一般要祭两个始祖,即凡间始祖与神界始祖,如《国语·鲁语上》说:“商人禘舜而祖契”、“周人禘喾而郊稷”。舜与喾分别是商、周民族的神界始祖,这两个神界始祖,《诗经》都称之为“帝”。每个民族的神界始祖都是该民族的至上神“帝”。帝的原始意义就是祖宗神。《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高阳是《离骚》主人公“吾”的始祖,亦即“吾”之“帝”。晚期殷墟卜辞,人王去世即可称“帝”,如“帝甲”、“文武帝”等。周承殷制,周王近祖皆可列入禘祭。一些诸侯贵族竟也对祖先进行禘祭。在现有金文中,只有禘祖,而无禘天、禘地<sup>①</sup>。一些良渚文化礼器,在宗神或其简化标志的旁边,刻有飞翔的神鸟。鸟是唯一能上天的动物,在宗神或其简化标志旁边刻有神鸟,可能表示宗神居于天上,是上帝。

夏商西周时期,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帝”,到战国时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已在形成,于是开始酝酿一位各民族共同的始祖神——黄帝。秦汉以后,各民族已实现统一,黄帝的始祖神地位也就完全固定下来。

从良渚文化早中期开始,各地玉琮无一例外地都刻着同一位宗神的简化标志,这说明各地良渚文化居民都在供奉一位共同的至上神(上帝)。天国的统一是人间统一的反映。先有统一的人间,才有统一的天国。结合“土筑金字塔”、“玉敛葬”、余杭“中心遗址”等文明因素,我们推测,在良渚文化早中期,太湖流域已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一个被历史遗忘的文明古国。

<sup>①</sup> 刘雨:《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礼》,《考古学报》1989年第4期。

## 二、“土筑金字塔”与大型祭祀遗址

良渚文化大墓大多建在人工堆筑的土丘之中,这些土丘,已被人们称为“土筑金字塔”。这些大墓的随葬品以琮、钺、璧等大型玉质礼器为主。玉器数量之多,雕工之精,为世界史前玉器之最,有的学者称之为“玉敛葬”<sup>①</sup>。良渚文化小墓基本上不见玉器,即使有,也都是小件装饰品,没有琮、钺、璧等大型礼器,没有良渚文化宗神的图像及其简化标志,良渚文化居民在神面前也是不平等的。大墓与小墓分地区埋葬,不混在一起。这种把贵族墓地与平民墓地完全分开,对贵族墓地普遍营造巨大坟山的做法,在中国史前时代是仅见的。

良渚文化大墓不与小墓杂处,却常与大型祭祀遗址共存。现将瑶山、汇观山、福泉山三处祭坛及墓葬分布情况简述如下:

### (一) 瑶山

瑶山在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群内<sup>②</sup>,是一座海拔 35 米的小山,祭坛是在山顶上堆土筑成。平面呈方形,外围每边约 20 米,面积约 400 平方米。由内向外共三重,最里面是一座红土台,平面略呈长方形,东壁长 7.6 米,西壁长 7.7 米,北壁长 5.9 米,南壁长 6.2 米;第二重是一周宽 1.7 至 2.1 米、深 0.6 至 0.9 米的围沟,沟内填满从山外搬运来的纯净的灰土;最外一重是黄褐色斑土筑成的土台,西北转角处残存用砾石砌筑的长约 20 多米的石砌。在祭坛遗址上发现 12 座良渚文化大墓。12 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基底平整或有低土台,可推断

① 汪遵国:《良渚文化的玉敛葬》,《南京博物院集刊》第 7 辑(1984 年),摘要载《文物》1984 年第 2 期。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 年第 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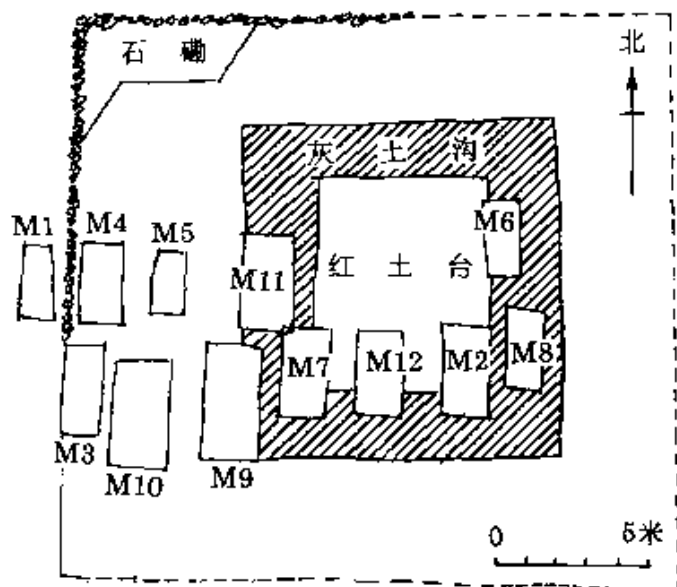


图 2-3 瑶山祭坛遗址及良渚文化墓群分布图

有棺槨之类葬具,头向朝南。墓分南北二列,琮、钺、三叉形冠饰只见于南列诸墓,玉璜、纺轮只见于北列诸墓,北列应为女性墓,南列应为男性墓(图 2-3)。

## (二) 汇观山

位于余杭瓶窑镇一座高约 30 余米的小石山上。1991 年在这里发现一座较完整的祭坛<sup>①</sup>,总面积近 1600 平方米。祭坛也分三重,中心部分南北长 10 米,东西宽 8 米,面积 80 平方米;其外为填有灰土的围沟,约 2 米宽。东部有祭祀坑三个。最外层的東西两边低于坛顶约 1.5 米的平面上各凿有两条南北向的排水沟槽。祭坛西南部有四座大墓。第 4 号墓南北长 4.75 米,东西宽 2.6 米,棺槨齐备,随葬玉器有钺、琮、璧、三叉形器、冠状器等,是一座重要的良渚文化大墓(图 2-4)。<sup>②</sup>

① 刘斌、王云路:《余杭汇观山遗址发现祭坛和大墓》,《中国文物报》1991 年 8 月 11 日第 1 版。

② 费国平:《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群考察报告》,《东南文化》1995 年第 2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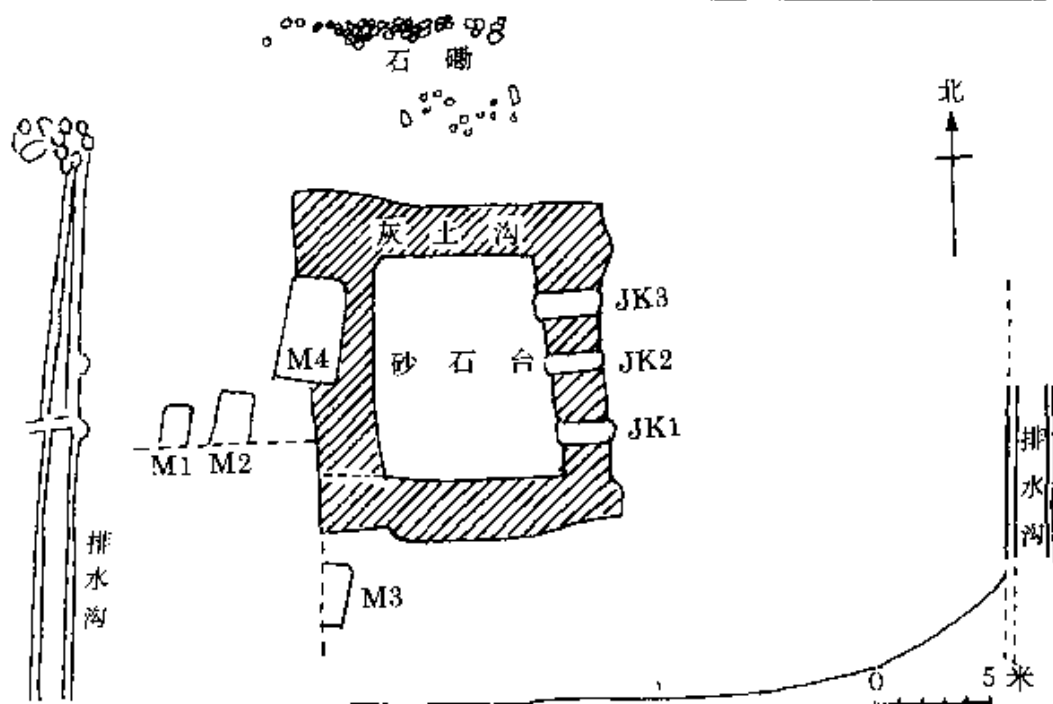


图 2-4 汇观山祭坛及良渚文化墓葬分布图

### (三) 福泉山

上海青浦福泉山，是一座“土筑金字塔”，已发掘良渚文化大墓 7 座。在山顶平台中心部位，有一处大型祭坛。祭坛南北长 7.3 米，东西最宽处 5.2 米，作阶梯形，自北而南，自下而上，北低南高，共有三级台阶，每级高 34—44 厘米。整个坛面土地都被大火烧红，似乎是举行过大型燎祭活动的结果。在山的北侧，有一个与祭祀有关的灰坑，作不规则的长方形，长约 19.25 米，宽约 7.5 米，四边较浅，中间渐深，深约 0.25—1.15 米，中心有一个略呈圆形的小土台，径约 1 米，高 1.15 米。坑中填满纯净的草灰，而坑壁、坑底以及中间的土台，无任何火烧痕迹，坑中的积灰，似是山上燎祭后，清扫堆放于此。<sup>①</sup>

从上海到余杭，都发现大规模的祭祀遗址。神权是世俗权力的反

<sup>①</sup> 黄寅佩：《福泉山遗址发现的文明现象》，《考古》1993 年第 2 期；孙维昌：《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论析》，《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 60 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中心 1996 年版。

映,大规模祭祀活动是社会权力大规模集中的一种反映。现已发现的多处祭祀遗址,都与大墓共存。大墓的主人正是大规模祭祀活动的主持人。参加这些祭祀活动与佩戴宗神标志一样,都是当时贵族的特权。

### 三、良渚文化遗址群与中心遗址

良渚文化遗址最为密集的地方是余杭的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图2-5)。这一带是处于山地与平原交接的谷地,其西北是天目山余脉形成的丘陵山地,东南是平原水网地区,这样的地理环境最适合上古时代人们生存繁衍。1986年在杭州举行的“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王明达提出“良渚遗址群”的概念。近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资料作依据,将良渚师姑坟遗址至安溪羊尾巴山遗址的连线为东界,小运河(良渚港—庙桥港)为南界,瓶窑吴家埠遗址为西界,吴家埠遗址经安溪天目山余脉至羊尾巴山为北界,作为良渚遗址群的范围。1994年请浙江省测绘部门对此范围作了1/2000的地形测绘,并用计算机测算实际面积为33.8平方公里。据目前已知资料,标定了各类古遗址、遗存达55处”<sup>①</sup>。这里,遗址密集,出土物特别丰富、精良。近几年来,在这遗址群内,有三次重大发现,三次都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这三次是:

第一次。1986年发现反山遗址与1987年发现瑶山遗址,被评为全国“七五”期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第二次。1991年发现汇观山遗址,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第三次。1993年发现莫角山遗址,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

---

<sup>①</sup> 王明达:《良渚遗址群田野考古概述》,《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8页。



古新发现”之一。一个遗址群的考古,在短短的六年內,三次获此殊荣,说明这里的文化遗存之丰富与重要,非同小可。

第一、二次发现,已见上文。第三次发现的莫角山遗址,又称大观山遗址,处于遗址群的中心,西距反山遗址不足 200 米,东北距瑶山遗址约 5 公里,西北距汇观山遗址约 2.5 公里。莫角山遗址也是人工堆筑的大土台,东西长约 670 米,南北宽约 450 米,高约 10 米,面积约在 30 万平方米左右,是反山的 100 多倍。大土台上还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乌龟山三座人工土台。像这样规模巨大的史前文化遗址中心,在国内还是第一次发现。更重要的是,考古工作者在莫角山发现有大片的夯土层与夯窝等建筑基址,发现成排呈圆形或椭圆形的大型柱洞,柱洞口径在 0.4 米至 1.35 米之间,大主柱遗迹直径一般有 0.5 米左右,最大达 0.9 米。据估算,夯筑基址总面积不少于 30000 平方米。这种大型柱洞与大规模的夯筑基址,应该是当时的宫殿建筑遗迹。莫角山遗址可能是当时的国都所在地。<sup>①</sup>

北京大学考古系严文明教授曾多次踏勘良渚文化遗址群。他对莫角山遗址是如此记载的:“我看到那些夯土是先铺一层泥,密密地夯筑,然后垫一层沙子,再铺一层泥,又密密地夯筑,如此反复达 9—13 层之多,总厚度为 50 厘米左右。这是在良渚文化以及整个龙山时代文化中所见加工最好的夯土”;“大量的土坯应该是房屋建筑的重要材料。考古发现表明,土坯是龙山时代发明的,在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福泉山、赵陵山等遗址中都有发现,但数量都很少。莫角山遗址发现的土坯的数量超过了同时代诸遗址土坯的总和,说明其建筑的规模大,技术先进。……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可以得

---

① 杨楠、赵晔:《余杭莫角山清理大型建筑基址》,《中国文物报》1993 年 10 月 10 日第 1 版;费国平:《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群考察报告》,《东南文化》1995 年第 2 期。

良渚文化大墓资料一览表

地址	土墩规模	座数	编号	随葬品					发掘时间			
				总数	玉器总数	玉琮	玉钺	玉璧		石钺		
吴县张陵山	高8.4米。有东、西两座，相距约100米，面积均约6000平方米。	3	西山	M4	41	16	1	(1) <sup>(1)</sup>		8	1977.5	
				M5	46	18				14		
			东山M1(残)	[2]	(20)	(1)	(1)	(4)			1982.8 1984.6	
吴县草鞋山	高10.5米。东西长120米，南北宽100米。面积12000平方米。	2	M198	32 件组	14 件组	3	2	2	2		1972.10—1973.1	
			M199(残)		(10)	(3)			(4)		1973.4—7	
武进县寺墩	高20米，东西长100米，南北宽80米。	4	M1	27	26	2			5		1978.12	
			M3	128	110余	33	3	24	4		1979.2—3	
				5	4	1		1	1			
			M4(残) <sup>(3)</sup>	(30余)		(10余)	?	(10余)				1982.10—11
			M5(残)	88	67	2	1	2				1993底 1994初 1994底 1995初

上海福山泉	高7.5米。东西长94米,南北宽84米。	7	M9	119	107	5	2	4	9	1982.9—12	
			M40	120	98	3	2	3	7		
			M53	17	14				1		
			M60	71	45			2	6		
			M65	126	115	2	2	2	3		
			M67	54	41	1					
			M74	170	140		4	1			
随葬品合计			677	560	11	10	12	26	1987.12—1988.1		
余杭反山	高约7.3米。东西长90米,南北宽30米。	11	1226 件组	1126 件组	21	5	125	54		1986.5 10	
余杭瑶山	海拔高程35米的小山	12	M1-M11	707 件组	635 件组	8	6			10	1987.5 6
			M12	(41) 件组	(41) 件组	(7)	(1)				1987.5
余杭横山		2	M1 <sup>(4)</sup>	43		1(残)	1	2		23	1993.4
			M2	175 件组		4	1	2		132	
余杭汇观山 <sup>(5)</sup>	中部主高点海拔22米的小山	4	M1-M4	173 件组	104 件组	3	1	5		54	1991.1—6
			M2(残)	53 件组	47 件组	有琮、镯、柱形器、锥形器等			4		
			M4	72 件组	17 件组	有琮、钺、璧、三叉形冠饰、冠形器等			48		

(续表)

地址	土墩规模	座数	编号	随葬品					发掘时间
				总数	玉器总数	玉琮	玉钺	玉璧	
昆山 赵陵山	东西长约80米; 南北宽约60米,相 对高度3—9米左 右	1	M 77	160	占大多数	有琮 <sup>(6)</sup> 、镯、环、坠、 管、珠等	6		1990秋 1991 1995

〔1〕 张陵山所在地角直镇文化站收集的有孔碧玉斧(即玉钺)、筒形玉镯等,传亦出自该墓。加上这些遗物,此墓随葬品有五六十件。本表随葬品数字凡加括号者,皆非发掘所得。

〔2〕 该墓已被破坏,随葬品均为征集所得,总数未统计。草鞋山 M 199、瑶山 M 12 与此同。

〔3〕 此墓于 1973 年群众取土时发现,当时出土遗物 30 多件,内有玉琮、玉璧各 10 余件,还有玉钺、玉珠、黑衣陶器等。此表分两格统计,上格无括号者为考古发掘所得,下格有括号者为群众早年发现。

〔4〕 此墓早期已被扰乱。

〔5〕 居民建房时发现,早期已遭破坏。发掘墓葬 4 座,《简报》对 M1、M3 未作分墓专门介绍,数字暂缺。

〔6〕 该器外方内圆,而未刻凹凸与纹饰,工艺粗糙,可能是琮的半成品。

〔资料来源〕

1. 《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 6 辑;《江苏吴县张陵山东山遗址》,《文物》1986 年第 10 期。
2. 《苏州草鞋山良渚文化墓葬》,《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 60 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6 年版。
3. 《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 年第 3 期;《1982 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 年第 2 期;《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第四、五次发掘》,《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 60 周年纪念文集》。
4. 孙继昌:《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论析》,《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 60 周年纪念文集》;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黄宣佩先生早年曾提供分墓资料。
5. 《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 年第 1 期。
6. 《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 年第 1 期;《浙江省余杭县安溪瑶山十二号墓考古简报》,《东南文化》1988 年第 5 期。
7. 陆文宝:《余杭横山良渚文化墓葬刍议》,《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8. 《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与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7 年第 7 期。
9. 《江苏昆山赵陵山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陆建方:《良渚文化墓葬研究》,均载《东方文明之光》一书。



到一种比较合理的推测:就是在莫角山这个长方形土台上,一定有成组的大型房屋建筑。虽然我们暂时还不知道这些房屋的具体形状,但可知道它们都有精心夯筑的地基,有用大方木构建的梁柱和用土坯建造的墙体,房子外面还可能有壕沟。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算是颇为雄伟和气派的了。很有可能,它就是我国最早的宫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良渚遗址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块圣地。”<sup>①</sup>

---

## 第二节 文明的扩散与衰落

---

大量的玉质礼器,大规模的“土筑金字塔”与祭祀建筑,以及超大型的莫角山人工大土台,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良渚文明的一部分“硬件”。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材为主,支撑这座文明大厦的木质“硬件”,已灰飞烟灭。还有其他“硬件”,也已烟消云散。与这些“硬件”相配套的,必有复杂繁缛的礼制,那是中华文明的“软件”,也是中华文明的特色所在,这些文明“软件”更是与时光同逝了。要维持这座金碧辉煌、灵光四射的文明大厦,要养活一大批“冠带文明”、亦人亦神的人上人,良渚文化本族的平民是不堪负荷的。在那个时代,战争掠夺比生产劳动更为正当,在神的名义下,显得十分圣洁,正义非凡。于是,良渚文化的将帅们,捧着神秘的玉琮,挥舞威严的玉钺,奉神命而远征了。

1987年,南京博物院的考古工作者在紧邻山东的苏北新沂花厅大汶口文化遗址进行发掘<sup>②</sup>。发掘的重点是当地农民挖出玉器的北

---

① 严文明:《良渚随笔》,《文物》1996年第3期。

② 南京博物院花厅考古队:《江苏新沂花厅遗址1987年发掘纪要》,《东南文化》1988年第2期。

区。在北区共发现墓葬 22 座。其中 4 座大墓都有上百件随葬品。其中玉器达二三十件之多,器类有琮、璧、环、佩、镯、坠、锥形器,以及由珠、管组成的串饰等。每件琮上都饰有良渚文化宗神的简化标志——小眼人面纹与大眼兽面纹。花厅还出有两件特长的多节琮体锥形器,一件八节,长 35.5 厘米,另一件六节,长 32 厘米,每节都刻有良渚文化宗神的简化标志。

花厅遗址的良渚文化并非孤立现象。邻近的邳县大墩子遗址曾发现良渚文化的贯耳壶、有肩穿孔石斧、双孔石斧等。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的墓葬中,也出有贯耳壶和有段石铤。1964 年南京博物院曾在淮河(废黄河)北岸的涟水三里墩遗址征集和采集到良渚文化玉琮和贯耳壶等陶器。涟水的杨庄、板湖陆庄也出有良渚文化玉器。苏北最典型的良渚文化遗址是海安青墩遗址,1978、1979 年两次发掘,共清理新石器时代墓葬 98 座。青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可分三层,中层近似崧泽文化。上层属良渚文化,出有玉琮、玉璧、玉瑗、条形玉坠、贯耳壶、丁字形鼎足、有段石铤、有肩穿孔石斧等。而且遗址是个高出地面数米的“土堆金字塔”,这一切使青墩上层具备了良渚文化的基本特征。

上述苏北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存,都偏于东部近海地区,即基本上都在大运河东侧。距今 5000 多年,苏北海岸线在现在的陆地之内,约距现在海岸线 100 公里左右,青墩、板湖陆庄、杨庄、三里墩等基本上都处于当时的海岸边上。这或许表明,江南的良渚文化是经由海路北上的。

良渚文化扩散的另一方向是南方。江西的丰城、新余出有良渚文化玉琮,广东北部的曲江还发现颇具规模的“石峡文化”。石峡文化因曲江马坝镇的石峡遗址而得名。石峡遗址面积约 3 万平方米,1973—1976 年发掘。遗址分上、中、下三层,“石峡文化”在下层,碳-14 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 2900 年至前 2700 年,约当良渚文化中期。遗址经发

掘的墓葬有 64 座。有的大型墓随葬玉器、生产工具和陶器多达 110 余件,玉器有琮、璧、璜、瑗、环、玦等,制作精细,形制与良渚文化玉器无异,玉琮也刻有良渚文化宗神的简化标志。陶器有鼎、釜、罐、壶、豆等。有几座大墓还出有成团的稻谷和米粒。石峡文化在岭南可称是一支孤岛文化,它“不是广东地区自身发展的传统文化,在岭南的原始文化中找不到其渊源,也找不到其继承者,存在的时间也不很长,与广东同时期的诸文化基本上没有相似之处”。“石峡文化其实是良渚文化的一个亚区,是良渚文化部族向西南扩散迁徙的结果”<sup>①</sup>。这支外来文化未能在当地生根,石峡遗址中层没有继承石峡文化,粤北地区其他稍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没有继承石峡文化,而在粤东南的海丰与粤桂交界的封开,发现几只良渚文化玉琮。这支进入岭南的良渚文化部族大概被土著部族打得七零八落。

良渚文化另一扩散方向是西部地区。镇江的磨盘墩、江宁的胥庙、安徽定远的山根许等地,都出有良渚文化大型玉质礼器。宁镇地区晚于北阴阳营文化层的遗址中,有良渚文化因素。北阴阳营文化与后来的湖熟文化虽然存在地层叠压关系,但在年代上、文化内涵方面大多不直接衔接,中间存在明显的缺环。宁镇地区的史前先民可能随良渚文化的部队远徙中原,参加中原逐鹿。

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有四个文化层。第四、三层文化面貌比较接近鲁南、苏北的大汶口文化。第二层(第三期)与太湖地区较相似,出有 15 件石钺,6 件有段石镞,2 件方璲形小玉琮,1 件玉瑗以及捏流细长颈鬻、贯耳壶等。第一层(第四期)所出遗物虽少,但从“遗物窥知它和良渚文化有相似的因素”。<sup>②</sup>

① 邓聪、区家发:《环珠江口史前考古刍议》,《环珠江口史前文化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

② 杨德标:《谈薛家岗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

薛家岗文化分布于安徽江淮地区,与这个文化区隔江相望、毗邻湖北的江西瑞昌西南 20 公里的良田寺遗址,出土的“三棱形鼎足见于浙江舟山群岛新石器时代遗址;扁形鼎足见于常州武进寺墩遗址;器盖、豆与江西清江筑卫城遗址第三层所出的器盖、豆相似,这些都具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特征,较接近浙江的‘良渚文化’”。<sup>①</sup>

到了良渚文化晚期,尤其是公元前 2200—前 2000 年左右,良渚文化先进因素在黄河中上游纷纷出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甘肃的齐家文化、河南的龙山文化,都出现本地区前所未有的玉琮、玉钺、玉璧,以及太湖地区其他传统文化因素。陶寺大型墓 9 座,有两种类型,“甲种墓有成对的木腔鼙鼓与特磬、陶异型器(土鼓?)同出,乙种则未见”。乙种墓的最珍贵礼器是“玉、石钺瑗”<sup>②</sup>,有太湖遗风。

二里头夏文化有两个类型:(1)晋南夏县的东下冯类型;(2)豫西偃师的二里头类型。东下冯类型与当地文化尚有较多的承袭关系,而二里头类型在中原却是一座文化孤岛。鬲、斝等袋足器和空足器,本是河南龙山文化居民的传统炊器,釜、罐、鼎是山东、太湖地区居民的传统炊器。二里头类型一、二期文化叠压在河南龙山文化王湾三期的文化层上,两者虽有某些联系,但有质的差别。二里头早期的典型器:花边口沿圆腹罐、瓦片足三足盘、折盘豆、单耳罐、觚等,都为王湾所罕见或未见。王湾三期有鬲斝,却为二里头早期所全无。二里头晚期文化与附近的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也有质的区别。“鬲是二里岗期文化墓葬中最突出的一种器物。然而,在各地区二里头文化早、晚期几十座墓葬中,却未发现一件陶鬲”<sup>③</sup>。二里头墓葬中的炊器全部是鼎与罐。

① 《江西瑞昌县良田寺遗址调查》,《考古》1987 年第 1 期。

② 高炜等:《陶寺遗址的发掘与夏文化的探索》,《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第 26 页。

③ 刘绪:《从墓葬陶器分析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及其与二里岗期商文化的关系》,《文物》1986 年第 6 期。

二里头出有玉琮、玉钺、玉圭、玉璋等礼器。玉琮来源于良渚文化、玉钺以良渚文化为最盛，玉圭与玉璋近似长条形玉钺，从玉钺演变而来，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大墓就出有玉圭形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出土的玉、铜礼器常饰有精致的饕餮纹。饕餮纹是太湖特产。

二里头文化的东南色彩，是与夏王朝的苗蛮血缘互为表里的。《吴越文化新探》列举十一条证据，论证禹为良渚文化等南方民族的后裔。这十一条证据是：

(1) 《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祝融是传说中的南方火神。祝融八姓是华夏中的苗蛮后裔，古代南方民族普遍尊奉祝融为自己的祖神，楚国、越国莫不如此。“夏之兴”是由于“融降于崇山”。崇古嵩字，崇山即嵩山，陶寺与二里头附近都有嵩山。“融降于崇山”，似乎透露了陶寺与二里头突然出现南方文化的原因。

(2) 鲧为禹父，传说甚盛。《国语·周语下》：“有崇伯鲧。”韦注：“崇，鲧国。”崇伯即嵩山一带的氏族领袖，是创造二里头类型的先民的领袖。鲧的南蛮血统很明显，如《山海经·大荒南经》说：“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头。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即祝融——引者注），生驩头。”在这里，鲧是驩头的祖父，祝融的父亲。祝融属南方血统，已见上文。驩头也属南方种族。《山海经·海外南经》说：“驩头国……，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大荒南经》也说：“驩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太湖、钱塘江流域自古崇拜鸟图腾，“鸟喙”、“有翼”，应与鸟图腾有关。《史记·越世家》说勾践“长颈鸟喙”。“食海中鱼”，更是南方人的生活方式。

(3) 据很多学者研究，鲧与共工是一人的分化<sup>①</sup>。《山海经·海

<sup>①</sup> 如童书业：《五行说起源的讨论》，见《古史辨》第五册；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第十二篇：“鲧共工与玄冥冯夷”，见《古史辨》第七册（上）。顾颉刚、陈梦家等皆主此说。

内经》说：“祝融降居江水，生共工。”古代“江”，一般指长江。《逸周书·王会解》有“共人玄贝”一语，夹在“东越”至“会稽”等南“蛮”中间，晋人孔晁注：“共人，吴越之蛮”。

(4) 祝融有八姓：己、董、彭、秃、妘、曹、斟、非（《国语·郑语》）。八姓以己为首，己以古通。禹姓姁，姁古音以。甲骨文、金文和《说文》都无姁字，姁是后起字。所谓禹姁姓，即以（己）姓，为祝融集团的大宗。周封夏后为“杞国”，应与夏为己姓有关。昆吾为己姓，《汉书人表》颜《注》说他是姁姓，这也是姁己古通之一证。楚为非姓，居祝融八姓之末，奉祝融为宗神<sup>①</sup>。楚灵王称己姓的昆吾为“皇祖伯父”（《左传·昭公十二年》）。楚与夏都是祝融后裔，所以屈赋对鲧、禹描写特多，寄情极深。《史记·越世家》称勾践为“禹之苗裔”，《国语·吴语》韦注说：“勾践，祝融之后，允常之子，非姓。”韦昭称勾践为“祝融之后”，与《史记》无矛盾；说他为“非姓”，其误差范围尚未超出祝融集团。近人曹锦炎考证，越王姓氏“应属彭姓诸稽氏”<sup>②</sup>，也属祝融八姓。夏、楚、越都与祝融八姓有血缘关系，似无可疑。

(5) 在古代神话传说里，鲧（共工）禹家族是最著名的水利世家。查现有考古资料，在全国各地的原始文化中，水利最发达的莫过于太湖地区。距今 6000 年的嘉兴邱城马家浜文化遗址，发现九条排水沟与两条宽约 1.5—2 米的大型引水渠道<sup>③</sup>。崧泽文化时期，出现中国最早的水井。良渚文化水井密布。太湖先民有领先的治水技术，中原的水利世家可能是其族裔。

① 董楚平：《离骚首八句考释》第二部分“高阳·颛项·祝融”，载《楚辞译注》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② 曹锦炎：《越王姓氏新考》，《中华文史论丛》1983 年第 3 期。

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十年来浙江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

(6) 夏、越古音相近<sup>①</sup>,卜辞的戊方即夏族,禹字本也从戊<sup>②</sup>,夏代以“戊”为岁名。良渚文化时期,太湖地区是石钺、玉钺最发达地区。在距今 4000 年前后,随着良渚文化的北播,钺的最发达地区转移到黄河中游(如陶寺遗址与二里头遗址)<sup>③</sup>。古代有“以工命姓”的习惯。夏族本称“戊”,禹字本从“戊”,春秋战国时期的江南越国铜器铭文也都自号为“戊”,夏与越皆以同一器物“命姓”、命国。这中间似有渊源关系。

(7) 禹不但自己有南方血统,而且与南方的涂山氏联姻。涂山在安徽淮河之滨。

(8) 夏朝除王室外,诸侯中最有势力、最亲近王室的,前期是斟寻,后期是昆吾。“斟”在祝融八姓中排行第七,昆吾在己姓中排行第一,都属祝融集团。

(9) 二里头类型文化除继承河南龙山文化之外,还兼有山东龙山文化与太湖良渚文化等东南蛮夷文化因素,这说明夏朝与东“夷”、南“蛮”都有密切关系。但夏朝的东方形势与南方形势大不相同。终夏一代,与东夷关系一直紧张,斗争十分激烈,甚至发生过“太康失国”、东夷入主中原的严重事件。二里头文化中的山东龙山文化因素,可能与此有关。与东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南方一直平安无事,夏亡后,桀奔南巢(今安徽巢湖地区),即逃到安全地带。这与夏为南裔、禹娶涂山氏不无关系。二里头文化中的南方因素,即源于这种血缘关系。

(10) 由于夏王室、夏外戚、夏伯主,都有深远的苗蛮血缘,所以古代有“蛮夏”、“戎禹”的称呼。北宋吕大临《考古图》卷七第 9 至 11

① 详见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第一章第一节之四“‘戊’字的古音同‘斧’”、之五“夏族的本名可能也叫戊”。

② 详见《吴越文化新探》第一章第一节之五“夏族的本名可能也叫戊”。

③ 详见《吴越文化新探》第一章第一节之三“‘戊’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

页著录的《秦公钟》(实为罍)<sup>①</sup>,和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秦公簋》<sup>②</sup>,铭文内容相似,都有“虩使蛮夏”一句。“蛮夏”犹“夷羿”,是指明夏人的苗蛮血缘。夏古有“蛮夏”之称,姒则有“姒戎”之号<sup>③</sup>,禹也因而有“戎禹”之名<sup>④</sup>。“戎”未必指西方少数民族。东南少数民族,古代也常称之为“戎”。如西周穆王时器《班簋铭》称东南徐偃王为“东国厌(偃)戎”。《尚书·费誓》也称徐国为“徐戎”。古书还以“戎蛮”连文来称呼南方蛮人。如《春秋·昭公十六年》的“戎蛮子”、《春秋·哀公四年》的“戎蛮子赤”、《左传·昭公十六年》的“戎蛮子嘉”,都指南蛮。“蛮夏”、“姒戎”、“戎禹”之称,说明当时去古未远,尚有人知道夏、禹的底细——不是纯正的“中原之人”。

(11) 鲧禹家族及与其有血缘关系的祝融集团、驩兜等人名有古越语特点。古越语是多音节语言,华夏语是单音节语言。用华夏文字记录古越语人名,字数往往可多可少。共工可省称为“共”或鲧。“共工”是“鲧”的复音、缓读。共工是水神,不少学者认为是冯夷的传说分化,冯古音接近共、工。冯夷又作“无夷”(《穆天子传》)。古越语人名、地名常以“无”为发声。《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近人常以句龙为禹的别名。据《墨子·非攻下》所述,助禹(句龙)战胜三苗的天神是“句芒”。以“句”为发声,也是古越语人名、地名的特点之一。十一世夏王名“不降”,又名“降”,不字可省。后来的越王人名中有“不寿”、“不扬”。“不”是古越语常见发声之一。祝融可以省称为“融”,又称“重”、“黎”,或合称“重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称“重”为“句芒”。斟寻可省称为“斟”或“寻”,“豕韦”可省称为“豕”或“韦”,“吴回”可省称为“回”,据近代多位学者研

① 宋仁宗庆历年间叶清臣守长安时所得,早已失传。

② 据传是1921年在甘肃天水附近出土。

③ 《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尚书纬·帝命验》。

④ 《潜夫论·五德志》。



究，驩兜与丹朱是同一个人在传说过程中的分化。驩兜或作“驩朱”，“丹朱”或作“丹殊”，均可省称为“殊”。与这些人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地道、纯正的中原华夏人，如黄帝、炎帝、尧、舜、弃、稷等，其名字都无这种特点。黄帝又称“轩辕”，从不省称为“轩”或“辕”。

除上述十一条外，这里再补充四条：

(1) 夏乐与南夷音乐关系最为密切。《诗·小雅·鼓钟》：“以雅(夏)以南，以箫不僭。”雅夏古通。1983年江苏丹徒出土的《濞邳编钟》<sup>①</sup>，是舒国铜器<sup>②</sup>，铭辞“我以夏以南，中鸣媿好”。毛《传》：“南夷之乐曰南。”齐、鲁、韩三家《诗》说，皆与此同。《诗经·鼓钟》是中原贵族称道“夏”、“南”音乐协和；《濞邳编钟》是南夷土著称道“夏”、“南”音乐协调美好。东汉人薛汉说：“四夷之乐，唯《南》可以和于雅者，以其人声音及箫不僭差也。”(《后汉书·陈惇传》注引)夏、南音乐特别和谐，说明其人种、文化有特殊的渊源关系。

(2) 传说禹有南方人的裸体习俗。《史记·赵世家》：“舜舞有苗，禹袒裸国”；《论衡·恢国》篇：“夏禹裸入吴国”；《淮南子·原道训》：“禹之裸国，解衣而入”(高诱注“裸国在南方”)。传说舜曾南巡九疑，比禹跑得更远，舜用中原文明(“舞”)来感化南方有苗氏，而禹却丢尽中原的衣冠文明(“袒”)，以争取南方的“裸国”。这种“以夷变夏”的做法，在古“圣王”传说中独见于夏禹，颇为发人深思。

(3) 中国上古时代的人称，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习惯，一种先称职位身份后称具体人名，如“帝尧”、“帝舜”；一种先称具体人名后称职位身份，如“黄帝”、“炎帝”。前者与古越语及百越后裔的台侗语的称谓习惯相同，后者与汉语的称谓习惯相同。罗漫称前者为“越式称

① 《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合刊。

② 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第318—326页。

谓”，后者为“汉式称谓”<sup>①</sup>。“大量的古籍显示：远古及先秦时代，‘越式称谓’占据主导地位。”<sup>②</sup>《夏本纪》是清一色的“越式称谓”，如“帝禹”、“帝启”、“帝太康”……“帝履癸(桀)”。《殷本纪》未见“帝汤”之称，但自其子开始，均为“越式称谓”。《周本纪》则不然，基本上是汉式称谓。如“文王”、“武王”等。夏、商族中保留着大量“越式称谓”，是个值得重视的历史迹象。

(4) 夏又称“夏后”，古籍中的“夏后”，都是单词，不是词组。例如：《史记·夏本纪》：“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姁氏。”写明“夏后”是一个“国号”。《诗·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夏后”犹“殷”，是朝代(“世”)名。《论语·八佾》：“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夏后”犹“殷”、“周”，都是族称。《孟子·万章上》：“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夏后”犹唐、虞、殷、周，都是朝代名。问题是：唐、虞、殷、周皆单音，唯“夏后”复音，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夏为越裔，古越语是多音节的“胶着语”，用单音节的华夏文字记载多音节的古越语，字数可多可少，可写作“夏”，也可写作“夏后”。夏古鱼部，后古侯部，鱼侯是邻韵，古可旁转，夏后二字古音近同。

综上十五证，夏王朝的苗蛮血缘当无可疑。夏王朝的苗蛮血缘是二里头文化富有东南色彩的深层原因。

当山西陶寺、河南二里头出现东南地区的文明因素时，东南地区的文明之星却陨落了。

大约在公元前 2000 年以后，即相当于中原夏朝时期，良渚文化的精华部分突然在家乡消失，东南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明显下降，具

① 罗漫：《夏、越、汉：语言与文化漫笔》，《国际百越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② 同上书，第 40 页。

体表现是：“土筑金字塔”不见了；大型玉质礼器及其“饕餮纹”悄然绝迹；扁薄穿孔石斧也明显减少；有段石镞制作粗糙，重复出现早期形态；文化遗址稀疏，水井不多，表明人口已大为减少；石箭头和网坠的数量反而增多，表明渔猎经济的比重有所增大；陶器的质量明显下降，有不少完全适应轮制法的泥质陶也采用泥条筑叠法。这种文化逆转现象，差不多于同一时期，也在山东、江汉等“夷”“蛮”地区出现。这些地区的传统先进文化却在中原隐约出现，汇成灿烂的华夏文明。由于太湖—钱塘江流域远离中原，山河阻隔更多，较难接受中原华夏文明的影响，致使逆转趋势显得特别突出，维持时间特长。在夏、商、西周整整三代时期内，东南地区的文化水平明显落后于中原，长期处于文化低潮状态。

## 第三章 吴越文化的形成

这里所说的“吴越文化”，是狭义的、考古学意义的文化，与诸如“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并列。考古学意义的吴越文化是基本上与吴越建国、亡国共始终的。

---

### 第一节 越文化的诞生

---

#### 一、马桥文化——越文化的前身

江南进入文化低潮以后，一种新的文化却悄悄地来临，这就是马桥文化。

马桥文化是太湖—钱塘江流域的早期青铜文化，因上海马桥遗址而得名。马桥遗址位于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东，面积约 5000 平方米，1960 年开始发掘。其第四层出有印纹陶与青铜器，是马桥文化的代表性遗存。重要遗址还有上海金山亭林中层、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甲区第二层和乙区第三层、杭州拱宸桥水田畝遗址第三层等。1983 年，南京博物院的考古工作者在苏州、吴县、吴江、常熟对马桥文化遗址作了一次较为全面的考古调查和复查，“发现遗址 20 余处。同年，

对吴江县刘家浜、彭家里和常熟市的钱底巷等遗址进行了试掘。出土遗物大多与上海县马桥遗址第4层出土的相同”，说明“江苏境内太湖以东、以北普遍分布着马桥文化遗存”。<sup>①</sup>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83年冬在嘉兴雀幕桥发现了马桥文化的地层。1985年初，在嘉善大往遗址有相同的发现。1986年初，又在吴兴邱城遗址庞杂的上文化层中划分出相应的堆积。“在浙北的海宁、海盐、平湖、嘉兴、吴兴、长兴及余杭都已发现马桥文化的遗址，在宁波、嵊县、淳安、金华、兰溪、江山等地都曾发现过马桥文化的遗物。甚至在浙南的飞云江两岸和龙泉境内，也能见到薄胎硬陶条纹罐的残片”。<sup>②</sup>

马桥文化层常叠压在良渚文化层之上、周文化层之下。大多相当于中原的商代，个别遗址的上限可能早到夏代晚期。碳-14年代测定数据有：金山亭林遗址中层木头距今 $3730\pm 150$ 年，金山查山遗址中层木头距今 $3114\pm 120$ 年；吴江刘家浜遗址距今 $3310\pm 100$ 年。热释光测定数据有5个：马桥遗址中层陶片距今 $3030\pm 333$ 年、 $3470\pm 382$ 年；查山遗址中层陶片距今 $2930\pm 322$ 年、 $2890\pm 318$ 年、 $3260\pm 359$ 年。

马桥文化的主要特征是：(1) 出现刀、凿、镞等小件青铜器，但未发现铸铜工具。(2) 石制生产工具仍极盛行，有大型三角形石犁、有段石镞、半月形石刀、带把破土石刀、石镰等，器类、形制与良渚文化同类器物基本相同。(3) 陶器主要有三类：A. 夹砂绳纹(或篮纹)红陶鼎、甗和釜。甗是鼎和甑的连体。未见鬲。B. 各种陶色(浅黄、橙黑、紫红、紫褐色)的印纹陶器，如折沿弧腹罐和盆，圆把杯和鸭形壶等，纹饰有叶脉纹、篮纹、方格纹、回字纹和云雷纹等，底部都是圜底内

① 《近十年来江苏考古的新成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第107—108页。

② 《浙江省新近十年的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第121—122页。

凹。C. 灰陶、黑衣陶和黑衣灰陶平底或圈足器,器表以素面为主,有的在肩腹部压印一条带形的云雷纹和鱼鸟纹,器类有觚、觶、尊、豆、簋、瓦足盘、袋足盃和澄滤器等。前两类为泥条盘筑法加轮修,后一类为轮制,有明显的不同。

马桥文化的石器、炊器与良渚文化基本相同。青铜器、印纹陶是全新的文化因素。青铜器数量很少,只在个别遗址中发现,而印纹陶则是各遗址普遍性器物。因此,马桥文化又被称为“印纹陶文化”。

把花纹刻在木拍上,用拍子拍打陶器表面,留下印痕,这就是印纹陶。印纹陶始见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广东、福建、浙南、赣东北。拍印花纹的陶器有软陶与硬陶,我们常说的印纹陶,主要指硬陶。印纹硬陶的烧制温度比一般陶器高,陶质较硬,是原始瓷器的前身。良渚文化没有印纹陶,马桥文化叠压在良渚文化层上,突然出现大量印纹陶。马桥文化的印纹陶,不论在制法、造型、纹饰等方面,都未能在良渚文化陶器中找到早期因素。制造印纹陶的居民应该是从南方迁来的新居民,很可能是文献说的“区人”。这些新居民入境随俗,使用当地原有的石制生产工具与炊器。这些新居民与良渚文化遗民可能是同一族属的不同支系。

马桥文化最令人惊奇的是出现大量中原夏商文化因素。上海马桥遗址第四层出土一件长条形青铜刻刀与长条形铜凿,与二里头出土者类似。而且这两种铜器是二里头类型的代表性器物。一件瓦形足三足盘与二里头同类器风格一致,特别是瓦形足更为相似。“扁平三角形石镞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所出形制相同,觚、觶、尊等一类器物上压印的带状云雷纹与河南郑州二里岗商代早期文化极为相似,觚、觶的造型与偃师二里头的同类器也近似。”<sup>①</sup>

<sup>①</sup> 《上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第99页。

马桥文化中的夏商文化因素从何处传入江南？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探讨这个问题，应首先考虑早期马桥文化，尤其是包含夏商文化因素较多的早期马桥文化主要分布在哪些地区。这问题的答案是清楚的，首先是上海，其次是太湖平原东部和浙江的宁绍平原，也就是说，包含夏商文化因素较多的早期马桥文化，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既然如此，那么，马桥文化中的夏商文化因素最可能是经海路传入的。

在夏商时期，中国沿海地区，受中原文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山东。山东与江南沿海地区自古关系密切。

在相当于夏代的时期内，山东的考古学文化由龙山文化演变为岳石文化。岳石文化层叠压在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文化层之上，又被商代文化层所叠压。它是山东早期青铜文化，开始出现少量青铜器，在陶器方面出现山东龙山文化不见或罕见、而在二里头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尊形器与器盖等。岳石文化的年代约当公元前十九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早于江南的马桥文化。马桥文化中的二里头因素，与山东岳石文化中的二里头因素十分相似。例如马桥文化中有一种被称为“簋”的陶器，上、中、下部各有三周粗大的凸脊，这种粗大的凸脊不见于其他地区，而在山东岳石文化的泥质陶中则非常盛行<sup>①</sup>。（图3-1）1960年在山东半岛的平度东岳石遗址<sup>②</sup>出土的簋形陶器，有少数为瓦形三足，颇似上海马桥的瓦形足三足盘。

山东与江南自古海路畅通，文化面貌相近。在马桥文化时期，上海有山东岳石文化因素，山东也出有上海马桥文化器物。1982年10月，在胶东庙岛海域的大竹山岛以南约30米的海底，打捞到一批陶器。“其中一件为圜底釜，侈口，宽斜缘，最大腹径明显下垂；腹部饰松

① 宋健：《马桥文化探源》，《东南文化》1988年第1期。

② 《山东平度东岳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与战国墓》，《考古》1962年第10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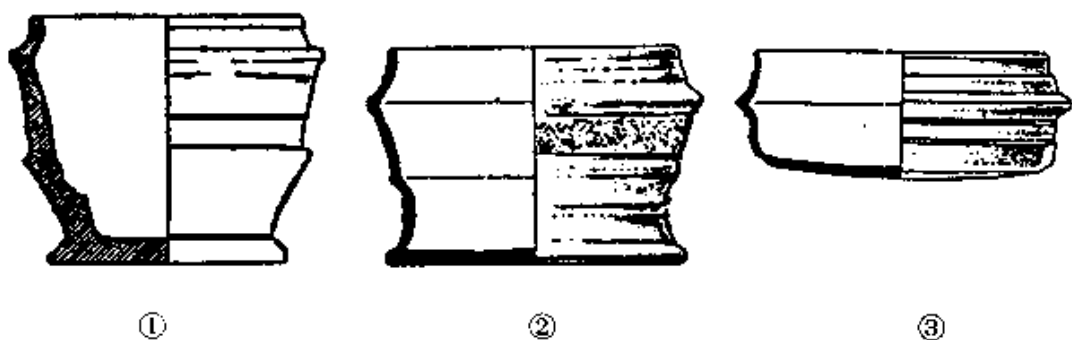


图 3-1 马桥文化与岳石文化相似的陶器

1. 山东牟平照格庄；2、3. 上海马桥

散的竖绳纹和数道弦纹。同样形状的器物只是在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一带才有发现，如余姚河姆渡一层，上海青浦崧泽中层，上海马桥四、五层和金山亭林中层等处，年代从崧泽期、良渚文化到当地的早期印纹陶文化，是当地的一种传统器物，胶东一带从来没有发现过。大竹山岛旁的这件陶釜为泥质灰陶而略夹细砂，只四沿轮制，再结合其纹饰观察，应更接近金山亭林中层和上海马桥四层，即当地早期印纹陶文化的产物。”<sup>①</sup>“早期印纹陶文化”即早期马桥文化。

总之，马桥文化有三个来源：(1)良渚文化；(2)印纹陶文化；(3)黄河流域夏商文化。马桥文化的居民构成，可能包括良渚文化遗民，即土著人；从南方迁来的区人；从山东半岛迁来的夏裔及土著夷人。由于印纹陶文化是越文化在考古学文化上的重要标志，因此，考古界普遍认为马桥文化是越文化的先驱。

## 二、山东夏裔与江南越国的关系

在古文献中，会稽有三处：一在山东，一在辽西，一在江南。这三处的夏文化遗存，以山东为最早，辽西与江南的“会稽”地名皆从山东迁

<sup>①</sup> 严文明：《夏代的东方》，《夏史论丛》，齐鲁书社 1985 年版，第 176—177 页。



去,即因山东夏裔来到辽西与江南,把“会稽”这个地名也带了过去。

关于会稽原在山东、越国王室从山东迁来,《〈国语〉“防风氏”笺证》一文曾列出九条证据<sup>①</sup>,这里再补充两条:

(1) 勾践曾想迁葬琅琊,并已采取一定的行动。《越绝书·记地传》云:

独山大家冢者,勾践自治以为冢,徙琅琊,冢不成,去县九里。

“若耶大家冢者,勾践所徙葬先君夫谿冢也,去县二十五里。

“木客大家冢者,勾践父允常冢也,初徙琅琊,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故曰木客,去县十五里。

《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记载,勾践迁都琅琊后,“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允)常之丧,欲徙葬琅琊。三穿元(允)常之墓,墓中生燧风,飞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勾践曰:‘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

《水经·浙江水注》也有类似记载。

夫谿、允常、勾践最后有没有葬琅琊,现在已不得而知。根据上述记载,有一点则可肯定,即勾践曾想把夫谿、允常迁葬琅琊,并已砍掉木客山的松柏、多次击穿允常的墓穴;他自己在江南的墓也因“徙琅琊”而“不成”。

在古代,迁祖坟墓是件十分严肃的大事,王室迁祖墓,更非同小可。迁都是不必迁祖墓的,除非原基地将沦为敌区,即使如此,祖墓一般也是不迁的。勾践迁都琅琊,并没有放弃会稽,他“欲徙葬琅琊”,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学者常困惑不解:琅琊僻处海隅,迁都琅琊有何军事、政治、经济意义?现

<sup>①</sup> 董楚平:《〈国语〉“防风氏”笺证》,《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4—8页。文中列举九条证据,证明会稽原在山东。最早提出会稽原在山东的是杨向奎先生,其《〈夏本纪〉〈越王勾践世家〉地理考实》,载《禹贡》第3卷第1期,《吴越文化新探》第51页引有原文。

在我们明白了勾践曾“欲徙葬琅琊”，那么，迁都的原因显然是“衣锦还乡”，故乡情结使然。<sup>①</sup>

(2) 山东日照北 40 里处，有一座山叫“小会稽”<sup>②</sup>。《越绝书》称江南会稽为“大越”。古地名以“大”(太)、“小”(少)互称者，“大”多为新居地，“小”多为原居地。如“大东”与“小东”、“大月氏”与“小月氏”、“大梁”与“小梁”、“太昊之墟”与“少昊之墟”等。山东有“小会稽”说明会稽原在山东，绍兴称“大越”，说明这里不是越国王室的祖居地。

山东本属东夷地区，据《竹书纪年》记载，从禹至少康六世，夏王朝与东夷的关系最为紧张，冲突最多，甚至发生太康元年“羿入居斟寻”、相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浇帅师灭斟灌”、二十八年“寒浞使其子浇弑帝”等颠覆夏王朝的严重事件。少康中兴，只在夏本土内杀灭寒浞，还没有远征东夷。到帝杼八年，才“征于东海，及三寿，得一狐九尾”。古“东海”指山东及苏北连云港一带。古山东有不少称“寿”的地名，“三寿”之“三”，言其多也。“九尾狐”当为“封狐”。《离骚》：“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封字有大义，封狐犹封豕、修蛇、大风(凤)，是以某动物为图腾的氏族名称。羿是东夷，与羿为邻的“封狐”，当也为东夷某氏族。

帝杼“征东海”以后，东方才基本宁静。如《竹书纪年》所载：

帝芬三年，九夷来御。

帝芒十三年，东狩于海，获大鱼。

帝泄二十一年，命吠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帝发元年，诸夷宾于王门。

桀十四年，扁帅师伐岷山(即蒙山，在今蒙阴与费县一带)。

① 董楚平：《越国王室迁葬考》，《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② 林华东：《越都丛考》，《百越民族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71页。

杼“征东海”后,夏人大规模殖民山东。王献唐遍考山东古国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山东方面,夏代是姒姓集团的活动区域。北面临近渤海为益都、寿光,东接潍县,县南为安丘,再南为诸城,皆有姒姓统治史实。”<sup>①</sup>在相当于夏代的时期内,山东的考古学文化是具有二里头因素的岳石文化。岳石文化几乎覆盖山东全境和苏北黄淮地区。岳石文化的年代约当公元前十九世纪至前十六世纪,结束的时间与夏代相当,开始的时间比夏代晚 100 多年。这是因为禹还不可能远征山东。夏王朝最早远征山东、并在山东立足的是“杼”。所谓禹会诸侯于会稽与无余封于会稽,可能都是杼征东海之一事分化。

《竹书纪年》记载,禹“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又说:杼“八年,征于东海,……”。禹与杼是叠韵字,古音近同,后人容易把杼说成禹;禹与杼东征的时间都是“八年”;“会稽”在古“东海”范围之内。禹八年抵会稽,与杼八年征东海,人名、时间、地点皆有重合之处。禹时,山东还没有二里头文化因素,杼时,山东才开始出现二里头文化因素。因此,所谓禹至会稽,实际上是杼至会稽。古人尊祖,喜欢把后代子孙的事迹伪托给先祖。全国有许多“禹迹”,其实大多是禹裔之迹。禹会诸侯于会稽,很可能是杼征东海的托古美化之辞。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一开头就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越绝书·外传记地传》一开头也说:“昔者,越之先君无余,乃禹之世,别封于越,以守禹冢。”《吴越春秋》卷六《越王无余外传》说少康“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余始受封”。这三本古书都说越王室是夏之后裔。《史记》与《吴越春秋》都说其先君是夏少康之庶子。《越绝书》与《吴越春秋》都说越之先君叫无余。《吴越春秋》又称无余为余。《水经·浙江水注》说:“夏后少康,封少子杼,以奉禹祠,为越。”同书又说:秦望“山南有

<sup>①</sup> 王献唐:《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 1983 年版,第 208 页。

岿岿，岿里有大城，越王无余之旧都也”。同一本书，一忽儿称“杼”，一忽儿称“无余”，《吴越春秋》既称他“无余”，又称他“余”。杼，《史记·夏本纪》又作“予”。甲骨文与金文皆没有“杼”与“予”字，其本字是“余”。“无”是古越语常用发声，“无余”是“余”的古越语多音节记音。因此，“无余”即“余”，也即“杼”、予。《竹书纪年》与《史记》只说杼（予）是少康之子，而没有说明嫡庶行次。《史记·索隐》说：予“音佇”。《系本》云季佇作甲者也”。既然称“季”，那么杼肯定不是嫡长子。《水经·浙江水注》说杼是少康之“少子”。“少子杼”与“季佇（杼）”则完全吻合。至于“无余”，《史记》、《吴越春秋》称他是少康之“庶子”。“庶子”一词，古有二义。一是狭义，专指妾生之子；二是广义，除嫡长子一人之外，其他众儿子皆可称庶子。因此，“季佇（杼）”、“少子杼”、“庶子无余”，其“季”、“少子”、“庶子”在广义上是完全可以统一的。所谓封于会稽的“庶子无余”，很可能就是“征东海”的季杼。《史记》与《竹书纪年》都未说少康时有远征东方的军事行动，这种行动始于季杼八年。季杼的年代约为公元前十九世纪，山东的岳石文化也始于公元前十九世纪。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互为印证，合若符节。<sup>①</sup>

现有的马桥文化年代数据，以上海金山亭林遗址中层木头的碳-14所测年代为最早，距今 3730±150 年，约当夏代晚期，其他数据皆约当商代，多为商代中期以后。以上数据皆晚于山东岳石文化的开始年代。

江南越国王室先祖从山东迁来，在文献中也留有依稀印痕。《越绝书·外传记地传》云：“龟山者，勾践起怪游台也，……一曰怪山。怪山者，往古一夜自来，民怪之，故谓怪山。”《吴越春秋》卷五《勾践归国外传》，记越国筑大城，“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瑯琊东武海中山也，一夕自来，故名怪山。”《太平寰宇记》也说：“龟山，即瑯琊东武山，一

<sup>①</sup> 董楚平：《夏杼钩沉》，《浙江社会科学》1997 年第 1 期。

夕移于此。”这种神话传说正是越国王室先祖从山东经海路迁来的史影。怪山、龟山，今称塔山、飞来山，在绍兴市区内。

山东夏裔与东夷南迁的主要路线，是先在上海登陆，然后西徙于太湖东岸，再逐步南迁，绍兴是最后一站。

马桥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夏商文化因素与岳石文化因素，以上海最为丰富、典型。上海及其西邻昆山、太仓一带，古称娄地。秦置娄县，县治在今昆山东北。这一带今有浏河流经入海，浏河古称娄江，今上海西北近浏河处尚有地名称“娄塘”。娄古侯韵，浏古幽韵，古可旁转。《后汉书·礼仪志》“貆刘之礼”，《汉仪》注作“貆娄”。今浏河是古娄江之音转。《越绝书》卷二《吴地传》“娄”字地名出现频率甚高，如：

邑中径从阖门到娄门九里七十二步。

娄门外马亭溪上复城者，故越王余复君所治也，去县百五十里。

娄门外鸿城者，故越王城也，去县百五十里。

娄门外鸡陂墟，故吴王所畜鸡……。

娄门外力士者，阖庐所造，以备外越。

娄东十里坑者，古名长人坑，从海上来，去县十里。

娄北武城，阖庐所以侯外越也，去县三十里，今为乡也。

上海及其附近一带古称娄，这地名是夏裔从山东带来的。

娄是夏裔杞国地名。《春秋·隐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娄。”《公羊传》：“牟娄者何？杞之邑也。”《春秋·宣公十五年》：“仲孙蔑会高固于牟娄”；又昭公五年之《经》、《传》：“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左传》杜注：“城阳诸县东北，有娄乡。”《路史》说牟娄“一曰无娄”。牟娄、无娄、娄，为同一地名。牟古幽韵，娄古侯韵，古可旁转。“无”古鱼韵，与娄也可旁转。急言称“娄”；缓言称“牟娄”、“无娄”，有古越语多音节特点，盖夏为越后故也。上海附近一带古称娄，当是山东杞人南迁带来。夏人征服防风氏部族以后，当有一部分防风氏族裔

依附夏人,他们也与夏裔一起来到江南,居于娄地。《越绝书·吴地传》:“娄东十里坑者,古名长人坑,从海上来。”此“长人”当指防风氏族裔,他们“从海上来”到夏裔聚居地“娄”之“东”。上海马桥文化中明显有山东岳石文化因素,娄地名与“长人坑”皆在上海附近,当为山东夏裔“从海上来”到上海之二重证据。

江南越国何时建立?最初的国都在何处?迁徙过程如何?目前还不容易考证得很具体。越国王室是夏裔,从山东经海路迁来,则可肯定。越国的连续世系,只能从夫谭算起。“夫谭子允常,允常子勾践”(《越绝书·记地传》)。年代是春秋晚期。国都在绍兴、诸暨一带。

---

## 第二节 吴文化的诞生

---

### 一、湖熟文化——吴文化的前身

宁镇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称“湖熟文化”。湖熟文化因1951年最先发现于江苏江宁湖熟镇而得名。主要遗址有:南京北阴阳营遗址第三层<sup>①</sup>、锁金村遗址下层<sup>②</sup>、太岗寺遗址上层<sup>③</sup>、江宁汤山点将台遗址中层<sup>④</sup>、镇江马迹山遗址<sup>⑤</sup>、仪征甘草山遗址<sup>⑥</sup>、滁河下游的江浦蒋滕子遗址<sup>⑦</sup>等。

湖熟文化的分布范围与北阴阳营文化大体相同,即以宁镇地区

---

① 《南京市北阴阳营第一、二次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② 尹焕章等:《南京锁金村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③ 《南京西善桥太岗寺遗址的发掘》,《考古》1962年第3期。

④ 《江宁汤山点将台遗址》,《东南文化》1987年第3期。

⑤ 《镇江市马迹山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11期。

⑥ 《仪征胥浦甘草山遗址的发掘》,《东南文化》第2辑。

⑦ 《江浦县曹王滕子遗址试掘简报》,《东南文化》第2辑。

为主,延伸至滁河流域、皖南地区。湖熟文化层大多叠压在北阴阳营文化层之上,但两个文化层在年代上并不连接,文化内涵也存在缺环,这说明宁镇地区的原始居民与太湖地区一样,也曾远徙黄河流域,参与中原逐鹿。

湖熟文化的开始年代约当中原商代前期。下限年代约当中原周代初期。西周前期康王时期,周人南下,在宁镇地区建立宜(即吴)国,使该地区文化面貌起了很大变化。从此时开始,宁镇地区的文化应称吴文化。湖熟文化可称先吴文化。

湖熟文化是早期青铜文化,出有小件青铜器,如镞、小刀、鱼钩、凿、斧等。在南京北阴阳营遗址第三层(即湖熟文化层)发现一件炼铜用的陶钵,钵的内表粘附着一层铜液,这说明湖熟文化的青铜器是当地制造的。但石器仍然是主要生产工具。半月形穿孔石刀、石镞、石镰、椭圆形石斧与扁平穿孔石斧等,都是北阴阳营文化的延续。陶器变化较大,炊器出现了鬲,腹部常带角状把手。陶甗也是新品种。鬲与甗来自北方。例如江宁点将台中文化层出土的陶器“鬲、缸、研磨盆等都与中原商代遗存相近”。北阴阳营遗址第三层出土的“铜刀基本为条状,形近殷代武士所佩带的刀”<sup>①</sup>。锁金村遗址出土的青铜小刀与徐州高皇庙遗址殷代文化层所出的相同<sup>②</sup>。北阴阳营文化的炊器以鼎为主,湖熟文化的炊器以鬲与甗为主,这是一种突变。鬲是商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湖熟文化的鬲富有地方特色,即有角状把手,“这是本地原有带把手的鼎或盃与中原商文化的鬲有机结合的产物,……但其基本特点如高裆、半袋式尖锥足等,与二里岗商代中期的鬲甚为接近”<sup>③</sup>。内壁有刻划纹的陶钵更是商代早期的典型器物,见于郑州二里岗、洛

① 曾昭燏、尹焕章:《试论湖熟文化》,《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

② 《徐州高皇庙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图版肆:1—4。

③ 魏正瑾:《宁镇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与分期》,《考古》1983年第9期。

阳东干沟、陕县七里铺等商代早期遗址<sup>①</sup>，而且在中原是仅见于商代早期的典型器物。北阴阳营遗址第三层出有龟甲和牛、羊的肩胛骨片，甲骨上有灼痕，显然是用于占卜。扬州郊外的葫芦山也发现“占卜用有火灼痕迹的龟甲”<sup>②</sup>。卜甲和卜骨的发现，尤其是卜骨的发现，说明湖熟文化的上层社会，在精神生活方面受到商文化的影响，这些使用卜骨的人，可能就是商族人，他们可能是当时宁镇地区的统治者。

根据田野考古资料，当时的宁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这些地方的大片土地可能已入商王朝的疆域。宁镇地区可能是商王朝的东南边陲重镇。根据《宜侯矢簋铭》辞，西周康王封宜侯矢于宁镇以前，这里已有“王人”。《宜侯矢簋铭》的“王人”是“殷之没落贵族”。<sup>③</sup>

湖熟文化与马桥文化都是早期青铜文化，两者的区别十分明显。(1) 在青铜器方面湖熟文化数量、器类较多，并有冶铸遗迹发现，铜刀、鼎耳、鼎足的形制与商文化相似。马桥文化的青铜器很少见，铜刀、铜凿的形制与二里头夏文化相似。(2) 在炊器方面，湖熟文化以鬲为主，甗次之，鼎少见，无釜。鬲的主体形制与中原商鬲相同，甗的下部是袋足鬲。马桥文化的炊器以鼎为主，其次是釜与甗，无鬲，甗的下部是扁足鼎。(3) 马桥文化有一组与二里头夏文化相似的陶器群(觚、觶、尊、簋、瓦足盘等)，为湖熟文化所不见，湖熟文化中内壁划纹的商文化陶钵，为马桥文化所不见。(4) 湖熟文化的石镞是柳叶形，马桥文化的石镞除传统的柳叶形和菱形带铤或带翼外，还出现大量扁平三角形，与二里头夏文化的石镞相同。(5) 湖熟文化有卜骨、卜甲，马桥文化无。(6) 各地马桥文化遗址普遍出有大量印纹硬陶与原

① 《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图拾陆：4；《1958 年洛阳东干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59 年第 10 期，图版柒：7；《河南陕县七里铺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60 年第 1 期，图十七：3、4。

② 《江苏仪六地区湖熟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62 年第 3 期。

③ 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8 页。



始瓷,印纹陶是越文化的重要标志。湖熟文化虽然也有印纹硬陶与原始瓷,但数量甚微。例如江宁点将台遗址中层陶片较多,印纹硬陶仅占1%,原始瓷片更少。总之,马桥文化受二里头夏文化的间接影响,湖熟文化受商文化的直接影响。如果放宽尺度,湖熟文化与江西吴城文化一样,可以归到商文化的系统里去,马桥文化则有浓厚的南方越文化特色,归不到夏文化里去。就整体水平言,湖熟文化比马桥文化略高,它与中原青铜文化的差距比马桥文化略小。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除了两地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程度不同之外,主要还在于两地主要土著居民的族属不同。太湖流域的主要土著是越族,宁镇地区的主要土著是淮夷<sup>①</sup>,淮夷文化与华夏文化比较接近。

## 二、周人南下与宜(吴)国建立

宁镇地区的商文化遗存延续到西周初期,到西周康王时期以后,宁镇地区开始出现周文化遗存。

丹徒从大港至谏壁一带的沿江山上,分布着一批周代大墓,年代愈东愈早,愈西愈晚。先后经过清理发掘的有烟墩山1号墓、2号墓,磨盘墩墓,母子墩墓,北山顶墓,粮山1号墓、2号墓,王家山墓,青龙西山墓。“遭破坏的墓葬最重要的有青龙东山墓和墩上墓。青龙东山墓于1958年开山取石时被炸毁,青铜器残片到处可见,据云有一件青铜鼎从山顶滚到山下,直径逾40厘米;墩上墓‘文革’期间被农人挖掘,卖到废品收购站的青铜器达200余斤,据云有一鼎形体甚大,有一壶有盖,盖上有鸟形捉手。”<sup>②</sup>可见丹徒的大港至谏壁一带应为

<sup>①</sup> 《吴越文化新探》,第164—165页。

<sup>②</sup> 张敏,《吴王余昧墓的发现及其意义》,《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合刊,第54页。

吴国贵族墓葬区。烟墩山1号墓、2号墓、磨盘墩墓、母子墩墓，年代均属西周。

烟墩山又名四墩山，山上原有4座大型土墩墓，1号墓只是其中的一座。1号墓于1954年发现，出土的青铜礼器有5鼎1鬲2簋，此外还有酒器、水器、兵器和车马器等<sup>①</sup>。其中一簋有铭，称《宜侯矢簋》，铭文如下：

隹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征商图，遂省南国图。王卜于宜，入社，南向，王命虞侯矢曰：“迁侯于宜。赐鬲鬯一卣，商瓚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赐土：厥畷三百，厥□百又□，厥宅邑卅又五，厥□百又卅。赐在宜王人□十又七姓。赐甸七伯，厥廬□又五十夫；赐宜庶人六百又十六夫。”宜侯矢扬王休，作虞公父丁尊彝。

宜侯矢簋是建国以来出土的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形制属西周早期。与它同出的其他铜器、原始瓷器等的形制也属西周早期。器主“宜侯矢”原为“虞侯矢”，铭文记载康王把他从北方的虞地迁封到南方的宜地。宜侯矢为了纪念这次册封庆典，特地在北虞铸造此器，然后带到南方。因此，此簋的铜质、形制、纹饰，都属中原铜器。早在文王以前，北方已有姬姓虞国。《逸周书·世俘解》：“王烈祖自太王、大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武王祭祖时把虞公列在文王之前。《国语·晋语四》说文王“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可见文王时北虞贵族已不少。按先秦语例，北虞既可称虞，也可称吴，如《汉书·地理志》称北虞为“北吴”；而南吴绝无称虞之例<sup>②</sup>，铭辞之“虞”必为北方之虞。宜与虞、吴古音相近，可以通假，宜是吴的初名。宜侯矢可能就是《史记·吴太伯世家》的叔达。<sup>③</sup>

① 《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

②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第146页。

③ 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第22页。

烟墩山1号墓的出土物,除宜侯矢簋纯属中原器物外,其他铜器和原始青瓷豆等,都具有南方特点,应为当地产品。

烟墩山2号墓在1号墓南坡70米处,是一座中型土墩墓,可能是1号墓的陪葬墓。墓底有长方形石床。随葬品36件,其中陶鬲达8件之多,有一件IV式绳纹鬲(M2:22),与长安张家坡西周墓所出之IV式鬲完全一致,属中原西周早期形制(图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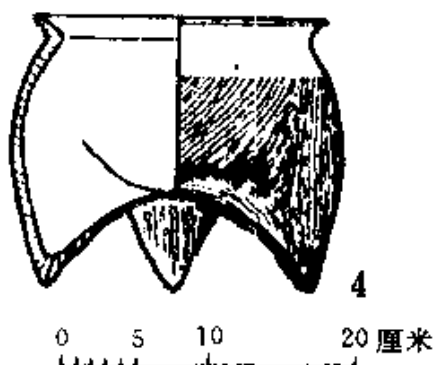


图3-2 烟墩山2号墓出土的IV式鬲(M2:22)

磨盘墩墓有长方形竖穴土坑,随葬品有青铜尊、匝各1件,车马器2组,印纹硬陶罐、瓮,原始青瓷罐、豆等80余件,海贝170余枚。其中青铜独耳尊为中原罕见,颇具南方特色。年代约当西周前期。

距烟墩山1号墓仅3公里的荞麦山母子墩西周墓,1982年发掘,出土铜器500余件,其中鼎、鬲、簋、尊、卣、壶等礼器9件,青铜兵器百余件,铜车马器数百件。这些铜器绝大多数在铜质、形制、纹饰上都有南方特点,当为本地铸造。只有一件具铭方座簋,即伯簋,形制与陕西长安花园村17号墓出土的西周前期谿(唯叔)簋相似。伯簋方座上是二凤相对,谿簋方座上是四鸟双双相对,其余完全相同。经检验,伯簋主要成分是铜,锡大量,铅微量,与中原青铜器相同。器内底部铭五字:“白(伯)乍(作)宝尊(尊)彝。”这类铭文的铜器,在陕西周原一带出土颇多。李学勤定谿簋为昭王时器<sup>①</sup>,马承源定伯簋为穆王时器<sup>②</sup>。伯簋与宜侯矢簋一样,都是西周前期中原器物,都是江南统治

① 李学勤:《论长安花园村两墓青铜器》,《文物》1986年第1期。

② 马承源:《长江下游土墩墓出土青铜器的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第4期。

者从中原带来的,这些墓主人是周人,不是南方土著贵族。

除丹徒外,宁镇地区的溧水、句容、金坛等地也都发掘过一些西周土墩墓。溧水乌山1号、2号墓出土的提梁卣、方鼎、竖耳垂腹柱足鼎,都是中原常见的西周早期形制。在太湖地区,土墩墓很少出有青铜器,而宁镇地区的这些西周土墩墓普遍出有青铜器,伴有较多的原始瓷器豆。这种原始瓷器豆,在中原西周墓中是经常发现的。如长安普渡村西周墓、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岐山贺家村西周墓等。金坛县城东乡一座西周土墩墓出土230件青铜块,共重70千克,应该是当地铸造铜器的原料。<sup>①</sup>

在长江下游,周文化最早出现于宁镇地区,时间是西周早期,这说明周人初到江南的地点不是无锡、苏州,时间不是殷末、先周的古公时期,旧史盛传“太伯奔吴”,其实,太伯所奔的是北虞,虞仲是北虞始封君。《史记·吴太伯世家》所列吴世系之第五世“周章”,是“吴太伯”一人之分化<sup>②</sup>。《汉书·古今人表》称“吴寿梦”为“十五世”,按《史记·吴太伯世家》,寿梦是十九世,故历来学者皆斥之为“误”。若除去太伯、仲雍、季简、周章,寿梦刚好是“十五世”,无误。《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北虞从南吴分封出来,事实正好相反,是南吴从北虞分封出来<sup>③</sup>。

---

### 第三节 吴越文化的融合统一

---

#### 一、吴文化的中期突变(越化)

西周时期,茅山两侧的文化面貌泾渭分明,西侧的宁镇地区是吴

---

① 《江苏金坛暨墩西周墓》,《考古》1978年第3期。

② 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第20、21页。

③ 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第19—23页。

文化区,东侧的太湖地区是越文化区。大约在春秋前期,宁镇地区的文化面貌产生明显的越化倾向,而在太湖地区,青铜文化由西而东渐次发达起来。到春秋晚期,茅山两侧的文化面貌已趋一致,吴文化与越文化已融合统一而成吴越文化。

宁镇地区的吴文化可分为三期。西周是第一期,春秋前期是第二期,春秋后期是第三期。第二期与第三期大体相同,第一期与第二、三期有明显区别。

第一期墓葬常有青铜器出土,这些青铜器与中原地区同期青铜器相比,共性大于个性。第二、三期墓葬除丹徒沿江和六合程桥的贵族大墓之外,一般土墩墓都无青铜器,贵族大墓所出的青铜器与中原同期青铜器相比,个性大于共性。

第一期墓葬原始瓷器品种不多,罐、碗都很少,而普遍存在原始瓷豆,这种原始瓷豆,在中原西周墓中是经常发现的。在第二、三期墓葬中,原始瓷器进入鼎盛期,器形多样,有罐、小罐、小盂、碗及带盖碗等,却没有豆器,也就是说,在食用器方面,碗取代了豆。

在炊器方面,第一期多见夹砂陶的鬲和鼎,无釜。多数的鼎带有角状的把手。第二、三期的夹砂陶炊器是釜与鼎,无鬲。也就是说,在炊器方面,釜取代了鬲。而且鼎无角状把手,鼎上部为釜形,连鼎也釜形化了。第二期的鼎足扁圆锥形,第三期的鼎足是扁鸭嘴形,这些都是太湖地区陶鼎的特色。

显然,宁镇地区的吴文化在春秋前期发生了突变。鬲是中原商周文化的主要炊器,也是宁镇地区湖熟文化的主要炊器。到了西周时期,鬲仍很普遍,到了春秋前期,鬲突然消失。鼎虽为三个时期所共有,但西周时期的鼎带有角状把手,这是宁镇地区陶鼎独具的地方特色,到了春秋前期这特色就突然消失。西周时期原无釜,到了春秋前期,釜突然取代了鬲。

炊器不用鬲是太湖、钱塘江水系的传统特点。釜,一直是该地区

的习用炊器。马家浜文化与河姆渡文化,釜都是主要炊器。在全国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时期遗址中,虽也发现不少釜,但从商周到春秋晚期,从黄河流域到珠江流域,除长江下游与广东等越人居住地区之外,其他地区很少发现釜。这种盛行数千年的釜,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在广大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上游,普遍被鬲代替,这是商周文化对外扩展的标志。但是,当广大地区普遍以鬲代釜的时代,宁镇这小片丘陵地带,却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戏剧性变化。这里,在西周时期,仍以陶鬲为主要炊器,到了春秋前期,突然以釜代替了鬲,与东边的太湖地区取得了完全一致,而一反自己的原来面貌,也违反了其他广大地区的演变趋势。与陶鬲消失的同时,宁镇地区的另一重要炊器陶鼎,也突然消失了自己的特色,把手没有了,也与东边的太湖地区取得了一致。

导致宁镇地区吴文化中期中突变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主要的土著民族由原来的淮夷被越人代替;二是南下的周人随从越俗,即古书说的“断发文身”。第二个原因是由第一个原因决定的。

宁镇地区本是淮夷的聚居地,到了西周时期,宁镇地区逐渐有越人迁入。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遗址下层,很少有几何印纹硬陶,上层明显增多,靠近浙、皖的宜兴、溧阳、江宁一带,几何印纹陶尤多。“溧阳县的孔村神墩和社渚,宜兴县的高塍”,是宁镇地区几何印纹硬陶“遗存最丰富的遗址”,“江宁县的东善桥,溧阳县的社渚,宜兴县的横山水库”,“都发现以几何印纹硬陶为主要陪葬品的墓葬”<sup>①</sup>。这些外来的越人,与原来的土著淮夷人难免有矛盾,这使周人有隙可乘。周王朝分封宜侯矢,目的是为了监临东夷,为了取得南方其他土著的支持,可能随从越俗以抗夷族。《左传·哀公七年》:“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鬻立,断发文身。”太伯、仲雍都不可能来到江南,但这个传说

<sup>①</sup> 曾昭燏、尹焕章:《江苏古代历史上的两个问题》,《江海学刊》1962年第12期。

可能是这种历史事实的折光反映,即周人初到江南时,还保持周的习俗(“治周礼”),后来迫于斗争的需要,才屈从越俗,逐渐越化。史称周人“断发文身”,“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这千余家“荆蛮”应该是“断发文身”的越人。他们得到周人的支持后,可能逐渐取淮夷人而代之,成为宁镇地区主要的土著民族。

宁镇地区居民成分的变化,应该是宁镇地区吴文化发生中期突变的重要原因。突变的时间始于春秋早期,这与当时的斗争形势有关。西周末年,王室式微,苏北、皖北的徐、淮诸夷势力复兴。吴国的统治者周人,为了翦灭“内奸”,消除隐患,在国内争取越人、排斥夷人,是合乎情理的,此其一;其二,春秋时期,吴国开始向东扩张,为了争取太湖地区土著居民的支持,越化也是符合策略要求的。

吴文化区别于越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出有大量青铜器。发现于太湖地区、具有吴文化特点的青铜器,其上限年代未有早于春秋。苏州地区具有吴文化特点的青铜器,其上限年代只能追溯到春秋晚期。青铜器是贵重器物,以国都最为集中,苏州青铜器的上限年代,应该是吴国定都姑苏的重要时间标尺之一。宋人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说:“周敬王六年,阖闾始城姑苏而迁焉。”周敬王六年即阖闾元年,也即公元前514年。只过40年,越就灭吴。由于吴国统治太湖地区时间不长,这使太湖地区在春秋时期没有发生文化断层,整个太湖、钱塘江流域文化面貌基本一致。

## 二、干越文化的加盟

上节说过,宁镇地区居民成分的变化,是宁镇地区吴文化发生中期突变的主要原因,突变的时间始于春秋早期。春秋早期,吴灭干越。《管子·小问》:“昔者吴、干战,未訾不得入军门。国子撻其齿,遂入为干国多。”战斗十分激烈残酷。吴灭干后,吴又称“吴干”、“吴邗”,甚至

径称干、邗。可知干是文化发达国家,吴国吸收了干的文化,故袭其国号。吴变成吴干,是吴文化发生中期突变的动因。

干的地望有四说,蒙文通说在临淮<sup>①</sup>,俞静安说在扬州<sup>②</sup>,陈梦家说在太湖平原<sup>③</sup>,刘美崧说在赣东北余干一带<sup>④</sup>。现在人们多从刘说,认为鄱阳湖东岸、皖南一带是干越文化区,可能波及浙西的新安江流域。

江西鄱阳湖东岸地区,六十年代发现著名的万年遗址和墓葬<sup>⑤</sup>;1983年发现鹰潭角山商代窑址<sup>⑥</sup>,出土大批陶瓷器皿和制陶工具,在不少工具和器皿上发现刻划符号或文字1500多个<sup>⑦</sup>。角山出土的陶器在“胎质、制法、器形和印纹陶纹样,以及总的文化面貌都与万年一致”,“可把万年一角山看成同一文化类型”<sup>⑧</sup>。万年一角山类型应属干越文化。近年,地处赣东北的玉山县发现东周时期的土墩墓。

皖南的繁昌、南陵、青阳、郎溪、屯溪等地,分布着许多土墩墓,随葬品主要为原始青瓷与印纹硬陶,年代约当西周、春秋。其中,屯溪的几座西周土墩墓规模最大,出土遗物最为丰富<sup>⑨</sup>。屯溪西周土墩墓的主要随葬品是青铜礼器与原始瓷器。据专家鉴定,屯溪出土的原始瓷器,其釉灰采之于今景德镇附近的乐平,这说明当时皖南同鄱阳湖东

① 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俞静安:《“干越”考》,《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7年第3期。

③ 陈梦家:《禹邗王壶考释》,《燕京学报》第21期。

④ 刘美崧:《试论江西古代越族的几个问题》、《百越续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增刊《百越源流研究专辑》。

⑤ 刘林等:《1961年江西万年遗址的调查和墓葬清理》,《考古》1962年第4期。

⑥ 《鹰潭角山窑址试掘简报》,《江西历史文物》1987年第2期。

⑦ 李家和等:《角山刻划符号初步研讨》,《江西历史文物》1987年第2期;廖根深:《角山商代记数符号分组研究》,《江西历史文物》1987年第2期。

⑧ 《十年来江西的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考古工作十年》,第150页。

⑨ 《屯溪西周墓》,《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536页;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屯溪西周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



岸关系密切。屯溪还出有几何印纹硬陶,在部分原始瓷器与青铜器上,也有几何形纹饰,这应是对几何形印纹硬陶的摹仿,体现了当地居民对几何印纹陶这一传统工艺的偏爱。因此,屯溪一带很可能也是干越文化区。<sup>①</sup>

近年,皖南发现十多处先秦时期的矿冶遗址,均为冶炼型。其中,以南陵江木冲遗址规模最大。炼铜炉渣散布范围近 1.5 平方公里。1988 年 5、6 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试掘了南陵江木冲和铜陵木鱼山遗址。从发现的遗址遗物看,皖南地区在西周晚期即已开始铜矿的采冶。江木冲炉渣的含铜量为 0.34—1.3%,有的已超过湖北大冶铜绿山 0.7% 的平均含铜量,接近现代冶炼厂炉渣含铜量标准,反映了较高的冶炼水平。至迟在东周时期,皖南铜矿已使用硫化铜矿石来炼铜。此外,在江木冲、木鱼山、万迎山均发现有古矿井坑迹和石球、葫芦形提升石等采矿工具,这证明了当时的采矿与冶炼活动是在同一小区内进行的”<sup>②</sup>。就现有考古资料言,皖南地区堪称长江下游最早最大的冶炼中心,南陵古矿冶遗址规模之大,为国内罕见,仅以江木冲冶炼遗址为例,其炼渣“总重量达 50 万吨以上,若按每 10 吨渣出铜一吨计算,则仅该遗址就提炼出粗铜 5 万吨以上”<sup>③</sup>。皖南先秦矿冶遗存的主人,应该是干越族人。

《庄子·刻意》云:“夫有干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尸子·劝学》云:“使干越之工铸之以为剑。”《新序·杂事》云:“剑产于干越。”著名的铸剑名匠干将,应为干越族人。吴灭干后,干将入吴,为吴王铸剑。干将莫邪的神话传说,说明干越先进的青铜

① 刘玉堂:《论屯溪西周墓的族属》,《楚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十年来安徽省的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第 133 页。

③ 彭适凡:《略论扬越、干越和于越对我国冶金术的杰出贡献》,《国际百越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46 页。

文化加盟了吴文化。《战国策·赵策》云：“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匝。”越灭吴后，吴干先进的青铜文化加盟了越文化，使越国兵器的铸造工艺达到先秦时代的最高水平。越国的一些兵器即在赣东北的余干制造。最近，台北古越阁主人王振华收藏到一件“越王州句复合剑(双色剑)”，剑格正面铭“越王州句”，背面铭“之唯用剑；余邗工利”。余邗是地名，即《汉书·地理志》豫章郡的余汗，汉代辖境包括鄱阳湖东岸至浙西新安江附近的大片地区。故城在今江西余干东北。“工利”即工匠名字叫利<sup>①</sup>。“余邗工利”表明，此剑是在当时的余邗制造，赣东北属越国国境。此剑脊部与两锷的铜料成分不同，故色泽不一。脊部含锡量较低，锷部含锡较高。锷部锡多，较硬而锋利；脊部锡少，较韧而难折。刚柔相济，各得其所。这是当时的一种先进工艺。

干越文化的加盟，对吴越文化的统一与提高，起了促进作用。

---

<sup>①</sup> 铭文释读，详见李学勤：《新出现的十二字越王州句复合剑》，《中国文物世界》第112期。

## 第四章 吴国金文

金文,即青铜器铭文,是研究先秦历史文化最可靠的原始资料,可补文献之缺,纠正文献之误。吴国历史,文献记载不多,而吴国金文,1949年后出了不少。铭文中很多专门名词保留着古越语风貌,极具特色。因此,吴国金文是吴国文化的十分重要方面。旧史盛称,吴为周人后裔,近代学者对此颇多怀疑。1949年以后出土吴国铜器铸明吴为“姬”姓,这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五十年代出土的宜侯矢簋,更为研究吴国早期历史打开了全新局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吴国金文是研究吴国历史文化的铁证材料。

---

### 第一节 吴国金文集录

---

#### (一) 宜侯矢簋

1954年6月,江苏丹徒龙泉村烟墩山出土。今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图4-1)。最初著录于《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四耳,高圈足,属西周初期形制。据铭文,是康王时器。簋腹内底有铭文12行,100多字(图4-2)。可分三段:第一段说康王看了武王、成王的伐商地图,又看了南国地图,经过卜卦,决定封矢于宜地。于是,康王进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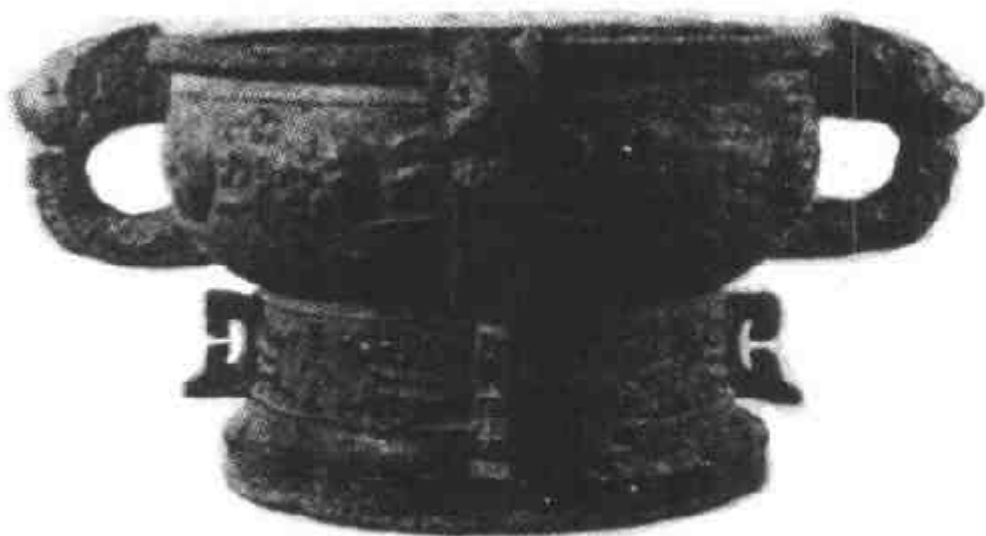


图 4-1 宜侯矢簋

大社,面向南方,对“虞侯矢”举行册封仪式。第二段为册命全文:即“迁侯于宜”,赐以礼器、土地、奴隶等。第三段记“宜侯矢”受封后,称颂周王的美德,并为其先人“虞公父丁”作此祭器。器主受封前称“虞侯矢”,受封后即自称“宜侯矢”,可知是由虞地迁封到宜地。虞在北方,宜在江南,虞与吴古字同,上古音虞属鱼部,宜属歌部,虽不同韵,但元音相同,可以通转,例如“吾”古鱼部,“我”古歌部,二字自古互通。根据古籍资料,宜字与虞、吴也可通假。

《诗·小雅·角弓》:“如食宜飶。”《释文》、《韩诗》作“如食仪飶”。《诗·大雅·烝民》:“我仪图之。”毛传:“仪,宜也。”《文选·束皙补亡诗序》:“由仪,万物之生各得其仪也。”注:“毛萇《诗传》曰:‘仪,宜也。’”可知宜可通仪。而仪与偶亦通。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五《柏舟》云:“仪与偶双声,仪为偶假借字。”偶或隅皆以禺为声,与虞、吴同在鱼部,可以通假。如《山海经·大荒北经》:“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郭注:“禺谷,禺渊,日所入也,今作虞。”《列子·汤问》“逐之于隅谷之际”,张注:“隅谷,虞渊也。”

根据金文与文献资料,北虞可以称吴,而南吴从不称虞,盖因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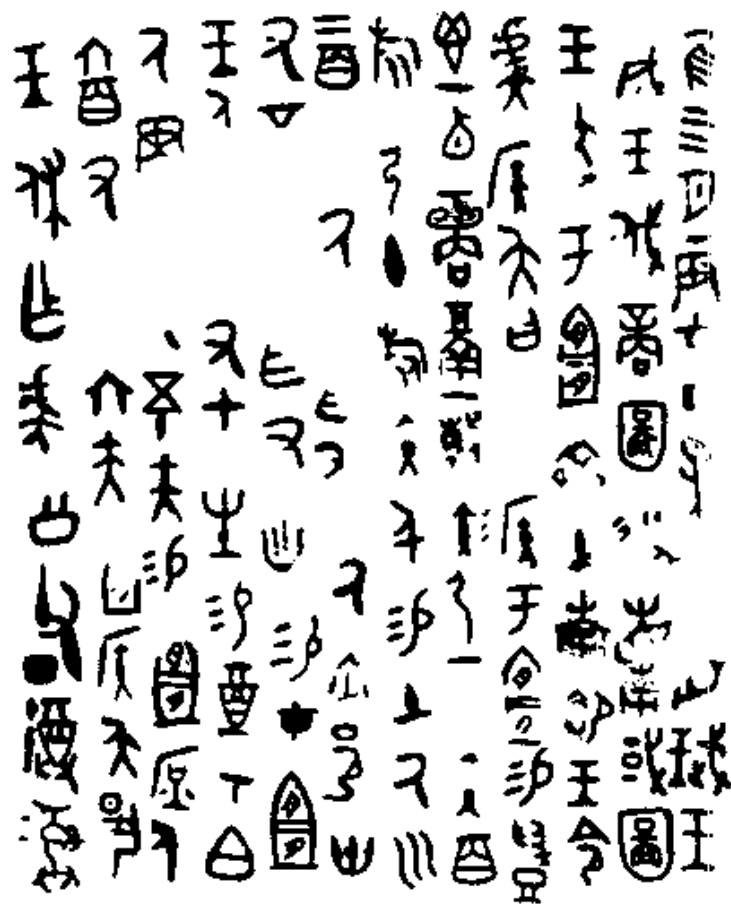


图 4-2 宜侯矢簋铭文摹本

虞早于南吴,南吴是从北虞分封出来的;宜即南吴,是它的初名<sup>①</sup>。宜侯矢即《史记·吴太伯世家》第四世叔达<sup>②</sup>。《说文解字》释矢为“侧头”,头侧则不正。达有通义,与矢反义。矢为本名,叔达是字。

## (二) 者减钟(10件)

此编钟最初著录于《西清续鉴》甲编第十七卷。据记载,此编钟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江西清江出土,共11件,其中最小的一件没有铭文,作为“金文”统计,只能算10件。今犹存4件,二大二小,大者分别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台北博物馆,小者分别藏于北京故宫博

①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第二章第一节“三、宜侯矢簋‘虞’、‘宜’考释”。

② 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

物院与上海博物馆。

有铭文的 10 件编钟,按器形大小排列,第一至六件,每钟铭文 80 余字;第七至十件,每钟铭文 27 或 28 字。每件铭文内容皆完整。国名称“工敝”。器铭中的“工敝王皮黹”及其“子者减”,究竟是谁,说法不一。马承源认为皮黹是毕轸(句卑)的音假<sup>①</sup>,可从。又董楚平认为者减即去齐。者古诸字,是古越语人名地名常用发语辞,无义。减犹失,去亦有“失”之义,去齐,即失齐、不齐,与减同义。者减当是本名,去齐是后取之字。铭曰:“工敝王皮黹之子者减……”。此钟当是去齐为太子时,即毕轸(句卑)在位时所作<sup>②</sup>。句卑时晋献公灭北虞(《春秋·僖公五年》),时当春秋中期,与钟的形制、纹饰所属年代相符。《史记》说吴国自寿梦始称王,据者减钟铭文,句卑已称王,比寿梦早二世。者减钟工艺颇高,风格同于中原。吴国在寿梦以前,应该已“通于中国”。

### (三) 邗王是野戈

著录于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569,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 4-3)。正反面共有铭文 8 字,郭沫若读作:“邗王是野作为元用。”“邗王”即吴王,吴灭邗后,袭用其国名。“是野”,郭沫若与罗常培皆以声韵考为寿梦。<sup>③</sup>

### (四) 工敝太子姑发剑

1959 年安徽淮南蔡家岗赵家孤堆 2 号墓出土<sup>④</sup>。安徽省博物馆藏。国名称“工敝”。此为诸樊为太子时、即寿梦在位时所作。铭 2 行

① 马承源:《关于甗生盨和者减钟的几点意见》,《考古》1979 年第 1 期。

② 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9 页。

③ 郭沫若:《吴王寿梦之戈》,《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130 页;罗常培:《关于〈吴王寿梦之戈〉音韵上的一点补充》,《光明日报》1950 年 6 月 21 日。

④ 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考古》1963 年第 4 期。

背面 正面

图 4-3 邗王是野戈铭文拓本

35 字,器主自称是:“工𡇗太子姑发𡇗反”。姑发𡇗反是诸樊的古越语记音,诸樊是省写、缩写。根据古越语人名规律,前一、二字是发声,无义,后一、二字才是主词所在。𡇗,金文首见,文献所无,其义难以确诂,以文理推测,当与“反”字同义。诸樊又名“遏”(《春秋·襄公二十五年》)。遏,阻止也,与“反”同义。是知“遏”与“姑发𡇗反”有语义相配关系,应该是一名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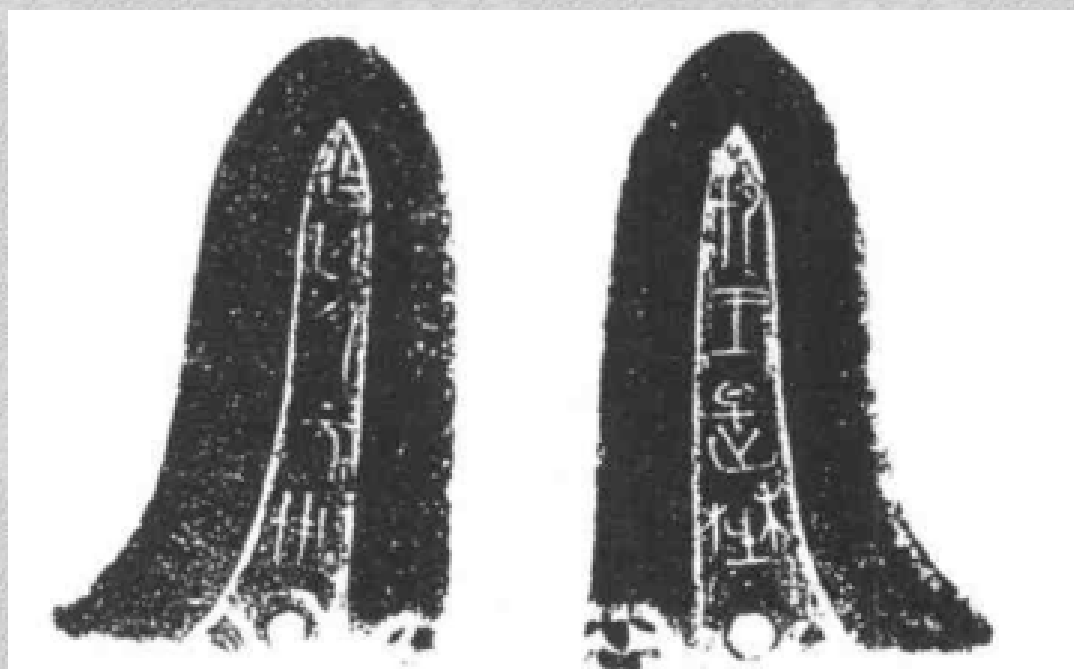
#### (五) 工𡇗王剑

1983 年山东沂水出土<sup>①</sup>。沂水博物馆藏。铭 2 行 16 字,器主自称“工𡇗王”,名字未铭。铭辞与前器雷同,疑为诸樊为王时所作。

#### (六) 工𡇗季生匜

江苏盱眙出土。匜内有铭文 9 字:“工𡇗季生乍其盥会匜。”季生

<sup>①</sup> 沂水县文物管理站:《山东沂水县发现工𡇗王青铜剑》,《文物》1983 年第 12 期。



背面

正面

图 4-3 邗王是野戈铭文拓本

35 字,器主自称是:“工敷太子姑发晋反”。姑发晋反是诸樊的古越语记音,诸樊是省写、缩写,根据古越语人名规律,前一、二字是发声,无义,后一、二字才是主词所在。晋,金文首见,文献所无,其义难以确诂,以文理推测,当与“反”字同义。诸樊又名“遏”(《春秋·襄公二十五年》)。遏,阻止也,与“反”同义。是知“遏”与“姑发晋反”有语义相配关系,应该是一名一字。

#### (五) 工虞王剑

1983 年山东沂水出土<sup>①</sup>。沂水博物馆藏。铭 2 行 16 字,器主自称“工虞王”,名字未铭。铭辞与前器雷同,疑为诸樊为王时所作。

#### (六) 工虞季生匜

江苏盱眙出土。匜内有铭文 9 字:“工虞季生乍其盥会匜。”季生

① 沂水县文物管理站:《山东沂水县发现工虞王青铜剑》,《文物》1983 年第 12 期。



当即寿梦季子延陵季札。<sup>①</sup>

### (七) 工虞季子剑

1985年山西榆社出土。榆社博物馆藏<sup>②</sup>。铭2行24字：“工虞王姑发髻反之弟季子，所尚後子，厥可金而作其元用剑。”《史记·吴世家》说：“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曰季札。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所，敬；尚，崇尚、推举。後子，“为父後之子，即长子也”（《墨子间诂》）。“所尚後子”，季子敬重诸樊。可金，吉金、善金。铭辞有印证文献关于季札让国的重要价值。<sup>③</sup>

### (八) 工虞大叔盘

1988年江苏六合程桥东周3号墓出土<sup>④</sup>。南京市博物馆藏。铭1行10字：“工虞大叔□□自作行盘。”工虞大叔，前世吴王之首弟。叔下二字是他的名字，可惜模糊难识。墓葬年代属春秋末期。国名称“工虞”，可能属诸樊时期。器主可能是寿梦之首弟，诸樊之大叔。

### (九) 攻敌工叙戟

1980年出土于安徽霍山一座春秋晚期墓葬<sup>⑤</sup>。霍山文物管理所藏。援两面各有错金铭文4字：正面“攻敌工叙”，反面“自作用戟”。器主“工叙”即“句馀”（余祭）。工句古通。《说文》“叙，余声。”本铭“工叙”未称王，应作于公元前548年以前。<sup>⑥</sup>

① 秦士芝：《盱眙县王庄出土春秋吴国铜匜》，《文物》1988年第9期。

② 晋华：《山西榆社出土一件吴王姑发剑》，《文物》1990年第2期。

③ 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第96、97页。

④ 南京市博物馆等：《江苏六合东周三号墓》，《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

⑤ 王步毅：《安徽霍山县出土吴蔡兵器和车马器》；殷淦非：《吴工年戟跋》。二文均载《文物》1986年第3期。

⑥ 金永平：《吴王徐祭余昧享国年代辨析》，《东南文化》1989年第3期。

### (十) 余昧矛

1984年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出土<sup>①</sup>。南京博物院藏。余昧是余祭之弟，在位17年（前543—前527年）。<sup>②</sup>

### (十一) 伯刺戈

1960年江苏江宁出土，南京博物院藏。器主伯刺可能是吴王僚，刺僚音近通假。

### (十二) 吴王光鑑(2件)



图4-4 吴王光鑑 附小匣

1955年安徽寿县西门内蔡昭侯墓出土(图4-4)，著录于《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sup>③</sup>。共出2件，一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一藏安徽省博物馆，形制、大小、铭文、纹饰都相同。高35、口径57、腹径59、底径33厘米。鑑是水器，古人以盛水正容为监。《尚书·酒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鑑大者可当浴器，《庄子·则阳》：“同濫而浴。”《释文》：“濫，浴器也。”犹今之浴缸。此鑑及下文夫差鑑，皆大可容人，当为浴器。内底有韵语铭文8行52字(图4-5)：

佳(惟)王五月，既字白

① 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6年第3、4期合刊。

② 金永平：《吴王徐祭徐昧享国年代辨析》，《东南文化》1989年第3期。

③ 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图 4-5 吴王光鑑铭文摹本

期，吉日初庚，吴王光择  
 其吉金，玄铕白铕，  
 以作叔姬寺  
 吁宗彝荐鑑，用享  
 用孝，眉寿无疆，往已

叔姬，虔敬乃后，

孙(逊)勿忘！

庚、铎、疆、忘，阳韵。铎即矿字，玄铎指铜，白铎指锡(或铅。古代锡铅常混称，吴越青铜器含铅较高)。青铜(“吉金”)是铜与锡(或铅)的合金。周人分一月为四期：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每期约七、八日。铭辞“既字白”，即“既生霸”，字与生、白与霸古可通假。“此言‘既字白期，吉日初庚’，乃初吉之后，既生霸期中之第一庚日，即五月九日左右也。”<sup>①</sup>

此鑑及下文吴王光残钟，都是吴王光(阖闾)的嫁女媵器。根据吴王光钟铭辞“入城”“寺春”推算，本铭首句“惟王五月”，当是吴王阖闾十年五月。吴王阖闾九年(前506年)“冬十有一月庚午(十八日)，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师败绩。楚囊瓦出奔郑。庚辰(二十八日)，吴入郢。”吴王阖闾九年冬末为女儿铸造编钟，十年五月初九前后又铸造此器。这段时间，吴王在郢。

与吴王光鑑、钟同出的还有蔡侯盘、蔡侯尊，是蔡昭侯元年(前518年)嫁姊(大孟姬)于吴王僚的媵器。过了14年，蔡昭侯娶吴王光的女儿(或妹妹)“叔姬寺吁”。吴、蔡都是姬姓，竟违反周礼，两次通婚，以抗强楚。这些铜器都出于寿县蔡昭侯墓。寿县一带，古属州来。蔡昭侯二十六年(前491年)，蔡国为了避楚就吴，迁都州来，到蔡国灭亡共历46年。

### (十三) 吴王光残钟(约13件)

1955年，与吴王光鑑同出于蔡昭侯墓，现藏安徽省博物馆。出土时破碎不堪，经清理，有铭文者计47块。著录于《殷周金文集成》224，称“蔡侯墓残钟四十七片”。郭若愚对残钟片铭文进行连缀，得79字(不计重文)，作了连贯性摹写与释读，认为是一组铭文相同的编钟，

<sup>①</sup> 郭沫若：《由寿县蔡器论到蔡墓的年代》，《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也是吴王光嫁女(叔姬寺吁)于蔡昭侯的腰器。原编钟为甬钟,约 13 枚。

#### (十四) 攻敌王光剑(4 件)



攻 敵  
王 光  
自 作  
用 劍  
以 賞  
勇 人

其一,攻敌王光剑之一。1964 年山西原平出土<sup>①</sup>。山西省博物馆藏。铭 2 行 8 字:“攻敌王光自作用剑。”

其二,攻敌王光剑之二(图 4-6)。1974 年安徽庐江出土<sup>②</sup>。安徽省博物馆藏。铭 2 行 16 字:“攻敌王光自作用剑,赳余允(骏、长)至(鹜),克搏多攻(功)。”赳余是自称之词,赳可能是吴王光称王后自取的号<sup>③</sup>。允、骏古通。骏,长久、永远。至与鹜同声通假。允至,永远勇武,与下文“多功”对偶。

其三,攻敌王光剑之三。1978 年安徽南陵出土<sup>④</sup>。安徽省南陵博物馆藏。铭 2 行 12 字:“攻敌王光自作用剑,以赏勇人。”此剑质地较差,出于一座很普通的土墩墓。“以赏勇人”表明

图 4-6 攻敌王光剑,安徽庐江出土

① 戴遵德:《原平峙峪出土的东周铜器》,《文物》1972 年第 4 期。

② 马道阔:《安徽庐江发现吴王光剑》,《文物》1986 年第 2 期。

③ 《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第 111—112 页。

④ 刘平生:《安徽南陵县发现吴王光剑》,《文物》1982 年第 5 期。

此剑是吴王赏赐给勇士的礼物。

其四,攻敌王光韩剑。今藏荷兰波斯顿博物馆。著录于李家浩《攻区王光韩剑与虞王光超戈》<sup>①</sup>。铭2行12字:“攻敌王光韩以吉金自作用剑。”韩,读作超,吴王光自取之号。

#### (十五) 攻敌王光戈(2件)

其一,攻敌王光戈之一(图4-7)。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著录于《三代吉金文存》19.43。正面胡上铭“攻敌王”3字,援上铭“光自”2字。背面胡上一字未识,此字与下文《王子玖戈》背面胡上一字相同,是特殊标识字,可能是地名、人名,可能是扬字<sup>②</sup>。此戈铭辞不全,缺“乍用戈”3字。铭文为鸟篆体,攻字左上部与王字上部,用单线勾画极简化的背向双鸟首。



图4-7 攻敌王光戈之一



图4-8 攻敌王光戈之二

其二,攻敌王光戈之二(图4-8)。著录于《周金文存》6.18。戈已

① 《古文字研究》第17辑。

② 李零:《古文字杂识》,《古文字研究》第17辑,第282页。

残,仅存三个半字:攻、自、乍;光字只剩末画。字体与前器相同,攻字左上部也饰背向双鸟首。

#### (十六) 大王光趯戈(3件)

同铭三件,分别著录于《周金文存》第六卷第15、16、17页。《周金》17铭文最为清晰(图4-9),现藏上海博物馆,其他二件下落不明。三件大小不一,铭文次序都是由胡至援,转折至背面胡部,共8字:“大王光趯自作用戈。”光趯是名与号连称。字体皆鸟篆,笔画皆肥瘦相间,柔和飘逸,与《宋公趯戈》、《宋公得戈》的鸟篆风格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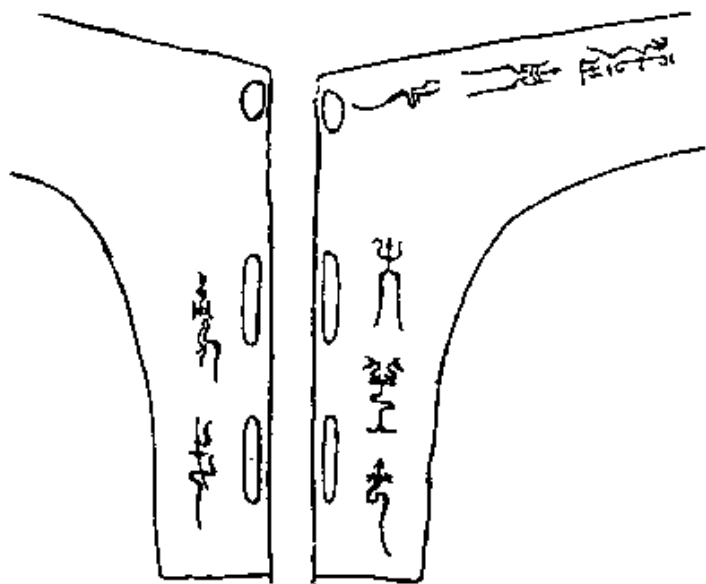


图4-9 大王光趯戈

#### (十七) 配儿钩鐙(2件)

1977年浙江绍兴出土<sup>①</sup>。浙江省博物馆藏。二件同铭,正背面各铭4行60余字。器主自称是“吴”太子“配儿”。配儿即《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之太子波,配波双声;儿是语尾。

<sup>①</sup> 绍兴市文管会:《绍兴发现两件钩鐙》;沙孟海:《配儿钩鐙考释》。二文载《考古》1983年第4期。

### (十八) 玄蓼之用戈

1980年河南新郑能庄出土。著录于《中原文物》1982年第4期第31页图二、三。胡铭“玄蓼之用”4字，字体鸟篆。援铭一特殊标识字，与《攻敌王光戈》、《王子攸戈》胡部之字相同，可凭此字定为吴器，且可能也作于阖闾时期。

### (十九) 吴季子之子逞之剑

传世品(图4-10)，著录于《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8.20。剑身铸错金鸟篆铭文2行10字：“吴季子之子逞之元用剑。”季札有子名逞，未见经传，此铭可补史缺。

### (二十) 王子攸戈(2件)(图4-11)

1961年山西万荣出土<sup>①</sup>。现藏山西省博物馆。此二戈铜质极佳，制作精致。铭文错金、鸟篆，字体与《攻敌王光戈》、《大王光起戈》及下文《吴季子之子逞之剑》最为相似，其背面胡上一字与《攻敌王光戈》背面胡上一字相同，是特殊标识字。铭文无国名，可据此字断为吴器。正面援上2字：“王子”，胡上4字：“攸之用戈。”此二戈长期被定为王僚之器，失之。据研究，应为夫差即位以前所作，“攸”是夫差的本名。<sup>②</sup>

### (二十一) 吴王夫差鑑(5件)

吴王夫差鑑之一(图4-12)，清同治中，山西出土。现在下落不明。著录于《周金文存》4.41。高40、口径70.6厘米，比吴王光鑑大。腹内铭3行13字：“攻吴王大差择其吉金自作御监。”

吴王夫差鑑之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河南辉县出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高44.8、口径76.5厘米，比前器更大。著录于《商周金文录

① 张颌：《万荣出土错金鸟书戈铭文考释》，《文物》1962年第4、5期合刊；商承祚：《“王子攸戈”考及其它》，《学术研究》1962年第3期。

② 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第122—131页。





图 4-10 吴季子  
之子逞之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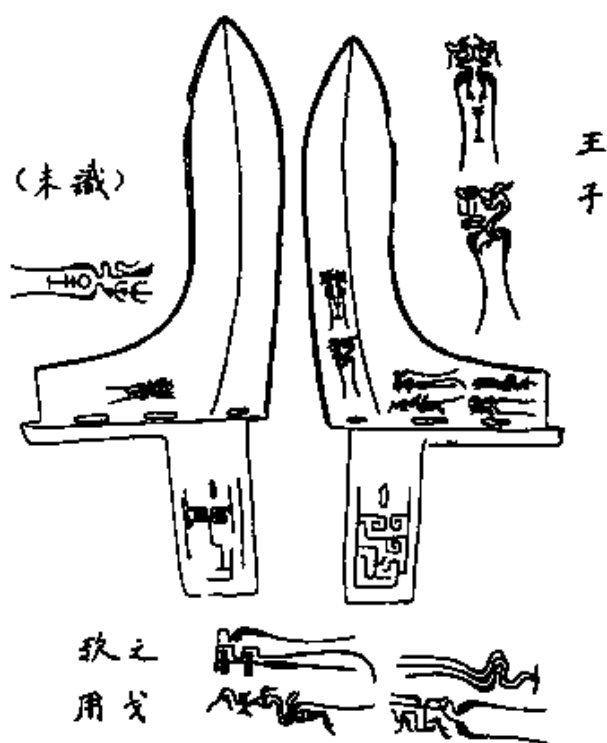


图 4-11 王子欽戈

遗》521。腹内铭 2 行 12 字：“吴王夫差择其吉金自作御监。”

吴王夫差鑑之三，上海博物馆藏。著录于《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第 74 页。高 45 厘米，口径 73 厘米，重 54 千克。铭 2 行 13 字：“攻吴王夫差择其吉金自作御监。”

吴王夫差鑑之四，上海博物馆藏。著录于《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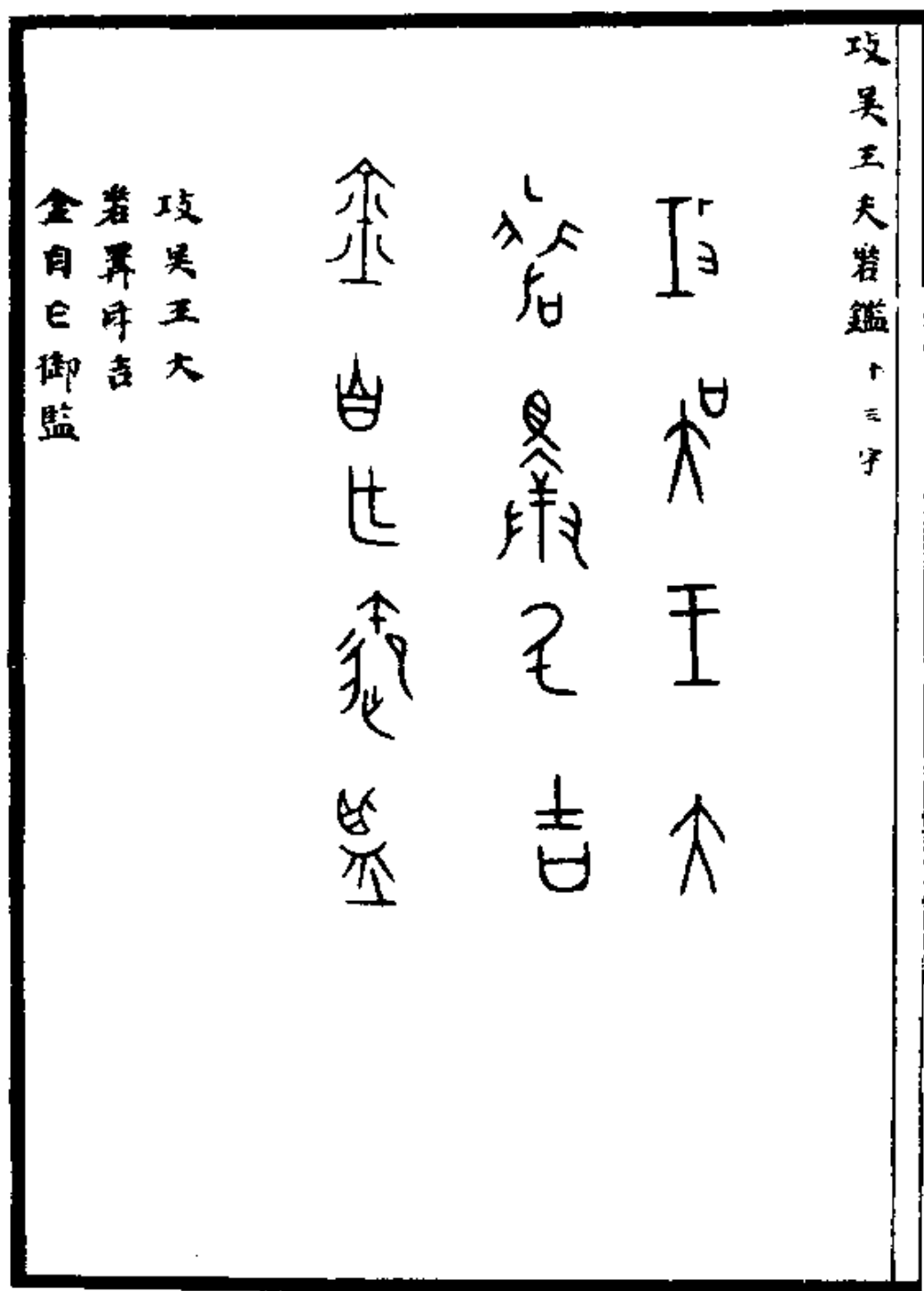


图 4-12 吴王夫差鑑之一

75 页。高 44.9、口径 75 厘米，重 63 千克。铭文漫漶不清；唯夫差二字可辨。

吴王夫差鑑之五，此系残片，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铭文与其一相

同。

以上 5 件，三件国名称“攻吴”，一件称“吴”。第四件国名未详。

### (二十二) 禺邗王壶(2 件)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河南辉县出土。英国喀尔兄弟收藏。铭 19 字：“禺(吴)邗王于黄池，为(因)赵孟介(予)邗王之惕(敬)金，以为(作)祠(祀)器。”(图 4-13)禺吴古通。公元前 482 年秋，夫差在黄池会盟诸侯。“吴晋争先”激烈，晋人赵鞅斡旋吴晋关系，铭辞中赵孟即此赵鞅。字体修长，线条柔和，完全是南方书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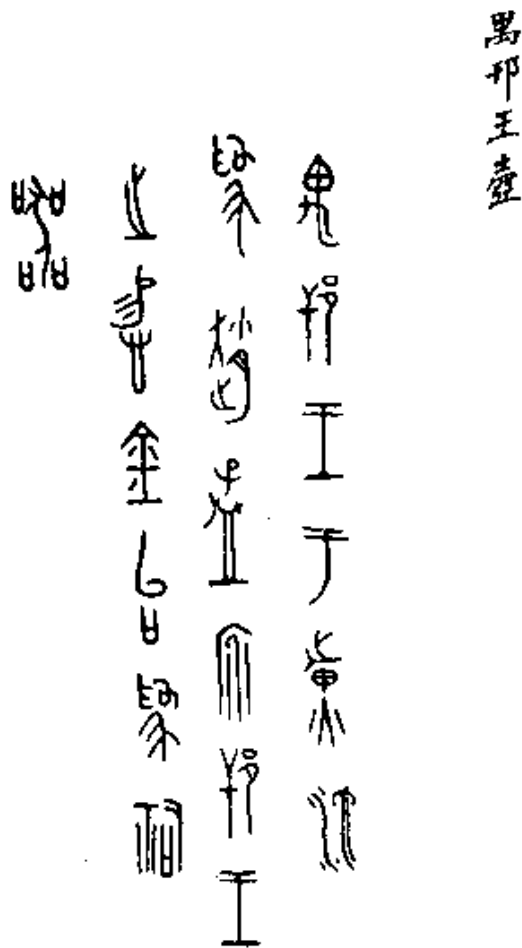


图 4-13 禺邗王壶

### (二十三) 敌王夫差盃

上海博物馆藏。香港何鸿章捐赠。盃高 27.8 厘米，口径 11.7 厘

米,腹径24.9厘米。肩上近口处有一周铭文12字:“致(敌)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sup>①</sup>“敌”王即吴王,下文“吴”金即“敌”金,犹《禹邗王壶》先称“禹邗”,后称“邗”,都是一器用两种国名。

#### (二十四) 攻敌王夫差戈

1959年安徽淮南蔡侯产墓出土,与《工敝太子姑发剑》、《越王者旨於赐戈》同出。安徽省博物馆藏。铭2行10字:“攻致王夫差自作其用戈。”<sup>②</sup>“攻致”与“夫差”四字经刮削或有意磨去。原因可能是越灭吴后,此戈入越,国名与人名被刮,后又入蔡。

#### (二十五) 吴王夫差矛

1983年湖北江陵出土(图4-14)。湖北省博物馆藏。著录于《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青铜器(下)》46、47。铭8字:“吴王夫差自作甬(用)铓(矛)。”

#### (二十六) 攻敌王夫差剑(10件)

其一,1935年安徽寿县西门内出土。著录于《双剑谿古器物图录》上卷第41页。于省吾旧藏,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其二,1976年河南辉县征集所得,可能出于辉县东南一里许的琉璃阁或辉县西南赵固附近战国墓区<sup>③</sup>。现藏河南辉县百泉文物保管所。

其三,1965年山东平度征集所得。周身满布坚硬绿锈;可能新出于平度附近莱州湾。山东省博物馆藏。著录于王恩田《吴王夫差剑及其辨伪》一文。<sup>④</sup>

① 陈佩芬:《吴王夫差盃》,载《上海博物馆集刊》第7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孙稚雏:《淮南蔡器释文的商榷》,《考古》1965年第9期。

③ 辉县百泉文物保管所崔墨林:《河南辉县发现吴王夫差铜剑》,《文物》1976年第11期。

④ 《吴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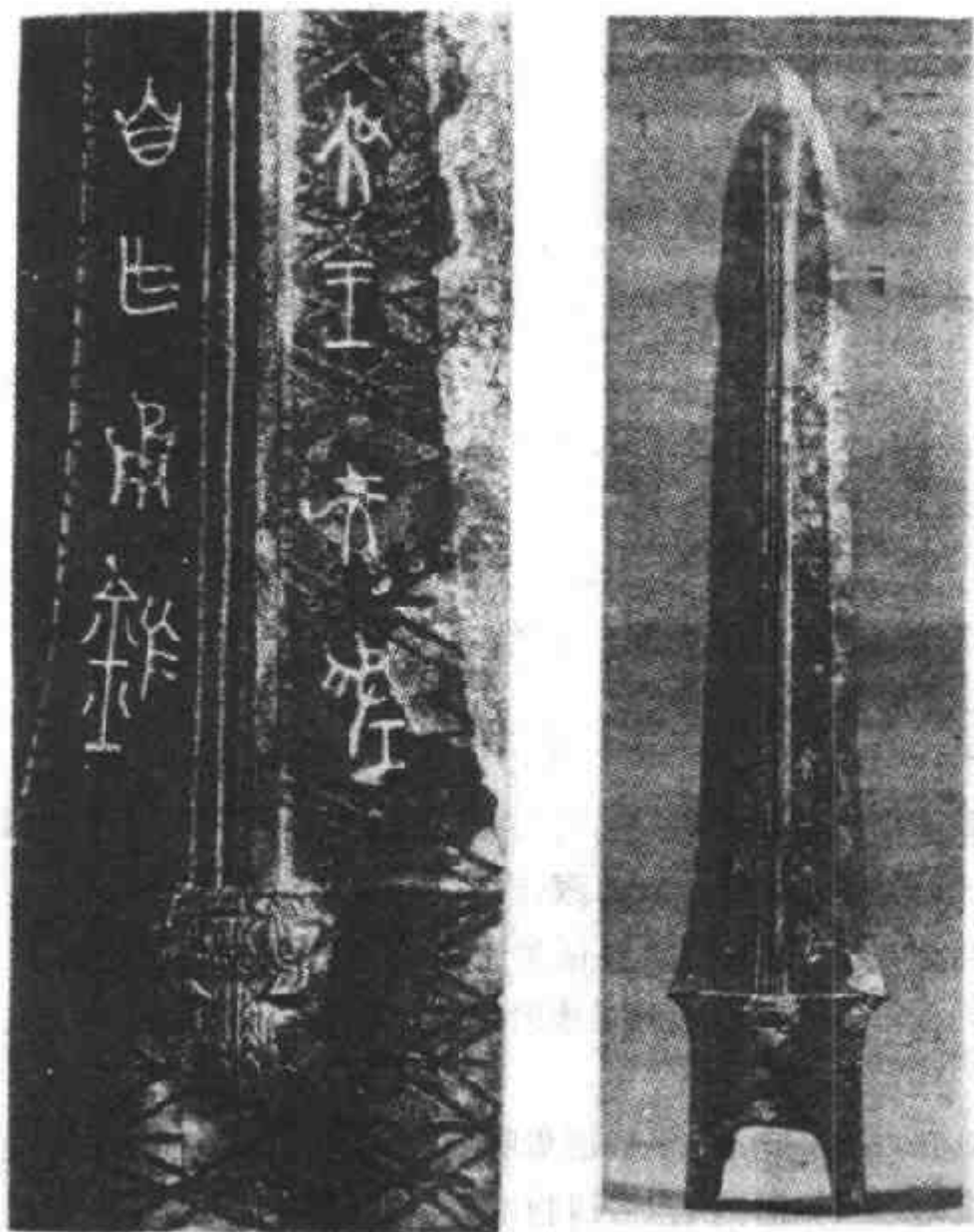


图 4-14 吴王夫差矛

其四,1976年湖北襄阳蔡坡12号楚墓出土。<sup>①</sup>

其五,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过去不见著录,李先登《吴王夫差铜

① 襄阳首届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襄阳蔡坡12号墓出土吴王夫差剑等文物》,《文物》1976年第1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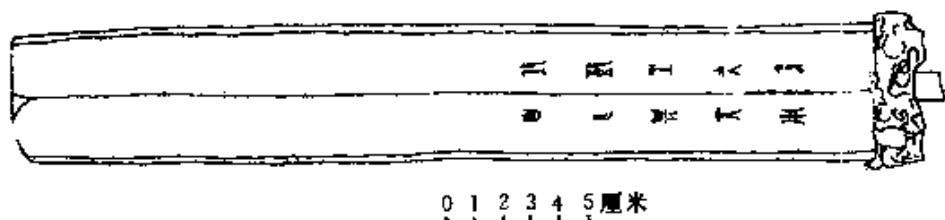


图 4-15 攻敌王夫差剑其五,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器集录》最先介绍<sup>①</sup>。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第 140 页有器形、铭文摹本(图 4-15)。

其六,传世品,最初著录于嘉庆初年的《山左金石记》,称“天水剑”,器主未识。郭沫若、商承祚曾释为诸樊剑。容庚、张振林认出是夫差剑。<sup>②</sup>

其七,刘鹗旧藏,著录于《周金文存》6.95.2。今下落不明。

其八,1991 年洛阳出土<sup>③</sup>。洛阳市博物馆藏。

其九(图 4-16),1991 年山东邹县出土。邹县文物保管所藏。著录于《文物》1993 年第 8 期第 72、73 页。通长 60、宽 5、柄长 9.8 厘米,重 1000 克。

其十(图 4-17),台北王振华“古越阁”藏。著录于李学勤《古越阁所藏青铜兵器选粹》<sup>④</sup>、王振华《商周青铜兵器》80<sup>⑤</sup>。此剑是墓葬新出之物,1991 年始见于香港古董市场,即为古越阁所藏。此剑保存完好,除剑格上的绿松石稍有脱落外,余均无损。且工艺精致,光泽照人,是现有夫差剑中最精美的一件。全长 58.3、身宽 5、格宽 5.5、茎长 9.4 厘米。

① 《东南文化》1990 年第 4 期。

② 此剑辨认过程,详见《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第 141—144 页。

③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 CIM3352 出土吴王夫差剑等文物》,《文物》1992 年第 3 期。

④ 《文物》1993 年第 4 期。

⑤ 台北,1993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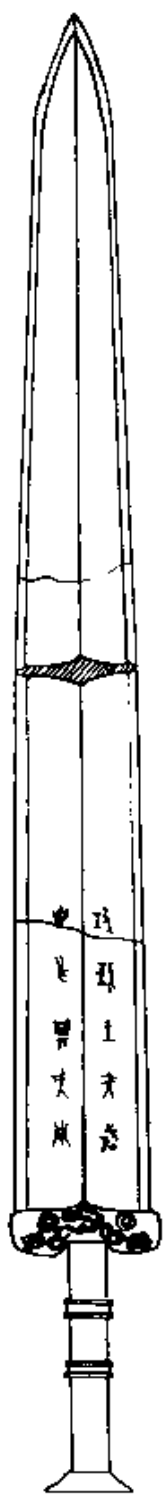


图 4-16 攻敵王  
夫差劍其九，  
山东邹县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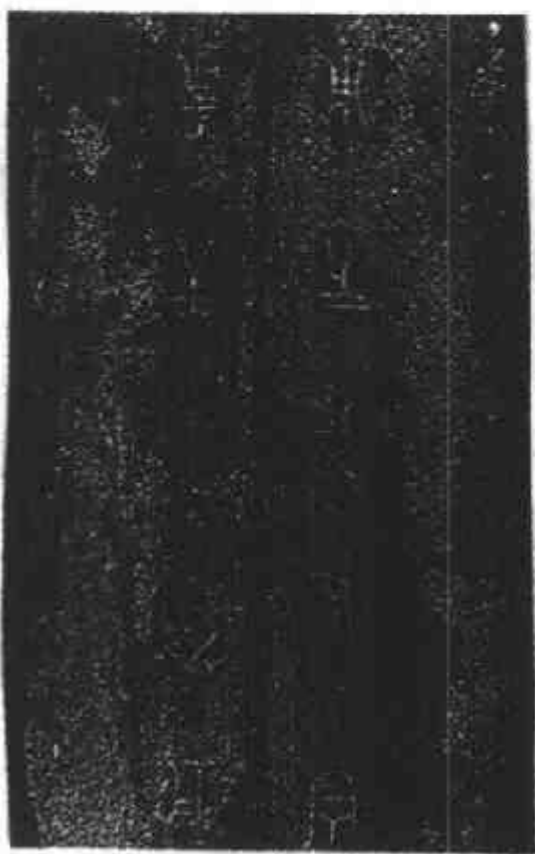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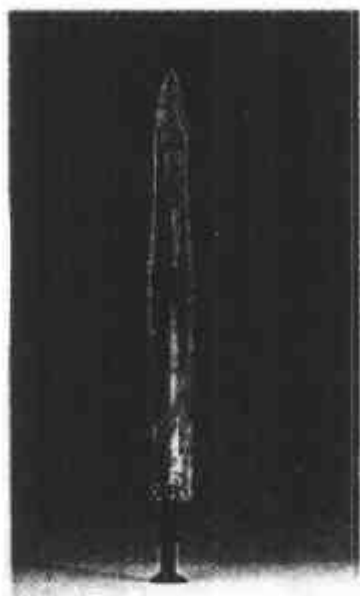


图 4-17 攻敵王夫差劍其十，  
“古越閣”藏

上述 10 件夫差剑，铭文相同，皆 2 行 10 字：

攻敌王夫差

自作其元厯

### (二十七) 攻敌臧孙编钟(9 件)

1964 年 7 月江苏六合程桥春秋末期 1 号墓出土<sup>①</sup>。南京博物院藏。铭文自称“攻敌中(仲)终岁之外孙、坪之子臧孙”。终岁即《左传》之“终纛”，吴王光的太子，上文《配儿钩鐙》之配儿。配儿是本名，终岁是字。坪与臧孙皆无可考。臧孙可能是夫差时人。<sup>②</sup>

### (二十八) 吴王御士簠

1957 年北京海淀出土<sup>③</sup>。今藏北京首都博物馆。此器本是清宫旧



图 4-18 吴王御士簠，  
北京海淀出土

藏，即《西清续鉴》甲编第 13 卷第 1、2 页著录的《周叔绥簠》，由于种种原因，流落到海淀，被埋入地下。铭 2 行 12 字：“吴王御士尹氏叔繁作旅簠。”(图 4-18)御士是君王的侍卫官，尹本为职官之长。铭文称“尹氏”，则是以职称为氏。中原尹氏，仅见于周、郑。周人尹氏，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左传·隐公五年》等；郑出自周，姬姓，也有尹氏，见于《左传·隐公十一年》、《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等。吴为姬姓，虽远在南蛮之地，却也有尹氏，值得注意。叔繁是器主名，人无可考。

①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考古》1965 年第 3 期。

② 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第 81—83 页。

③ 北京市文物组：《海淀区发现春秋时代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第 5 期。



## （二十九）无土脰鼎

1977年出土于陕西凤翔高王寺一处东周铜器窖藏<sup>①</sup>。现藏陕西凤翔雍城文物管理所。盖与器各有相同铭文8字：“吴王孙无土之脰鼎。”器主无土是吴国王孙，其名不见经传。脰字屡见于寿县楚器铭文，朱德熙、裘锡圭释为厨<sup>②</sup>。形制属春秋与战国之交的楚式鼎，花纹、字体也属楚式。此鼎可能是吴亡国后，某王孙逃往楚国，在楚国制造。

## 第二节 从吴国金文看吴国的历史文化

### 一、从吴国具铭铜器的器类、装饰看吴国的文化特点

吴国具铭铜器共81件，其中，礼乐器49件，兵器32件。礼乐器虽多于兵器，但兵器比例之高仅次于越国。一般诸侯国的铜器刻铭都以礼乐器为大宗，兵器很少刻铭。与吴越文化关系最为密切的徐国，已知具铭铜器25件，礼乐器占22件，兵器仅3件。这符合多数诸侯国的器类比例。

吴国具铭兵器不但比例特高，而且制作精良，讲究艺术性。吴国所有具铭铜器中，铭文属鸟篆体者9件，这9件都是兵器；错金者4件，这4件也都是兵器。具铭礼乐器49件，没有一件鸟篆，也没有一件错金。能够代表吴国青铜铸造水平的，不是某件礼乐器，而是《王子玦戈》、《吴王夫差矛》，以及“古越阁”所藏的夫差剑。

在商周青铜礼器中，鼎是主要器类，具有“明尊卑、别上下”的等

① 韩伟、曾明檀：《陕西凤翔高王寺战国铜器窖藏》，《文物》1981年第1期。

② 朱德熙、裘锡圭：《战国文字研究六种》，《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吴国具铭铜器器类、装饰统计表

器类	总数	兵器					礼乐器										
		剑	戈	矛	戟	合计	钟	镈	钩鐃	壶	簠	簋	盘	鼎	匜	盃	合计
	81	18	11	2	1	32	32	7	2	2	1	1	1	1	1	1	49
鸟篆	9	1 <sup>(1)</sup>	8 <sup>(2)</sup>			9											
错金	4		2 <sup>(3)</sup>	1 <sup>(4)</sup>	1 <sup>(5)</sup>	4											

〔1〕《吴季子之子逞之剑》。

〔2〕《攻敌王光戈》2件、《大王光越戈》3件、《王子狄戈》2件、《玄蓼之用戈》1件。

〔3〕《王子狄戈》2件。

〔4〕《吴王夫差矛》。

〔5〕《攻敌工叙戟》。

级标志作用。在具铭铜器中，鼎是大宗，例如徐国已知具铭礼乐器 22 件，其中鼎占 7 件，居首位。但在吴国礼乐器中，鼎的比例特低，到目前为止，只知道一件《无土脰鼎》，铭 8 字：“吴王孙无土之脰鼎。”脰字常见于楚器，窃疑这位“吴王孙”可能是越灭吴后侨居楚国时铸造此鼎。现已发掘的吴国王陵与贵族墓葬，随葬的青铜礼器缺乏中原那样等级森严的组合规范，鼎出得很少。现有吴国具铭铜器几乎无鼎，与考古发掘的结果正相符合。

吴国铭鸟篆文铜器仅 9 件，都集中于阖闾时期，字体同于宋国，“可能是宋国影响的产物”<sup>①</sup>。夫差在位 23 年，现存具铭铜器 20 件，2 件《王子狄戈》作于阖闾时代，是鸟篆书的杰出代表，其他 18 件作于称王以后，无一鸟篆。夫差是怀着对越人杀父之仇登上王位的，登位

① 董楚平：《金文鸟篆书新考》，《故宫学术季刊》第 12 卷第 1 期。

后突然中止鸟篆,可能与仇越有关,“也可能与吴国没有鸟篆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基础有关”<sup>①</sup>。看来,吴、越两国文化存在着大同中的小异。

## 二、吴国的国名

上节所录吴器 81 件,有国名者 72 件,国名共有以下 9 种:

1. 宜(1 件):《宜侯矢簋》。
2. 工敝(11 件):《者减钟》(10 件)、《工敝太子姑发剑》。
3. 邗(3 件):《邗王是野戈》、《禺邗王壶》(2 件,又称“禺邗”)。
4. 工虞(4 件):《工虞王剑》、《工虞季生匝》、《工虞季子剑》、《工虞大叔盘》。
5. 攻敌(27 件):《攻敌工叙戟》、《攻敌王光剑》(3 件)、《攻敌王光韩剑》、《攻敌王光戈》(2 件)、《攻敌王夫差剑》(10 件)、《攻敌王夫差戈》、《攻敌臧孙编钟》(9 件)。
6. 吴(22 件):《吴季子之子逞之剑》、《吴王光钟》(13 件)、《吴王光鑑》(2 件)、《配儿钩鐘》(2 件)、《吴王夫差鑑》、《吴王夫差矛》、《无土脰鼎》、《吴王御士簠》、《敌王夫差盃》(又称“敌”)。
7. 攻吴(3 件):《攻吴王夫差鑑》(3 件)。
8. 禺邗(2 件):《禺邗王壶》(2 件,又称“邗”)。
9. 敌(1 件):《敌王夫差盃》(又称“吴”)。

这 9 种国名,“宜”是西周初期周人所称,是“虞”的谐音,属华夏语。工敝、工虞、攻敌、攻吴,是春秋时期吴国统治者越化以后的国名,都是古越语的记音符号,具有多音节的“胶着语”特点。由于是古越语的记音符号,故不能以华夏语的语义进行解释,如“攻吴”,倘用华夏

<sup>①</sup> 董楚平:《金文鸟篆书新考》,《故宫学术季刊》第 12 卷第 1 期。

语的语义解释,岂非要进攻吴国,自取灭亡?

国名用“吴”,始见于阖闾时代。阖闾、夫差时代,吴国统治者已高度华夏化,国名取华夏语的“吴”,似有恢复周裔历史原貌之用意。但因阖闾、夫差时代,吴国上下仍多越俗,故仍混用“攻敌”、“攻吴”等越语国名。

宜、吴、敌是华夏语国名,工𩇛、工廬、攻敌、攻吴,是越语国名。两者皆源于北虞之虞,谐其音而已,别无他义,不必深究。有些学者说吴本称工𩇛、工廬,字从鱼,因江南水乡多鱼之故。还有其他望文生义的解释,都失之穿凿。吴国国名由“宜”始,以“吴”终,从一个侧面反映吴国统治者本是中原血统,到江南后,经数百年的土著化(越化)以后,到春秋晚期卷入华夏化的时代潮流之中。最后仍混用“攻敌”、“攻吴”的多音节越语国名,则说明吴国统治者的越化程度太深,最后仍未完全华夏化。

“邗”,文献或作“干”,本是吴之邻国。吴灭邗后,袭其国号,或单称“干”,或复称“吴干”。《禹(吴)邗王壶》先称“禹邗”,后称“邗”,犹《敌王夫差盃》先称“敌”,后称“吴”,不足怪。邗与禹邗都是华夏语国名。

综上所述,有国名的72件吴器中,华夏语国名28件,古越语国名44件,古越语国名几占三分之二。吴国王室虽为周裔,但因入境随俗,越化时间既长,越化的程度也深,故其铜器国名仍以越语为多。

以上说的是吴人自称的国名。那么别国人对吴国又是如何称呼呢?

他国金文中的吴国国名,唯《宋公盨簠》称“句致(敌)”,其他如《蔡侯盘》、《蔡侯尊》、《中山王鼎》等,皆称“吴”。

典籍中的吴国国名,唯《史记·吴太伯世家》称“句吴”一次,余皆称“吴”。

“句敌”与“句吴”都是中原人对吴国越语国名“工虞”、“攻敌”的译音。

以上9种国名,有8种源于“虞”,“禹邗”的“禹”也源于“虞”,只有“邗”与“虞”无关。盖南吴从北虞“分彘”出来故也。

### 三、吴国的人名

吴国金文人名与文献人名对照表

金文人名	文献人名
矢(宜侯矢簋)。名	叔达(《史记·吴太伯世家》)。字
皮黻(者减钟)	毕轸(《古史考》) 句卑(《史记·吴太伯世家》)
者减(者减钟)。名	去齐(《史记·吴太伯世家》)。字
是野(邗王是野戈) 名 西野(伯刺戈)。名	乘(《春秋·襄公十二年》)。名 乘诸(《史记·吴太伯世家》索隐)。名 寿梦(《左传·成公七年》、襄公十年、十二年及十九年)。字 祝梦(《史记·吴太伯世家》索隐)。字 孰姑(《史记·吴太伯世家》索隐引《系本》) 梦(《楚辞·天问》)。字
姑发胥反(工敝太子 姑发剑、工虞季子 剑)。号	遏(《春秋》)。名 谒(《公羊传》)。名 诸樊(《左传》)。号 <sup>[1]</sup>

[1] 《史记·吴太伯世家》索隐：“遏是其名，诸樊是其号。”未知确否，录以备考。

(续表)

金文人名	文献人名
工叙(攻敌工叙戟)	余祭(《春秋》及《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史记·吴太伯世家》) 句余(《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戴吴(《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余昧(余昧矛)	夷末(《春秋·昭公十五年》) 夷昧(《公羊传·襄公二十九年》、《左传·昭公十五年》) 夷昧(《史记·刺客列传》) 余昧(《史记·吴太伯世家》) 余末(《史记·刺客列传》索隐)
季子(工虞季子剑) 季生(工虞季生匜)	札(《春秋·襄公二十九年》) 季札(《左传·襄公十四年》、《史记·吴太伯世家》) 延州来季子(《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号 延陵季子、季子(《史记·吴太伯世家》)。号
白刺(伯刺戈)	僚(《春秋》、《左传》、《史记》) 州于(《左传·昭公二十年》)
光(吴王光鑑、钟、剑、戈)。名 赧(大王光赧戈)。号 韩(攻敌王光韩剑)。号	光(《春秋》、《史记·吴太伯世家》即位前称光)。名 闾庐(《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史记·吴太伯世家》即位后称闾庐)。字 闾闾(《淮南子·泰族训》、《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吴越春秋》卷二)。字 闾(《天问》，与寿梦合称闾梦)
狄(王子狄戈)。名 夫差(吴王夫差鑑、盃、戈、矛、剑)。字	夫差(《左传》、《国语》、《史记》等) 差(《楚辞·九思》)
配儿(配儿钩鑑)。名 终岁(攻敌臧孙钟)。字	终景(《左传》)。字 波(《吴越春秋》)。名

周礼规定,贵族生即取名,成年取字。字,读作孳,它是由名孳生出来的,语义与名相关,或同义,或反义。吴国王室是周人后裔,南下后随从越俗,断发文身。吴国贵族是否有字,是个未解之谜。《左传》杜预注等,仅说吴人有号,未说有字。例如:《左传·襄公十二年》“吴子寿梦卒”,杜注:“寿梦,吴子之号。”《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孔疏:“吴子遏,号诸樊。”《左传·定公五年》:“夫槩王归,自立也,以与王战。”杜注:“自立为吴王,号夫槩。”吴人可能有号,但未必无字。字与号的区别在于,字的语义必与名有关,号则不必。诸樊,金文作“姑发晋反”,“诸樊”是中原人的记音。根据越语人名规律,前一、二字是发声,无义,后一、二字才是主词所在。晋,金文首见,文献所无,其义难以确诂,以文理推测,当与“反”字同义。遏,阻止也,与“反”同义。是知“遏”与“姑发晋反”有语义相配关系,应该是一名一字。

再如《春秋·襄公十二年》“吴子乘卒”,《左传》作“吴子寿梦卒”,杜注:“寿梦,吴子之号。”孔疏:“乘、寿梦,名、字之异。”孔疏可信。因为《春秋》多书名,不书字。罗常培《关于〈吴王寿梦之戈〉音理上的一点补充》,根据近代音韵学对周秦古音的拟读,认为“是野”与“乘诸”的拟音最为接近,乘当是乘诸之省文,乘诸是“是野”的对音。因此,是野、乘诸、乘是名,寿梦可能是字或号。

《春秋》多书人物本名,不书字与号,鲁定公十四年载“吴子光卒”,而“阖庐”却不见于《春秋》。可知光为本名,阖庐是字。阖庐,张家山与银雀山竹简均作盖庐,都是黄昏天暗之时关闭家门的意思。《吴越春秋》作阖闾,是黄昏时关闭里门的意思。阖庐与阖闾,皆与“光”反义。现有吴光铜器,皆称“光”,无一件称阖庐或阖闾。《大王光越戈》多一“越”字,《攻敌王光韩剑》多一韩字,安徽庐江出土的《攻敌王光剑》自称“越余”,第一人称代词“余”置于人名“越”之后。韩、越古

音相近,可能是吴光即位后自取的别号。<sup>①</sup>

吴王光有名,有字,甚至可能还有别号,当非孤立现象。吴光有弟称“夫槩”。《左传·定公五年》:“夫槩王归,自立也。”杜注:“自立为吴王,号夫槩。”所谓“号夫槩”,可能是字夫槩。因为吴越人有取字称“夫某”的习惯。《史记·邹阳列传》:“故吴人庄忌夫子。”《索隐》:“忌,会稽人,姓庄氏,字夫子。”子,读作慈,与忌反义。“夫差”也是字,不是名与号。

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吴王光有个儿子叫“子山”。春秋时期,取字常称“子某”。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绝大多数称“子某”。《左传·成公十五年》,宋人荡泽,字也称“子山”。吴光之子“子山”,当也是字,不是名,名无可考。

据《左传·定公六年》记载,吴王光有“太子终纍”。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吴王光的大子称“波”。1977年绍兴出土《配儿钩鐙》二件,据沙孟海研究,器主配儿,即太子波,配波双声,儿字是尾声<sup>②</sup>。据董楚平研究,终纍是配儿的字。甲骨文、金文终字皆作两物相配之状;《说文》:“纍,綴得理也。”“终纍”有配合得当的意思,与本名“配”同义。<sup>③</sup>

吴王光自己有字,其弟“夫槩”是字或号,太子配儿字“终纍”,还有一个儿子字“子山”。那么,夫差也是吴王光之子,当然也有字。据董楚平研究,“夫差”即为字,本名是“玖”。玖即吁字,差读作嗟,与玖同义。著名的《王子玖戈》原定为王僚之器<sup>④</sup>,失之。董楚平从工艺水平、字体特点、人名声韵、名字礼俗四个方面论证其为夫差即位以前

① 《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第112页。

② 沙孟海:《配儿钩鐙考释》,《考古》1983年第4期。

③ 《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第66页。

④ 张颌:《万荣出土错金鸟书戈铭文考释》,《文物》1962年第4、5期合刊;商承祚:《“王子玖戈”考及其它》,《学术研究》1962年第3期。



所作<sup>①</sup>。夫差即位以后的铜器,都称“夫差”,即都用字,不用名。

其他如“矢”与“叔达”、“者减”与“去齐”等,明显有语义相配关系,应该是一名一字。

#### 四、从吴国具铭铜器出土地点谈吴国的一些历史问题

在已知的 81 件吴国具铭铜器中,出土地点明确者 64 件。

吴国具铭铜器出土统计

安徽 21 件					江苏 14 件			
寿县	淮南	霍山	庐江	南陵	六合	丹徒	江宁	盱眙
16	2	1	1	1	10	2	1	1
江西 10 件		山西 5 件			河南 6 件			
清江	万荣	代州	原平	榆社	辉县	洛阳	新郑	
10	2	1	1	1	4	1	1	
浙江 2 件		湖北 2 件		山东 3 件		陕西 1 件	合计	
绍兴	江陵	襄阳	沂水	平度	邹县	凤翔	64	
2	1	1	1	1	1	1		

在现有吴器中,出土地点意义最为重大、因出土地点而引起的争论最为激烈者,莫如《宜侯矢簠》。《宜侯矢簠》1954 年出土于江苏丹徒烟墩山。烟墩山属丹徒大港镇。东从大港镇、西至谏壁镇的沿江低山丘陵,自东向西年代从西周前期到春秋晚期依次分布着很多大型

<sup>①</sup> 《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第 124—131 页。

土墩墓,这一带是吴国贵族墓地,有学者称之为“吴国王陵区”<sup>①</sup>。出土《宜侯矢簋》的土墩墓处于这个“王陵区”的尽东头。宜侯矢原为虞侯,西周康王时迁封于宜,改称“宜侯矢”。宜的地望是争论的焦点。唐兰说宜“可能就在丹徒或其附近地区”,“虞侯矢应该就是周章”<sup>②</sup>。此说一出,附者甚夥。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宜在中原或别处,宜侯矢簋是后来流传到丹徒的。例如黄盛璋认为宜即后来的宜阳,在王畿之内,宜侯矢簋在丹徒出土,系后人带去,与吴国无关<sup>③</sup>。主张宜在丹徒的学者看法又有差别。唐兰、李学勤等多数学者认为本铭虞字即南方之吴,迁封于宜,是在吴国境内迁徙,“移动未必很远”<sup>④</sup>。董楚平认为,本铭之“虞”,是北方虞国。虽然虞吴字通,但作为国名,北虞常可称吴,南吴却从不称虞,西周东周皆然。原因是北虞早于南吴。在未有南吴之时,北虞称吴不会引起混乱。在虞可称吴既成习惯以后,南方之吴虽已名满天下,这习惯还是沿袭难改。相反的,出现南吴时,已有北方之虞,为了不致混乱,吴不便称虞,因此,南吴始终不称虞。《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北虞从南吴分封出去,事实则是南吴从北虞分封出来。在古代,新封地的地名往往是原封地地名的谐音字、通假字。宋为商之声转,卫之名由于豕韦。宜古歌部,虞与吴皆隶鱼部,歌鱼古可通转;宜与虞、吴又都属疑纽字。宜是吴的初名,地在丹徒或其附近。宜侯矢簋的铜质、形制、纹饰,皆属中原铜器。它在丹徒吴国王陵区的西周初期大型土墩墓出土,揭示了南吴从北虞分封出来的历史原貌,纠正了《史记》一大错误。<sup>⑤</sup>

① 萧梦龙:《吴国王陵区初探》,《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

② 唐兰:《宜侯矢斝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

③ 黄盛璋:《铜器铭文宜、虞、矢的地望及其与吴国的关系》,《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④ 李学勤:《宜侯矢簋与吴国》,《文物》1985年第7期。

⑤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第145—151页;《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第19—23页。

具铭吴器出土最多的是安徽两座蔡侯墓，一是寿县的蔡昭侯墓，二是淮南市蔡家岗的蔡声侯墓。

1955年5月，在寿县西门内进行治淮工程、挖沟取土时发现一座较完整的蔡昭侯墓，出土铜器将近500件，很多铜器有铭文。其中，吴器有吴王光鑑2件，吴王光钟残片四五十块，估计原钟有13件。蔡器中铭辞提到吴国者，有蔡侯盘、蔡侯尊一、蔡侯尊二、蔡侯作大孟姬盥缶。寿县一带，春秋时称州来。蔡昭侯二十六年（前493年）为避楚就吴而从新蔡迁到州来，州来因此称“下蔡”，迄蔡之亡仅46年。公元前506年，即吴王光九年，蔡昭侯十三年、楚昭王十年，吴蔡联军攻破郢都。吴蔡联军入郢时间，《春秋》所记是“冬十有一月庚辰”，即十一月二十九日。据《左传·定公五年》记载，到次年夏，“越入吴”时，吴还“在楚”。到九月下旬，秦师大败吴师，“吴子乃归”，“楚子入于郢”。吴蔡联军在郢共十一个多月。吴王光在此期间与蔡昭侯联姻，将自己的女儿叔姬寺吁嫁给蔡昭侯。吴王光钟与吴王光鑑都是嫁女媵器。这些铜器于昭侯十四年入蔡，到昭侯二十六年带到州来，两年后入葬。

蔡昭侯墓出土的蔡侯盘、蔡侯尊一、蔡侯尊二、蔡侯作大孟姬盥缶，是蔡昭侯嫁大姊“大孟姬”于吴王僚的媵器。这四件蔡器当是吴光杀王僚后，“大孟姬”因夫死而带媵器奔归母国，而葬于蔡墓。

安徽淮南蔡家岗有两个孤堆，皆名赵家孤堆。1958年、1959年先后发掘了这两个孤堆。1958年发掘的南孤堆编为一号墓，1959年发掘的北孤堆编为二号墓。二号墓是蔡声侯产之墓。蔡声侯墓这次出土的具铭铜器有蔡侯产剑3件，另有一件戈铭文六七十字，未通释；出土的吴越铜器有工敝太子姑发剑与攻敌王夫差戈各1件、越王者旨於赐戈2件。

蔡声侯墓与蔡昭侯墓相距仅7.5公里，古代皆属州来。蔡声侯墓出土四件吴越兵器，唯攻敌王夫差戈的国名（“攻敌”）、王名（“夫差”）遭刮削。此戈当是勾践灭吴后作为战利品被越人刮削，到者旨於赐时

又作为礼品送给蔡国。至于工馘太子姑发剑可能是吴亡后吴人奔蔡而携入州来。

江苏六合程桥,也是具铭吴器出土较多的地方。这里是春秋晚期吴国贵族墓葬区,1964年、1972年、1988年先后发掘三座贵族墓葬,1号墓与2号墓、3号墓相距仅80米。每次发掘都出有具铭铜器。1964年发掘的1号墓,出土攻敌臧孙编钟9件。1968年发掘的2号墓出土旨赏钟7件,无国名,人名“旨赏”无可考,此器国属待定。1988年发掘的3号墓,出土工馘大叔盘、罗儿盥匜、曾子义行簠各1件。

程桥在六合县城西南10公里,今六合县城北古为棠邑。《左传·襄公十四年》(前559年)“秋,楚子为庸浦之役故,子囊师于棠,以伐吴。”此棠在六合,学者多误为楚地,其实应为吴地。《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前522年)“棠君尚谓其弟员曰”,《路史·国名纪三》谓此棠亦今之六合,后人多从之。沈钦韩《地名补记》谓即棠谿城,据《读史方輿纪要》,在今河南遂平县西北百里。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是其说。谨案,吴文化发源于江苏宁镇地区,原都丹徒一带,吴王阖闾始迁姑苏。六合与宁镇隔江相望,是吴都的门户,不可能曾为楚邑。考古工作者至今未在江北沿江地带发现春秋时期楚文化遗址。楚人伍尚曾任“棠君”(当从《释文》作尹)的棠,应在河南。《左传·襄公十四年》楚人屯“师于棠,以伐吴”,更说明六合之棠确是吴都门户,并非楚地。今发现程桥原为吴国贵族墓葬区,其为吴国心腹之地可知。

## 第五章 越国金文

本章收录越国具铭铜器 72 件，除一件姑冯句鑑、两件其次句鑑外，器主皆为国王和太子。从允常至翳，连续六代皆有具铭铜器流传至今，这为别国所罕见。这连续六代正是越国历史的主要阶段。越国金文对研究越国历史的重要意义也就不言而喻。

两千多年来，人们都说越国“自号於越”，而现有越国铜器铭文，国名皆只铭一个“戊”字，在这铁证面前，两千年的结论只好改写。

在 72 件越国具铭铜器中，兵器有 50 件，占 70%，这在各国铜器中是绝无仅有的奇观。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越王勾践剑、浙江省博物馆新入藏的越王者旨於赐剑，制作精美，保存完好，是中国古代兵器之双绝。

鸟篆书是先秦最优美的艺术书体，现有国属可考的金文鸟篆书共 103 件，越国竟有 56 件，占 54%，这又是绝无仅有的文化奇观。

72 件越国具铭器，构成一座珍贵的资料库，这座资料库保存的不是一般资料，而是铁证。

## 第一节 越国金文集录

### (一) 越王之子勾践剑(2件)

有阴文与阳文各1件,阴文的1件藏美国哈佛福榕美术馆,阳文的1件著录于《金匱论古初集》第36页、《商周金文录遗》593。旧读此铭为“越王勾践之子”,近年,张振林对照其他越剑剑格铭文排列规律,改读为“越王之子勾践”。《吴越徐舒金文集释》从字体上证成其说<sup>①</sup>。此剑作于允常称王、勾践为太子之时,是已知的最早越器。剑格铭8字:正面“戊王、王戊”;背面“之子九菱”(图5-1)。五个字有鸟形。两个戊字左肩饰一鸟首;两个王字顶上饰两鸟首。这六个鸟首皆为小鸟张口形,这是越国鸟篆文最常见的鸟形。“九”字右旁饰一全身鸟形。九、菱之下皆饰一口字,口作冂,是越国鸟篆文常用装饰。八个字皆用单线勾画,无肥瘦相间、婀娜多姿的宋吴风格,也无以后越国鸟篆文的繁缛作风,具有早期简朴的特点。



图 5-1 越王之子勾践剑

### (二) 越王剑

1972年在杭州征集所得。浙江省博物馆藏。著录《浙江文物》37、《吴越文化新探》第350页、《古文字研究》第17辑第108、109页。锈蚀严重,残长32厘米。剑身细长,无格。一面纵部有简笔铭文“戊

<sup>①</sup> 《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第201页。

王”2字,王上有鸟形,腊部饰有六组鸟翼形纹饰。具有早期越式剑风格。此“戊王”可能是允常。

### (三) 越王矛

长沙出上。湖南省博物馆藏。著录于《楚文物展览图录》第42页,图78,称“奇字矛”。中脊两侧饰三组鸟翼纹,鸟翼纹下各铭一“戊”字,中脊下铭一王字,王字顶上饰一对简化鸟首。此矛字体、纹饰,皆同于前器。

### (四) 越王勾践剑

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sup>①</sup>。铭2行8字:

“越王九菱自作用剑”(图5-2)。此剑工艺极精,保存完好,是古兵器中的极品至宝。



图5-2 越王勾践剑

### (五) 之(子)利钟

最初著录于宋人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一,称“商钟四”。共64字,字体鸟篆,一直无人通释。1983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古文字学论集》初编发表曾宪通《吴王钟铭考释——薛氏〈款识〉商钟四新解》,第一次通释全铭,解为吴王僚铭功重器。

1992年出版的《吴越徐舒金文集释》吸收曾文不少精义,改释为越王勾践的铭功重器。释文如下:

佳王正甬(仲)春吉日,子

<sup>①</sup> 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

型呼叫，之利集桓众。  
 夏，王敬厚帅，择吉金，  
 用作稣罍，以乐宾客，  
 哱劳父。诸侯往庆。余(徐)  
 之客酌子利：“万年之  
 后，世代自宁，四裔同  
 安。”之利曰：“孙久谗讽。”

铭辞三次出现“之(子)利”，疑是勾践的字。勾践，剑铭作“九菱”。九句古通，越语发声，主词是菱。菱字从戈，利字从刀，皆从兵，义相因。“九菱”与“子利”似有名与字语义相配关系。在文献中，越君有称“之某”、“子某”之例，如《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之侯”、《越绝书》“子翁”。之侯、子翁应为字，不是名。之、子字通。

子型，疑是越大夫文种的字。余(徐)之客，是客居越国的徐人领袖。吴灭徐后，徐人流寓越国各地。吴是徐、越共同敌人，在越灭吴过程中，徐人可能起过作用，故得参加庆功盛会。亡国徐人，已非诸侯，故在“诸侯”之外，另列徐客，客字更切合当时在越徐人的身份。

#### (六) 之利残片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最初著录于《文物》1961年第10期唐兰《记错金书鸟篆青铜器残片铭》。此残片可能是鼎盖的一部分，残长16厘米，宽5.3厘米。铭文错金，多次出现“之利”连文。残存50字，有鸟形者至少8字，鸟形皆为张口小鸟，这是越国鸟篆书的一个标志。

#### (七) 能原铸(2件)

传世品，有2件，姑称为甲乙二器。甲器著录于《奇觚室吉金文述》9.19—21，称“酈原钟”<sup>①</sup>，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江西瑞州东郭

① 此器钲部首二字应隶定为“估能”。估能即姑冯，此二器似应更名为“估能铸”。详见拙文《金文鸟篆书新考》，载《故宫学术季刊》第12卷第1期，1994年10月。



外锦江中为渔人发现,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存48字。乙器著录于《奇觚室吉金文述》9.22—25,称“陆氏钟”,出土于江西临江,今藏台北的博物馆中。存60字。甲乙二器字体皆鸟篆,一些文字在《之利残片》、《越王盲姑剑》中重见。残泐模糊,尚难通读。可辨认者,二器皆有“邾”、“邾”二国名,各有“利”字两个。铭辞可能记载越邾关系。四个利字可能是“之(子)利”之省。东周人名字,之、子可省。如介之推,或作介子推,可省称为“介推”、“推”。邾在山东,越曾迁都邾邾。据《左传·哀公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二十七年》记载,邾是越的附庸,本国的君主废立,与邻国的土地纠纷,都要听命于越。

#### (八) 姑冯句鑑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江苏常熟出土。最初著录于《捃古录金文》3·1·13。正反面共有铭文8行39字:“佳王正月初吉丁亥,姑冯昏同之子择其吉金,自作商句鑑,以乐宾客及我父兄,子子孙孙永保用之。”姑冯昏同即《越绝书》所记勾践时期的越国大夫冯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之逢同,《左传》与《国语》之舌庸。《左传·哀公二十七年》,“越子使舌庸来聘,且言邾田,封于骀上。”勾践派舌庸(姑冯)到鲁国,为邾鲁划定国界。上列《之利残片》与《能原罇》,可能都写到此事<sup>①</sup>。句鑑是吴越特有的乐器,来源于商人之饶,故称商句鑑。

#### (九) 其次句鑑(2件)

道光初年出土于浙江武康(今属德清)山中,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铭31字。器主“其次”,人无可考。

#### (十) 越王者旨於賜钟

最早著录于北宋《宣和博古图录》22·17。铭52字,错金,字体鸟篆:“佳正月仲春吉日丁亥,越王者旨於賜择其吉金,自作和钟;我以乐

<sup>①</sup> 参见《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第349—355页;《金文鸟篆书新考》,《故宫学术季刊》第12卷第1期,第41、4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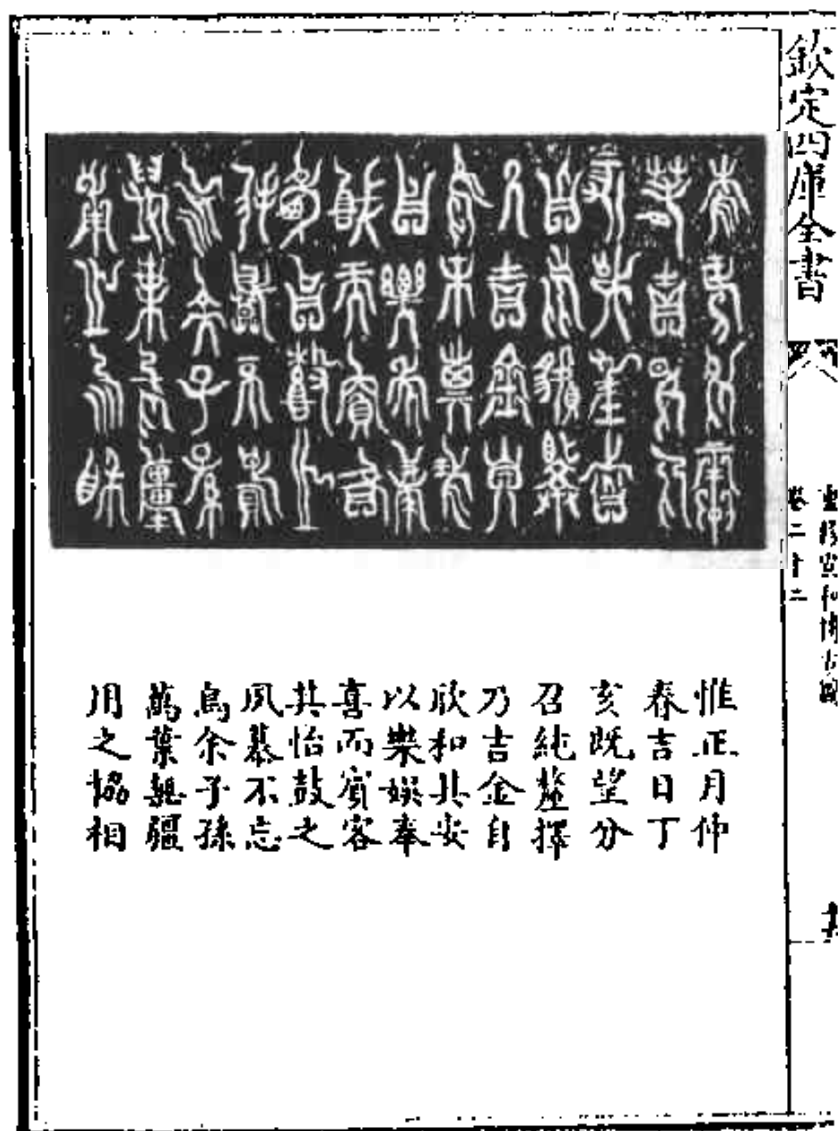


图 5-3 越王者旨於賜钟

考帝，喜尔宾客。陈以鼓之，夙暮不忒。顺余子孙，万世无疆，用之勿丧。”（图5-3）者旨於賜，是勾踐之子，《史记》称“颺与”，《左传》称“適郢”，公元前464年至前459年在位，历六年。《左传·哀公二十四年》记载：“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将妻公而多与之地。”鲁哀公二十四年是公元前471年，哀公所到之越，当是山东琅琊，越太子者旨於賜接见他。当时，者旨於賜已有女儿长大成年，可以出嫁。七年后登王位，年已老，六年即卒。勾踐晚年，者旨於賜当已董理国事，可能主政琅琊。

（十一）越王者旨於賜剑（9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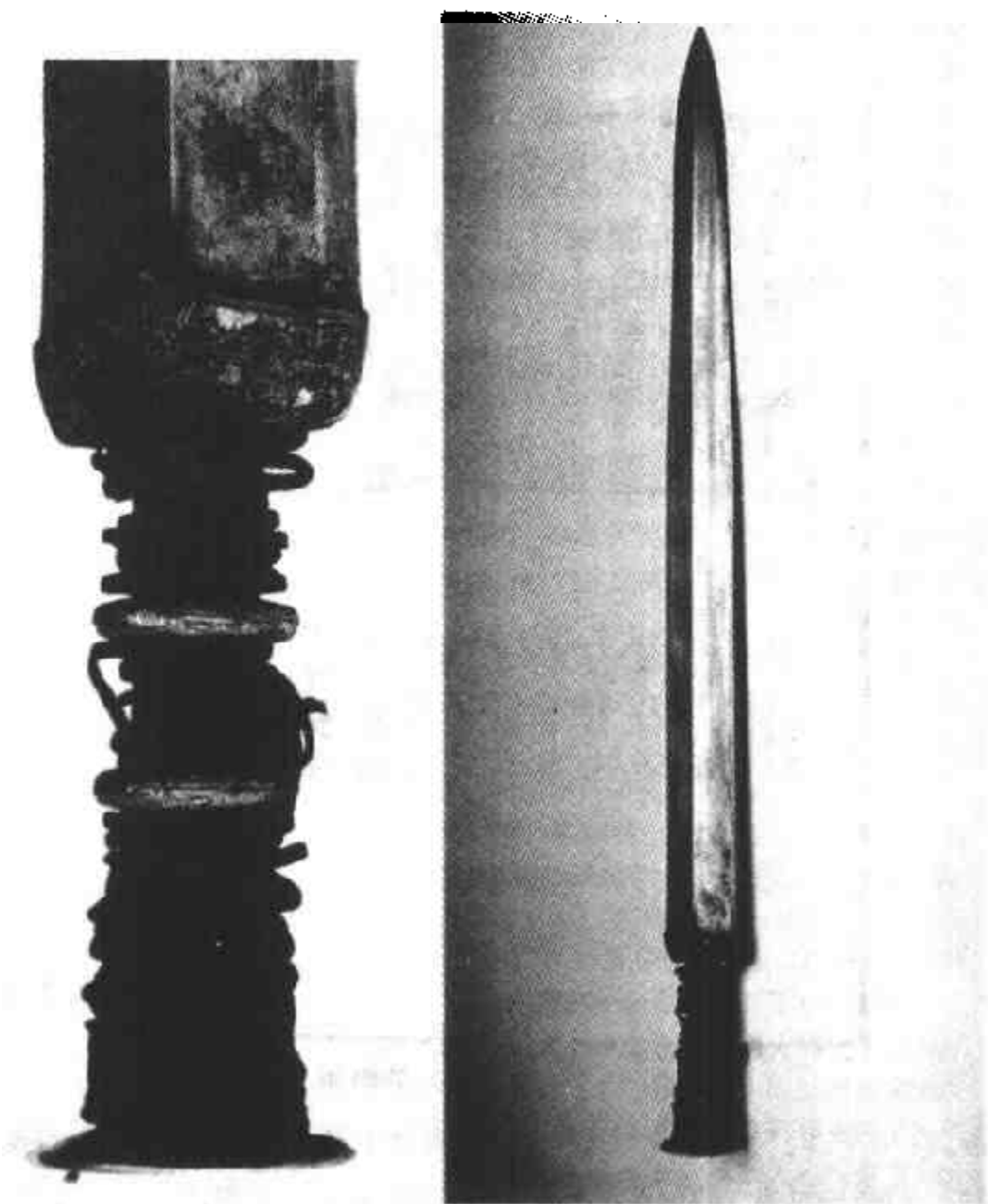


图 5-4 越王者旨於賜劍其，浙江省博物館藏

其一(图 5-4),此劍近年在祖國內地出土,流入香港,1995 年秋,因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撮合,携返內地,由杭州鋼鐵廠出資買下,捐贈給浙江省博物館收藏。劍身長 52.4 厘米,最寬處 4.1 厘米。通體毫無銹蝕,寒光逼人,外有完好的黑漆劍鞘。劍緜基本完整,劍格上鑲嵌的綠松石也無脫落。劍格銘鳥篆書 8 字:一面為“戊王、戊王”,

另一面为“者旨於賜”。1995年10月26日,马承源的鉴定意见如下:“越王者旨於賜劍……铭文铸于剑格两面,字为双格,范铸极精。双钩内填红色,空地处镶嵌绿松石。字划完整,未有任何损坏,剑茎上有半圆之木片填地,其上缠有丝编织之纒,虽有局部腐朽,然大体可见其制度。传世越王剑中缠纒者,仅此一柄。茎有箍二周;其上纹饰极其精工,延伸两边,此盖陶范不能为,知其为失蜡法所铸。剑体宽阔,前端稍收,乃越剑之常制。尤其珍贵者,剑体未有绿锈腐蚀,大部光亮如新,青铜质地未有任何改变,……距今二千四百余年左右之剑,仍然光亮湛然,在已发现千柄古剑中,难能有一柄与之相匹,此乃剑中之极品,稀世之珍宝。……本剑的金属质地之完好,已超过湖北发现的越王勾践剑,……此剑附有剑鞘,表面光洁如新,且有平行之密棱,是越国王室髹漆工艺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整体来看,质地崭新,有纒、有鞘,此其胜于越王勾践剑者。因而,此者旨於賜剑与越王勾践剑,可并列为越剑之双绝,而为国家之重宝。”

其二(图5-5),寿县出土。最初著录于容庚《鸟书三考》4<sup>①</sup>。上海博物馆藏。铭文同其一。



图5-5 越王者旨於賜劍其二,上海博物馆藏

其三,传出寿县。著录于《商周金文录遗》592。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铭文同其一,但文字模糊。

其四(图5-6),寿县出土。著录于《鸟书三考》5<sup>②</sup>。中国历史博物馆藏。铭文同其一。

①② 《燕京学报》第23期。



图 5-6 越王者旨於賜劍其四,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其五,1986年江陵雨台山官坪村9号楚墓出土。著录于《江汉考古》1989年第3期。江陵博物馆藏。铭文同其一。

其六,现藏台湾高雄。著录于张光裕、曹锦炎主编的《东周鸟篆文字编》85。铭文同其一。

其七,著录于《尊古斋古兵精拓》199。铭文同其一。

其八,著录于《尊古斋古兵精拓》200。铭文同其一。

其九(图5-7),传出浙江。未见著录。台北王振华“古越阁”1996年新藏品。通长53.8厘米,格宽5.5厘米,身宽4.7厘米,茎长9厘米,全剑完好无损。铭文同其一。



图 5-7 越王者旨於賜劍九,台北“古越阁”藏

#### (十二) 越王者旨於賜矛(4件)

其一,日本细川护立收藏。著录于《书道全集》105、《鸟书考补正》10<sup>①</sup>。铭错金鸟篆书2行6字:“越王者旨於賜。”

其二,上海博物馆藏。著录于《商周青铜器铭文选》557。铭鸟篆书2行6字:“於越王賜旨者。”铭文次序错乱,系字模误植所致,应读

① 《燕京学报》第17期。

作“越王者旨於賜。”

其三(图 5-8),1988 年洛阳一座东周墓出土。现藏洛阳。著录于《考古》1989 年第 5 期第 415 页。铭文同其一,错金。



图 5-8 越王者旨於賜矛三，  
洛阳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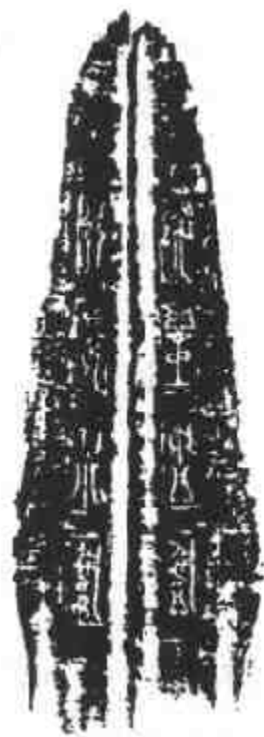


图 5-9 越王者旨矛,香港  
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其四(图 5-9),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著录于《大公报》(香港)1992 年 6 月 12 日。铭 2 行 8 字:“戊王者旨自作用矛。”

### (十三) 越王者旨於賜戈(3 件)

其一、二,1959 年安徽淮南蔡侯产墓出土同铭戈 2 件(图 5-10),著录于《考古》1963 年第 4 期图版肆:四、五,第 208 页图三,第 209 页图四。安徽省博物馆藏。正背两面各有错金鸟篆书 2 行 6 字,共 12 字,字甚残泐,两戈同铭,可互相识补。正面:“彘(癸)亥,郟(徐)侯之皇”;背面:“戊王者旨於賜”。者旨於賜可能封境内的徐人领袖为侯,徐人则尊称者旨於賜为皇。此戈出于蔡侯产墓。淮河流域是徐人故土,者旨於賜似要借重蔡国来监视附近徐人,故以此戈作为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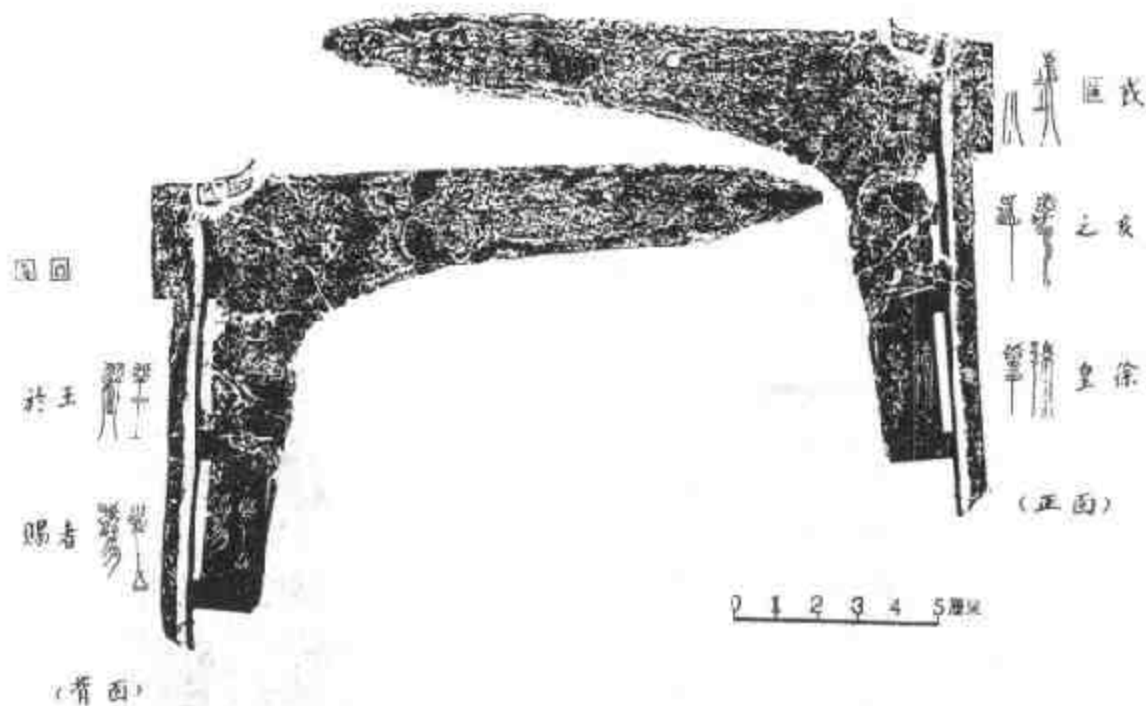


图 5-10 越王者旨於賜戈,安徽淮南蔡侯产墓出土

交礼物送给蔡国,并特别声明自己是“徐侯之皇”。蔡国本无鸟篆文,到蔡侯产时突然盛行,字体同于越国,而与宋、吴不类,这可能与蔡越关系曾经特别密切有关。<sup>①</sup>

其三,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图 5-11)。著录于《金匱论古初集》五·一一。胡部铭 2 行 6 字:“戊王賜旨於者”,赐与者二字左右误置,应读作“戊王者旨於賜”。

#### (十四) 铭文双钩的越王剑

陕西出土。广州博物馆藏(图 5-12)。最初著录于《贞松堂集古遗文续编》下 23。剑格两面左右各铭“戊王”2 字,共 8 字,双钩鸟篆。铭文未具王名。现存具有人名越器,剑格铭文双钩者,唯者旨於賜。此剑“戊王”2 字与者旨於賜剑正面剑格的“戊王”2 字字体也相同,剑的

<sup>①</sup> 董楚平:《六件“蔡仲戈”铭文汇释——兼谈蔡国的鸟篆书问题》,《考古》1996 年第 8 期。

形制与上海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古越阁”所藏的者旨於賜劍相同。因此，器主可能是者旨於賜。

图 5-11 越王者旨於賜戈，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 5-12 铭文双钩的越王剑，  
广州博物馆藏



形制与上海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古越阁”所藏的者旨於賜劍相同。因此，器主可能是者旨於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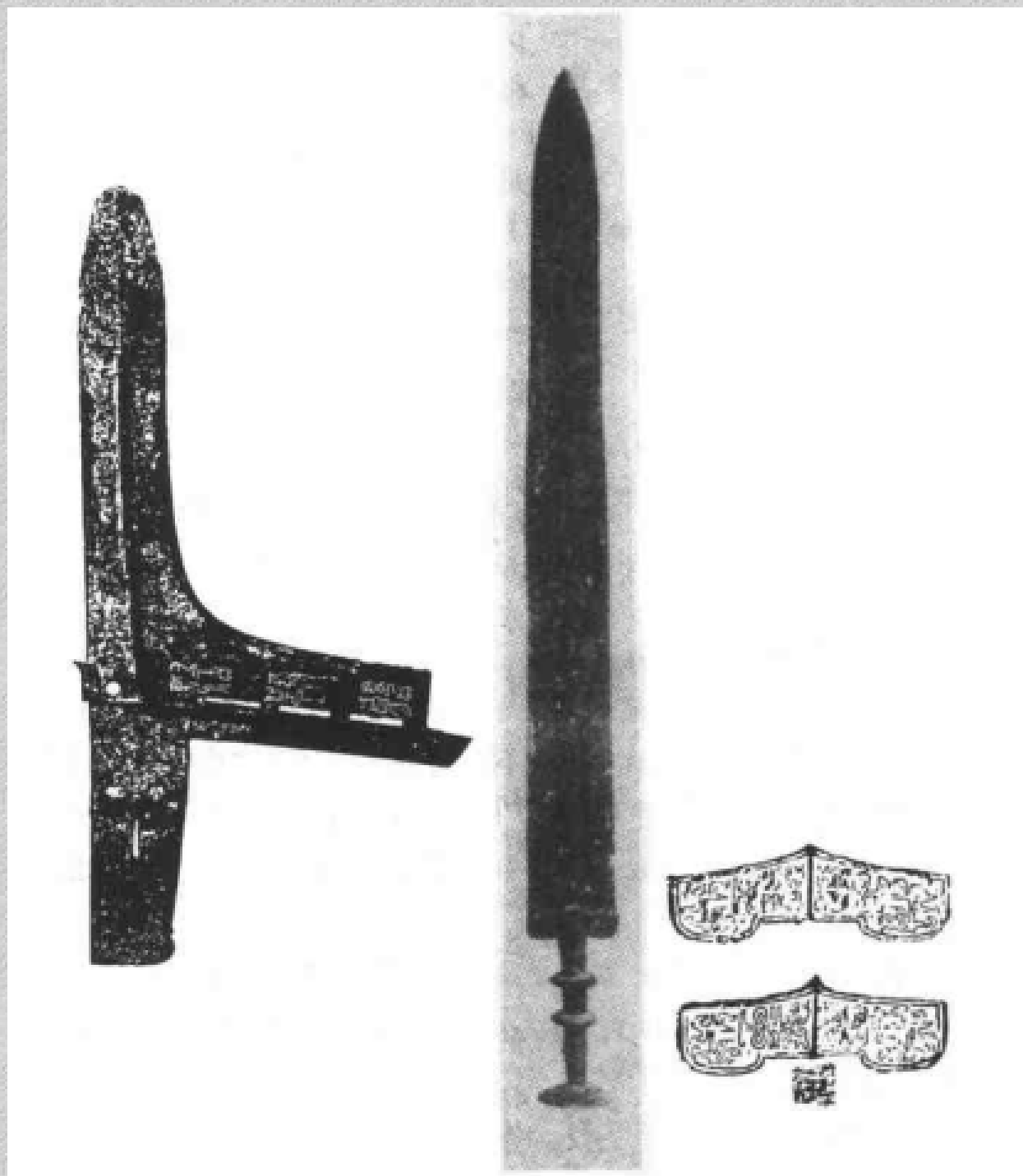


图 5-11 越王者旨於賜戈，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 5-12 铭文双钩的越王劍，  
广州博物馆藏

### (十五) “於”字残钟片

1960年江苏吴江出土<sup>①</sup>。南京博物院藏。著录于《殷周金文集成》1,称“於残钟(越王残钟)”。仅存



一於字,左旁寓笔划于鸟形,与者旨於赐矛之於字相同(图5-13)。

### (十六) 越太子不寿矛

上海博物馆藏。著录于《商周青铜器铭文选》561,释为王翳太子诸咎矛。《吴越徐舒金文集释》释为者旨於赐太子不寿矛。正背面共铭鸟篆文4

行16字:“戊王者旨於赐之太子甬寿自作元用矛”。甬寿,即《越王勾践世家》“不寿”。不古帮母,甬古并母,帮并旁纽,都读唇音,故得相通。不寿,《竹书纪年》作盲姑,是者旨於赐之子、勾践之孙。

### (十七) 越王盲姑剑(2件)

其一,上海博物馆藏。著录于马承源《越王剑·元康元年神禽兽镜》<sup>②</sup>。铭文错金,字体鸟篆。剑格正面左右各铭“戊王丌北古”5字,背面左右各铭“自作用□自”5字,剑首环铭“戊王丌北自作元之用之剑□”12字,共32字,字数之多,为现有越兵之冠。丌北古即盲姑。

其二,1974年江陵张家山小墓出土。荆州博物馆藏。著录于《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第229页。铭文鸟篆错金。铭于剑格与剑首,款式与前剑同,字数较少。剑格“戊王”二字清晰。荆州博物馆陈列展览称“越王盲姑剑”。

<sup>①</sup> 陈邦福:《吴江横塘出土越王残钟考释》,《考古》1961年第7期。

<sup>②</sup> 《文物》1962年第12期。

**(十八) 平粮台越王剑(3件)**

1979年河南淮阳平粮台出土与征集。淮阳太昊陵博物馆藏。三件剑的剑格正面皆铭“戊王、戊王”4字,皆有鸟形。剑格背面与剑首的铭文未识。三剑铭文皆错银。

**(十九) 见于著录的环铭剑首(4件)**

其一,著录于《善斋吉金录》11·11,称“卯剑”。剑首环铭12字。剑格一面铭“戊王、戊王”,另一面6字未识。鸟篆,错银。字体、款式以及错银等情况,皆与平粮台越王剑最为相似。

其二,著录于《善斋吉金录》11·9,称“奇字剑一”。剑首环铭12字,错金,字体鸟篆。

其三,著录于《善斋吉金录》11·10,称“奇字剑二”,剑首环铭12字,存7字。

其四,簠斋旧藏。著录于《奇觚室吉金文述》10·4,称“环剑”。仅存剑首,略残,环铭12字,蚀3字。

剑首环铭,仅见于越国,而且皆铭12字。字体皆鸟篆,其一已铭“戊王”,后三件当也为越剑。

**(二十) “越州𠄎”铁剑铜格**

台北王振华“古越阁”收藏。著录于王振华《商周青铜兵器》82。仅存铜质剑格,宽4.8、高2、厚2.2厘米。剑格正面铭6字:“戊州𠄎,戊州𠄎”,句字作𠄎,背面铭8字:“自作用剑,自作用剑。”(图5-14)与下述14件越王州句兵器铭文相校,区别有二:(1)缺“王”字;(2)州句称王以后的兵器铭文,笔画肥瘦互变,柔和



图5-14 “越州𠄎”铁剑铜格,台北“古越阁”藏

飘逸；与宋、吴鸟篆文风格相同，一变以前越国诸王鸟篆文笔画粗细一致的面貌，唯这件“州𠄎”剑，铭文仍与以往诸王之兵器鸟篆文相同，笔画粗细一致，不参肥瘦。根据以上二点，此剑当作于盲姑时期，即公元前 449 年以前。

剑格中间有大致呈长方形的穿孔，原供剑茎插入。穿孔“内壁及孔外格缘上，都有残余铁锈。缘上铁锈成块，尤为显著。经相关科技检验分析，证实确含大量铁元素。这说明剑格原装于铁剑上”<sup>①</sup>。在铁剑上配铜质剑格，是为了铸制精细的铭文与纹饰，如秦铁权上嵌铜质诏版。《越绝书》卷十一《外传记宝剑》说楚王命风胡子到吴国，请吴人干将、越人欧冶子“作铁剑”。“欧冶子、干将凿茨山，泄其溪，取铁英，作为铁剑三枚：一曰龙渊；二曰泰阿；三曰工布。”这条资料常被忽视，认为吴越只有铜剑，而无铁剑。越州句铁剑铜格说明，至少在越国盲姑时期，吴越地区已有铁剑。

#### (二十一) “越王州𠄎”剑(2 件)

其一(图 5-15)，台北王振华“古越阁”藏。著录于李学勤《古越阁所藏青铜兵器选粹》<sup>②</sup>；王振华《商周青铜兵器》81。剑格正面铭 6 字：“戊王州𠄎、州𠄎”；背面铭 8 字：“自作用剑，自作用剑。”与前剑铭文相校，有一同二异。句字也作𠄎，是其同。异者有二：一、增一“王”



图 5-15 越王州𠄎剑，台北“古越阁”藏

① 王振华：《商周青铜兵器》，1993 年版，第 242 页。

② 《文物》1993 年第 4 期。

字；二、笔画已参肥瘦，与其他“越王州句”兵器书风相同。甲骨文已有卩字。金文卩字见于《徐璠尹繇鼎》（即“汤鼎”）。卩与句音义皆近，卩可能是句的本字<sup>①</sup>。“州句”可能本作“州卩”。前剑作于称王以前，此剑与下剑可能作于称王之初。

其二，刘体智旧藏，著录于《善斋古兵录》下 8，称“自乍用剑”。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著录于《故宫文物月刊》第 93 期第 89 页，图 4a、b。其州句之句也作“卩”，无口。因铭文模糊，过去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 （二十二）“余邗工利”制造的越王州句剑（2 件）

其一（图 5-16），台北王振华“古越阁”藏。著录于李学勤《新出现的十二字越王州句复合剑》<sup>②</sup>。此剑相传出于浙江。通长 53.5、茎长 9、身宽 5、格宽 5.5 厘米。刃缘至今锋利。中脊与两从因金属成分不同而使颜色明显有异。中脊含锡量较低，两从含铜量较高。这样，中脊韧性较高而两从硬度较高（锋利），可收刚柔相济之效果。在钢剑出现之前，这种双色铜剑（复合剑）是效果极佳的短兵。此剑格部铸工精细，铭鸟篆书 14 字。剑格正面铭 6 字：“戊王州卩”；“州卩”二字重复，与多数州句剑相同。反面铭 8 字：一侧“之唯用剑”；另一侧“余邗工利”。“唯用剑”犹云专用之剑。“余邗”是古越语地名，即《汉书·地理志》之“馀汗”；故城在今江西余干东北；古余邗属越国西境。“‘余邗工利’就是余干地方的工匠，名字叫‘利’。这柄州句剑乃是他的杰作。”“这是越剑中最早标出工名的。过去以为‘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铭



图 5-16 “余邗工利”制造的越王州句剑，台北“古越阁”藏

① 《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第 307 页。

② 《中国文物世界》第 112 期。

文始于秦国,这柄州句剑显然早于有工名的秦国名器。”“这也是唯一知道确切制作地点的越剑宝物。1958年,余干黄金埠曾发现西周早期的应监甗,不过有学者认为器系北方传来,并非当地所铸。这柄州句剑证明,在晚周时余干有着发达的青铜器工业,能制造这样精良工巧的器物。”<sup>①</sup>

其二(图5-17),中国历史博物馆藏。著录于张光裕、曹锦炎主编之《东周鸟篆文字编》98。此为断残剑格。一面剩“戊州句”3字,另一面剩“余邗工利”4字。所剩铭辞与其一相同,字体也相同,笔画肥瘦互变,当作于称王之后。



图5-17 “余邗工利”制造的越王州句剑剑格残件

### (二十三) 越王州句剑(12件)

其一(图5-18),1973年湖北江陵藤店1号楚墓出土。著录于《文物》1973年第9期。荆州博物馆藏。剑身铭2行8字错金鸟篆文:“戊王州句自作用剑。”现有州句剑,文字多铭于剑格,唯此一件铭于剑身。此剑制作精良,保存完好,金光灿烂,甚为美观。

其二,湖北秭归出土。秭归屈原纪念馆藏。最初著录于《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第218页,杨权喜论文图七(铭拓)。

其三(图5-19),1987年湖北荆门出土。荆门博物馆藏。著录于《江汉考古》1990年第4期,《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第239、240页。

<sup>①</sup> 李学勤:《新出现的十二字越王州句复合剑》,《中国文物世界》第112期,第85、88页。

自乍用劍  
(劍)

自乍用劍

自乍用劍

自乍用劍

自乍用劍

戊王州句

戊王州句

戊王州句

戊王州句

戊王州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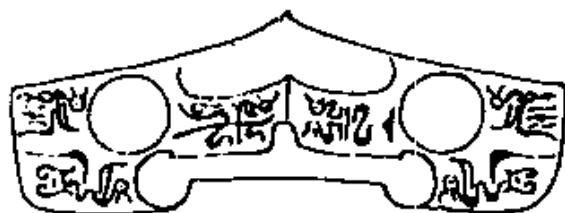


图 5-18 越王州句剑，  
湖北江陵藤店出土

图 5-19 越王州句剑，  
湖北荆门出土

其四，1977年湖南益阳楚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著录于《湖南考古辑刊》第1辑第88页图4，惜铭文模糊；《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第241页，铭文甚清晰。剑格正面两侧各铭“戊王州句”，背面两侧各铭“自乍用剑”，共16字。正面铭文字数、款式与多数州句剑略异，即“戊王”出现两次。

其五，传出陕西。光绪七年，王懿荣得于西安，“锋如新”（《天壤阁杂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剑之上半及柄均佚，仅存剑格及中段。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其六,巴黎色努施奇博物馆藏。著录于《鸟书考补正》7<sup>①</sup>。

其七,美国哈佛大学 Sackler 美术馆藏,编号为 1943·52·1。著录于《鸟书考补正》3。<sup>②</sup>

其八,上海博物馆藏。著录于《商周青铜器铭文选》559。

其九,1936 年长沙小吴门外楚墓出土。著录于商承祚《长沙古物闻见记》卷下第 13 页至 15 页,称“戊工剑”;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598。瑞典卡尔白克氏藏。

其十,旧藏北京尊古斋,今藏浙江省博物馆。仅存剑格,剑身后配。著录于陈梦家《六国纪年》第 103 页;曹锦炎《吴越青铜器铭文述编》。<sup>③</sup>



图 5-20  
越王州句  
矛,大不  
列颠博物  
馆藏

其十一,著录于陈仁涛《金匱论古初集》4·6·7。现在收藏情况不明。

其十二,著录于张光裕、曹锦炎主编之《东周鸟篆文字编》100。现藏香港。

以上 12 件“越王州句剑”,除了其一铭于剑身、其四剑格铭 16 字之外,其他 10 件皆于剑格铭 14 字:正面 6 字“戊王州句、州句”,反面 8 字“自作用剑,自作用剑”。

#### (二十四) 越王州句矛

不列颠博物馆藏。编号:176577。著录于《中山大学学报》1964 年第 1 期《鸟书考》10。此矛制作精致,保存完好,是越兵之珍品。矛身铭错金鸟篆书 2 行 8 字:“戊王州句自作用矛。”(图 5-20)8 字皆有鸟形,是鸟篆书中的杰作。

上述州句铜器共 18 件,全部是兵器。州句是吴越诸王中传世兵器最多的一位。州句,金文又作“州句”,《史记·越王勾践

① ② 《燕京学报》第 17 期。

③ 《古文字研究》第 17 辑,第 101、102 页。



世家》称“翁”，《纪年》作“朱句”。在位 37 年（前 448—前 412 年）。《索隐》引《纪年》云：“於粤子朱句三十四年灭滕，三十五年灭郟。”《水经·沂水注》引《纪年》云：“晋烈公四年，越子朱句灭郟，以郟子鸪归。”朱句晚年距勾践灭吴已有半个世纪，还能远在齐鲁附近灭滕灭郟，说明越国霸业余威犹存。朱句兵器既多且精，则是物证犹在。到他儿子（翳）时，越国情况可能起了变化。

（二十五）者刃钟（13 件，图 5-21）



图 5-21 集十三件者刃钟铭文摹本

此为编钟，共 13 件。日本神户东畑谦三藏 8 件，京都泉屋博古馆藏 2 件，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各藏 1 件。各器铭文不全，合 13 件则全文为 94 字，其中合文 2，重文 1。释文：“佳戊（越）十有九年。王曰：者（诸）刃（咎）！汝亦虔秉不滯（汭涇）<sup>①</sup> 德，以克总光朕辟（躬）。考之逊学，赳赳哉，弼王宅，往捍庶盟。以祗光朕立（位）。今余其念訓（祷），乃有（为）齐（斋）休祝成（盛），用僇刺（烈）壮，光（既）之于（虞）聿（肆），汝其用兹。汝安乃寿，惠逸康乐。勿有不义谋，至于不適。佳王命元顛（没）乃（是）德，子孙永保。”意译：越王翳十九年。王说：“诸咎！你要虔诚地坚持常德而不能丧失，使能全面发扬我的法则传统。要注意自我检点，谦虚学习，英武地辅佐王室，去捍卫诸侯盟国，以崇尚加强我的王位。今天我之所以念咒祷告，是为了恭敬地祈求神明保佑你有美盛的德性，激扬你的壮怀，赐予编钟一组，供你使用。你将平安长寿，和顺康乐。今后勿有不义之心，以致做出不轨之事。唯王命黽勉是从，则为至德，子孙将永远保住这套编钟。”

者刃，即文献诸咎，是越王翳之子。从勾践，历者旨於赐、丌北古（不寿）、州句，而至翳，共五世。翳在位 36 年（前 411—前 376 年）。钟铭“越十有九年”，说明此钟作于王翳十九年，即公元前 394 年。《越王勾践世家》索隐引《纪年》云：“翳三十三年迁于吴，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诸咎弑其君翳。十月粤杀诸咎。粤滑（乱）。吴人立子错枝为君。明年，大夫寺区定粤乱，立无余之。十二年，寺区弟忠弑其君莽安，次无顛立。无顛八年薨，是为莢蠋卯。”越国这场内乱就是由诸咎开其端，国力从此衰竭。越国宗室子弟的腐败，翳时应露端倪。本铭主题，就是力诫太子“勿有不义谋，至于不適。”父王的谆谆告诫，似乎透露了内心的隐忧。王翳在位 36 年，竟没有一件兵器传世，而其者刃钟之豪

① 滯是汭，涇合文，汭上读，涇下读。汭，读作壁，失也。涇，读作經，經德，即常德、恒德、公德。

华,为现存越国礼器之冠。越国原有的重耕战、富进取、尚武轻文传统,至王翳时可能丧失殆尽。

者刃编钟铭文语言常见于中原典籍,“超超”常见于《诗》、《书》;“虔秉”出于《诗》;“经德”出于《书》;“斋休祝成”语出于《易》;“逊学”见于《礼记》;“不适”见于《吕览》……。由此可见,战国时期的越国贵族子弟,当也诵习中原典籍,受中原礼教影响渐深。

## 第二节 从越国金文看越国的历史文化

### 一、从越国具铭铜器的器类、装饰看越国的文化特点

越国具铭铜器器类、装饰统计表

器类	总数	兵器				礼乐器			
		剑	矛	戈	合计	钟	句鑑	鼎	合计
	72	40	7	3	50	18	3	1	22
鸟篆	56	40	7	3	50	5 <sup>(1)</sup>		1 <sup>(2)</sup>	6
错金	11	4 <sup>(3)</sup>	3 <sup>(4)</sup>	2 <sup>(5)</sup>	9	1 <sup>(6)</sup>		1 <sup>(7)</sup>	2
错银	4	4 <sup>(8)</sup>			4				

〔1〕 子利钟、能原铸 2 件、越王者旨於赐钟、於字残钟片。

〔2〕 之利残片。

〔3〕 越王盲姑剑一、二、见于著录的环铭剑首二、越王州句剑一。

〔4〕 越王者旨於赐矛一、二、越王州句矛。

〔5〕 越王者旨於赐戈一、二。

〔6〕 越王者旨於赐钟。

〔7〕 之利残片。

〔8〕 平粮台越王剑 3 件、见于著录的环铭剑首一。

上面收录具铭越器共 72 件,器类 6 种,而吴器有 81 件,器类 14 种,这与考古发掘的结果相符。到目前为止,吴越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以宁镇地区数量最多,宁镇地区是吴文化发源地,是周人初到江南之地,是吴国王室长期留居之地。钱塘江南岸的宁绍平原是越文化中心区域,出土青铜器不多,出土的印纹陶、原始瓷则比宁镇地区多,质量也较宁镇地区精,有些本该用青铜铸造的礼乐器,如钟、句鑿,往往也用原始瓷仿造,用于墓葬。种种迹象表明,吴国的青铜文化较越国发达。

越国铜器总数虽比吴国少,兵器却比吴国多,占越国铜器总数的 68.6%,这在各国具铭铜器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吴国虽尚武,礼乐器还有钟、鉴、钩鑿、壶、簠、簋、盘、鼎、匜、盃十类,越国仅有钟、句鑿、鼎三类。吴国礼乐器有 48 件,越国只有 22 件,不到吴国的一半。史书记载,吴国有季札评论礼乐的著名故事<sup>①</sup>,越国却有勾践拒绝孔子论道的著名传说<sup>②</sup>。史书上的此类记载与出土铜器,都说明吴国受中原诸国的礼乐思想影响较大,越国则保持着更多的野性未驯的“越之常性”;在东周诸国中,吴越皆崇武,越国尤甚之。

越国兵器铭文全部是鸟篆文,无一例外,而且有 6 件礼乐器也铭鸟篆文,礼乐器铭鸟篆文,迄今仅见于越国。据统计,国属可考的铭有鸟篆书铜器,共 103 件,其中,越国 56 件,蔡国 24 件,吴国 9 件,楚国 8 件,曾国 3 件,宋国 2 件,徐国 1 件。越国占总数的 54%。蔡国本无鸟篆传统,由于受越国影响,在蔡侯产时期(前 471—前 457 年)大兴鸟篆。<sup>③</sup>

①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② 《越绝书》卷八《记地传》。

③ 董楚平:《金文鸟篆书新考》,《故宫学术季刊》第 12 卷第 1 期,第 56 页;董楚平:《六件“蔡仲戈”铭文汇释——兼谈蔡国的鸟篆书问题》,《考古》1996 年第 8 期。

## 二、从铜器铭文谈越国国名

吴国铜器自铭国名多达8种,越国铜器自铭国名皆作“戍”,无一例外。东汉何休给《公羊传》作注说:“越人自名於越。”此说已成定论。但越器皆自名“戍”(钺),不自名“於越”,然则两千年定论可以不攻自破。越国“夷俗”浓于吴国,其人名如“九夔”(勾践)、“者旨於赐”(颛与)、“丌北古”(盲姑)、“州句”(朱句)、“者沔”(诸咎)、“姑冯昏同”(冯同)等,都有古越语多音节特点。其地名亦然,如句章、余姚、诸暨、余杭等,唯国名是单音节的戍字。吴国王室是周人后裔,民间越俗也不如越国浓厚,其国名反而大多用多音节的古越语。如此看来,越国对国号“戍”的执著坚持,似乎是特别崇拜钺器的缘故。但查青铜时代资料,江南的钺器并不发达。江南钺器的黄金时代是在良渚文化时期。铜钺的祖型是玉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诸文化中,玉钺最发达的莫如良渚文化。在传说的尧舜时代,良渚文化先民大规模北上,参加中原逐鹿,鲧禹家族即其遗绪<sup>①</sup>。夏与戍古音相同,殷墟卜辞中的戍人即夏人,夏朝可能原称“戍”,“夏”是周人对“戍”的改译<sup>②</sup>。越国王室是夏人后裔,商代中后期从山东经海路南迁吴越<sup>③</sup>。越国王室因是夏人后裔,故坚持原国名“戍”。

有的学者说,越人没有自己的文字,越器自名为“戍”,是用华夏文字给越语注音,无义。此说恐不确。因为华夏同音字很多,吴越人选哪个同音字注音,如果不固定,可能无义,仅注音而已,例

①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第一章第二节:“四、二里头夏文化的东南色彩”、“五、夏王朝的苗蛮血缘”。

② 《吴越文化新探》第一章第一节:“释戍:五、夏族的本名可能也叫戍”。

③ 详见董楚平:《〈国语〉“防风氏”笺证》第一节“会稽有三”,《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

如吴器中的国名“工敝”、“工虞”、“攻敌”、“攻吴”，中原人记作“句吴”、“句敌”，皆无义。越国国名，中原文献写作“越”、“粤”，中原金文《中山王鬲鼎》作“𠄎”。越、粤、𠄎都是“戊”的同音字，中原人可以随便互换，说明都是无义的记音符号。越器国名皆作“戊”，无一例外，不像吴器那样可以换用其他同音字，说明越人取国名为“戊”，含有特定意义，即“戊”为斧钺之钺，是夏的原来国名，表明越国王室是夏之后裔。

### 三、从铜器铭文谈越国世系

现有越国具铭铜器，最早是越王之子勾践剑，作于允常时；最晚是者刃钟，作于王翳时。从允常至翳，连续六代皆有具铭铜器流传至今，这为别国所罕见。根据铜器铭文，结合文献资料，可以理出从夫鐔至无疆的连续世系及其大致年代。

公元前 519 年前后：夫鐔（《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正义引《舆地志》<sup>①</sup>）。

公元前？年—前 497 年：允常（《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正义引《舆地志》）。

公元前 496 年—前 465 年：勾践<sup>②</sup>。《索隐》引《纪年》称“莢執”；金文作“九菱”。

公元前 464 年—前 459 年：颯与。《索隐》引《纪年》称“鹿郢”；《左传》称“適郢”；金文作“者旨於賜”。

公元前 458 年—前 449 年：不寿。《索隐》引《纪年》称“盲姑”；金

① 《舆地志》云：“至周敬王时，有越侯夫鐔，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周敬王于公元前 519 年即位。

② 王名无注出处者，均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文作“丌不古”。

公元前 448 年—前 412 年：翁。《索隐》引《纪年》称“朱句”；金文作“州日”、“州句”。

公元前 411 年—前 376 年：翳。《越绝书》称“不扬”。金文可能作“不光”<sup>①</sup>。翳三十三年迁都于吴（姑苏）。

公元前 376 年七月至十月，之侯。《索隐》引《纪年》称“诸咎”；金文作“者刃”。七月，诸咎弑父自立；十月，越人杀诸咎，越国从此内乱。

公元前 375 年，错枝（《索隐》引《纪年》说吴人立诸咎之子错枝为君）。

公元前 374 年—前 363 年，无余之，又称莽安（据《索隐》引《纪年》，为大夫寺区所立，12 年后，被寺区弟忠所弑）。

公元前 362 年—前 355 年，无颀，又称菱蠋卯（《索隐》引《纪年》）。

公元前 354 年—前 333 年，无彊（《索隐》说无彊是无颀之弟）。

公元前 333 年，是楚威王七年。这一年楚威王兴兵“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国从此衰弱。《越绝书》无彊以下还有“之侯”、“尊”、“亲”三代“君长”。《吴越春秋》称“玉”、“尊”、“亲”。根据《中山王鲁鼎》铭文，越国到公元前 314 年还占有故吴地。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越国到公元前 222 年才亡于秦。<sup>②</sup>

#### 四、从越国具铭铜器出土地点看越国势力的消长

现在知道的越国具铭铜器 72 件中，出土地点明确者 25 件。25

① 曹锦炎：《越王嗣旨不光剑铭文考》，《文物》1995 年第 8 期。

② 董楚平：《楚败越过程考略》，《百越民族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越国具铭铜器出土地点统计

湖北			湖南		河南		安徽		江西		浙江		江苏		陕西	合计
江陵	秭归	荆门	长沙	益阳	淮阳	洛阳	寿县	淮南	瑞州	临江	武康	吴江	常熟			
4	1	1	2	1	3	1	3	2	1	1	2	1	1	1	25	

件中,出于浙北苏南者仅 4 件,两湖、河南淮阳以及安徽寿县的楚墓竟出土 15 件,占 60%,而且越器精品多出于楚墓。郢都所在地江陵出土 4 件:越王勾践剑、越王者旨於赐剑、越王盲姑剑、越王州句剑。这 4 剑分属于祖孙连续四代的越王,真是恰巧。

河南淮阳原为陈国国都所在地,公元前 479 年楚灭陈,改属楚。公元前 241 年又由陈迁都寿春。淮阳平粮台楚墓出土的 3 件越王剑,当是陈为楚都时入葬。

越器中还有 3 件相传出于寿县。安徽寿县是楚国最后建都的地方。1933 年与 1938 年先后两次在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墓中盗出大量铜器。越王者旨於赐剑,3 件出于寿县楚墓,1 件出于江陵楚墓。浙江省博物馆新入藏的越王者旨於赐剑,据传也出于湖北某地楚墓。

越器所出之楚墓,墓主都是大夫以下者,身份不很高。这些越王剑当是作为战利品流入楚国。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楚威王七年(前 333 年)“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又据《史记·甘茂列传》、《楚世家》与《韩非子》、《战国策》等记载,楚怀王二十年代初期,曾使昭滑挑拨越国内部矛盾,引起越国内乱,楚乘机“东取地于越”(《楚世家》)。这次战争,楚军可能曾入越都会稽,把越国的传世至宝越王勾践剑等都掠走。但有些学者因此而说楚国曾经灭越,则不确。楚军一度攻入越都不等于已灭越,犹如吴军曾攻入郢都、占领郢都十个月,却未灭楚,吴军曾攻占会稽,掳越王勾践而未灭越。

《史记》凡记亡国者,都用“灭”字,如《六国年表》记有:

楚惠王四十二年“楚灭蔡”;



楚惠王四十四年“灭祀”；

楚简王元年“灭莒”；

楚王负刍五年“秦灭楚”。

《六国年表》没有记载楚灭越。《越王勾践世家》只说楚威王“大败越”，《楚世家》只说楚怀王“东取地于越”。查遍《史记》，找不到楚灭越的记录。相反，《史记·秦本纪》说：“武王立，韩、魏、齐、楚、越皆宾从。”秦武王立于楚怀王十八年（前311年），当时还有与楚并立的越国，且不远千里“宾从”秦国。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五年（前222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到公元前222年还有“越君”，可见其是被秦所灭，而不是被楚所灭。《史记》所记与《越绝书·外传记地传》的以下记载基本相符：

勾践子与夷，时霸。与夷子子翁，子翁子不扬，时霸。不扬子无疆，时霸，伐楚，威王灭无疆。无疆子之侯，窃自立，为君长。之侯子尊，时君长。尊子亲，失众，楚伐之，走南山。亲以上至勾践，凡八君，都琅琊二百二十四岁。无疆以上，霸，称王。之侯以下微弱，称君长。

《越绝书·吴地传》说：“越王勾践徙琅琊，凡二百四十年。楚考烈王并越于琅琊，后四十年秦并楚。”秦并楚在公元前223年，倒数40年，即公元前262年恰是楚考烈王元年。这年以前，越还占有山东琅琊。

楚未灭越的最坚实证据还是考古资料。1978年出土的《中山王𦣻鼎》铭曰：“昔者吴人并季（越），季（越）人修教备阵，五年覆吴，克并之至于今。”<sup>①</sup> 据考证，该鼎约作于公元前313年至公元前308年之间，具体年份各家说法不一。但都在楚威王“大败越”之后二十多年。据铭辞“克并之至于今”理解，当时，越不但未灭，而且还据有部分故

<sup>①</sup> 《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期。

吴地。

从吴越地区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楚文化对吴越地区的影响,有由北向南、由西向东逐步推进的趋势。苏北靖江等地有战国中期墓葬,苏南邻近安徽的宁镇地区,其楚墓年代较早,太湖平原与上海地区的楚墓多属战国晚期。几何印纹陶与原始青瓷是越文化的标志。苏南与上海的几何印纹陶与原始青瓷在战国晚期已普遍衰落,而浙江的几何印纹陶与原始青瓷在整个战国时期不但未见衰落,而且有新的发展,散布范围空前扩大,直到汉代才呈衰落,数量明显减少<sup>①</sup>。战国时期,在以几何印纹陶与原始青瓷为标志的越文化的汪洋大海里,却也发现几座楚墓,如绍兴凤凰山的木椁墓<sup>②</sup>、宁波火车站 125 号战国土坑墓等<sup>③</sup>。这应是楚怀王二十年代初期“东取地于越”以后,楚军开始进驻钱塘江南岸一些地方的证据,但仍未灭掉越君,而是驻军监督。此后,楚越之间时有斗争<sup>④</sup>,直到公元前 222 年,越君才被秦军所废,越国灭亡。

1959 年发掘的安徽淮南蔡家岗蔡声侯产墓,出土越王者旨於赐戈 2 件。蔡声侯是蔡昭侯的孙子,蔡昭侯死于公元前 491 年,蔡声侯即位于公元前 471 年,相距 20 年。这期间的最大事件是越国崛起,灭吴兴霸。蔡昭侯墓有楚国器物,而未有越国器物;蔡声侯墓没有楚国器物,而有越王者旨於赐戈 2 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时越国势力已跨过长江进入淮河流域,与蔡国发生接触。《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这二戈的出土地点,或可印证文献。此二戈入蔡时间当在者旨於赐在位期间(前 464—前 459

① 牟永杭:《浙江的印纹陶》,《文物集刊》第三辑。

② 《绍兴凤凰山木椁墓》,《考古》1976 年第 6 期。

③ 姚仲源:《浙江德清出土的原始青瓷》,《文物》1982 年第 4 期。

④ 董楚平:《楚败越过程考略》,《百越民族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98—199 页。

年)。戈铭曰：“戔(癸)亥，邾侯之皇、戊王者旨於賜。”<sup>①</sup>《春秋》记载，鲁昭公三十年(前512年)“冬，十有二月，吴灭徐”。徐、越皆为吴国近身之敌。徐亡前后，至少有一支徐国王族得到越国庇护，流寓越国境内。越器《之利钟》记载，在勾践灭吴以后的庆功会上，“余(徐)之客”与“诸侯”一起往庆，并特别殷勤，献上“万年之后，世代自宁，四裔同安”的贺词。到者旨於賜时候，可能封境内的徐人领袖为“侯”，徐人则尊称越王为“皇”，皇比王更神圣，更尊贵。淮河流域是徐人的故土，蔡国境内及其周围地区必有不少徐国遗民。蔡为姬姓，徐为淮夷，者旨於賜为了控制淮河流域，可能要借重蔡国作为监视徐人的前哨据点，故赠以错金铜戈一对，自铭为“徐侯之皇”。

<sup>①</sup> 《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第226—227页。

## 第六章 稻作文化

粮食作物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成果之一。南稻北粟，是中国古代两大主要粮食作物。粟耐旱寒，稻喜温湿；北方种粟，南方种稻，乃地理使然。南北文化的差别，犹稻粟之异性，吴越文化的许多特性往往与这个地区的人们历来种稻、食稻有关。近年的考古发现与农学研究表明，吴越地区是世界稻作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

###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的稻作文化

---

吴越地区是我国新石器文化比较密集的地带之一。这里的新石器文化主要有三片：（1）钱塘江以北的太湖流域，其早晚依次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2）钱塘江以南的宁绍平原，其早晚依次为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3）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安徽淮河以南和鄱阳湖以东的赣东北地区，是吴越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亚区。这些地区在地理上皆属长江下游，其原始稻作文化都较发达。

## 一、各地的稻作遗存

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的稻作遗存分布甚广、甚密，东起舟山群岛，西至鄱阳湖东岸，已发现稻作遗存四五十处。

(1) 浙江桐乡罗家角，距今7000年以上<sup>①</sup>，具体情况详见下文。

(2) 浙江余姚河姆渡，距今7000年左右<sup>②</sup>，具体情况详见下文。

(3) 浙江慈溪童家岙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片中有稻谷壳，距今7000年左右。<sup>③</sup>

(4) 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1989年、1990年进行两次发掘。其马家浜文化层的红烧土块上“多见清晰的古水稻的茎、叶、谷壳的印痕”，距今约6500年。近年，东山村遗址的土壤经植物蛋白石分析，认定东山村遗址稻作活动的起始年代距今为8000年前。<sup>④</sup>

(5) 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1993年春至1994年夏，经三次发掘，第八、七、六、四层皆发现碳化稻米。水稻植物蛋白石的分析结果表明，皆为粳型稻。粒型鉴定的结果表明，皆为人工栽培稻。“而对稻米粒长、粒宽、粒厚的测量结果表明，从第八层至第六层，稻米的进化是缓慢的，而第六层到第四层，稻米的长、宽、厚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这一时期内，栽培水稻曾有一次飞跃，有意识的人工选择已产生了显著效应，稻作栽培有了相当发达的水平。”<sup>⑤</sup> 龙虬庄遗址第八层至第七

① 《桐乡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②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③ 林士民：《宁波沿海地区原始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第284页。

④ 萧公仪、钱公麟等：《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中的古水稻植物蛋白石》，《农业考古》1994年第3期，第98—100页。

⑤ 张敏：《高邮龙虬庄遗址的发掘及其意义》，《东南文化》1995年第4期，第97页。

层,距今约 7000—6300 年,第六层至第四层,距今约 6300—5500 年。

(6) 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共有 10 个文化层,第十层属马家浜文化,距今 6000 多年,其土块含炭化谷粒,经鉴定,有粳、籼两类,粳比籼多。1993 年,江苏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与日本宫崎大学的藤原宏志教授合作,“在草鞋山遗址外围探寻古农田时,在马家浜早期文化层发现了好几处有人工筑造痕迹的遗构,其结构与现代稻田有比较相似的特征”,于是在遗构中取了 7 个土壤样品,进行水稻植物蛋白石分析,结果,在 7 个样品中都观察到水稻的植物蛋白石,而且数量较多,其数量之多,可以证明这些水稻是人工集中栽培,而非野生;这些植物蛋白石皆为粳稻的植物蛋白石。他们的结论是:“在马家浜时代早期草鞋山一带就有了水稻栽培,栽培的亚种接近于现代的粳稻。”<sup>①</sup>

(7) 上海青浦崧泽遗址下层(马家浜文化层),在探方 A1 的下层发现稻谷颗粒和稻叶残片;在 A2 的灰坑中发现稻谷与稻米。稻谷颖壳脉纹清晰,有的颖尖也很清楚。以粳为主,籼稻少量。距今 6000 多年。<sup>②</sup>

(8) 江苏无锡仙蠡墩遗址,1954 年冬,在下层发现成堆的稻谷,距今 6000 年左右。<sup>③</sup>

(9) 江西湖口县文昌渡遗址,大量的红烧土块有稻谷壳、稻秆的印痕,个别红烧土块夹有炭化谷粒。遗址未经发掘,根据采集到的器物判断,年代跨度为距今 6000—4000 年之间。<sup>④</sup>

① 江苏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孙加祥等,《草鞋山遗址新石器时代稻作初考》,《农业考古》1994 年第 3 期,第 95—97 页。

② 《上海市青浦县崧泽遗址的试掘》,《考古学报》1962 年第 2 期,第 27 页。

③ 《江苏无锡仙蠡墩新石器时代遗址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第 8 期,第 50 页。

④ 杨赤字,《江西湖口县文昌渡原始农业遗存》,《农业考古》1989 年第 1 期。

(10) 浙江宁波五星,出土稻谷、稻秆;陶片中有稻谷印痕,距今6200—5900年左右。<sup>①</sup>

(11) 浙江宁波妙山,出土稻谷、稻壳、稻叶、稻秆,距今6200—5900年左右。<sup>②</sup>

(12) 浙江鄞县董家跳,陶片中有谷壳,距今6200—5900年左右。<sup>③</sup>

(13) 浙江宁波八字桥,出土稻谷,距今6200—5900年左右。<sup>④</sup>

(14) 浙江鄞县贛蛟,出土稻谷,陶片中有稻谷印痕,距今5700—5300年左右。<sup>⑤</sup>

(15) 浙江宁波慈城,出土稻谷,陶片中有稻谷印痕,距今5700—5300年左右。<sup>⑥</sup>

(16) 浙江定海白泉镇十字路遗址,在夹炭陶中有谷壳遗存,陶器器壁中还可以看到炭化谷粒结晶,距今5700—5300年左右。<sup>⑦</sup>

(17) 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二期,在一处残房基的红烧土堆积中掺杂着许多稻壳,应是作为建筑物涂料的稻糠泥经火烧烤的遗痕,距今5500年上下。<sup>⑧</sup>

(18) 江苏海安青墩,出有稻作遗存,距今5000多年。<sup>⑨</sup>

(19) 江苏南京庙山,遗址在长江北岸,1958年发现一件红色陶衣的器盖上面有明显的稻壳痕迹。该遗址的文化面貌与南京北阴阳营第四层基地的文化面貌基本相同,距今约5000多年。<sup>⑩</sup>

①②③④⑤⑥ 林士民:《宁波沿海地区原始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第284页。

⑦ 陈金生等:《舟山群岛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3年第1期。

⑧ 杨德标、杨立新:《安徽江淮地区的商周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

⑨ 纪仲庆:《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第159页。

⑩ 蒋赞初:《关于江苏的原始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第36页。

(20) 江苏无锡马山门前山,出有炭化稻谷,距今约 5000 年。<sup>①</sup>

(21) 浙江湖州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遗址分为三区,在甲区和乙区第四层都发现成堆的炭化稻谷和稻米,乙区第四层有一粗厚的黑陶片上有好几个稻谷印痕,其中有一个特别明显。距今 4500 年左右。<sup>②</sup>

(22) 江苏吴江龙南良渚文化遗址,“在房址灰层及灰坑泥土中,经淘洗发现大量的植物种子及动物残骸,植物种子有十多种,尚未鉴定,能判断的有稻谷、菱等”<sup>③</sup>。距今 5000—4000 年。

(23) 江苏江宁小丹阳,位于南京江宁和安徽当涂之间。经南京博物院考古调查,“发现了石器、鹿齿、水稻粒等,说明距今四五千年前小丹阳一带居民的经济生活内容已相当丰富”<sup>④</sup>,属良渚文化,距今 5000—4000 年。

(24) 江苏吴县东坊摇城,1974 年 6 月,从一口新石器时代的古井中清理出数十粒稻谷,包括粳、籼两种类型。距今 4500 年左右。<sup>⑤</sup>

(25) 江苏苏州越城,出有稻作遗存,距今 4000 多年。<sup>⑥</sup>

(26) 江苏句容陈头山,出有稻作遗存,距今 4000 多年。<sup>⑦</sup>

(27) 江苏常州圩墩,出有稻作遗存,距今 4000 多年。<sup>⑧</sup>

(28) 江苏丹徒磨盘墩,出有稻作遗存,距今 4000 多年。<sup>⑨</sup>

(29) 江苏江浦龙山,出有稻作遗存,距今 4000 多年。<sup>⑩</sup>

① 林华东:《河姆渡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01 页。

② 《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 年第 2 期,第 88 页。

③ 《江苏吴江梅墟龙南遗址 1987 年发掘纪要》,《东南文化》1988 年第 5 期,第 49—53 页。

④ 贺云翱、查珣:《小丹阳史迹》,《南京史志》1986 年第 6 期。

⑤ 张志新:《江苏吴县出土新石器时代稻谷》,《农业考古》1983 年第 2 期,第 84 页。

⑥ ⑦ ⑧ ⑨ ⑩ 闵宗殿:《江苏稻史》,《农业考古》1986 年第 1 期,第 254 页。



(30) 上海马桥遗址第五层(良渚文化层)。出土泥质红陶残陶器2件,器表有稻谷印痕。距今4000多年。<sup>①</sup>

(31) 浙江杭州水田畝良渚文化遗址,第四层中发现碳化稻谷,距今4000多年。<sup>②</sup>

(32) 浙江仙居下汤,陶器以稻草和稻谷壳作麇和料,距今4000多年。<sup>③</sup>

(33) 浙江萧山蜀山,红烧土块含稻谷壳,距今4000多年。<sup>④</sup>

(34) 浙江萧山跨湖桥,发现稻谷壳,距今4000多年。<sup>⑤</sup>

(35) 浙江海宁赞山,红烧土块中有稻谷壳,距今4000多年。<sup>⑥</sup>

(36) 浙江嘉兴双桥,发现稻谷壳等,距今4000多年。<sup>⑦</sup>

(37) 浙江嘉兴大坟,出土稻谷、稻米等,距今4000多年。<sup>⑧</sup>

(38) 安徽肥东大陈墩,1955年调查时,在其西坡的红烧土中发现稻粒结块,距今4000多年。<sup>⑨</sup>

(39) 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在其第一期文化层中“发现有大量的碳化稻谷,初步鉴定有粳型和籼型两种”<sup>⑩</sup>,距今4000多年。

(40) 江苏武进寺墩良渚文化遗址,出有稻作遗存,距今4000多年。<sup>⑪</sup>

(41) 江苏江阴南楼,出土稻谷、稻草,距今4000多年。<sup>⑫</sup>

① 《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第121页。

② 《杭州水田畝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③ 金祖明:《浙江仙居下汤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87年第12期。

④⑤⑥⑦⑧ 林华东:《河姆渡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6页。

⑨ 《安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⑩ 杨德标、杨立新:《安徽江淮地区的商周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

⑪ 《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第3页。

⑫ 《无锡文博》1990年第2期;《河姆渡文化初探》,第306页。

(42) 江苏无锡施墩,出有稻作遗存,距今4000年左右。<sup>①</sup>

(43) 江苏无锡锡山公园,1955年进行试掘,在下层(良渚文化层)的一个灰坑中发现“有不少稻谷凝块”<sup>②</sup>,距今约4000年左右。

江苏的连云港二涧村、赣榆盐仓城以及安徽固镇濠城镇(原属五河)等地,也出有新石器时代的稻作遗存,因考虑到这三地皆处淮河以北,地理位置不属长江流域;更重要的是遗址的文化面貌与吴越地区的史前文化差别较大,而与淮河流域的史前文化比较一致,故未列入。江西湖口位于鄱阳湖北湖东岸,是长江下游的西端起点,地理位置属长江下游;更重要的是赣东北是百越之地,史前文化与东部地区比较接近,故列入。在湖口,除文昌濮遗址外,还有城墩坂遗址、银珠山遗址、下柳青遗址、王狗墩遗址和史家桥遗址等,也都出有新石器时代的稻作遗存,湖口的原始稻作文化可能比较发达。

上述稻作遗存,大多以碳化稻谷及其印痕为根据,并依据谷粒形状判别籼粳。可是稻谷不易保存,发现碳化稻谷很不容易,仅仅依靠粒形来判别籼粳,可靠性不高。近年来,国外开始利用分析土壤中的植物蛋白石(Plant Opal)来判断稻作的年代,判别稻谷的种类,估计古代稻谷的产量,为研究稻作起源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新手段。吴县草鞋山与张家港东山村已采用这一先进方法,取得初步成果,故予介绍。

## 二、罗家角与河姆渡的稻作文化

上述出土原始稻作遗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以杭嘉湖平原的罗家角遗址与杭州湾南岸的河姆渡遗址年代最早,遗物最为丰富。

罗家角遗址有四个文化层,稻谷主要出于第四、三层,分别出自

<sup>①</sup> 《江苏无锡锡山公园古遗址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期,第27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30页。

T102、109、114、119、120、130 等探方中,约有 $\frac{1}{3}$ 为带颖稻实。第 120 号探方就出土稻谷约 300 粒,粒形较完整的约 170 粒。据专家对其中 156 粒进行目测鉴定,其拟属粳 55 粒,占 35.26%,拟属籼约 101 粒,占 64.74%。第 119 号探方出土稻谷约 150 粒,较完整者 85 粒,其拟属粳 20 粒,占 23.53%,拟属籼 65 粒,占 76.47%。两探方的稻谷都是籼多于粳。罗家角稻谷较河姆渡出土的小,估计原干粒重约 20—21 克。专家对第 114 号探方第四层土壤进行孢粉鉴定,统计出 567 粒孢粉,其中禾木科植物占孢粉组合的 97%。<sup>①</sup>由于花粉如此单一和集中,倾向性意见认为,这层中的禾木科花粉是当时人类栽培的农作物水稻的花粉。而且,在第四、三层夹炭陶的胎壁中,夹杂着大量稻壳碎屑。稻壳已经作为制陶的麩和料,足见其数量之大,稻谷生产可能已是当时农业的主要部门。

罗家角早期遗址出土猪、水牛的完整头骨各 3 件,狗的完整头骨 1 件。据鉴定,均属驯化的家畜。<sup>②</sup>

第三文化层出土建筑木构件二十余件,有榫卯和企口等残迹。有一构件顶端有中心凸榫,在其凸榫顶上另有更小的凸榫。罗家角出土的木构件数量比河姆渡少得多,但其断面方正规整,木作加工水平似较高于河姆渡文化。从残留的木构件推测,罗家角先民的“居住形式为柱底垫板的地面建筑,同时还存在干栏式建筑”<sup>③</sup>。建筑木构件的出土,说明距今 7000 年前的罗家角先民已过着农业定居生活。

在河姆渡第四层的居住区内,堆积着大量人工栽培的稻谷、谷

---

① 《桐乡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  
② 张明华:《罗家角遗址的动物群》,《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3—47 页。  
③ 《浙江省新近十年的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16 页。

壳、稻秆和稻叶等稻作遗存,这些稻作遗存伴和着大量的木屑片、芦苇类茎叶等非稻作遗物。这些堆积物的厚度一般是20—50厘米,最厚处达70—80厘米。这就是著名的河姆渡“稻谷堆积”,很多学者推测这“稻谷堆积正是当时的居民用以储存稻谷的场所”<sup>①</sup>,或径称为粮食仓库。有学者推断,河姆渡第四层的“稻谷堆积”“原先的厚度当在1米以上。假定平均厚度只有1米,其中四分之一为稻谷和谷壳,换算成稻谷当在120吨以上,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sup>②</sup>。这一推断与换算被许多论著引用,影响颇大。但是,120吨即24万斤,以一人一年口粮365斤计算,可供657人全年食用。考古资料表明,在当时河姆渡人的经济生活中,渔猎与采集仍占重要地位,河姆渡不可能有那么大量的粮食储藏。近来,亲身参加河姆渡遗址发掘的学者根据“‘稻谷堆积’的主要成分是秕谷、尘屑和木屑,碳化稻谷数量不多”等实际情况,认为所谓“稻谷堆积”是河姆渡先民的卧具,它们被铺垫在干栏式建筑的地板之上,起着软垫、防潮的作用。<sup>③</sup>

河姆渡“稻谷堆积”的性质、数量虽然尚待进一步探讨研究,而它那稻谷遗存的丰富程度及其保存完好,在世界史前遗址中仍属十分罕见。除“稻谷堆积”之外,在十多个探方、广达4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普遍都有稻谷发现。出土时,稻草和稻谷色泽如新,外形完好,有的稻谷颖壳上的隆脉、稃毛仍清晰可辨,个别地方还出有稻谷与茎叶相连的稻穗,可惜出土后很快就变色碳化。稻谷虽已碳化,但大多保留着完整的谷粒外壳,颗粒大小接近现代的栽培稻,比现代野生稻大得多。经鉴定,有籼稻和粳稻之分,以籼稻为主。籼稻与粳稻是亚洲水稻的两个基本亚种。

① 《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② 《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③ 劳伯敏:《河姆渡遗址“稻谷堆积层”成因析》,《农业考古》1995年第1期。

近年,中国水稻研究所、日本国立遗传所和浙江省博物馆合作,利用电子显微技术对河姆渡出土的碳化稻谷进行亚显微结构研究,在受检的 81 粒碳化稻谷中,发现 4 粒是普通野生稻。这个研究成果表明,在距今 7000 多年以前的河姆渡地区,生长过普通野生稻,“这对于中国栽培稻起源于长江中下游的假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sup>①</sup>。因为人工栽培稻的起源必须具备这样的先决条件,即该地区具有人工栽培稻的祖先种——普通野生稻,古代先民从采集普通野生稻的长期实践活动中,逐渐学会人工栽稻。根据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动植物遗存、孢粉分析和古气候学的研究揭示,距今 7000 年前的长江中下游,气候比现在温暖潮湿,年平均温度比现今高 3—4℃,年降雨量多 800 余毫米,与现在的两广、海南及云南南部的气候相当,这样的气候是野生稻生长最合适的条件。中日学者的合作研究为此提供了实物证据。

罗家角、河姆渡的稻作文化都不是原始农业的早期形态,在这以前应有几千年的发展历程。近年,长江中游与淮河流域发现几处更早得多的稻作遗存,乃是情理中事。著名农史学家游修龄说:“稻作遗址的不断出现,促进了稻作起源研究的迅速发展,其中以河姆渡遗址带来的震动最大,研究的内容也最丰富。尽管以后又陆续发现较河姆渡遗址更早的遗址如湖南澧县彭头山、河南舞阳贾湖等遗址,但就遗址的内涵而言,都不及河姆渡那么丰富多样,使得河姆渡遗址迄今为止仍属中国乃至亚洲最丰富的稻作遗址。河姆渡遗址吸引了考古界以外的诸多学科如历史的、地理的、农业的、民族的、遗传学的学者都投入研究。从而在稻作的起源、分化和传播方面取得很多的进展,提出了不少不同于以前的新观点,明白了以前未曾清楚的问题,也因而产

---

<sup>①</sup> 汤圣祥、佐藤洋一郎、俞为洁:《河姆渡碳化稻中普通野生稻谷粒的发现》,《农业考古》1994 年第 3 期。

生以前未曾想到的问题。”<sup>①</sup>

### 三、农具的进步

在吴越地区新石器时代稻作文化发展史上,罗家角与河姆渡既不是起点,更不是终点。以后的二三千年,吴越地区的稻作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到良渚文化时期,终于进入了犁耕阶段。稻谷的保存极为困难,农具则较易保存,农具的演变更能反映稻作文化的进步历程。

据统计,河姆渡遗址的骨质农具分布于第二、三、四层,数量分别为3件、47件、186件,未见于第一层。木质农具分布于第二、四层,数量分别为2件、45件,未见于第一、三层。石质农具分布于第一、二、三、四层,数量分别为53件、23件、35件、83件。根据这一数字统计,将骨质、木质、石质农具在各文化层中所占比例,列成下表:

河姆渡遗址石、骨、木农具构成<sup>②</sup>

数量与百分比 层 次	石 料		骨 料		木 料	
	件数	%	件数	%	件数	%
第 四 层	83	26.4	186	59.3	45	14.3
第 三 层	35	42.7	47	57.3	0	0
第 二 层	23	82	3	10.7	2	7.3
第 一 层	53	100	0	0	0	0
合 计	194	40.7	236	49.5	47	9.8

① 游修龄,《河姆渡稻谷研究进展及展望》,《农业考古》1995年第1期。

② 此表据郑云飞《长江下游原始稻作农业序列初论》(载《东南文化》1993年第3期)统计资料制成。

桐乡罗家角遗址也有四个文化层,属马家浜文化。四个文化层不见木质农具,只有骨质与石质农具。骨质农具在第一、二、三、四层的数量分别是1件、15件、28件、13件;石质农具在第一、二、三、四层的数量分别是92件、59件、76件、6件。根据这一数字统计,将骨质、石质农具在各层中所占比例,列成下表:

罗家角遗址石、骨农具构成<sup>①</sup>

数量与百分比 层 次	石 料		骨 料	
	件数	%	件数	%
第 四 层	6	31.6	13	68.4
第 三 层	76	73.1	28	26.9
第 二 层	59	79.7	15	20.3
第 一 层	92	98.9	1	1.1
合 计	233	80.3	57	19.7

罗家角遗址的年代与河姆渡遗址大致相当。综观二表,可以发现,不论是河姆渡遗址,还是罗家角遗址,骨质农具的比例都是愈早愈大,愈晚愈小;而石质农具刚好相反,所占比例是愈早愈小,愈晚愈大。罗家角未见木质农具,河姆渡的木质农具变化趋势与骨质农具一样。这三种质地的农具,以石质农具最为坚硬,制作最难,而入土最深;以骨质农具最为松脆,制作最易,入土最浅。河姆渡与罗家角的骨质农具呈不断减少、石质农具呈不断增加的趋势,是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的反映。

郑云飞根据马家浜下层、崧泽下层、圩墩下层等三个典型的马家浜文化遗址所出的骨质、石质农具进行统计,列成下表:

<sup>①</sup> 此表据郑云飞《长江下游原始稻作农业序列初论》(载《东南文化》1993年第3期)统计资料制成。

马家浜文化石、骨农具构成

数量与百分比 遗址	石		骨	
	件数	%	件数	%
马家浜下层	1	7.1	13	92.9
崧泽下层	2	33.3	4	66.7
圩墩下层	0	0	3	100
合计	3	13	20	87

石质农具仅占 13%，骨质农具有 87%，占绝大多数。

崧泽文化普遍叠压在马家浜文化之上，年代晚于马家浜文化。郑云飞根据上海青浦崧泽中层、吴县张陵山下层、圩墩中层等三个典型的崧泽文化遗址所出的骨质、石质农具进行统计，列成下表：

崧泽文化石、骨农具构成

数量与百分比 遗址	石		骨	
	件数	%	件数	%
崧泽中层	43	95.6	2	4.4
张陵山下层	9	100	0	0
圩墩中层	37	97.4	1	2.6
合计	89	96.7	3	3.3

石质农具占到 96.7%，骨质农具仅占 3.3%。

良渚文化是吴越地区最后一支新石器文化，石质农具十分发达，有石斧、石镑、石凿、石刀、石镰、石犁等，骨质农具极为罕见。郑云飞根据杭州水田畈下层、上海马桥五层、嘉兴雀幕桥等三个典型的良渚文化遗址所出的农具进行统计，列成下表：



良渚文化石、骨农具构成

数量与百分比 遗址	石		骨	
	件数	%	件数	%
水田畈下层	16	100	0	0
马桥五层	7	100	0	0
雀幕桥	406	100	0	0
合计	429	100	0	0

石质农具皆占 100%，未见骨质农具。

综观上述五个统计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随着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石质农具逐步增加，骨、木质农具逐步减少。在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除年代最早的河姆渡、罗家角外，只有海安青墩遗址的崧泽文化层中出土过一件骨耜<sup>①</sup>，其他遗址尚未发现“骨耜”。而且骨锥、骨凿等小型农具的数量也呈逐步减少的趋势。而石质农具不但数量逐步增加，而且体形也逐步增大，加工逐步精细。拥有大量骨耜是河姆渡稻作文化的一个典型特色，这个特色可能说明河姆渡的稻作水平比其他遗址低，说明吴越地区史前时期的稻作水平在不断发展、提高，以致较快地放弃骨质农具，改用石质农具，最后出现石犁。

吴越地区是我国犁耕文化的发源地。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石犁，始见于江南的崧泽文化时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湖州邱城崧泽文化晚期 4 号墓出土一件小石犁，全器长 15 厘米，宽 20 厘米，两腰各长 11 厘米，中心钻孔，孔径较大<sup>②</sup>（图 6-1）。八十年代初，上



图 6-1 崧泽文化的石犁，浙江湖州邱城出土

① 纪仲庆：《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3 年第 2 期，称“骨铲”。

② 梅福根：《浙江吴兴邱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59 年第 9 期。

海松江汤庙村遗址下层 1 号墓出土 1 件石犁<sup>①</sup>。汤庙遗址下层墓葬是目前发现的崧泽文化墓葬中年代最晚的一类,热释光测定年代为  $4860 \pm 230$  年<sup>②</sup>,已接近良渚文化早期。邱城与汤庙的石犁,是全国已发现的石犁中年代最早的两件。

到了良渚文化时期,石犁数量猛增,器体增大,器形较狭长,全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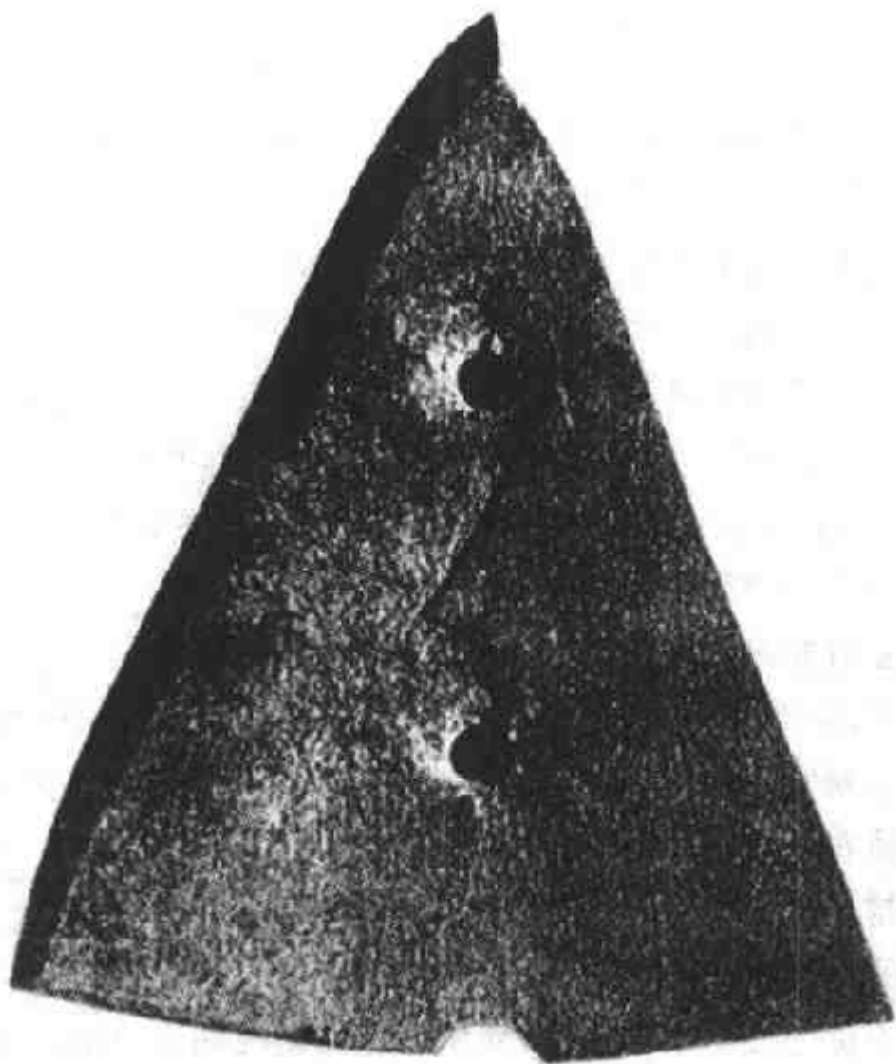


图 6-2 良渚文化石犁,浙江余杭出土

①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松江县汤庙村遗址》,《考古》1985 年第 7 期。

② 上海博物馆:《上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2 页。

长度在 40—60 厘米左右,中心常有一个以上钻孔,孔径较小,各孔作直线排列。这种形体硕大的石犁,出土地点遍及太湖—钱塘江流域,是石犁中最常见的一种。由于这种石犁体形硕大而扁薄,石质脆弱(皆由软质石料制成),故出土时多有残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杭州水田畝遗址良渚文化层出土过一件基本完好的石犁<sup>①</sup>。近年,余杭出土一件完整器(图 6-2),甚难得。1979 年 10 月,江苏吴县濒临太湖的光福镇良渚文化层出土一批石犁,形体都较大,最大的一件长 60 厘米以上,一般也有 40 厘米左右。<sup>②</sup>

还有一种石犁,器体中等,器形比上述的大石犁稍宽,长约二三十厘米,后端凹形,似为装置某器物所设,钻孔多作三角形排列,其缚系方法似较复杂(图 6-3)。玉环岛三合潭出土的石犁,形制与此相仿,还附有两件钻孔犁壁。这类石犁可能是后起而较先进,目前所见都为采集品,无地层关系可考,年代尚难确定。



图 6-3 绍兴陶堰义峰山出土的石犁

良渚文化石犁应以器体硕大、器形较狭长、钻孔作直线排列者为代表。这种石犁怎样使用呢?民族学家宋兆麟说:“据考古学和民族学的对比研究,这种犁有一个犁架,犁床为扁平状,下为床垫,石犁即放在其上,上边再安一木板,以一或若干木钉加以固定。这种石犁包镶在木犁床内后,不易破坏,外露的石犁刃又便于破土划沟。”<sup>③</sup>最早的石犁应该是用人来拉的,因为人类普遍有过以人力拉犁的历史。“不过在我国长江流域普遍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水牛遗骨,

① 浙江省文管会:《杭州水田畝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 年第 2 期。

② 叶玉奇:《江苏吴县出土的石犁》,《农业考古》1984 年第 1 期,第 49—52 页。

③ 宋兆麟:《我国的原始农具》,《农业考古》1986 年第 1 期,第 126 页。

说明当地是世界上驯育水牛的最早地区,当地居民较早使用水牛犁田也是可能的。”<sup>①</sup>太湖地区是我国犁耕文化的发源地,也可能是牛犁文化的发源地。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河南孟津小潘沟遗址也出过石犁<sup>②</sup>,年代均属龙山文化晚期,形制与良渚文化的石犁相同,且伴有良渚文化的其他典型器物,当为良渚文化先民“逐鹿中原”的影响结果。<sup>③</sup>

#### 四、水利与水井

水稻以水为命。吴越地区原始稻作文化发达,要有相应的排、灌、蓄等水利设施。湖州邱城马家浜文化遗址距今 6000 多年,发现 9 条排水沟与两条宽约 1.5—2 米的大型引水渠道<sup>④</sup>。这些沟渠都用于住宅区,技术要求比稻田的排灌工程为高。住宅区有引水、排水设施,说明稻田的排灌工程已很普遍。

1987 年,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发现两座马家浜文化晚期水井<sup>⑤</sup>,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古老的水井。一座呈大口小底的漏斗形,不规则圆形井口直径 160—177 厘米,深 170 厘米;另一座为直筒形,深 226 厘米,直径 67—75 厘米。后者叠压在前者的文化层之上,直筒形水井应该是后起的比较进步的一类水井。

上海崧泽的两座马家浜文化水井都是土井。河姆渡第二层发现

① 宋兆麟:《我国的原始农具》,《农业考古》1986 年第 1 期,第 126 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考古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 年第 1 期;《孟津小潘沟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8 年第 4 期。

③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0 页。

④ 《三十年来浙江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

⑤ 《1987 年上海青浦县崧泽遗址的发掘》,《考古》1992 年第 3 期,第 21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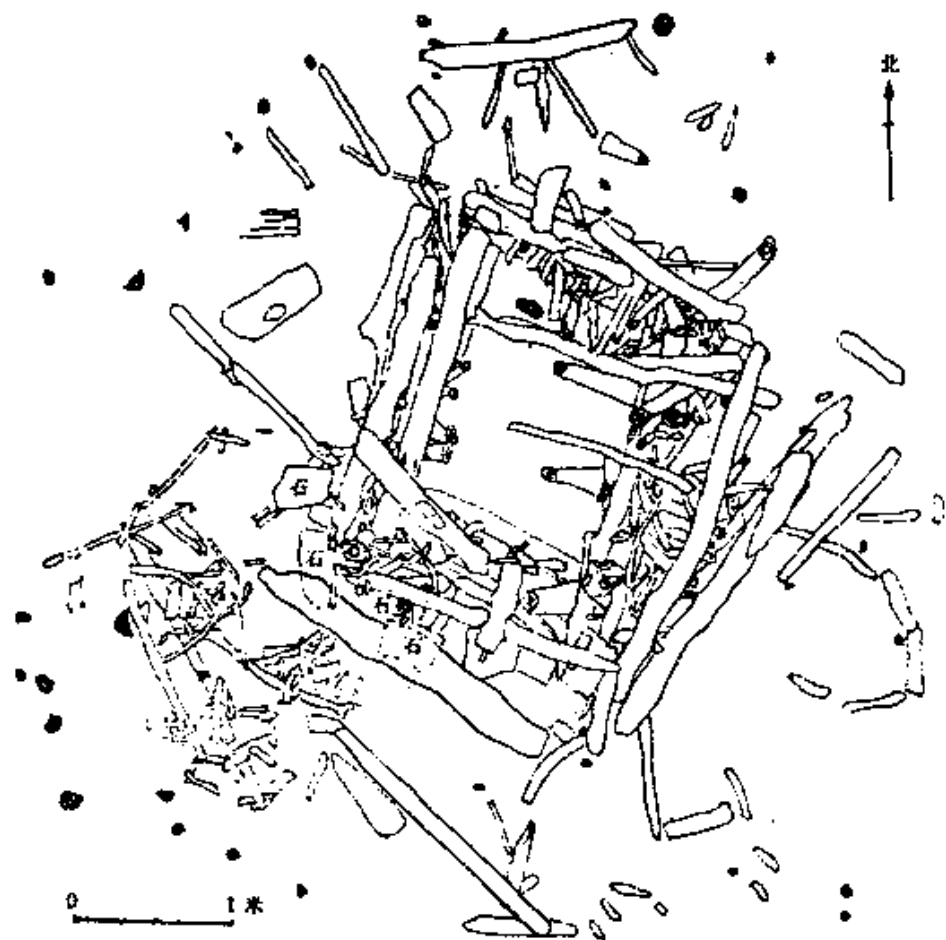


图 6-4 河姆渡木构水井平面图

一口木构方形竖井，距今约 5800—5500 年。它是由 200 多根底部削尖的桩木和长圆木构成(图 6-4)。平面像甲骨文井字：“井”、“井”。根据遗迹，推测当初的建造方法是：在原来的水坑中部四边打入四排密集的桩木(每排 21—40 根)，构成一个平面呈方形的桩木栏；为了防止排桩内倾，其内侧每边各用一根带有榫头或卯眼的粗圆木构成一个方框；为了防止周围泥土坍塌，又在排桩外围用 28 根直径 5 厘米左右的桩木打入地下，组成一圈直径约 6 米的圆形栅栏桩；然后在上部用 16 根长 196—260 厘米、直径 15—18 厘米的圆木，组成一个近似方形的井架，其地面形象恰似甲骨文的井字<sup>①</sup>。这种木架方形竖

<sup>①</sup> 《河姆渡文化初探》，第 146—147 页。

井显然不是水井的原始形态,在它以前即河姆渡第三层甚至第四层,可能已有原始的井,即类似上海崧泽的马家浜文化的土井。河姆渡第二层的年代相当于崧泽文化早中期。上海松江汤庙村遗址崧泽文化晚期文化层发现4座直筒形水井<sup>①</sup>,以芦苇与竹片条编结成圈状箍支撑井壁。井壁留有芦苇印痕,呈纵向排列,间距4—5厘米,井中出土朽蚀的竹片和草木灰。楚都纪南城曾发现5座东周以前的竹圈井,用竹子和柳条编织成圆筒形井圈紧贴井壁,以加固水井。据此推测,汤庙的4座水井也采取类似的加固方法,即芦苇作经,竹片作纬,编成圈状箍,紧贴井壁,不使内倾。<sup>②</sup>

良渚文化时期,水井密布,现在已发现100多座,仅江苏江阴就发现50多座<sup>③</sup>。1974年,吴县澄湖发现了一大批良渚文化水井<sup>④</sup>。这些水井大多是土井,江阴个别井是石井;浙江嘉善新港发现的直筒形水井,是用原生木段剖为几片,挖空后拼合,并用长榫固定而成。<sup>⑤</sup>

中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水井,年代很晚,数量很少。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1984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统计,仅有4口:汤阴白营1口,邯郸涧沟2口,洛阳姪李1口。近年在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也发现水井。中原的水井以汤阴白营的一口为最早,汤阴白营遗址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4540±135至4105±120年,正当良渚文化后期至衰亡的时候。陶寺遗址是中原地区吸收良渚文化最为全面的地方,陶寺有水井更

① 上海市文管会:《上海市松江县汤庙村遗址》,《考古》1985年第7期。

② 上海博物馆:《上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③ 林嘉华:《江阴的史前文化》,《无锡文博》1990年第2期。

④ 《江苏吴县澄湖古井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9辑。

⑤ 陆耀华、朱瑞明:《浙江嘉善新港发现良渚文化木筒水井》,《文物》1984年第2期。

是情理中事。

新石器时代的水井,以吴越地区年代最早,数量最多,这与吴越地区新石器时代稻作文化发达直接有关。水井有助于稳定供水供应,便于定居,还可浇灌住宅附近的园地和农田,是原始水利的组成部分。

---

## 第二节 夏商周时期的稻作文化

---

### 一、金属农具

田野考古表明,叠压在良渚文化层上面的是马桥文化。马桥文化以上海马桥遗址第四层最为典型<sup>①</sup>,根据碳-14与热释光测定的数据,“马桥文化的年代应相当于夏商时代”<sup>②</sup>。分布范围为太湖—钱塘江流域,与良渚文化大体叠合。但遗物稀疏得多,玉器十分罕见,出现几何印纹陶、小件青铜器等外来因素,给人以“换了人间”的感觉。两者的因袭关系,主要表现在基本生产工具上,如有段石铤、三角形石犁、石镰等,与良渚文化一脉相承。这说明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区消失以后,当地的农业生产并没有明显退化。这是因为,“民以食为天”,虽然上层社会大规模地远离故乡,而故乡的中下层居民仍然要吃饭谋生。《逸周书·王会解》说:“正东曰青州,其谷宜稻麦”,“东南曰扬州,其谷宜稻”。古分全国为九州,青州指淮河以北、山东南部,扬州指长江下游。淮河以北是稻麦夹种区,

---

① 《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黄宣佩、孙维昌:《马桥类型文化分析》,《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

② 上海博物馆:《上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

淮河以南则是纯稻区。《逸周书》说的虽是周代，大概也适合马桥文化时期（夏商），马桥文化的基本生产工具与良渚文化一脉相承，即其证。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地区出现大量青铜农具。苏州地区从1975至1980年出土的青铜器共约86件，其中，工具52件，兵器21件，生活器具13件。工具约占总数的60%，其中农具40件，接近青铜器总数的一半<sup>①</sup>。1973年冬，昆山盛庄发现一个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熔铸遗址，出土青铜器53.5斤、43件，竟然没有一件礼乐器，全部是工具与兵器，其中，生产工具26件，兵器11件，生活用具6件。生产工具计有铜镰14件，铜锯5件，铜犁头4件，铜凿、铤、铲各1件，基本上是农具<sup>②</sup>。1959至1960年，绍兴城东面的西施山等地，出土大批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刀、削、镰、斧、锯、凿、犁、锄等生产器具，并伴出冶炼遗址<sup>③</sup>。据报道，1973年10月，绍兴陶堰乡张家坟出土青铜犁铤，呈V形，全长18.2厘米<sup>④</sup>。此外，“历年来在绍兴市郊都泗门，稽山门外下阪、禹陵、亭山，县区坡塘、平水、湮渚、福全、南池、袍谷等地共出土了青铜镰二件、锄二十五件、铲形器十七件”<sup>⑤</sup>。据统计，从1972年12月至1982年12月，绍兴出土的越国青铜工具86件，其中，犁2件，锄21件，铲2件，镰3件，铤23件，凿1件，削34件，以农具犁、锄、铲、镰、铤为大宗<sup>⑥</sup>（图6-5）。

① 此据《苏州文物资料选编》第64—65页“苏州市地近年来(1975—1980)出土青铜器一览”表数字统计。

② 陈兆弘：《昆山盛庄青铜器熔铸遗址考察》，《苏州文物资料选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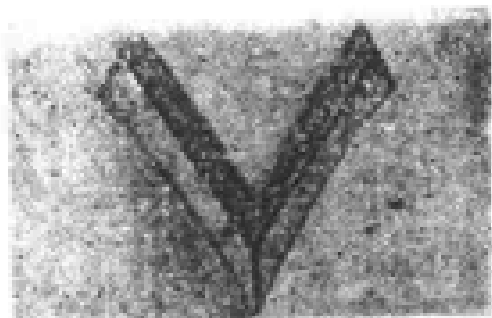
③ 《三十年来浙江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221页。

④ 沈作霖：《绍兴出土的春秋战国文物》，《考古》1979年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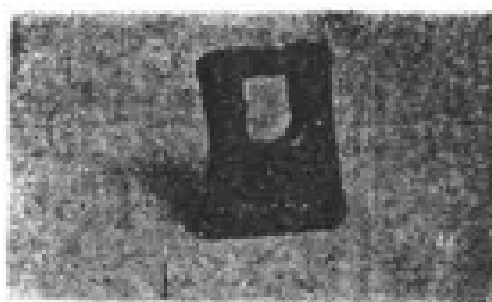
⑤ 沈作霖：《古代越国的农耕工具》，《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⑥ 此据绍兴县文管会沈作霖提供的资料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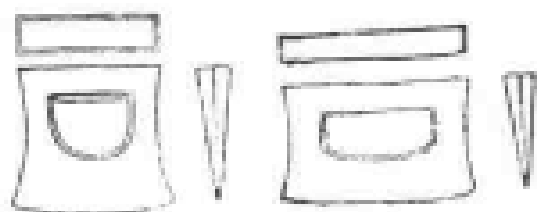




1 青铜犁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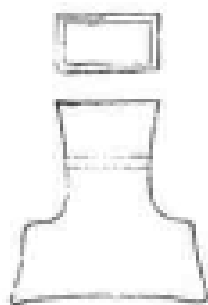
2 青铜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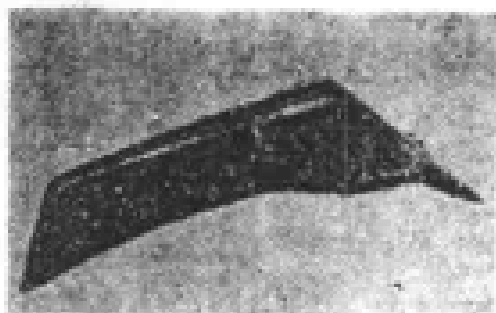
3 青铜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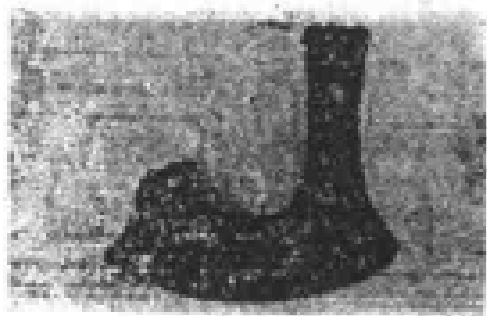
4 青铜“铲形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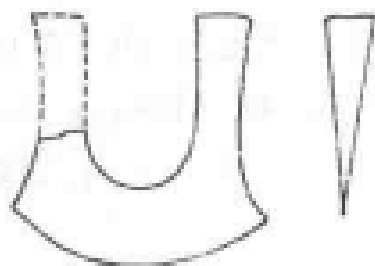
5 青铜“铲形器”



6 青铜锄



7 铁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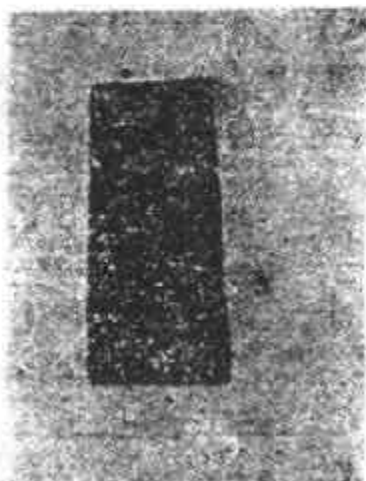
8 铁锄



9 铁镰



10 青铜耒



11 铁耒

图 6-5 绍兴出土铜、铁农具

(采自《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沈作霖论文)

吴越青铜农具遍及边远地区。1963年8月,温州地、市文管会收集到永嘉永临区西岸大队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其中,铜铲、铜耒、铜耨、铁耒各1件,铜块50多公斤和少数锡块,说明这些铜器是当地铸造的。其中夹有一件铁耒。根据这批器物的形制,“年代为春秋末至战国时期”<sup>①</sup>。1977年8月,安徽贵池出土一批东周青铜器。其中,铜

<sup>①</sup> 徐定水:《浙江永嘉出土的一批青铜器简介》,《文物》1980年第8期。

斧 6 件,铜铲 4 件,铜鐻 4 件,铜镰 4 件,铜鱼钩 14 件,铜锯 2 件。“时代约当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sup>①</sup>。1980 年 9 月,安徽舒城九里墩发现一座春秋末期墓,出土铜铤 2 件,铜铲 3 件,铜镰 9 件<sup>②</sup>。1982 年春,浙江舟山定海石礁东方大队,在离地表 1.5 米处发现东周青铜铤和青铜鐻各 1 件,同出的有大量东周时期的夹砂陶和印纹硬陶片<sup>③</sup>。舟山群岛土质碱性很强,金属器具在地下不易保存,这次发现的青铜农具可能因受古陶片保护之故,均完好无缺,弥足珍贵。

铜铤,长方形鏊,刃口圆弧,两侧角外撇,铤口长 7.3 厘米,宽 1.5 厘米,刃部长 8.1 厘米,通高 6.5 厘米,双合范铸制。木柄插入鏊内,即可使用。在古书中,铤又称铤,是破土农具。《淮南子·精神训》“揭铤铤”,注:“铤,铤也。”《方言》:“铤,宋魏之间谓之铤。”《释名》:“铤或作铤。铤,割地为坎也。”《越绝书·外传记吴王占梦》说吴王夫差梦“见两铤倚吾宫堂”,太宰嚭占曰:“两铤倚吾宫堂,夹田夫也。”公孙圣占曰:“见两铤倚吾宫堂者,越人入吴邦,伐宗庙,掘社稷也。”可知铤(铤)是“田夫”“掘”土的农具。

铜鐻,全器呈箭镞形,纵长 8.4 厘米,宽 17 厘米,双合范铸制。正中为小方鏊,作镞形,中空,鏊长 2.5 厘米,宽 1.9 厘米,下部正反各有一钉孔,孔径 0.4 厘米。全器分两翼向后斜出,左翼 14.5×4.2 厘米,右翼 12.5×3.9 厘米,两翼正面施纵线纹,背面平素,前刃甚锋利,后缘为钝边。这是用于稻田中除草的耘田器。

由于中原地区很少发现青铜农具,学术界过去对我国古代有无青铜农具,或是否普遍使用青铜农具,有过激烈争论。1949 年以后,由于长江下游出土大量青铜农具,这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从目前已掌

① 卢茂村,《安徽贵池发现东周青铜器》,《文物》1980 年第 8 期。

② 《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考古学报》1982 年第 2 期。

③ 王和平,《舟山发现东周青铜农具》,《文物》1983 年第 6 期。

握的资料看,吴越青铜农具有镰、耨、犁铧、耜、锄、镢、破土器等。从翻土整地到中耕除草,再到收割,每道工序,都有青铜农具,与中原相比,几乎有“隔代”之感。如果说,崧泽晚期出现石犁,标志吴越稻作文化开始进入“深耕”阶段,那么,东周时期青铜农具的全面使用,则显示吴越稻作文化的“细作”特色。最能代表这种“细作”特色的是带锯齿的耨、镰、犁铧。这三种农具刃部都带有很密的锯齿,正面有很密的直线纹。正面的线纹与刃部的锯齿接轨。农具制作得如此精细,最能显示吴越文化的传统特色。现在江浙的割稻镰刀,仅刃部有锯齿,刀两面皆无刻纹。吴越青铜农具中,出土数量最多的是镰刀,估计有百余件,绝大多数集中在江、浙、皖三地,江苏与安徽也都出在淮河以南。湖北、河南、山东、河北有零星出土。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过一件,上面铭有“冶尹”二字<sup>①</sup>,似乎是冶炼工场官员的玩赏物品,并非实用器。

## 二、吴越水利

大兴水利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吴越地区农业经济的另一重要特色。据《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记载,今太湖地区著名的王家农田与水利工程有:

“地门外塘波洋中世子塘者,故曰王世子造以为田。塘去县二十五里。”

“吴北野禹栎东所舍大嚳者,吴王田也,去县八十里。”嚳是灌田的水渠。

“吴西野鹿陂者,吴王田也。今分为耦渚、胥卑虚,去县二十里。”

“吴北野胥主嚳者,吴王女胥主田也,去县八十里。”

<sup>①</sup> 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上)》,《文物》1959年第7期。

“摇城者，吴王子居焉，后越摇王居之。稻田三百顷，在邑东南，肥饶，水绝。去县五十里。”“水绝”当是筑有堤塘，无海水倒灌之灾害。

“通江南陵，摇越所凿，以伐上舍君，去县五十里。”

“无锡湖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渚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以南注大湖，以写西野。去县三十五里。”

“吴古故祠江汉于棠浦东。江南为方墙，以利朝夕（潮汐）水。”方墙能控制潮汐水，当为斗门之类。

除上引“世子塘”之外，该卷还记有“洋中塘”、“筑塘北山”、“无锡塘”、“马塘”等。这些“塘”可能都是人工所“筑”的堤塘。

《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记载今宁绍平原著名的王家农田与水利工程有：

“富中大塘者，勾践治以为义田，为肥饶，谓之富中。去县二十里二十二步。”

“苦竹城者，勾践伐吴还，封范蠡子也。其僻居，径六十步。因为民治田，塘长千五百三十三步。”

“勾践已灭吴，使吴人筑吴塘，东西千步，名辟首，后因以为名曰塘。”

此外，该卷还记有“练塘”、“石塘”等。

越地诸塘，以“富中大塘”最著名。左思《吴都赋》云：“富中之贩，货殖之选。”

吴越水利工程中，最著名的是邗沟，这是我国第一条人工运河，也是最早的南水北调工程。《左传·哀公九年》记载：“秋，吴城邗，沟通江、淮。”邗城在今扬州北，大运河西岸。邗江，《水经注》作“韩江”。吴在邗城边挖河，沟通长江与淮河，大致自今扬州南长江北岸起，至今清江淮河南岸止，这条邗沟是大运河最古老的一段。哀公九年即公元前486年、夫差10年、勾践11年。夫差开邗沟的初衷主要不是为了农业，而是出于政治需要，为了北上伐齐，称霸中原。《水经·淮水

注》云：淮阴“县有中渚水，首受江于广陵郡之江都县，县城临江。……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沟，谓之韩江，亦曰邗溟沟，自江东北通射阳湖。《地理志》所谓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淮安府志》云：“吴将伐齐，于邗江筑城穿沟，曰渠水。……其水乃自南向北，非自北入南也。”长江水位较高，故邗沟水自南向北，这是我国最早的南水北调工程，有利于江北地区的农田灌溉。

吴、越本是不见经传的东南小国，春秋晚期能先后称霸中原，应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当时的经济命脉只能是农业，江南的主要农作物应该是水稻。《越绝书》记述吴越争霸之道，经常把“农桑”“蓄积”看作胜败的根本。《越绝书》卷五《请余内传》，大夫种分析吴国的有利条件时，首先肯定“吴甚富而财有余”。当时所说的“富”“余”，首先当指粮食充足。故大夫种接着向勾践献计，就是“请余于吴”。吴国君臣在是否借粮食给越国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当“吴王乃听太宰嚭之言，果与粟”时，申胥随即预感到吴国的末日将临，叹道：“于乎嗟！……胥愿廓目于邦门，以观吴邦之大败也！”接着记述越国灭吴的具体过程。这一卷的主要内容是写越灭吴的过程，题目却取“请余”二字，把“请余”写成胜败的关键，虽有夸张之嫌，却也包含合理的内核，即粮食在吴越争霸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记载越国向吴国“请余”粮食，“吴王乃与越粟万石”。两年后，越国“粟稔”，“还于吴”，吴“王得越粟，长太息，谓太宰嚭曰：‘越地肥沃，其种甚嘉。’”吴越借还粮食，动辄“万石”，可见产量相当可观，非大面积种植不可。《越绝书》的“粟”字，是粮食的通称，指稻谷，不是北方小米。《越绝书·计倪内经》“稻粟”连文，是偏义词，也指稻谷。

## 第七章 史前玉器

把“史前玉器”单独列为一章，似乎有点突兀，不合体例。但是，唯有这样才能反映长江下游史前玉器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突兀地位，才能反映中国文明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文明的个性特色。

---

### 第一节 从河姆渡时期到崧泽时期的长江下游玉器文化

---

就目前已知的考古资料言，我国玉器最早出现于距今 8000 年的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中。出土地点有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辽宁阜新查海等遗址。玉器的品类除装饰品外，还有凿、镞等工具。到距今 7000—6000 年前后，黄河中游的裴李岗文化、杭州湾南岸的河姆渡文化、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早期文化，都先后出现了玉器，基本上都是小件装饰品。

长江下游最早出现玉器的地方是河姆渡遗址第四层，距今约 7000 年，稍晚于辽西的兴隆洼文化与河南的裴李岗文化。河姆渡遗

址共出上璜 4 件、管 5 件、玦 6 件、珠 7 件<sup>①</sup>。璜是半环形玉饰,璜、珠、管都钻有小孔,可以串挂起来用作胸饰、手饰。玦是耳饰,有一狭窄的缺口,用以夹住耳朵,可知当时还没有流行穿耳。罗家角第三文化层出土玉坠饰 1 件,是利用纵向对半破损的圆柱形玉管,在一侧接近两端之处各钻小孔一个,长 3.1 厘米,直径 1.4 厘米<sup>②</sup>。罗家角遗址第四、三层属马家浜文化早期。其他马家浜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数量也不多。例如,嘉兴马家浜文化遗址墓葬,在几十副人骨架上,仅在第 9 号骨架头部和 21 号骨架头部发现玉玦 2 件<sup>③</sup>。吴县草鞋山遗址第九、八层(距今 6000 年左右)106 座墓葬,只在一具二三十岁的女性骨架上发现一件玉饰<sup>④</sup>。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的玉器形制简单,不加纹饰,钻孔亦多偏斜,工艺比辽西同期玉器粗糙。

太湖地区紧接马家浜文化的是崧泽文化。崧泽文化距今 5900—5300 年间,可能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但玉器并无明显进步。其典型遗址上海青浦崧泽中层有墓葬 90 多座,仅出土璜 18 件,琕 3 件,环 2 件,玦 1 件<sup>⑤</sup>。桐乡罗家角第一层相当于崧泽时期,仅出土玉管 1 件,圆柱形,中空,长 1.3 厘米,直径 0.9 厘米。吴县草鞋山第六层有崧泽文化墓葬 89 座,其中,21 座随葬装饰品,“以玉石制的璜为最多(12 件),放置于胸部”<sup>⑥</sup>。此外,还有玦、环、钺、饰若干。吴江梅堰出有璜 5 件,玦 6 件,管 4 件。常州圩墩出有璜 4 件,玦 10 件,管 2 件,钺 1 件。苏州越城出土璜、玦各 1 件,湖州邱城也出有璜、玦。与马家浜文化玉器相比,崧泽文化制玉水平尚无重大突破,仅在数量上有所增

①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 年第 1 期。

② 《桐乡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7 页。

③ 《浙江嘉兴马家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61 年第 7 期。

④⑥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第 3 辑,1980 年版。

⑤ 《上海市青浦县崧泽遗址的试掘》,《考古学报》1962 年第 2 期;黄宣佩、张明华,《青浦县崧泽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80 年第 1 期。



加,器类比例有些变化,即璜增多而玦减少,出现半璧璜。上海崧泽遗址出土18件璜中,有9件是半璧形。

与崧泽文化大致同时的南京北阴阳营遗址,发掘206座墓葬,出土玉器283件,大多比较精美。器类基本上是璜、玦、管、环、镯、珠、坠等装饰品,还有“玉铲”、玉琮<sup>①</sup>。北阴阳营文化的来历目前还不太清楚。就现有考古资料言,在崧泽文化时期,太湖—钱塘江流域的玉器文化似乎稍逊于宁镇地区。

---

## 第二节 良渚文化时期的长江下游玉器文化

---

良渚文化距今5300—4100年。这一千多年间,长江下游的玉器文化突飞猛进,达到中国、世界史前玉器文化之顶峰。

### 一、皖南地区的玉器文化

安徽潜山薛家岗新石器遗址可分四期,一期约当马家浜文化时期,二期约当崧泽、北阴阳营时期,三期的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5200—5000年,约当良渚文化早期。第三期出土“琮”形管1件,玉璜18件,玉环18件,玉铲11件,玉饰31件,一般小玉管85件。有一座墓随葬品46件,其中玉器30件,有点类似良渚文化的“玉敛葬”。

安徽含山凌家滩出有大量玉器。1987年6月进行第一次试掘,揭露面积50平方米,发现墓葬4座<sup>②</sup>。1987年11月第二次发掘,揭

---

① 《南京市北阴阳营第一、二次的发掘》,《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所,《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4期。

露面积 275 平方米,发现墓葬 11 座,出土玉、石、陶器 600 多件,其中,以玉器为主,其次是石器,陶器较少<sup>①</sup>。第一次发掘出土不少为别处未见的珍贵玉器。这里只介绍第一次发掘成果。凌家滩文化层分上下二层。下层热释光测定年代数据有二:(1)距今 $4500\pm 500$ 年;(2) $4600\pm 400$ 年。凌家滩下层距今约 5000—4500 年。上文化层略晚于下文化层,但相差不大。下层 4 号墓出土随葬品 131 件,其中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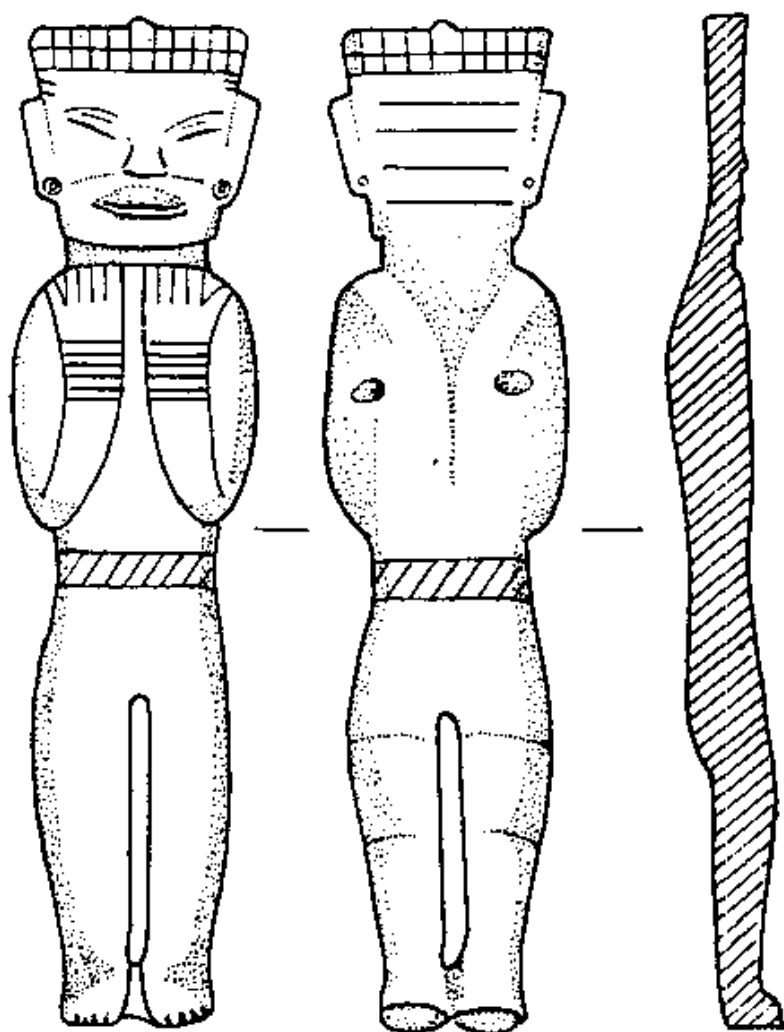


图 7-1 玉人

<sup>①</sup> 张敬国:《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第二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研究》第 7 期。

96件,包括玉斧10件,玉璜17件,玉镯2件,玉璧3件,玉纽扣饰4件,玉管3件,菌状玉饰2件,玉龟、长方形与三角形玉片、半椭圆形玉饰、扣形玉饰、刻纹玉饰、玉勺、玉笄、玉玦各1件。凌家滩4号墓随葬玉器之多,超过薛家岗三期,其“玉敛葬”之风已经颇为隆盛。凌家滩上层已遭破坏,可能也是墓葬,出有玉人3件(图7-1),玉璜2件,玉璧饰1件,玉玦1件,玉纽扣饰2件,玉环1件。据最近报道,凌家滩还出有“玉龙、玉虎”<sup>①</sup>。含山凌家滩的玉龟、玉人、玉龙、玉虎、长方形和三角形玉片(或称玉板)为别处所罕见。最值得研究的是玉龟(图7-2)和长方形玉片,玉龟分为腹甲与背甲两部分,出土时长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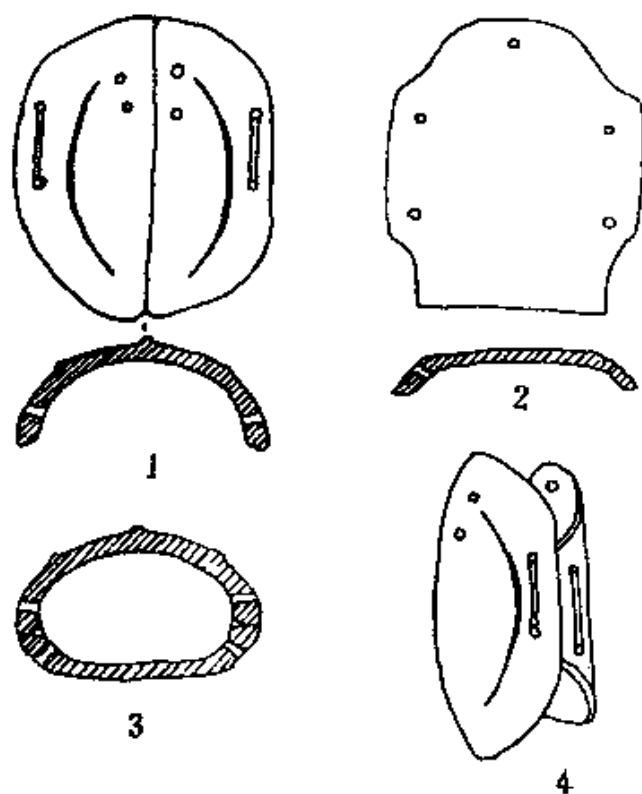


图7-2 玉龟示意图

1. 背甲 2. 腹甲 3. 扣合横剖面 4. 扣合侧视

<sup>①</sup>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十年来安徽省的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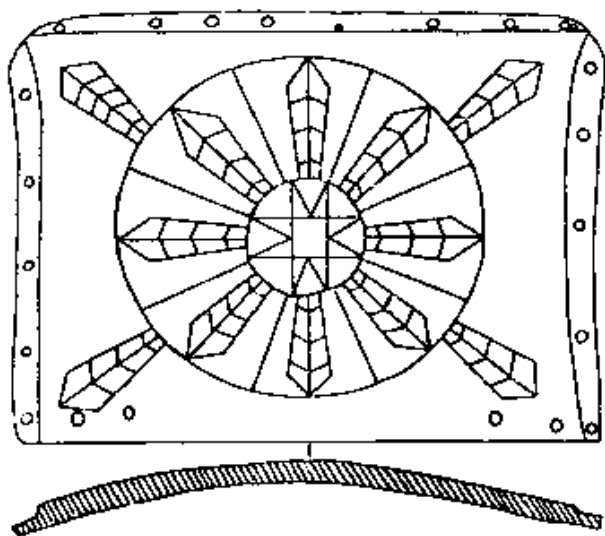


图 7-3 长方形玉片示意图(1/2)

形玉片夹在背甲与腹甲之间。

长方形玉片,牙黄色,长 11 厘米,宽 8.2 厘米。正面有三条宽约 0.4、深 0.2 厘米的凹边,两面都经过精磨,背面光素,正面围绕中心刻有两个大小相套的圆圈。在内圆里,刻方心八角形图案。内外圆之间,有八条直线将其分为均等的八份。在每一份中各刻一个箭头形的图案。在外圆和玉片的四角之间,各刻一个箭头形的图案。在玉片两短边的凹边上,各钻 5 个圆孔;长边的凹边钻 9 个圆孔;无凹边的长边钻 4 个圆孔(图 7-3)。对这件长方形玉片有多种解释,这里只介绍一种说法,天文学史专家陈久金等认为:方心八角形是太阳的象征,八角是太阳的光芒,玉片四角的四个箭头、大圆与小圆之间的八个方位,都与季节有关。《周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又称天一,在天文历法的概念上,指的是地球上的北极,古人给它以至高无上的地位。两仪原指天地,但从历法概念来说,是指阴阳。太极一分为二,将一岁分为阳阴两个半年。四象和八卦,在季节上的概念,相当于农历的四时八节,玉片中箭头所指的四方和八方,正与四象和八卦的概念相合。玉片所刻图形,应该就是先夏时代原始八卦的图形。玉片四边的孔数与“洛书”中四、五、

九之数有关,上古传说,伏羲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夏禹时,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人们就依据“河图”、“洛书”画成八卦。玉片出土时,夹在玉龟的背甲与腹甲之间,可与传说的“龟负书”相证,推测这玉龟与玉片,“可能是远古洛书和八卦”,“反映了我国夏代或先夏的律历制度”。<sup>①</sup>

凌家滩遗址仅发掘一座墓葬,资料有限,与良渚文化相对照,可能处于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即已经进入文明时代。

凌家滩玉器的雕刻工艺虽不如良渚文化玉器那么精美,但仍精磨细雕,经过抛光处理。

根据测试,凌家滩出土的玉器主要是软玉和假玉,没有发现硬玉。“安徽的肥东、全椒、凤阳、滁县、霍山一带,都有玉料、玛瑙和水晶等矿藏分布。含山和上述各县同处江淮之间。考古调查材料又表明,这一地区在5000年前同属一个考古学文化系统。由此可以认定,凌家滩新石器墓地所出土的玉器原料是安徽本地的产品”。<sup>②</sup>

## 二、良渚文化玉器的流散与地层的发现

良渚文化距今已有5300—4100年左右,其玉器在2500年前已有出土流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苏州严山吴国玉器窖藏,在大量东周玉器中,混杂着良渚文化的玉钺、玉琮各1件,玉璧6件<sup>③</sup>。南宋官窑烧制琮式瓷瓶,其形制属良渚文化,说明宋代皇家收藏着良渚文化玉器。清朝皇宫藏有不少良渚文化玉器,乾隆皇帝爱玉成癖,在

① 陈久金、张敬国:《含山出土玉片图形试考》,《文物》1989年第4期。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开放研究实验室:《凌家滩墓葬玉器测试研究》,《文物》1989年第4期。

③ 《江苏吴县春秋吴国玉器窖藏》,《文物》1988年第11期。

古玉上题辞赋诗。吴大澂所著《古玉图考》收录不少良渚文化玉器，因这些玉器制作精良，被称为“周汉古玉”。

二十世纪初，余杭良渚、安溪一带和嘉兴双桥等地，民间掘出大量良渚文化玉器。清代末年，安溪有个姓洪的，挖到几担古玉。这些古玉流散世界各地，被欧美、日本的博物馆珍藏。由于这些玉器工艺极为精致，学术界把它们的年代不断往后推移。到六十年代，多认为是汉代遗物。直到七十年代，世人才认出这些玉器的历史真面目。

1972年至1973年，南京博物院发掘到吴县草鞋山198号良渚文化大墓，出土琮、钺、璧等大型礼器，第一次找到这些玉质礼器的地层关系，揭开了它的历史面纱。接着，1977年吴县张陵山的发掘，八十年代初武进寺墩、上海福泉山的发掘，使人们对良渚文化玉器的认识逐步深化。1986年、1987年先后发掘余杭反山、瑶山墓葬，两地共出土玉器约2000件(组)，超过了以往良渚文化玉器发掘品的总和。近年，苏北新沂花厅、江南昆山赵陵山两处墓地，“出土了上千件良渚文化玉器”。<sup>①</sup>

田野考古表明，几乎所有良渚文化遗址都有玉器，许多小型墓葬也有小件玉质饰物随葬，不过良渚玉器主要出于大型墓葬之中，礼器皆出于大型墓葬。据初步统计，1949年以后考古发掘的良渚文化玉器，以单件计算有6000多件。如果包括私挖盗掘的在内，估计总数已有上万件。

良渚文化玉器的器型有30多种，以大型礼器为大宗，小件装饰品退居次要地位，这是良渚文化玉器与崧泽文化及其以前各种史前文化玉器的主要区别。

---

<sup>①</sup> 汪遵国：《考古发现的良渚文化玉器》，《东南文化》1994年第6期。

### 三、良渚文化玉质礼器及其母题纹饰

#### (一) 玉 钺

这是良渚文化中最尊贵的礼器，是军权的象征。玉钺是组合礼器，由龠、钺身、钺三件玉器配上木柄组成。1982年在武进寺墩3号墓中首次发现配套的玉钺，全长68厘米，木柄已腐朽，从出土遗迹可知，木柄涂漆，并镶嵌20多件长方形小玉片。后来，在福泉山、反山、瑶山共发现十多套组合玉钺都置于死者身侧，多数在左侧。玉钺磨制甚精，但大多素面，唯反山第12号墓出土一件玉钺(M12:100)，钺身两面都刻有完整的良渚文化宗神图像。而且在宗神的下方刻饰神鸟，象征宗神居于天上，是上帝(图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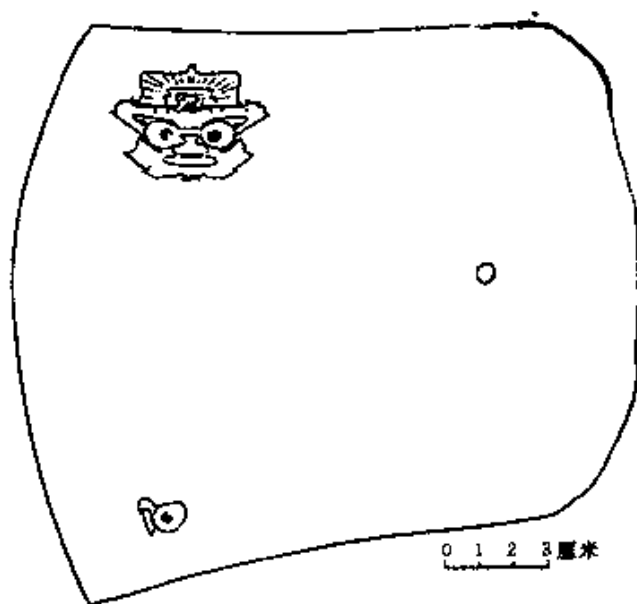


图 7-4 玉钺(反山 M12:100)

钺身的形制与扁平穿孔石斧(石钺)相同，有长条形与宽阔形两种。玉比石脆，玉钺器体扁薄，不能用于砍杀，所有的良渚文化玉钺都无使用痕迹。因此可以断定玉钺不是实用兵器，而是权仗，是兵权的象征。在出土的玉器中，以玉钺最稀罕。反山出土玉璧125件，玉琮

21件,玉钺仅5件,这5件玉钺分别出于5座大墓,每座仅1件。瑶山第12号墓随葬品最丰富,出有玉琮7件,玉钺也只有1件。张陵山3座大墓仅出2件,草鞋山3座大墓仅出1件,寺墩3座大墓仅出3件,福泉山7座大墓也仅出10件。出有玉钺的大墓,规格都较高,随葬品都较多。随葬品较少的一般大墓,没有玉钺。例如,张陵山以西山5号墓随葬品最少,没有玉钺。武进寺墩以3号墓规格最高,出土玉琮33件,玉钺3件;1号墓规格较低,虽有玉琮2件,但无玉钺。瑶山12座大墓分南北二列,南列为男性墓,北列为女性墓,玉钺出于南列墓,未见于北列墓。看来,玉钺只为拥有兵权的将帅所有。

## (二) 玉 琮

在良渚文化礼器中,工艺最复杂,形制纹饰最富有地区特色的当推玉琮。玉琮的形制变化最多,大别之有二,一是内外皆圆的圆筒形;二是外方内圆的方柱形。前者是玉琮的早期形式,后者则比较多见。玉琮的节数没有定准,早期多一二节,晚期可多到十多节。玉琮都有母题纹饰,过去称“饕餮纹”或“兽面纹”,实是良渚文化宗神的标志。早期纹饰较繁,越到后来越简化,有些晚期玉琮只刻两个小圆圈。宗神形象、标志的简化,可能是对宗神信仰淡化的反映。良渚文化是畸形发展的宗教文化,宗教狂热使太湖地区很快统一。但宗教狂热是不容易持久的。宗教淡化,信仰发生危机,这可能是良渚文化后来很快衰落的一个原因。玉琮上的宗神标志,是玉琮的灵魂,形制只是它的载体。晚期玉琮,追求高度与节数,轻视宗神标志,可谓舍本逐末、虚有其表。它是良渚文化走向衰落的一个征兆。

玉琮的方圆、节数、纹饰,变化都很大,有一点始终未变,即器表都雕成四个凸面和四个凹面,凹凸相间对称。玉琮器形最有特色者正在于此。如果仅因艺术需要,没有不变之理。这种独特的造型之所以坚守不渝,应该有一种顽强的信念在支撑着。玉琮是祭祖神器,刻着宗神形象或其简化标志。祖先的伟大功劳首先是生育了子孙,祭祖的



目的之一是为了传宗接代,生生不息。这一切都离不开男女相配。祖先崇拜说穿了就是生殖崇拜。玉琮的灵魂是宗神,玉琮器形的不变特征是凹凸相间,凹凸与宗神互为表里,充分表达了良渚文化的祖先崇拜与生殖崇拜。良渚文化已进入父系社会,当时的人应该已经知道人与动物的生育原因,这是中国阴阳思想之滥觞。

在良渚文化玉琮中,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当推 1987 年反山第 12 号墓出土的“琮王”(M12:98)。这件大玉琮射径达 17.1—17.6 厘米,孔径仅 4.9 厘米,高 8.8 厘米,重达 6.5 千克。器形之宽,重量之大,甲冠现有玉琮,因此被称为“琮王”。“琮王”不但器体大,更重要的还是纹饰特殊。一般玉琮只在凸面上刻宗神标志,个别玉琮还在宗神标志两侧各刻变形鸟纹。此琮除在凸面刻宗神标志与鸟纹外,还在四个凹面内上下各刻一个神像,共刻八个神像(图 7-5)。凹面内雕刻纹饰尚属首见。凹面内的八个神像,每个高约 3 厘米,宽约 4 厘米。神像的主要部分是羽冠、人面、兽面纹。羽冠与兽面纹都采用象征手法。羽冠象征鸟首。兽面纹饰于身躯的主要部位胸腹部,象征此神为兽身(《山海经》中的神大多为禽兽之身)。此兽为神兽——龙。这个人面、鸟首、龙身的神,是良渚文化的宗神,即上帝<sup>①</sup>(图 7-6)。同样完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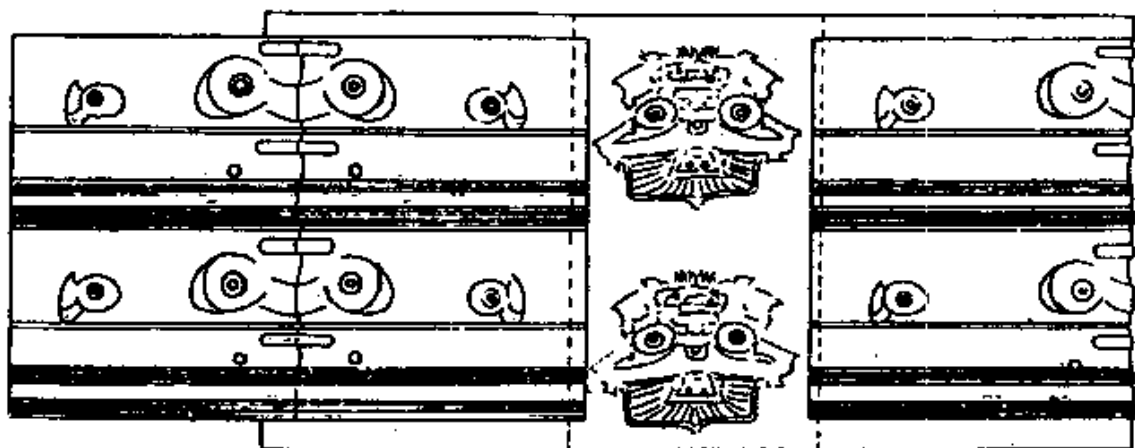


图 7-5 “琮王”纹饰示意图

<sup>①</sup> 董楚平:《良渚文化上帝小考》,《浙江学刊》1996 年第 5 期,第 28、29 页。

的神像还出现于同墓出土的玉钺(M12:100)上,玉钺刻神像,也为仅见。看来,反山第12号墓的墓主身份不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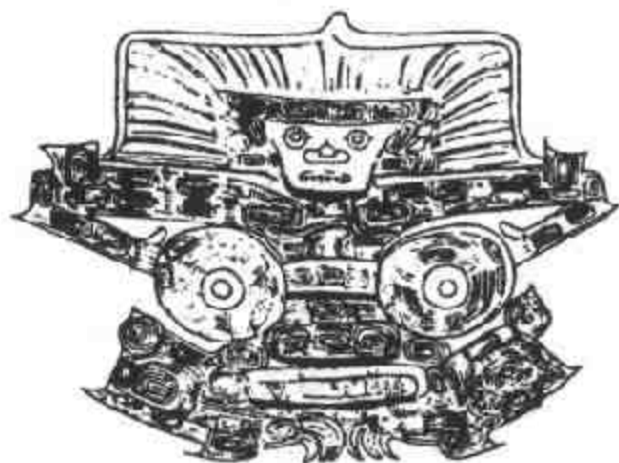


图 7-6 宗神全身像

上海福泉山 T4M6 墓出土玉琮 5 件,其中一件(T4M6:21),高 5 厘米,矮方柱形。器内径 6.7—6.9 厘米,厚 0.3—0.6 厘米。共两节,上节刻小眼人面纹,略有眼角,下节刻繁缛的大眼兽面纹。每个凸面的四角,即小眼纹与大眼纹的两边,各有一只神鸟,横棱中间和凸起的额、鼻、目、口部位满刻几何形图案,

刻纹细如毫发。小眼纹与大眼纹是宗神的简化标志,在宗神标志的两边刻神鸟,表示宗神居于天上,手法与反山“琮王”相同(图 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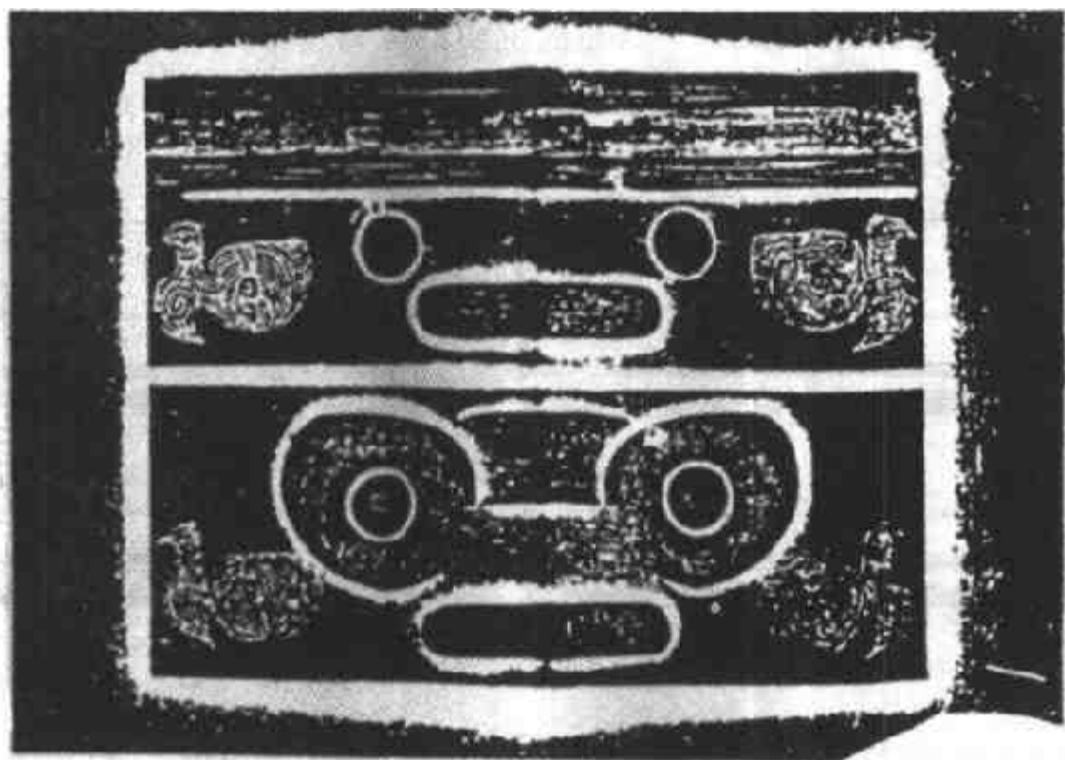


图 7-7 福泉山 T4M6:21 玉琮纹饰拓片

### (三) 玉璧

玉璧最早出现于辽西红山文化<sup>①</sup>，但数量不多。良渚文化玉璧大增，但不是每座大墓都有玉璧。江苏吴县张陵山西山4号墓是典型的良渚文化早期墓葬，出有钺、琮等大型礼器，但无玉璧。余杭反山11座大墓出土玉璧125件，而近在咫尺的瑶山12座大墓居然未见1件璧。据发掘简报分析，瑶山年代稍早于反山。在太湖地区，玉璧最早出于上海青浦福泉山，其崧泽文化晚期墓T8M4，出有1件玉璧<sup>②</sup>；上海与北方海路联系较多，福泉山23号坑的良渚文化大墓出有一件大汶口文化的彩绘背壶。福泉山当时是港口，玉璧可能原是舶来品。

在良渚文化玉器群中，玉璧的特点是器体大，数量多，而制作大多粗糙。反山11座墓葬出土125件玉璧，少数出自死者的头部，大部分叠放在腿脚部位，10余件堆成一叠。出自头部的少数玉璧加工较好，成堆叠放在腿脚部位的玉璧，“是所有玉器中最为粗糙的，边沿缺损，厚薄不匀，直径误差甚至超过2厘米，……。”<sup>③</sup>其他良渚文化墓葬的玉璧出土情况也与此类似。人们常以“天圆地方说”并引《周礼》“苍璧礼天”“黄琮礼地”来解释璧、琮的功能。其实，《周礼》成书于战国，远距良渚文化二三千年，未必能说明良渚文化璧、琮的功能。据董楚平研究，“良渚文化的宇宙观是天圆地也圆”<sup>④</sup>，即半球形的天穹盖在周边圆形的大地上。这是人类对天地的直观感受。“所谓‘天圆地

① 方殿春等：《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6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② 黄宜佩、张明华：《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东南文化》1987年第1期，第5—7页。

③ 王明达：《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初论》，《文物》1989年第12期，第50页。

④ 董楚平：《良渚文化不祭天，玉璧像天也像地——兼释D形器与山字形器》，《中国文物世界》第141期。

方’，是天尊地卑、上下有别的形象化说法，是周代礼乐文明的产物”<sup>①</sup>，良渚文化时代不可能有这种蓄意扭曲人类对天地直观感受的古怪观念。

在《山海经》里，玉璧用于祭地，见于《南次二经》、《北次三经》、《东次二经》、《中次十经》。例如《南次二经》说“毛用一璧瘞”。瘞是埋物祭地。《南次二经》写的是吴越地区，尤其值得重视。良渚文化时期，水井密布，人口稠密，要用石犁深耕，以充分利用土地肥力。这些情况说明，良渚文化时期的太湖地区，土地占有已较紧张，当时的主要财富应该是土地。那些堆放在腿脚部位、工艺粗糙的玉璧，可能象征土地；少数置于头部、工艺较精的玉璧，可能象征天穹。现已发现有三件玉璧刻有宇宙模式，正面刻符象征天，反面刻符象征地，侧边刻符象征天地交合<sup>②</sup>。

玉璧是良渚文化玉器中唯一没有刻过宗神图像及其简化标志的器种。这是因为，玉璧象征天穹与大地，天穹与大地都不是宗神的居所。良渚文化时期，人们还不可能赋天以神格，天还是一片辽阔的自然空间，高山才是神的居所。古希腊诸神都住在奥林帕斯山上，屈原想象虽然丰富，《离骚》诸神都还居于昆仑等山上。“悬空的天堂、天廷是后来才产生的，是人类抽象思维能力发展到一定高度以后才能创造出来。”<sup>③</sup>至于大地，那是人的世界，更不可能把宗神刻在象征大地的玉壁上。玉璧无宗神，也是“玉璧像天也像地”的一个证据。

#### （四）玉璜

玉璜是吴越地区传统玉器，最早出现于河姆渡第四层，有 7000 年悠久历史。璜可依“肉”的宽窄、厚薄、圆弧的形状等，分为弧形璜、

① 董楚平：《良渚文化创世神话补证》，《故宫文物月刊》第 174 期。

② 详见董楚平：《良渚文化创世神话补证》之“三、刻有宇宙模式”。

③ 董楚平：《良渚文化不祭天，玉璧像天也像地——兼释 D 形器与山字形器》。

折角璜、扇形璜、半璧璜四种。半璧璜是璜的最后发展形式。《说文》：“璜，半璧也，从玉黄声。”良渚文化的玉璜大多呈半璧形，有的镂空刻纹，常与玉管贯联编成串饰，置于死者胸腹部位。有的玉璜刻有宗神形象和龙首纹。反山出土玉璜4件，皆为半璧形，有两件刻有宗神形象或其简化标志。

反山第22号墓出土一件玉璜(M22:20)，长12.1、高7.6、厚0.8厘米，用阴线细刻宗神的完整形象，与“琮王”所刻者相同(图7-8)。第23号墓出土一件玉璜(M23:67)，长13.8、高5.6、厚0.7厘米。正面正中有一浅浮雕简化兽面纹，两角雕琢一对神鸟，布局与反山第12号墓出土的“琮王”与玉钺所刻者相同(图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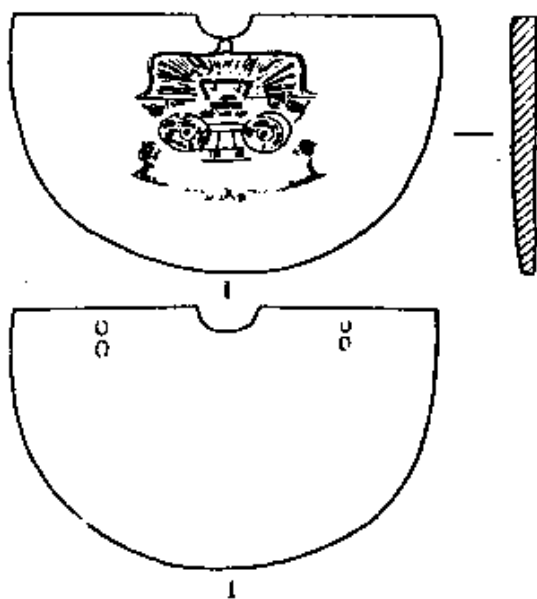


图7-8 (反山M22:20)  
玉璜纹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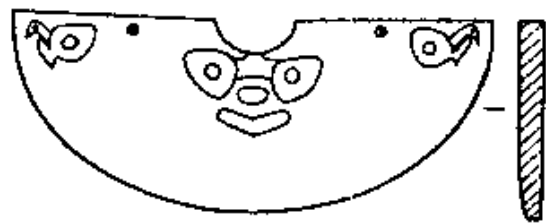


图7-9 (反山M23:67)  
玉璜纹饰

瑶山出土玉璜9件，其中8件为半璧形。4号墓出土的一件玉璜(M4:34)，宽14.3、高5.7厘米。正面有线刻的宗神简化图案，包括有眼角的人眼和兽面的巨嘴獠牙，余皆省略，手法极其简练(图7-10)。第11号墓出土的一件玉璜(M11:84)，宽12.7、高4.8、厚0.35厘米。两面用透雕及阴线雕刻相结合的技法，琢出宗神的简化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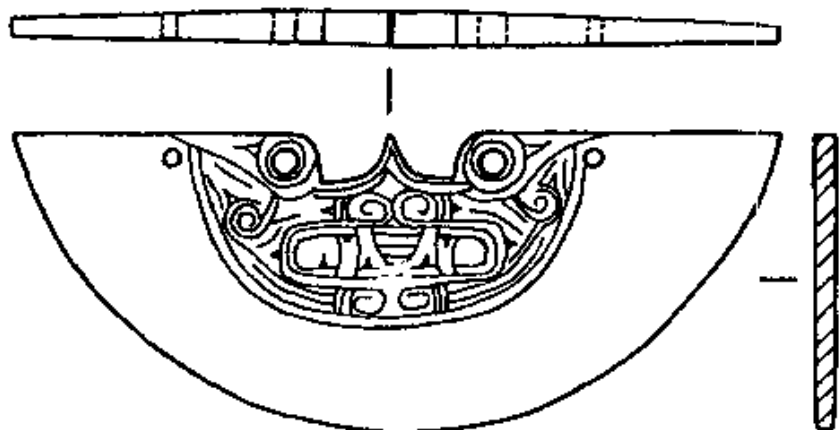


图 7-10 (瑶山 M4:34)玉璜纹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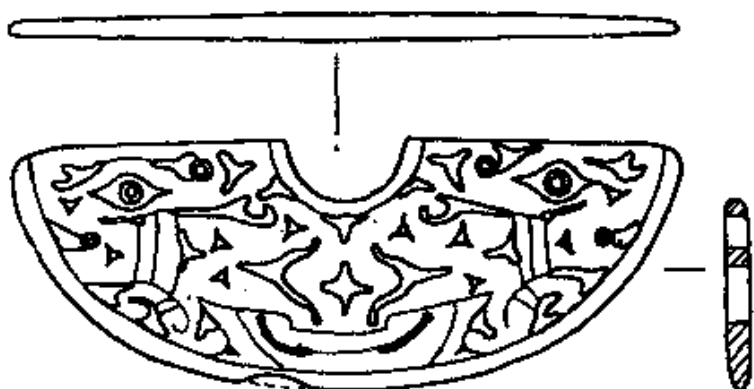


图 7-11 (瑶山 M11:84)玉璜纹饰

案，包括有眼角的人眼和兽面的阔嘴(图 7-11)。不以大眼而用巨嘴代表兽面，是这两件玉器的共同特点。第 11 号墓出土另一件折角璜(M11:94, 简报称“桥形”)，下部弧缘处用浅浮雕法琢出四个“龙首”(图 7-12)。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具有良渚文化风格的双龙首弧形玉璜，长 20.4、肉宽 3.9、厚 1.5 厘米，重 230 克，比重 2.92。青白泛黄色，表面大部分已沁成赭色，应为闪玉。体积较一般的璜厚大，两端各刻一龙首。上下两弧边上，各刻五个与四个椭圆形的凸面，凸面上用浅浮雕和极浅的细阴线，刻出良渚式的大眼兽面纹。龙首上下两排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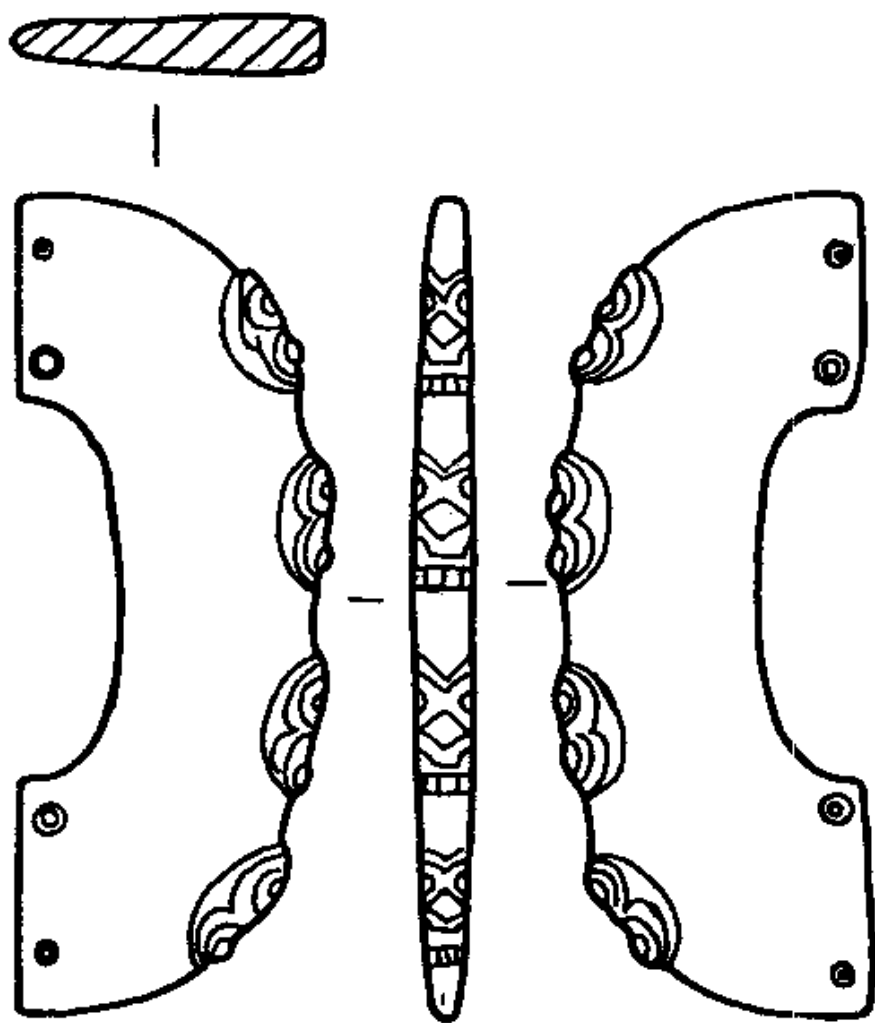


图 7-12 (瑶山 M11:94)龙首玉璜

齐的牙齿,与瑶山出土的折角璜和龙首圆牌饰的“龙牙”相似<sup>①</sup>(图 7-13)。

良渚文化玉璜不仅刻宗神和其简化图案以及“龙首”,而且工艺精致,可知不是一般饰物。

古文献盛传玉璜是夏代重要礼器,例如:

《左传·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

<sup>①</sup> 邓淑蘋:《故宫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之四——装饰品类》,《故宫学术季刊》第 8 卷第 4 期,1991 年,第 17—18 页,图版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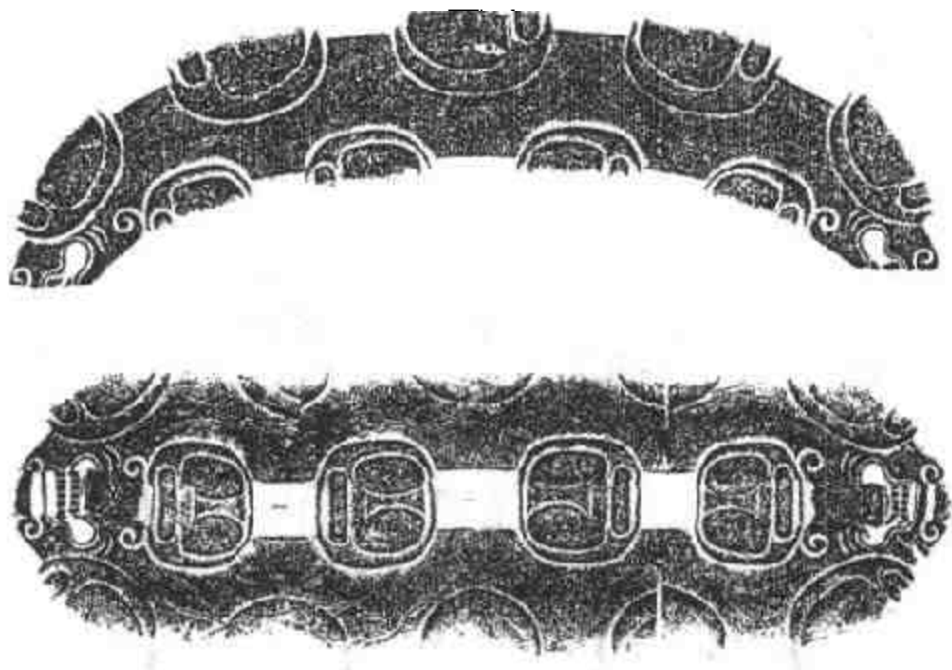


图 7-13 双龙首玉璜 上：侧面拓片；下：下缘拓片

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

《左传·哀公十四年》：“（宋）向魑出于卫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与之他玉而奔齐，陈成子使为次卿。”

《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氏启于此僂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

《淮南子·精神训》：“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匮而藏之，宝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宝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

《淮南子·汜论训》：“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考；明月之珠，不能无纰；然而天下宝之者，何也？其小恶不足妨大美也。”

《淮南子·说山训》：“高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让而进之以合欢。”

《淮南子·说林训》：“曹氏之裂布，蜾者贵之，然非夏后氏之璜。”

《汉书·王莽传》：“成王之于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锡之检，开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赐以附庸殷民六族，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



由于夏与璜有特别密切关系,故典籍中有“夏璜”之称。《意林》卷三引汉人桓谭《新论》:“此乃国之大宝,亦无价矣,虽积和璧、累夏璜、囊随侯、篋夜光,未足喻也。”

由上可知,璜在夏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在中国各地史前文化中,璜始见于河姆渡第四层,在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中盛传不衰。在良渚文化玉璜中,宗神及其简化图案,是其主要纹饰。夏文化与长江下游史前文化之关系,于璜也可见一斑。<sup>①</sup>

### (五) 冠状器

此器与宗神羽冠相似,呈倒梯形,冠顶凸出,应是木质神像的冠冕。下端为扁榫,榫钻三五并列小孔,下面常有成片的朱砂和用于镶嵌的小玉粒,可知原应嵌插在木质(或其他材料)神像顶端。此器仅见于随葬品较丰的墓,而每墓仅出一件,多为素面,有刻纹的皆刻宗神形象或其简化图案。吴县张陵山与草鞋山、昆山少卿山、江宁智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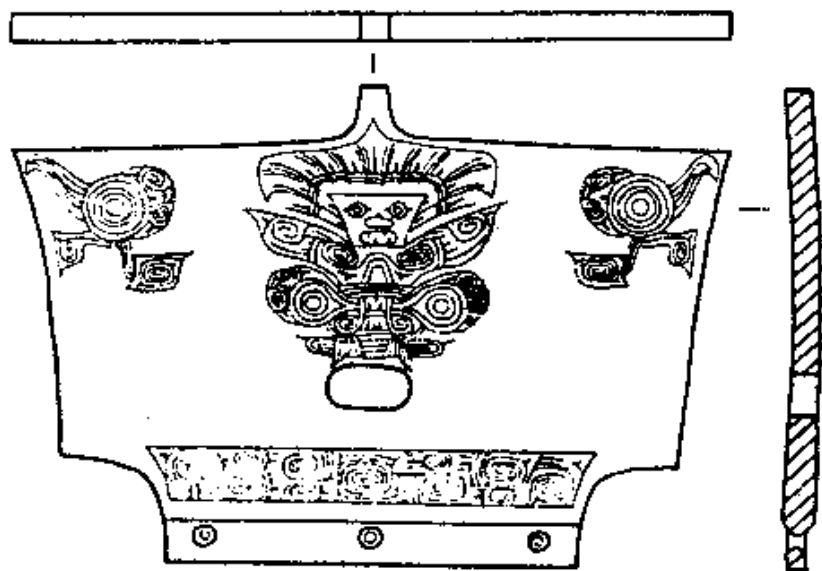


图 7-14 (瑶山 M2:1) 冠状器纹饰

<sup>①</sup> 陈剩勇:《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第三章“夏室宝玉:夏后氏之璜、玄圭与先夏历法图”,湖南出版社 1994 年版。

余杭反山与瑶山等地均有出土,以反山、瑶山所出者刻纹最精。

瑶山2号墓出土的一件冠状器(M2:1),高5.8、上宽7.7、厚0.3厘米。正面中部用阴线刻宗神图像,宗神头戴羽冠,眼、鼻、嘴俱全;其下为兽面图案,双眼为重圈,有椭圆形眼睑,宽鼻、阔嘴,一对獠牙外伸;上侧两端各刻一神鸟,鸟头朝外,引颈昂首(图7-14)。反山16号墓出土的一件冠状器(M16:4),通高5.2、上宽10.4、下宽6.4、厚0.3厘米。器形较特殊,左右突出,似有双翼的冠;正反两面以透雕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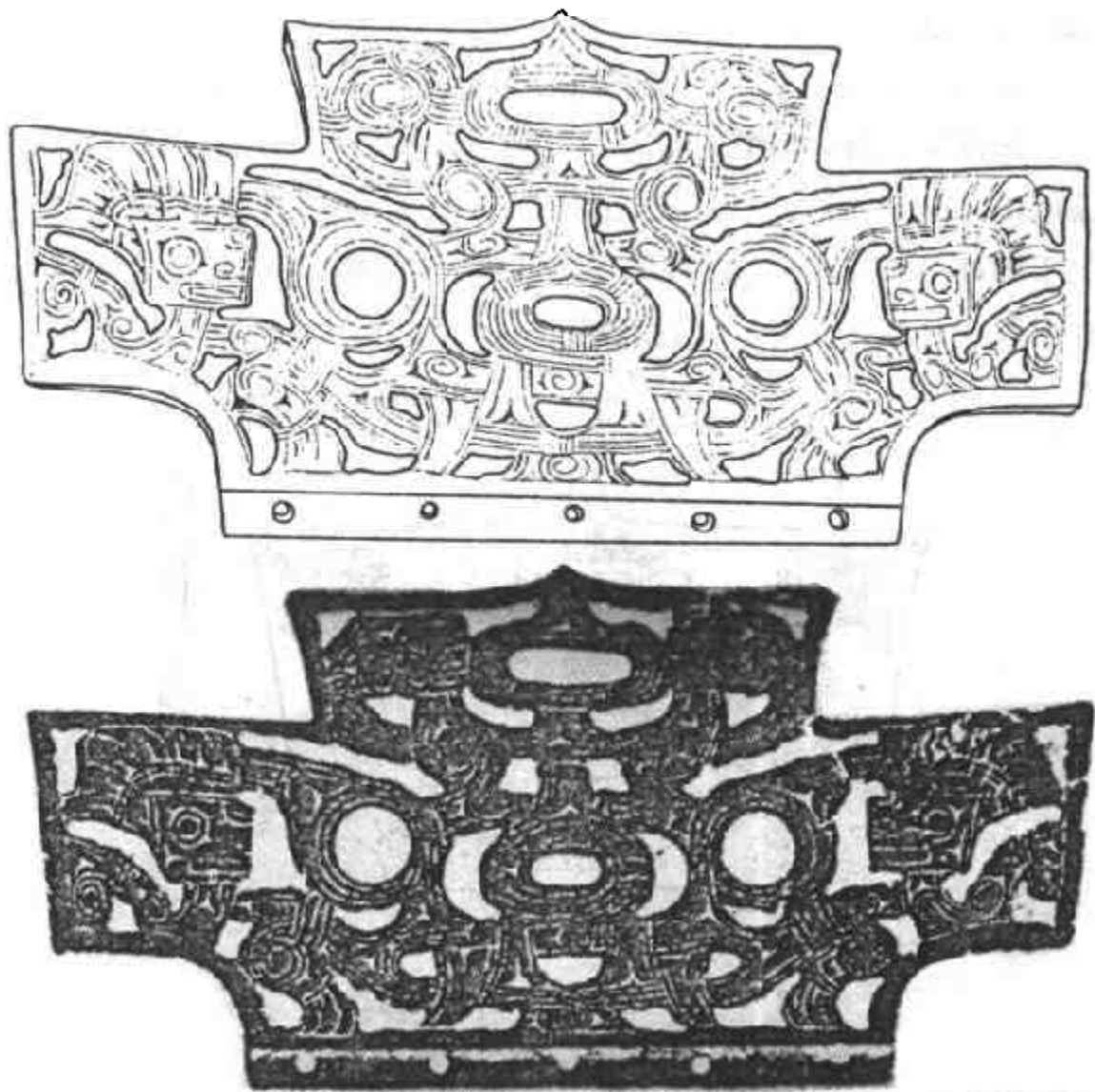


图7-15 (反山M16:4)龙身缠绕的冠状器纹饰  
上:示意图 下:拓片

阴线雕刻相结合的技法，雕琢宗神图像；中间顶上有羽冠轮廓，下部有巨嘴獠牙，其余皆为盘曲缭绕的龙身；左右两侧各有羽冠人面，颈部以下也是盘曲缭绕的龙身，与中间的龙身缠绕相连（图7-15）。反山15号墓出土的另一件透雕冠状器（M15:7），通高3.9、上宽6.8、下宽6.2、厚0.3厘米。中部刻羽冠、人面，颈部以下全是盘曲连卷的龙身；左右侧还有几只鸟首，鸟嘴朝上，鸟首以下也是盘曲连卷的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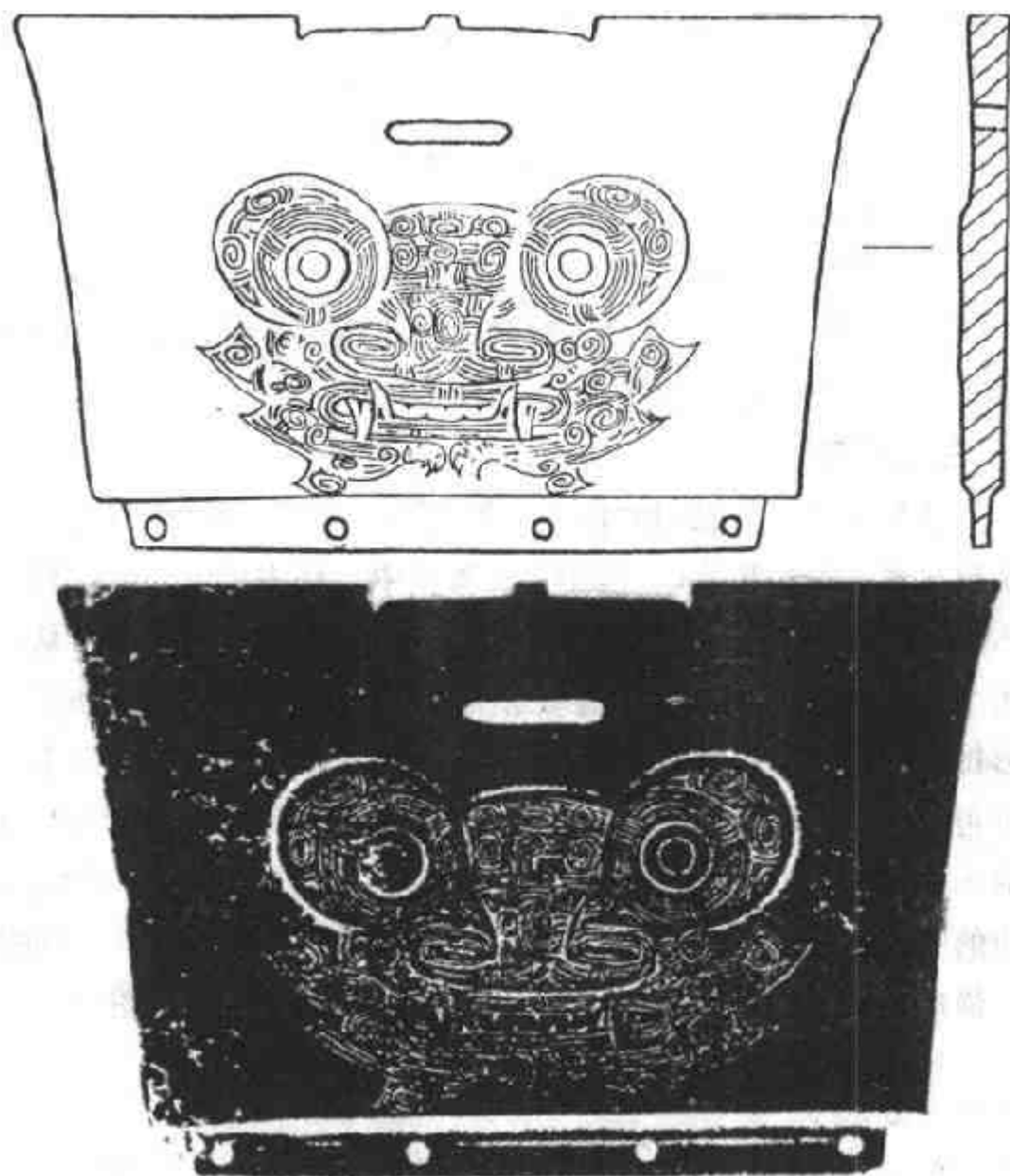


图7-16（反山M17:8）冠状器纹饰  
上：示意图 下：拓片

身,与中部的龙身缠绕相连。这两件透雕的冠状器,为良渚文化宗神是龙身提供了绝佳的物证。

反山 17 号墓出土的一件(M17:8),上宽 9.15、下宽 7.5、高 6、厚 0.35 厘米。正面雕琢简化的宗神图案,宗神无脸部和上肢,仅有阴纹细刻的蹲踞状的下肢和爪;兽面纹为图案主体,双眼夸张极大,眼、鼻部为浅浮雕,阔嘴和牙齿为阴纹细刻。各部位均刻满卷云纹、弧线、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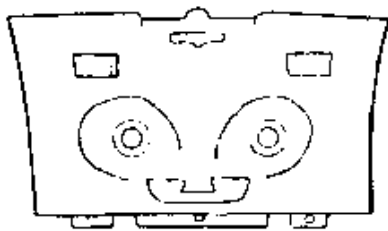


图 7-17 笄庙出土的  
冠状器背面纹饰

直线(图 7-16)。背面光素。1976 年江苏江宁笄庙出土一件,整体器形无殊,但有两处不同,一是下端扁棒分为三段,二短一长;二是背面眼睑上方各有一块凸出的扁方块,并钻有贯孔,似为插羽毛之用。纹饰简朴,正背

两面各刻浅浮雕的简化兽面纹,以桥形凸面相连,以凸横档象征宽鼻(图 7-17)。

#### (六) 三叉形冠饰

以往仅见于传世品,称“山字形器”、“山形器”。发掘品目前只见于余杭一地。反山出土 5 件,出自五座墓中。瑶山出土 6 件,出自南列六座男性墓中。近年,余杭汇观山 4 号墓、横山 1 号墓与 2 号墓,也有出土,都是每墓 1 件<sup>①</sup>。出土位置都相当于死者头顶,都与成组的锥形饰相邻或叠压。该器上部是三个并列的枝叉,中间的枝叉中空,上下可贯通,常和一枝长玉管相接,应是插在冠冕上的重要饰物。反山的 5 件,3 件素面,2 件刻纹。瑶山的 6 件,2 件素面,4 件刻纹。汇观山的 1 件素面。横山 1 号墓的 1 件破残严重,仅存一叉及一块底弧边。横山 2 号墓的 1 件有刻纹。上述 7 件刻纹,皆刻宗神图像。

<sup>①</sup>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与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7 年第 7 期;陆文宝:《余杭横山良渚文化墓葬刍议》,《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三叉形冠饰象征山,即象征天的实体部分。在《山海经》、《楚辞》、《淮南子》里,高山是天的根据地。日月行空,每天都要回到山里,好比渔舟要返回港湾。所有的“帝”、“神”都住在山上,“帝都”都建在山上。在上古时代,人们还不会把理想寄托于渺茫的天空,而是寄托于天空中的山。那里是日月、云彩的家乡,是以上帝为首的祖先神灵居住的地方,是自己似乎可以亲眼看到的乐园。因此,象征山的三叉形冠饰,工艺精致,考古出土仅见于余杭一地,是良渚文化最稀贵的玉器之一,大概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穿戴。“冠上饰山字形玉器,似有‘唯天在上’之意。”<sup>①</sup>

瑶山7号墓出土的一件(M7:26),高4.8、宽8.5、厚0.8厘米。左右二叉各刻侧面相向的宗神头像一个。中叉上端饰五组直向羽状纹,象征正视的宗神头部。下端以阴线刻兽面图案。共有三个宗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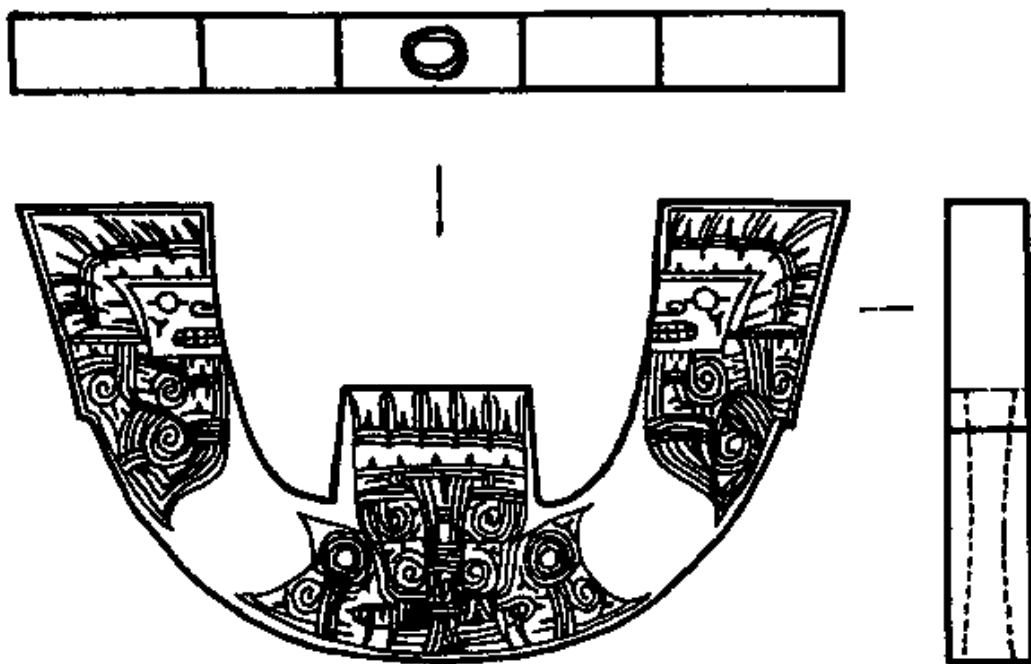


图7-18 (瑶山 M7:26)三叉形冠饰纹饰

① 董楚平:《良渚文化不祭天,玉璧像天也像地——兼释D形器与山字形器》,《中国文物世界》第141期。

图案,都是以局部代表整体(图7-18)。瑶山10号墓出土的一件(M10:6),高5.2、宽7.4、厚1.3厘米。三叉各刻三组羽状纹,象征宗神的头部。下部用浅浮雕和阴线刻纹相结合的技法琢出兽面图案,嘴有四枚獠牙(图7-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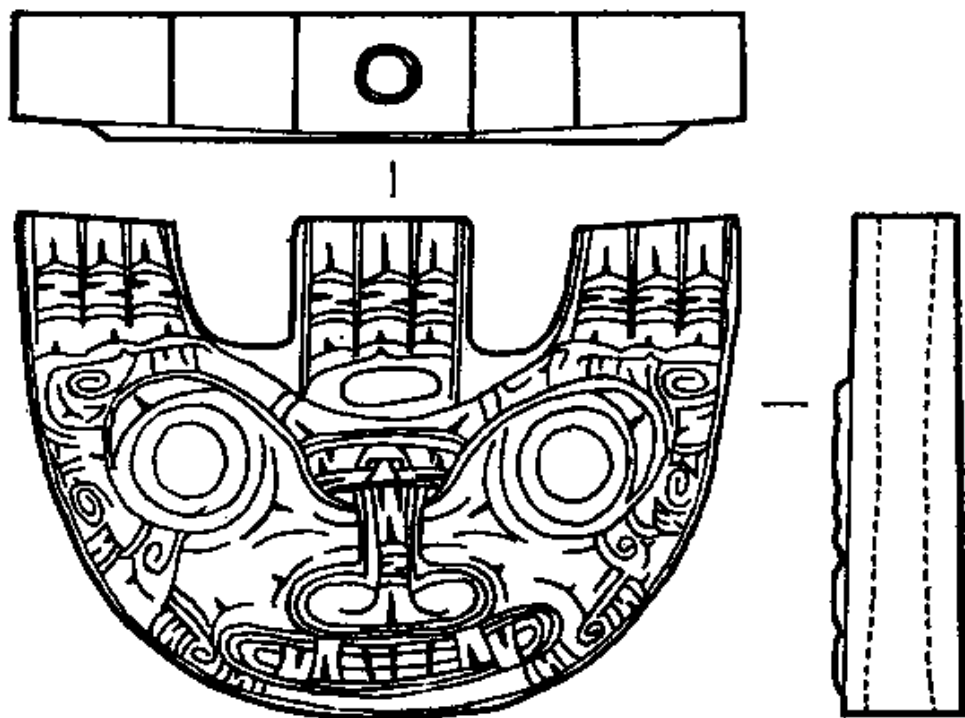


图7-19 (瑶山M10:6)三叉形冠饰纹饰

反山14号墓出土的一件(M14:135),通高3.65、宽5.9厘米。正面正中阴线细刻一简化的宗神图案,图案最上端为冠顶外缘,象征宗神的头部。冠顶下刻大眼兽面,下端为一双鸟爪。左右二叉各刻一只神鸟。背面三叉的上端和器体下端正中部位均有凸块,凸块上皆钻有上下贯通的圆孔,用以固定在他物上。四个凸块也用阴线雕刻两只圆眼和卷云纹等繁细纹饰。此件刻纹繁细,肉眼极难辨认,是良渚文化玉器的精品(图7-20)。

#### (七) 半圆形冠饰

过去仅见传世品,因形似英文字母D,故又称D形器。它是良渚文化最稀贵的玉器之一,考古出土目前仅见于反山第12、14、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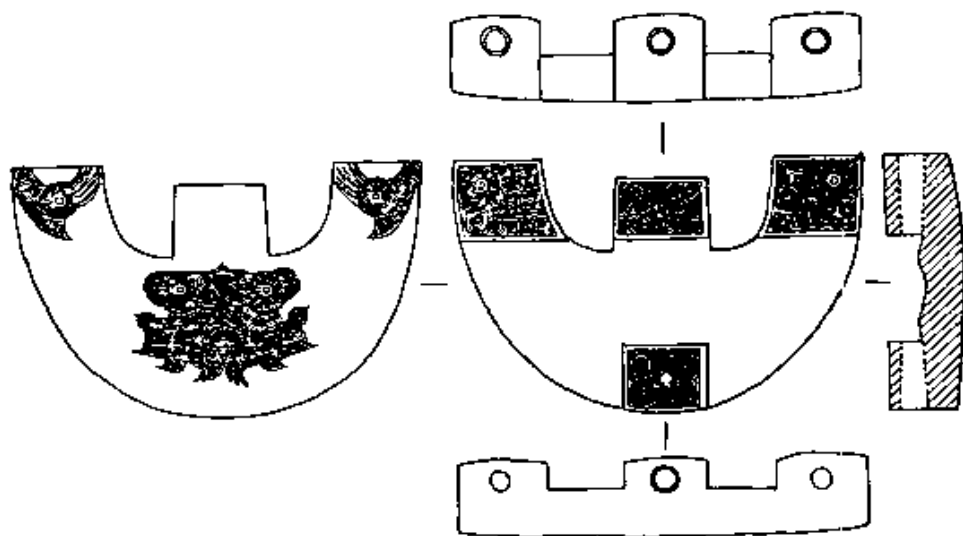


图 7-20 (反山 M14:135)三叉形冠饰纹饰

左:正面;右:背面

号墓以及瑶山第 12 号墓,共五个墓例,每墓 1 套,每套 4 件。同套的 4 件,大小、玉料皆同。反山的 4 套,出土位置都在“头骨的上方,以大致相等的间距围成一圈。器如半圆,底边平直”。背面“斜向对钻出一至三对隧孔,可穿缀在冠帽上”<sup>①</sup>。瑶山 12 号墓经盗挖,出土情况不明,器形与反山所出者相同,背面隧孔有四对。底宽 7.5、高 3.8、厚 0.6 厘米。这五套半圆形冠饰,唯反山 12 号墓出土的一套有纹饰,正面刻简化神像,底宽 5.8、高 3.5、厚 0.3 厘米。

反山 12 号墓与瑶山 12 号墓的墓主,是目前所知身份最高的统治者,有些学者称他们是“君王级”<sup>②</sup> 人物。半圆形器置于头骨上方,作为冠饰,当可肯定。“君王”的冠饰,自非等闲之物。其器形可能象征原始盖天说的宇宙纵剖面,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缩影。每套四件围在冠帽周围,就成为主体的宇宙图。该器“正面微弧凸,半圆边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 年第 1 期,第 22 页。

② 陆建方:《良渚文化墓葬研究》,《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中心 1996 年版,第 199 页。

缘略薄,背面相应内弧凹”<sup>①</sup>。人头圆形,冠帽也必圆形,再配上“正面微弧凸”的半圆形冠饰,不就成为圆拱形的宇宙周边图吗?如果这个假设没错,说明良渚文化的宇宙观是天地俱圆的盖天说,即半球形的天穹覆盖在周边圆形的大地上。少数那些制作较精、象征天穹的玉璧,是天的横剖面,半圆形冠饰是天的纵剖面。玉璧没有刻过宗神图像及其简化标志。考古出土的5套半圆形冠饰,只有反山12号墓的一套刻有宗神简化图案。宇宙纵剖面包括天地之间,天地间有昆仑等神山相连,那是神的居所,所以象征宇宙纵剖面的半圆形冠饰偶有宗神刻纹。

除上述器类外,还有圆牌饰、三角形牌饰、柱形器、带盖柱形器、玉镯、锥形器等。器形、器类多种多样,不变的是母题纹饰,都刻有宗神或其简化标志,真是“万变不离其宗”。宗神是良渚文化的至上神,当无可疑。宗神龙身,有反山两件冠状器为证。

#### 四、良渚文化玉器的材料与雕刻方法

按照现代矿物学定义,软玉和硬玉称为真玉,其他彩石称为广义的玉石。软玉又称角闪玉,主要成分是硅酸钙镁,显微结构是透闪石、阳起石组成的纤维状致密块体,质地坚韧,比重2.96至3.17,硬度5.5至6.5度。硬玉又称辉石玉,俗称翡翠,主要成分是硅酸钠铝,显微结构是微粒状致密块体,质地坚硬,比重3.2至3.33,硬度6.5至7度。据科学鉴定,良渚文化玉器基本上是软玉,呈晶莹润泽的湖绿色或黄绿色,有的带有红褐色斑块。这些玉器在地下埋藏四五千年,大多因受沁蚀而在质地和色泽上发生变化,器表往往失去原有半透明的润泽感,只有福泉山玉器群中,保存了一批没有受到太多沁蚀的

<sup>①</sup> 《文物》1988年第1期,第22页。



玉器,其他各地的出土玉器皆有不同程度的沁蚀。由于受沁程度不同,呈褪色的黄绿色、褐红色、鸡骨白直至灰白,色调皆匀称、和谐、光亮。受沁后成分没有变化,但硬度降到5度以下,比重降至2.5—2。吴越地区软玉矿藏颇丰,史前先民制作玉器皆就地取材。

中国史前有两大玉器中心,一是辽河流域,二是太湖流域。山东大汶口文化的玉器也较发达,但晚于辽河流域与太湖流域,从器类、纹饰考察,是在接受南北玉器文化影响后才发展起来的,不像辽河流域与太湖流域的玉器那样具有鲜明的土著性。辽河流域的玉器,取材于当地的岫岩玉,岫岩玉是一种似玉的矿物。太湖流域玉器取材于当地的透闪玉,与商、周以来我国传统的玉料相一致。

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条件下,精致的良渚文化玉器以及其他史前玉器,是怎样雕琢出来的?《诗经·小雅·鹤鸣》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1979年南京博物院考古人员在寺墩一号墓的一块玉璧上,发现有一层砂粒,经鉴定是花岗岩风化壳粗砂粒,主要成分有钾长石、钠长石、石英和黑云母等,其中石英硬度为7度,大于制作璧、琮的玉料硬度。这种砂粒称“解玉砂”。“以解玉砂和水作为加工工具和玉料之间的介质,反复不断地成千上万次地磋磨、碾琢,以柔克刚,经过切锯、作坯、钻孔、刻纹等工序制成玉器”<sup>①</sup>。制作玉器的主要技术是钻孔和刻纹。据南京博物院汪遵国研究,其具体方法如下:“在钻孔方面,用木棒、竹管、细石器加砂(石英砂)蘸水不断在玉料上旋转磋碾而成。璧、琮、镯等大件玉器的大孔是用竹管从两头对钻而成,……珠、管、坠一类小件玉器的小孔,是用燧石(硬度7度)打制成的细石器(石钻、尖状器),同样也要加细砂蘸水两面对钻而成。这种燧石在江苏丹徒磨盘墩发掘时,在良渚文化地层中出土了几百件,我们用来在玉料上做钻孔实验得到了预想的结果。张陵山出土透雕玉黼上的

<sup>①</sup> 汪遵国:《考古发现的良渚文化玉器》,《东南文化》1994年第6期,第139页。

镂空纹饰则是先以燧石钻对钻出圆孔,再以丝麻的纤维或兽类的筋毛穿入孔内向三个不同方向搓磨、切割而成。”

“在刻纹方面,细如发丝的阴刻线纹,其工具应为装柄加固的燧石打制成的石钻、尖状器、雕刻器和鲨鱼牙齿。徒手用燧石钻在和田白玉上作刻纹试验,留下了清晰的阴刻线纹。鲨鱼牙齿在福泉山六十号墓、反山二十号墓各出土一枚,在瑶山七号墓出土四枚,说明良渚人已掌握鲨鱼的习性,能够制服鲨鱼,以其坚硬锐利的牙齿作为刻玉工具。我们徒手用鲨鱼牙齿在玻璃(硬度7度)上刻划同样留下了清晰的线纹。”<sup>①</sup>

---

① 汪遵国:《考古发现的良渚文化玉器》,《东南文化》1994年第6期,第139—140页。

## 第八章 丝织、陶瓷与冶金

---

### 第一节 世界丝织发源地

---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唯一能养蚕织丝的国家。

河姆渡第四层出土陶纺轮 70 余件,木纺轮 1 件;第三层一件用象牙雕成的盅形器外壁,上部刻着一周很规则的编织纹,下部一周刻着多条蚕形图像,有的蚕似在昂首吐丝。将编织纹与蚕形图像刻在一起,颇可发人深思。根据孢粉分析,在罗家角遗址第三层,即马家浜文化的早期地层中出有桑属花粉<sup>①</sup>,在上海崧泽文化遗址中桑树花粉数量很多<sup>②</sup>,这或许可作当时人们已经种桑养蚕的旁证。太湖流域养蚕织丝的直接物证出现于良渚文化地层。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出有绢片、丝带和丝线<sup>③</sup>,距今 4750 年左右。经鉴定,原料均为家蚕丝。绢片的经纬密度为每平方厘米 47—48 根,是先缫后织的。茧丝纤度偏

---

① 王开发等:《浙江罗家角遗址的孢粉研究》,《考古》1985 年第 12 期。

② 《崧泽遗址的孢粉研究》,《考古学报》1980 年第 1 期。

③ 《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 年第 2 期。

细,要增加经纬纱数以达到织物的密度<sup>①</sup>。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丝织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丝织品。其他原料的纺织品物证年代更早。

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第十层发现三块属于马家浜文化早期的炭化了的织物残片,经鉴定,原料是野生葛麻纤维<sup>②</sup>。这三块织物织成山字形和菱形斜纹,织物的密度是,经密每厘米约10根,纬密每厘米罗纹部约26—28根、地部13—14根,纺织技术较高,表明当时可能已使用原始织机。钱山漾遗址也出有平纹麻布残片,经纬密度为每平方厘米16—24根,最密的是经线31根,纬线20根,其缜密程度可与现代的细麻布相媲美。

1985年,浙江省博物馆新入藏一件越王者旨於赐剑,剑柄上缠着丝织品。丝织品有两种:(1)丝带。已呈黑色,带宽约2毫米,仍富有弹性,松散地绕着整个剑柄,共绕40圈左右。以剑柄平均直径为1.5厘米计,丝带长度约为190厘米。丝带用四根股线编成,与现在的四股辫编法完全一致,编得非常平挺。(2)绢。裹在剑柄顶端宽约2.5厘米处,绢的上面再绕着丝带。此绢所用之丝线极细而平滑,用普通放大镜已不能看清其组织结构,用高倍放大镜才可发现它是平纹纺织的绢,是用极为纤细的蚕丝制成。“从后文献如《吴都赋》、《永嘉郡记》等载‘乡贡八蚕之绵’或称‘八辈蚕’来看,越国一带所饲养的蚕品种一般为多化性蚕,蚕体小,单丝细,因此缫得的丝较匀,织出的丝织品较轻薄,这已成为江南丝绸生产的传统风格”<sup>③</sup>。此绢的组织结构如下:中纬线相对较粗,非常平直,密度约为25根/厘米;经线很细,“密度为60根/厘米,卷曲包缠在纬线之上,形成明显的畦纹效

① 《钱山漾残绢片出土的启示》,《文物》1980年第1期。

② 《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

③ 赵丰,《浙江省博物馆新入藏越王者旨於赐剑笔谈》,《文物》1996年第4期,第11页。

果。由此可推测在织制过程中使用腰部控制经丝张力和打纬刀打纬，其织机类型应与杭州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出土的良渚织机相似，属于“一种原始腰机”。<sup>①</sup>

将越王剑上的绢、丝带，与钱山漾出土的绢片、丝带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其工艺是一脉相承的。这说明它们都是本地产品。不同的只是，钱山漾的绢片稍为粗疏，经密在 47—48 根左右/厘米，越王剑上的绢，经密有 60 根。

---

## 第二节 陶 器

---

陶器是人类最早利用火力烧制的器皿，是人类最早的科技产品之一，是人类开始过定居生活的标志。就制陶原料言，远古时代烧制的陶器可分为两类，一是纯粹以粘土作坯的泥质陶，二是在粘土内掺入一定比例的砂粒、蚌末以及植物炭屑等作坯的夹砂陶、夹炭陶。粘土中加入羸和料，是早期陶器的特点，是制陶术不成熟的标志，原因是当时烧制温度欠高，欠稳，目的是为了增加陶胎耐受急热、急冷的能力，防止坯件干燥过程的破裂和用作炊具时崩裂。

吴越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陶片，距今约一万年左右。1977 年，在江苏省溧水白马回峰山的神仙洞中，发现一块长 2.5 厘米、宽 1.8 厘米、厚 0.5 厘米的泥质红褐色陶片，质地疏松，可知其火候较低。神仙洞遗址的碳-14 测定年代为距今 1 万年左右<sup>②</sup>。六十年代初期，地处鄱阳湖以东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下层，出有饰粗绳纹的夹粗砂

---

① 赵丰：《浙江省博物馆新入藏越王者旨於赐剑笔谈》，《文物》1996 年第 4 期，第 11、12 页。

② 蒋赞初：《关于秦淮河流域古代文化的一些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

陶片<sup>①</sup>,陶胎中属和的砂粒最大径超过陶胎的厚度。仙人洞遗址下层估计距今约 9000 年左右。<sup>②</sup>

迄今发现的吴越地区最早的可复原的陶器,见于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与余姚河姆渡遗址。

罗家角遗址有四层,皆属马家浜文化。第四、三层称下层,属马家浜文化早期;第二、一层称上层,属马家浜文化晚期。陶器是罗家角遗址的主要遗物。“陶质以夹砂夹蚌陶为主。第四、三层有少量夹炭陶,这种夹炭陶在显微镜下可辨认出不少稻壳的碎屑;第二、一层有少量泥质陶。制法采用泥条圈筑法,有些大器如釜似用分段接成。制作尚规整,以圜底器、平底器为主,有少量圈足器和三足器。有腰沿、耳、盩、把手等附件。……陶器的烧成温度不高,多数在 800—850℃左右”<sup>③</sup>。陶色不匀,总趋势是从灰红色、黑灰色向灰白色演变。各层陶片的陶色比例如下表:

百分比 地层	陶色			
	灰红色	红色	黑灰色	灰白色
第四层	49.65	13.65	36.47	0.24
第三层	52.6	29.26	16.18	1.87
第二层	43.82	30.60	13.32	12.25
第一层	10.86	27.35	10.74	51.05

各层中均出有少量的陶豆残片。灰黄或灰白色的胎,火候较高,器壁厚薄匀称,制作规整,器表有白色陶衣。这些白陶,经理化测试,发现其胎泥并非瓷土或高岭土,而是一种氧化镁含量很高、在显微镜

① 江西省文管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12期。

② 彭适凡:《江西先秦考古》,江西高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

③ 罗家角考古队:《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

下呈现羊毛状结构的特殊陶土<sup>①</sup>,可作为罗家角遗址制陶工艺最高水平的代表。

陶器种类繁多,以供生活用的炊器、盛贮器、食器为主,有少量生产工具、装饰品和陶塑玩具。器型有釜、罐、盆、盘、钵、盂、豆、鼎、匜、壶、碗、篦圈架、器盖、支座、网坠、纺轮、陶拍和弹丸等。几乎涉及当时人生活的所有方面。其中,釜是罗家角遗址陶器中的主要器种,占陶器总数的66.9%。其中,腰沿釜逐层增多,到第一层时,在各种釜的比例中高达70%以上。腰沿釜是马家浜文化的典型器物。

河姆渡遗址出土大量夹炭黑陶。夹炭陶在罗家角也有少量发现,也见于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在河姆渡第四层则属陶系之大宗。夹炭陶的主要原料是炭化的稻草、谷壳,方法是先把稻草、谷壳等植物废料烧成炭屑,然后拌入陶土。陶土夹炭只能在烧成温度较低的时候才有积极作用,一当陶器的烧成温度增高到足以使胎坯中植物炭屑全部烧成灰烬的时候,它们将失去原有的作用,反而使陶质松懈。砂子耐热,不受烧成温度影响,始终能增强陶器的坚固性。河姆渡第四层的夹炭陶占该层陶片总数的78%,夹砂黑陶次之,占22%。从下层到上层,夹炭黑陶明显递减,而夹砂陶依次增多,是河姆渡遗址四个文化层陶系演变的主趋势。到第二层和第一层时,陶器有了明显进步,泥质陶占有一定的比例,按不同的用途分别选用夹砂陶和泥质陶。炊器多用耐高温、质地硬的夹砂陶,盛贮器和食器多用泥质陶。陶器表面呈现出红、灰、黑等不同的色泽。尤其是第一文化层,烧成温度已提高到950—1000℃。

釜是河姆渡四个文化层的主要炊器,在第四层中是独占性的炊器,釜下配三个支座,可能是后来鼎的雏形。第三层始见甑。为夹炭灰陶,口微敞,下附半环耳一对,斜腹平底,甑孔密集。高12.4、口径

<sup>①</sup> 张福康,《罗家角陶片的初步研究》,《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

24、孔径 0.8—1 厘米。甑是蒸具,它利用蒸汽热能使食物熟化,这在远古时代,是饮食文化的一大进步。第二层始见鼎,且占有一定数量,但多残破。可复原的鼎有盆形鼎和釜形鼎各 1 件。盆形鼎为夹砂黑陶,口径 17.8 厘米、高 11.8 厘米、腹径 18.6 厘米,束颈,折肩浅腹,肩饰弦纹,小平底,足呈扁锥形。釜形鼎为夹砂灰陶,口径 33 厘米、高 31 厘米、腹径 32.5 厘米;敞口,束颈,扁圆腹,上施弦纹、斜线纹构成的装饰带,附加堆纹一道,圜底,圆柱形足略内收,外侧上部饰有三浅圆窝。到第一层,鼎增多,以夹砂红鼎为主,鼎足形式丰富多采,主要有鱼鳍形、三角形、凿形、扁平形、圆柱形和扁锥形等。鱼鳍形和三角形鼎足是良渚文化丁字形鼎足的前身。

吴县草鞋山遗址第九层与第八层发现马家浜文化的墓葬 106 座,共出土 5 件夹砂红陶鼎,是在釜形器下加三个圆柱足或宽扁形足。罗家角第二、一层也发现少量圆锥形和圆柱形的鼎足,未见完整器。到崧泽文化时期,鼎的数量增加很快,开始取代釜的主要地位。到良渚文化时期,鼎几乎成为独占性炊器。后来,鼎是夏商周主要礼器。

在罗家角等马家浜文化的陶器中,陶土中除了麝和砂粒之外,有的还麝和蚌末。蚌末虽比植物炭屑的耐火度高,但是蚌末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碳酸钙经烧制变成氧化钙,氧化钙容易溶化于水。继马家浜文化之后是崧泽文化。崧泽文化陶器的空隙率甚高,这些空隙间残留着白色物质,似为粗颗粒蚌末在酸性土壤中腐蚀溶化的残余。到良渚文化时期,蚌末的缺点似已被人们认识,砂粒成为唯一的麝和料。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砂灰褐陶、泥质灰陶,泥质灰胎黑陶为主。器表以素面为主,磨光陶较多,流行弦纹、镂孔装饰。制陶工艺以轮制为主,圈足器、三足器较发达。磨光黑陶最能代表良渚文化的陶器工艺水平。良渚文化的黑陶用熏烟渗炭法使陶器呈现黑色。如果属打磨发亮就成为磨光黑陶。

到了马桥文化时期,吴越地区出现了新的陶系,那就是几何形印



纹陶。把几何形花纹刻在木拍上,用拍子拍印器表,留下纹痕,这种装饰方法,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末期开始出现于南方一些地方。拍印的陶器,有硬陶和软陶。我们常说的几何印纹陶,主要指硬陶。

我国的几何印纹陶有从南到北的传播趋势。福建、江西、广东在相当于中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出现几何印纹陶。当时,宁绍平原、太湖地区与宁镇地区都未见几何印纹陶。但是,当良渚文化衰落以后,即相当于中原的夏商之际,几何印纹陶突然“乘虚而入”,很快成为上述地区各文化遗址的主要陶系之一。浙江的几何印纹陶最早出现在接近闽赣的西南地区。接着就顺之江北上,到达钱塘江流域和太湖平原。宁镇地区的几何印纹陶比太湖地区发达得晚。

几何印纹硬陶与良渚文化诸陶系相比,不论在制法、造型、纹饰等方面,都无继承关系,这是外来的新陶系。几何印纹硬陶传到长江下游以后,人们又在烧制几何印纹硬陶的过程中发明了原始瓷器,这种原始瓷器被夏鼐等考古学家称为“吴越青瓷”。<sup>①</sup>

---

### 第三节 原始瓷器

---

全世界各地各民族在进入新石器时代前后,都普遍学会烧制陶器,而瓷器则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能够生产瓷器的国家。

陶器与瓷器都是粘土制品。陶器以陶土为原料,用较低温度(900℃左右)烧成,器表不施釉。瓷器以瓷土为原料,用较高温度烧成,器表施釉。这两类制品在中国文献中统称为“瓦器”。《说文》:

---

<sup>①</sup> 《沔西发掘报告》附录二;周仁等著《张家坡西周居住遗址陶瓷碎片的研究》及“夏鼐按”。

“瓦，土器已烧之总名。”这种粘土制作工艺，《周礼·考工记》称之为“抔埴之工”。埴是粘土，抔是用于揉聚，“抔埴”是把粘土捏制成器的意思。《考工记》又说：“抔埴之工二。……抔埴之工：陶、瓶。……陶人为甗，……盆，……甑，……鬲，……；瓶人为簋，……豆，……。”“豆”是中原人殉葬的唯一原始瓷器，古无“瓷”字，“瓶”应该是古瓷字。由此看来，自古陶、瓷有别。

一般陶器以易熔粘土(陶土)为胎料，这种粘土含有大量熔剂，烧成温度一般只能在900℃左右，最高不得超过1000℃，否则就会变形，甚至熔融。而瓷器的胎料是一种特殊的粘土——高岭土(即瓷土)，这是一种含熔剂较少的粘土，可烧到1200℃以上而不会变形或熔融。胎料不同是陶与瓷的根本区别。印纹硬陶的胎质原料与原始瓷器基本相同，因此烧成温度比一般陶器高，约在1050℃至1200℃左右，接近原始瓷器的烧成温度(1250℃)。有的已达到烧结程度，吸水性低，击之有和原始青瓷类似的声音。由于印纹硬陶的胎质与温度接近原始瓷器，因此它们从商代到战国，始终存在同窑共烧的现象。例如，在南京北阴阳营遗址的湖熟文化下层，有兼烧印纹硬陶与原始青瓷的直焰窑。这种窑容积很小，较为原始，却能烧制出1100℃左右的硬陶与原始瓷<sup>①</sup>。到春秋战国时期，浙江绍兴富盛、萧山进化区的茅湾里、唐子山和马面山等处的数十座较为进步的、半倒焰窑的窑场遗址，发现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也在一个窑中烧制<sup>②</sup>。原因是它们的胎质、温度相近，从而成为同胞产品。

李家治《我国古代陶器和瓷器工艺过程发展的研究》一文<sup>③</sup>，对大量陶器、原始瓷器及瓷器等陶瓷标本的胎质化学组成，进行分析研

① 《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② 《浙江绍兴富盛战国窑址》，《考古》1979年第3期；《浙江萧山进化区古代窑址的发现》，《考古通讯》1957年第2期。

③ 载《考古》1978年第3期。

究,将它们计算成分子式,然后制成历代陶瓷胎质化学组成分布图。在这个图中,陶器的组成点多集中于图的上方;瓷器的组成点多集中于图的左下角;原始瓷器的组成点多集中在图的中部逐渐向左下角移动,与瓷器的组成点混杂在一起,形成一个过渡带,然后移到左下角形成一个瓷器组成点的集中带;而印纹硬陶的组成点,则多和原始瓷器的组成点混杂在一起。由此可见,印纹硬陶、原始瓷器和瓷器之间存在着源流关系。

由于印纹硬陶在胎质与温度方面接近原始瓷器,它们是同胞产品,因此在相当于中原商代时期,吴越地区同时出现大量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原始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多为黄绿色或青灰色的石灰釉,烧成后器表多呈青色或青绿色,以青绿色为最多,故又称原始青瓷。吴越地区的原始青瓷,被夏鼐等考古学家称为原始的“吴越青瓷”。夏鼐又说:“原始瓷(Proto-Porcelain,即加釉硬陶)的烧造,……当为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发明,……,原始瓷后来在长江下游地区逐渐改善,终于在汉末出现了瓷器,成为中国文明的特点之一。”<sup>①</sup> 这里所说的“南方长江下游地区”即吴越地区。

1984年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在上虞百官镇西南的李家山清理了六座印纹陶窑址。其中有五座都呈倾斜的长条形,尾部未设挡火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龙窑。从其烧制的各类印纹陶的纹饰分析,这五座龙窑的年代“应定为商朝”。“商代龙窑尚属首次发现,它不但提前了龙窑的出现年代,同时为研究龙窑的历史、结构和发展演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sup>②</sup>。商代龙窑的出现,为烧制原始瓷器提供了温度条件。南方原始瓷器发达,应与龙窑出现较早有关。

①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85年第8期。

② 《浙江上虞县商代印纹陶窑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11期。烧制印纹陶与原始瓷器的窑灶,有圆窑与龙窑(长形)两种,龙窑较先进。

西周时期,南方的原始青瓷进入鼎盛期,数量猛增,分布区域很广,胎质更趋细腻,釉层普遍增厚,器类以小型的原始瓷豆为主。这种原始瓷豆在中原的西周遗址中也有出土,但数量很少,而在南方则几乎遍及整个长江中下游流域和东南沿海的边远地区。南方生产的原始青瓷还远输西北。陕西张家坡出土的原始青瓷,经化学分析,其二氧化硅含量相当高,而三氧化二铝含量则为中等,这“与‘北方青瓷’有很大差别,相反却与原始的‘吴越青瓷’非常接近”,因而被认为是吴越地区烧造的<sup>①</sup>。浙江西南的金衢盆地及其附近一带,可能是西周时期南方原始青瓷的重点生产区。例如,1983年发掘的衢州西山西周早期土墩墓,出土的陶瓷器17件,其中,原始瓷器13件。这批原始瓷的年代虽属西周早期,但胎骨致密,手制轮修相当熟练,釉面均匀,装饰工艺也比较细致,整个制作水平较高。再如1981年发掘的义乌平畴一座西周晚期土墩墓,出土随葬品114件,其中,原始青瓷竟有100件,数量之多,为全国所未见<sup>②</sup>。“衢州西山大石塔出土一组器物,原始青瓷28件,陶器仅1件”<sup>③</sup>。江山南区“第六单元”大约相当于中原的西周后期,出土印纹硬陶2件,原始瓷21件,这两个姐妹产品总揽了出土器物。其中,原始瓷占91.3%。而且该地区出土的原始青瓷与南方各地同时期产品相比,无论胎质、造型、釉色,皆称上乘。<sup>④</sup>

从西周晚期开始至春秋战国时期,原始瓷器的生产优势逐渐北移,太湖、杭州湾一带,逐渐成为生产原始青瓷的最发达地区。地处新安江沿岸的淳安县右口小塘坞,于1979年清理了五座西周晚期至春

① 《沔西发掘报告》附录二:周仁等著《张家坡西周居住遗址陶瓷碎片的研究》及“夏鼐按”。

② 《浙江义乌县平畴西周墓》,《考古》1985年第7期。

③ 《浙江衢州西山西周土墩墓》,《考古》1984年第7期。

④ 牟永抗、毛兆廷:《江山南区古文化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

秋早期的土墩墓,出土随葬器物 44 件,“以原始青瓷器占绝大多数”。<sup>①</sup>

1976 年,浙江德清新市镇东北“皇坟堆”,发现一批原始青瓷器,共 27 件,排列有序,似为一个墓葬的随葬品。除原始青瓷之外,别无其他器物,其单一程度为别处所罕见。簋、卣、尊等都仿铜器形制,而不见一件铜器。此墓“年代的上限”可“定在西周”,“下限定在春秋时期”。

太湖地区的石室土墩,出土物的 80—90% 是原始青瓷与印纹硬陶,前者又比后者更多一些。

宁镇地区周代土墩墓也普遍出有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器,但它们合计数在全部陶瓷器中所占的比例,一般都不到一半,其中,原始瓷器一般在 1/5 左右。长江北岸的仪六地区,原始瓷器所占比例更小。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宁镇地区原为淮夷文化区,虽受越文化的强大影响,但与茅山以东的太湖地区、杭州湾以及浙西南的金衢盆地等传统的越文化区相比,毕竟有所不同。

吴越地区已发现的东周窑址不少,以绍兴、萧山一带最为密集。绍兴富盛乡和萧山进化区共发现窑址 20 多处,每个窑址的范围都比较大。

富盛长竹园窑址,现存面积为南北长 200 米,东西宽 40 米。在窑址的南部已暴露出南北并列的窑床遗迹两处,每处都有上下相压的龙窑五条,而且从遗物的分布情况分析,近旁应该还有窑床。这说明当时窑的建造是密集的,并且都是龙窑,装烧量较大,产量高。

这时期,除龙窑外,更为进步的半倒焰窑的窑场遗址,也在萧山进化区的茅湾里、唐子山和马面山等处出现<sup>②</sup>。

① 《浙江淳安右口土墩墓》,《文物》1987 年第 5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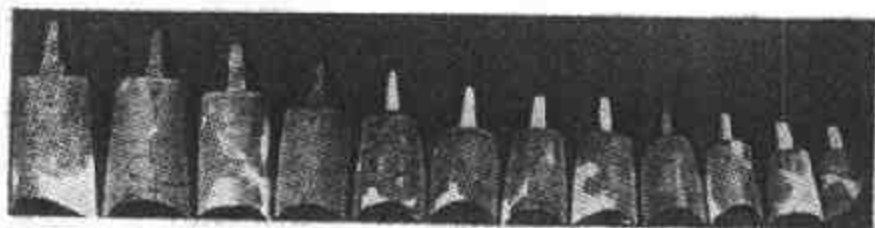
② 蒋赞初:《关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几何印纹陶问题》,《文物集刊》第 3 辑,第 59 页。

绍兴富盛乡、萧山进化区,距越都很近,这里的陶瓷业规模大而集中,很可能是越国的官营手工业,是吴越地区陶瓷生产的重要基地。

春秋晚期特别是战国早中期,吴越地区的原始青瓷,不仅数量多,产地广,而且器类繁多,几乎遍及生活的各个领域,除大量的碗、钵、盅、罐等实用器外,还有专门烧制作冥器用的仿铜器形制的鼎、尊、卣、簋等,甚至有瓷质句罐编钟、铎于等乐器。



1 原始瓷甬钟



2 原始瓷句罐

图 8-1 浙江海盐黄家山出土的原始瓷乐器

1983年,浙江省海盐长川坝乡黄家山出土一批编套的原始瓷乐器。内有甬钟 13 件,最大者通高 43.2 厘米;句罐 12 件(图 8-1),最大者通高 44.9 厘米;铃(或称权)11 件;以及泥质灰陶的纽钟 3 件、磬 4 件。还有泥质灰陶的羊角状器 14 件,底部呈喇叭形,上部为尖状圆柱,形似羊角。据挖掘者说,出土时左右扶持于甬钟篆间,可能是乐器附件。除乐器外,同出的原始瓷器还有鼎 5 件、罐 1 件、碗 1 件,印纹硬陶器 11 件。黄家山遗存是一座战国时代的墓葬<sup>①</sup>。浙江省鄞县、

<sup>①</sup> 《浙江海盐出土原始瓷乐器》,《文物》1985 年第 8 期。

德清等地也曾出土过原始瓷甬钟。

1984年,余杭崇贤三座战国墓出土一批仿青铜器的原始瓷器,计有甬钟4件,权形器6件,钺盃2件,盖鼎3件,双耳鉴3件,兽面3件,甗形鼎4件,双螭鼎1件,竖耳鼎2件,附耳鼎3件,匜2件,罍2件,洗1件等。<sup>①</sup>

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茅山两侧的原始瓷器质量普遍较高。胎质更为细腻,铁和钛的含量较低,绝大多数器皿由原来的泥条盘筑改为轮制,因而器形规整,胎壁减薄,厚薄均匀,外施青釉,已经接近瓷器。只是限于当时的工艺水平,原料的淘洗与坯泥的炼制还不够精细,烧结程度一般还不够高,胎骨的白度与透明度也不如后世的瓷器,所以,一般称它为“原始瓷器”。原始瓷器已具备瓷器的基本条件,春秋战国的“吴越青瓷”已接近瓷器。

镇江市博物馆曾于1972年将溧水柘塘蔡家山墓葬出土的两片春秋时期原始瓷请江苏宜兴陶瓷研究所进行化验,发现成分和其他地方出土的原始瓷化验的结果基本相同,胎质属于高岭土,类似后代的瓷器。1975年10月,他们又将一片原始瓷和一片六朝青瓷请镇江瓷厂作了烧成试验,两瓷片放在一起以还原气氛试烧,温度1300—1320℃。结果,两瓷片都膨胀,断面呈淡棕色,有气孔,釉面都很光亮。该厂估计两瓷片原烧成温度相近,大约为1240—1260℃左右<sup>②</sup>。绍兴富盛的原始青瓷器与上虞小仙坛的东汉青瓷片相比,化学组成几乎完全一样<sup>③</sup>。瓷器生产本来应该是指日可待的,但是战国晚期,越都附近的原始瓷器生产突然中断,这应与楚国败越有关。因此,江浙一带的原始青瓷生产,并不是按一般规律,由

① 沈德祥:《浙江省余杭崇贤战国墓》,《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

② 刘兴:《镇江地区出土的原始青瓷》,《文物》1979年第3期。

③ 李家治:《我国古代陶器和瓷器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考古》1978年第3期。

商周一直不断地向前发展提高，最后演变成为青瓷；而是在战国时期由于战争原因，曾经有一段中断时间，到战国末年与秦汉之际，人们又烧制一种从成型、装饰到胎、釉的工艺都与前有别的原始瓷，尔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重新向前发展，终于在东汉时烧制成真正的瓷器。

---

## 第四节 冶 金

---

### 一、青 铜 器

吴越地区的青铜文化起步较晚，在相当于中原商代的时候，才出现青铜器。

宁镇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是湖熟文化。湖熟文化层叠压在新石器文化层之上，出有小刀、鱼钩、镞、凿、斧等工具。在南京北阴阳营遗址的湖熟文化层中，出有一件陶钵，内壁粘着一层铜液，说明这钵是炼铜用具，当地能生产青铜器。

太湖地区与钱塘江、新安江流域的早期青铜文化是马桥文化。上海马桥遗址出有刀、凿、镞等小件青铜器，但未发现铸铜工具。1957年在淳安进贤遗址的清理中，发现刀等小件青铜器和几何印纹陶伴出，应属马桥文化。1983年底，对嘉兴雀幕桥遗址进行新的发掘时，在其上层发现铜渣。<sup>①</sup>

在宁镇地区及其邻近的浙江长兴、湖州一带，出有一些年代约当商代、富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兵器。1975年江苏句容葛村出土一件青铜钺，钺身有一大圆孔（图8-2）。这件铜钺形制与中原铜钺迥异，而

---

<sup>①</sup>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年），文物出版社，第108页。



“和吴江梅堰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石钺完全相仿”。<sup>①</sup>形制类同的铜钺，在浙江也出有两件。1977年长兴县长城杨桥出土一件青铜钺，钺身布满叶脉纹与斜方格纹(图8-3)。1974年湖州市废旧物资公司金属仓库拣到一件铜钺，“除了钺身有凸缘透孔外，其形制与此是一脉相承的”。<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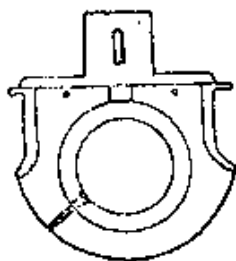


图8-2 句容出土的早期铜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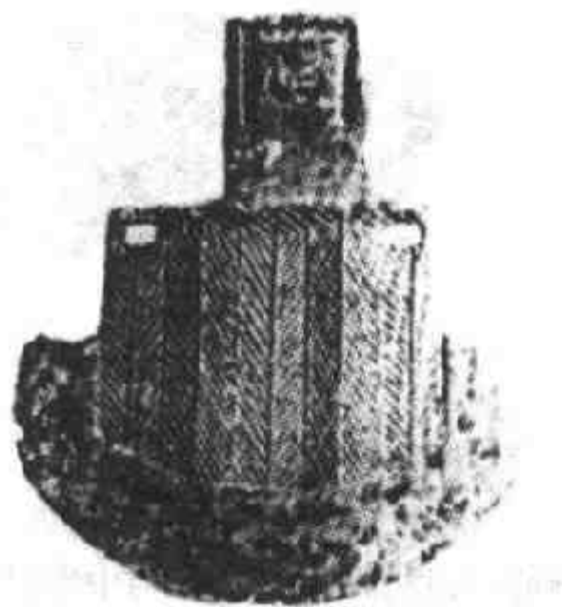


图8-3 长兴出土的早期铜钺

过去，湖州市袁家汇疏浚河道时发现三件铜戈，也有早期特征：“直内有阑，内端微凹。其援部，一件刃如钺，中有圆孔；一件三面有刃而前刃弧出；另一件呈三角形，前鋒尖锐。三件戈的内端及阑部均饰云雷纹，其中一件援部饰有斜方格纹，同于长兴出土的钺。尤其是前二件戈，形体介于戈、钺之间”<sup>③</sup>(图8-4)。这三件戈，形制与中原戈完全不同，内和阑部所饰云雷纹、斜方格纹，具有浙江商代印纹陶纹

① 萧梦龙：《试论吴越青铜兵器》，《国际百越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

② ③ 曹锦炎：《浙江出土商周青铜器初论》，《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第10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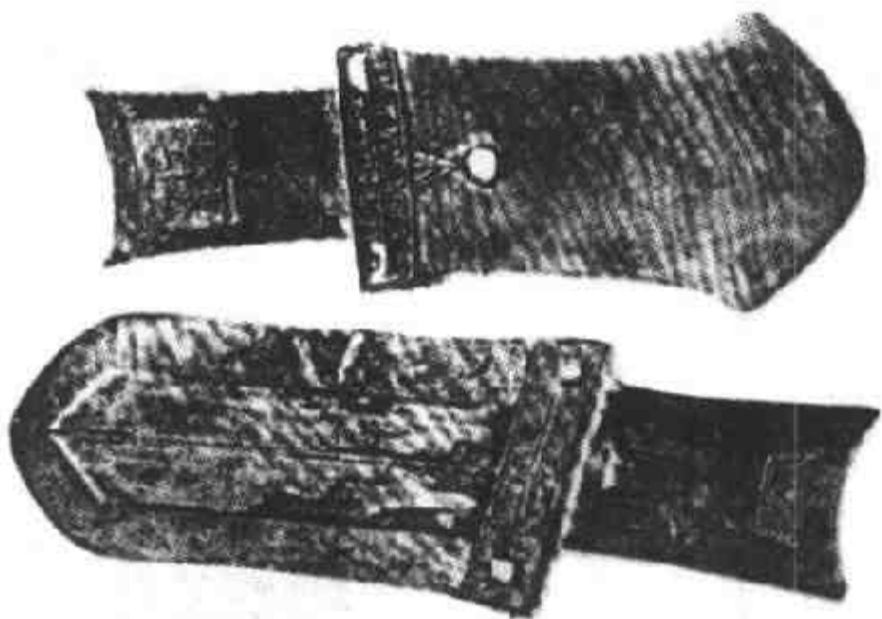


图 8-4 湖州出土的早期直内戈

饰特征,当为商代之物。

这些青铜兵器很有地方特色,由当地石兵器演变而来。而商代江浙的青铜礼器,却基本上与中原相同。

西周初年,康王封中原的“虞侯矢”于“宜”(吴)，“虞侯矢”也就变成了“宜侯矢”。宜侯矢即《史记·吴太伯世家》的叔达,来到江南后,从中原带来《宜侯矢簋》以及其他一些中原铜器,促进宁镇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宁镇地区的贵族大墓普遍出有成批的青铜礼器、车马器及兵器。在这些铜器中,属中原制造的只是少数,绝大多数是当地制造。例如1982年发掘的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墓,共出土铜器数百件,有鼎、鬲、斝、尊、卣、壶等礼器。这批青铜器绝大多数在质地、形制和纹饰上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应为本地制造。只有一件有铭文的双鸟耳方座斝,即《白伯斝》,是中原铸造。

在周代吴越青铜礼器中,地方特色最稳定、延续时间最长的,首推“越式鼎”。这种形制的铜鼎,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战国,成为吴越青铜礼器的标准器。早在西周初期的宜侯矢墓(烟墩山1号墓),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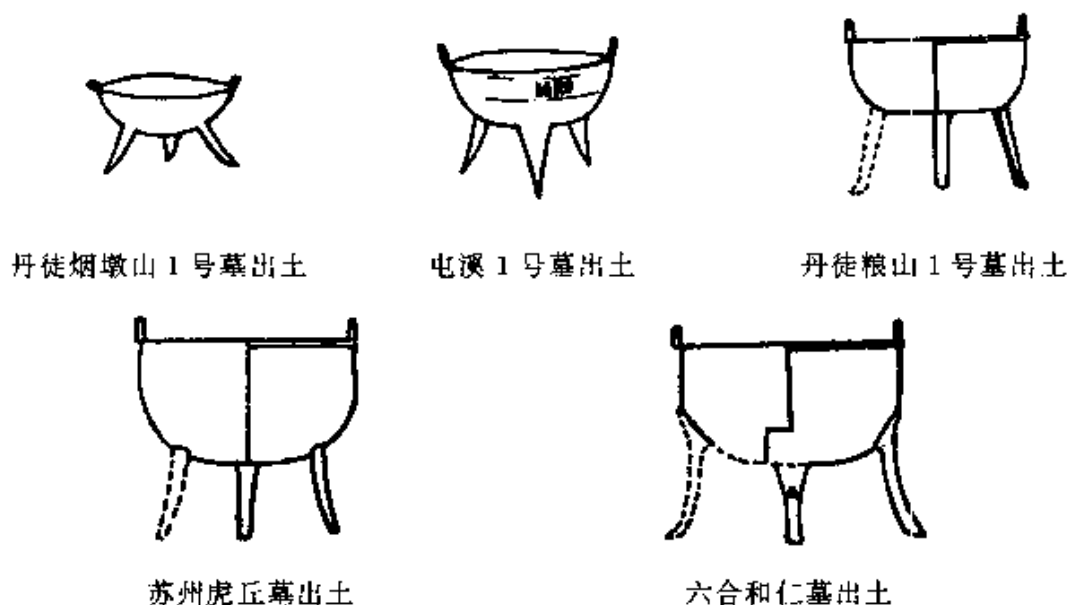


图 8-5 越式鼎

出有浅腹撇足的越式鼎(图 8-5)。以后遍见于太湖流域、皖南地区。越式鼎的主要特征是撇足,它是仿照当地陶鼎制造的,为中原所不见。春秋以后,随着越国称霸,越式鼎扩散到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百越之地,“越式鼎”的名称可能因此而来。其次是宽体尊,从西周后期延续到战国前期,出土量也较大,形体矮胖,与中原瘦长的铜尊明显不同(图 8-6)。句鑿是吴越特有乐器,已出土不少。青铜鸠杖也是吴越地区特有礼器,丹徒北山顶余味墓出土一件,包括杖首和杖墩,木杖已朽(图 8-7)。1990 年,绍兴漓渚中庄坝头也出土一件青铜鸠杖的杖首和杖墩。1969 年湖州棣溪出土春秋时期的铜徽。吴越地区常出单件奇特的青铜礼器。例如,武进奄城的双虬三轮盘(图 8-8),绍兴 306 号墓出土的铜屋模型(图 8-9)。鄞县甲村出土一件铜钺<sup>①</sup>,钺身上有“羽人划船纹”(图 8-10),这是西南地区早期铜鼓的常见纹饰。从钺的形制特点及伴出的器物来看,其时代早于铜鼓出现的年代。吴越的青铜文化对百越地区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① 曹锦炎、周生望:《浙江鄞县出土春秋时代铜器》,《考古》1984 年第 8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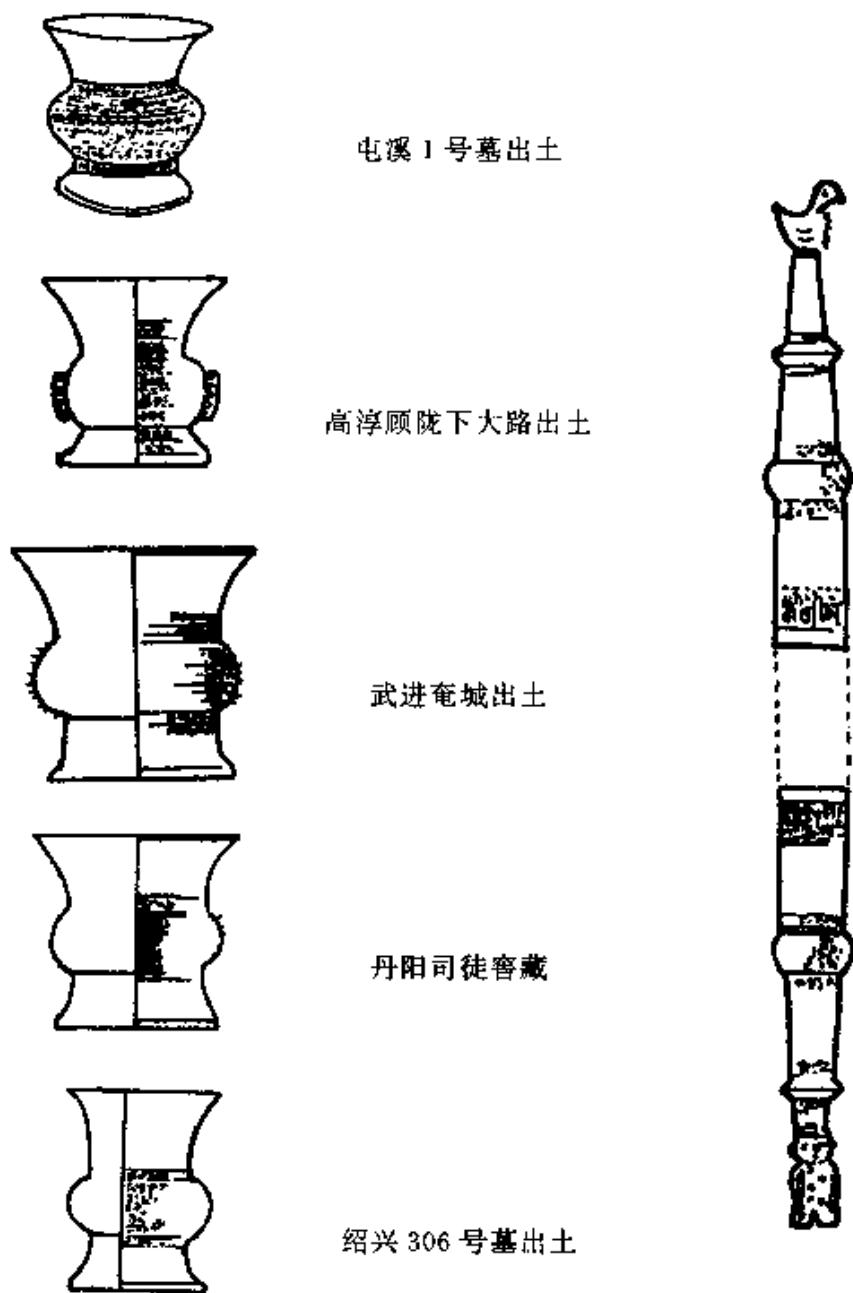


图 8-6 宽体尊

图 8-7 鸠杖，  
丹徒北山顶出土

最能代表吴越青铜文化水平的自然是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的吴越兵器，尤其是剑。本书第四章第二节统计，吴国具铭青铜器共 81 件，其中，兵器有 32 件。在 32 件兵器中，剑 18 件，戈 11 件，矛 2 件，戟 1 件。本书第五章第二节统计，越国具铭铜器共 72 件，其中，兵器有 50 件。在 50 件兵器中，剑 40 件，矛 7 件，戈 3 件。吴越两国的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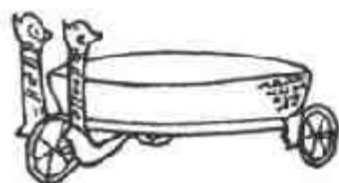


图 8-8 双虬三轮盘，  
武进奄城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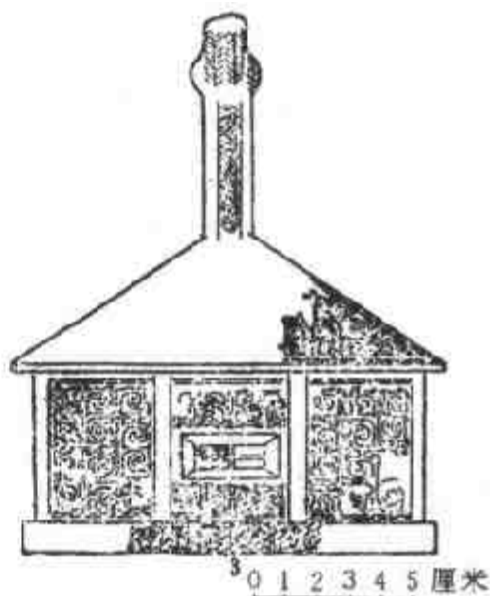


图 8-9 铜屋北壁，  
绍兴 306 号墓出土



图 8-10 “羽人划船纹”青铜钺，鄞县出土

铭兵器在具铭铜器总数中所占比例如此之高，为别国罕见。吴越兵器不但数量特多，而且工艺水平特高，为别国无法比肩。

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吴越的剑较以前增宽加长。长度一般在 55—60 厘米。剑体加长后，需要增强韧度，而韧度增强会降低硬度（锋利）。为了兼顾韧度与硬度，吴越匠师首创嵌铸剑，亦称复合剑、双

色剑。即剑脊与剑刃(两从)分开浇铸。剑脊的锡少于两从(锋锷)的锡。剑脊锡少则韧性好,不易折断;锋锷锡多则硬性好,比较锋利。剑脊与两从先分铸,然后合成,故称“复合剑”。由于剑脊与两从成分不同;颜色也明显有异,故称“双色剑”。台北“古越阁”近年入藏的“余邗工利”铸制的“越王州句剑”,即为典型的双色剑,其中脊与两从的颜色区别界线分明。1977年,复旦大学静电加速器实验室等单位,利用质子X荧光非真空分析,对越王勾践剑进行无损的测定,得知该剑各部位由铜、锡、铅、铁、硫、砷诸元素组成,各部位诸元素含量不同<sup>①</sup>,详见下表:

越王勾践剑各部位元素成分检测表

分析部位	元素成分(%)					
	Cu (铜)	Sn (锡)	Pb (铅)	Fe (铁)	S (硫)	As (砷)
剑 冈	80.3	18.8	0.4	0.4		微量
黄 花 纹	83.1	15.2	0.8	0.8		微量
黑 花 纹	73.9	22.8	1.4	1.8	微量	微量
黑花纹特黑处	68.2	29.1	0.9	1.2	0.5	微量
剑 格 边 缘	57.3	29.6	8.7	3.4	0.9	微量
剑 格 正 中	41.5	42.6	6.1	3.7	5.9	微量

从上表可知,剑脊含铜较多,韧性好,不易折断,刃部含锡较多,硬度高,使剑锋利。

吴越的剑、戈、矛、戟,表面常呈菱形、米字形及火焰状几何暗纹,也为别国所未见,其工艺原理至今还是个谜。目前对这些花纹作过现

<sup>①</sup> 复旦大学静电加速器实验室、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活化分析组、北京钢铁学院《中国冶金史》编写组:《越王剑的质子X荧光非真空分析》,《复旦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9年第11期。

代化技术测验,得出的说法不同。例如上海博物馆运用化学分析和X光衍射分析,认为兵器的基体是锡青铜,花纹是锡、铜、铁的合金,采用复合金属工艺铸成<sup>①</sup>。而复旦大学等单位对越王勾践剑测定结果,认为剑身花纹是经过硫化处理的缘故<sup>②</sup>,可起防腐作用。

《越绝书》专门为吴越铸剑辟一卷,题目叫《越绝外传记宝剑》,把吴越的铸剑工艺描写得神乎其神:“当造此剑(指名剑“纯钩”——引者注)之时,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雨师扫洒,雷公击橐;蛟龙捧炉,天帝装炭;太一下观,天精下之。欧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技巧,造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卢;二曰纯钩;三曰胜邪;四曰鱼肠;五曰巨阙。”

《淮南子·修务训》说:“夫纯钩、鱼肠之始型也,击则不能断,刺则不能入,及加之砥砺,磨其锋,则水断龙舟,陆刳光甲。”这段带有夸张性的描写告诉我们,著名的越剑从模子里浇铸出来时,这只是“始型”,不是成型。再经过“砥砺”、“磨”等加工手续,才能使它坚固锋利。王学理对秦俑坑青铜兵器作过详细的考察研究,指出:“秦剑、戈的内部组织结构严密,无气泡的存在,表层的硬度高于内部,这除了掌握纯熟的冶铸技术外,还必定经过加热锻打以清除内应力,使分子结合紧密,组织细化,表面整洁,再经平锉、平铲、平磨,打击毛刺和粗糙的表皮。”吴越青铜兵器铸成“始型”之后,除了要经过“砥砺”、“磨”外,也应该要经过锻打。

1991年11月,绍兴县东南约14公里的上灶乡在昌烽村整治古若耶溪时,先后于河床深处出土一批青铜器。其中,剑1件、削2件、斧1件,均系半成品,即“始型”。剑通长65.9厘米,茎长9厘米,剑身

① 陈佩芬:《古代铜兵铜镜的成分及有关铸造技术》,《上海博物馆馆刊》第1期。

② 《越王剑的质子X荧光非真空分析》,《复旦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9年第11期。

后端最宽处 4.2 厘米。剑身中脊起棱。剖面呈“◇”形。斜从而宽，脊与从分界明显，前锋收狭，较钝，有淬火蓝痕。茎上留有两处毛刺。茎首交界处有衔接痕。色青黄，素面，较粗糙。未见使用痕迹，可以窥见其浇铸后的原貌。剑的“脊棱是用含锡量较低的铜料铸成，色泽黄亮，像一条茎竖穿剑身。从刃、锋等部位则用含锡量较高的铜料铸成，色泽青灰”<sup>①</sup>。这把剑还只是“始型”，上引《越绝书》说“欧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技巧”。一个“乃”字说明，“悉其技巧”是铸成“始型”以后的加工工艺。这种手艺的高超，竟用“天之精神”来形容。这是因为这种工艺的微妙处，是只可手会，不可言传的。即只能靠匠师通过长期实践而达到得心应手的地步，而很难用语言把它具体表达出来。吴越青铜兵器不但表现了冶炼水平的高超，也表现了吴越工匠手艺技巧的神妙，它是科技与艺术的结晶。

中原青铜器精于礼器，吴越青铜器精于兵器；中原青铜器总的数量比吴越多，吴越的青铜兵器与青铜工具在青铜器中的比例比中原高得多。这是因为中原注重礼制，吴越注重耕战实际。吴越青铜工具，以农具为大宗，本书上编第六章第二节已说过，不赘。总之，拥有精良的青铜兵器与众多的青铜农具，是吴越青铜文化的两大特色。

## 二、冶铁业

从目前的实物发现来看，吴国至迟在春秋晚期已能炼铁、锻铁。

1964 年，江苏六合程桥 1 号东周墓出土铁丸一件，锈蚀十分严重，器表已成氧化铁，只有中部尚留少量纯铁。<sup>②</sup>

① 周燕儿：《试述绍兴新出土的越国青铜器》，《东南文化》1995 年第 2 期，第 28 页。

② 《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考古》1965 年第 3 期。



1972年,江苏六合程桥2号东周墓也出土一件铁器,虽然两端残损,未知用途,但作铁条状,肯定是经过锻制的铁器。<sup>①</sup>

这两座墓的年代大约属春秋末期。“经过金相检查表明,铁丸是白口生铁铸成,是目前鉴定过的最早的生铁,这比欧洲出现生铁的时间要早一千九百多年。二号墓的铁条是由块炼铁锻成的。两件铁器说明生铁与块炼铁在我国可能是同时发明的”。<sup>②</sup>

1983年,位于南京市长江北岸的江浦蒋城子遗址第四期(春秋后期至战国初年)文化层出有铁器13件,包括铁甬8件,铁镢2件,铁条1件,铁块2件。<sup>③</sup>

1983年9月至12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人员,对江苏吴县五峰山及其相邻的借尼山上的24座春秋时期的土墩石室进行发掘,出有“铁器二件”。<sup>④</sup>

1958年3月,绍兴西施山出土铁镰、铁锄、铁镢、铁削等工具<sup>⑤</sup>。绍兴“县区上灶出土过铁斧。……在铁镰刀刃部也铸有细锯齿,具有吴越文化的特色”。<sup>⑥</sup>

1963年8月,浙江温州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收集到的永嘉出土的一批青铜器中,夹有一件铁甬。这批器物的年代为春秋末至战国时期。<sup>⑦</sup>

《越绝书》卷十一《记宝剑》,既记铜剑,又记铁剑,亦铁亦铜,铜铁不分。由于《越绝书》成书于东汉,因此论者往往认为《越绝书》是以东

① 《江苏六合程桥二号东周墓》,《考古》1974年第2期。

② 《江苏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203页。

③ 《江苏江浦蒋城子遗址》,《东南文化》1990年第1、2期合刊,第237—238页。

④ 邹厚本:《吴县五峰山石室土墩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年)。

⑤ 沈作霖:《绍兴出土的春秋战国文物》,《考古》1979年第5期。

⑥ 沈作霖:《古代越国的农耕工具》,《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⑦ 徐定水:《浙江永嘉出土的一批青铜器简介》,《文物》1980年第8期。

汉之铁剑混同先秦之铜剑。但是,从长江北岸到瓯江之滨,都出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铁制工具,既然有铁工具,必然有铁兵器。最近,台北“古越阁”主人王振华,公布了他收藏的“越州<sub>4</sub>”铁剑铜格,证明吴越地区至少在盲姑时期(前 458—前 449 年)已有铁剑。

# 第九章 神话、艺术与文学

---

## 第一节 有关鸟的神话与艺术

---

### 一、河姆渡文化的鸟日(月)同体神话与艺术

距今 7000 年的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出有两件举世闻名的艺术



品,一件是象牙板,刻着两只相向而飞的神鸟,两个鸟首之间的下部是五个大小相套的同心圆,外圆边刻有烈焰,应为太阳(图 9-1)。另

一件是骨匕,刻两组相同的鸟纹图案(图 9-2),每组都以一圆居中,右边一圆刻有四射的光芒,应为太阳;左边一圆较小,且未刻光芒,似为月亮。两圆左右分别刻一对背向



图 9-2 河姆渡出土的骨匕刻纹

站立的神鸟。这两件艺术品有两点相同之处：

- (1) 都是两鸟对称,或相向(象牙板刻纹),或背向(骨匕刻纹);
- (2) 太阳或月亮都与鸟体相连,不在鸟体之外。

上述第二点,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因此对这两件艺术品的解释常不符合刻纹的实际。图9-1常被称为“双鸟朝阳”,但据刻纹所示,双鸟不仅面朝太阳,而且身躯与太阳连在一起,可以看作是双鸟拥抱太阳,也可以看作是双鸟与太阳同体。图9-2常被称为“双头鸟”,或“连体鸟”。称“双头鸟”最不妥当,因为据刻纹所示,每组图案,不仅有两个鸟头,而且有两个鸟身与两双鸟爪。两个鸟身通过中间的日(月)连为一体。称“连体鸟”只反映双鸟连体,忽略了双鸟与日(月)连体。而双鸟中间的日(月)才是图案的主题所在,因此图9-2应称为“双鸟与太阳(或月亮)同体图”。根据图9-2所示,我们可以推断图9-1也应该是双鸟与太阳同体,而不是拥抱太阳。

这两件艺术品具有相同的艺术构思,这种艺术构思应与当时流行的神话有关,决不是随意所刻。

中国古代文献有金乌载日、鸟日同体同命的神话。例如《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楚辞·天问》说:“羿焉弹日? 乌焉解羽? ……天式纵横,阳离爰死; 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sup>①</sup>(意译:“后羿怎么样射下九日? 金乌的羽毛散落哪里? ……自然的法则矛盾交替,阳气一离开生命就停息; 太阳里的金鸟多么肥大,为什么也会被后羿射毙?”)<sup>②</sup>《天问》里的“乌”、“大鸟”,与“日”、“阳”同体同命,是河姆渡鸟日同体图的绝妙注脚。

① 鸣原作“鸣”,据姜亮夫校作“鸣”,鸟肥大貌。见姜著《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21页。

② 董楚平:《楚辞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2、99页。

日月没有翅膀,而能在天空运行。原始人的直觉思维,使他们想象日月依靠飞鸟载行,甚至想象日月与飞鸟同体,是很自然的,河姆渡的两件艺术品,都把鸟与日月刻成连体关系,而且两鸟左右对称,像是日月的两翼。这比后世的神话可能更为神奇、瑰丽,可惜具体细则已不得而知。<sup>①</sup>

河姆渡遗址还出有其他鸟形刻纹与鸟形器,河姆渡人的鸟神崇拜颇为强烈。

## 二、良渚文化关于鸟的神话与艺术

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鸟神崇拜更为明显。

1986年余杭反山第12号墓出土的“琮王”,凹面上刻有良渚文化宗神的完整形象8个(上编第七章图7-5、图7-6),同墓出土的玉钺也刻有一个完整的宗神神像(上编第七章图7-4)。基本完整的神像还见于反山、瑶山其他一些玉质礼器上。宗神头戴羽冠,羽冠象征鸟首。宗神的脚为鸟爪。鸟头鸟爪,表示宗神是鸟的化身,良渚人是鸟生民族,或称“卵生民族”。《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燕)是商族的图腾,已有定论。良渚人崇拜的是什么鸟,目前还无确切证据,后世的吴越人则特别崇鸕(详见下文)。

反山“琮王”除了凹面上刻有宗神全身像外,其凸面也与一般玉琮一样,刻有小眼人面纹与大眼兽面纹,还在8个大眼兽面纹的两边,各刻一只神鸟,共有神鸟16只。1982年上海福泉山出土的一件良渚文化玉琮,其小眼人面纹与大眼兽面纹两边,都刻有神鸟,也有神鸟16只。反山出土的钺、璜、三叉形冠饰等玉器,瑶山出土的倒梯形玉冠状器,也刻有这种神鸟(上编第七章图7-4、图7-9、图

<sup>①</sup> 董楚平:《河姆渡双鸟与日(月)同体刻纹》,《故宫文物月刊》总134期,1994年5月。

7-14、图7-20)。上述良渚文化玉质礼器上的神鸟刻纹,有两个共同的特点:(1)它们都与宗神图像或宗神的简化标志共处于一件玉器上,不单独存在。(2)它们的形象皆非写实,而是采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变形的式样虽然不尽相同,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鸟身皆由一两个或好几个大小相套的圆圈构成。似乎有个圆形的东西与鸟同体,鸟在拉着这个圆形的东西飞行。联系河姆渡的鸟日同体图与中国古文献关于鸟日同命的神话,这个圆形的东西应该就是太阳。这种构图寓意,以反山“琮王”(第七章图7-5)、瑶山M2:1冠状玉器(第七章图7-14)、福泉山玉琮(第七章图7-7)的神鸟形象最为明显。这些与太阳同体的鸟,当然居于天上,它们与宗神同在,表示宗神居于天上,是良渚人的上帝。

良渚文化遗址出了一些玉鸟,这些玉鸟应该也是神鸟,但形象是平实的(图9-3)。下文所述刻在璧、琮层台图案上的侧面立鸟,也是神鸟,它们的表现手法也是写实的,其形象与自然界所见的鸟毫无区别。与这些形象平实的神鸟相比较,上述与宗神同在的神鸟,其形象的异样,就显得更为明显。可见它们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鸟,它们亦鸟亦日,鸟日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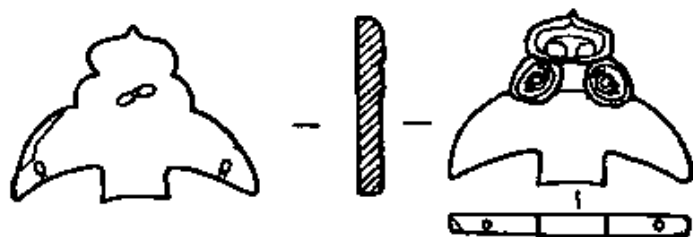


图9-3 瑶山出土的玉鸟

从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这些与太阳同体的神鸟,可称为“太阳鸟”。鸟日同体的神话,不但源远流长,而且流长。在四川新繁清白乡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发展成为鸟、日、人三位一体(图9-4):人首、鸟肢、日身。以日为身,与良渚文化“太阳鸟”的构思相同。对于这种鸟日同体神



图 9-4 东汉画像砖,四川新繁出土

话,后世文献及现代学者都称为“金乌载日”、“神鸟负日”。所谓“载”、“负”,都是文明人的理性思维。原始人的想象力属“野性思维”,他们的思路障碍较少,自由得多,往往比文明人跑得更远。河姆渡的象牙、骨匕刻纹,良渚文化宗神旁边的神鸟形象,东汉画像砖所刻的人首、日身、鸟肢之神,画面上明明是鸟日同体,我们为什么非要按自己的“合理”解释,把太阳从鸟体中分割出来,让鸟来“负”、来“载”呢?

美国弗里尔博物馆藏有三件大玉璧,每件都刻有鸟纹(图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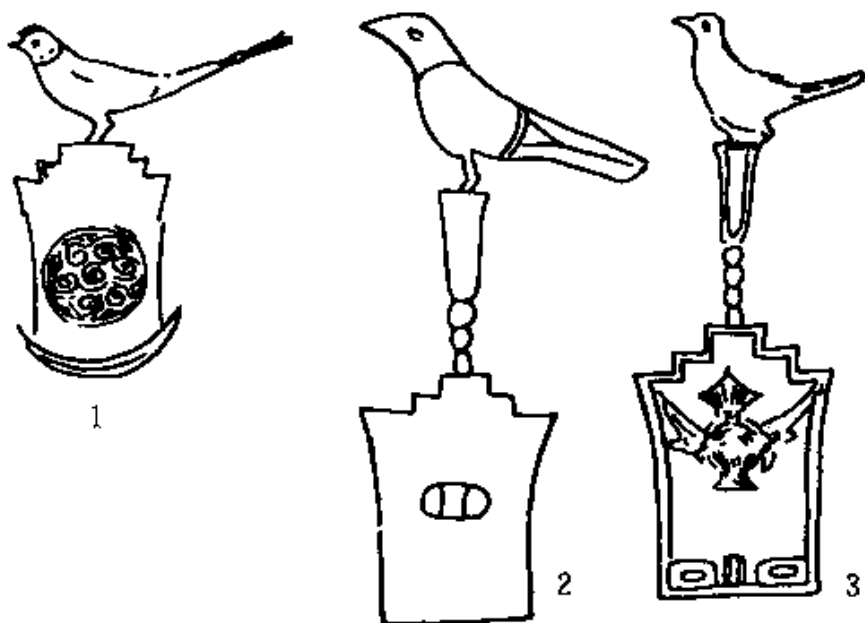


图 9-5 弗里尔三件玉璧刻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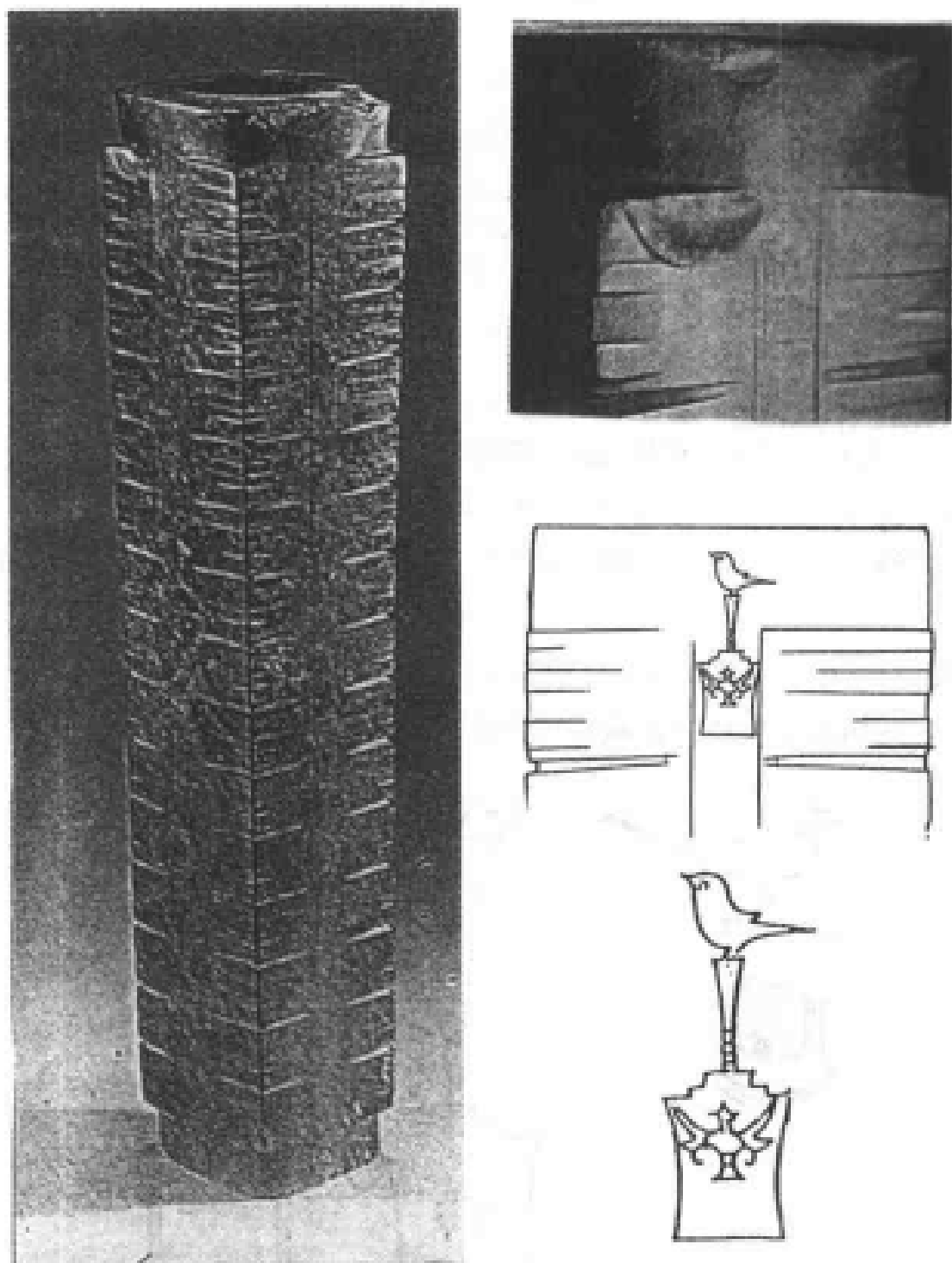


图 9-6 北京首都博物馆所藏玉琮刻纹



鸟为侧面,形象平实。同样形象的鸟纹,还见于以下两件良渚文化玉器:

(1) 北京首都博物馆藏有一件 15 节的玉琮,在射口与凹面间,刻有同样的图像(图 9-6)。

(2) 台北故宫博物院于 1989 年新入藏一件玉璧,刻纹与美国弗里尔博物馆所藏玉璧、北京首都博物馆所藏玉琮的刻纹类似,可惜鸟形残缺,“只剩下喙、前胸和足部”<sup>①</sup>(图 9-7)。

这五只鸟下面都有层台,层台中都有刻纹。有四只鸟,在鸟与层台之间,还有立柱和三四个小圆圈。鸟站在立柱上。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玉琮,高 17 节,47.2 厘米,在上端第一、二节的直槽上,刻有立柱和五个小圆圈<sup>②</sup>(图 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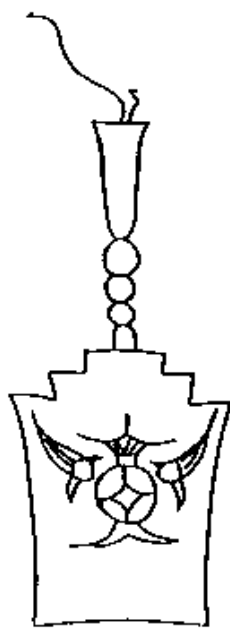


图 9-7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玉璧刻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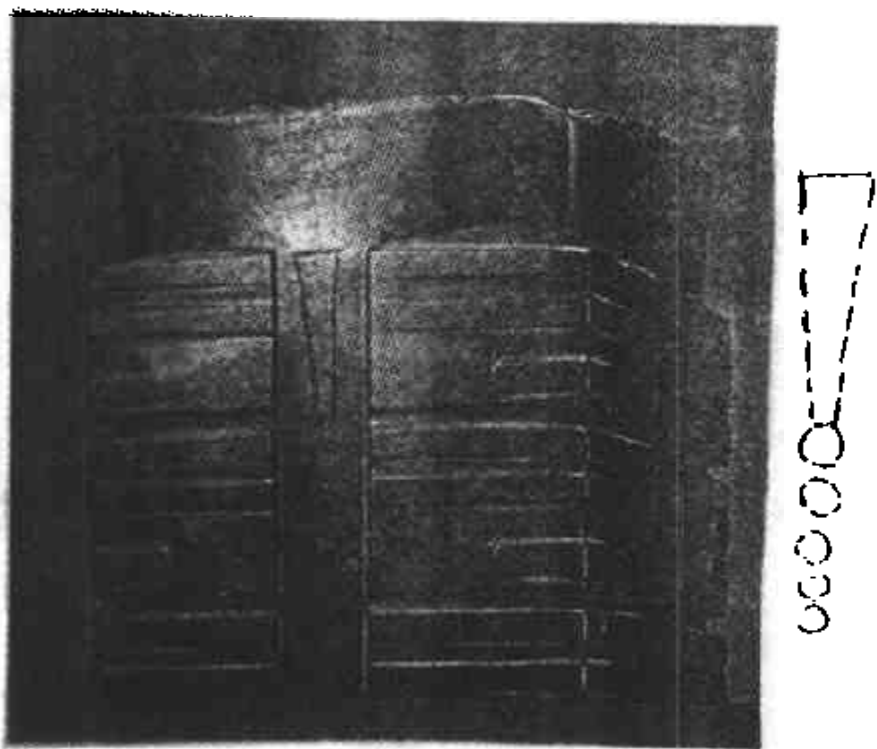


图 9-8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玉琮刻纹

- ① 邓淑蘋:《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 10 卷第 3 期,1993 年,第 14 页。  
② 邓淑蘋:《故宫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之二——琮与琮类玉器》,《故宫学术季刊》第 6 卷第 2 期,1988 年,彩图五。

还有两件良渚文化玉器，刻有类似的层台：

一件是近年在余杭安溪出土的大玉璧，上面有两处刻纹（图9-9：1、2）。图9-9：1与上述层台相同；图9-9：2为首见，它“象征天地柱的地基”。<sup>①</sup>

另一件是原为法国收藏家吉斯拉所藏的玉琮，在上端射口与凹面间刻有层台，层台上面还有小圆圈等刻纹，似是未完成的作品（图9-10）。此琮今藏巴黎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

上述刻有立鸟、立柱、小圆圈、层台的玉器共8件，其中，璧5件，琮3件。这些刻纹与吴越地区传统的鸟崇拜有关，是鸟日同体以外的另一种鸟神话。类似于“玄鸟生商”，含有祖先崇拜与生殖崇拜的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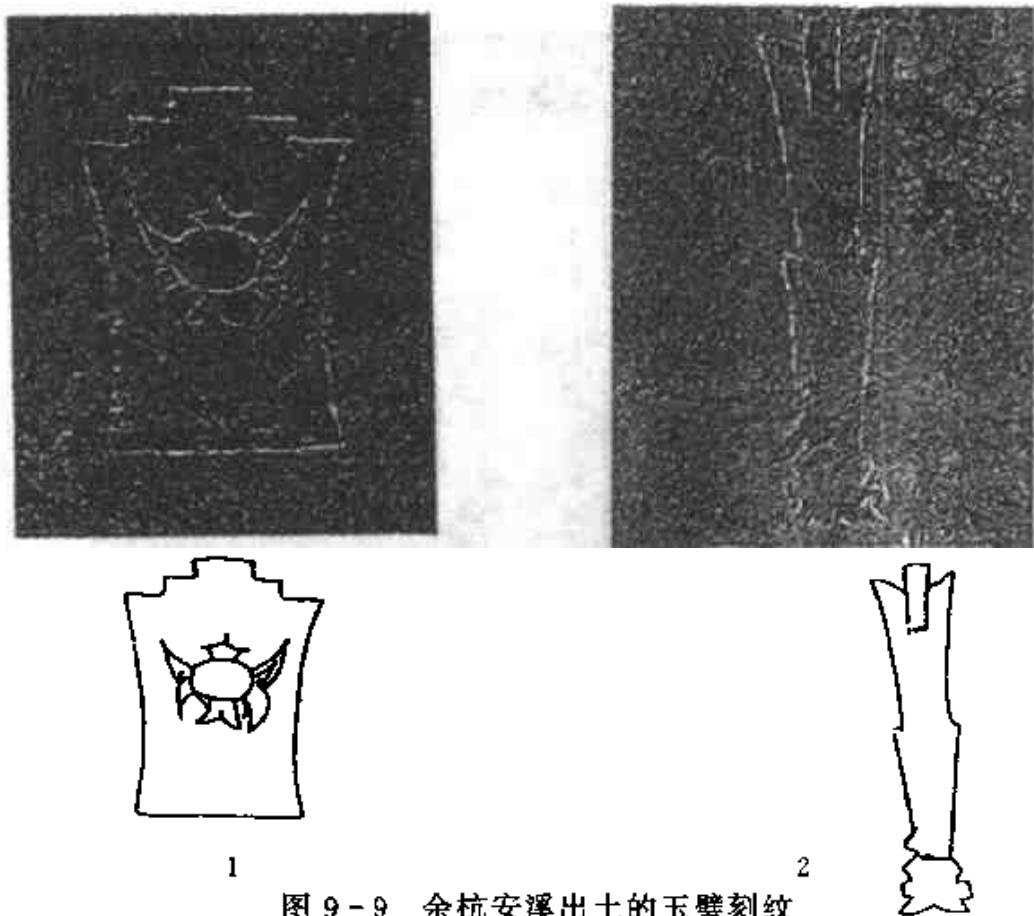


图9-9 余杭安溪出土的玉璧刻纹

<sup>①</sup> 董楚平：《良渚文化创世神话补证》，《故宫文物月刊》第174期，1997年9月，第8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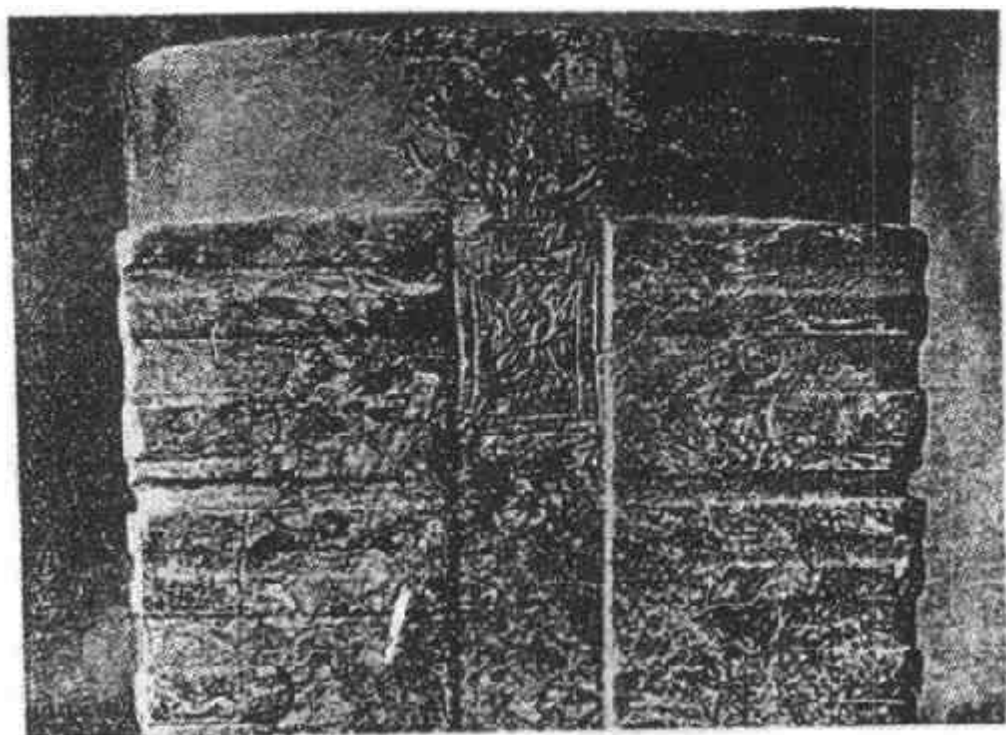


图 9-10 巴黎吉美博物馆所藏玉琮刻纹

义。试解释如下：(1)鸟是生育良渚民族的始祖；(2)立柱象征男根；(3)圆圈是鸟卵，是民族的种子；(4)层台代表神山——天地柱。前三项比较容易理解，第 4 项说层台代表神山——天地柱，是因为层台中都有刻纹，从这些刻纹可窥见这种意蕴。

层台的刻纹，有 5 件雷同（本章图 9-5：3；图 9-6；图 9-7；图 9-9：1；图 9-10），有 1 件刻一个饰满涡纹的圆球（本章图 9-5：1）。这个刻涡纹的圆球下面，也即层台的底边，刻有弯月。圆球应该是太阳，涡纹表示太阳的火焰，层台是天上神山。古人认为高山是天的阶梯，登高山可到达天上。有些高山已伸入天界，如昆仑。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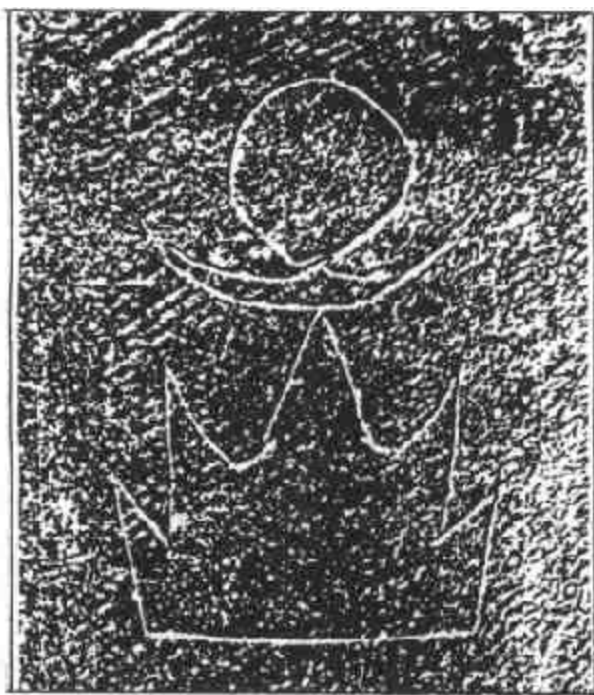


图 9-11 大汶口文化陶尊刻纹

种以日、月、山组合以代表天的艺术构思，在一件著名的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刻纹(图9-11)，表现得最为明显。美国华盛顿的弗里尔博物馆藏一件玉钺，刻有两个花纹(图9-12)，其中一个花纹，(图9-12:1)与大汶口陶尊上的刻纹相似。良渚文化中也有日、月组合的刻纹。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件19节的玉琮，高达49.2厘米，高度仅次于不列颠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高49.5厘米)。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这件玉琮，射口处刻有日、月纹(图9-13)。<sup>①</sup>

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推断，弗里尔一号玉璧的层台(图9-5:1)，表现的也是日月组合，与日月共处的层台，当然也在天上，是上伸到天上的神山。大汶口的山比较朴素自然，良渚文化的层台比较意象化，但仍保留着峰峦层叠的基本特征。《山海经·大荒西经》

<sup>①</sup> 石志廉：《最大最古的日纹碧玉琮》，《中国文物报》1987年10月1日。1991年林巳奈夫公布的线绘图(图9-13)，刻纹的上下图并不相连，下图中央无尖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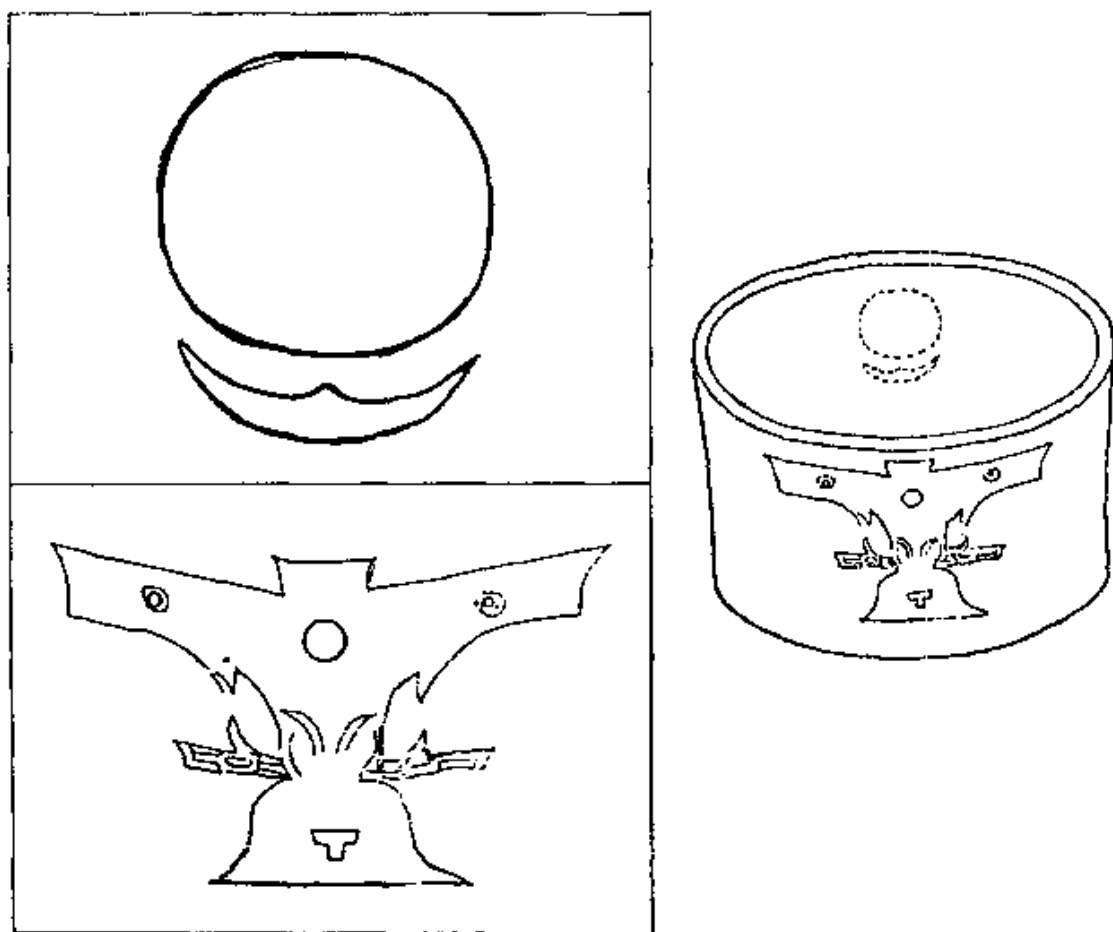


图 9-12 美国弗里尔博物馆所藏玉钺刻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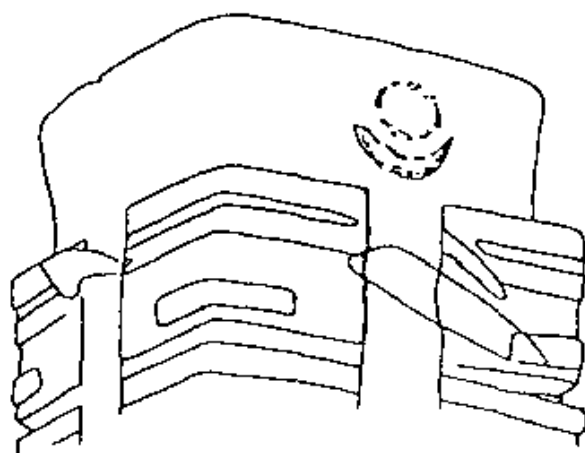


图 9-13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玉琮刻纹

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姮<sup>①</sup>天门，日月所入。”古人凭自己的直觉，看到日月出自山，入于山，自然会把日、月、山联想到一块，产生“日月山”的概念，甚至称它为“天枢”，即天之中枢。良渚文化琮、璧刻纹中的层台，可借用其名，称“天枢”。

分析了图 9-5:1 以后，其他五个层台（“天枢”）里面的刻纹就容易理解了，多数学者都认出这是神鸟展翅的正视图，中央（鸟身部位）的圆形是太阳。<sup>②</sup>

图 9-5 的 1、2、3 号玉璧，和图 9-6、图 9-7 的玉琮，这五件玉器的刻纹，都有两只鸟，高高在上的是祖先鸟，层台枢内的是太阳鸟，祖先高于太阳，祖宗神高于太阳神，这是中华大地上各族文化的共同特点。西方一些民族，自然神地位高于祖宗神，太阳神常常是至上神。如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刻在太阳神的神像之下，作为太阳神的意志，授权汉谟拉比国王执行。埃及有个神（图 9-14），也像良渚文化的宗神一样，是鸟首。不同的是，埃及采取写实手法，直接画出鸟首，良渚文化采取象征手法，以羽冠代表鸟首。一个直露，一个含蓄，表现了不同的民族性格。这位鸟首的神，头上压着日月，显然，这位鸟首神地位低于日神、月神。而良渚文化的祖先鸟，高高地站在日月乃至“天枢”之上。在“琮王”等礼器上，太阳鸟只能在宗神旁边侍候。反山第 12 号墓出土的玉钺，宗神刻在



图 9-14 埃及  
鸟首神像

① 郝懿行云：“姮字《说文》、《玉篇》所无，《藏经》本作姮”。

② 邓淑蘋：《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 10 卷第 3 期，第 30 页。

上端,太阳鸟刻在下端(图9-15)。在中国,至上神称“帝”。帝字的原始意义是祖宗神。祖宗崇拜压倒一切,自然神地位不高,是夏、商、周文化以及后来两千多年中华文化的传统特点。这个特点在良渚文化里已表现得十分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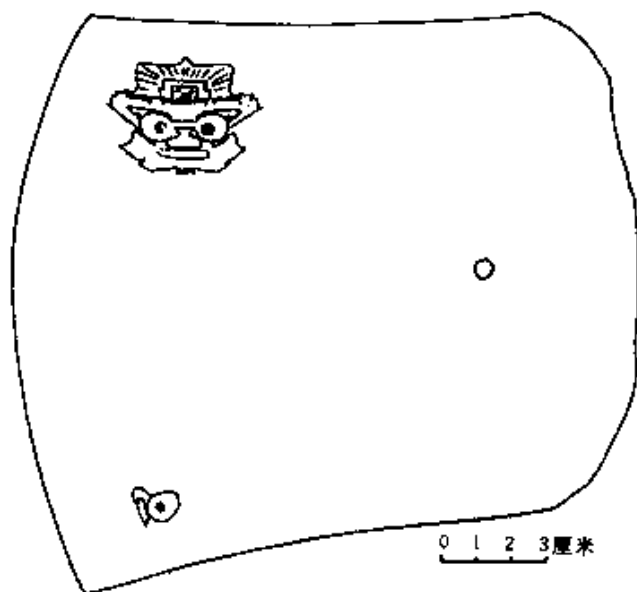


图9-15 反山第12号墓出土的玉钺

《山海经·大荒东经》云：“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

《山海经·大荒西经》云：“帝俊妻常羲，生月十二。”

日月竟然是“帝”“妻”(始祖母)所生。上引《山海经·大荒西经》“吴姬(姬)天门，日月所入。”吴族的始祖娘娘把守天门，管着日月的出入。

既然“帝俊之妻”能生日月，那么，其他民族的“帝妻”当然也可能有这个本领，也可能管“日月所入”。因此，图9-5:1可理解为良渚民族的“帝”或“帝妻”把守“天枢”，管“日月所入”；图9-5:3、图9-6、图9-7，可理解为良渚民族的“帝”或“帝妻”生育太阳。

总之，良渚文化的始祖神鸟，不但生育了良渚民族，而且还是太阳的父母，管理日月的行止。

上述8件璧琮刻符，既是图画，也是文字，记载良渚文化的创世

神话,它是中国现已发现的最早创世神话。<sup>①</sup>

### 三、“羽人”神话

吴越地区有“羽人”神话。<sup>②</sup>

羽人(或称“羽民”),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是指身生羽毛、有羽翼的人。在先秦、两汉的文献中,有不少关于羽人的记载,甚至传说古代中国还有“羽民国”的存在,凡此种种,均呈现出神奇的色彩。

据中国古典文献的记录,羽人生活于尧舜禹时代的唐、虞、夏之际。战国时期的屈原在《远游》中就写道:“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表现了他对羽人之国的向往情绪。《吕氏春秋·求人》篇曾说禹“南至交趾”、孙朴、续橛之国,丹粟、漆树、沸水、漂漂、九阳之山,羽人、裸民之处,不死之乡。”西汉刘安在《淮南子·墜形训》中也记载道:“洋水出其西北阨,入于南海羽民之南。”“自西南至东南方,结胸民、羽民、涓头民、裸国民、三苗民……”东汉高诱注释道:皆南方之国名也。由此可见,“羽人国”的大致方位是在中国的南方(东南方)。尤其是《吕氏春秋》将羽人、裸民相提并论,更是表明两地相近。而“裸民(国)”正是代指后来的吴国。“断发文身、裸以为饰”恰是吴越先民的习俗。说明羽人国大体在吴越这一方土地上。

有关羽人的形象,文献中曾有描绘,《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道:“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鸟东南,其为人长颊。”晋人郭璞注释说:“能飞不能远,卵生,画似仙人也。”郭氏还援引《启筮》曰:“羽民之状,鸟喙赤目而白首。”对“画似仙人”的说法,

① 董楚平:《“鸟祖卵生日月山”——良渚文化文字释读之一,兼释甲骨文帝字》,《故宫文物月刊》第168期;又《良渚文化创世神话补证》,《故宫文物月刊》第174期。

② 金永平:《吴越的羽人神话》,《思源》第21期,1992年。



今人袁珂提出异议,他认为:羽民自是殊方一族类,非仙人也。确实如此,把羽民视作仙人的观点,则是较为后起的看法。

此外,在《山海经·大荒南经》中亦云:“有羽民之国,其民皆生毛羽。”正是依据《山海经》的文字阐述,吴任臣在《山海经广注》中曾有一幅羽人的插图(9-16),人鸟合一,栩栩如生。

近年来,吴越地区考古的新发现,为进一步揭破羽人之谜,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资料。

1976年,在浙江鄞县甲村石秃头曾出土了一件春秋战国时的青铜钺,其正面有一幅“羽人划船”的图画装饰(图9-17),镌刻着四个头戴随风飘动的高大羽饰的人,坐在独木舟上向前奋力划进的图像,这几位戴羽状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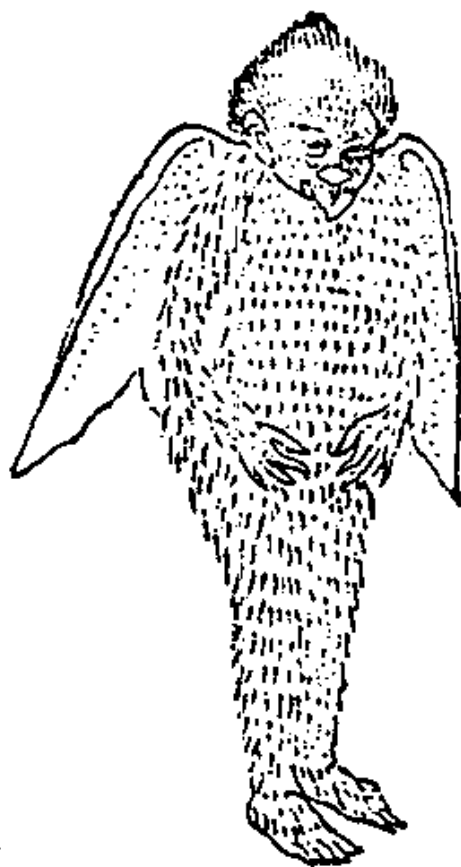


图9-16 《山海经广注》中的羽人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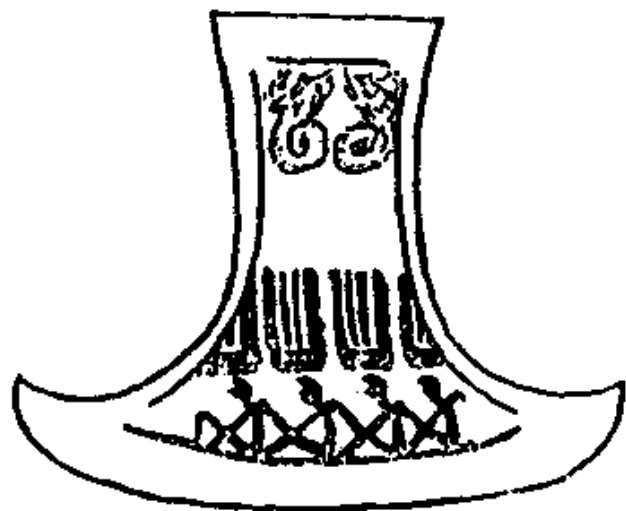


图9-17 鄞县出土的“羽人划船”青铜钺

鸟首人身者应是羽人的形象。而在1986年发掘的浙江余杭反山和瑶山良渚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许多玉琮、玉钺、玉冠状饰等器物,在这些玉器上,有的镌刻着戴羽冠的宗神。如反山的“琮王”,在琮的四个凹面内琢刻了图像相同的八个宗神。神人的脸为倒梯形,带眼角的圆眼、宽鼻、阔



图 9-18 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玉羽人

嘴,微微露牙,头上所戴的外层是高耸宽大的冠,冠上刻十余组单线和双线组合的放射状羽毛,可称为羽冠;上肢形态为耸肩、平臂、弯肘、五指平张叉向腰部,下肢作蹲踞状,脚为三爪的鸟足。“琮王”四个凸面刻小眼人面纹与大眼兽面纹的组合图案,那是宗神的简化标志。宗神简化标志的两侧雕琢着飞翔的神鸟,衬托了宗神在空中腾云驾雾的情状(第七章图7-7、7-8)。

最引人注目的是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的发现,经研究认为,其族属应是古越民族的一支——扬越人。在墓中有一件神人兽面形饰器,其正面中部偏下刻神人兽面纹,头顶上横刻平行阳线四条,其上竖刻稍向外弧的阳线十一组,直至器体顶端,形似羽冠。整体和正面纹饰犹如一个戴着卷角高羽冠的神人,构思巧妙,线条流畅。令人尤为惊叹的是墓中有一件完整的玉羽人(图9-18)。质地属青田玉,枣红色。造型作侧身蹲坐状,两面对称。粗眉、大眼、半环大耳、高勾鼻、戴高羽冠。顶后部用掏雕技法琢出三个相套链环。臂拳屈于胸前,蹲腿,脚与臀部齐平。脚底有短棒,棒部有横凹槽,并拢的小腿下部有一斜穿孔。腰背至臀部阳刻鳞片纹和羽纹,肋下至腿部雕刻出羽翼。如此形象生动的玉羽人,真不愧是中国的文物精品之一。

综上所述,从浙江鄞县的“羽人划船”到江西新干的“玉羽人”乃至上溯到良渚文化墓葬的鸟足羽冠宗神图像,这些发现于吴越土地上的文物精品,恰好印证了文献中关于羽人生活在中国东南区域的记载。

此外,我们还可以援引几条文献史料来说明吴越与鸟(羽人)的关系。《禹贡·扬州》载:“鸟夷卉服。”其含义指鸟夷部族是以鸟毛御寒,从而织成五彩斑斓、毛茸茸的外套,装饰成图腾鸟的样子。还有《史记》曾形容越王勾践的相貌是“长颈鸟喙”,《吴越春秋》也有“大越鸟语之人”。

#### 四、“鸟田”神话

“鸟田”神话，记载最详细的是《越绝书》，其卷八《记地传》说：“……畴粪桑麻，播种五谷，必以手足。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大小有差，进退有行，莫将自使，其故何也？曰：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因病亡死，葬会稽。苇椁桐棺，穿圻七尺；上无漏泄，下无即水；坛高三尺，土阶三等，延袤一亩。尚以为居之者乐，为之者苦，无以报民功，教民鸟田，一盛一衰。当禹之时，舜死苍梧，象为民田也。禹至此者，亦有因矣。”

这段话两次写到“鸟田”。第一次解释什么叫“鸟田”，说“鸟田”是“大越海滨”所“独”有的种田方法。“大越”指会稽，即今绍兴；所谓“鸟田”，就是鸟种田，“畴粪桑麻，播种五谷”，皆不“必以”人之“手足”为之，而由群鸟“大小有差，进退有行”，有条不紊地代为劳动。这真是独一无二的神奇现象。第二次是解释“鸟田”的由来，说“鸟田”是禹死以后，他的神灵为了“报”答大越之“民”对禹的厚葬之“功”，为了免除大越之民的劳作之“苦”，而创造的奇迹。对“一盛一衰”四字，各家歧解颇多。其实，只要紧扣原文，并不费解。这四字直承“教民鸟田”，所谓“一盛一衰”应该指春种秋收，秋收后即可休息，“鸟田”奇观也就“衰”了。总之，“鸟田”就是鸟代人种田，是禹的神灵创造的奇迹，唯大越之地所“独”有。显然，这是十足的神话。

《越绝书》虽成书于东汉，而其中很多部分应是先秦遗篇，字句多有舛误、难解。东汉王充在《论衡》里两次提到“鸟田”。《偶会》篇说：“传曰：‘舜葬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佃。’”《书虚》篇说：“传书言，舜葬于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田。盖以圣德所致，天使鸟兽报佑之也。”王充是东汉初年人（27—约97年），他所说的“传书”不会是《越绝书》。“鸟田”之说非东汉始有，而是古“传”之

“书”早已“言”之。而且根据王充的转述,古书所说的“鸟田”也是鸟种田。“田”,应读作“佃”,是“为”禹作佃。这显然也是十足的神话。所记载的并非古代越地实际的农作情况。<sup>①</sup>

从河姆渡文化到战国时期,越地的崇鸟习俗盛行五千年,遗俗迁延到晋代、唐代。长期的鸟崇拜,必然伴有丰富的鸟神话,这种文化土壤应该是产生“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神话的原因。

那么,“鸟田”神话的内涵是什么呢?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只能说“鸟田”是关于鸟为禹种祭田的神话。《论衡》与《越绝书》都以“象为舜田”与“鸟为禹田”相提并论。舜与象有特殊关系,已为学术界所公认。舜姓妫。甲骨文“为”字似“用手牵象”<sup>②</sup>。“鸟为禹田”既然与“象为舜田”并提,则鸟与禹也应该有特殊关系。中国史前文化大致可分为东西两大系统,东部民族普遍富有鸟神话。“鸟”与“禹”关系既然类似于“象”与“舜”,那么禹的血统应源于东方。禹的东南血统,可能是“鸟为禹田”这一神话的历史内涵。<sup>③</sup>

## 五、东周以后的鸟崇拜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地区仍然盛行鸟神崇拜。

1981年绍兴坡塘306号墓出土1件铜质房屋模型<sup>④</sup>,屋顶上立有一柱,柱顶铸一鸬(图9-19)。1984年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出土1件青铜鸬杖<sup>⑤</sup>。木杖已朽,仅存青铜杖首与杖徽。杖通长229.4厘米,顶端立一只鸬鸟。1990年绍兴漓渚发现青铜鸬杖1件<sup>⑥</sup>,有杖首、

①③ 董楚平:《“鸟田”神话刍议》,《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

② 《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9页。

④ 《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

⑤ 《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合刊。

⑥ 沈作霖:《绍兴发现青铜鸬杖》,《中国文物报》1990年11月15日。

杖徽，杖身已朽。杖首顶端立一鸠鸟。附近还发现方格纹、米字纹印纹陶，应是战国时期的遗存。1969年浙江吴兴棣溪出土1件铜徽<sup>①</sup>，与上述鸠杖的杖徽同形，可惜杖首未发现。以上鸠杖皆出在吴越地区。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木鸠杖3根，其中一根缠有10枚木简<sup>②</sup>。1968年，河北满城陵山西汉中山国靖王刘胜墓中出土青铜鸠杖1件<sup>③</sup>。鸠杖虽非吴越地区所独有，却以吴越地区年代最早，分布最为密集。甘肃、河北的鸠杖皆出于汉墓，这与刘邦有关。《风俗通义·佚文》卷一说：“高祖与项羽战败于京索间，遁丛薄中，羽追求之。时鸠正鸣其上，追者以为必无人。遂得脱。及即位，异此鸟，故作鸠杖以赐老人也。”《风俗通义》说鸠杖始于汉代，已被丹徒等吴越地区出土的先秦鸠杖所否定。说汉代赐鸠杖，始于刘邦，则可信。刘邦是沛人，沛原为徐国故地。徐为吴灭、吴为越灭后，其地先后归入越的疆域。徐、吴、越皆有崇拜鸟类的习俗。刘邦当皇帝后，把故乡习俗推广至于全国，是很自然的。

文献中也有关于越地崇鸟的记载。如晋人王嘉《拾遗记》说：“越王入国，有丹鸟夹王而飞，故勾践之霸也，起望鸟台，言丹鸟之异也。”越地的鸟崇拜遗俗还延续了好几百年，晋人张华《博物志》卷九说：“越地深山有鸟，如鸠，青色，名曰冶鸟，……越人谓此鸟为越祝之祖。”

唐代晚期，浙东裘甫于859年起义，建号曰“罗平”。原来“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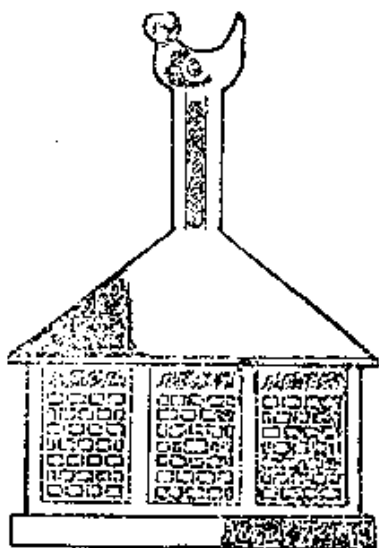


图9-19 铜屋侧视图，  
绍兴306号墓出土

① 《浙江长兴等县出土甬钟、铜徽和秘色瓷》，《文物》1979年第3期。

② 《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发掘》，《武威磨咀子出土王杖十简释文》，《考古》1960年第9期。

③ 《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册，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是越地一神鸟名。892年,越州节度使董昌称帝,“有客使倪德儒语昌曰:‘中和辰巳间,越中曾有圣经云:有罗平鸟主越人祸福,敬则福,慢则祸,于是民间悉图其形以祷之。今观大王署名,与当时鸟状相类。’乃出图示昌,昌欣然以为号。”<sup>①</sup>董昌国号为“大越罗平”。

先秦鸟篆字见于宋、蔡、楚、曾、吴、越等南方国家,这个地区有崇鸟传统。到目前为止,国属可考的鸟篆文已有103件。其中,越国的鸟篆字最丰富、最多样,有鸟篆铭文的越国青铜器已发现56件,超过总数的一半,这可能与越地崇鸟习俗特别盛行有关。

总之,从河姆渡文化到战国时期,越地的崇鸟习俗盛行五千年,余绪延续到晚唐、五代。

---

## 第二节 音 乐

---

### 一、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乐器

河姆渡遗址共出土骨哨160多只,仅第一次发掘就在第四层出土45只。骨哨是截取鸟禽的肢骨中段制成,哨身略呈弧形,长度在6—10厘米之间。大多只有两个音孔,少数有三四个音孔。类似的骨哨在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江苏吴江梅堰遗址也有出土。河姆渡有件骨哨(T31<sup>①</sup>:54),腔内还保存着一根鸟禽肢骨,这根肢骨可能充作拉杆,以变换音阶。

河姆渡第四层还出土两件陶埙,埙身呈鸭蛋形,中空,一端有一小吹孔,但无音孔。这种只有吹孔而无音孔的埙,是最原始的埙。河姆渡出土的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陶埙,稍后的郑州大河

---

<sup>①</sup> 《吴越备史》卷一。

村、西安半坡、山西万荣荆村也有出土。南京郊外安怀村遗址的湖熟文化层出土一件陶埙，顶有孔，器壁另有一孔，也就是说，既有吹孔，又有音孔，这比河姆渡的埙进步。<sup>①</sup>

河姆渡遗址第四层还出有 20 多件形制特殊的木筒，均为整段圆木剝空而成，两头相通。

这种形制特殊的木筒，有的学者认为是打击乐器，称之为“木笛”。说：“河姆渡木笛已具有相当复杂的构造，它的设计已具备构成一种发音层次较为丰富的打击乐器的基础。”<sup>②</sup> 在遗址出土的 20 余件木笛中，有 18 件基本完好。其中 12 件为直筒形，两头直径相等，断面呈圆形；3 件为扁筒形，两头大小相仿，断面为扁圆形；另外 3 件为亚腰形，外壁的两头及中部微鼓，中部至两头间则形成束腰。木笛的外表似皆经过锉磨、削刮，平整光洁。有的还经过髹漆，刚出土时漆色微黄。有的两头扎有藤篾等箍圈，显然是为了防止敲击时破裂。木笛可分为大、中、小三号。大号 3 件，长度在 40 厘米以上。其中最长的—件为亚腰形，长 48 厘米，外径 12—14 厘米；小号 1 件，长 27 厘米；其余为中号，长度均在 30—40 厘米之间。木笛外径完整的 20 件，外径在 6—13 厘米不等，其中 10 厘米以上的 4 件，8 厘米以下的 6 件，8—10 厘米的 10 件，笛壁的厚度多为 1 厘米左右。“木笛之作为乐器的全部奥秘在于它的内部结构。木笛内壁的加工虽不似外壁精细，但也相当平整。其中笛壁厚度一致、上下平直者约占半数，另有十件在内壁的不同部位镂有凸脊一周，……凸脊所处的部位也是一个颇为微妙的问题。有二件处于木笛的中间；五件靠近一端；另有三件距一端约 3—5 厘米不等。凸脊作何用途？从三件木笛刚出土时在凸脊上面塞着一个木饼看，应是专为承托木饼而设。在一期发掘时于第四层

① 曾昭燏、尹焕章：《试论湖熟文化》，《考古学报》1959 年第 4 期。

② 陈忠来：《河姆渡文化探原》，团结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90 页。



还发现这样的木饼七件……木饼似采用软木制成,出土时手感弹性还相当好。……木饼也可以称之为音塞。”<sup>①</sup>

余姚市文化馆的研究人员曾根据河姆渡出土的木笛仿制出一套7只木笛,将其中5只按大小排序,所击之音与钢琴之音对照,近似 $^bB, ^bA, F, ^bE, C$ ,其唱名可读作 $2, \dot{1}, 6, 5, 3$ ,与我国古乐中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相似。

考古发现有一定的偶然性,在吴越地区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还没有发现像河姆渡这样丰富的乐器。但根据河姆渡的发现可以推想,吴越地区史前时期的人们,是酷爱音乐的。尤其是良渚文化,它是畸形发展的宗教文化,宗教与音乐有不解之缘,在良渚文化时期,应有比河姆渡时期发达得多的音乐。可惜目前还缺乏这方面的实物资料。

##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地区的音乐文化可在青铜器中窥见一斑。

吴国现有具铭礼乐器共49件,其中,钟32件,钩鐃2件,钟与句鐃都是乐器,合计34件,约占礼乐器总数的70%。越国具铭礼乐器共22件,其中,钟18件,句鐃3件,共21件,约占礼乐器总数的91%。吴越两国的乐器在礼乐器中占这么大的比例,为别国所罕见。

考古发现无铭的吴越乐器,数量更多,材料遍及金、石、皮、木、丝、竹、瓷等,充分反映吴越器乐艺术之繁盛。器类除编钟与句鐃之外,还有特于、铙、钲、鼓、琴、编磬等。

特于(图9-20),是一种历史悠久的青铜乐器,“圆如碓头,大上小下,乐作鸣之,与鼓相应”(《周礼·地官·鼓人》郑玄注)。迄今发现

<sup>①</sup> 陈忠来:《河姆渡文化探原》,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属于先秦时期的镈于，已有数十件之多。出土地点基本上集中于东南与南方，有从北向南移动的趋势。从春秋中期至战国后期，依次出土地点如下：

春秋中期：山东沂水刘家店子一号墓，出有镈于 2 件；安徽宿县芦古城子，出土镈于 1 件。

春秋晚期：安徽寿县蔡昭侯墓出土镈于 1 件；镇江王家山墓，出土一组 3 件镈于，同出钲 1 件，置于镈于内；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出土镈于 1 件，同出钲 1 件，置于镈于内；江西修水曾家山出有镈于 1 件，同出钲 1 件，置于镈于内。

战国前期：浙江海盐长川坝墓出有原始瓷镈于 2 件，一大一小；湖南泸溪出土镈于 2 件；广东连平忠信乡彭山出有镈于 1 件。

战国后期：考古发现属于这一时期的镈于，数量较前期明显增多，主要集中于湘西、鄂西、川东、黔东等地。<sup>①</sup>

由出土地点可看出，“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的镈于，分别为东夷文化与百越文化所有，并是其富有特征性的典型器物”<sup>②</sup>（图 9-21）。

钲（图 9-22），又称“丁宁”。形似铃，口朝上，手执柄而击之。在考古发现中大多与镈于共出，并置于镈于之内。丹徒北山顶墓和王家山墓的钲，都置于镈于内。这种组合形式，一般只见于东夷、百越的文化区内。<sup>③</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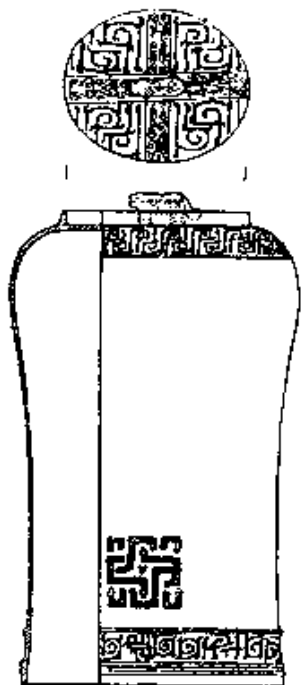


图 9-20 镈于，  
丹徒北山顶出土

① 镈于出土资料，采自刘建国：《论镈于文化与东夷、百越的关系》一文，载《百越民族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② ③ 刘建国：《论镈于文化与东夷、百越的关系》，《百越民族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53 页。



图 9-21 钟子文化传播示意图(采自《百越民族研究》刘建国论文)

铙。南方铜铙是越族特有的乐器<sup>①</sup>。1963年浙江余杭石濂和1974年江苏宁塘东村均曾出土。1989年,江西大洋洲商墓也出土有铙3件。<sup>②</sup>

鼓。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出有1件悬鼓,已朽烂,仅存青铜悬鼓环和一片红色漆皮,由于挤压变形,鼓已无法复原。江西贵溪崖墓出土一件木扁鼓的残部,扁鼓直径26.8厘米,高6.5厘米,鼓框呈圆弧状。施绘黑漆,上下边各有两排竹钉,用于绷紧鼓皮<sup>③</sup>。绍兴306号墓出土的铜屋模型,屋内置一鼓架,上悬一鼓。

① 高至喜:《论中国南方商周时期越族铜铙的演变与年代》,1990年“首届国际百越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

②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0期。

③ 许智范:《从崖墓文物看越族文化》,《百越民族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33页。

琴。1979年,贵溪崖墓出土木琴2件,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之间,琴身长,琴弦多(13根)<sup>①</sup>,是研究古代弦乐器的珍贵实物资料。

编磬。磬是石制打击乐器。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现整齐叠放的一堆石磬,计12件。

绍兴306号战国墓中的铜屋模型,据发掘简报介绍,室内有乐伎俑4具、歌伎俑2具,分前后两排,呈跪姿。前排东一俑面向西,右手执槌,左手前伸张指作节拍状,前置一鼓架,上悬一鼓,此人应是鼓师。前排中、西两人面向南,双手交置于小腹(作演唱状)。后排东一俑面向南,双手捧笙,作吹奏状。中一俑面向南,膝上置一长条形四弦琴,右手执一小棍,左手抚弦,正在演奏。西一俑面向南,身前亦横置四弦琴,右肘依于琴尾,拇指微曲作弹拨状,左手五指张开,正以小指抚琴。此二俑应为琴师<sup>②</sup>。这击鼓、吹笙、抚琴的4名乐伎和2位歌伎,构成了一幅形神兼备的组合演唱场面,显示了吴越音乐的水平(图9-23)。

吴、越两国的音乐文化可能存在文、野之差。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在鲁观乐,对所奏华夏音乐的风格、内涵,逐一作了精确而深刻的评论,说明季札对中原传统音乐有深厚的修养和超群的鉴赏能力,也说明吴国国内有这方面的音乐氛围与文化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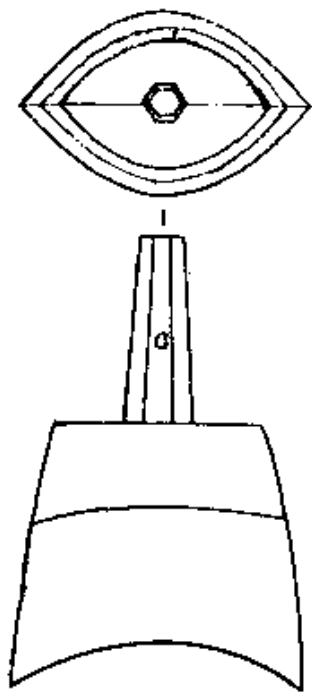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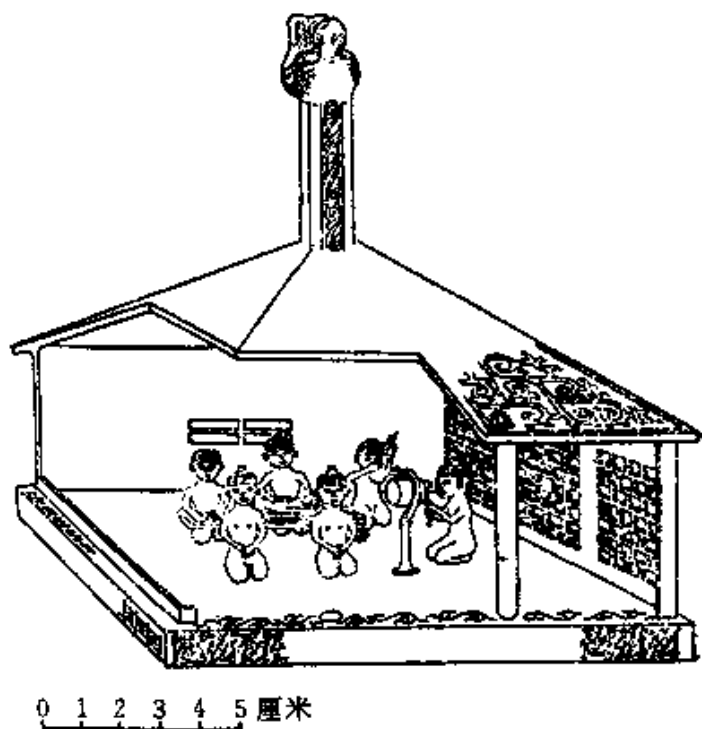


图9-22 钲,丹徒北山顶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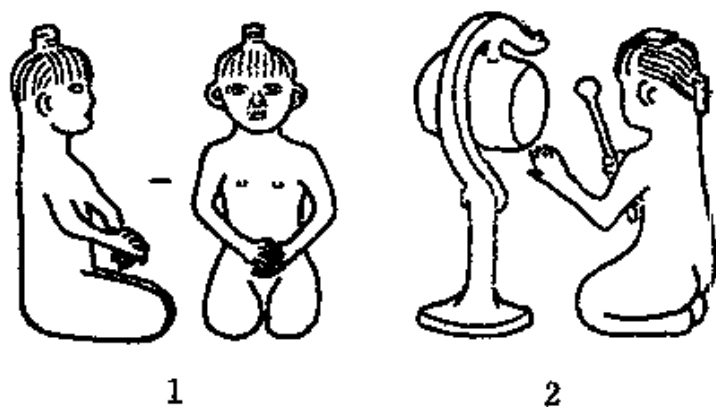
① 《江西贵溪崖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11期。

② 《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

《吕氏春秋·遇合》篇记载：“客有吹籁见越王者，羽、角、宫、徵、商不谬，越王不善，为野音而反善之。”越王所“善”的“野音”，应该是富有地域特色、越族特色的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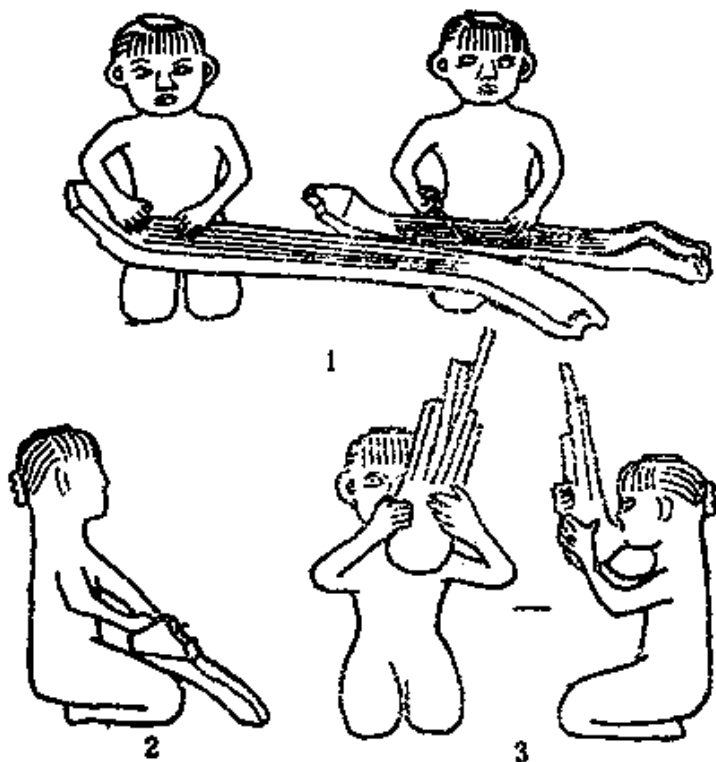


A 铜屋内部透视图



B 铜屋内前排俑姿

1. 前排西一歌伎俑 2. 前排东一乐伎俑正视(均为原大)



C 铜屋内后排俑姿

1. 后排西、中两俑正视 2. 后排中一俑侧视  
3. 后排东一俑(均为原大)

图 9-23 绍兴 306 号墓出土的铜屋模型内音乐演奏情景

### 三、句 鑿

句鑿是吴越特有的乐器。“句鑿”是古越语名称,未见于字书、文献。自清代以来,句鑿的出土情况如下:

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江苏常熟翼京门外,农民锄地挖到一件姑冯句鑿,铭文自称“商句鑿”。句鑿之名始见于此。

道光初年,浙江武康山中,发现句鑿13件(道光七年《武康县志》记载)。其中有2件有铭文,被称为“其次句鑿”,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1958年,江苏武进淹城发掘到成组句鑿7件。<sup>①</sup>

<sup>①</sup> 《文物》1959年第4期,图版四。

1974年江苏高淳顾陇发现成组句罍7件,后又发现不同组的1件。<sup>①</sup>

1974年冬高淳青山发现句罍2件。<sup>②</sup>

1976年吴江梅堰龙北发现两组句罍共5件(一组3件,另一组2件)。<sup>③</sup>

1977年,浙江绍兴城关狗头山出土具铭钩罍2件,即《配儿钩罍》<sup>④</sup>(图9-24)“配儿”是吴太子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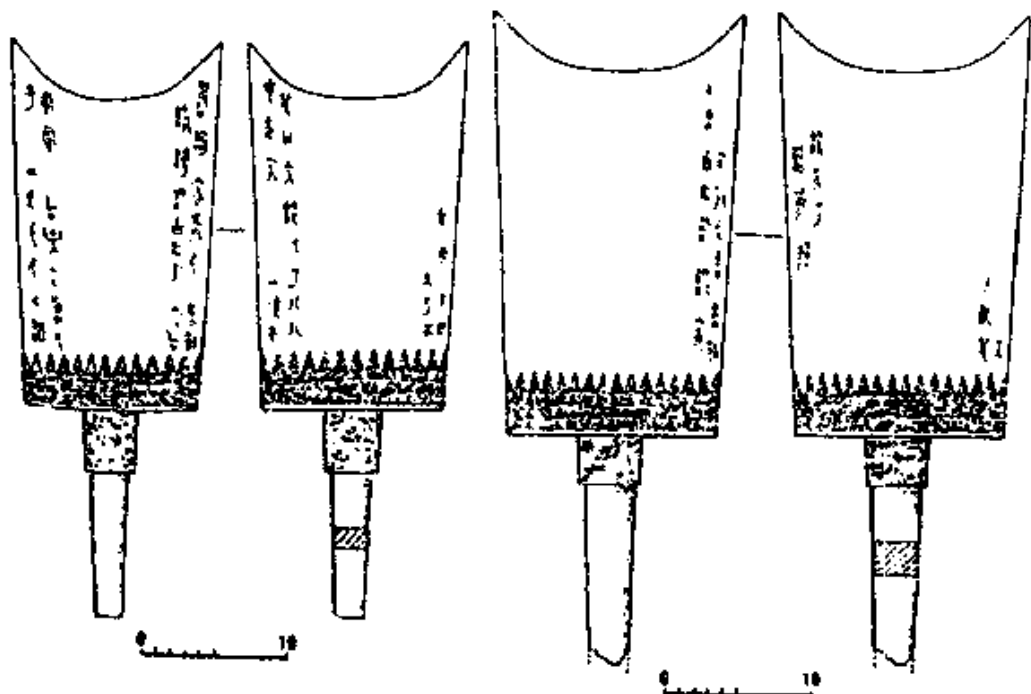


图9-24 配儿钩罍

1979年,湖北宜城雷家坡发掘句罍1件。<sup>⑤</sup>

1984年,湖北广济发现同组句罍2件。<sup>⑥</sup>

① 《文物资料丛刊》第5期,图版五。

② 《文物资料丛刊》第5期。

③ 徐孟东,《句罍发微》,《中国音乐学》1994年第2期,第39页。

④ 《考古》1983年第4期,图版三。

⑤ 《考古》1980年第2期。

⑥ 《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图版贰:6;图九。

1985年,江苏镇江王家山出土句鑃1件。<sup>①</sup>

1986年,湖南长沙北区荷花池发现句鑃1件,同时发现一件演奏句鑃所用的木槌(《湖南考古辑刊》第5期。报告误称“铎”。图9-25)。

1988年,江苏丹徒出土句鑃1件。<sup>②</sup>

以上44件句鑃,有明确的出土地点。江、浙等南方各地博物馆征集得来的句鑃未计在内。句鑃所属年代从春秋初期到战国时期,正是吴越两国兴盛时期。44件句鑃中,有铭文的5件。其中吴国2件(句作“钩”);越国3件(句字不从金字)。在44件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句鑃中,江苏出土25件,浙江出土15件,湖北出土3件,湖南出土1件。江浙的出土地点皆为苏南浙北。这些情况说明,句鑃是东周时期吴越两国特有的乐器。浙北地区还常出原始瓷句鑃。1929年和1935年绍兴两次出土,其中一次是在同一墓葬中出土11件成组的原始瓷句鑃<sup>③</sup>。1983年4月,浙江海盐长川坝黄家山出土12件成组的原始瓷句鑃。<sup>④</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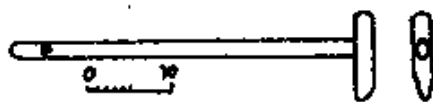


图9-25 长沙出土的句鑃及木槌(采自《中国音乐学》1994年第2期徐孟东论文)

① 《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文物》1987年第12期,第27、31—33页。

② 徐孟东,《句鑃发微》,《中国音乐学》1994年第2期,第39页。

③ 梅原末治,《支那考古学论考》,东京,1938年版;蒋玄伯、秦明之,《中国瓷器的发明》,艺苑真赏社1956年版。二书均有记载。

④ 《浙江海盐出土原始瓷乐器》,《文物》1985年第8期。



句鑃口朝上,手执柄,以木槌敲击发声。杭州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徐孟东对句鑃作过深入、专门的研究,并作过实物测音。他说:“根据句鑃多为大小依次成组发现(数量不等,多至七八件少则二三件)这一特点,再依照参考本人对江苏高淳顾陇成组句鑃(共7件,现藏镇江博物馆)测音结果来看,它是一种由正鼓音、侧鼓音组成音阶的旋律打击乐器(这可能是句鑃同铎、钲的最大不同之处)。据此推断,句鑃当时主要用于乐舞(越人乐舞极为发达),表演者手持句鑃排列有序顺序敲击,且奏且行且歌且舞。”<sup>①</sup>

“句鑃”之句,是越语发声,无义。鑃字《说文》所无,也不见其他文献。鑃字从翟,翟字古属宵部。铎字从尧,尧字古也属宵部。《姑冯句鑃》铭文自名为“商句鑃”,从声韵角度考虑,句鑃可能是从商铎演变而来。商文化与越文化都属东部鸟文化系统,关系密切。

商代的铎,是中国现存的最早青铜打击乐器,是甬钟的前身。有柄,以木槌敲击发声。铎也成组编套,中原商铎常以3件为一组,但个别者如殷墟妇好墓出有5件一组的铎。商周时期,南方出现青铜大铎。南方大铎的演变趋势是:形体由扁(短)阔厚重而瘦长精巧(即从铎宽超过栞长到二者相等,最后栞长超过铎宽);乳枚由无到有,是越族乐器<sup>②</sup>,到春秋时已衰亡。句鑃始于春秋早期,年代与南方大鑃衔接,形制继承了后期南方大铎狭长优美的特点。现有最早的句鑃之一——湖北广济句鑃,有类似乳突的小圆点,保持着当时已趋消亡的南方大鑃的一些特点。南方大铎与句鑃都分布于长江流域,都是古越族乐器。说“句鑃源于南方大铎”<sup>③</sup>,是顺理成章的。

① 徐孟东:《句鑃发微》,《中国音乐学》1994年第2期,第40页。

② 高至喜:《论中国南方商周时期越族铜铎的演变与年代》,1990年在杭州召开的“首届国际百越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

③ 徐孟东:《句鑃发微》,《中国音乐学》1994年第2期,第43页。

### 第三节 关于大禹、防风的神话传说

大禹治水的神话,是中国流布年代久远、涉及地域较广、内容异常丰富的古代神话之一。在历代典籍中有许多记载,众说不一。而在东南沿海吴越地区,迄今保存着不少禹的遗迹和流传在人民口头的有关禹的许多神话,具有独到的特色,可以与文献资料相印证。

关于“禹”本义的考辨。《说文》:“禹,虫也,从虫,象形。”并训为“兽足蹂地也”。顾颉刚据此而揣测禹“大约是蜥蜴之类”,“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sup>①</sup>。王伯祥认为禹或是龙。禹是“一条虫”的名论,曾引起学术界的巨大震荡。至今学术界仍有人认为,“禹”当为会意字,即“虫”(或它)与“九”的比类合谊,意味着一条屈曲究极爬动中的蛇。<sup>②</sup>

此外,也有学者在顾氏疑“禹”字是蜥蜴之类的基点上,具体指实为鳄鱼,即扬子鳄(俗称“猪婆龙”),从而认定越族崇尚蛟(鳄鱼)图腾。<sup>③</sup>

董楚平在《吴越文化新探》中从另一个角度对“禹”字作了考查,认为虽然现有的甲骨文中没有“禹”的祖型字,但卜辞里常见的“𩇛”字即禹的初文,该字由“夏”和“戊”两字组合而成,是会意结构,“夏”是“中国之人”(《说文》),“戊”是“王斧”(《字林》),因此,“𩇛”的含义是第一个执钺称王的“中国之人”,此人即禹。

凡此种种,对“禹”字的追根溯源,从虫、蜥蜴、龙、蛇、鳄鱼以及“𩇛”等一系列的考辨中,既可窥见氏族图腾崇拜的影子,又表明了禹

①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5页。

② 王宇信:《由〈史记〉鲧禹的失统谈鲧禹传说的史影》,《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③ 王卫平:《试论古代越族的“文身断发”与图腾崇拜》,《东南文化》1988年第3期。又见周幼涛:《越族蛟图腾初探》,《绍兴学刊》1990年秋季号。

与古吴越地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传说中的禹迹极为广阔,因此,关于大禹治水的区域也有诸多说法,一般认为洪水发生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也有人认为在汾河平原)。至于江南许多舜、禹故迹,只是巡狩、分封后代所留下的。对此,顾颉刚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大禹治水的传说是“商、周,南方的新民族有平水土的需要,酝酿为禹的神话。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sup>①</sup>;可以“假定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sup>②</sup>。虽然1937年顾氏在《九州之戎与戎禹》一文中据九州、四岳原在西方而提出禹的传说产生于西方戎族,从而放弃了这一假定,但“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这一思路对今人仍有启迪价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南方考古学、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的发展,特别是众多重大考古遗址的发掘和民间文学中大量活生生的神话传说的发现与整理,大禹治水神话的研究又有了进一步的拓展。陈桥驿依据地史学、第四纪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详细阐述了吴越地区产生禹治水神话的背景,认为南方产生大禹治水“这类传说的可能性不会比黄河流域小”<sup>③</sup>,这在考古学中也能找到印证。在吴越地区许多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如杭州水田畷、湖州钱山漾、嘉兴马家浜、吴江梅埭、吴县草鞋山等,都发现了水灾后的淤泥痕迹。面对着洪水和海潮的侵袭,吴越的先民们“幻想和期待着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神明,能够驱走这滔天洪水,让他们回到祖辈相传的这块广阔、平坦、富庶美丽的土地上去”<sup>④</sup>。这就是吴越地区产生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的背景。

事实上,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与古吴越地区有斩不断的关联。在历代古籍中,诸如“禹会诸侯于涂山”,“禹娶涂山”、“禹致群神于

①②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第151、154页。

③④ 《越族的发展与流散》,《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

会稽”、“禹封禅于会稽”、“禹道死葬于会稽”、“禹与会稽鸟耘”等等，无不富有浓郁的传奇色彩，交织、组合成丰富璀璨的禹神话系列。除文献外，从故迹来看，《越绝书》中有“禹冢”、“禹宗庙”、“禹稷”的记载，《史记》说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即使是司马迁本人也“上会稽，探禹穴”，因此，可推断：战国时候，绍兴可能已有禹庙；先秦时候，绍兴已有禹迹传说；秦汉时，禹葬会稽的传说，已牢不可破<sup>①</sup>。检查地方志及其他文献资料，仅绍兴、余姚、上虞三县境内就找出了18处传说中的舜、禹故迹<sup>②</sup>，“在这类传说中，舜，禹已经不是北方来客，他们生于斯，葬于斯，立功业于斯，恰恰证实了顾颉刚的论点”。<sup>③</sup>

就地名而言，吴越地区不少古老地名都与舜、禹的神话传说相关。如余姚、余杭、杭州、上虞、姚江等等，这在现代民间传说中可获得佐证。

吴越地区还保存着许多与禹有关的风尚习俗。俗传农历三月初五为大禹的生日，此日为禹陵最隆重的节日。古时，每逢此日，由历代皇帝御祭或诰祭大禹，至明清两代此俗最盛。<sup>④</sup>

最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仍在江浙民间口头流传的丰富多采的禹神话传说。这些“活化石”作为文献记载的补充与延伸，其价值显得弥足珍贵。如杭州、余杭流传的《禹杭》、《枕舟山》等，金华一带流传的《船埠头》、《皇停山》、《金鸡垅》等，台州流传的《龙符山》，宁波流传的《破船变陆地》、《禹船城》，绍兴流传的《卧龙山》，嵊县一带的《禹余粮》等等，以民间口碑的形式，演绎了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尤其是1982年

① 《吴越文化新探》，第2页。

② 以后又有不少学者陆续加以补充，据初步统计已达26处之多。

③ 《越族的发展与流散》，《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

④ 1995年4月20日在绍兴大禹陵举行了“浙江省暨绍兴市各界公祭大禹陵典礼”，与此同时，还举行了“大禹国际学术讨论会”。

后,在浙江各地又陆续发现了防风神话群系,引起了学界的惊讶和珍视,又为禹治水神话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

防风氏的历史神话,始载于《国语·鲁语下》<sup>①</sup>,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中只是将《国语》关于防风氏的神话基本照抄了一番。此后,仅有《述异记》和一些方志略有提及与补充。及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全国性的民间文学普查工作的开展,在浙江发现了大量防风氏神话传说的口碑资料,北京《民间文学》杂志1990年第1期发表了其中九则,并写了“珍贵的发现”的按语,称之为是中国近年来继中原神话、云南岩画、纳西族祭天古歌之后,神话学界的又一重大发现,其价值“不仅仅填补了我国神话传说的一项空白,更主要的还在于它具有较高的有关古代文化研究价值”。截止1993年,浙江各地已采录的防风氏神话传说有21则<sup>②</sup>(另外江苏太湖地区也有防风氏神话)。这些传说从不同侧面对防风氏的形象、居地、事迹、遭遇等作了描述,并提供了文献上未曾有的新内容,具有四方面的特色:第一是结合吴越自然环境,大量反映防风治理洪水、教民农业生产、开发太湖流域农业文明的艰苦历程;第二是说明了大禹为什么要杀戮防风(有“迟到”说、“误杀”说、“借故杀戮”说三种类型);第三是紧紧依附在吴越山川地名上;第四是有其历史悠久的民俗传承。如德清、武康二都相传为防风故土,自古以来有防风祠建筑,每年逢农历三月初三和八月二十五日为春秋祭祀之期,届时出庙会、演庙戏、跳防风舞,这种防风庙会风俗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盛行。

① 董楚平:《〈国语〉“防风氏”笺证》,《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

② 董楚平:《防风氏神话的新发现》,《浙江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 第四节 吴越诗歌

吴越地区的歌谣起于何时,已无法弄清楚。“但也不会比《诗经》更迟。可是因为《诗三百篇》的编者只收集了中原和江、汉的《国风》,江以南的吴、越、楚都没有在《风》、《雅》中占得一席之地。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蛮夷馥舌之音,还不足以登中原文化的大雅之堂的缘故。可是这并不能证明吴人没有歌,不会唱”<sup>①</sup>。《楚辞·招魂》:“吴歊蔡讴,奏大吕些。”东汉人王逸注曰:“歊、讴,皆歌也。”“大吕,六律名也。《周官》曰:舞云门,奏大吕。言乃复使吴人歌谣,蔡人讴吟,进雅乐,奏大吕,五音六律和调也。”“歊”又与“愉”通,左思《吴都赋》中有“吴愉越吟”之句。唐人李善注曰:“愉,吴歌也。”因此,“吴歊(愉)”、“吴吟”、“越吟”、“越歌”、“越声”都是指先秦时吴越人吟唱的歌曲。在《越绝书》、《吴越春秋》、《说苑》等文献中保存着不少吴越的诗歌谣谚<sup>②</sup>,多侧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景象。

文学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所谓“饥者歌食,劳者歌事”(《韩诗·伐木序》),在《吴越春秋》中就有两首表现织妇、木工生活的诗歌,其一是《采葛之妇歌》。当勾践作为“人质”从吴国获释后,返归故里,他一方面“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另一方面又要掩吴王耳目,使他放松警惕,为求其欢心,便大量朝献“贡货”以示臣服,而其中贡品之一是“乃使国中男女入山采葛”,“使女工织细布献之”,采葛之妇伤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诗(或曰“若何之歌”,或曰“何苦之诗”)曰:“葛不连蔓菜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尝胆不苦甘如饴,令我采葛以作丝(饥不

① 顾颉刚:《吴歌小史》,《顾颉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2页。

② 金永平:《吴越诗歌谣谚刍议》,《探索》1989年第6期。

遑食四体疲)<sup>①</sup>，女工织兮不敢迟。弱於罗兮轻罪罪，号絺素兮将献之。越王悦兮忘罪除，吴王欢兮飞尺书。增封益地赐羽奇，机杖茵褥诸侯仪。群臣拜舞天颜舒，我王何忧能不移！”这首诗的基调表面上似含着织女们“理解”勾践的“良苦用心”，乐意用自己的劳动为越王分忧解难，其实，诗中蕴含着织女的疲惫、憔悴与心酸，“（饥不遑食四体疲），女工织兮不敢迟”便是她们辛勤劳作、无可奈何的苦叹。

假如说《采葛之妇歌》在表达哀怨上还较为含蓄、隐晦，那么《木客吟》（有名无辞）便直截了当地抒发了木工们怨愤之情。据《吴越春秋》卷九《勾践阴谋外传》载：“越王乃使木工三千余人，入山伐木。一年，师无所幸。作士思归，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吟。”虽然书中具体的歌辞没有记录、流传下来，但是，很明显，这是一首表达木工们因服苦役，久不能回家而产生的忧思、愤懑和怨恨心绪的歌谣。

揭露统治者的乖戾，表现指斥、劝谏情绪，有伍子胥被吴王处死前“垂涕”吟诵的一首四言诗，“於乎哀哉！遭此默默；忠臣掩口，谗夫在侧；政败道坏，谄谀无极；邪说伪辞，以曲为直”，其结果必将使吴国“宗庙既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荆棘”，这些都是诤臣伍子胥发人深省、忧国忧民的箴言与忠告。

吴越地区舟楫的发达与兴盛，使舟楫文化在吴越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产生了许多与舟楫有瓜葛的歌谣。西汉刘向的《说苑·善说》篇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战国时期楚国令尹鄂君子皙泛舟江上，一位榜柁（摇船的短桨）越人“拥楫而歌”，歌辞曰：“滥兮抃草滥予昌桓泽予昌州州堪州焉乎秦胥胥纒予乎昭澶秦踰渗悝随河湖。”子皙听后，不知所云，说：“我不懂这首越歌，谁给我用楚语翻译一下？”于是召来越语翻译，用楚语翻译成楚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幾顽而

<sup>①</sup> 今本《吴越春秋》无此句，而《文选》注援引该诗时有此句。

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悦）君兮君不知。”<sup>①</sup> 鄂君听后很高兴，挥动长袖，走到越国舟子面前，和他拥抱，并把绣衣披到他身上。这首《越人歌》不仅保存了用汉字记越音的原词，而且还有楚人通过越语翻译成汉文的歌词，况且，在文献中这是唯一保存完整的、地道的用越语吟唱的歌谣，无论是探求楚、越语言的差异性，抑或研究越人的方言（胶着语）的独特性，其史料价值都是很高的。“在中国上古找翻译作品，这首歌怕是独一无二了。歌词的旖旎缠绵，读起来令人和后来南朝的‘吴歌’发生联想”。<sup>②</sup>

在《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中，还分别录有《渔夫歌》。据《越绝书》卷一记载：“（伍子胥）南奔吴。至江上，见渔者，曰：‘来，渡我。’渔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过之，曰‘日昭昭，侵以施，与子期甫芦之碕’。……日入，渔者复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为不出？’”而在《吴越春秋》中，其情节更为详尽，歌词也基本类似而有所差异，该书描述了伍子胥逃出昭关后，前遇大江阻隔，后有追兵相逼，在这危急之际，恰逢一渔夫驾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渔父欲渡之，“适会旁有人窥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以驰，与子期乎芦之漪。”子胥即止芦之漪。渔夫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事寝急兮当奈何？”这两首歌都是渔夫驾舟搭救子胥时的信口吟咏，暗示子胥藏身之地以及渡河之时，这既表现渔夫的心地善良、恪守诺言、助人于危难的品格，又显示出他见机行事、善于应变的性格特征。将二书的《渔夫歌》作一比较，便会发现：其一，有音同字异现象。清人黄生就注意到这一点，他认为：“《越绝书》驰作施，下乎作甫，漪作碕。施，日斜也；碕，曲岸也，二字义较确”（《义府》卷下）。这音同字异现象，也许正表明了民歌在流传中是口耳相传，仅记其声

① 《越人拥楫歌》的解读见上编第十章。

② 梁启超：《中国之美学及其历史》，《饮冰室合集》第十六册。



而已,不必过于拘泥字形。其二,从形式上看,《吴越春秋》中的《渔夫歌》似乎更像“诗歌”,语气词的增添,句式的联贯,其加工修整的痕迹十分明显,由此推断,《越绝书》中的《渔夫歌》更为“原始”。

《吴越春秋》中渔夫的即兴吟唱还体现在“芦中人”的称呼上。当渔夫将子胥摆渡过江后,又为子胥去取果腹的饭菜,而子胥却深怀戒心,潜身于深苇之中,“渔夫因歌而呼之曰:‘芦中人,芦中人,岂非穷士乎?’”径直以“芦中人”相呼,颇具戏谑、幽默的情趣。与此相照应,在同书卷四中,当伍子胥引军攻打郑国,郑国招募能够击退吴军的人,渔夫的儿子当即应募,并夸口不用一兵一将。当子胥率军将至,“(渔者子)当道扣棹而歌曰:‘芦中人!’如是再。”于是子胥思恩图报而还军。短短的“芦中人”三个字,前面均冠以“歌”字来形容,可以想象其何等婉变轻扬,清丽悠远,绵绵徐游。

与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相关联,也有两首歌谣,第一首是《候人歌》。据《吕氏春秋·音初》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尽管涂山的地望众说纷纭,但袁珂认为,此歌系浙江涂山一带的歌谣。<sup>①</sup>

《候人歌》虽然只是在“候人”实词后附缀了两个感叹虚词(且为叠韵),但语气更为婉转、绮柔。闻一多认为这“便是音乐的萌芽”。游国恩也认为这是骚体文之权舆,“导楚辞之先河”。

在《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中,还有一首《涂山之歌》:“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这首歌谣是大禹娶涂山女的“讖语”,其诗味、格式与《诗经》极其类似,如出一辙。

在《吴越春秋》中有几首倾吐离情别绪的诗歌,这就是《越王夫人

<sup>①</sup> 《中国古代神话》,第226页。

之歌》。勾践夫椒之败后,仅剩残兵五千被夫差围困在会稽山上。为保存疆土,只得俯首称臣,且要含辱负耻,远离故乡而入吴为质。在离开越国的时候,群臣送至江边,在船将要启动之际,越王夫人据舷悲戚,恸哭而歌之曰:“……妾无罪兮负地,有何辜兮谴天。飒飒独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懔懔兮若割,泪泫泫兮双悬。”一曲才罢,似乎意犹未尽,复又哀吟曰:“……始事君兮去家,终我命兮君都。终来遇兮何辜,离我国兮去吴。妻衣褐兮为婢,夫去冕兮为奴。岁遥遥兮难极,冤悲痛兮心恻。”细读二诗,其感情非常质朴、真率,呜噎悲哽,如泣如诉,充分倾泄了越王夫人缠绵悱恻、哀怨惆怅的情愫。

春秋战国之际,列强彼此兼并,征伐频繁。在《吴越春秋》中,就有两首反映越国征战的诗歌。其一是越王勾践经过“十年教训”、“十年生聚”后,国富兵强,遂决定一雪宿耻,起兵伐吴,军至边境,“军士各与父兄昆弟取诀,国人悲哀,皆作离别相去之词,曰:“踈蹠摧长恶兮,擢戟馭殳。所离不降兮,以泄我王气苏。三军一飞降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当百夫。道祐有德兮,吴卒自屠。雪我王宿耻兮,威振八都。军伍难更兮,势如貔豸。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尽管诗的上下文再三使用了“取诀”、“悲哀”、“离别相去”等凄恻语辞,但是,展读全诗,似乎并没有流露出这类情感,而是充溢着勉励出征、为王雪耻的豪气与一以当百、所向无敌的雄威,整首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另一首是《河梁之诗》。勾践二十五年,越王精选了将士,准备西渡河以攻打秦国。路途遥远且雪霜交迫,军士苦不堪言,这时,恰逢秦恐惧,不战自降,于是,越军上下一片欢欣,遂作《河梁之诗》,全诗表述了从行军艰难的征战之苦到忽闻秦军不战而降、可以凯旋的喜悦之情。

在《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中还有三首祈求佑助、寿庆宴饮的祝词贺诗。前二首是越国君臣在江边告别时的祖道祝词,其内容主要是宽慰劝说越王并祈求神祇庇护、逢凶化吉之类。后一首是勾践向

吴王进献的贺寿诗,内容不外乎歌颂夫差慈仁厚德、洪恩浩荡并预祝其延寿万福等等。

吴越诗歌谣谚,就艺术表现手法而言,首先是比兴的运用。所谓比、兴,根据朱熹的说法:“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例如,《吴越春秋》中的《河上歌》便是通篇用比。当楚之亡臣伯嚭奔吴后,吴大夫被离认为此人不可信,子胥便援引《河上歌》来表明自己的看法。“同病相怜,同忧相救。惊翔之鸟,相随之集。瀨下之水,因复俱流。胡马望北风而立,越燕向日而熙。”歌词分别用惊翔之鸟、瀨下之水、胡马、越燕来引类譬喻,反复说明伯嚭与自己是同病相怜、同忧相救、同仇敌忾之人。

而两首《越王夫人之歌》则是比兴交织在一起。第一首的开头是这样描写的:“仰飞鸟兮乌鸢,凌玄虚兮翩翩。集洲渚兮优恣,啄虾矫翮兮云间。……”第二首的开头稍有不同:“彼飞鸟兮鸢乌,已回翔兮翕苏。心在专兮素虾,何居食兮江湖。徊复翔兮游飏,去复返兮於乎!……”勾践夫人在江边即将登舟随越王去吴国。目睹了许多乌鸢(苍鹰)时而聚集沙渚,时而啄食鱼虾,时而凌空翱翔,这自由自在、优哉游哉的神态,触发了越王夫人内心的愁苦,联想到自己将远别故土、沦为吴王的“囚臣”和“奴婢”,从而抚舷悲吟,抒发了羈押縲继之块垒,所以整首歌词回肠荡气、催人泪下。又如《采葛之妇歌》,即景生情,以麻葛的花蒂蔓延茂盛来比拟织女们哀怨之深广。

其次,明白如话,直抒胸臆。如《渔夫歌》中的渔夫驾舟飘然而至,歌词即兴吟咏,直接告诉子胥藏身芦苇之中并约定上船时间。又如《河梁之诗》:“渡河梁兮渡河梁,举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冬道路诚难当。阵兵未济秦师降,诸侯怖惧皆恐惶。声传海内威远邦,称霸穆桓齐楚庄。天下安宁寿考长,悲去归兮何无梁。”全诗没有冷僻深奥的字眼,因而绝无晦涩拗口之感。

再次,韵律和谐,节奏明快,吟咏朗朗上口,抑扬顿挫,饶有韵趣。

如本文所列举的诗歌谣谚,稍加留心,便会明了他们不仅非常注意韵节,而且还有句句入韵的。如《河梁之诗》就是通首押韵的。

倘若从诗体方面来考察,大要有骚体诗(楚歌体)、工整的七言诗、四言雅颂体以及句式参差不齐的杂体诗等等。

总之,吴越的诗歌谣谚,涵盖面广,内容也丰富多采,在艺术上也有其独到之处。

## 第十章 古越语

古代越国为百越之一的於越，而吴国号称与周同姓为华族，但文献记载与语言材料都表明两国语言相通，吴越同说一种古越语。下面即以“古越语”赅括古吴越两国人民的语言。

古吴越两国的主体疆域在今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以及皖南赣东北地区。现代在这一区域内的主体方言为吴语，分布正大略相似。所以粗看会认为今之吴方言即是古越语的继承发展。

其实两者没有直接继承关系。古越语属一种古侗台语；而吴语则是一支汉语方言，是在越国灭亡后，楚国及秦汉人对吴越进行开发后才逐步发展形成的。虽然在吴语中也可找到古越语的影响和遗存成分，但这属于语言底层影响。从发生学来说，吴语是汉语方言，汉语属于汉白语族，跟侗台语族的古越语虽然都属汉藏语系，但语族不同，即远祖虽同而后代已各有源流；所以不是直接继承关系，而只是同一地域内胜利语言对失败语言的接替关系。

但原语言显然对后来方言的形成也发生重要作用，吴语所以形成自成一系的汉语方言，显然与古越语的历史背景有关。古汉语与这一地域内古越语的结合才形成了一支自有特色的方言，所以两者的分布才这么吻合。

古越语虽然没有直接完整的语言记录，但从传流下来的间接记

载、地名、人名、零星词汇及两篇越语文献,还能了解它的面貌、辨认它的系属。辨认的关键则是对文献及词汇材料所作的亲属语言比较与解读。

---

## 第一节 吴越两国所说古越语的系属

---

古越语通行于春秋时的吴越两国。《吕氏春秋·知化》篇记伍子胥语:“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得使。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道]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这说明吴越两国语言相同,但跟北面的齐国不同,不能通话,与其民不能相处。

刘向《说苑·善说》记鄂君子皙听不懂越人之歌,“乃召越译,乃楚说之”。这说明古越语与西边的楚国语言也不相同,需要专门翻译才能通意。

《齐风》、《楚辞》这些地方文学作品所用的语言表明齐楚两国说的是汉语(华言),又反证了吴越语不是汉语。

吴国王族自称太伯之后,据说是周的同姓,原本来自中原(周王室也予以承认)。那么王族可能通华语,但其人民却操越语。统治层与被统治层语言不同并不奇怪,久则会相化,犹如清皇族入关后,改说京话。吴王族口语也可能已经越化,其王名就是越式的。吴越王所作礼器铭文之用汉字,则是文字的借用,有如后世朝鲜、日本、越南等国长期使用汉文为官方书面语那样。这些金文材料中只有人名地名才表现出古越语的特色。

古越语文献今留存很少,可以肯定的只有《越人拥楫歌》与《勾践维甲令》见于引录。但大量的地名、人名及扬雄《方言》中“吴越”“瓯越”语的记录,及《越绝书》的有关材料,还能帮助我们认识古越语的

面貌。例如吴越地名中以“馀、夫”开头的，王名以“无”开头的很多，旧说以为这些都是无义的“发语辞”，现在经过语言比较，了解到这些字古读 a 韵，“馀”义大略相当“田地”，“夫”义相当于“山”，“无”相当于“君”，所以见于人地名很自然，并合于侗台语中心词在前的语法。从词语的音义及语法结构足以证明古越语是一种古侗台语，是今日侗语、水语、壮语、傣语、泰语、黎语、越南京语、缅甸掸语等共同祖语的兄弟语。古百越语原分为於越、瓯越、闽越、南越、西瓯越、骆越等支，大同而小异。今侗台语大致是西瓯越一支，越南语大致是骆越一支的后裔，所以研究吴越地区的古越语（即於越、瓯越两支的语言），可以拿今侗台语等作为亲属语言进行比较。由于这些语言中泰文的文字形式早，词典中保留的古词又多，所以拿泰文来比较有方便处。但要特别注意，泰文并非古吴越语的直接后裔，只是其兄弟语的后裔，故还需要其他侗台语材料相辅以补其不足。再还要注意，这些既都是后代语，比较时就得避免其中后起形式的干扰。

---

## 第二节 古越语文献解读

---

### 一、《越人拥楫歌》解读

越人作品遗留极少，明指越人所作而且内容完整、原语译语都齐备的则只有《越人拥楫歌》（简称《越人歌》）。因此解读这一作品是了解古越语面貌和判别它属于何种语言的重要关键。

《越人歌》著录于汉代刘向《说苑》卷十一《善说》：

鄂君子皙之泛舟于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会钟鼓之音毕，榜桡越人拥楫而歌。歌辞曰：“滥兮葭草滥予昌蒲泽予昌州州谿州焉乎秦胥胥纍予乎昭漘秦踰滲悵随河湖。”

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于是乃召越译，乃楚说之曰：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舟中”原作“中洲”，从孙诒让《札述》改）；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幾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悦）君兮君不知！”

于是鄂君子皙乃揄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鄂君子皙亲楚王母弟也，官为令尹，爵为执珪，一榜柁越人，犹得交欢尽意焉。

史载子皙在公元前 528 年短期任令尹，韦庆稳氏推测此歌当作于这一年。因越人擅长舟楫，故鄂君夜游南湖就聘用越人为其执楫。越人也因能与王子同舟而高兴地唱起船歌来。

越人歌原文用汉字记音凡 32 字，而楚译人译成楚辞的形式用了 54 个字，竟多了 22 字，可见两者不是一种语言，所以不能字字对译。双方歌式也不同，楚译人为了使译文合于楚辞歌式，还要添加凑韵的游辞。

原文因不知其意而无法断句。只是有两种尝试：一是依诗经那样四字断句，分为八句而不管韵脚；一是据末字“湖”属古鱼部字，便依鱼部为韵酌为点断。但因没有原语为据，难定是非。

由于民族学者推测古越族属南岛语族或侗台语族，所以在解读方面也有以下两种尝试。

1953 年日本学者泉井久之助在《言语研究》第 22—23 期发表《关于刘向〈说苑〉第十一卷中的越歌》，将《越人歌》首先试用占语进行对比，因为他相信古百越说的是南岛语，而占语是比较保守、保留古老形式较多的一支南岛语。他把汉字记音的越歌原文，四字一句分为八句。对译的八句占语义解为：“尊敬啊伟大的王孙，尊敬啊伟大的贵人，认识啊伟大的王孙。王孙正义的、王孙尊贵的，我在幸福幸福。心、我服从，所有人在繁荣中，一人长久地祝福。”——泉井氏的译解有以下缺陷：（1）汉字古音采用高本汉已过于陈旧的拟音，如鱼部



“胥”上古应为 sa, 他对占语 su“幸福”, 另一鱼部字“湖”应为 ga:, 他对 kuh, 都像宋以下音而不合先秦音。“予”字两次对 yuei, 一次对 no, 两音差得很远; 同一个“王孙”又用来译汉字“草”和“州”, 这两字字音也不相近, 对音内部先陷于矛盾不一。(2) 楚译六句含有四层意思: 夜行舟于中流, 喜得与王子同舟共渡, 为自羞鄙陋而王子不见绝而喜, 暗中思慕王子如枝恋木。泉井氏的八句译文实质只表现了楚译“得知王子”、“心悦君兮”两个“半句”的意思, 至关重要的与王子一起“拏舟中流”竟一无表现, 操舟越人原来正是为这一点才兴奋放歌的。泉井氏的译文却跟舟一点关系也没有, 只是一些任何场合任何人对贵人的尊崇致敬的颂辞而已, 看不出是船夫拥楫之歌, 所以他的译解没有成功。

1981年韦庆稳首先提出与壮语比较, 这是一个好建议。他将原歌分为六句, 长短不拘, 主要以鱼部字断韵, 各句义解对照如下:

滥兮葐草滥予	今晚是哪晚
昌溱泽予	舟中哪位
昌州州谿	朝中大人到
州焉乎秦胥胥	大人赏识邀请, 拜见谢谢
纒予乎昭漣秦踰渗	哪处访大人探望游玩
悵随河湖	小人心中独自感激。 <sup>①</sup>

韦氏的译解比泉井氏好, 但也有缺陷: (1) 汉字古音据董同龢拟音, 虽略胜高本汉, 也已陈旧。匣母<sup>h</sup>ɣ一下对壮语 g, k(河), 一下对 r/ɣ, l(予桓湖)、一下对 n(兮), 其实匣母属于喉牙音, 上古虽可分拟<sup>h</sup>g、<sup>h</sup>fi/ɣ, 但决不能对舌齿音 r, l, n 的。(2) 所对壮语各方言不是一个单一的音韵系统, 又都是现代方言, 内部已有复杂变化。韦氏却

① 韦庆稳:《“越人歌”与壮语的关系试探》,《民族语文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

哪个方言音近就取那个,随意性太大。例如以“桓”对来南  $\gamma u$ ,这是据今音相对。就汉语古音说,“桓”作 \*ga 或 \* $\gamma a$  都不能对  $\gamma u$ ;就台语说,来南  $\gamma u$  来自 r-,泰文 ruwa,田阳 lia 都表明台语古代舟应为流音 r/l 声母字,跟“桓” \*ga 差得很远,根本不能比对上。(3)“州、昭”都认作汉语“朝”的借词,引申为“朝中大人”,义既有偏差,古音也不合:“州”在幽部,“昭”在宵部,同一词在同一个歌里怎能对成两个不同部的字呢?(4)译文六句表示了楚译“今夕何夕兮得与王子同舟”、“得知王子”、“心悦君兮君不知”,其他像同舟共渡的喜悦、顽鄙而不见绝的感动等意思仍无表示。但他指明古越语属于侗台语族,给译解工作引导了正确方向。

郑张尚芳《越人歌的解读》<sup>①</sup>用侗台语中文字形式较古的泰文为主进行译解,分原文为五句:(左栏为原文,右为泰文译意)

滥兮蹇草滥	夜晚哎欢乐相会夜晚,
予昌障泽、予昌州	我好害羞,我善摇船,
州谿州焉乎、秦胥胥	摇船渡越、摇船悠悠啊,高兴喜欢!
纓予乎、昭澶秦踰	鄙陋的我啊王子殿下高兴结识,
渗悞随河湖	隐藏心里在不断思恋哪!

郑张译解有以下特点:(1)用自拟的古音系统<sup>②</sup>,对高本汉、王力、董同龢、李方桂诸氏系统中未能解释的地方都作了补订。(2)所对泰文是个内部统一的音韵系统,对音条例很规则,只在个别音类出现变异的例子时才引证同语族语言中同样变异的语例。(3)对原译四层意思尤其是“蒙羞被好”、“心幾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的感激之

①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东方语言学报》(CLAO)第20卷第2号,1991年(英文)。中译文见《语言研究论丛》(七),语文出版社1997年版。

② 郑张尚芳:《上古音构拟小议》,《语言学论丛》第14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上古韵母系统和四等、介音、声调的发源问题》,《温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

情都有了相对应的交代(只有“山有木兮木有枝”一句当是楚国译人为满足楚辞韵例凑足六句而添的衬韵句,以“枝”谐“知”而已,故泉井氏、韦氏也都没有把它考虑在内)。郑张的对译得到我国台语研究大师邢公畹先生及国外两位泰文专家的肯定,由此可以确定越人歌是用一种古台语写作的。具体词语的对译见下面的对照表,表分四栏,一、二栏是记音汉字及其上古拟音(注意三等字上古用短元音,一、二、四等字上古用双字母长元音表示,上声用?尾,去声用s或h尾表示,垫音j只用于章组及邪母),三、四栏是泰文词的书面拼法的拉丁字母转写(注意泰文的1调〔去声〕转写作-h,2调〔上声〕转写作-x)及其词义。

第一句 [汉]	濫	兮	杼	草	濫		
	figraams	fiee	brons	tshuu?	figraams		
[泰]	glamx	fiee	blɣɣn	cɣɣ	glamx		
	夜晚	哎	欢欣、陶醉	遇见、相会	夜晚		
第二句 [汉]	予	昌	桓	泽	予	昌	州
	la	thjaanɳ	gaah—draag	la	thjaɳ	tju	
[泰]	raa	djaanɳ	kra?—daak	raa	djaanɳ	ceeu	
	我俩,我	很会,多么	害羞,难为情	我	很会	摇船	
第三句 [汉]	州	憊	州	焉	乎	秦	胥—胥
	tju	khaam?	tju	jen	fiaa	dzin	sa
[泰]	ceeu	khaamx	ceeu	jɣɣnh	fiaa	djuuunh	sa
	摇船	渡越	摇船	久久	啊	愉快	满意
第四句 [汉]	纒	予	乎	昭	漣	秦	踰
	moons	la	fiaa	tjau	daans	dzin	lo
[泰]	mɔɔm	raa	fiaa	caux	daanh	djuuunh	ruux
	污秽	我	啊	王子,君	阁下	高兴的	知晓
第五句 [汉]	滲	悞	随	河	湖		
	sruums	dje?	ljoi	gaai	gaa		

[泰] zumh      caĩ      ruaiih      graih      gaʔ  
 隐藏      心      始终不断      思慕      哇<sub>语助词</sub>

可以注意原语中有许多与汉语是同源的，“兮、乎、予”几乎都同音同义，“州”也就是“舟”，不过用为动词，“踰”也就是“喻”（家喻户晓的喻），“昭：主”、“扑：忤”、“草：遭”、“昌：匠”、“秦：亲”、“愷：志”、“澶：殿”、“濫：暗阴”等分别音义相关；译者专选一个心旁的罕用字“愷”对译心，也似乎有点特别用心。以“昭”对“主”也是后世“诏”对“主”的先声。从此歌译解看，既证明越人操一种侗台语，又证明它的许多语词也是与汉语同根的。

此一译文在韵律上是二与四句、三与五句各自相叶，第一句是“濫”字首尾循环，“草”叶第二第四句（因“草”古为幽部字，与幽部“州”、侯部“踰”音近）。本译文虽与韦译同用台语比较，但因古音拟音见解不同，只采用韦氏一个“濫”字的夜晚义（“濫”从“监”声，《集韵》又“胡暂切”同“鑑”，故音\*figraams）。

## 二、勾践《维甲令》解读

公元前 494 年吴越夫椒之战，越大败求和，饱受耻辱，勾践卧薪尝胆，蓄志雪耻，十年生聚，终于灭吴。《越绝书·吴内传》曾记录勾践还都六年即战败十周年向越民发布的备战动员口号——维甲令：

越王勾践反国六年，皆得士民之众，而欲伐吴，于是乃使之维甲。维甲者，治甲系断。修内矛，“赤鸡稽繇”者也，越人谓“人鍬”也。方舟航，“买仪尘”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须虑者，越人谓船为“须虑”。亟怒“纷纷”者，怒貌也，怒至。“士击高文”者，跃勇士也。习之于“夷”，“夷”，海也；宿之于“莱”，“莱”，野也；致之于“单”，“单”者堵也。

这一动员令大体已被史官译为华语，但又努力保留了一些原语

词句并译注其大意。只因华语译文、附注的越语原文对音及义解,三者都夹混在一起,所以显得杂乱,难以卒读。不过也正因夹有这些原语注解,才显出这份材料的原始性及可信性。现经整理分出正文与注解,即可看出原来主要是四句口号(下以五号黑体字表示),其余为注解(加括号表示),注中~号表示“者”前所省略的正文被注句语,[ ]号内为对前一字的校字。这四句口号是:

- (1) **维甲**(~者,治甲系断),**修内[纳]矛**(“赤鸡稽繇”者也,越人谓“人[入]鍬”也)。
- (2) **方舟航**(“买仪尘”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须虑”(~者,越人谓船为“须虑”)。
- (3) **亟怒“纷纷”**(~者,怒貌也,怒至),士“击高文”(~者,跃勇士也)。
- (4) **习之于“夷”**(“夷”,海也);**宿之于“莱”**(“莱”,野也);**致之于“单”**(“单”者,堵也)。

据《国语·越语下》三国吴人韦昭注,越王反国六年为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也即吴国伍子胥被赐剑自尽之年(伍员被杀正对越国反攻有利)。如果韦注可信,“维甲令”可能比“越人拥楫歌”晚44年。

**解第一句**“维甲”是借用汉语。“赤鸡稽繇”则是越语,译“修、纳矛”或“入鍬”。“入”为“内”(献纳的纳)本字,殷墟妇好墓玉戈文“卢方皆入戈五”已用“入(内)”为献纳。

《说文》:“鍬,铍有鐔也。”《方言》九“鍬谓之铍”郭注:“今江东呼大矛为铍。”《说文》:“鍬,长矛也。”《国语·吴语》“被甲带剑,挺铍”董增龄正义:“矛长故可言挺……则铍当于长矛矣。”《史记·秦始皇本纪论》有“句戟长鍬”,都说明“鍬”即长矛。也说明“入鍬”即“内矛”。有人改“入鍬”为“大鍬”,有人以“鍬”对台语“男人”tsai,皆于此句句义不合。那么“赤鸡稽繇”就是修矛纳鍬之意(纳有交纳、修补之义)。正好与泰文比较如下,对照体例同上节《越人歌》解读。

[汉字]	赤(铎部三等)	鸡(支部四等)
	thjaag	kee
[泰文]	cak	keex
	要,将要	修理,整理
[汉字]	稽(脂部四等)	繇(宵部三等)
	klii	leu
[泰文]	c - rii   krii   kridj	leeu   reu
	刀、矛   虾额刺   短剑	①坏的②战斗   快、早

依泰文所示,前三字为“要整修刀枪”义,末字则有歧义,如对 leeu 可有“坏的刀枪”、“战斗用的刀枪”二解,如对 reu 则为“快快整修刀枪”也可通。

“稽”为枪矛义,也见于《国语·吴语》:“陈士卒百人以为徼行百行,行头皆官师拥铎拱稽。”韦昭注:“唐尚书云:稽,桡戟也。”董增龄正义:“稽之为戟,经传无文。”他不知这是用的古越语。

**解第二句“买仪尘治须虑”** 吴越为水乡泽国,行旅、打仗都离不开舟船。《越绝书·外传记地传》勾践说“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越之常性也。”《国语·吴语》记吴越将“舟战于江”。《汉书·严助传》也说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所以要动员备战就得准备航行、练习水战本领。“方舟航”的“方”本义为并船,这里是用为动词,即航行;如同《诗·汉广》“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的“方”。也读如“舫”,如桓谭《新论》:“水戏则舫龙舟,建羽旂,鼓钩乎不测之渊。”因此原注说“买仪尘”就是越语“方舟航”之意,指越人意欲去吴国的长江航行,而不是“买”什么叫“仪尘”的船。治“须虑”才是治船。此语与泰文比较如下:

[汉字]	买(支部二等)	仪(歌部重组三等)	尘(文部三等)
	mree?	ŋrai	duu
[泰文]	hmaai	ŋɣɣi	?dɣɣn   ?dɣn - ruu

	打算、决意	昂首,扬眉吐气	行进 航行
[汉字]	须(侯部三等)	虑(鱼部三等)	
	so	rah	
[泰文]	sa? 词头 sa? 词头 古代船名	rua 船,舰艇	

则此句原义为“要决意扬眉吐气航行(于江),就要整治战船”。《汉书·严助传》:“越人欲为变,……乃入伐材治船。”(入谓入余干,那里木材大,造船技术高。《酉阳杂俎前集·物异》犹云:“昆明池汉时有豫章船一艘,载一千人”)

“仪”对ηxvi 还有一证。《越绝书·记地传》:“语儿乡,故越界[地],名曰‘就李’。吴疆[强]越地[界]以为战地,至于柴辟亭。……勾践胜吴,更名女阳[亭],更‘就李’为‘语儿乡’。”“语儿”古音’ηa?-ηee (“儿”字取五稽切),正可对泰文带词头的ηa?-ηxvi。胜吴之后,抬头翻身、扬眉吐气了,所以把被收复的“就李”改名为昂首扬眉吐气之乡。

**解第三句“亟怒纷纷,士击高文”** 要伐吴复仇,激发士气非常重要。《孙子·作战》:“故杀敌者,怒也”,曹操注:“威怒以致敌。”《韩非子·内储说上》:“越王勾践见怒蛙而式之,御者曰:‘何为式?’王曰:‘蛙有气如此,可无为式乎?’士人闻之曰:‘蛙有气,王犹为式,况士人之有勇气乎?’”《太平广记》卷四七三“揖怒蛙”引《越绝书》则记为“〔王〕答曰:‘蛙如是怒,何敢不揖。’于是勇士闻之,皆归越,而平吴。”这是本句最好的说明,即激起战士们对敌人怒火,同仇敌忾,勇往直前。原语译解如下:

[汉字]	纷(文部三等)	士(之部三等)	击(锡部四等)
	phuun	dzru?	keeg
[泰文]	bvun→fun <sup>2</sup>	djaai sua	guuk
	怒气冲冲,怒火中烧	男人 虎,猛士	振奋、激昂的

[汉字] 高(宵部一等) 文(文部三等)

kaau mun

[泰文] kaaux manh

步伐、迈步 坚定的

故原义为“激起冲冲怒火，激昂的勇士们坚定地迈步(赴战)”。

“士”古代本义就是男人，以“士”对 djaai(傣文为 tsai<sup>2</sup>)似是音义兼译(也可能两者同源，可比较汉语“市” \*dju? 既对泰文 zuux, 又可对泰文 caaih, 水语“买”ndjai<sup>3</sup> 也对“市”，说明古汉语“之部”字在侗台语中有 u 和 ai 两种对应层次)。

**解第四句“夷、莱、单”** 原文已注明三语的汉义，这是说的军事训练演习在海上、在田野，以及苦练乃以攻关为最终目标(其中“习”指“习水”，《明堂月令》：“舫人，习水者。”《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乃发习流二千人”，亦指熟习水性者)。

“致之于堵”，如依《说文》“致，送诣也”，“堵，垣也”，即使解为“将勇士送到城垣”，仍有消极防守之嫌。但“致”字还有“取敌制胜”义，《孙子·虚实》：“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淮南子·主术训》：“简子欲伐卫，使史黯往规焉。还报曰：蘧伯玉为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险阻，何足以致之。”高诱注“致，犹胜也。”《汉书·赵充国传》：“飭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而“堵”《集韵》又读平声同“阨”。《诗·出其东门》：“出其闾闾，有女如荼。”毛传：“闾，城台也。”孔疏：“谓当门台也。”相当后世城楼处。“闾”既可“出”，实指城门。不论城门或城门之台，都是取敌攻关的要害处。比较：

[汉字] 夷(脂部三等) 莱(之部一等) 单(元部一等)

li ruu→rau taan

[泰文] (da?-)lee raih ?daanh | ?daan

海 坡地，畚地 关隘 | 硬块版



泰文 ?daan 义为硬块版,相当于“堵”(“五版为一堵”)的一般义, ?daanh 义为“关隘,国境防御之关”,则相当于“阍”(关城之门)。

泰文 da?-lee 跟蒙古语“大海”daleε(汉语音译为“达赖”),西部裕固语 dale、鄂温克语 dalaj 也相同,它们相隔那么远,蒙古等族也不靠海住,因此可能都是从古东夷语传来这个词(“夷”也即是靠海民族的称呼,而侗台先民百越则跟东夷同源)。

汉语“莱”本有“休耕之田”义,于“草莱”一词中也指田野、荒野,故可能也是个音义兼译词,其实泰文 raih(壮语 rei<sup>6</sup>)可能与汉语“地”·fil'eih 同源。

韦庆稳氏曾解本句及第二句<sup>①</sup>,但“单”无解。所解只“夷、莱、虑”合,其他不合。

根据以上解读,可将这一动员口号通译如下:

维甲,赤鸡稽繇	连结好犀甲,快整修好枪矛刀剑!
买仪尘,治须虑	要想昂首航行长江,快整治战船!
亟怒纷纷,士击高文	激起冲天怒火,勇士们坚定地迈步向前!
习之于夷	让勇士们在海上苦练,
宿之于莱	让勇士们在野地宿营,
致之于单	让勇士们去致胜攻关!

《维甲令》发布之第十年(所谓“十年教训”),即前 473 年,勾践终于攻灭吴国,实现了复仇雪耻、称霸东疆的宿志。

### 三、吴越史书《越绝》解义

《越绝书》是吴越人写的关于吴越两国历史、地理、吴越之战的战

<sup>①</sup> 韦庆稳:《试说百越民族的语言》,《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术战备、策略、思想、教训的专书，被称为我国方志之祖。现存十五卷十九篇（唐以前目录则有十六卷二十五篇），分内经内传及外传、外传记两大部分。内记原有八篇“太伯、荆平王、吴人、计倪、请余、九术、兵法，陈成恒”（今缺“太伯、兵法”二篇），这八篇文辞古奥，属先秦作品、《越绝》本文。外传原有十七篇，今存十三篇。其中《外传》今存四篇“本事、计倪、枕中、春申君”，是吴平写的，其余《外传记》九篇则是袁康辑录或新写的。吴、袁都是汉代会稽人，吴平为《越绝》删定复重，订定文辞，加写外传。可惜英年早逝，申酉之交的更始年间就“怀道而终”了。其友袁康“览睹厥意”，继续整理吴越史料，完成了《越绝书》。因此《越绝》是古史本文，《越绝书》则本是其外传，尽管现在混编在一起，原来却是两本书。《越绝书》中又分两部分，《外传》大抵是新莽时写的，《外传记》一直陆续写到建武二十八年还在写，已在吴平故后29年了。

以《越绝》为何称“绝”，历来解释纷纭，未能定论。《越绝书》外传首篇《本事》和末篇《篇叙》都解释过这个“绝”字，可是已经解释得不一样：

《本事》：“问曰：‘何不称《越经书记》而言“绝”乎？’曰：‘不也，绝者绝也。勾践之时，天子微弱，诸侯皆叛，于是勾践抑强扶弱，绝恶反之于善。……以其诚在于内，威发于外，越专其功，故曰《越绝》。’”——这是说“绝”是用来称颂勾践能绝恶专功的。

《篇叙》则说端木赐见“圣人没而微言绝”，《春秋》未及吴越，“乃传吴越，□指于秦。圣人发一隅，辩士宣其辞；圣文绝于彼，辩士绝于此，故题其文，谓之《越绝》。”——这是说“微言”大义绝止于此，“无能复述”。

首尾释义不同倒不奇怪，因《本事》已明说外传“非一人之作”，不同作者见解自可不同（末篇属《外传记》，篇中自称袁康，睹文而悼念“德配颜渊”又同样早逝的“邦贤”吴平，则此篇所说自是袁康见解。首篇属《外传》，说的当是吴平意见）。但这说明汉时整理本书的两位补作者都已不懂“绝”字的真正意义，他们所解既相矛盾，又都牵强附

会,越说越使人糊涂。

后世人有别作他解的,如明田艺蘅《留青日札》卷十七释为“断灭”、“最绝”,近人张宗祥在其手写本的序中释为“不继”,指越史已经断灭不继。但也都只是就汉字“绝”的本字字义所作揣测。

其实《本事》开头一段本来写得不错:“越者,国之氏也。……绝者,绝也,谓勾践时也。……其后贤者辩士见夫子作《春秋》而略吴越,……览史记而述其事也。”解“绝”为勾践时史事记录,可能本来最合适,而却给再问一句“何不称《越经书记》而言‘绝’乎”给搞混了。

其实各国史书各有自己名称。《孟子·离娄下》:“晋之《乘》,楚之《梲杌》,鲁之《春秋》,一也。”如在其中补一句“越之《绝》”,那后来就不会有争论了。

“绝”字中古音 *dziuat*,上古音 \**dzod*,此音正与泰文 *cod*[*tsot*]相近,*cod* 正是“记录,记载”的意思(虽然泰文用为动词而“越绝”用如名词,在二千余年的传承中词义毕竟会有所变化,而古越语也只是泰文的同族语,并非直系相承,动名互变在亲属语中是常见的,古代汉语“衣、女、名”等也都动名相兼)。

《水经注》、《史记正义》引本书只作《越绝》,《史记集解》则称《越录》,《北堂书钞》称《越记》。《越录》、《越记》恰是《越绝》的译意。谁说不能叫《越经书记》来着?只是看译音还是译意罢了。

---

### 第三节 古吴越语词本义探释

---

#### 一、古吴越地名解义

除上述文献所见古越语外,还有其他书籍记录的古吴越词语及地名、人名材料,现先就可考者探释其义。《方言》以外其他字书韵书

中的吴越语词尚待再考。

地名是当地居民给居留地及地理实体取的名称,带着明显的民族语言烙印,外来者也往往名从主人,照以称呼。即使原住民因故迁走或改换语言,地名也往往长久保留下来,有的则随着移民带到新地去。因此可以通过地名了解古代民族的语言及其分布、迁徙等情况。这是一份丰富的素材。

吴越地区一些在吴国越国时代就已产生的地名正表现了古越语的特色,现在还可通过亲属语言比较了解它们的本义。有意思的是过去认为发语辞或无义词头的“夫、余、句”等,经研究却都有实义,而且是中心词(古越语中心词在前)。下面加以分叙。

1. 夫椒——《左传·哀公元年》：“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杜预注：“夫椒，吴郡吴县西南太湖中椒山。”“夫椒”也作“夫湫”，南宋《嘉泰会稽志》卷十八引《郡国志》：“越州椒山，隶会稽县，春秋败越于夫湫。”

几乎使勾践丧国的吴越“夫椒之战”，使这个小山很出名了。有人怀疑太湖中椒山“非战所”，那是误解为陆战，其实吴越都以水军为主力，作为主力决战自应在靠椒山的水面上，而不会在椒山山头上。

“夫”通常以为是无实义的发语词而读“扶”。但这里“夫椒”很明显对“椒山”，“夫”可能是“山”的译音字，而不是什么发语词，因此不需要改读的。“夫”古音 $^hpa$ ，音如今“巴”。一般词典收“邕 $b\bar{a}$  石山：邕关岭（广西地名）”，正是据壮语地名收的，这个“邕 $b\bar{a}$ ”正用于地名头上。《徐霞客游记·粤西游日记四》：“复一里，北上一冈，是为邕歹村。”也早用了这广西地名字，同样放在地名头上，表现了壮语地名特色。

这个词在壮、布依语中都读 $pja^1$ ，义为石山，音义正与夫椒之“夫”相当（佯黄 $pa^1$ 、泰文 $pha^1$ 则为岩石义）。所以“夫椒”相当于“邕椒”古译，正是古越语属侗台语的明证。汉晋南朝时曾设置以“夫”冠首的地名，如“夫夷”侯国在湘桂边境，“夫宁、夫阮、夫罗”等县在今广

东,那时都是越人住的地方。其后“夫”变轻唇逐渐向 fu 发展,才不用来译 pa/pja,而改译“邕”了。写“夫”写“邕”不过是异代的异译。

2. 余暨、余姚、余杭、余干——《汉书·地理志》“余暨”(余原从食旁,为印刷方便作“余”,下同)应劭注:“吴王阖闾弟夫槩之所邑。”夫槩(暨)的封地叫“余暨”,可见这里“余”有地的意思。又余姚,《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说是“顾野王云舜后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余姚”。舜的传说且不说,因是姚姓氏族居地而叫“余姚”却可肯定,这里“余”也是“地”的意思。又余杭,《太平寰宇记》说是“夏禹东去,舍舟航登陆于此,乃名余杭”,则其地是搁置舟航之地。这些个表“地”义的“余”都放在地名之首,正是侗台语构词惯例,有如今壮族地区许多以“那”(na<sup>5</sup>)带头的地名。

“余”为鱼部以母字,古音\*la→ja,今侗水语称地或田近于此音:仡佬 la<sup>31</sup>“地”,佯黄 za<sup>5</sup>、仡佬 ʔa<sup>5</sup>、水语 ʔa<sup>5</sup>、毛南 ʔja<sup>5</sup>、侗语 ja<sup>5</sup>“田”。

吴越以“余”带头的地名中,有名的还有江西的余干(也作余汗)。余干在赣东北,原属越,至汉代犹如此。《汉书·严助传》载淮南王刘安上书:“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可见余干正是一片粮田所在。《谈苑》:“饶州余干县有干越亭。”当原为干越一支所居,故称“余干”,意思是“干越人的田地”。

浙江长兴西南又有“余干山”,《读史方舆纪要》卷九一引《梁陈故事》:“梁武帝时童谣曰:‘王气在三余。’又曰:‘鸟山出天子。’乃于余干、余姚、余杭为厌胜法,凡江左以鸟名山者皆凿之。不知此有余干山,县南有余罍溪,县东北有余吾浦,县北有雉山,陈武帝果起于此。”此条说明在古越地区要找带“余”字头的地名真是太多了,仅长兴就好几个。周振鹤、游汝杰曾指出“江浙一带以‘余’字冠首的地名还有‘余不、余罍、余渔、余英、余支’等”。<sup>①</sup>

<sup>①</sup> 周振鹤、游汝杰:《古越语地名初探》,《复旦学报》1980年第4期。

“余杭”说是搁置舟航之地，但“航”为汉语并非越语。按“杭”古音 *gaaŋ* 与泰文 *gaaŋx*“搁浅，搁置”音同，大概是船在此搁浅，才舍舟登陆的，正常的登岸码头应该早已自有地名了。

3. 姑苏、姑蔑、大末——苏州被称为“姑苏”是得名于姑苏山，《史记·河渠书》所说“上姑苏，望五湖”即登此山。而它的得名则是因为这里建有“姑胥之台”。《越绝书·吴地传》：“胥门外有九曲路，阖庐造以游姑胥之台，以望太湖。”“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姑胥之台。且食于纽山，昼游于胥母。射于躯陂，驰于游台，兴乐越宿（依《外传记地传》补宿字），走马长洲。”可见这本是一处吴王游乐的别宫。依《越人歌》解读，“胥”对古越语 *sa*“称心满意”，那么别宫的得名是由于它能使吴王称心、玩得高兴。上古“胥”*sa*、“苏”*saa* 只是长短元音的区别，反正是译音，所以可以随意用。“姑”*\*kaa* 一般认为是词缀，台语 *kaʔ -kraʔ* 词头确很发达，依此说“姑胥”*\*kaa -sa* 即等于以称心为名是可通的。此外，泰文今 *traʔ* 头字中有古本作 *kraʔ* 的，今 *traʔ* 作单词用有“地块”义，那么“姑”也许是对 *traʔ*“地块”的古代形式 *kraʔ*，则“姑苏”即含有“令人称心的地块”之意了。

姑蔑在越国的西境（约当旧衢州府）。《国语·越语上》：“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麋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吴越春秋》八作“姑末”，《越绝书·外传记地传》同：“姑末，今大末。”又《左传·哀公十三年》“姑蔑之旗”杜注：“姑蔑，越地。今东阳大末县。”单看‘姑蔑’意义不易断定，‘大末’是它别称，就较易了解了。“末”*\*maad* 与“蔑”*\*meed* 古音相近，而泰文 *hmod*“终了”跟汉语“末”的音义都相近。“大”*\*daaih* 则与泰文 *daaix*“末尾”音合，“大末”应为末尾义，指边境。因越国东部较为发达，西部则较荒僻，故西境就被称为“姑蔑”、“大末”。参看《国语·楚语上》：“夫边境者，国之尾也”，曹植《九愁赋》：“践南畿之末境。”可知得名之由。“姑蔑”“大末”意即“末尾的地块”（或写为“太末”，“太”也可对泰文 *thaih*“方面”，解为“末尾之方”

亦通)。

4. 会稽——会稽后为郡县名,原为山名。《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说禹“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为会稽。”说会稽是从大禹会计来的,当然是附会,禹来越会计的传说虽很通行,但并非史实,而且为什么不就叫“会计”却要写成“会稽”?《史记·封禅书》索隐引《吴越春秋》说同,而说茅山亦曰苗山,可见茅、苗亦无定写。看来茅山原应作“矛山”,即“会稽”的译意;而“会稽”则是越语的译音,因为“勾践维甲令”解读已说明“稽”古越语是“矛枪”的意思。

《水经·浙江水注》:“又有会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谓之为茅山。……秦始皇登稽山,刻石记功”,“昔越王为吴所败,以五千余众,栖于稽山”。称“会稽之山”与“稽山”,而不称“会稽山”,说明“会稽”=“稽山”,“会”本有山义。按“会”字《广韵》有黄外、古外二切。古外切注:“会稽,山名。”规定该音专用于“会稽”。此字古音\**koods*,相当泰文 *khoo*“阜,岭”,或 *khoo*“峰”(现代汉语“会”读 *khuai*,声母也变为 *kh-*),那么“会稽”即相当于泰文 *khoo - cii*“矛山”了。

《越绝书》的《吴地传》、《地传》皆记“度会夷”,会夷为会稽又称。“会夷”古音\**koods - li*,*li*正对 *cii* 的 *ri*,或\**klii* 的\**lii*,原语本相近。

5. 朱余——《越绝书·外传记地传》:“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越为鱼盐之乡,盐自重要,此地因主管盐务官署所在而得名。“朱”古音\**tjo*,可对泰文 *caux*“主者,长官、王族”。“余”古音 *la*,对泰文“盐”*klua* 的 *-lua*(韦庆稳对水语 *?dwa*<sup>①</sup>)。因“朱余”意为盐的主管者,所以其义为“主·盐”。余字后置,与余杭、余姚等余字前置不同。

① 韦庆稳:《试说百越民族的语言》,《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6. 诏息——《水经·浙江水注》：“浙江北合诏息湖，湖本名阡湖，因秦始皇帝巡狩所憩，故有诏息之名也。”“诏”<sup>\*</sup>tjauh 对泰文 caauh“王”（也作 caaux，跟上条的 caux 是同源词）。

7. 盱眙(xū yí)、缓伊——《左传·襄公五年》经文：“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于善道。”善道即今江苏盱眙县。“道”字《穀梁传》《公羊传》作“稻”，稻是“道”的同音假借字，因古地志如阮胜之《南兖州记》明说“盱眙本吴善道地”，应以“善道”为准。《穀梁传》：“吴谓善‘伊’，谓稻‘缓’，号从中国，名从主人。”据上应改为“谓道‘缓’”。

吴人的古越语说法跟今侗台语仍同。“缓”字古音<sup>\*</sup>gwoon→fiwaan，与侗台语“道路”、侬佬 khwən<sup>1</sup>、普标 qhuan<sup>1</sup>、侗语 khwən<sup>1</sup>、泰文 hon<sup>1</sup>、壮语 hon<sup>1</sup> 相近。|“伊”古音<sup>\*</sup>?li→?i，与侗台语“善，好”，侬佬 ?i<sup>1</sup>、普标 ?ai<sup>1</sup>、侗语 lai<sup>1</sup>，泰文 ?di<sup>1</sup>，壮语 li<sup>1</sup> 相近（侗台语此字有些语言读 ?-，有些语言读 l-，也像汉语的“伊”一般读 ?i 作“他”解，而苏州他说“俚”li，与嘉兴说 ?i 不同，情况相似）。

照侗台语语法，名词的修饰成分后置，好道路的语序应为“道路·好”，“善道”在古越语中应作“缓伊”，唐陆德明《释文·穀梁音义》说“吴谓之伊缓”，是陆氏不明此理，误以汉语语序代替古越语词序的结果。原文并未说“伊缓”，正因语序不同，特意两字分开解释。按原语应为“缓伊”，因后来秦代将善道改名“盱台”（再后来将台字也类化加上目旁作“眙”，但各字书都特别指明盱眙的“眙”仍然音“怡”）。盱台读作“吁怡”（古音<sup>\*</sup>hwa-lu），正是“缓伊”（古音 fiwaan-?li）的另一译法。不过“缓伊”是鲁译而“盱眙”是秦译，鲁人秦人听感不同而有差异，但可看出原来是同一词语。大概“善道”这个译意地名在当地行不开，结果还是“名从主人”改译为“盱眙”的。时转代换，后人不明古越语地名原义，颇多猜测之解，如说什么“张目为盱，举目为眙，城居山上，可以眺远，故名”，根本不顾《史记》项梁初定都盱台尚只作“台”，何“眙”之有？（“眙”如作视解则应读“丑吏切”，音义皆异）



8. 无锡——《汉书·地理志》：“无锡，有历山，春申君岁祠以牛。”《越绝书·吴地传》作“盛祠以牛”。《吴地记》说“历山又名西神山”，说明此山神灵在当时当地影响非同小可。“無”与“巫”同音同源（“無”字本即古巫舞象形）。《越绝书·外传记地传》“巫山者，越魑、神巫之官也，死葬其上。”这说明山可以因葬巫得名。又“江东中巫葬者，越神巫无杜子孙也。”古越人崇巫信鬼非常厉害，神巫“无杜”的“无”即是对巫的尊称。因此“无锡”可能即得名于历山之巫。因为“锡”从“易”声，“易”古音\*leeg、“锡”古读\*sleeg与“历”古音\*reeg是很相近的。“历山”的意思则是“鬲山”（永康也有历山，又名釜历山，即因其状如覆釜故名）。“无、巫”古音 ma，与泰文“师巫”hməə（包括巫、占卜者、医生、律师）亦同源；釜最古为“鬲”\*reeg，也与武鸣壮语“炒菜锅”reek<sup>8</sup>相同。可见侗台语有些词跟汉语同根。

9. 句吴、句无、句章——“句”本有三等一等两类读法，后世为区别，一等又转注变写为“勾”。金文句吴常作“攻敌，工虞”，是“句”音与“吴”声母连读合音而为“工”字（即\*koo + ŋ(a) → kooŋ），可见这类“句”都应读如一等“勾”音\*koo。此字与泰文“氏族、宗族、群”kəə相当（kəə另有草木丛义，族群义当来于彼）。《方言》十三“吴，大也”。吴自认太伯之后，是大宗，故名；或者因虞国南支而称。总之“句”是宗族氏族之义，不是虚的词头。“句无”据前条可能指“师巫之族”。句无之东有句余，在余姚鄞县一带古代靠海之处，则可能表“盐之氏族”（参上第5条）。阚骃《十三州志》：“句践之地，南至句余，其后并吴，因大城句余，章伯功以示子孙，故曰句章。”“章伯功”即“彰明霸功”，泰文“明亮”也说cangh，与“彰”\*tjang音义相同。句践胜后封其一有功宗支于此，而号之为有光彩的“彰明之族”也是可能的。总之其命名格式还是中心词在前，修饰成分在后，合于古越语语法。

10. 柞邑——《越绝书·吴地传》：“柞碓山下，故有乡名柞邑，吴王恶其名，内郭中，名通陵乡。”“柞”音“在各切”\*dzaag，本县名，后

《集韵》才释义为茹草，不解吴王何以恶之。看泰文 caak 有节草义、又有离别义，zaak 甚至是尸体义，古越语大概同音字中也有相似贬义词从而引致嫌恶。

11. 禦儿、语儿——《国语·越语上》：“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禦儿。”禦儿为越与吴交界地名，《越绝书》作“语儿”。《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语儿乡，故越界，名曰‘就李’。吴疆越地以为战地，……勾践胜吴……更‘就李’为‘语儿乡’。”上文勾践《维甲令》解读第二句已解义为扬眉吐气之乡。

## 二、古吴越王名谥号解义

吴越人名众多，但不像地名有取名理据的记载，所以更难比核越语本义，易出歧解。下面依据前叙文献记录的已知义解，及一些多见词表现的规律，略作探释，大约首字很多属于尊称、表示身分。

1. 夫罽、夫差、夫槩——夫罽是勾践祖父，《越绝书》已称之为“越王夫罽”；夫槩是吴王夫差叔父，《左传·定公四年、五年》亦称之为“夫槩王”。那么这里的“夫”虽与“石山”同译“夫”字，义似不同于“石山”，更像对泰文表尊崇的词头 braʔ，这个词头常加于帝王、王亲、神佛及御用事物前。“差”\*tshraai 与泰文“照耀”chaai 音近，也许“夫差”即取义于 braʔ - chaai。越王有“不寿、不扬”，“不”古音读之部\*puw，古鱼部字遇轻读常转为之部字，“不”可能也是 braʔ 的轻读。

2. 无余、无颀、无疆——越王以“无”带头的有好几位。但无余是始祖，自然只是个酋长，勾践称王以后四代传承较正常，据《竹书纪年》自王翳太子诸咎弑翳而被杀后，拥立的无余之、无颀都是临时找的，原非王储；而最后接位的无疆则是无颀之弟（据《史记》索隐）。因此“无”好像不是对君王而是对一般贵族公子、酋长、头人的称谓。“无”古音\*ma，正对泰文 maʔ，那是较老的一个对男人的尊称，有如

汉语以前称某君某老谷那样。

3. 周章、周繇、寿梦、州于、朱句——周章是吴的始封祖，周繇是中间一代，至寿梦则称王，州于是《左传·昭公二十年》对吴王僚的称呼。以上这些字古汉语都是幽部章系字，都可对泰文 *caux* “君王、王子；首脑，长官；主人”。朱句是越王翁的又称（“句”吴可称“攻”敌，朱“句”自可通王“翁（公）”，古公翁同字）。“朱”对 *caux* 可参看盐官称“朱余”，而“朱句”在金文中也写作“州勾”，可见“朱”、“州”可以互译，都是此一尊称的对音。（其实此字也跟汉语“主”*\*tjo* 同源，相当汉语称“主子”）

寿梦，《史记》正义：“《左传》及《世本》又云：吴‘孰姑’，寿梦也，世谓‘孰梦诸’也，《春秋传》‘寿’作‘孰’，音相近。‘姑’之言‘诸’也，《毛诗传》读‘月诸’为‘月姑’，是以知姑为诸也。则知孰姑、寿梦一人耳。又名乘。”则“孰、寿”也应对 *caux*（孰 $*djug$  是寿 $*djuh$  的入声）。《左传·哀公十三年》记吴俘越帅“畴无余”，越俘“吴太子友、王孙弥庸、寿於姚”，其中“畴无余、寿於姚”首字也都应对 *caux*。畴无余名字中用了始祖无余名，寿於姚的“於” $*ʔa$  相当后来吴语“阿”，即名叫阿姚。

4. 诸稽、诸咎、诸樊——《国语·吴语》记越王“令诸稽郢行成于吴”，《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作“使范蠡与大夫柘稽行成为质于吴”，为质一般为世子，则“大夫”可能是“太子”之误。今金文有越王“者旨於赐”器，“者旨”即“诸稽”，“於赐”即“郢”。因为“赐” $*sleeh$ （←*sleegs*）与“郢” $*leŋʔ$  对转，“於”古音  $*ʔa$  只是词头“阿”。《竹书纪年》勾践太子为鹿郢，“鹿”相当泰文“儿子”*luuk*，为常见的表子爱称词头。《越语》、《史记》则作“颺与”，“颺”音常隻切 $*djag$ ，相当“柘” $*tjag$ 、“诸” $*tja$  的另一译法，“与” $*laʔ$  则是“郢” $*leŋʔ$  的别译（《左传·哀公二十四年》又作“適郢”。“適”音之石切 $*tjeg$ ，也是“诸柘”等别译，译音用字可以任意）。

“诸、柘”等音都近于泰文 *cah* “首长”，而“稽”<sup>\*klii</sup>《维甲令》解读为“枪矛刀剑”。则“诸稽”之义相当于“首长·兵器”，看来鹿郢可能曾担任相当司马之类的职务，故称诸稽郢。诸咎是越王翳的太子，全名诸咎粤滑，后弑父自立。“咎”古音<sup>\*gʷuʔ</sup>，音近泰文 *khaaux* “米粮”，“诸咎”可能义为“首长·粮食”，表示诸咎可能任过相当司徒之类职务。诸樊是吴王寿梦太子，可能也任过某首长职务而得称“诸”，他另有本名“遏”。如果“樊”<sup>\*ban</sup>对泰文 *?baan* “房屋”，则诸樊可能相当司空之职，因古代可以职名氏，所以汉语才有司马、司徒、司空等姓氏（而徐国也有令尹以诸稽为氏）。

5. 余祭、余昧——诸樊传位于弟弟，其二弟余祭三弟余昧相继接位。此“余”字在人名不见得为“地”“盐”等义，可能对泰文 *raa*，此字有“男人”、“我俩”义。颇疑这两兄弟是孪生的，因余祭的“祭”<sup>\*tsads</sup>可对泰文 *djaad* “出生”，而“昧”<sup>\*mʷuʷds</sup>对泰文 *hmod* “终了”。

6. 阖庐——吴公子光夺取王位后，改称“阖庐”（庐或作闾），汉字义“关屋子、关门”定非取义所在。“阖”<sup>\*gaab</sup>音可对泰文同源词族的 *grəəb* “盖罩”、*gəəb* “管制”，或 *gab* “狭小”，而“庐”<sup>\*ra</sup>可对泰文 *raa* “放松”、*raah* “开放”，此则正可表示他被压制而得解放，由隘小而将肆意张大的心情。

7. 允常——《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正义引《舆地志》：“周敬王时有越侯夫鐔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吴越春秋》六“越之兴霸，自允常矣”。实为越国由部落发展为国的大业创建人。“允”<sup>\*lunʔ</sup>，可对泰文 *luŋ* “公，老伯”，“常”<sup>\*djaŋ</sup>对泰文 *caŋ* (*taŋ* 的古词) “创立、建基”。则允常原当为给“创业伯公”的称号。

8. 勾践——勾践在金文中作“九浅”，可见此“勾”又与地名“句”不一样。“句”<sup>\*koo</sup>，“九”<sup>\*kuuʔ</sup>与泰文 *kuux* “兴复，保救”音近，“践”<sup>\*dzenʔ</sup>、“浅”<sup>\*tshenʔ</sup>与泰文 *zeenh* “祭祀”音近。古代以宗庙社

稷的祭祀是否保持正常举行表示国家兴亡，“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故作为领导人的勾践可能以“兴祀”为名而表达保家卫国之义。

9. 勾践谥号莒执——《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索隐引《纪年》：“晋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粵子勾践卒，是为莒执。”像勾践这样功烈显赫的兴国之君，死后称号自应是十分尊崇的，自然不会是“莒执”的汉义“拿着芦苇”。比较泰文就可清楚，“莒”《集韵》有杜览、吐览二切，杜览切·daam? 可对泰文 ?damx“祖宗神”，“执”·tjuub 对泰文 cab“初始”，则“莒执”义正为“初始之宗神”，即犹如汉族给开国之君“庙号”通常叫“太祖”、“太宗”那样，但比汉族还称得早多了。

10. 无颡谥号莒蠋卯——《史记》索隐引《纪年》：“无颡八年薨，是为莒蠋卯。”这是勾践之后另一位被谥为宗神的越王，其义自不会是芦苇虫子什么的。比较泰文，“蠋”·tjog 可对 cook“首领”，“卯”·mruu? 可对 hmo? “适当的、合格的”。则知原是“合适的领袖”之意，自为一个评价很不错的谥号。

吴王僚曾命公子烛庸率师伐楚，这个“烛”·tjog 与“蠋”同音，应当也是“首领”之意。

11. 盲姑、莽安——《史记》索隐引《纪年》：“不寿立十年见杀，是为盲姑。”“大夫寺区定粤乱，立无余之，十二年，寺区弟忠弑其君莽安。”不寿在金文是“丌北古”，死后被谥为“盲姑”，“姑、古”同名，只是换了一个前加的称谓。“无余之”《史记》作“之侯”，死后又被谥为“莽安”。“盲”·mraaŋ、莽·maaŋ 音基本相同，都是对被杀害之君的谥号，应对泰文 mlaaŋx“杀害”。

### 三、扬雄《方言》古吴越词语解

汉代扬雄集录各地方言，其中有他搜集到的前代记录，也有他自己的亲笔记录。由于当时越人势力还很大，尤其东瓯闽越长期不受汉

朝廷控制,所以所记吴越方言多数还是古越语,东瓯更是全部属古越语,现据区域分述一些例子。

### 1. 瓯越

(1) 卷六“厉、印,为也。瓯越曰印,吴曰厉”。《尔雅·释诂》:“厉,作也。”“印·ŋaɑŋ 对泰文 ŋaɑn “工作,活儿”。“厉”·rads→·raih 对泰文 raaj “事项”(raajh 则表进行“漫步、起舞、念诵”等)。

(2) 卷一“凡物盛多谓之寇,齐宋之郊楚魏之际曰夥,……荆吴扬瓯之郊曰濯。”“濯”读直角切音·dreeug,可对泰文 ?dok “盛多的”,又 djuk 也表“盛多,许多”。

(3) 卷二“恒慨、蓼绥、羞绎、纷母,曰既广又大也。荆扬之间或言广大者谓之恒慨,东瓯之间谓之蓼绥,或谓之羞绎、纷母”。上条“濯”表盛多放在“硕沈巨濯…大也”条下,可见大也包括多在内。“恒慨”·gwwŋ - khwuih,对泰文 garh “稠密、充裕”,krai “极,大,多”。“蓼(索含反)·suuwm 绥·sui”可对泰文 sam “重叠、纷杂”,sɔɔi “连串”(又 zɔɔi “密”),或 samh “成群成队”、slai “连绵成行的”(萧元川《暹汉辞典》)。“羞绎”·su - lag 可对泰文 suuh “达到,远至”,hlak “数以十万计”。“纷”·phuun、“母”·mwu? 或“母”·ma?,可对泰文 pen - maak “许许多多”。(又 ?baan “繁多”、muah “密集”、maak “众多”)

(4) 卷七“簪,儋(担)也。燕之外郊,越之垂,瓯吴之外鄙谓之簪。”“簪”·ra?,可对壮语“挑担”rap。

(5) 卷五“(甕)灵桂之郊谓之甗(缸),其小者谓之‘甗’”,此字都感反·tuum?,对泰文 tumh “缸”。灵桂之“郊”古近南越西瓯。

(6) 卷一信“西瓯毒屋黄石野之间曰穆”,穆·mug(《疏》云又通“缪”·mruih),对泰文 hmo? “确切”。

### 2. 扬越、吴越、吴扬

(1) 卷十“卉、莽草也,东越扬州之间曰卉”。“卉”古音·hmuih,此对泰文 maix “柴,树木”,武鸣壮语作 fai<sup>4</sup>(其变化与汉语 hmuih→

huih 相似)。按“卉”古汉语泛指草木,两者同源。

(2) 卷十“痴,駮也。扬越之郊凡人相侮以为无知谓之聃。聃,耳目不相信也。”此字“诺革反”古音 \*nrwuwg, 是对老人耳目不便的形容。《列子·黄帝》:“顾见商丘开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检,莫不聃之。”泰文“聃”hnuak(又 ɲak“老态龙钟、笨拙”)。

(3) 卷十“拏,扬州会稽之语也,或谓之‘惹’或谓之讠”。“拏”上文注“言謏拏也”。《玉篇》“謏拏,言不可解也”,《广韵》上字陟加切释为“语不正也”,“拏” \*nraa、“惹” \*nja? 对泰文 hnɣɣ“口音不正的”。“讠”乙剑反 \*amh, 对泰文 amh“吹牛撒谎”。(卷六“诬,讠与也,吴越曰诬。”说明‘讠’即诬,“诬” \*ma 也对泰文 moox“说大话”)

(4) 卷六离“吴越曰徇”,注“音刎” \*muun?, 对泰文 mɣɣn“不理睬,转头不顾”。

(5) 卷七“吴越之间凡贪饮食者谓之茹”,“茹” \*nja, 可对泰文 nuu“可口”。

(6) 卷六:“吴越饰貌为均,或谓之巧。”“均”,恪垢反 \*khoo?, 对泰文 koox“华丽,打扮漂亮”。“巧” \*khreeu? 对泰文 klau“擦光,刷新”。

(7) 卷六:“胥、由,辅也,吴越曰胥。”“辅”是防车倾侧的夹毂直木,故引为相助相正之义,上文有“由,迪,正也”。“胥” \*sa, 可对泰文 zuu“直言不讳。”

(8) 卷七:“怜职,爱也,言相爱怜者,吴越之间谓之怜职。”古音“怜”riin, 对泰文 ruuinh“欢快”(又 rɣɣɲ 欢快),“职”古音 ?ljwɔg→tjwɔg, 对泰文 rak“爱”。二字相连有合欢之义。

(9) 卷七:“煦煨,热也、乾也,吴越曰煦煨。”二字音 \*ho -hraah (←qho -qhraas), 对泰文 gu“烧热,熏”,kraak“干硬”。合为烤干之义。

(10) 卷五杯“其大者谓之閻,吴越之间曰盥。”《说文》閻为“大开

也”，可作大杯义，则“盥” $laŋ$  也应来自巨大义，正对泰文  $liɑŋx$  “大的，巨型的”。

(11) 卷六视“吴扬曰略(音略)” $*raŋ$ ，对泰文  $ruak$  “瞪眼看”。

(12) 卷八：“吴扬之间谓之猪子，其槛及蓐曰槽(音缙)。”音为疾陵切 $*dzuŋ$ 。可对泰文  $zaŋ$ ，“稻秆”之意，蓐今吴越地区仍用稻秆。

(13) 卷六藏“吴扬曰揜”，衣俭切 $*am?$ ，对泰文  $am$  “掩藏”。(《广韵》乌敢切“手揜物也”，温州今犹说以手遮物为 $[aŋ^3]$ )。

(14) 卷五镬“吴扬之间谓之鬲”，鬲 $*reeg$  古为瓦炊器，吴扬之间用以称金属锅子，情况同壮语“锅” $reek^8$ 。这是一个很古的汉台同源词，而古越语其义变方向与台语相同(参上文无锡条历山释义)。

3. 吴楚、荆吴、荆扬 此类区域之词则多与汉语相同或同源，略举二条。

(15) 卷六：“荆吴之人相难谓之展。” $*tan?$ ，对泰文  $duan$  “非议，指摘”(又  $taanx$  “抗衡”)。

(16) 卷一慙“荆扬青徐之间曰慙”。音 $*thuun?$ ，可对泰文  $(sa?-)dɣɣnɣ$  “羞怯”。此字古读“文”部，双方元音相当，属古东夷同源词。

看来古越语跟侗台语很相似，有些也跟汉语相同，是同源词或互相借用，尚可进一步研究。

#### 第四节 古越语的语言特点及遗存词辨识

由前述材料可以约略窥见，古越语有以下语言特点：

(1) 是一种汉藏语族语言，含有很多与汉语同源而意义略有区别的词，如以“州”(舟)表摇船，作动词用；以“鬲”表金属锅等。使用语



气助词“乎、兮”等也同汉语。

(2) 是一种侗台语,许多基本词汇跟今泰傣壮侗语相同,也有一些跟京语相同。动宾词序同于汉语,但定语后置于名词,如椒山称“夫椒”(邕椒),善道称“盱眙”(道善),盐官称“朱余”(主盐)等。这是最重要的特点。

(3) 称人不加姓,而以职分尊称置于其前,如“无余、诸稽、州勾”等,有如古汉语“巫咸”之例。

(4) 有一些重叠形式,表示摹状修辞,如“秦胥胥”表高兴、喜欢,“州谿州焉”表摇船态势,以词形变化表情状,这也跟今汉台语相同。

(5) 语音发展阶段接近泰文及汉语上古晚期。与两者可建立有规则的语音对应关系。韵尾-b-d-g-m-n-ŋ齐全,而-s等似已开始向声调转化。复声母还有,因此“诸,姑”还可同译寿梦之名末字,说明还有klja之类复声母的音节。

掌握以上特点还可使我们解释和辨识其他材料的古越语语词。这里举一个例子,如范蠡隐名“鸱夷子皮”,鸱夷是什么意思?《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索隐:“范蠡自谓也。盖以吴王杀子胥而盛以鸱夷,今蠡自以为有罪,故为号也。韦昭曰:‘鸱夷,革囊也。’”《汉书·货殖传》颜注:“自号鸱夷者,言若盛酒之鸱夷,多所容收,而可卷怀,与时张弛也。鸱夷,皮之所为,故曰子皮。”看来这是一种吴越都用的皮囊,鸱夷应为古越语译音。“鸱”处脂切,古音\*thji,对泰文 thaix“长袋子、腰袋”;“夷”音\*li,对泰文 lii“椭圆形的,细长的”,合起来即表椭圆形长袋子,故可装尸。此二字也正用侗台语中心词在前的结构。

《周礼·司关》“凶札”注引郑司农曰:“越人谓死曰札。”“札”\*tsred,对越南京语 chet“死亡”。

有些材料,虽然时间较晚,但也反映了古越语遗存,例如《集韵》禡韵词夜切:“禡,吴人谓衣曰禡”。这是中古韵书记的一个吴语俗称,

中古音为  $zja^p$ , 是“席”的去声, 也正对泰文同音不同调的  $suax$ “衣衫”、 $suah$ “席”。可见即使是材料较晚的底层遗存词, 也可依语音语义的对应关系寻出原语, 音义, 并证明对古越语的以上认识是正确的。

古越语词在汉语落脚是很多的, 值得继续发掘辨识(例如南方称筏的“木排”原作“簿”, 实来自古越语, 泰文为  $bee$ “筏”)。今吴语方言中上海、浙西南的先喉塞声母( $?b$ 、 $?d$ 、 $?f$ )等特殊语音, 名词后加定语等特殊构词法, 也都反映了吴方言中有丰厚的古越语底层遗存。

下 编  
汉文化时期



# 第一章 吴 语

---

## 第一节 吴语概况

---

吴语是一支重要的汉语方言。它现在分布于上海市、浙江省、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及福建西北一角，凡五省一市，总人口达 7000 万人。吴语是汉语方言中人口仅次于官话的大方言，又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沿海发达地区人民的地方语言，地位自然很重要。这种方言因为是以古吴郡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故称“吴语”<sup>①</sup>。东晋以降文献上吴语就已成为通称了（《世说新语·排调》）。

吴语处于中国历史上东晋南宋中原王朝两次南迁的中心地带，对我国文化、文学发生过重要的历史影响，并且是我国古典戏剧温州戏文、海盐腔、昆腔和后来越剧的说白语言，故历代有过不少夹杂吴语的作品，明代以降甚至出现纯吴语的作品（如冯梦龙：《山歌》）。吴语也很早就引起学者记录和研究，历代都有引述吴语的著作，清以前

---

<sup>①</sup> 有人说吴语以吴国得名，现在看来不妥。因古吴国是说侗台语族的古越语的。三国之吴则疆域内几乎包含今东南各大方言。东晋之“吴语”尚为今吴语、闽语、江淮话的共同原始语。

即出现方志(明苏州松江等志)方言专章,清初已有研究吴语专著。现代更是汉语方言研究重点之一,国内外都有专门研究吴语的学者。

## 一、吴语分布地域及人口

吴语分布在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长江下游五省一市,北与江淮官话,西与徽语、赣语,南与闽语交界。吴语具体分布如下:

江苏 23 市县约 2 万平方公里,人口 1677 万;上海市的各市辖区及 10 县 5800 平方公里,人口 1185 万;浙江 74 市县,9.1 万平方公里,人口 3657 万;江西 5 市县,5400 平方公里,人口 185 万;福建一县,浦城北部 2300 平方公里,人口 27 万;皖南 14 市县 1.3 万平方公里,人口 261 万。吴语全部分布面积约 13.75 万平方公里,人口 6992 万(以上是郑张尚芳据 1982 年人口普查数字统计的。统计方法是从各县市总人口中减去非吴语乡镇的人口数字。如吴语人口最多的浙江省总人口共 3888.5 万人,减淳安徽语 42 万,建德徽语 36.6 万,庆元蛮话〔蛮话为闽东话〕0.5 万,泰顺蛮话 18 万,泰顺闽南话 1.4 万,平阳闽南话 24.3 万,苍南闽南话 48.4 万,苍南蛮话 25.4 万,洞头闽南话 5.2 万,玉环闽南话 2.8 万,安吉官话 5 万,长兴官话 4.7 万,长兴闽南话 2.7 万,浙南畲话 15 万,共减非吴语人口 232 万,而得到 3656.5 万之数)。经过十余年后,现在当然已经超过 7000 万了。

除上海外,其他省的吴语区都聚居、杂居、散居有非吴语的人口,上面数字说明即使吴语分布全省最广的浙江,也有闽语 128.7 万人(闽南话 84.8 万、闽东话 43.9 万),徽语 78.6 万,官话 9.7 万,畲话 15 万人。其中数量最大的闽南话人口大抵是明清之交的泉漳移民,他们除主要分布在温州地区南部,还向浙北长兴、安吉、临安及江苏宜兴移民。并一直分布到皖南广德、宁国、郎溪、芜湖县东部,江西的上饶、玉山、广丰等县境内及福建浦城北部边境。他们常自称“温州

人”，实际不说温州话而说浙南闽语。这些移民中有的跟浙江的官话移民一样，是太平军战后清政府招垦被兵荒地时迁移去的。

皖南本地原来只有吴语、徽语和赣语，除旧徽州府及浮梁说徽语，怀宁地区、东至以及贵池、石台两县西部说赣语外，原来都是吴语地盘（因大都是古宣州总督府所辖，故称宣州吴语）。但太平军与清军的战争中，兵灾、瘟疫促使人口凋零，东部最严重，广德由 31.2 万余人锐减至 6000 余人。1936 年续修《宁国县志·风俗》也说：“土民存者不足百分之一，客民居多数”，“湖北人满阡陌”。同治五年（1866 年）开始各省奉令设劝农局、招垦被兵荒地，湖北、河南两省及安徽江北地区的移民大量涌入皖南，移民最集中的地区为广德、郎溪、宁国、宣城东部和浙江的安吉、长兴，其次是南陵、青阳等地，移民的方言占据了大片原属吴语的地域。沿江的当涂、采石、芜湖、大通、池州等大城镇则很早就受到江淮官话的影响，江中和沿江沙洲又大都由江北移民垦殖，所以至今黄山、九华山以北各县除圩区尚说吴语，县城都通行江淮官话，只有铜陵、繁昌、泾县、黄山市的太平等四城官话与土话并用，一般对外用江淮官话，家庭内部、老人妇女之间才说宣州吴语。芜湖县城湾沚，石台县城七里，青阳县城蓉城，现在只有少数老年人才会说原来的本地话（石台县城老派说石陵小片吴语，新派说赣语）。

宁国南部山区土著方言是宣州吴语，移民方言有浙江吴语、徽语、赣语、湘语、闽南话、闽北话、客家话、畲话、江淮官话、湖北官话、河南官话等，土著与移民交错杂居，成为少见的方言博览会。注意浙皖闽的畲话都是一种接近客家话的汉语方言，它与广东博罗等处畲族说的固有畲语（一种苗瑶语）不同。

## 二、吴语的源流

源流包括：汉语的来路、如何形成方言及何时与近亲方言分开而

独立为吴语三个方面：

### (一) 吴语初源来自古楚语

吴越地区在春秋时为吴国越国领地，当时这些诸侯国的主体民族为百越人（属侗台语族，已见前文考述）。吴为越并，语言并无变化。越后又为楚国所灭，吴地被列为三楚之一的“东楚”内。这表明是楚人给吴越地区带来了华夏语基础。这还可以由好几个方面推论：

据传说吴国王族与周同姓，来自中原，这还有“宜侯矢簋”铭文为证，则王族原来可能是会说华语的，但数百年与越族相处之后能否在日常说话中保持下来大可怀疑，因连王名都已越化。但吴越王铸礼器兵器皆使用汉字，吴季札尤其通中原礼乐（孔子弟子中江南唯吴人子游一人，《礼记》记孔子称季札为“吴之习于礼者”），那么统治层应至少在文化上要学华语，犹如旧时欧洲贵族之习拉丁文。只不知当时用的是中原雅音还是相邻的楚音（从楚伍子胥、伯嚭、文种、范蠡皆入仕吴越看，近楚可能性大。注意即使更早的吴太伯传说可信，《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则也是从周先经楚才至吴的）。

楚语正式进入吴越由楚灭越开始。楚灭越时间现有四说：（1）楚威王七年，即公元前 333 年（《史记·越世家》及《六国年表》未记年，仅云“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同时破齐徐州。《楚世家》破齐事列该年，集解引“徐广曰：时楚已灭越而伐齐”）；（2）楚怀王二十二年，即前 307 年（《史记会注考证》）；（3）楚考烈王元年，即前 262 年（《越绝书·吴地传》）；（4）楚考烈王十四年，即前 249 年（蒙文通：《越史丛考》；蒙氏认为楚陆续败越夺地，夺取吴故地较早，但未及会稽，直至秦方灭）。后二说实为春申君入吴之时。《史记·楚世家》说考烈王元年（前 262 年）封令尹黄歇于吴号春申君，至幽王元年（前 237 年）被杀，凡 25 年（而《春申君列传》则说考烈王十五年春申君才求移封于江东，《越绝书》则谓幽王立，封春申君于吴，治吴三年后以子为假君，父子治吴凡



14年),这段时间内据《越绝书·吴地传》说春申君治无锡湖、柯历山,造龙尾陵道,作吴两仓、吴市、诸里大闹、狱廷、楚门等,还有好几处客冢,说明当时楚国积极加强对吴的统治,官吏、兵将、食客众多,春申君被杀后又十六年才被秦灭亡(楚灭后楚人在吴仍有很大势力,从项梁叔侄在吴的号召力及后来项羽率江东子弟八千人过江反秦可知)。楚人几十年的统治形成当地发展汉语的条件,今日老湘语与吴语有许多共同处,似非偶然。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分全国为三十六郡,于吴越地东置会稽郡、西置鄣郡。汉初曾一度合并,后又改会稽为吴郡,汉武则改鄣郡为丹阳郡;至东汉又分置会稽、吴郡。秦汉置郡设官驻兵,中原移民主要聚居点应在郡治的吴(今苏州)、会稽(今绍兴)、宛陵(今宣城)及一些重镇如秣陵(金陵,今南京)等处,吴语方言应是以此等地方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故后来吴语还是分别以苏州为苏南吴语中心,绍兴为浙江吴语中心,宣城为皖南吴语中心。但当时越族力量还很强,部分越人往往进入山区成为所谓“山越”,而浙南、福建一直还是越人天下。虽然汉武帝诏命徙瓯越、东越、闽越于江淮,不过迁走了三越的王族、军队主力与豪强而已,广大散居越人退入山区,后来又出就故地,如史载“(东瓯)后遗人往往渐出”(《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引《吴地记》),“(闽越)遁逃山谷者颇出”(《宋书·州郡志》),而形成了回浦(温州)、冶(建安)、东冶(福州)三县。东汉时还曾派高级将领骠骑将军张意以水军讨伐东瓯(见《太平御览》引《东观汉记》佚文)。直至三国时许靖致曹操书还叙说自己从会稽“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三国志·蜀书·许靖传》),说明那时浙南、福建还没有被真正完全控制。乃至南朝宋谢灵运“尝自始宁(上虞南乡)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当由山间还有山越遗民而致误会。因此无怪乎西汉末扬雄所记“吴越”方言词主要还是侗台语词汇了(详本志上编第十章),这说明

后来吴语方言的形成是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的。

但扬雄《方言》中除“吴越”并称者为古越语外，常见的便是“吴扬”、“吴楚、荆吴”、及“楚扬、荆扬”等合称。“扬”既然可与“吴”、“江淮”等并举，应不是指包含吴（会稽）、庐江、九江、豫章、丹扬等五郡的大扬州，而应指吴楚之间的丹扬郡地而言<sup>①</sup>，丹扬地区为今西部宣州吴语区及徽语区。分析这类“荆吴”、“荆扬”语词，则较多属汉语词。这正表明了楚语由西而东，扩及吴、会二郡的路线。从很少见到“吴”与北方方言并称，也反证了吴楚方言间关系不比寻常（《汉书·地理志》：“本吴粤〔越〕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由于南吴语比北吴语保持更多的古吴语特点，作者曾将温州方言与扬雄《方言》所说各地方言进行对比，结果是北邻吴扬、江淮各 2 条相合，中原关东 5 条、关西达 17 条而多数属通语，值得注意的楚、南楚沅湘间竟有十八九条相合。如：晓、蹠、檻、恹、憇、篷、嬉、譬、猾、拌、拂、颌、歛、担、仇、杜狗、螭、螭、筭、箐”，其中如“檻、恹（物行敝）、憇（怒）、憇（病愈）、拌（挥弃）、担（取）”等最具温州方言特色的词都见于楚语，可见楚语在吴语尤其南吴语的形成中应起过重要作用。吴语的形成除结合古越语底层外，汉语方面可能由楚与中原话两源融合而成（中原话主要来自晋室南迁），怪不得中原人说吴人“音楚”。唐《慧琳音义》合称吴楚之音。

即使据最晚的说法，楚治吴始于前 249 年，至西晋永嘉之乱洛阳陷落的 310 年，也已有 560 年的发展，东楚方言与古吴越语相融合当已形成一种有地方特色的汉语江东方言。王充《论衡·自纪》篇记建武十年他八岁就学时“书馆小僮百人以上”，说明东汉初会稽教育已很发达，居民相当稠集，也自会向外发展。尤其东吴西晋期间，郡县屡屡分置增多，说明人口在不断增加，方言区域在不断扩展。它与中原汉语的巨大差别，则在晋室南渡时才在文献记载中明显表现出来。

<sup>①</sup> 丁启阵：《秦汉方言》，东方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 页。

## (二) 江东方言生出吴语

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巨异。”陆氏(约550—630年)是身为吴人的语言大家，历经陈隋而故于唐初，亲记其所见闻，自然贴切。从郭璞注《方言》大量以当时“江东”方言进行对比，可见江东方言晋代即已形成，这又出现几种情况：

### 1. 从南北、东西的语音歧视说明江东方言自为一系

因南北方言巨异，晋南渡时南人北人互相轻视，南人称北人为“伧”，北人称南人为“楚”。

(1) 顾亭林《日知录·方音》引《宋书》“高祖虽累叶江南，楚音未变”。又“长沙王道怜素无材能，言音甚楚”。《世说新语·豪爽》“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又引《文心雕龙》云“张华论韵，士衡多楚”。刘宋皇族及王敦皆南徙北人，已习南音，陆机更是吴人，因都住于东楚之地话带楚音，故也称之为“楚”。北朝《魏书·岛夷刘裕传》：“岛夷刘裕，晋陵丹徒人也。”《岛夷萧道成传》：“岛夷萧道成，晋陵武进楚也。”这些出生在常州地区的南朝皇帝，都被加以“楚”名。

(2) 《世说新语·轻诋》：“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唤哑哑声。’”这是说支公到会稽(在建业东，故称“东”)见王氏兄弟不说官话雅音，就讥之为鸟语。又同篇：“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原注：“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故云老婢声。”)顾为晋陵无锡人，不愿依当时风习学洛下语，乃讥北音为婢语(按“伧”义鄙贱之人，与“臧(～获)、狙(～工)”同源)。

以上为南北之别，而江南之东西亦已有较大差别。

当时吴人又鄙称赣人湘人为“溪”(也作“僎”)，因古代荆山以南、洞庭湖至鄱阳湖之间，是“五溪蛮”的原居地，方言含有苗瑶语底层(自明代至今仍有呼江西人为“鸡”的，是“溪”音变)。

(3) 《世说新语·容止》：“温(峤)劝庾(亮)见陶(侃)，庾犹豫未

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按陶为豫章鄱阳人,家于寻阳,故云)。

(4)《南史·胡谐之传》:“谐之,豫章南昌人也……,上(齐武帝)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僂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家教子女语。二年后帝问曰:‘卿家人语音正未?’谐之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宫人顿成僂语。’帝大笑。”(又范伯年云:“胡谐是何僂狗!”)

(5)《梁书·杨公则传》:“所领是湘溪人,性怯懦。”(《南史》作:“公则所领,多是湘人,溪性懦怯。”)

可见当时江东方言与北、与西皆已不同。

## 2. 南北互学方言及双重语言制

《晋书·王导传》:“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金陵成为六朝政治文化中心。这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汉人人口大量增加,他们努力学习土话,增强了当地汉语方言对非汉语的同化力量,二是中原南迁人士大量聚集于新都城,又使都城形成双方言制,即士族阶层与庶民的双重语言制。这有南北朝人士的当时记录:

(1)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洵?’(注:吴人以冷为洵。《御览》卷二一引此条注“音楚敬反”)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语林》曰:“真长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吴语及细唾也。’”)

(2)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

(3)《宋书·顾琛传》:“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

(4)《南齐书·王敬则传》:“敬则名位虽达,不以富贵自遇,危拱

傍遑，略不衿裾，接士庶皆吴语，而殷勤周悉”（敬则原籍临淮射阳，南徙侨居晋陵南沙县，初为南沙县吏，母为女巫）。

由(1)可见北来人士连丞相也努力学吴语，由(2)可见南朝士族能说官话，庶民操吴语，极易分辨，是为双重语言制。但由(3)(4)还可见当地有的人即使贵达了也不放弃自己的方言，这就加强了土语的力量。但北来雅音官话的力量还是很强的，唐张籍《永嘉行》：“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可能这对以后的北吴语的官话化打下了底子，以后我们看到不但南京、扬州等处宁镇地区沿江吴语官话化了，还影响其周围吴语发展为带有一定官话味的吴语，即以太湖为中心的北吴语，以青弋江为中心的西吴语（宣州吴语），而离南京远因而发展较慢的南吴语则能保持较多的古老特征。但我们不能肯定，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东晋，还是主要由晚唐、南宋的移民造成的，也许是几次移民积累而成的。因为当时的江东方言还不就是后来的吴语。

### 3. 江东方言是吴闽等方言的祖语

江东方言在六朝时称为“吴语”，但性质跟今吴语不同，它应是吴语、江淮话、闽语、徽语的共同祖语。江淮话明显是后代吴语官话化而形成的，而闽语则保留更多的六朝“吴语”的特色。这里存在吴、闽语与江东方言都有关系的情况：

江东话具有今吴方言特征。我们由以下材料可以看到这些特征。

(1) 东晋语言学家郭璞(276—324年)，字景纯，为《尔雅》、《方言》、《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作注，不时征引当时江东方言，从而为当时的早期吴语留下了一份可贵的记录。他的江东、江南方言词与今温州话相合的也有十余条（如陞、甌、杨、浦、噢、藻、虾蟆衣”等）。

(2) 颜之推在上引《音辞》篇还指出“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羨’，以‘是’为‘舐’”。是声纽上不分“从”母与“邪”母、“禅”母与“船”母，即浊的塞擦音与擦音不分，这即在今天还是吴语的一个特点，而在南北朝时已经如此了。

(3) 颜氏又云：“北人以庶为戌，以如为儒。”这说的是鱼虞二韵之别，表明北人鱼虞相混而南人不混。南宋山阴人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吴人讹鱼字，则一韵皆开口。”今温州话鱼韵见系文读合口呼同虞[y]，白读开口呼读[ei←i]，齿音则只读开口呼如：“许(那) hei<sup>3</sup>、去 khe<sup>5</sup>、渠 gei<sup>2</sup>、猪 tsei<sup>1</sup>、蔗 dzei<sup>4</sup>、箸 dzei<sup>6</sup>、蛆 tshei<sup>1</sup>(~虫)、徐 zei<sup>2</sup>(姓)、絮 sei<sup>5</sup>(天罗瓜~)、鼠 tshei<sup>3</sup>”。

而另一方面又有江东话与闽语有关的反映：

(4) 日本从南朝学去的汉字音称“吴音”。但除全浊声母为浊音外，跟今吴语差别很大，却有八个特点与今闽语相同，如：麻韵见系字读 e，齐韵读 ai，梗摄读 yau、yaku，元韵合口读 wan(同厦门)，开口读 on(似福州)，文韵见系读 un 如“云”，尤韵读 u 如“有”，匣母合口部分白读字不随其他匣母字读 k-而读 w-，如“会画禾|获(同潮州)皇(同建瓯)”(这也似今吴语，但今吴语匣母读 ŋ/w，不像闽语分 h、ɸ/w 两类。客家话齐韵、梗摄读法相似，则暗示客赣方言与江东这种“吴音”也有关系)。

六朝时日本与刘宋通使十次，而东晋末、齐梁各只一次，据《日本书纪·雄略纪》记当时遣使于“吴国”，接待“吴国”使及缝织工都承前称刘宋为“吴”。故“吴音”之“吴”应以来自吴都建康为可靠，不可能远到闽地，因为直至唐宋，日本舟船也大多还是南至明州(今宁波)，未能远至泉州。则当时“吴音”只能取自苏南，这说明那时江东“吴音”很近今闽音，而不像今吴音(注意就吴方言保留浊音一点说，闽语方言就也有四处古全浊声母今尚读浊音<sup>①</sup>)。

(5) 作为南朝“吴语”见于记载的几个特征词如：人称“侬”(《子夜歌》)、腿称“骹”(《南史·王亮传》)、冷称“淘”(《世说新语》)，今都

① 郑张尚芳，《赣、闽、粤语里古全浊声母今读浊音的方言》，《吴语和闽语的比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3—17 页。

既见于浙南,又常用于闽语。郭璞《方言》注引当时江东方言,如:袖称“裯”,勺子称“櫜”,锹刃称“鏊”(今为犁铧)、粗簞称“筮”,茅蚬为“蝥”(今指蟑螂),盂为“瓿”,同样今皆吴闽两方言通用,而“裯、櫜、筮”只见于浙西南处衢吴语。黄典诚《闽语的特征》一文引闽语常用口语词单字 35 个<sup>①</sup>,其中“媵”在《集韵》佳韵户佳切,即本注为“吴人谓腌鱼”。而其中“媵(母)、骹(脚)、涂(泥)、林(水)、舷(边)、媵(田)、蛭(水母)、蛭、柚(稻)、箬(竹叶)、伏(孵)、卵(蛋)、倮、裯、哺、待(立)、櫜(楔子)、芽”等 18 字也用于浙南,如温州边即叫“边舷[.ci]”(“舷”本胡千切,闽语声母塞化,温州则清化),相同的超过一半。从而表明闽吴二语关系很深。

(6) 黄典诚《闽语的特征》举语法特征说:数量结构“几百几十、几丈几尺”等可以省去第二个量词及位在前面的“一”,如一百几十说“百几”,一万七千说“万七”,一丈六尺说“丈六”。浙南也如此,一百二十还可说“百念”。

(7) 尤其浙西南处衢片吴语跟闽语更像,有许多介于闽语吴语之间的形式,如龙泉“水”说“林”[?jy<sup>3</sup>←?dzy<sup>3</sup>]、“树”说[dziu<sup>6</sup>],表明吴闽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一个方言连续体。

那么当时江东方言至少与今吴闽二语都有关系,未能分清(徽语亦然)。今吴闽二语分化成这样巨大差异,可能与两种情况有关:(1)当时在双重语制下有两种“吴语”,一种官话性,一种土著南方语。那么或者太湖周围的“吴”语受官话同化而成今吴语,再向南扩展,而古“吴”语则保留在浙南山区,更远的进一步分化为闽语、徽语。(2)若是日本吴音代表原南方官话,则今闽语可能是受到带有古南方官话性质的客赣语从西而来的影响,才进一步转化、向客赣靠近(晋代闽地与赣地同属江州)。从而可能引起了吴闽方言的分化(现在闽语白读梗摄 eŋ→iaŋ

<sup>①</sup> 见《方言》1984 年第 4 期,第 163—164 页。

→iā, 阳韵 iaŋ→ioŋ→iū, 寒韵的 an→on→uā, 都是走的客赣方言路子。甚至“脣”laʔ<sup>8</sup>, “粒”白读 liap<sup>8</sup>, 也与客家话 lak<sup>8</sup>lep<sup>8</sup> 相似)。

### (三) 吴语形成独立方言

当闽语与吴语分别独立时, 吴语才算真正形成独立方言。很多证据表明唐时宋时闽语已形成与今一样的闽语和吴语:

1. 材料表明, 我国各个大方言在唐代确都已形成。这有几个理由: (1) 闽方言唐代已形成, 唐顾况《囿》诗中“囿”“郎罢(父)”等闽语词与今合(宋《集韵》狝韵九件切也说:“囿, 闽人呼儿曰囿”), 说明闽语已成独立方言。(2) 唐末五代间闽人避王曦之乱大量迁入温州地区(今温州很多大姓族谱及宋人墓志都表明这一点), 但却没有影响温州方言成为闽语, 说明当时吴语已很巩固。(3) 唐代对汀州、潮州的开拓则使那里成为客话及闽语区域, 而从此离开潮汀而北迁的畲族都已放弃近似苗瑶语的固有畲语, 而带走学来的客话, 表明客话闽语当时都已形成, 只是进入非汉语区才发挥其强大影响作用。比较杭州话可知客话唐代早已形成, 杭州话是宋代由汴京话渗入吴语而形成的, 从它可见到宋时官话与吴语的具体差别, 杭州话既无-p-t-m 尾而“儿”读[l/r], 这表明具有-t-p 与-m 尾、“儿”读[ŋi/ni/i]的客话不可能是宋代才从北方南迁的。而且客话放弃北方否定词“不”而采用粤语“唔係”, 说明粤语在当地力量已很强大了(赣语一直用“不”而没有采用“唔”则是它跟客话的重大区别)。

2. 宋室南迁使首都临安的吴语带上官话色彩, 形成独特的杭州吴语。比较杭州市区话及郊县余杭话就可明显看到, 杭州话只不过代词、结构助词都官话化了, 又有见系声母二等由k变tɕ, 儿尾由-n尾变成了-l尾等官话影响。这表明吴语已经很巩固, 不但郊县仍然保持小称-n尾等, 市内官话特色也不过有限的那几项, 都是大家熟知的官话特点。

依照杭州话的活标本, 可以窥知官话影响吴语的情况。那么将苏



沪吴语与南京扬州官话比,则除掉相类的官话成分,留下吴语本色,再以此与浙南吴语相比较,可能更能认识其共同的成分。这共同成分及本色特点或能表露由汉至东晋的原始江东“吴”语的一些旧貌。

3. 宋末永嘉戴侗《六书故》大量采录自己的温州方言俗语俗字俗音如“妮圳𧄸𧄸(音隘,小蟹名)箬”,充分表明当时温州话已很近今语。他还指出南部吴语台、温、括(处州)三片方言的差别,如“人”字瓯人“奴登切,呼若能”,台人“鱼邻切”,都已同如今三片方言区别一样。

#### (四) 综述吴语源流

1. 上古南方汉语只有楚语,原说非汉语的吴越江南各地最初也是被楚国收服的,原始吴语也应由楚语分化。至今吴语与老湘语还有许多语音演变共同点如:全浊声母都读浊音;见系二等无*i*介音;“咸山”二摄鼻尾脱落、元音鼻化;“蟹、效”二摄-*i*-*u*尾脱落,变单元音;入声古塞尾脱落变开或紧喉等。后来吴语湘语两区虽由客赣语从中插开,自江南近江至今还留有一条浊音走廊,从湖口、星子、都昌、永修,德安、武宁、修水到湖北通城、崇阳、蒲圻,到湖南临湘、岳阳、平江(南江)这十三点,全浊声母都还读浊音(湖口老派、武宁与吴语、湘语一样与次清不混,其他点与次清混),还有很多词汇相同。

2. 吴湘联系被插开是客赣语发展后的事。这种方言除全浊、次清声母混一外,韵尾保持比较完整,二等有些点(如梅县)有*i*介音,三等*i*介音也比别的南方方言多,影母洪音读 $\eta$ ,表现出好些比其所处地域位置更为靠北的一些语言特点,可能是北语结合南方土语的产物。早期南迁活动可以溯至汉末动乱。如《三国志·蒋济传》:“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皖城即今安徽潜山,是今赣语楔入江淮区的最北点之一,在周围强大江淮话包围圈中至今还能保持赣语一些基本特色。孤悬于江北赣语尖角之尖的潜山话,想来不会是受隔江赣语的影响,而可能是旧语的余

存。则赣客语可能来自这些东渡江入吴的古江淮移民，因从庐江、九江、蕲春南移的话，过江即今赣语区（贵池石台二县西部、东至、彭泽、瑞昌等处，这里有湖泊、长江及众多支汊，古代可能因到处沼泽，不便居住，因而人少荒废地多。而战乱时就成为很好的避难可垦辟之处了。这股江淮移民与豫章的古楚语结合后形成客赣语的雏形，以后又因东晋南下移民而加强为客赣语，从而向东发展影响东邻的古吴语，对分化出徽语、闽语曾起过重大作用（今闽语徽语中有的层次接近客赣）。

3. 六朝晋宋之“江东”方言包括后世吴闽方言在内，至今吴语东瓯片南部有苍南“蛮话”，是一种有全浊声母的介于吴闽之间的闽东话，在处衢片浦城南部有一种石陂话是有全浊声母的介于吴闽之间的闽北话，它们都是含有对方层次的中介方言，表示了一种处于二者之间的中间状态。就像浙江建德话是吴徽二语之间中间状态话那样。

4. 至唐时国家安定兴盛。战乱可造成方言迁徙，安定则可使方言巩固，分化。到开汀、开漳之时闽客两语即界线划然分明，说明闽语已经形成并巩固，北宋编的韵书《集韵》中已经编入闽方言专用方言字“囿、林”，皆与今闽语正同。同时也收入不少吴语方言字（如御韵陟虑切“齿，吴俗谓盛物於器曰～。”此即相当温州话[tsei<sup>2</sup>]，可能是“贮”（丁吕切）在方言中的音变，而为之造了专字）。则吴语自然也已形成而巩固了。

5. 宋代吴语不但已巩固并已形成今天南北各片的基本状况。东瓯片永嘉方言作者并已据自己方言写入字书（如戴侗：《六书故》），并由专业书会写出影响全国的文学作品——各种永嘉戏文脚本，其中丰富地表现了本片方言特色（如《张协状元》）。

那么吴语从江东方言分别独立发展则应在南朝以降。吴语形成的下限应该至少不晚于唐，而其祖语上限可以追溯到汉以至东楚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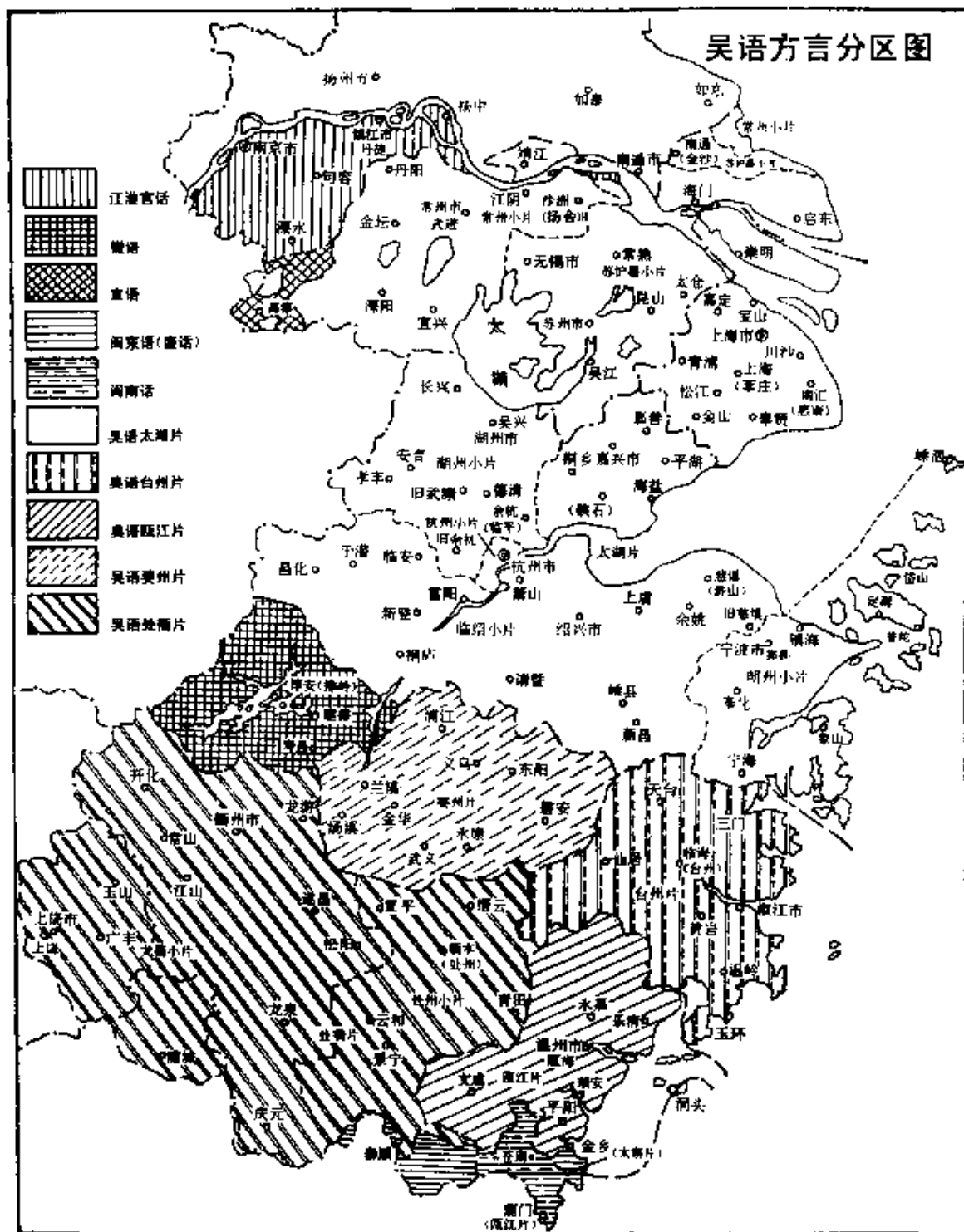


图 1-1 吴语方言分区图

## 第二节 吴语的分区

吴语南北、东西差异极大,彼此不能通话,甚或误认为对方说的不是吴语。北区出生的余杭章太炎先生在《检论·方言》中甚至将温州台方言划归闽语,所以必须在内部再行分区。

根据语言特点及通话情况,可将吴语分为三区六片:北区太湖片,南区台州片、东瓯片、婺州片、处衢片,西区宣州片。太湖片最大,可再分为毗陵、苏沪嘉、苕溪、杭州、临绍、甬江等六小片。处衢片也较大,可分为处州、龙衢两个小片(图1-1)。宣州片较散,可分为铜泾、太高、石陵三个小片(图1-2)。下面列举各小片分布的县市名称。各县市内的土话有的只一种,有的不止一种,部分县因有两种以上土话而跨片重见,则县城所在的片加星号“\*”为记。<sup>①</sup>

### 一、北 区

1. 北部吴语虽分布于苏沪浙皖四省市,但内部通话程度较大,故合为一片。

2. 太湖片 67 县市,人口 4730 万人。

(1) 毗陵小片 15 县市,人口 800 万。

[江苏] 常州市、武进(除沿江的圩塘、魏村、孝都、小河等乡)、丹阳、金坛(除漕河以西)、溧阳、宜兴、江阴(除西北角石庄

<sup>①</sup> 此处分区依据《中国语言地图集》“吴语”及“安徽南部方言”两图。这两图皆由郑张尚芳编绘,依据地图集编委会规定以 1984 年地名为准。这几年变化甚多,如无锡县,今为锡山市;吴县,今为吴县市;上海县,今划归闵行区;嘉定、宝山、金山皆已划为区;川沙县划归浦东新区。凡此,均请读者注意。

乡及利港乡一部)、沙洲(除中心河以东,沙槽河以北)、靖江(除西南角新桥、东兴等乡)、\*南通县(县城金沙镇及周围乡村)、海门(北部包场等12乡)、启东(北部吕四等7乡)、高淳(东部顾陇、永宁等7乡)。

[安徽] 郎溪(北部定埠、梅渚等乡,西北部建平、东夏、幸福等乡)、广德(北部下寺乡的庙西,南部芦村乡的甘溪沟及东亭乡部分村庄)。

(2) 苏沪嘉小片30县市,人口2330万。

[江苏] 南通县(东南部通海区9个乡及东北部三余区7个乡)、如东(东南角)、沙洲(中心河以东、沙槽河以北)、\*启东(除北部吕四、三甲等7个乡)、\*海门(南部)、常熟市、无锡县、苏州市、吴县、吴江、昆山、太仓。

[上海市] 上海市区、上海县、嘉定、宝山、川沙、南汇、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1185万人)。

[浙江] 嘉兴、嘉善、桐乡、平湖、海盐、海宁。

(3) 苕溪小片五县市,人口300万。

[浙江] 湖州市、长兴、安吉(以上两县西部边境官话移民区除外)、德清、余杭。

(4) 杭州小片一市,人口120万。

[浙江] 杭州市(限城区及周围近郊区)。

(5) 临绍小片十二县市,人口790万。

[浙江] 临安(旧昌化县昌北区及旧於潜县北部边境除外)、富阳、萧山、桐庐、建德(下包、乾潭以东)、绍兴市、诸暨、嵊县、新昌、上虞、余姚、慈溪。

(6) 甬江小片十县市,人口400万。

[浙江] 宁波市、鄞县、奉化、\*宁海(岔路及其以南除外)、象山、镇海、定海、普陀、岱山、嵊泗。

## 二、南 区

1. 南部吴语四片除处衢片部分外,都在浙江境内。但分歧很大,甚至片内也有部分点不能通话。一般说台州片婺州片跟北部吴语尚有一定程度的通话可能(台州片语音与北区最近),而东瓯、处衢两片与其他片差异最大,完全不能通话。

2. 台州片 10 县市,人口 500 万。

[浙江] 临海、三门、天台、仙居、黄岩、椒江市、温岭、玉环、乐清(清江以北)、宁海(岔路以南)。

3. 东瓯片 12 县市,人口 420 万。

[浙江] \*乐清(清江以西)、永嘉、温州市、瓯海、瑞安、平阳(闽语区除外)、苍南(闽语区除外)、\*文成(除南田区)、泰顺(限万丈区)、洞头(南部洞头、元觉、霓屿三岛东部的闽语区除外)、玉环(西南角)、青田(东部温溪区,及万山区的黄垟、万山等乡)。

4. 婺州片 9 个县市,人口 400 万。本片内有些县互相通话困难,要用金华话作中介。从通话情况看,金华、兰溪接近,武义、永康接近,东阳、磐安与义乌接近,浦江更较特殊。

[浙江] 金华市、兰溪、浦江、义乌、东阳、磐安、永康、武义(旧宣平县地区除外)、建德(姚村乡及旧寿昌县东南唐村、里叶二乡)。

5. 处衢片 23 县市,分布在浙西南、赣东北、闽西北,人口 650 万人。

(1) 处州小片 9 县、人口 150 万。

[浙江] 丽水、缙云、宣平(今归武义县所辖)、云和、景宁畲族自治县、文成(南田区)、\*青田(温溪区及万山区一部除外)、\*泰顺(南部闽语区及百丈镇除外)、庆元(东部)。

(2) 龙衢小片 15 县市,人口 500 万。

[浙江] 龙泉、\*庆元(东部竹坪、合湖以东除外)、松阳、遂昌、衢州市、龙游、开化、常山、江山。

[江西] 上饶市、上饶县、玉山、广丰、德兴(限陇头)。

[福建] \*浦城(南部石陂、水北、临江等五乡的闽语区除外)。

6. 相邻两片间有些方言带过渡性质,如婺州片的武义带有好些处州小片特点,处州小片的缙云又有婺州片特点。交通发达城市跟周围乡村也常不同,如浙赣线上的衢州市和上饶市,市区话带有较多的北区太湖片特点,跟周围乡间的处衢话不同。

7. 在东瓯片以南的闽语区中有好些地方是双方言区。如平阳水头镇,既说闽南话,也说吴语东瓯片的水头话。苍南县闽语区中有两个吴语方言岛:一是处在蛮话区与闽南话区之间的金乡镇,人口约1.6万,为明初金乡卫驻军的后裔,属北吴语太湖片,兼有好些官话特点。一是南端浙闽界上的蒲门城,也是一个古戍所,城内蒲城乡与城东面沿浦乡说南吴语东瓯片的蒲门话,这种话与其他东瓯片各点温州话不同,自有特色,约8000人。蒲门人对外能说闽南话,金乡人对外能说闽南话、蛮话、平阳当地温州话。

### 三、西 区

1. 宣州吴语分布于皖南、江苏西南部及浙江西北一角,内部分三个小片,差别较大。太高小片古全浊声母没有通音化,石陵小片有的点清化,铜泾小片则都通音化了(图1-2)。

2. 宣州片 15 县市,308 万人(其中安徽 261 万人)。

(1) 铜泾小片 12 县市,230 万人。

[安徽] \*铜陵、\*泾县、宁国(青龙、济川、东岸等乡的乡村)、\*繁昌、南陵(北部西部,及东南角奚滩乡一带)、宣城(限北部西部及南部溪口乡金牌)、\*芜湖县(万春区除外)、当涂(限东部南部)、青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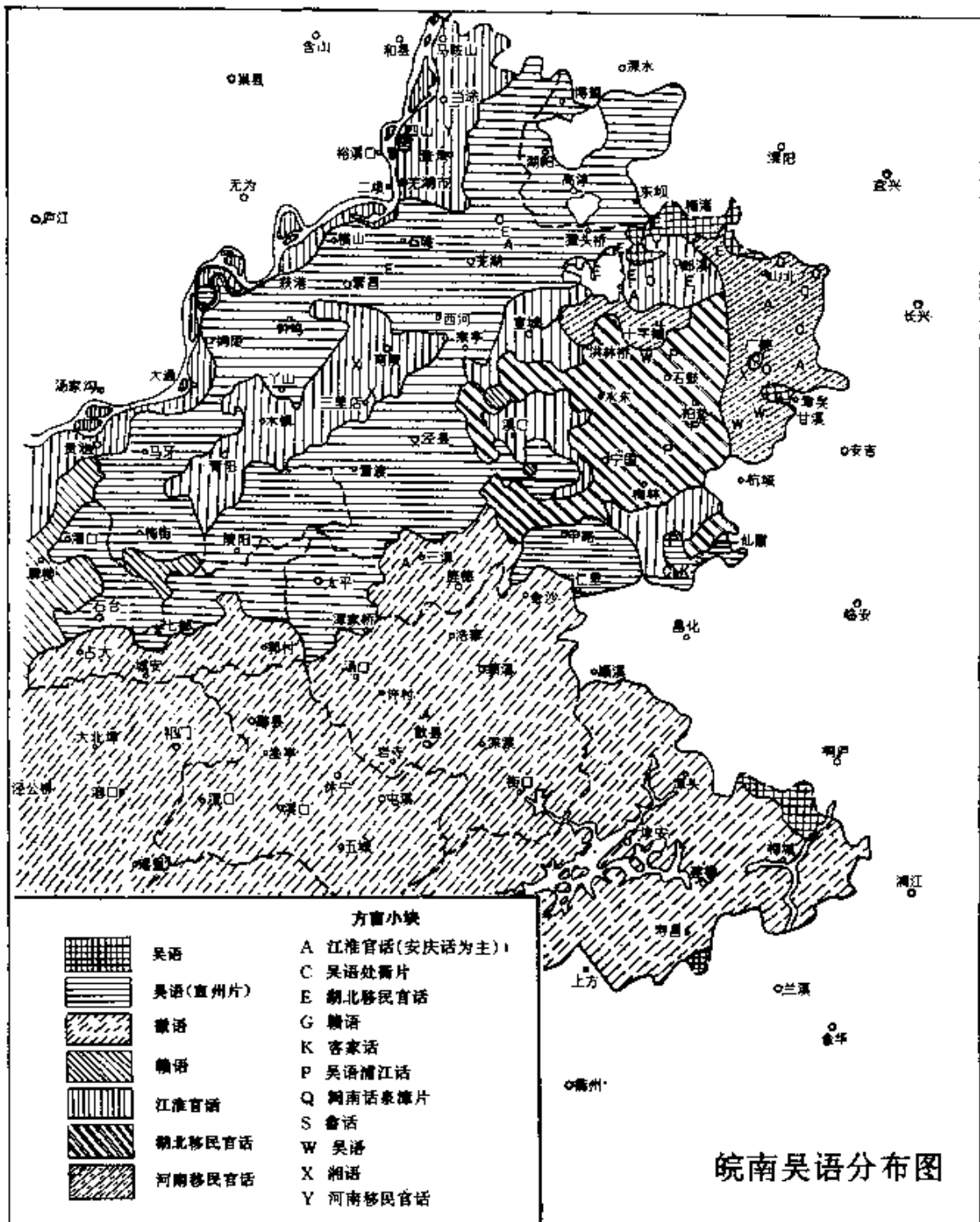


图 1-2 皖南吴语分布图



(童埠、杜村二乡及酉华乡杨柳地)、贵池(东部)、石台(东部,含旧城关广阳)、太平(已划入黄山市。西部杨家岭一带,北部龙门以北)。

(2) 太高小片 6 县市 65 万人(安徽 18 万人,浙江 47 万人)。

[安徽] \*太平(划入黄山市。东部南部)、宁国(限南部南极等乡)、当涂(限东部湖阳乡、博望乡)。

[江苏] \*高淳(西部)、溧水(南部)。

[浙江] 临安(旧昌化县的昌北区)。

(3) 石陵小片 5 县市,13 万人。

[安徽] \*石台(石埭。中部)、青阳(东南陵阳等乡,含城关旧派)、泾县(限西南厚岸、包合、水东三乡)、太平(划入黄山市。西北三丰地区部分乡村)、贵池(限南部灌口一带)。

3. 宣州吴语受到官话严重侵蚀,在城镇往往对外说江淮话,在家说吴语,或限于老人妇女应用,在圩区则保存较好,称为“此地话、圩巴老话”。有些在官话包围中的土著话已被同化得只残存很少几项特征,如芜湖市郊四山乡的褐南村,男人已说市区官话,土话被认为妇女话,也只剩下定母读[r]声母,代词复数带[nən<sup>24</sup>]尾,近指用[kəʔ<sup>5</sup>],远指用[ku<sup>55</sup>]等几项宣州吴语特征了,这些残余点即未统计在内。注意太平划入黄山市,但现黄山市驻地屯溪是说徽语的。

---

### 第三节 吴语的特征

---

#### 一、现代吴语的一般特征

##### (一) 语音方面

##### 1. 声母

(1) 古全浊声母多数点今仍读浊音(后接气嗓音),与古清音声

母今仍读清音有别。古帮滂并[p、ph、b]、端透定[t、th、d]、见溪群[k、kh、g]今音在发音方法上三分。以“端透定”为例，一般仍分读[t、th、d]。少数点如青田分读[ʔd、th、d]，庆元分读[ʔd、th、t]，浦城分读[l、th、t]，铜陵分读[t、th、ʔ]也保持三分。是吴语最主要的特点。

(2) 古“疑”母今读鼻音，洪[ŋ-]，细[ɲ-]，不与“影”母混。如苏州“岳”[ŋoʔ<sub>2</sub>]、“玉”[ɲioʔ<sub>2</sub>]。

(3) 古“微”母今有[v][m]文白两读，文读为口音，白读为鼻音。以下举例，斜线前为文读，后为白读。例如苏州“味”[vi<sup>2</sup>/mi<sup>2</sup>]，温州“问”[vaŋ<sup>2</sup>/maŋ<sup>2</sup>]。

(4) 古“日”母今有[z~z̥][n~ɲ]文白两读，文读音，白读鼻音。如上海“日”[zəʔ<sup>2</sup>/ɲieʔ<sup>2</sup>]，“儿耳二”文读[əl~z]，白读鼻音[ɲi]。“儿”作词尾也读鼻音，如余杭读[ɲ]，温州读[ŋ]，庆元读[ɲie]。杭州读[l]是宋代南渡官音影响所致，是例外。

(5) [m、m、ŋ]能自成音节，“五鱼”口语多读[ŋ]音。

(6) “鸟”字声母有[ɲ][t]文白两读，白读与古音端母“都了切”相合。

## 2. 韵母

(1) 蟹摄二等字不带[-i]尾，读开尾韵，如绍兴“排”[<sub>c</sub>ba]。江西吴语例外。

(2) 咸山两摄字不带鼻尾，读音或半鼻音。如苏州“甘”[<sub>c</sub>kɸ]、嵊县“山”[<sub>c</sub>s æ̃]，温州“先”[<sub>c</sub>çi]。

(3) 咸山两摄见系字一二等不同韵(二等指白读洪音)，如苏州“肝”<sub>c</sub>kɸ≠“间”<sub>c</sub>kɛ，温州“含”<sub>c</sub>fi<sub>4</sub>≠“咸”<sub>c</sub>fi<sub>4</sub>。

(4) 梗摄二等白读跟同摄三四等及曾摄不混，“更(打~)坑杏撑生”跟“亘恒称胜”不同韵。例如丽水“撑”tshāŋ≠“称”tchiŋ。

(5) 只有一个鼻尾音位，-n与-ŋ、-m不对立，“因阴英”不分。

(6) “打”字读法合于梗韵“德冷切”，不与麻韵相混，只跟“冷”字

同韵。

(7) “大”口语多读唐佐切,不读“徒盖切”。

### 3. 声调

(1) 平上去入今各分阴阳(一部分方言阳调没有阳上),阴调只拼清音声母及紧喉鼻流音声母,阳调只拼浊声母(包括带浊流实即后接气嗓音的鼻流音声母)。

(2) 入声多数收喉塞尾;少数读开尾,但自成一调类不跟其他三声相混(如温州)。只有婺州片永康入声与上声合并,武义一部分古浊母入声字并到阳上;金华一部分古入声字白读并到去声。

(3) 吴语的连读变调比较发达,连调往往保持更早于单读调的调值,例如有的方言阴阳平在连调时合而不分。

## (二) 语法虚助词方面:

### 1. 虚助

(1) 否定词“不”字口语读齿唇音声母,除东瓯片[ $fu^3$ ]、处衢片[ $fəu^3$ ]合于《广韵》上声“方久切”外,多数点促化读作入声的“弗”[ $fəʔ^7$ ]或“勿”[ $vəʔ^8$ ]。

(2) 表领有的助词“的”多数点是“个”字的轻音。有的浊化,有的读成促音。

(3) 第三身代词多作“渠”,太湖片[ $ɕji$ ]宣州片[ $ɕhzi$ ]是“渠”的弱化形式(只有受官话影响深的小片作“他”。还有少数点作“伊”[ $ʔi$ ])。

(4) 吴语名词词头“阿”比较发达,多用于亲属、排行及人品、人名上,如“阿哥、阿侄、阿伯、阿囡、阿大、阿飞、阿木林、阿福、阿英”等。还有“老”范围更广些,如“老虫/老鼠、老鹅/老鸦、老虎、老板、老师(温州兼表老师傅)、老鸨、老大(掌船者)、老二、老三、老陈、老怪、老太、老兄、老公、老婆或老姥、老实、老蟹”等。

(5) 吴语词尾除“子”及小称“儿”尾外,最发达的是“头”尾,各片都有很多“头”尾词,如“鼻头、额头、日头、行头、姘头、名头、门口头、

甜头、块头、十个头(十块)、单斤头”等。又有“佬(老)”尾用于人品,如上海“小魅佬、大好佬”,温州“鼓板佬、哑佬”,宣州“圩巴佬、本地佬、江北佬”等。

(6) 状词词尾不用“地”,而用“叫”或“能”,如“慢慢叫走”、“好好能吃”。

## 2. 句法

(1) 宾语前置的主谓谓语句占优势,如“我看过了电影”常说成“我电影看过了”(“看”“了”各方言说法或有不同,但句式不变)。双宾语句如“我给你一本书”,除说成“我拨本书你”外,也常说成“我书拨本你”。

(2) 说“做我不着”、“打你不过”、“对渠不住”等。

## (三) 词汇方面

1. 吴语词义与普通话有别,如:(1)“两”可用如序数“二”：“礼拜两、第两个、两年级、两楼”。(2)“脚”兼指腿,普通话只指腿下端脚掌部分。(3)“面”指面条,普通话指粮食的粉末。(4)“壮”兼指人的胖和动物的肥,普通话则指健壮。“肥”专指动物脂肪、或多脂肪。普通话兼指动物肥壮、衣裤鞋袜宽大。(5)“长”兼指高：“长人”、“长脚”,普通话只指长度长。

2. 常用词不同,例如:(1)天说“日”(一日、两日、半日、十几日、前日、后日、大前日),白天说“日里”。(2)东西说“物事”,活儿说“生活”。(3)风筝说“鹞”、“鹞子”。(4)脸说“面”。眼说“眼乌珠”。左手说“济手”,右手说“顺手”。(5)下说“落”(落雨、落雪、落车、落课、落班)。(6)说话说“话”或“讲”。(7)溶化说“烊(扬)”,如“烊雪”。(8)傻说“騃”(俗作“呆”),圆滑说“滑头”。节俭说“做人家”。(9)年轻说“后生”。(10)宽说“阔”,窄说“狭”,稀说“薄”(薄布、薄粥)。(11)一些说“一”眼”。(12)很说“蛮”(“蛮好”、“蛮灵”)。

3. 构词语素字序不同,例如:(1)客人说“人客”。(2)热闹说“闹

热”。(3)地道说“道地”。

4. 保持古音词;例如:(1)麻雀叫“麻将”。“将”是“爵儿”合音,东瓯片称“将儿”,也即“爵儿”(“爵”即古“雀”字)。或说“麻鸟”,“鸟”音吊上声,也是古音。(2)孵说“伏”[bu<sup>6</sup>],音如捕。《广韵》寡韵扶富切:“伏,鸟菴子。”保持重唇读法。(3)那里称“许”,音如海,“勒海、辣海”等都是“来许”。拥有称“窟”,音如“该”,皆鱼韵字白读。(4)合伙、合药、合缝都音鸽,《广韵》古沓切或作“恰”。(5)嗅说 hoŋ<sup>5</sup>,《集韵》香仲切:“鼻审气也。”(6)铜钱说“铜钿”,“钱”上古音 \*sden,未变塞擦音。(7)巷说“弄”。“巷”上古音 \*groong,此取复辅音后半的音。吴语代词复数及你家你处都有说“拉”的,也可能是上古“家” \*kraa 音之后半。

5. 保留古词。例如下面一些吴语常用词,古辞书字书皆已著录:

(1) 滗,《心明经音义》引《通俗文》:“去汁曰滗”。

(2) 馊,阉鸡,见《篇海类编》。又《正字通》引《臞仙肘后经》:“~鸡”。《广韵》魂韵都昆切则从“马”旁作馊:“去畜势,出《字林》。”

(3) 宰鸡说“焮”,音推,本作“焮”。《广韵》他回切:“焮毛,出《字林》。”《集韵》:“以汤除毛。”

(4) 敲,透上声。《集韵》他口切:“展也。”

(5) 汰,略洗。字早见《说文》。又《玉篇》:“徒盖切,洗也。”

(6) 囤,藏。《集韵》口浪切:“藏也。”《周礼》作“抗”,《夏官·服不氏》:“宾客之事则抗皮”,郑玄注引郑众说:“主举藏之。”即主管收藏宾客朝聘之皮帛。

(7) 陞,斜靠。《方言》卷十三:“江南人呼梯为陞,所以陞物而登也。”《玉篇》巨慨切:“梯也,企立也。”《集韵》巨代切:“《博雅》陞也。”

(8) 糍,俗作“糍”(麻~,~糕)。《说文》:“稻饼也。”

(9) 焯,水煮或油炸。《广韵》士洽切:“汤~”。《集韵》实洽切:“《博雅》:淪也。”

(10) 饧,饴糖。俗作“净糖”,误。饧字早见于汉。《诗·有瞽》郑

玄注有“卖汤者”。《广韵》清韵徐盈切：“饴也”。

(11) 揞，本作“揞”，按住，见《集韵》沁韵丘禁切：“按也”。

(12) 憨，《广韵》呼谈切：“《玉篇》：愚也、痴也。”梁刘勰《文心雕龙·程器》：“正平狂憨以致戮。”

(13) 念，二十《说文》作“廿”。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三：“〔开业寺碑〕碑阴多宋人题名，有曰：‘……元祐辛未阳月念五日题’。以廿为念，始见于此。”

(14) 呷，喝饮。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景宁寺》：“呷啜尊羹。”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中记任迪简因军宴中军吏误以醋酌，恐主者见罪而强饮之，后被时人呼为“呷醋节帅”。

(15) 颺，比量长短。《广韵》愿韵於建切：“物相当也。”《广雅·释诂三》：“当也”。

(16) 饮，粥汁今称“粥饮汤”，宋洪迈《夷坚三志辛卷·危病不药愈》：“仅吸少稀饮。”

(17) 揞，抓。《集韵》乌化切：“吴人谓挽曰～。”

(18) 𦘔，《广韵》乌孔切：“臭貌，出《字林》。”《集韵》乌贡切：“𦘔，臭气”，与今调去声更合。

(19) 鼷（～鼻。俗也作“瓮鼻”），《集韵》引《埤苍》：“鼻病也”。王充《论衡·别通》：“鼻不知香臭曰鼷。”

(20) 頔，指淹没于水。《广韵》没韵乌没切：“内头水中。”

此类词甚多，以上所举不过略举一斑。

## 二、古吴越语遗存的特征

在今吴语中还可看到与普通话差异较大，而与侗台语相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在语音、语法、词汇上都表现有所表现，应该是吴方言的底层，即古吴越语的遗存成分。它们当是古吴越人在学得汉语后，遗留

在新学语言中的旧语言的沉淀和化石。现也分三方面来说。

### (一) 语音方面

1. 在上海和浙南,古帮母和端母有好些地点不念[p][t]而念成先喉塞音[ʔb][ʔd],这种现象在上海市分布于松江、南汇、川沙、奉贤、金山,嘉定、上海等县及市区老派中(赵元任 1928 报道了松江、南汇,袁家骅 1960 增加了川沙)。在浙南分布于庆元、景宁、青田、文成(南田、玉壶、黄坛、西坑等四区)、永嘉(除县城及其以南地区)、仙居(南部)、缙云、永康等县(赵元任 1928 报道过永康,其喉塞成分较弱,郑张尚芳 1964 提到永嘉、文成、青田这类声母,其喉塞成分较强)。如“疤、带”二字金山、永嘉都读[ʔbo<sup>1</sup>],[ʔda<sup>5</sup>]。<sup>①</sup>

这类先喉塞声母,除浙沪吴语外,只见于广东连山粤语及海南闽语。但在壮侗语族语言中却是最常见的声母,如壮语、布依语,水语、莫话、毛南语、拉珈语、黎语,以及邻国的泰语、老挝语、阿含语(Ahom)等,此外还有越南京语、芒语、巴那语及孟语、高棉语等孟高棉语族语言。其他地区其他语族的语言很少出现这种先喉塞音。这些语言的这类声母都配阴调,上海、浙南吴语,海南闽语同样也配阴调,所以这是典型的古吴越语音的遗留。

北泰诸语的 ʔb、ʔd 声母在其方言或兄弟语中有的分别转化为 m、n(如南壮的邕宁、扶绥、隆安话,北壮的田东、平果、横县话,剥隘话;缅甸的康梯语),有的转化为 m、l(如宁明、来宾壮语、德宏傣语、侗语、阳安水语,中越边界的村老话,缅甸的掸语)。浙南帮端母除读 ʔb、ʔd 外也有些地点转化为 m、n(如缙云、永康、义乌、武义等县)。缙云帮端母在今鼻尾韵 om、eiŋ、aŋ 前整齐地转化为鼻音声母,如:东冬

<sup>①</sup> 赵元任:《现代吴语研究》,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四种,北京 1928 年;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 1960 年版;郑张尚芳:《温州音系》,《中国语文》1964 年第 1 期。

?nom<sup>1</sup>、丁灯 ?nēiŋ<sup>1</sup>、饼 ?mēiŋ<sup>5</sup>,还包括知母白读“砧” ?naŋ<sup>1</sup>。永康则不限今鼻尾韵,古鼻尾韵无介音字也都变鼻音声母:担 ?na<sup>1</sup>、冬东 ?noŋ<sup>1</sup>、绷 ?mai<sup>5</sup>、扮 ?ma<sup>5</sup>、本 ?nəŋ<sup>3</sup>,义乌、武义有介音的也能变,如义乌:担 ?nə<sup>1</sup>、店 ?ŋie<sup>5</sup>、癫 ?ŋie<sup>1</sup>,武义:担 ?nuo<sup>3</sup>、店 ?nie<sup>5</sup>、转(白读) ?ŋye<sup>3</sup>。这种现象在有些点则不成系统,只作为一些字的白读出现,如在东阳、金华。“打”字读 ?n-声母则扩及北至浦江、仙居,南至浦城、庆元、泰顺等许多县分。因此这同样是古百越 ?b、?d 声母变化的一种体现(陈忠敏即说南汇 ?b、?d、?ʔ 都有较浓的鼻音感<sup>①</sup>)。现将浙南端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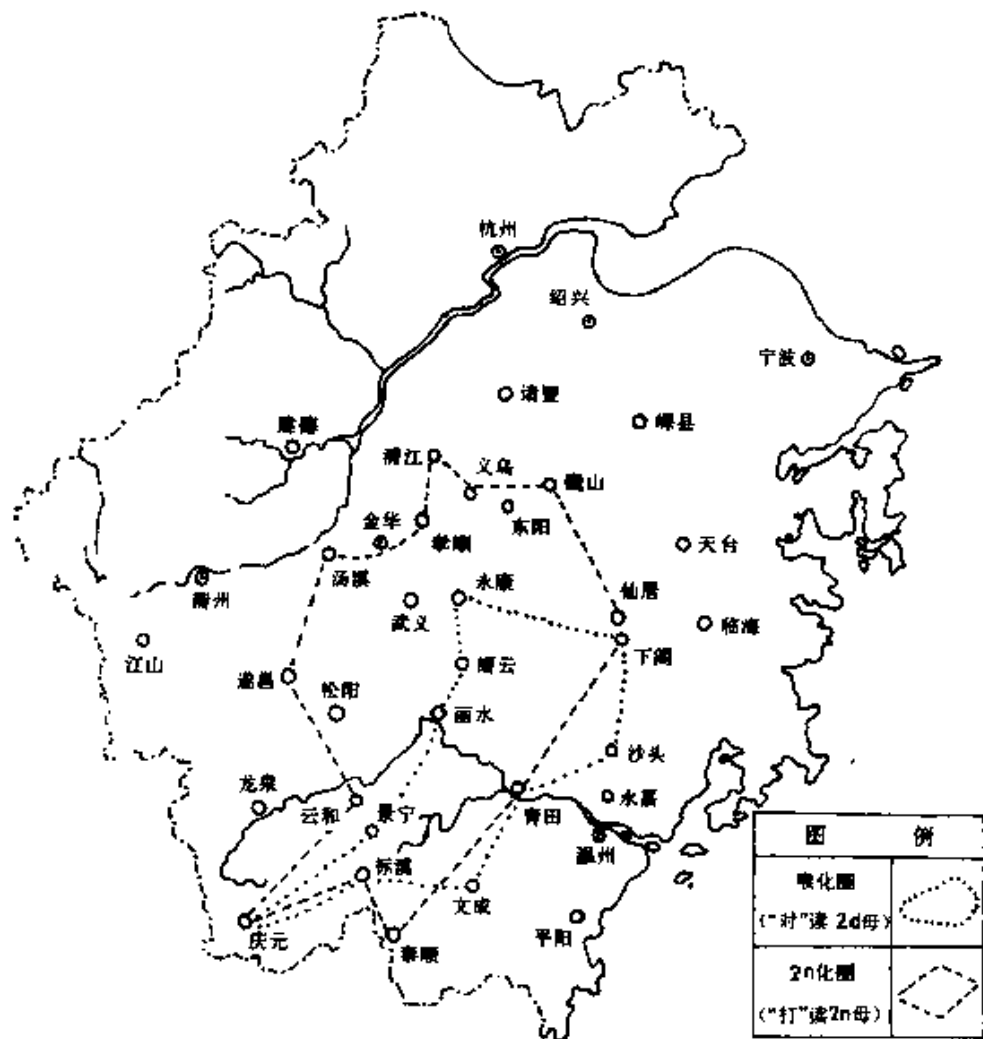


图 1-3 浙南帮端母喉化及鼻化现象分布图

① 陈忠敏:《论南汇方言三种缩气塞音》,《语言研究》1988年第1期。



读ʔd、ʔn的地区图示如下(图1-3)。

同样,ʔd变l的现象吴语中也同样有所表现,如ʔn化圈中靠北的武义是端母逢古鼻尾韵变ʔn,非鼻尾韵则变ʔl(与帮母分读ʔm、p相对),而最南的浦城则不管什么韵母都变ʔl(只“打”n<sup>53</sup>例外)

	底	堆	笃	单	店	冬
武义	ʔlie <sup>3</sup>	ʔla <sup>1</sup>	ʔlo <sup>7</sup>	ʔnuo <sup>1</sup>	ʔnie <sup>5</sup>	ʔnoŋ <sup>1</sup>
浦城	ʔlie <sup>3</sup>	ʔlue <sup>7</sup>	ʔlou <sup>7</sup>	ʔli <sup>53</sup>	ʔli <sup>53</sup>	ʔloŋ <sup>1</sup>

2. 在上海市南汇县还有先喉塞音[ʔʃ]<sup>①</sup>,见于见母二三等字如“交嫁甲姜镜脚菊叫”及端母四等字“雕鸟钓”等字上,而在浙南则有见、章母读为[ʔj-]母的现象,如“鸡箕叫笕嫁夹”与“圳肫种肿周(对~)煮”等,分布于龙泉、庆元、景宁、云和、松阳、遂昌、江山、常山、开化、衢县、龙游、武义、永康、缙云、丽水等县,“箕”读“衣”,“圳、肫”读如“怨、氩”的现象分布得更广,还可涉及淳安、寿昌、建德,兰溪、金华、东阳、青田、永嘉等处。<sup>②</sup> 两者“嫁夹叫”等字相交叉,应为同一现象。这一现象可与布依语的[ʔdz]母相比较:兴义巴结布依语“住在”(汉语“驻”)ʔdzu<sup>5</sup>,“挖”(相当汉语“斫”,陟玉切)ʔdzok<sup>7</sup>、“布依”ʔdzei<sup>4</sup>,惠水长安即分别变为[ʔjiu<sup>5</sup>]、[ʔjo<sup>7</sup>]、[ʔjei<sup>4</sup>]。“嫁夹种”则与越南汉字音“嫁 gia<sup>5</sup>[ja→ja<sup>5</sup>]、“夹甲”giap[jap→jap<sup>5</sup>]、“种”(~类,白读)giong[joŋ→joŋ<sup>5</sup>]的现象很相一致。可以推出,在上海浙南都有古

吴越语以下遗存:  $\left. \begin{matrix} \text{ʔʃ} \\ \text{ʔdz} \end{matrix} \right\} \text{ʔj}$

3. 多数吴语是入声带喉塞ʔ,但东瓯片各县市都是上声调带喉塞,读ʔ45、ʔ34。文成青田则阴上读紧喉ʔ45、或ʔ35。台州的三门、天台、仙居上声两调都是ʔ324、ʔ213。黄岩ʔ423、ʔ212 赵元任曾作报道,

① 陈忠敏:《论南汇方言三种缩气塞音》,《语言研究》1988年第1期。

② 详郑张尚芳:《浙西南方言的tc声母脱落现象》,《吴语和闽语的比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说上声字“当中喉头关一关，作一个？音，把字切成两个音节似的”。<sup>①</sup> 这跟海南文昌话？21“使人感到韵母突然因喉部闭塞而中断，……一个韵母听起来就好像是两个韵母”很相似。<sup>②</sup> 这种上声读促调的现象也见于龙州壮语阳上？310，转折式见于越南京语 214 和 255，后者紧喉中断转折现象尤显著，一如台州方言（有人认为越南话是侗台语与芒语的混合语）。故这也是古越语音特征之一。

## （二）语法方面

1. 侗台语修饰词组中，中心语常在前，定语常在后，如“新鞋、大鸭、快刀、死猪”说成“鞋新|鸭大|刀快|猪死”。吴语也常有类似倒序词，如嘉定澡盆叫“桶浴”，即别处“浴桶”。温州这类现象最丰富，下面即以温州话为例。温州除同义比联倒序词如“腰身（身腰）、千秋（打秋千）、玟杯（杯玟）、牢监（监牢）、伤损（损伤）、闹热（热闹）”不算，还有：

（1）鱼咸（咸鱼：～行）、菜咸（咸菜）、菜干（干菜）、笋干（干笋）、茶浓[n<sub>1</sub>yo<sup>2</sup>]（才泡的浓茶，待冲淡再喝）、饭焦（锅巴）。

（2）豆腐软（豆腐脑）、豆腐熟（蒸的豆腐）、豆腐生（生吃的豆腐，泰顺说“豆腐青”）、鱼生（生吃的腌鱼）、江蟹生（生吃的凉拌海蟹）、菜头生（腌一下生吃的萝卜）、煤生（生铁）、净生（生漆）。

（3）老鼠黄（黄鼠狼，南昌即称“黄老鼠”）、篾青（青竹篾）、篾黄（黄篾）、江蟹红儿（煮熟的海蟹）。

（4）石牯（大石头）、风颶（亦写“风痴”，台风）、楼阁（阁楼）、酒汗（汗酒）、针金（黄花菜，别处称“金针菜”）、板砧（砧板）、髡蹄（蹄髈）、纸蓬（蓬纸、草纸，用稻草土制的卫生纸）、头衔（衔头）。

（5）鞋拖（拖鞋）、鞋套（套鞋）、衣裳沓（两件套在一起，一块脱穿的衣服）、裙衬（衬裙）、墙围（围墙）、眼泪出[tçhai<sub>1</sub>]（流泪）。

①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四种，北京 1928 年。

② 梁猷刚：《海南方言中的喉塞音》，《中国语文》1964 年第 6 期，第 465 页。

2. 台语名词中动物性别常后加“公”、“母”，温州话也有这样的，如下列词，注意“牯”常指配种的，“娘”常指已孕育的：牛牯（公牛）、牛娘（母牛）、猪牯（公猪）、猪娘（母猪）、鸡娘（母鸡）。

母的或重复在前后加雌性义词素：如“草鸡娘，草狗娘儿”。

3. 副词修饰动词时，壮语“先”*koon*<sup>5</sup>、布依语“添（再）”*tiam*<sup>1</sup>在动词后，温州话也如此说（上海也有“到快哉”之类说法）。如温州：  
走先（先走） 吃添（再吃） 呷道（马上喝） 睏罢（已睡）  
吃快（快些吃） 走慢（慢些走） 走好（好好走） 讲实（肯定地说）

副词修饰形容词时，壮语“极”*ɣau*<sup>6</sup>在后，温州也有在后的（“蛮”则在前），如：

红显（很红） 高甚（颇高） 臭脍（臭死了，可能原同“交”字）  
苦倒（太苦了） 好最（音醉 [*tsai*<sup>5</sup>]，如在前则读 [*tse*<sup>5</sup>]

4. 形容词后加双音摹状成分，汉台语皆同，但台语还可在后加单音节摹状成分，如壮语漆黑说 [*dam*<sup>1</sup> *det*<sup>7</sup>]，前字为黑，后字为摹状成分。温州这类结构非常丰富，如：

深顿 浅撇 矮坐 圆鲲 尖溜 长梢 大笨 细雅  
轻可 重坠 嫩膘 硬扎 硬浪 软烘 厚墩 薄索  
方整 横绷 近便 壮质 光暝 光溜 燥索 灵泛  
清致 苦瞪 酸齏 花斑 黄肿 白荡 红鲜 乌扭

比较“长梢”别的方言说“梢长”，“尖溜”别的方言说“溜尖”。

5. 壮语量词不带数词直接加在名词前时有指示作用，如“个缸” [*ʔan*<sup>1</sup> *kaaŋ*<sup>1</sup>] 等于“这个缸”。温州话也如此，“个缸” [*kai*<sup>5-7</sup> *kuo*<sup>1</sup>]、“把刀” [*po*<sup>3-7</sup> *tə*<sup>1</sup>]、“张纸” [*tci*<sup>1-7</sup> *tsei*<sup>3</sup>] 即这个缸、这把刀、这张纸，只是量词都要变读入声。“个人”作这个人解，南北朝以来，诗文中多见，亦可能是南方语言影响所致。

量词又可加定语。温州话可说“长条”（纸）、“细粒”（米），“大个”（人）等。量词也可与名词组合成词，温州戏文称“戏出”，冰棍叫“冰

条”，磨扇叫“磨片”。

### (三) 词汇方面

1. 名词。有些事物常见于南方，有字或无字，即使有字，也可能因南方民族词源而后起。

(1) 小河称“浜”，同泰文[ʔbaaŋ]。

(2) 柚子，温州叫[phə<sup>1</sup>]，滂母豪韵，瑞安叫[pha<sup>1</sup>]，肴韵。清范缜《越谚》卷中记绍兴作“香脬”，今音[ciə<sup>1</sup>phə<sup>1</sup>]，宁波同。俗写作“泡”“枹”无定。福州也说 phau<sup>1</sup>，可比较侗语 pau<sup>2</sup>。

(3) 蟑螂，温州叫“胶蜚”[kuə<sup>1</sup>za<sup>8</sup>]，说法同闽语，后字相当傣雅[saat<sup>7</sup>]。

(4) 雾，温州叫“幔”[mø<sup>6</sup>]，可能与水语[mon<sup>1</sup>]同源。

(5) 温州永强农村呼母为“阿 ja<sup>2</sup>”，与泰文称祖母为 jaa<sup>6</sup>（傣雅 a<sup>1</sup>ja<sup>3</sup>）同。

(6) 降神，温州叫“降童”，其术者称“神童”，江苏南通叫“童子”。《夷坚三志辛卷·古步仙童》中也记“余千古步民陈青……自称仙童”，用降神术。皆与越南语称[ʔdoŋ<sup>2</sup>]相同。

(7) 木筏称“排”，源同泰文 bee<sup>2</sup>。

(8) 鞋袷，温州称“迫”，同壮语[pek<sup>7</sup>]。

(9) 酒瓮，温州称“埕”[dzeŋ<sup>2</sup>]，已见《拍案惊奇》卷四〇：“望子高挑，埕头广架。……原来是一个大酒店。”亦见《型世言》。与龙州壮语 tciŋ<sup>2</sup>，越南 chih<sup>4</sup> 同。（此词也有可能同来自《方言》卷五的甌字）

(10) 蓓蕾，温州叫[ny<sup>6</sup>]，同越南 nu<sup>6</sup>。

(11) 鸡虱，温州叫“蟻”[ji<sup>2</sup>]，源自泰文 rai<sup>2</sup>，壮语[jwi<sup>2</sup>/rei<sup>2</sup>]。

(12) 上瘾，温州叫“念头”，同越南[njen<sup>6</sup>]。

2. 动词：

(1) 轻轻抚摩，温州叫 lai<sup>4</sup>，同泰文 lai<sup>4</sup>。

(2) 丢抛，温州叫“坎”cai<sup>7</sup>，丽水叫 cyei<sup>7</sup>，庆元 cyei<sup>7</sup> 与永春闽语

hit<sup>8</sup>、拉珈[hwit<sup>7</sup>]同源。

(3) 鸟啄物,温州叫“咄”[tai<sup>7</sup>](与“脱夺”白读同韵),应与壮语[toot<sup>7</sup>]同源。

(4) 挖,温州叫“搂”[lau<sup>1</sup>](冯梦龙《广笑府·咏老翁》也有“未曾放箸便搂牙”)。同侬语[ləu<sup>1</sup>]。

(5) 勉力支撑,温州叫[nɛ<sup>6</sup>],同越南 nai<sup>1</sup>。

(6) 晕厥,温州说[ŋɔ<sup>6</sup>],同越南[ŋet<sup>5</sup>]。

(7) 稻麦开花,温州叫“浪”[luɔ<sup>6</sup>]“花”,同壮语[laaŋ<sup>6</sup>]~花。

### 3. 其他

(1) “一点儿”温州说[ʔni<sup>7/3</sup>](一~,~儿),此字不合温州音系中泥母字遇细音腭化为[nj]的一般规则,是唯一 n 与 i 拼的音节。其所以超出常规说明它应为古越语遗存。泰文“小、少”、“一点点”正是 nid, 侬语“小”[ni<sup>5</sup>], 又量词“些点”[nj<sup>1</sup>], 毛南语[ʔni<sup>5</sup>], 仡佬语[niŋ<sup>5</sup>]。(温州此字儿化也是 niŋ<sup>7/3</sup>, 如“喝一~”, 与傣语“一”、“一点”nuŋ<sup>6</sup>, 如“喝一点儿”也正音近)此语分布很广, 北至连云港市海州话 li<sup>1</sup>(很小一点, 海州 n、l 不分), 东至福州 li<sup>7</sup>(~团: 一点), 南至潮州 ni<sup>8</sup>(~团: 一点儿)、阳江粤语“一 nit<sup>7</sup>”, 西至湖南娄底“一点儿”[ni<sup>2</sup>], 这些可能都是古百越语的遗存。

(2) 温州“一些”“好些”“有些”的“些”说[le<sup>0</sup>], 轻声字写作“仵、俚、侬”等, 都不过记音, 应与泰文 lek“细小的, 些少的”同源。壮语 lik<sup>8</sup> niŋ<sup>1</sup> niŋ<sup>1</sup>“小小的”, 应是(2)与(1)两语素的结合。

(3) 温州“又、也”说“𪗇”[ji<sup>6</sup>], 冯梦龙《山歌》写作“𪗇”, 当与壮语“也”[ji<sup>6</sup>]同源。

## 三、吴语各区片的特征

吴语分北部、西部、南部三区, 其主要特征可由第三身代词的

发音来区别。《集韵》鱼韵：“𩚑，吴人呼彼称，通作渠。”明冯梦龙《山歌》也都作“渠”。除北区、西区有少数方言接受官话“他”的说法外，本地说法一般是“渠”，或“其”，但发音不同。西区音擦化或通音化为[hzi/hji<sup>2</sup>]，音同“其”。北区或为通音[fi<sup>2</sup>]音同“夷”，或为塞擦音[dzi<sup>2</sup>]音同“其”，都可以看成“其”或其通音化读法（注意有人把“夷”混写为“伊”，但“伊”为阴平影母字，来源不合<sup>①</sup>），这个音可能也是“渠”的白读，但与“其”音更近。南区则清楚地说成鱼韵“渠”的白读[gu/gi/ge/gei<sup>2</sup>]（常山、江山、玉山、广丰则鼻音化为[ŋɣ<sup>2</sup>]。北区只常熟、昌化、余姚说[g-]，苏州说[li<sup>1</sup>]，南区只乐清、浦江说[dzi<sup>2</sup>]，泰顺说[dzɿ<sup>2</sup>]，是为例外。

连读变调，北区前字主导，南区后字主导；西区变调少，以前字主导的平声变调较多些。

还有北区时候多说“辰光”，南区西区则多说“时节”、“时候”（西区还有“晌子”），也不相同。

下面分区分片具体说明各片的语言特点。

### （一）北区太湖片

1. 太湖片的范围包括江苏南部、上海市及其辖区、浙江省杭嘉湖一带，是吴语区范围最大的一片。本片的特点如下：

（1）三等韵逢知章组多数读洪音。例如：上海[尝<sub>c</sub>zā]，溧阳[烧<sub>c</sub>səu]，嘉兴[手<sub>c</sub>se]。

（2）流摄不读[u]尾。如：松江[手<sub>c</sub>sɣ]，桐庐[狗<sub>c</sub>ke]，宁波[周<sub>c</sub>tciɣ]。

（3）效摄不读[u]尾。例如：常熟[包<sub>c</sub>pə]，平湖[烧<sub>c</sub>sə]，定海

<sup>①</sup> 北区吴江、宝山、嘉兴“他”说不带浊流的阴平“伊”[i<sup>1</sup>]，结合苏州[li<sup>1</sup>]，则可能北区跟闽语一样另有上古“伊”[\*ʔli]的遗留，这是另一要注意的问题。但是宝山在赵元任调查时还是[fi<sup>2</sup>]，那么，有些“夷”进一步清化为“伊”也是可能的。

[小<sup>6</sup>ciɔ]。

(4) 麻韵三等精章两组不同韵。如：“借≠蔗”，宝山[tɕia<sup>3</sup>≠tso<sup>3</sup>]，溧阳[tɕyɔ≠tso<sup>3</sup>]。

(5) 见系二等开口字有文白读，文读多数读[tɕ]组声母，白读多数读[k]组声母。如：常州[交<sub>c</sub>tɕieu/<sub>c</sub>kəu]，绍兴[嫁 tɕia<sup>3</sup>/ko<sup>3</sup>]，湖州[家<sub>c</sub>tɕia/<sub>c</sub>ka]。

(6) 口语“人银”同音。如：常州[<sub>c</sub>niŋ]，海门[<sub>c</sub>niŋ]，嘉善[<sub>c</sub>niəŋ]，余杭[<sub>c</sub>niɛŋ]。

(7) “鹿六绿”同音。如嘉兴都读[lo<sup>3</sup>]

(8) 没有鼻音形式的儿尾。但“囡儿、筷儿”两词在苏州等地分别读[nø<sup>2</sup>ŋ<sup>0</sup>]、[khue<sup>3</sup>ŋ<sup>0</sup>]，例外。

(9) 单数第三人称代词多作“夷”或“伊”。只有毗陵小片多作“他”，甬江小片多作“其”[<sub>c</sub>dzi]。

(10) “事情”多说“事体”，少数地点说“事情”。“今天”说“今朝”，只有宁波一带说“今日(音密)”。“女儿”多说“囡”或“囡儿”。又“筷子”多说“筷”或“筷儿”、“筷子”，不说“箸”。“灶”多说“灶头”，少数地点说“灶”。“鸡蛋”多说“鸡蛋”，少数地点说“鸡子”。“白糖”说“白糖”，不说“糖霜”。“房子”除宁波、绍兴一带说“屋”，多说“房子”。“抽屉”多说“抽斗”。“牛棚”多说“牛棚”，不说“牛栏”，这些都接近官话。“乘凉”多说“乘风凉”或“吹风凉”。“玩儿”多说“薄相”或音变为“勃相”。

(11) 多数地点没有“人客，豆腐生”这样结构的词，没有“大粒豆，小张纸；买本添，买本凑；你走先，你走起”这样的语法结构。

下面分说小片：

2. 毗陵小片——范围大致包括江苏南部吴语区东北边和西边的常州、溧阳、宜兴、海门等13个县市及安徽郎溪、广德部分村镇。本小片特点：

(1) 澄母多读[dz]。如：常州[茶<sub>c</sub>dzo]，溧阳[迟<sub>c</sub>dzl]，沙洲[缠<sub>c</sub>dzyø]。

(2) 臻摄合口三等知章组字多保持合口。如：宜兴[春<sub>c</sub>tçhyŋ]，金坛[出<sub>c</sub>tshueʔ<sub>3</sub>]。

(3) 唐阳江三韵非庄两组字带鼻尾。如：常州[方<sub>c</sub>faŋ]，溧阳[庄<sub>c</sub>tsaŋ]。

(4) 歌戈韵与模韵(明母除外)不混，“坡≠铺|多≠都|搓≠粗|河≠湖”。如：常州[多<sub>c</sub>tɣw≠都<sub>c</sub>tu]，溧阳[河<sub>c</sub>fiɣ≠湖<sub>c</sub>fiu]。

(5) 麻韵开口三等章组字与二等字不同韵。如：常州[蔗<sub>c</sub>tɕa°||沙<sub>c</sub>so|茶<sub>c</sub>dzo|家<sub>c</sub>ko]，宜兴[蔗<sub>c</sub>tɕA°||沙<sub>c</sub>so|家<sub>c</sub>tçio]。

(6) 侯韵、尤韵(知系)，除宜兴读[ɣw]外，多读[ei]。如：金坛[斗<sub>c</sub>tei]，江阴[手<sub>c</sub>sei]。

(7) “嘴”字不读[ɿ]韵母，多读[y]。如：常州[<sup>c</sup>tsy]，溧阳[<sup>c</sup>tçy]。

(8) “鱼”字白读多数地点不读[ŋ]或[ŋe]一类音。如：常州[<sub>c</sub>fiy]，金坛[<sub>c</sub>ŋy]。

(9) 灰韵不读单元音。如：常州[对<sub>c</sub>tæi°]，丹阳[雷<sub>c</sub>lue]，金坛[罪<sub>c</sub>dzui]。

(10) “铁锅”多说“锅”或“锅子”，不说“镬子”。“穿(衣服)”说“穿”，不说“着”。“家”多说“家”不说“屋里”。泛指“东西”说“东西”，不说“物事”。此等都接近官话。

(11) 人称代词第三人称单数说“他”不说“夷”或“伊”。“谁”口语说“哪个”或“底人”，不说“啥人”。

(12) 子尾除沙洲外，都读促音[tɕəʔ]。

(13) “红的、好的”除丹阳、沙洲、江阴外，都说“红佬、好佬”。

3. 苏沪嘉小片——这一小片处于吴语区的东北角，包括江苏省的无锡、苏州等，浙江省的嘉兴、平湖、海盐等，共30个县市。苏沪嘉小片的特点如下：



(1) 澄从两母多读[z]。如:嘉善[茶<sub>2</sub>zo],平湖[迟<sub>2</sub>z1],上海市[坐 zu<sub>2</sub>]

(2) 臻摄合口三等知章组字变开口。如:昆山[春<sub>2</sub>tshən],嘉兴[出 tshəʔ<sub>2</sub>]。

(3) 唐阳江韵多读鼻化韵。如:常熟[窗<sub>2</sub>tshā],嘉兴[双<sub>2</sub>sā],苏州[张<sub>2</sub>tsā]。

(4) 歌戈韵与模韵多混。如:苏州[多=都<sub>2</sub>təu],嘉兴[歌=姑<sub>2</sub>kəu]。

(5) 麻韵开口三等章组字与二等帮知庄组字同韵,与见系不同韵。如:吴江[蔗 tso<sup>o</sup>|沙<sub>2</sub>so|家<sub>2</sub>ka],海盐[蛇<sub>2</sub>zo|叉<sub>2</sub>tsho|架 ka<sup>o</sup>]。

(6) 侯韵、尤韵(知系),多数读单元音,少数读[ɣu]。如:上海市[楼<sub>2</sub>ly],嘉兴[狗<sup>o</sup>ke],苏州[手<sup>o</sup>sɣ],常熟[头<sub>2</sub>de|周<sub>2</sub>tsɣu],海门[口<sup>o</sup>khɣu|寿 zɣu<sup>o</sup>]。

(7) 仙韵合口精知章组字不读[y]介音。如:上海市[船<sub>2</sub>zɸ],苏州[全<sub>2</sub>zi]。

(8) “嘴”字多读[l]韵。如:海门[<sup>o</sup>tsl],嘉定[tsl<sup>o</sup>],桐乡[<sup>o</sup>tsl]。

(9) “鱼”字白读多读[ŋ]。有的地方如常熟读[<sub>2</sub>ŋe]。

(10) “梳”字白读多读[l]韵或[ɥ]韵。如苏州[<sub>2</sub>sl],嘉兴[<sub>2</sub>sɥ]。

(11) 哈韵与谈寒韵多混。如:上海市[才=残<sub>2</sub>zɛ],嘉善[胎=淮坍<sub>2</sub>thɛ]。灰韵端组多读开口。如:上海市[对 te<sup>o</sup>],无锡市[队 dɛ<sub>2</sub>]。

(12) “铁锅”多说“镬子”。“家”多说“屋里”。

(13) 单数第三人称代词说“夷”或“伊”。

(14) “红的、好的”的“的”说“个”,读[k-]或[g-]声母的入声。如:苏州[kɣʔ<sub>2</sub>],上海市[gəʔ<sub>2</sub>]。

4. 苕溪小片——本小片位于浙江省西北部,包括湖州市等5个县市。小片的特点如下:

(1) 鱼虞两韵知章组和日母今读[l]韵。如湖州[猪<sub>2</sub>tsl|书<sub>2</sub>sl|

蛛<sub>c</sub>tsl|树z<sub>l</sub>。|如<sub>c</sub>z<sub>l</sub>]。

(2) 除余杭外,无撮口韵母。如:湖州[雨<sub>c</sub>i|选<sub>c</sub>ciē|军<sub>c</sub>tciŋ],德清[举<sub>c</sub>tci|远<sup>c</sup>i|均<sub>c</sub>tciē],余杭[雨<sup>c</sup>i|举<sup>c</sup>tci|军均<sub>c</sub>tciē|选<sup>c</sup>ciē|远<sup>c</sup>yo]。

(3) 除湖州、余杭外,咸山两摄开口三四等舒声(知系除外)今读[i]或[ɪ]。如:长兴[边<sub>c</sub>pɪ|天<sub>c</sub>thɪ|钳<sub>c</sub>dzi],德清[变pi<sup>ɿ</sup>|线ci<sup>ɿ</sup>|剑tci<sup>ɿ</sup>]。

(4) 除余杭外,“尾”字白读作[m]或[n]。余杭读[<sup>c</sup>mi]。

(5) “洗脸”说“汰面”(湖州除外)。“稻草”说“稻梗”或“稻梗子”。

(6) 指示代词不分远指、近指,“这个、那个”都说“葛个”。

5. 杭州小片——这一小片只分布于杭州市城区及周围郊区(大致在笕桥—拱宸桥—古荡—北高峰—天竺山—五云山—钱塘江边这一范围内)。南宋建都于此,所以这一小片的方言带有较浓的官话色彩,不同于一般吴语。如“鸟”字文白不分都读[<sup>c</sup>niə]不读[<sup>c</sup>tiə]。本小片的特点如下:

(1) 见母开口二等只有[tɕ]声母一读,如[嫁tɕiA<sup>ɿ</sup>|交<sub>c</sub>tɕiə|江<sub>c</sub>tɕiAŋ]。

(2) 日母字“儿耳二”只有[əl]一读。[人<sub>c</sub>zən|软<sup>c</sup>qō|肉zoʔ<sub>2</sub>],都不读[n]声母。

(3) 微母字只读v-:[蚊<sub>c</sub>vən|问vən<sup>ɿ</sup>],不读[m]声母。

(4) 有很多带[ɥ]介音的韵。如:[舍碎税sɥei<sup>ɿ</sup>|社罪穗dzɥei<sup>ɿ</sup>|揣<sub>c</sub>tshɥei|帅sɥe<sup>ɿ</sup>|村春<sub>c</sub>tshɥən|桑双<sub>c</sub>sɥAŋ|窗<sub>c</sub>tshɥAŋ|染软<sup>c</sup>ɥə]。

(5) 山摄合口一二等,合口三等知章组,咸山两摄开口三等知庄章组,今全读[uō]韵。如:[搬<sub>c</sub>puō|团<sub>c</sub>duō|官关<sub>c</sub>kuō|冂<sub>c</sub>suō|专<sub>c</sub>tsuō|佔tsuō<sup>ɿ</sup>|展<sup>c</sup>tsuō|缠dzuō<sup>ɿ</sup>]。

(6) “夺”读[doʔ<sub>2</sub>],“落鹿绿”读[loʔ<sub>2</sub>],四字同韵。

(7) 其他地方说“锅子,面盆,事体”的词,本片分别说“锅,脸盆,事情”。

(8) 有大量的儿尾词。儿尾读[əl](赵元任记[ɪ],史瑞明记今读

[rʎ], 见《方言》1989年第3期第180页)。

(9) 人称代词是“我,你,他”,复数加“们”。

(10) 否定副词用“不”和“没有”。如:不晓得|没有来。

(11) “好的、我们的”用助词“的[tɿ]”。

6. 临绍小片——本小片包括浙江省临安、绍兴、桐庐、余姚等12个县市。本片特点有:

(1) 咸山两摄多读鼻化韵。如:富阳[贪<sub>2</sub>.thē|斑<sub>2</sub>.pā]。

(2) 哈灰两韵端系字今同韵。如:萧山[胎=推<sub>2</sub>.the],嵊县[猜=催<sub>2</sub>.tshē]。

(3) 哈韵跟谈寒韵今不混。如:临安[胎<sub>2</sub>.the≠坍滩<sub>2</sub>.the],余姚[来<sub>2</sub>.le≠篮拦<sub>2</sub>.lē]。

(4) “歪”字读[ɸ]声母,不读[h]声母。例如:分水属桐庐[<sub>2</sub>.ue],诸暨[<sub>2</sub>.ua]。

(5) 除临安县的昌化外,“家、嫁”等开口二等见母字白读为[ko]或[kuo]。

(6) 单数第三人称代词除昌化(今属临安)、诸暨、新昌、余姚外,都说[夷<sub>2</sub>.fi]。

7. 甬江小片——本小片处于浙江省东部,包括宁波市、奉化、定海等10个县市。本片特点:

(1) “效流咸深山臻宕(限于知组)曾”等摄舒声开口三等知章组字一般读细音韵母,与同韵的精见两组字同音。例如宁波[焦朝招娇<sub>2</sub>.tɕyo|酒肘帚九<sub>2</sub>.tɕiv|津珍真巾<sub>2</sub>.tɕiŋ]。

(2) 除宁海、定海、镇海外,其余各处“推贪”同音,“退探”同音。如:奉化[推=贪<sub>2</sub>.thæi]。

(3) 遇止两摄合口三等的精知章组字和日母字,止摄开口三等的知母字,许多地方今韵母读[ɥ]。如:宁波、镇海、奉化[絮书<sub>2</sub>.sɥ|猪主嘴<sub>2</sub>.tsɥ|如儒<sub>2</sub>.zɥ|趣<sub>2</sub>.tshɥ|蛛置<sub>2</sub>.tsɥ]。

(4) “小菜”叫“下饭”。“麻雀”叫“麻将”(海宁除外)。“今天”叫“吉日(音密)”。

(5) 单数第三人称代词为“其”[<sub>2</sub>dzi]。

## (二) 南区吴语

1. 台州片——本片包括浙江东部天台、临海、椒江、黄岩等9个县市。本片特点如下：

(1) [k kh g h]声母拼撮口呼韵母。如：天台、临海、仙居、黄岩[举<sup>6</sup>ky | 区<sup>6</sup>khy | 跪<sup>6</sup>gy]。临海、黄岩[穷<sub>2</sub>gyoŋ | 嗅<sup>6</sup>hyoŋ<sup>2</sup>]。仙居、黄岩[拳<sub>2</sub>gyø | 军<sup>6</sup>kyn]。

(2) 阴去字单说一律读高平调。如：“靠”字临海、黄岩、温岭读[kho<sup>-</sup>]。

(3) 用变音表示儿尾。如温岭[də<sup>2</sup>桃儿 ← də<sup>21</sup>桃 | z ə<sup>2</sup> 凿子 ← zo<sup>21</sup> 凿]。

(4) “姐夫、妹夫”都叫“姊丈”。“早晨”叫“枯心”，只仙居叫“五更”。

(5) 动词重叠后加“想”，表示短暂或尝试。

2. 东瓯片——本片在浙东南瓯江流域，包括永嘉、温州、瑞安、平阳等11个县市，特点如下：

(1) 宕江两摄，通摄钟韵(日、以母、非组除外)，舒声字鼻尾全部脱落。东钟两韵有别。如：乐清[帮<sub>2</sub>pa | 章<sub>2</sub>tɕia | 双<sub>2</sub>sua | 钟<sub>2</sub>tɕua ≠ 中终<sub>2</sub>tɕioŋ]，文成[浆<sub>2</sub>tɕie | 江<sub>2</sub>kuΛ | 重<sub>2</sub>dza ≠ 虫<sub>2</sub>dziŋ | 胸<sub>2</sub>ɕyΛ]。

(2) 曾摄开口三等帮组，梗摄开口三四等帮端组，舒声字今韵母读[er]或[iŋ]。如：乐清、温州、瑞安、平阳、文成[冰兵<sub>2</sub>peŋ | 丁<sub>2</sub>teŋ]，永嘉[冰兵<sub>2</sub>?biŋ | 丁<sub>2</sub>?diŋ]。

(3) 效摄一二等不同韵。如：乐清[宝<sup>6</sup>pə ≠ 饱<sup>6</sup>pa]，温州[报<sup>6</sup>pə<sup>2</sup> ≠ 豹<sup>6</sup>puə<sup>2</sup>]。

(4) 深臻两摄多数地方今读[ar]或[iar]等带后鼻音尾的韵。

如：永嘉、温州、瑞安[沉<sub>2</sub>dzaŋ|神<sub>2</sub>zaŋ|新<sub>2</sub>saŋ|认<sub>2</sub>ŋiaŋ<sub>2</sub>|斤<sub>2</sub>tɕiaŋ]。只有平阳读[an]或[ian]等带前鼻音尾的韵，如[沉<sub>2</sub>dzian|神<sub>2</sub>zan|新<sub>2</sub>san|认<sub>2</sub>ŋian<sup>?</sup>|斤<sub>2</sub>tɕian]。

(5) 流摄一等，流摄三等庄组见系，今韵母读[au]或[iau]。如：温州[偷<sub>2</sub>thau|狗<sup>o</sup>kau|愁<sub>2</sub>zau|球<sub>2</sub>dɕiau|纠<sub>2</sub>tɕiau|幼<sub>2</sub>iau]。

(6) 遇蟹止三摄合口三等喻母字今读[v]声母。如：温州[孟为维围<sub>2</sub>vu|雨<sup>ɛ</sup>vu|卫<sup>ɪ</sup>vu<sup>2</sup>]。

(7) 梗摄开口三四等的见系字与帮端知三系字不同韵。如乐清[轻<sub>2</sub>tɕhiaŋ≠清<sub>2</sub>tɕhiaŋ]。

(8) “人”字多数地方有[<sub>2</sub>zaŋ/<sub>2</sub>ŋiaŋ/<sub>2</sub>naŋ]三个读音(<sub>2</sub>naŋ即“依”的变音)。

(9) 入声没有塞音尾，读长调。例如：温州[入<sub>2</sub>zai<sup>212</sup>|竹<sub>2</sub>tɕieu<sup>323</sup>]。

(10) 指示代词近指是“个。”(或“居。”)，如温州[kai<sub>2</sub>]或[ki<sub>2</sub>]；远指是“许”，如温州[<sup>o</sup>hi]。

(11) “月亮”叫“月光”。“菜蔬”叫“配”。“打闪”叫“烁龙”。“房子”叫“屋宕”。“脸盆”叫“面盂”。“麻雀”叫“将儿(即爵儿)”或“吃谷将儿、黄头将儿”。“蚕豆”叫“淮豆”。“看”叫“覘(集韵七赐切)”。“认识”叫“识”。冬天在阳光下晒着取暖不说“孵日头”，说“晒太阳”“晒晒暖”。生吃的食品叫什么什么“生”，如“豆腐生|江蟹生|盘菜生|虾生”；腌食的叫什么叫“咸”，如“菜咸|鱼咸|江蟹咸|菜头咸”。

(12) 可能补语可以直接加在动词后。如“吃落(吃得下)|担动(挑得动)”。

3. 婺州片——婺州片处于浙江省中部，包括金华、永康、武义、东阳、浦江等8个县市。本片内部差异较大，有些县互相不能通话，要用带官腔的金华话来交际。本片的特点如下：

(1) 除浦江、兰溪、金华市城区外，其他地区咸深山臻宕江曾梗

通九摄的舒声帮端母字今分别读为[m、n]声母(皆读紧喉阴调)。如：孝顺(属金华市)[班<sub>c</sub>ma | 本<sub>c</sub>min | 帮<sup>o</sup>maŋ | 冰兵<sub>c</sub>miŋ || 担<sub>c</sub>na | 墩<sub>c</sub>niŋ | 当<sub>c</sub>naŋ | 灯<sub>c</sub>niŋ | 丁<sub>c</sub>nieŋ | 东<sub>c</sub>noŋ]。

(2) 除武义城关外,大体上能分尖团。如:金华[蕉<sub>c</sub>tsiau ≠ 娇<sub>c</sub>tciau],永康[箭<sub>c</sub>tcie<sup>o</sup> ≠ 见<sub>c</sub>cie<sup>o</sup>],兰溪[津<sub>c</sub>tsiŋ ≠ 斤<sub>c</sub>tcŋ],泉溪(属武义)[清<sub>c</sub>tchiŋ ≠ 轻<sub>c</sub>chiŋ]。

(3) 咸山两摄有一部分字能区别三四等。如金华[劫<sub>c</sub>tcie<sub>3</sub> ≠ 挟<sub>c</sub>tcie<sub>3</sub>文读 | 仙<sub>c</sub>sie ≠ 先<sub>c</sub>sie],浦江[粘<sub>c</sub>ŋiē ≠ 鮎<sub>c</sub>ŋiā | 连<sub>c</sub>liē ≠ 莲<sub>c</sub>liā]。

(4) 古入声字今有文白读。文读带喉塞尾[ʔ],读入声短调。白读没有塞音尾,读长调,或自成入声调类,或并入其他调类。

(5) “吃饭,喝茶,抽烟”叫“食饭,食茶,食烟”。“早晨”叫“五更”。

(6) 可以说“对勿渠住(对不起他)”这样结构的句子。

4. 处衢片——本片处于吴语区西南部。包括浙江省西南部 17 个县市,江西省的上饶市、上饶、玉山、广丰,福建省浦城县北部。本片因与闽语接壤,受闽语影响较多。特点如下:

(1) 知组白读同端[t]组(浦城、衢州、上饶市区除外)。如:丽水[猪<sub>c</sub>ti | 桩<sub>c</sub>tiŋ | 张<sub>c</sub>tiā | 长(长短)<sub>c</sub>dəŋ | 竹<sub>c</sub>tiwʔ<sub>3</sub>]。

(2) 章组字多读细音,与精组混。如“昌=枪 | 船=旋 | 唇=巡”。(与东瓯片相同)

(3) 桓魂两韵有相混现象。例如:广丰[酸=孙<sub>c</sub>suē],缙云[半<sub>c</sub>ʔbε<sup>o</sup>:本<sup>o</sup>ʔbε]。

(4) “津”字多读如合口。如:庆元、丽水[<sub>c</sub>tcyoŋ],浦城[<sub>c</sub>tsuĩi]。

(5) “龙”字多读细音。如:丽水[<sub>c</sub>liŋ],宣平[<sub>c</sub>lyōŋ],泰顺[<sub>c</sub>lyō],玉山[<sub>c</sub>liā]。

(6) “房子”或“家里”叫“处”。“人”叫“农”或“能”。“要”叫“乐”(集韵去声鱼教切)。

4A. 处州小片——处州小片位于处衢片东部，包括丽水、缙云、原宣平（今属武义）、景宁、青田等9个县市。本小片特点如下：

(1) “猪”字白读[<sub>c</sub>ti]或[<sub>c</sub>?di]。“梳”字读[<sub>c</sub>sɿ]。韵母读高元音。泰顺“梳”读[<sub>c</sub>soe]例外。

(2) 蟹摄四等和止摄三等字，开口精见组字今多读[ts]组声母和[ɿ]韵母。如：丽水、宣平、云和、青田[西=私<sub>c</sub>sɿ|鸡=基=资<sub>c</sub>tsɿ]。

(3) “打”字读[n]声母。如：丽水[<sup>o</sup>?nã]，青田[<sup>o</sup>ne]，泰顺[<sup>o</sup>nai]，宣平[<sup>o</sup>nɛ]。

(4) 蟹摄二等字，韵母的元音较靠后。如：云和[排<sub>c</sub>bɔ]，缙云[街<sub>c</sub>ka]，丽水[债<sub>c</sub>tson<sup>o</sup>]。

4B. 龙衢小片——本小片位于处衢片的西边，包括浙江省的龙泉、庆元、松阳、衢州、江山等9个县市及江西省的上饶市、上饶、玉山、广丰，福建省的浦城（县城及以北）。本小片的特点如下：

(1) “猪梳”两字韵母的元音较低较后。如：龙泉[<sup>o</sup>to|səu]，龙游[<sub>c</sub>tua|<sub>c</sub>sua]。

(2) 蟹摄开口四等字读[ie/iɛ/iɛ]或[i]，与止摄精见组不混。如庆元[西<sub>c</sub>gie≠私<sub>c</sub>sɿ|鸡<sub>c</sub>?jie≠基<sub>c</sub>tɕi≠资<sub>c</sub>tsɿ]。

(3) “打”字多读[t]声母不n化。如：龙泉[<sup>o</sup>taŋ]，衢州[<sup>o</sup>tã]，开化[<sup>o</sup>tæ]，玉山[<sup>o</sup>tai]。

(4) 蟹摄二等字，韵母的元音较靠前。如：常山[排<sub>c</sub>bɛ]，玉山[介<sub>c</sub>kai<sup>o</sup>]，浦城[矮<sup>o</sup>a]。

(5) “吃”多数点说“啞”（广韵徒结切，啞也，音不合；又见于丁结切，音合，未注啞义），如：遂昌[tiɛ<sup>o</sup>]，浦城[liɛ<sup>o</sup>]；少数点说“齧”（广韵胡结切），如：龙游[fiɛ<sup>o</sup>₂]，开化的塘口[fiã<sup>o</sup>₂]。而处州小片说“吃”，不说“啞、齧”。

### (三) 西区吴语宣州片

1. 皖南的宣州片及非宣州片吴语——皖南地区吴语可以分为两类。郎溪(北部定埠、梅渚、岗南、凌笪等乡,西北部建平、东夏、下湖、幸福等乡)、广德(北部下寺乡,南部芦村乡、东亭乡等地的一些村庄),这两个县各乡的吴语,属于太湖片毗陵小片。主要特点是:(1)至少有六个调,有的有七个调。阴阳入有别并多带喉塞音;两县北部的方言全浊上归阳去,阴阳去有别,南部芦村乡的甘溪话上声分阴阳两类,去声不分。(2)基本保持全浊声母系统,只有郎溪的定埠话已起变化。定埠只平声读浊母带  $\text{fi}$  流,仄声已经清化,如“陪<sub>2</sub>bei:倍pei<sup>2</sup>|桃<sub>2</sub>da:道ta<sup>2</sup>|迟<sub>2</sub>dzl:直tsəʔ<sub>2</sub>”,而且连平声的浊塞音、塞擦音也可自由读成 $[\text{pfi tfi tsfi tɕfi}]$ ,以至 $[\text{ph th tsh tɕh}]$ 。(3)古澄群母今都读浊塞擦音,如定埠话“迟<sub>2</sub>dzl|旗<sub>2</sub>dzj”。

皖南地区的主要吴语则属宣州片。宣州话具吴语的基本特征,它的大部分方言古全浊声母今读自成一类,与古全清、次清声母的今读对立,保持“帮滂并、端透定”三分(全浊声母后接元音读为气嗓音也同其他吴语)。但宣州话中这些全浊声母的读音变化很大;浊塞音的闭塞成分都很轻微,很多已向通音转化,并带上清送气;浊塞擦音大都已转化为擦音。这种塞音成分通音化以及气音化的现象,是宣州话区别于其他吴语的重要特点。虚词方面是:否定词已用“不” $[\text{pəʔ}]$ ,问曾否前加“可” $[\text{kheʔ}]$ ,表“了、着”多用“个” $[\text{kə}^0]$ (如繁昌说:“坐个吃,吃个饭再去,他可去个了?”),表‘再’后加“添” $[\text{.thi}]$ 等,也是宣州话特色。

宣州片分布于长江以南、黄山以北的古宣州或宣城郡地区,可分为铜泾小片、太高小片、石陵小片。下面分别说明各小片的特点。

2. 铜泾小片——本小片包括铜陵、泾县、繁昌、芜湖县、石埭(东部)等12个县。铜泾小片的特点是:古全浊声母读 $[\text{vrzr}]$ 等一类通音,多数地点带清喉擦成分,即并奉母今读 $[\text{hv-}]$ 或者 $[\text{hβ- hw-}]$ ,定



母今读[h-]或者[h-],澄从邪崇船禅等母依今音洪细读[hz- hz-]或者[hz- hj-],群匣母依今音洪细读[h- hfi-]或者[hz- hj-]。例如:

	盘(并)	冯(奉)	大(定)	坐(从)	直(澄)
铜陵	<sub>2</sub> võ	<sub>2</sub> vom	ɿ <sup>3</sup>	zo <sup>3</sup>	zi <sub>2</sub>
泾县	<sub>2</sub> hve	<sub>2</sub> hoŋ	hiə <sup>3</sup>	<sup>3</sup> hze	hzei <sub>2</sub>
繁昌	<sub>2</sub> hβõ	<sub>2</sub> hβΛŋ	hla <sup>3</sup>	hzo <sup>3</sup>	hzəʔ <sub>2</sub>
	除(澄)	船(船)	裙(群)	跪(群)	
铜陵	<sub>2</sub> zy	<sub>2</sub> zõ	<sub>2</sub> zin	ʒue <sup>3</sup>	
泾县	<sub>2</sub> hzu	<sub>2</sub> hze	<sub>2</sub> hjieŋ	<sup>3</sup> hvei	
繁昌	<sub>2</sub> hzu	<sub>2</sub> hZõ	<sub>2</sub> hzyən	huei <sup>3</sup>	

这里几点必须特别说明:

(1) 以上的浊通音声母中,多数地方清喉擦成分[h]发得很强烈,有的地方甚至只留下喉擦音[h],“爬茶蛇驮河”都读[h-]声母。例如:泾县茂林“爬茶蛇”[<sub>2</sub>hɔ],“驮河”[<sub>2</sub>hɔ]。

(2) 群匣母合口有的点读[hv-],跟并奉母相混。如:泾县“葵=肥<sub>2</sub>hvei|混=拌<sup>3</sup>hvəŋ”。

(3) 当涂东部塘南、大垅一带及贵池墩上、里山、余河一带并定母还读[bh dh],闭塞轻微,爆发时带有清送气,后面韵母带fi浊流读气噪音,如墩上“爬”[bha<sup>11</sup>],实际读音是[bh-fia<sup>11</sup>]。

(4) 浊音来源的[h-]跟清音来源的[x-],在宣州话的多数是对立的,“贺 ho<sup>3</sup>≠货 xo<sup>3</sup>”。

(5) 儿尾用[ɲi](或[n],泾县),如铜陵、宣城“小伢儿”。子尾词较多,如“巷子、芥子(萆芥)、筷子”。

(6) 人称代词一般说:我 ŋo<sup>3</sup>|你 ŋi<sup>3</sup>|渠 hzi<sup>2</sup>。

3. 太高小片——本小片包括太平(东部、南部)、高淳(城关及西部)、溧水(南部)、昌化(只限于昌北区)等6个县(高淳、溧水今属江苏,唐代属宣州)。太高小片的特点是:

(1) 古浊塞音声母基本保持或部分保持读浊塞音,但小片南部和北部有所不同。北部高淳、溧水、当涂等地已出现 b d 向 bh dh 或 hβ hr 转化的趋势。例如高淳城关淳溪镇 d 在快读时变成滚音 r;当涂博望 d 变成 hr,而 b 与 hβ 可以任意互读:“盘”[<sub>c</sub>bə~<sub>c</sub>hβə]。南部太平、昌化等地舒声基本上读浊塞音,而入声变清送气音。例如昌化昌北“道 dɔ<sup>2</sup>|倍 be<sup>2</sup>||夺 thə<sub>2</sub>|别 phiε<sub>2</sub>”。但不论南北只有个别点有浊塞擦音,如“桥”有些地方还读[<sub>c</sub>dziɔ]。

(2) 小称除“子”外有“儿”(太平 n<sup>0</sup>,高淳 nə<sup>0</sup>)如“小伢儿”、“一点儿”,太平有“仔”[te<sup>0</sup>],如“儿仔”[n<sup>2</sup>te<sup>0</sup>]。

(3) 代词北部南部不同,有的音变得很不一样,如:

	我	你	他
高淳淳溪	ŋo <sup>1</sup> /o <sup>1</sup>	ni <sup>1</sup> 你	tha <sup>1</sup> 他
当涂湖阳	ŋu <sup>1</sup>	ni <sup>1</sup> 你	tha <sup>1</sup> 他
当涂博望	nie <sup>7</sup> /ŋə <sup>7</sup>	nie <sup>8</sup> 你	hra <sup>8</sup> 他
太平仙源	a <sup>1</sup>	ŋ <sup>1</sup> 尔	e <sup>2</sup> 渠
宁国南极	fiə <sup>2/4</sup>	n <sup>2/4</sup> 尔	i <sup>2/4</sup> 渠

4. 石陵小片——本小片包括石埭(中部)、青阳(陵阳等乡)、太平(三丰地区)等5个县。本小片在宣州片中比较特别,特点是:

(1) 古全浊声母今都读清音,不再读浊音。变清音的情况也有不同:东部陵阳、三丰等地是浊塞音全变送气清音,类似赣语,如永丰:“盘<sub>c</sub>phe|病 phiŋ<sup>2</sup>|团<sub>c</sub>the|大 tho<sub>2</sub>”;西部石埭掘珠、贵池灌口等地是全部变不送气清音,类似长沙,如灌口:“盘<sub>c</sub>pən|病 pin<sup>2</sup>|团<sub>c</sub>tən|大 ta<sup>2</sup>”。但东部、西部古澄群母舒声字今多读清擦音,与定母读塞音有别,还是宣州话的特点,如东部太平永丰“地 thi<sup>2</sup>|茶<sub>c</sub>so”,西部贵池灌口“亭<sub>c</sub>tin|骑<sub>c</sub>ci”。这个特点有的地方正逐步消失,这是周围江淮官话或赣语影响的结果。如青阳陵阳的澄群母字多已读为送气的清塞擦音:“近 tchin<sup>2</sup>|除<sub>c</sub>tchy|茶<sub>c</sub>tsho”,但从崇母的“坐 so<sup>2</sup>|柴<sub>c</sub>sε|床<sub>c</sub>sō”仍

读擦音不变。

(2) 有“站到吃”、“吃碗添,坐下子添”等说法。

(3) 除泾县外,“儿”已少用,小称以“子、仔”为主,石埭主要说“子”:“台子、土狗子、蟋蟋子、蛾子、手拇子、簪子、手捏子(手帕)”。

(4) 指词如:

	这	那	哪
石埭掘珠	n <sup>5</sup>	me <sup>5</sup>	la <sup>5</sup>
青阳沙济	ŋ <sup>3</sup>	ki <sup>3</sup>	lo <sup>5</sup>
泾县后岸	ei <sup>3</sup>	kei <sup>16</sup>	lo <sup>5</sup>

(5) 本片代词我常说成“俺”,你说“尔”,他说“渠”而渠的声母擦化或变零,如下表:

	我	你	他
石埭掘珠	æ <sup>3</sup> 俺	n <sup>3</sup> 尔	ei <sup>2</sup> (渠白读)
青阳沙济	ɛ <sup>4</sup> 俺	n <sup>4</sup> 尔	xəʔ <sup>7/8</sup> 黑
泾县后岸	ŋæ <sup>4/6</sup> 雁	ŋieŋ <sup>4/8</sup> 认	xei <sup>4/6</sup> 亥

其中石埭可后加 ne,沙济可加“侬”noŋ<sup>0</sup>,后岸“认”是“尔人”合音。

#### 第四节 吴语与相邻方言的关系

吴语北部(含西北部宣州地区)靠近江淮官话区,吴语南部靠闽语区。因此北部吴语含有较多的官话成分,南部吴语与闽语有共同之处。外地人到吴语区,常感北部吴语比较好懂,越向南越不好懂。吴语区的人对南北的不同也明显感觉得到:从江苏南部到浙江北部、浙东沿海一带,内部大致可以通话,但到浙江南部和西部山区,通话就困难了。

## 一、北部、西部吴语与官话、赣语

1. 官话对北部吴语的影响很深,如:

(1) 见系声母开口二等字官话大都读[tɕ]部位。北部吴语文读跟官话一样,白读读[k]部位。例如“家”苏州[<sub>c</sub>tɕia/<sub>c</sub>ka],绍兴[<sub>c</sub>tɕia/<sub>c</sub>ko]。这类文白对立的现象最南到金华为止。再往南就只有[k]部位的读法了。

(2) 官话疑母字细音多数读零声母,吴语一般读[ŋ]声母。但北部吴语中有好些字的读音近于零声母,例如苏州“义 fi<sup>2</sup>、乐(音乐) fi<sup>2</sup>o<sup>2</sup>”、文读“鱼<sub>c</sub> fiy、月 fiyə<sup>2</sup>”。

(3) 官话的影响在毗陵小片,杭州小片最大。如第三身代词用“他”,表领格的助词用“的”,否定词“不”说[p-]不说[f-],“鱼”说[y],这些都跟官话相同,而跟其他吴语不同。这两小片词汇中说“东西、锅、家、穿(~衣)”跟官话相同,而吴语多说“物事、镗、屋里,著(~衣)”(温州音分别是[<sub>c</sub>?m<sup>2</sup>o<sup>2</sup>y z<sup>1</sup> | fi<sup>2</sup>o<sup>2</sup> | ?v<sup>2</sup>le | tɕa<sup>2</sup>])。

(4) 宣州话有些特点跟当地江淮话相似,如影母洪音读[ŋ-]:高淳话“哑”[ŋa<sup>3</sup>];泥来母不分,宣城金牌话“脓=龙”[noŋ<sup>2</sup>];“虹”读如“杠”,铜陵[kā<sup>5</sup>];“刚(~才)”读如“姜”,石埭[tɕiaŋ<sup>1</sup>];否定词用“不”[p-]不用“弗”[f-]。

(5) 反过来有些吴语底层还留在当地的江淮官话中,例如青阳县城城西村老人的江淮话:“我吃了饭再去”说“我吃仔饭再去”[<sub>c</sub>ŋo tɕhia<sup>2</sup> ts<sup>1</sup> fe<sup>2</sup> tse<sup>2</sup> tɕhi<sup>2</sup>],仍很像北吴语。

2. 宣州吴语西部与赣语接界,石埭、贵池东部尚是宣州吴语,西部就说赣语了。赣语的特点是:古全浊声母今读送气清音;古鼻尾及-i、-u尾保持较完整,古əu、ən、əŋ常前化读为eu、en,搬≠班[pon≠pan]、官≠关[kuon≠kuan]、“大”口语读“徒盖切”[thai<sup>6</sup>],影母洪音

读[ŋ-];泥母来母在洪音韵母前不分。小称有“子、仔、哩”尾;稻说“禾”;吃饭喝水一般都说“喫”[tɕhiaʔ];助词“的”说“个”[ko<sup>0</sup>];坐着说“坐到”;不要说“莫”,没有说“冒”或[miəu] (“没有”合音)。

下面说一些相互影响的语言现象。

(1) 宣州吴语及江淮话影母洪音读[ŋ-],泥来母洪音不分,“虹”读如“杠”,这些现象也和赣语相同,也许都是受了赣语的影响。

(2) 宣州吴语除“儿”尾、“子”尾(如泾县“灶马儿”[tsɔ<sup>5</sup>mo<sup>3</sup>n<sup>0</sup>]、“快点儿”[khwa<sup>5</sup>tie<sup>3</sup>n<sup>0</sup>]、“盘子”[hve<sup>2</sup>tsl<sup>0</sup>]、太平“碟儿”[ko<sup>3</sup>n<sup>0</sup>]、徽子[sã<sup>3</sup>tsl<sup>0</sup>]外,还有一个“仔”尾,铜陵、太平作te,泾县作te/tei。如泾县“饼仔”[pieŋ<sup>3</sup>te<sup>0</sup>]、“扣子仔”[khei<sup>5</sup>tsl<sup>3</sup>te<sup>0</sup>];太平“鸟仔”(鸟儿)[tio<sup>3</sup>te<sup>0</sup>]、“灶马儿仔”[tse<sup>5</sup>mo<sup>1</sup>n<sup>0</sup>te]。这个“仔”在赣语里也说,如“手捏仔”(手绢儿),音[te<sup>0</sup>]或[li<sup>0</sup>]。看来皖南吴语的“仔”可能是赣语影响,因为江浙吴语没有,铜陵也只有“儿”[ŋi]、“子”[tsl]而没有“仔”(仔都作“子”,如“小指拇子|弄子(巷)|围嘴子|蚂蚁子”)。

(3) 宣州“掬”(甩)和箱环,门环的“环”说 khuæ<sup>5</sup>(浙南如温州说[ga<sup>6</sup>←gwa<sup>6</sup>],是匣母去声字)。g母字变清送气,也应属赣语的影响之类。宿松、望江、东至、彭泽等处赣语匣母的“虾(~蟆)、葫(~芦)、鏊(门~、箱~)”白读正都作[kh-]母。

(4) 宿松“你”说“尔侬”[n<sup>3</sup>noŋ<sup>0</sup>],比相邻几处[n<sup>3</sup>]多一“侬”字,“我”“渠”后可加[n],则是“侬”的缩减形式,不但表示出吴侬的色彩,而且还解释了现在北吴语你单说“侬”,实由“尔侬”合音而来,原先应是“我侬、尔侬、渠侬”并立的。今宣州话石陵小片的青阳沙济仍如此。注意江西彭泽、湖口和都昌都说“我侬 ŋo<sup>3</sup>noŋ<sup>2</sup>、尔侬 n<sup>3</sup>noŋ<sup>2</sup>、渠侬 tɕhi<sup>2</sup>noŋ<sup>2</sup>(湖口说 gɛ<sup>2</sup>noŋ<sup>2</sup>或“夷侬”i<sup>2</sup>noŋ<sup>0</sup>)”。此等点正在赣语浊音走廊之端,应属吴语底层。

(5) 石陵小片可说“站到吃”,明显接近赣语。

## 二、南部吴语与闽语、徽语

### 1. 南部吴语中有不少与闽语相同的特点：

(1) 闽语把“人”说作“侬”(即“农”)。整个吴语区这个词的说法正好分两大派,北部多说“人”[<sub>2</sub>nin/<sub>2</sub>niŋ],音同“银”,南部多说[<sub>2</sub>noŋ/<sub>2</sub>nəŋ/<sub>2</sub>naŋ]音同“侬”或“能”,跟闽语相似。

(2) 闽语知组字白读同端组。处衢片“猪竹桌着(~衣、~棋)”等也都读成[t]母,“虫肠长沉”等常读成[d]母。这种现象向北一直分布到开化和武义。例如开化“猪.ta|、竹tio?<sub>2</sub>、丈<sup>2</sup>deŋ|、虫<sub>2</sub>doŋ”,武义知母白读今同端母那样读[l]母:“猪.li|竹lo?<sub>2</sub>”。

(3) 闽语[k kh]等声母逢细音不腭化。处衢片的江山、玉山、广丰、缙云、浦城,婺州片的永康,台州片的天台、三门也如此。

(4) 闽语远指多说“许”。东瓯片同,如温州[<sup>2</sup>hi]、乐清[<sup>2</sup>ci],龙衢片变促音,如广丰[hɣ?<sub>2</sub>]。

(5) 龙衢小片跟闽语相同点更多,例如“手笑树”广丰读塞擦音[<sup>2</sup>tɕhye|tɕhiəu<sup>2</sup>|dʒiu<sup>2</sup>];庆元“火远园蝇痒”白读作h声母:[<sup>2</sup>huei|<sup>2</sup>huəŋ|<sub>2</sub>huəŋ|<sub>2</sub>ciŋ|<sup>2</sup>ciō],这些发音特点都同闽语。用词上庆元脚说“骰”[<sub>2</sub>khoo]、“晒”说“曝”[pu?<sub>2</sub>]、“家(屋里)”说“处[tɕhye<sup>2</sup>]”,“袖子”说“手腕”[<sup>2</sup>tɕhye-<sup>2</sup>iəŋ],眼睛说“目珠”[muə?<sub>2</sub> <sup>2</sup>tɕye],“肚饿”说“腹饥”[<sup>2</sup>bu<sub>2</sub> kei]。这些说法都跟闽语相同。

(6) 处衢片方言中还有一部分调类的全浊声母变读清音现象,庆元浦城更是全部变清。这也是吴闽边界地区方言过渡现象之一种。

2. 吴语在安徽南部、浙江西北部与徽语接界,浙江的建德、淳安二县(如依旧县计,建德、寿昌、淳安、遂安,共是四县)即已说徽语。徽语的特点是古全浊声母今多读送气清音近似赣语(但休黟片或送气或不送气,近似闽语)。韵母变化大,古鼻尾及-i、-u尾大量脱落,今之

-i、-u 尾,常非古韵尾,如黟县“群琼”[tɕhyāi²]、“林邻”[lai²],而“来雷”读[luau²];休宁“况项”[xau³]“章姜”[tɕiau²],而“高”[kɣ¹]、“交”[ko¹]、“招骄”[tɕio¹]。祁门“龙灯”[li æ²ta¹]与“林带”[li æ²ta⁵]音近;此与赣语大异,而接近浙南吴语,如温州“龙灯”[liɛ²taŋ¹]。多数点入声读舒声;浊上不变去,好些点上声收喉塞,近似东瓯吴语。有儿化变音,以-n、鼻化韵、小称变调表示,这更近于南区吴语。日母有j-、n-、l-等读法,读鼻音者近似吴语。

且看徽语中与吴语相类似的情况,再看吴语中的徽语影响:

(1) 章组与精组见组细音部分字相混,如绩溪“招焦骄”都读[tɕie¹],黟县“扇线宪”都读[si:a⁵],近似浙南。

(2) 蟹摄二等(及一等舌齿字)读 a 或 ɒ,近似浙南。

(3) 咸山一二等开口读 ɔ/ɒ,近似东瓯片南部各县。

(4) 休黟片徽语有长元音[i:- u:- y:-]加尾音ə、ɛ,这现象跟浙南永康相似,永康这三种长元音后也加 ə、á。

(5) 儿化变音近似婺州、台州片吴语,如屯溪“燕儿”[ja:n↗]“舌儿”[tɕia:n↗]。

(6) 东西说“物事”,母称“姆、妈”,穿衣叫“著衣裳”,吃早饭说“吃天光”,很大说“老蛮大[tho⁶]”,“柚子叫“香包”,皆近吴语。手帕叫“手捏”,同宣州。人称代词复数加“人”则不同。

(7) 建德寿昌否定词说[f-][v-]是受吴语影响。其他徽语说[pu,]或[pəʔ,][pe,]等。

(8) 昌化的昌北区属宣州吴语太高片,全浊入声字不读浊音而读清送气,这种情形近似绩歙片徽语,婺源江湾话全浊字入声也一律送气,而舒声仅少量字送气,绩溪浊入字也以送气为主。所以昌北吴语浊入送气当是徽语影响所致。

请注意吴语与江淮话、闽语、徽语原初都是由江东方言分化的,它们分别受到官话与赣客语的影响分化为不同方言。

## 第二章 文 学

---

### 第一节 吴声歌曲

---

两晋南北朝时期，“吴声歌曲”兴起于今之苏南浙北。《晋书·乐志》：“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已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继而被之管弦。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这说明吴声杂曲原本是江南民间流传的、徒口吟唱的地方谣曲，采集后经过加工润色，再配上管弦，成为高雅的乐舞曲。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中收《吴声歌曲》的曲调名称共 38 个，每个曲调都有几首或数十首具体歌词，全部《吴声歌曲》共有 424 首，其中属于无名氏的共有 342 首。因此，“吴声歌曲”除了明显是文人仿作的作品之外，还保留着民间歌谣的本色，正如《大子夜歌》所说：“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丝竹发歌响，假器扬清音。不知歌谣妙，声势出口心。”

“吴声歌曲”在内容上比较单调，多数是恋歌，是非常清丽动人、“婉娈轻扬”的民间情歌，对男女恋爱时的各种情态、心情、意境、景色都有极为出色的描绘。例如《子夜歌》，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认为“它们的想象，有的地方较之近代的《挂枝儿》、《山歌》以及《马头



调》，更为宛曲而奔放，其措辞造语，较之《诗经》里的情歌，尤为温柔敦厚；只有深情绮丽，而没有一点粗犷之气；只有绮思柔语，而绝无一句下流卑污的话。……故它们和后来的许多民歌不同，它们是绮靡而不淫荡的”。这也说明这些乐府民歌在很大程度上经过文人们的润色和加工，而变得温柔文雅了。

“吴声歌曲”在艺术上的特色也是异常丰富的。其中两个方面应予以关注，一是被誉为“吴格”的谐音双关语。《诗家直说》云：“古辞黄檗向春生，苦心随日长。又曰：石阙生口中，衔碑（谐悲）不得语。又曰：杀荷不断藕，莲（谐怜）心已复生。此皆吴格，指物借意。”《沧浪诗话》也说：“上句述一语，下句释其义。”洪迈《容斋三笔·乐府诗引喻》也解释说：“前句比兴引喻，而后句实言以证之。”这种“谐音双关”的手法在“吴声歌曲”中是极普遍的，并仍是现代吴歌的主要特点之一。二是它的“三句式”段式，特别引人注目<sup>①</sup>。“吴声歌曲”大都是方正谨严的五言四句式，而在《华山畿》等具体歌词中，却存在着三句式词格，在所有的“吴声歌曲”中，三句式达 41 首，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可以断定，三句式是当时吴歌中的一种独特的词格。这种词格，至今仍可以在吴越地区民歌中看到。

唐以后民间吴歌是在发展中逐步变化的。例如“吴声歌曲”的基本形式是五言四句，到唐朝七言诗句已成为主要的句式，恰如顾颉刚所说：“吴歌的体裁是变了。”据北宋人释文莹《湘山野录》记载，唐末钱镠为吴越王时衣锦还乡，大宴乡亲。席间，他“自唱还乡歌以娱宾”，可是父老虽闻歌进酒，但反响并不热烈。钱镠“觉其欢意不甚浹洽，再酌酒高揭吴喉唱山歌以见意。词曰：‘你辈见侬底欢喜？别是一般滋味子，永在我侬心子里！’歌阙，合声赓赞，叫笑振席，欢感闾里”。这个故事说明当时的吴歌已形成七言句式，语言是颇为俚俗的吴方言，显

<sup>①</sup> 马骧：《吴越民歌色彩溯源》，《中国民间文化》1994 年第 1 集。

示了吴侬软语的风貌；还点明了吴歌在民间称之为“山歌”，这都是现代吴歌所具有的特征。

从内容、风格角度来考察，唐宋以后的吴歌也有所变化，以清丽的恋歌表述民间之苦。苏东坡在任杭州通判时，能欣赏、仿制当地的民歌，并在序中说：“吴人用其语为歌，含思宛转，听之凄然。”南宋的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曾记录了两句著名的吴歌：“月子弯弯照几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并认为：“此二句乃吴中舟师之歌。每于更阑月夜，操舟荡桨，抑遏其词而歌之，声甚凄怨。”这首吴歌的全文又见于明昆山人叶盛的《水东日记》，他记录的后两句为：“几家夫妇同罗幃，多少飘零在外头？”且解释说：“吴人耕作或舟行之劳，多作讴歌以自遣，名‘唱山歌’。”可惜，囿于“词多鄙野”、“不协宫商，亦罕节奏”等偏见，搜集、记述的山歌民谣寥寥无几。

到了明代，情形为之一变。明朝确实是民歌、俗曲的繁盛时期。卓珂月在《古今词统序》中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而明冯梦龙对吴越民歌搜集整理的成就尤为卓著。“在天启崇祯年间，吴县冯梦龙特留意于民曲，尝辑《挂枝儿》及《山歌》，为《童痴一弄》、《童痴二弄》，其中，绝妙好辞，几俯拾皆是。”<sup>①</sup>冯梦龙所辑《童痴一弄·挂枝儿》和《童痴二弄·山歌》两部集子所收的民歌，约八百来首，其中掺有少量文人的拟作及润饰的痕迹，但总的说来，基本上保存了“原汁原味”。这与冯梦龙的指导思想有关，冯梦龙认为，民歌是“田间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的“天地间自然之文”，是“民间性情之响”，其“情真不可废”。他理直气壮地说“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宣布他的记录、编选原则是“存真”，目的是“借男女真情，发名教之伪药”。他赞赏民歌“最浅，最俚，亦最真”。从冯梦龙的这一系列赞美民歌的评语中，不难发现，他把

<sup>①</sup>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下册），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第275页。

“情真”看作民歌艺术的生命之所在,因此,在这两部民歌中,大量是表现男女之间私情的作品,乃至咏妓、窃婢之类,也占了相当的比重。即使在语言上也如实地记录了吴方言语音。例如《山歌·月上》:

约郎约到月上时,邨了月上子山头弗见渠。嗳弗知奴处山低  
月上得早,嗳弗知郎处山高月上得迟?

这是一首表现少女对爱情主动追求的歌,美好的想象、细致的心理刻画,具有浓郁的吴地山歌的韵味。

从这两部吴歌辑集中,也可知吴歌的另一特点,即吴歌多衬字。如《山歌·哭》:

姐儿哭得悠悠咽咽一夜忧,邨了你恩爱夫妻弗到达。当初只指  
望山上造楼楼上造塔上参梯升天同到老,如今个山进楼塌塔倒梯  
横便罢休。

这种衬字衬词的句式通常在一首歌的第三句,有的仅几字,有的长达几十字,甚至更长。这不仅仅是增加文字的长度,而且是增添了语言表现的丰富性和深厚度,从而凝结成语言的感人力量。

明代以后,吴歌的搜集又趋消沉。在清代,吴歌常被作为淫词小调而遭严禁。清末民初胡云翘编《沪谚外编》收录了大量歌谣,内容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

吴歌搜集和研究的又一高潮是伴随着1918年北京大学搜集民歌开始的。当时的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出版了刊物《歌谣》周刊。1926年出版《吴歌甲集》收集吴歌100首,1928年出版的《吴歌乙集》编集了吴歌112首;1929年出版了李白英编的《江南民间情歌集》;1933年出版了黄洁心编的《湖州歌谣》,同年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也出版《江苏歌谣集》五册<sup>①</sup>。吴歌还引起了学术界有识之士的关注。

<sup>①</sup> 姜彬:《吴歌研究提纲》,《民间文艺集刊》(第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65页。

如1936年顾颉刚发表了研究论文《吴歌小史》，而有关的研究文章也很多。吴歌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注意。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以后，吴歌的收集与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其特点一是视野扩大，采集的内容宽泛；二是不断地发现和搜集到长篇叙事诗，也有抒情长诗；三是文学和音乐的综合采集；四是许多诗集和研究论文、专著的出版。这恰如李贺《江南弄》所说：“吴猷越吟未终曲”，这口头相传的文学资料，是研究吴越文化的宝贵财富。“吴声是何等的柔曼，而歌词又何等的温厚，若忽略它们，真是空入宝山”。<sup>①</sup>

---

## 第二节 白话小说

---

通俗白话小说，源于古代民间艺人的讲说故事——“说话”。“说话”是唐宋人的习语，是民间艺人讲说故事的特殊称谓。虽然“说话”伎艺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但它的兴盛却始于宋代。究其原因，大抵是两宋都市的繁荣、工商业的兴盛而造成城市人口的激增，由此而出现市民阶层，为适应他们的文化娱乐的需求，通俗的、内容丰富生动的说话伎艺便日益发达。《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条载南宋临安市上知名的说话人有孙奇、朱修等百余人之多，可见其盛况。

话本小说是“说话”艺术的文学底本，其作者，主要是瓦舍勾栏中的艺人，后来一些文人参与其中而组成“书会”，并负责整理和撰作说话底本，使话本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到明代，话本小说已蔚为大观。不仅有改写、润色和汇集刊者，而且还有模拟话本形式撰写新作品（称之为“拟话本”）。明末“三言”、“二拍”的出现，形成了中国通

---

<sup>①</sup> 俞平伯：《〈吴歌甲集〉序》。

俗白话小说创作整理的高潮。

冯梦龙(1574—1646年),字犹龙,别署龙子犹、顾曲散人、墨憨斋主人等,江苏吴县人。他在明末天启年间(1621—1627年)“因贾人之请”,先后纂辑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共收录八十三篇小说),既有宋元旧作,又有明代新作和冯氏的拟作,虽不是宋、元、明三代话本小说的全集,但几乎把当时广为流传的脍炙人口的作品网罗无遗了。正如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说:“独龙子犹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如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比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这也说明了冯氏在去芜取菁的筛选中独具慧眼。

“三言”的编纂和题名表现了冯梦龙的“小说观”——强调小说的社会教育作用。他在署名“绿天馆主人”的《喻世明言》序中说,好的小说能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捷且深”。在《醒世恒言》序中,除强调小说的教化作用外,甚至还把小说的意义提到可以为国者借鉴,即“为六经国史之辅”,“以醒天下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显然,冯氏是想通过小说来劝谕世人,警诫世人,唤醒世人的。其用心可谓良苦。“三言”的思想内容是颇为复杂的,题材又极其广泛,几乎涉及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反映了城市经济的繁荣面貌及市民阶层的思想感情。其中以写“公案”和描写爱情婚姻的作品,成就最为卓著。公案故事揭露和批判的锋芒往往是直指草菅人命的封建官府和官吏的,如《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简帖僧巧骗皇甫妻》、《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木绵庵郑虎臣报冤》等等。在爱情和婚姻方面,作者并非在一般层面上表现这个古老的题材,而是贯注了许多新的思想因素、民主意识和反抗精神,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当时社会生活的写生画和风俗画,诸如《崔待诏生死冤家》、《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小夫人金钱

赠少年》以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

在艺术上，“三言”也有独到的艺术特色。情节的曲折多变，构思上巧合回旋，散发出引人入胜的魅力；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臻于绘声绘色、传神摹态的境地；还有通俗的口语，逼真的对话，使人恍似躬历其境，亲闻人物警歎的感受。这些都使得“三言”广为流传。

受“三言”的影响，明末清初的文坛涌现了一个短篇小说的收集和创作的热潮，凌濛初的“二拍”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凌濛初（1580—1644年），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今吴兴）人。所谓“二拍”即是他整理、改编和创作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简称。初刻和二刻各为四十卷四十篇，其中二刻二十三卷与初刻重复，第四十卷为杂剧《宋公明闹元宵》，因此，“二拍”实收小说七十八篇。每篇篇目不同于“三言”的单句篇目，而是采用章回小说的骈句形式。另外，这七十八篇小说中大部分为凌氏自己的创作。追究凌濛初的创作意旨和动机，他在《初刻拍案惊奇·序》中说得很明确，归纳起来不外以下三点：一是由于冯梦龙的“三言”“行世颇捷”，于是凌濛初在“肆中人”的要求下编撰起《拍案惊奇》了。二是宋元旧篇已被冯梦龙“搜刮殆尽”，剩下的又只是“沟中断筭，略不足陈”，于是，他便“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三是他创作小说“文不足征，意殊有属”。恰似他在《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所说“其间说梦说鬼，亦真亦诞，然意存劝诫，不为风雅罪人，后先一指也”。他的作品确乎“诤诫连篇，喧而夺主”，<sup>①</sup>其思想内容较为复杂，有的作品对当时错综复杂的生活有所描绘，揭示了社会矛盾的某些方面，多少带有进步倾向。但也有的作品的思想意识流于浅薄，宣扬宿命论、因果轮回等迷信思想，同时还有较多的色情描写，这是其糟粕所在。不管如何，“三言”、“二拍”等话本小说的兴起，为中国小说开

<sup>①</sup>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页。

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大大促进了通俗文学的繁荣。<sup>①</sup>

除“三言”、“二拍”之外,最近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员陈庆浩在汉城奎章阁图书馆又发现另一部由小说家陆人龙编撰、崇祯初年刊刻的小说——《型世言》,这是一部在中国亡佚四百多年的白话短篇小说集。

1987年夏,陈庆浩去汉城奎章阁图书馆查访韩国的汉文小说资料,在目录上发现了著录为“崢宵馆评定通俗演义型世言”一书。该书共计四十回,分订11册,另已佚去首册。但陈先生认为,四回一册,小说正文当为10册,佚去一册当为序、总目及插图。据他研究,今传世的《幻影》、《三刻拍案惊奇》(下简称《三刻》)、别本《拍案惊奇》(下简称《别刻》)等书,均系《型世言》一书的残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郑振铎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别刻》,后来刘修业女士曾对其中的插图作了研究,判定插图与正文不符。根据这一线索,在对《别刻》的研究中,陈庆浩发现其中的14叶28幅插图,均出自《型世言》。后经几年来多方努力,征得奎章阁图书馆同意及法国国家图书馆授权,他将此两项资料聚合一编,交由台北文哲研究所,作为该所《珍本古籍丛刊》第一种,于1992年12月影印出版。书前有他撰写的长达一万多字的《导言》,对《型世言》作者、评者及其相关小说作了详细的考证与探讨。后附《〈型世言〉与〈别刻〉、〈三刻〉各回关系对照表》。

《型世言》评点者刊刻者是陆云龙。陆云龙字雨侯,号翠娱阁主人,浙江钱塘人,生卒年不详。幼时家贫,父亲早逝,姐弟五人,由生母与嫡母共同抚养成人。少为诸生,考科举二十年皆落第,遂弃绝功名,专事著作和刊刻著作,主持崢宵馆书坊,由其编选、作序、出版的著作现存计有二十余种,《型世言》回前的“叙”及回末“雨侯评”都是他的手笔。《型世言》各回回首都有“钱塘陆人龙君翼”署名。由此得知作

<sup>①</sup> 宁宗一:《“三言”和“二拍”》,《古典小说十讲》,中华书局1992年版。

者叫陆人龙,字君翼,钱塘人,为陆云龙的弟弟。除《型世言》以外,陆人龙还撰写了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名《辽海丹忠录》。《型世言》有强烈的教诲意识,书名据书中故事,即有“以为世型”、“树型今世”的劝诫教化之意,此与“三言”所承袭的宋明白话短篇小说的道德劝诫一脉相承。所叙多为明代故事,有的源于史实,大半源于社会生活,因作者系杭州人,内中亦多有杭州风俗的描写。每回虽有叙,回末也有评语,但都没记明日期。陈庆浩据刊于崇祯四年的《翠娱阅评选行笈必携》序前一则征文启事及刊于崇祯六年的《皇明十六名家小品》,推测《型世言》当在崇祯五年壬申(1632年)前后问世。因奎章阁藏本中划去“奴儿哈赤”等字,推测可能避清讳,推测此书或清初仍在中国,后方传入朝鲜。《型世言》在朝鲜有译本,但现存非全本,仅存卷之三、四、五、六共四册,今藏汉城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

《型世言》大部分故事,其实已被吸收到《幻影》、《三刻》、《别刻》之中。《幻影》共七回,后被发现与《三刻》中的七回故事相同,将《型世言》与《三刻》比较,发现《三刻》的三十四回“均自《型世言》抄来”。但删去了评批眉批,撰者评者姓氏也改为“梦觉主人”,“西湖浪子”。这当是书商剽窃旧本另用新名的书贾作派。《别刻》与凌濛初的《二刻拍案惊奇》有所不同,《别刻》前十卷采自《二刻拍案惊奇》,后二十四卷大部分同《幻影》与《三刻》。据此线索,将《别刻》二十四卷与《型世言》比较,“发现其回目虽有不同,内容则都是采自《型世言》的”。《型世言》的发现,有助于解决《幻影》、《三刻》、《别刻》的来源及成书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幻影》与《三刻》、《三刻》与《别刻》故事多所雷同,其来源及成书皆有疑问。《型世言》的发现,可以理清它的线索,探明来源,从而了解其成书及刊行年代等,也从侧面提供了清初书商窃取旧本改用新名的刊行情况。

影印本《型世言》卷首附有 28 幅插图,这也是恢复插图部分原貌的一件可喜之事。《型世言》首册佚去,未能睹其插图原貌。陈庆浩发



现《别刻》所保存的 17 叶 34 面插图中,有 14 叶 28 面插图,“与正文不相应,却和《型世言》相应的现象”。由此推知,《型世言》原来如同“三言”、“二拍”一样,每回有图一叶两面,共计 80 幅插图,惜乎首册已佚去,只能看到有赖《别刻》得以保存的部分插图。

《幻影》、《三刻》和《别刻》中保存了《型世言》的大部分故事,但只有《型世言》本身才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四十回本,这是继“三言”、“二拍”初刊本被发现后的一个重要发现。《型世言》可谓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既与“三言”“二拍”一脉相承,同时又有它独特的风格,此即每回篇首的“叙”。《型世言》篇首都有“叙”概述作品大意,寄托作者感慨,这在明代白话短篇中绝无仅有。《型世言》的发现,填补了明末白话短篇小说研究的一段空白。<sup>①</sup>

明末清初,有较大影响的通俗小说作家当推李渔。李渔(1610—1680年),原名仙侣,字谿凡,号天徒;后改名渔,字笠鸿,号笠翁,另有觉世稗官、澹慧居士、随庵主人、新亭樵客、湖上笠翁等别号,时称李十郎,浙江兰溪人。李渔一生著作宏富,仅小说就有:短篇小说集《无声戏》、《十二楼》,长篇小说《合锦回文传》、《肉蒲团》等。李渔继承了宋、元、明以来话本小说的传统,着重反映市民阶层的思想感情、风习兴趣和利益要求,其题材主要是发生在市民阶层中的事件,主人公也主要是市民阶层中的人物,透过这些人物和故事,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的市民生活图景,反映了明末清初城市社会面貌。同时,他的小说还揭露了明末清初统治者的荒淫昏庸以及社会风气的腐朽,反映了人民的苦难,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另外,李渔的小说在语言、结构上都具有十分明显的通俗性,与他“贵显贱”的主张是相吻合的。当然,李渔小说为迎合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有一些淫秽猥琐的描写,这是他作品中的糟粕。

<sup>①</sup> 屈小玲,《三言二拍一型》,《文艺报》1993年9月25日。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把《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等称之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其中《官场现形记》、《孽海花》的作者李伯元和曾朴均为吴越人。李伯元(1867—1906年),名宝嘉,以字行,自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他曾主办过《指南报》、《游戏报》、《繁华报》、《绣像小说》半月刊等,在清末蔚然成风的办报热潮中,他是众多报刊的创始人之一。除了《官场现形记》之外,他还创作了《文明小史》、《活地狱》、《中国现在记》等多种小说以及其他一些弹词曲艺作品,这奠定了他在晚清小说史上的地位。他的代表作《官场现形记》全书六十回,近80万字,刻画了大大小小的封建官吏形象,上至朝廷的军机大臣,下至偏僻小县的胥吏典史,大大小小都被放置在官场的舞台上,来去匆匆,各自做着升官发财的迷梦。他们的官阶不等,人面各殊,但有着共同的性格,即无官不贪,嗜钱如命,可以说,这部小说简直就是贪官污吏的列传。《官场现形记》在结构上的突出特点是没有贯串首尾的主要人物,也没有支撑全局的中心事件,只是将若干短篇故事加以联缀组合,用以描绘封建官场丑态百出的怪现状,恰如鲁迅所概括:“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自然,这一结构也有缺陷,易失之于肤浅和平铺直叙。

《孽海花》也是一部抨击腐朽清政府的谴责小说,它的写作过程较为复杂,版本也比较多。阿英介绍说:“《孽海花》二十四回,东亚病夫著。首五卷十回,光绪乙巳(1905年)由小说林社出版。丙午年(1906年)续出次五卷十回。杂志《小说林》创刊,又续作四回。丙辰(1916年),强作解人以此四回,并所作《孽海花人名索引表》、《孽海花人物故事考证》八则,及《续证》十一则,合刊为《孽海花》第三册(拥百书局版)。1927年,著者主编之《真美善》杂志出版,再赓续十一回,

又修改前书,成1928年之修改本(真美善版),刊十五卷三十回,与原来计划之六十回,仍相差约二分之一。”<sup>①</sup> 流传较广的三十回本,大致有三种版本。一是1928年由作者在真美善书店出版的修改本;二是1943年孙次舟的重印本;三是1955年北京宝文堂的重印本(后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印行)<sup>②</sup>。在《孽海花》的初印本上,其署名为:“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据作者1928年《修改本自序》所说,“爱自由者”是作者的朋友金松岑(吴江人),而且据作者说,此书的前四回,就有一部分是爱自由者的原稿。至于作者“东亚病夫”,则为曾孟朴的笔名。曾孟朴本名曾朴(1871—1935年),江苏常熟人。《孽海花》的特点,作者在修改本的《自序》里曾说过这样的话:“想借用主人公做全书的线索,尽量容纳近三十年来的历史,避去正面,专把些有趣的琐闻逸事,来烘托出大事的背景,格局比较的廓大。”全书虽未写完,但从同治末年写到戊戌政变的前夕,这一段时间里的政治、外交和社会变革,还是比较具体地表现出来,而且写得相当有艺术性。从人物看,全书以男主角金雯青和女主角傅彩云为中心,作者写出了将近五十个正反的当时在朝在野的官僚知识分子。此外则上至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下至“娼优隶卒”,以及俄国人、日本人、德国人,作者都网罗无遗。就情节论,除了以金、傅两人的爱情事件为中心线索外,像中法马尾之战、康梁变法前公羊学派的盛极一时、甲午中日之战和李鸿章的出使议和、慈禧太后和光绪之间的矛盾、孙中山等革命党在广州的活动,都很概括而生动地写入书中。这对了解近代史实和晚清社会,都不无裨益。所以《孽海花》问世后,深受当时社会的欢迎,曾再版十多次,还有评论、考证、续作纷纷发表。常熟张鸿撰写了《续孽海花》三十回,书中着力描绘了戊戌变法与庚子之役两大历史事件,抨击清朝廷

① 《晚清小说史》,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21页。

② 吴小如:《古典小说漫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69页。

的昏聩,赞美谭嗣同舍生取义,揭露西太后的阴鸷狠毒,指责袁世凯的卖友求荣,全书充满着爱国主义的激情。

倘若我们从语言角度来论述吴越白话小说,吴侬软语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地域的神韵逐渐渗入到文学作品之中。话本和拟话本中就深深烙有吴方言的印记。明代冯梦龙“三言”的某些篇章将明和艳丽的山水与吴语方言糅合得如此水乳交融,以致顾颉刚推崇说:“其人实为搜集当时民间文学之倡始人,亦即为独一无二之专家,后有述者所当奉为此学不祧之祖也”(《吴歌小史》)。同样,受冯氏影响的“二拍”拟话本中也采用了较多的吴方言。此外,包含吴方言韵味的文学作品品种还有冠以地域之名的苏州评弹和风靡海内的古老剧种昆曲,这些使吴语成为方言文学中的一大分支。对此,胡适在《吴歌甲集·序》中有一段精湛的评述:“有三种方言已产生了不少的文学:第一是北京话,第二是苏州话(吴语),第三是广州话(粤语)。……介于京语文学与粤语文学之间的,有吴语的文学。论地域,则苏、松、常、太、杭、嘉、湖都可算是吴语区域。论历史,则已有了三百年之久。三百年来,凡学昆曲的无不受吴音的训练;近百年中,上海成为全国商业的中心,吴语也因此而占特殊的重要地位。加之江南女儿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国少年心;向日所谓南蛮舛舌之音久已成为吴中女儿最系人心的软语了。故除了京语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最有势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以今日眼光看,这评语似乎有溢美之嫌,然就晚清及近代吴方言通俗小说的创作实绩而言,这一评价还是较为实事求是的。

通俗小说中吴方言成分的大大增加,使清末民初吴方言小说曾大放异彩。较早用吴方言写成的小说为清乾嘉时期的《何典》(又名《十一才子书鬼话连篇录》,共十回。原题“过路人编”,又题“上海张南庄先生编”)。有据可考的出版时间是清光绪四年(1878年),由上海《申报》馆印行。《何典》是借鬼域讽刺官场的黑暗,呈现幽默滑稽的风格,正如光绪五年《申报馆书目续集》所说:“《何典》……阅之已堪喷

饭。况阅其所记,无一非三家村俗语,无中生有,忙里偷闲。其言,则鬼话也;其人,则鬼名也;其事,则开鬼心,扮鬼脸,钓鬼火,做鬼戏,搭鬼棚也。语曰:‘出于何典?’而今而后,有人以俗语为文者,曰‘出于《何典》’而已矣。”鲁迅对《何典》极为赏识,他在《何典题记》中充分肯定了此书的讽刺力量和幽默特色,认为:“作者便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便是信口开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仿佛有会于心,禁不住不很为难的苦笑。”《何典》是拟话本和南昆净丑式的苏白的交融,也是镶嵌着吴方言词拟话本发展为吴语长篇小说的过渡桥梁。<sup>①</sup>

时隔不久,便迎来了吴方言小说的新的巅峰,这就是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的出版(从1892年开始在《海上奇书》上连载达二十八回;并于1894年以六十四回石印巾箱本发表全书)。该书是吴方言小说中涉及近代生活的最著名的第一部。胡适在1926年撰文评价道:“在三十多年前用吴语作小说,还是破天荒的事。《海上花》是苏州土语的文学的第一部杰作。”“韩君认定《石头记》用京语是一大成功,故他也决计用苏州话作小说,这是有意的主张,有计划的文学革命。”(《海上花列传序》)其实,《海上花列传》一书使用了两种方言,凡叙事则用普通白话,记言或对话则用吴方言。胡适称之“富有文学的风格与文学的艺术”,令人读来有“悠然不尽的余韵”。这部小说在吴语地区风行一时。《海上花列传》引起了连锁反应。1904年二春居士撰写吴方言小说《海天鸿雪记》,接着是漱六山房张春帆的吴方言小说《九尾龟》于1910年起陆续问世。影响所及,许多通俗小说不仅写吴地生活风光,而且将吴方言也融入作品之中。虽然对吴方言长篇小说的评价历来有不同的见解,但作为近代吴文化流变中的产物,其价值应予肯定。

清末民初,随着上海这一大都市的成型和日趋繁荣,近代吴文学

<sup>①</sup> 范伯群、翁寿元:《吴方言与文学》,《文史知识》1990年第11期。

中涌现了一个都市通俗文学流派：鸳鸯蝴蝶——礼拜六派。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有明确纲领与严密组织的团体，而是指民国初年以《礼拜天》、《游戏杂志》、《眉语》、《小说月报》、《小说画报》、《小说新报》、《红杂志》等刊物为阵地的文人们。他们大都是吴文化地域中的才子，其中又以吴县（苏州）籍和常熟籍占多数。如吴县籍作家有包天笑、周瘦鹃、徐卓呆、程瞻庐、顾明道、郑逸梅、江红蕉、陆澹安、叶小凤等人；常熟籍作家有徐枕亚、徐天啸、李定夷、吴双热、姚民哀、平襟亚、俞天愤等人；上海市的有张恂子、王小逸、孙玉声（海上漱石生）、朱瘦菊（海上说梦人）、陆士谔、王钝根、张舍武等人；武进籍的则有张春帆（漱六山房）、恽铁樵、许指严等；扬州籍的有李涵秋、毕倚虹、贡少芹、刘铁冷、张秋虫等；另外，浙派人数亦不少，最著称于通俗小说界的有陈蝶仙（天虚我生）陈小蝶父子、严独鹤、许廑父、徐哲身、赵苕狂、戚饭牛等<sup>①</sup>。他们汇聚在上海且形成一个作家作品众多，影响范围颇广的文学流派。在这一近现代通俗小说流派之中，古代小说三原素：英雄、儿女和神魔已很明显地嬗变为社会、言情、武侠和侦探等小说样式。同时，他们的小说观念的价值取向也大体一致，即：消遣趣味中的“警世觉民”。他们既宣扬“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的游戏和消遣，又强调“虽曰游戏文章，然谏讽微讽，潜移默化于消闲之余，亦未始无感化之功也”，还提醒读者：“纵豆棚瓜架，小儿女闲话之资，实警世觉民，有心人寄情之作也。”总之，他们是想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创造出新的世俗道德小说。<sup>②</sup>

就社会小说而言，由于都市市民阶层的日益扩大，市民的凡人小事题材异常丰富，这些市民大都从乡村的农业经济自然解体中转化

① 范伯群：《从通俗小说看近代吴文化之流变》，《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② 汤哲声：《鸳鸯蝴蝶——礼拜六小说观念的价值取向及其评价》，《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出来且主要从事于工业或店员之类的工作,他们热衷的是现有的生活,通俗社会小说表现了这样的“人之常情”,自然受到欢迎。从言情小说看,封闭状态中的“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和“奉旨成婚”之类的大团圆结局,已缺乏起码的社会基础。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传统婚姻的程式已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些小说作家一方面对心心相印的爱情充满了肯定和同情,另一方面又尚无冲决封建罗网的勇气。他们在矛盾的心态中只能给爱情主人公两种结局:殉情或屈从。于是产生了一种新的小说模式——哀情小说。如徐枕亚的《玉梨魂》全书三十章,先发表于《民权报》,1913年出版单行本。小说写的是当时一个青年寡妇白梨影和一个家庭教师何梦霞的恋爱故事,拘于封建礼教,梨影不能再嫁,便介绍其小姑筠倩与梦霞订婚,三人均因婚姻不由自主而郁郁寡欢,不久梨影、筠倩相继夭亡。何梦霞遂投身军中,死于战场。整个故事具有浓厚的伤感情绪。《玉梨魂》的出版,曾风靡一时,再版竟达三十多次,销数达几十万册。此外,还有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武侠小说所反映的内容总是彰侠义、惩顽恶,这类小说的情节大都曲折紧张、环境也是神秘可怖、人物总是奇人异士,这就使得市民们贫乏的精神生活受到了强烈刺激,好奇心和好胜心都得到极大的激发和满足。对此,朱自清曾评论道:“鸳鸯蝴蝶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中国小说一向以‘志怪’‘传奇’为主,‘怪’和‘奇’都不是正经的东西。”<sup>①</sup>而侦探小说既是“迭破奇案,诡秘神妙,不可思议”,又能使读者有“亲历其境之妙”,因此,侦探小说受到了鸳鸯蝴蝶——礼拜六的作家们青睐,热衷于此类小说的制作,也显示了他们追求消遣和娱乐的小说观念。

从这些通俗小说中所反映的近代吴越文化流变,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概括:其一能从某一侧面较为形象地反映出吴地(主要是上

<sup>①</sup> 《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海)中西文化互相融合的过程;其二表现了社会变迁、时尚更新和价值观念的演化,以及其辐射中介作用。几乎每一部通俗小说都要重点写几种趋时的花样,而这些“时鲜货”又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吴越的文化面貌;其三是注意为民俗存真。如包天笑续写《人间地狱》时,用三个整回篇幅写姚啸秋陪碧嫣到杭州去烧香的全过程,提供了当时的地域文化资料。无可否认,这一流派的通俗小说有历史的积极意义。然而,其发展却不尽如人意。1915年以后,那种哀婚姻不自由的写情小说被写勾栏妓院生活的玩情文学所代替,而侦探小说和社会小说、武侠小说合流成黑幕小说,“丑诋私敌,等于谤书”<sup>①</sup>,成了“犯罪的教科书”。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以鸳鸯蝴蝶——礼拜六作家当作批判的对象。当然,有的评价和提法不免偏激。

“五四”以来,吴越这块丰厚的文化土壤中,又滋生出一批文学大家。如鲁迅、茅盾、郁达夫、夏衍等等,都是一座座令人瞩目的丰碑。

---

### 第三节 戏曲曲艺

---

吴越地区戏剧曲艺的起源是很早的。因此,宋元南戏的出现就不是偶然的事情。宋元南戏是指十二世纪三十年代至十四世纪六十年代期间在中国南方流行的舞台艺术<sup>②</sup>。南戏产生的时间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宋光宗朝(1190—1194年)。元末明初人叶子奇《草木子·杂俎篇》:“俳优戏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之。”徐渭的《南词叙录》:“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另一说为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年)。明祝允明《猥谈》:“南戏出于

---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2页。

② 刘念兹:《南戏新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页。



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其实这一说法,徐渭也曾提到,“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又曰‘鹤伶声嗽’。”两说时间虽则相距近八十年,但无多大的分歧,一是着眼于南戏流行,另一则考实于有无代表性剧目,总之,宣和之后、南渡之际是南戏的形成时期。

南戏产生的地区,自明以来一般都认为在永嘉(温州),然最近的研究表明,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及一些古老剧种的发掘、调查认为,南戏是在闽浙两省沿海一带同时出现并相互影响,具体的地点是在温州、杭州以及福建的莆田、仙游、泉州等地。<sup>①</sup>

南戏最早的剧目据《南词叙录》、《猥谈》等书的记载,有《赵贞女蔡二郎》和《王魁》,并称之为“戏文之首”。此外,还有《王焕戏文》、《乐昌分镜》、《韞玉传奇》以及《张协状元》等六种,这仅仅是可以确定的宋人作品。及至元代,南戏与北杂剧并行在剧坛上。明叶子奇的《草木子》说:“元朝南戏盛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也加以肯定:“元一统后,南戏与北杂剧并行。”“元代南戏之盛,……此亦事实,不可诬也。”宋元南戏主要是民间的创作,刊刻付印的机会不多,遗留下来的剧本更少。尽管如此,研究者从文献资料中,仍辑得数量可观的剧目。据钱南扬《戏文概论》的统计,有存目的宋元南戏达 238 种;《南戏新证》辑得宋元南戏剧目 244 个;当然,具体数目还有不同的见解;目前比较可靠的宋元南戏大约在 200 种左右。这一数据充分说明了当时南戏的繁盛。尤其是元末明初之际,南戏更加成熟,在创作上出现了“四大南戏——《荆钗记》、《白兔记》、《拜月记》、《杀狗记》,以及“南戏之祖”——《琵琶记》,这些都是在戏曲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作品。

纵观南戏孕育、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大体经历了北宋政权的覆亡和南宋的偏安,及至元代的统一和明王朝的建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又

<sup>①</sup> 刘念兹:《南戏新证》,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0 页。

一个社会动荡、阶级和民族矛盾交织的时代。作为广泛流传于东南沿海地区并富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南戏作品,也就很自然地多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表现了各阶层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他们的生活愿望。许多南戏作品,就描写了兵荒马乱的历史背景和人民颠沛流离的情景,并把社会动乱作为家庭离散和爱情波折的直接原因。如《乐昌分镜》、《孟月梅》、《王仙客》、《章台柳》、《柳颖》、《拜月亭》等南戏剧本,大致就反映了这些内容,南戏作品中大量的“破镜重圆”的结局,也是曲折地表达了要求安定团聚的生活愿望。而对爱国英雄人物的颂扬及对祸国殃民权奸的鞭笞,则从另一角度表达了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如《牧羊记》、《东窗记》、《贾似道木棉庵记》等。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并表达人民对现实的不满情绪也是南戏的重要内容,如《曹伯明错勘赃》、《郑孔目风雪酷寒亭》、《祖杰戏文》等,这表明了南戏的现实主义精神。

南戏中最突出的题材应是反映爱情问题和家庭故事的,约占已知南戏剧目的一半左右。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歌颂爱情自由、提倡婚姻自主的作品,如《王焕》、《董秀英花月东墙记》、《裴少俊墙头马上》、《王月英月下留鞋》、《罗惜惜》、《张资鸳鸯灯》、《苏小卿月夜贩茶船》、《赛金莲》、《孟月梅》、《崔莺莺》、《张浩》、《兰蕙联芳楼》等;另一类是描写婚变、批判男子负心的故事,如《赵负女蔡二郎》、《王魁》、《张协状元》、《崔君瑞江天暮雪》、《三负心陈叔文》、《张琼莲》、《李勉负心》等,作品往往予负心者以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并给以严厉的惩罚。总之,南戏的创作主流是富有现实主义精神,充分而深刻地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且反映了特定的时代风貌。但在两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南戏作品的思想内容也是复杂的,有维护封建秩序,宣扬封建道德,倡导宿命思想的作品,还有《王母蟠桃会》、《吕洞宾三醉岳阳楼》、《黄粱梦》等神仙道化戏之类的消极内容的作品。

南戏在艺术形式上也有自己的特色。它的剧本形式,在结构布局

和各种艺术手段的运用上,都有它特定的规格。由于南戏故事的完整性和情节的连贯性的特征,以及在宫调和套曲运用上,根据剧情的发展需要,比较自由灵活,因此,它采取了分场的形式。分场即是以人物上场、下场作为界线,把剧本分成若干段落,每一段落便各成一场。凡是交待人物,衔接剧情的场子,则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而需要集中刻画人物和表现强烈戏剧冲突的场面,就要刻意求工,多施笔墨。在场次的安排上,南戏剧本开头有一段介绍作者创作意图和叙述剧情大概的开场戏,叫做“副末开场”或称“家门大意”,这在明清传奇里一直还保存着。南戏进入正戏,是从第二场开始的。按照南戏剧本的规格,在前几场戏里,男女主角和主要配角,都要上场和观众见面;在故事情节展开以后,便要照顾到角色行当的劳逸、大小场子的安排和冷热场子的调剂。同时,围绕着生旦戏的进行,分别穿插净丑插科打诨的戏,使热闹轻松的喜剧场面和冷静严肃的正剧场面交替出现。在每一场戏里,运用歌唱、念白和科介等戏剧表现手段来塑造人物形象。这种艺术创造,反映在剧本文学上,就出现了曲、白、科介相间的文学形式。

南戏的音乐,最初取材于当地流行的民歌。《南词叙录》中说“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又说“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这种“村坊小曲”与“里巷歌谣”就是当地人们通俗易懂的民歌,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宋代极为流行的词体歌曲。据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的统计,南戏曲调来源于唐宋词的约有 190 首,占总数 543 首的 1/3。这些词体歌曲在曲调形式与唱词格式上变化很多,曲调的风格和情趣也多种多样,适合南戏表现各种人物的感情。除此之外,还有大曲、诸宫调、唱赚等传统音乐成分。南戏音调与南方语言是一致的,它以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为特色的南曲音乐为主,其旋律多用级进,节奏多舒缓宛转,以管笛伴唱,以板点拍。在唱曲的运用上,不拘于宫调的限制,曲牌组织不完全受所谓套数的制约。曲词既是典雅

的又是抒情的,诙谐风趣而且通俗易懂。在演唱形式上是多样化的,既有一个人的独唱,也有两三个人的对唱,还有众人的同唱、合唱以及帮腔等等,所有的出场角色都可以唱。其后南北合套新的表现形式的出现,把南曲与北曲两种风格的音乐结合在一起,开创了戏曲中不同的声腔互相吸取融合的先例。集曲是南戏音乐另一种新的形式,它是把几支不同的曲牌,各摘取若干片段,一句或数句,以至全曲均可,重新加以组织而成为一支新的曲牌。

在南戏的演出中,运用唱、念、介等表现手段,充分发挥其不同的作用,有的善于抒情,有的富于戏剧性。他们之间彼此配合,互相补充,说明一种综合性的戏曲表演艺术已经形成,南戏角色行当共有七种,即生、旦、净、丑、外、末、贴。净、丑是南戏中的一对喜剧角色,他们和生、旦等正剧角色形成鲜明的对比。人物类型的专业分工已逐渐细致,每行角色的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也日趋明显起来,并形成了以生、旦为主的角色表演体制。

南戏的艺术形式和它的艺术成就,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影响是很大的,明清戏曲的舞台艺术便是沿着这种传统发展起来的,从而也就奠定了整个戏曲艺术的基本发展道路。<sup>①</sup>

南戏在元末明初有很大的演变,首先是南北合套形式的出现。这主要指南戏吸纳了北杂剧,曲词上不限南北,既运用了南曲柔美的情调,又糅合了北曲激昂的韵味。其次,依据地区语言的不同,许多声腔蓬勃发展,故有“四大声腔”之说。徐渭《南词叙录》:“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扬用之;称海盐腔者,嘉、湖、温、台用之。惟昆山腔止行于吴中,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听之最足荡人。”

海盐腔的萌生时间较早,有一说可能在南宋时期已经创兴。明李

<sup>①</sup> 《南戏新证》,第13—15页。

日华《紫桃轩杂缀》：“张镗字功甫，循王之孙，豪侈而有清尚，尝来吾郡海盐，作园亭自恣，令歌儿衍曲，务为新声，所谓海盐腔也。”而一般认为海盐腔产生在元末。至明中叶，海盐腔流传已非常广泛，不仅“嘉、湖、温用之”，而且还流入苏州、南京、山东、北京一带。海盐腔的唱法及其特点是歌声细绵悠长婉转。明人姚旅的《露书》曾形容说：“今唯唱海盐曲者似之。音如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不背于永言之义。”余姚腔不仅保存了早期宋元南戏所固有的“俚词肤曲”的特征，而且更以“杂白混唱，以曲代言”的演出形式显示出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弋阳腔的特点如汤显祖《庙记》所说：“其节以鼓，其调喧”，还有帮腔。弋阳腔能保持戏文原有的长处，文辞通俗易懂，声调高亢，适于田野间演出，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相比之下，昆山腔虽也在元末出现，但影响不大，流行范围较小，至明代嘉靖时，以魏良辅为首的一些艺术家对昆山腔进行了改进和完善，赋予它较高的艺术魅力。

魏良辅(号尚泉)，生卒年不可考。原籍江西豫章(南昌)，寓居太仓。明沈宠绥《度曲须知》：“嘉隆间有予章魏良辅者，流寓娄鹿城之间。”明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更具体地说他“居太仓之南关”。魏氏最早是习北曲的，后改习南曲，并且“愤南曲之讹陋也，尽洗乘声，别开堂奥”(《度曲须知》)。魏良辅对昆山腔的改革，主要体现在演唱方法伴奏方面。《度曲须知》评论说：“调用水磨，拍挨冷板，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匀，功深熔琢，气无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而在伴奏乐器上也有较大的改进，既有笛、箫等管乐，又有琵琶等弦乐。这样，改革后的昆山腔有“闲雅整肃、清俊温润”(《曲律》)的品味，具有轻柔缠绵、委婉悠远的“水磨调”特色，且保持至今。魏良辅还著有《南词引正》(又名《曲律》)，这是他在对昆山腔进行改革时所作的理论总结，全文虽只有二十条，一千多字，但所论却自成系统，对昆山腔演唱技艺的发展和提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无怪乎

在明代,就有人予他“昆腔之祖”(《度曲须知》)的美誉。

诚然,魏良辅改革后的昆山腔还只是停留在清唱阶段,不久,梁伯龙开始运用这种新腔编写了《浣纱记》,使昆山腔与戏曲舞台相结合。《梅花草堂笔谈》曾记述道:“梁伯龙闻,起而效之,考订元剧,自翻新调,作《江东白苎》、《浣纱》诸曲。又与郑思笠精研音理,唐小虞,陈棋泉五七辈杂转之,金石铿然,谱传藩邸戚畹、金紫熠燿之家,而取声必宗伯龙氏。”《渔矶漫钞·昆曲》也说:“梁伯龙独得其传,著《浣纱记》传奇,梨园子弟喜歌之。”真所谓一时“吴阊白面冶游儿,争唱梁郎雪艳词”,这使得昆山腔流行的范围日益扩大,出现了“四方歌皆宗吴门”(徐树丕:《识小录》卷四)的情形,从此,我国的戏曲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繁荣时代。大约从十六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至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前后两百多年中,是传奇(包括昆山腔传奇)和杂剧名家辈出、名作如林的时代,而吴越地区是成就卓著之地,主要的作家和作品只能概述如下:

梁辰鱼(约1515—1585年左右),字伯龙,江苏昆山人,他的《浣纱记》是记叙吴、越两国兴亡的传奇历史剧,中间穿插着范蠡和西施的爱情故事。一般认为,这部传奇是把魏良辅新昆山腔搬上戏曲舞台的第一新作品,对昆山腔的流行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回营》、《打围》、《采莲》、《泛湖》等出,一直是昆曲舞台(及清唱)中的著名传统折子戏。此外,他还有《红线女》与《红绡》杂剧两种。

张凤翼(1527—1613年),江苏长洲人。他著有传奇剧本6种:《红拂记》、《祝发记》、《窃符记》、《灌园记》、《虎符记》、《虞彦记》。

王世贞(1526—1590年),江苏太仓人。生平以诗文著名,还著有戏曲评论集《艺苑卮言》。一般认为,传奇《鸣凤记》和他有关系,是他或其门人所作。这部作品写的是嘉靖年间丞相严嵩及其子世蕃弄权横暴、祸国殃民,后被弹劾,问斩于市的故事,它是反映现实政治斗争的时事戏的开山之作。

屠隆(1542—1605年),浙江鄞县人。他的作品有《昙花记》、《修文记》和《彩毫记》。其中《彩毫记》写李白的故事。现在昆剧舞台上还演出《太白醉酒》一折。

沈璟(1553—1610年),江苏吴江人。他是吴江派的领袖。编写了《属玉堂传奇》17种,今存的仅有《义侠记》、《红蕖记》、《埋剑记》、《双鱼记》、《桃符记》、《坠钗记》、《博笑记》7种。他还是个戏曲声律家,所著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是元明以来南曲曲律方面的总结之作。

与沈璟同时的重要作家有:

顾大典,江苏吴江人。著有《清音阁传奇》4种,只有《青衫记》今存。

卜世臣,浙江秀水(嘉兴)人。著有《冬青记》、《乞魔记》(已佚)。

叶宪祖,浙江余姚人。作传奇《鸾镜记》、《玉麟记》、《双修记》、《四艳记》、《金锁记》。还写过一些杂剧如《易水寒》、《团花凤钗》等。

王骥德,浙江会稽人。著有传奇《题红记》、杂剧《男王后》等,另有戏曲论著《曲律》,这是元明以来一部全面系统地探讨戏剧创作规律的理论专著。

史槃,浙江绍兴人。作有传奇《樱桃记》等十余种。

周朝俊,浙江鄞县人。著有颇负盛名的传奇《红梅记》,主要描述宋太学生裴舜卿与李慧娘、卢昭容的曲折爱情故事。

徐复祚(1560—1630年),江苏常熟人。著有传奇《红梨记》等。这部传奇是根据元人杂剧《红梨花》改编,写靖康之际书生赵汝舟和妓女谢素秋的恋爱故事。

陈与郊,浙江海宁人。作有传奇《鸚鵡洲》、《樱桃梦》、《麒麟鬪》、《灵宝刀》。

冯梦龙在戏曲方面,所作的传奇有《双雄记》、《万事足》二种,而修订的传奇共有12种。

吴炳,江苏宜兴人。作有《粲花别墅五种》传奇:《绿牡丹》、《画中

人》、《疗妒羹》、《西园记》、《情邮记》。

孟称舜,浙江绍兴人。作有传奇《娇红记》、《贞文记》、《二胥记》,还有一些杂剧。此外,孟称舜在戏曲史上的一大贡献是编刊《古今名剧合选》,这是继臧晋叔《元曲选》以后今存收录杂剧最多的一部总集。

沈自晋,江苏吴江人。作有传奇《翠屏山》、《望湖亭》、《耆英会》等三本;写水浒故事中石秀嫂的《翠屏》,其中《交账》、《戏叔》、《反诳》、《杀山》等出是昆曲的保留节目,并为京剧之所本。

明末清初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大变革时期,作为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戏曲艺术,出现了一些著名剧作家和优秀作品,就吴越地区就有徐渭的杂剧(《四声猿》4种、《歌代啸》)、李玉为中心的“苏州昆山腔作家群”、李渔的戏曲创作以及“南洪北孔”中的洪昇等等,呈现出极盛的局面。

李玉,字玄玉,又作元玉,自号苏门啸侣、一笠庵主人,江苏吴县人。他是“苏州昆山腔作家群”中最多产且最负盛名的人物。据有关记载所知,他共创作传奇34种,今存18种,分别是《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清忠谱》、《千忠戮》、《眉山秀》、《牛头山》、《万里圆》、《两须眉》、《太平钱》、《麒麟阁》、《意中人》、《五高风》(或题《五义风》)、《昊天塔》、《风云会》、《七国记》、《一品爵》,还有一些传奇的残本传世<sup>①</sup>。李玉剧作的内容广泛,符合广大观众的欣赏要求;不少剧作取材于时事或近代的史实,反映观众所关心的事件。如《清忠谱》和《万民安》反映了明代苏州两次大规模的市民运动,《一捧雪》把严世蕃“以清明上河图掀起大狱而终不得”的故事敷衍成剧。此外,李玉还从元杂剧、话本、讲史、笔记小说和民间传说中汲取题材,因而为广大群众所熟悉和喜闻乐见。

<sup>①</sup> 《中国戏剧通史》(中),第131页。



除李玉之外,“苏州作家群”有朱佐朝、叶时章、朱雠、张大复等。而这一阶段还有一个著名的戏曲家李渔,浙江兰溪人。他所编写的戏曲剧本有16种、15种等诸说,一般考订都以清黄文暘《曲海总目》所著录的《笠翁十种曲》为李渔所著,这10部传奇为《奈何天》、《比目鱼》、《蜃中楼》、《怜香伴》、《风筝误》、《慎鸾交》、《凤求凰》、《巧团圆》、《玉搔头》、《意中缘》。李渔还有一整套戏曲理论,集中见于《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和《演习部》。《词曲部》分为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六章,专门论述戏剧编剧的创作方法;《演习部》分为选剧、调变、授曲、教白、脱套五章,主要阐发戏剧表演、导演和排练应注意之事项与方法。这部专著吸取了前人的戏曲理论成就,总结了宋元以来戏曲创作与演出的一些实践经验,并在理论上作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论述,标志着中国戏曲理论进入成熟阶段。

清初的洪昇也是剧坛上的著名人物。洪昇(1645—1704年),字昉思,号稗畦,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他的剧作有名可考者12种,现仅存传奇《长生殿》和杂剧《四婵娟》两种。《长生殿》是作者“盖经十余年,三易稿而始成”(《长生殿·例言》)的力作,虽然在他之前,已有不少的戏曲作家描写过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但洪昇能结合自己对本时代的现实感受,对原题材有重大的突破和超越,正如作者所说:“借天宝遗事,缀成此剧……然而乐极哀来,垂戒来世,意即寓焉”(《长生殿·自序》)。尽管作者声明是“专写钗盒情缘”的,但剧中所展示的却多是国家大事、兴亡之感,包容了广阔的社会内容和政治含意;虽然全剧以李、杨的爱情故事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可作者有意识地把它与安史之乱的发生、发展交织在一起,既表现了李、杨二人的爱情悲剧,又真实地描绘了唐天宝年间的历史面貌,表达了作者歌颂忠义、抨击权奸、同情人民、关切故国山河等多方面的思想感情。这也是《长生殿》的价值所在。

昆山腔在清代称为“昆贡”(后又改称昆剧),于乾隆后期,昆曲开

始衰落,其原因很多,主要有统治者对戏曲的控制,并制定一些所谓“钦定曲谱”,使艺术形式趋向凝固;同时,清代地方戏的蓬勃兴起,出现了花部“乱弹”诸腔与雅部昆曲的争胜局面,结果,“乱弹”诸腔深受广大观众喜爱,而“闻歌昆曲,辄哄然散去”(张漱石:《梦中缘传奇·序》)。当然,昆曲对当时戏剧有很大的影响,具体表现是流布在各地的昆曲演变发展为地方昆曲,或变为一个独立的地方剧种,如苏州昆曲、武林昆曲、永嘉昆曲、郴州昆曲等等;或与其他声腔结合,共同形成当地的一个剧种,在这个剧种中保留了昆曲戏,如湘剧、赣剧、川剧、婺剧等剧种中的昆曲戏。后来昆曲发展为两大流派:一派为流传于江南一带的南昆;另一派是流传于北京和河北一带的北昆。两派只是在咬字吐音和风格上略有区别,南昆比较细腻,北昆较为粗犷。

在清末和近代,昆曲的步履颇为艰难,曾专为庆贺乾隆六十寿辰而组成的苏州第一流昆曲“集秀班”,无奈于道光七年(1827年)解散。清光绪年间,京戏流传至苏州、上海,昆曲再次受到冲击。至民国初年,昆曲奄奄一息、濒于绝境。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昆曲得到了民族资本家穆藕初的扶植,1921年秋,在苏州成立了昆曲传习所,招收五十多名传字辈学生;1926年,传习所停闭,演员星散各地。1949年后,昆曲又获新生,尤其是1955年,浙江昆剧团整理演出了《十五贯》,轰动了国内外,后上海、江苏相继成立昆剧团,苏州也成立了苏昆剧团,使古典昆曲后继有人。

发源、盛行于吴语地区的一种著名曲艺为苏州评弹。评弹包括评话(俗称大书)和弹词(俗称小书)两个部分,它们都是运用吴语方言宣讲故事的说唱艺术。评话主要开讲武侠、公案之类故事,以醒木、扇子和手帕等为道具;弹词以弹唱才子佳人为主题的故事,用三弦、琵琶等乐器,自弹自唱,配以各种曲调。评弹博采小说、诗歌、戏曲、音乐等表现手法之长,形成了一套以说、噱、弹、唱为主的综合性艺术,表现细腻,语言生动,深受听众喜爱。

评弹渊源于唐代的变文和说唱文学,它的形成,大约在明末清初。据记载,明万历年间,苏州一位说书人钱二演唱《黑白传》和《五精八义图》,由于书中揭露了董其昌一家鱼肉乡民的故事而遭到迫害(《民抄董宦事实》)。在李玉的《清忠谱》中也记载了一个说《岳传》评话的艺人李海泉。这表明,明中叶以后,评弹已在苏州露面。同时,弹词曲调,在明代后期也已形成,表现哀伤的曲调有“凄楚琵琶调”、“汝月琵琶调”等,用琵琶、三弦伴奏,其声悠扬。至清代,评弹在说白上,有官白、私白(苏州话)之分,唱腔也逐渐地方化。清乾隆以后,苏州评弹艺术出现了兴盛的局面。相传乾隆下江南之时,曾在苏州御驾亲聆王周士弹唱《游龙传》,王周士还被乾隆带回北京。后王周士乞病回苏,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成立光裕公所(属保护评弹艺人利益而建立的行会组织),公所中还悬挂《先辈图》,即评弹艺人死后列名之轴,以示怀念。王周士还著有《书品》、《书忌》二书,从理论上总结了评弹艺术的经验。

清乾隆之后,评弹名家辈出,书目繁多。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以陈遇乾为首的前四家;咸丰、同治年间又出现了以马如飞为首的后四家,并形成了具有不同风格的曲调。陈遇乾吸收昆曲唱腔,创造了陈调,以苍凉遒劲,庄严厚重为特点,为老旦等年迈角色的专用曲调;俞秀山的俞调,旋律迂回,委婉动人,常被用来描绘才子佳人谈情说爱和少女感怀的曲调;马如飞的马调,腔短字洁,叠句众多,给人以质朴豪放之感。今日之评弹曲调,大多由这三种调子衍化而来。

评弹界还有自己的一些组织。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光裕公所改称光裕社,创办育才学校,培养了一批评弹艺人,但是,光裕社的章程规定,并不能代表全部评弹艺人的利益。于是有些评弹艺人另立组织,先后成立润余社、宽裕社、同义社、萃和社、鸳湖楔社、光裕分社等,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1949年前夕。

须强调的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评弹曾在上海繁荣、风光

一时。这时的上海已是远东第一大商埠，江南一带的豪富之家，纷纷麇集于十里洋场。评弹进入上海后，使上海成了评弹繁荣发展的“大本营”。当时的书场有数十家，电台上开办了“空中书场”，有钱人家还邀请“先生”去做堂会。其时，评弹十分红火。可以说，苏州评弹是吴语方言地区深受人们喜爱的曲艺，被誉为曲艺界中的“江南一枝花”。

近现代流行于江南的一个主要剧种为越剧，其产生的时间并不长，有资料记载称，1906年农历三月初三清明节为越剧的誕生日，又把1923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作为女子越剧的誕生日。即使把嵊县农民金其炳于1852年创造的同越剧有密切渊源关系的“四工唱书调”计算在内，越剧从萌芽状态到正式形成、发展，也不过是一百多年时间。

浙江嵊县是越剧的发源地，最初只是一种自娱形式的歌唱活动，属于“落地唱书”的一种曲艺。二十世纪初，才从落地说唱发展到上台演出，当时称“小歌班”或“的笃班”、“鹦歌班”。1916年进入上海，称为“绍兴文戏”。1923年以后，又发展成为全部由女演员演出的“女子绍兴文戏”。直到1942年，越剧的名称才得以被正式认可。1949年后，整理改编演出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祥林嫂》等，并恢复了男女合演。越剧成为中国的一个大剧种。

越剧的主要曲调有四二调、尺调、弦下调等，在唱腔音乐上源自江南小曲，在唱法上自然而然地继承了作为“里巷小曲”的那种低回、婉转和轻声细语的演唱方法，具有细腻、委婉与口语式的吟唱风格。

总之，吴越地区的戏曲曲艺颇多，大致说来，本地区的剧种有30多种；曲艺形式变异性较大，一般估计略多于戏曲，难以逐一加以叙评，附“吴越地区戏曲、曲艺流传概况”：

丹阳：丹剧、榔档。

无锡：锡剧、沪剧、越剧、滑稽戏、评曲、隔壁戏、苏州评弹。

苏州：苏剧、昆剧、京剧、锡剧、越剧、滑稽戏、沪剧；苏州评话、弹

词、评弹、隔壁戏。

宜兴：锡剧、春调。

常熟：锡剧、京剧、越剧。

南通：锡剧、沪剧、京剧、越剧、滑稽戏、山歌剧。

上海：苏州剧种、曲种之外，加绍剧、甬剧、扬剧、淮剧、通俗话剧；  
上海说唱、锣鼓书、沪书（钹子书）、浦东说书、扬州评话、相声。

湖州、嘉兴：京、昆、越、锡、湖、苏剧与评弹。

杭州：剧种大致同沪。曲艺：杭评、杭曲、杭滩、小锣鼓（小热昏）、  
花调。

绍兴：绍剧、高腔、姚滩、鹦哥戏、平湖调、莲花落、京剧、滑稽戏。

宁波：甬剧、越剧、京剧、昆剧、四明南词、青书。

金华：婺剧、京剧、昆剧、越剧、道情、唱新闻。

温州：大致同金华，剧种加瓯剧、和剧；曲种加鼓词、龙船、傀儡  
戏。

浙南多傀儡戏。

特殊的有开化的目连戏，宁海平调，海宁皮影。<sup>①</sup>

<sup>①</sup> 金名：《吴语地区戏曲曲艺概况》，《民间文艺季刊》1987年第4期。

## 第三章 艺术

吴越地区独到的文化土壤以及吴越人的灵性与才气,创造了别具一格的艺术。那委婉淡远的音乐、轻柔翩跹的舞蹈、纤秣细腻的绘画和流美秀逸的书法,无不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呈现了较高的文化艺术品位。

---

### 第一节 音乐

---

秦汉以后,南朝五代时期,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吴越地区,各种音乐活动盛况空前,其中格调缠绵、韵质清纯且谐音双关的吴声歌曲,便成为该时期音乐艺术的主角,独领一代风骚。

伴随着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持续繁荣,吴越音乐又演化为多种艺术形式:源于浙东永嘉(今温州)一带的民歌曲子和以旋律“流畅婉转”、风格“轻峭柔远”著称的宋元南戏;似“细腻水磨,一字数转,清柔婉折,圆润流畅”而“听之最足荡人”的明清昆曲;出没瓦舍勾栏、街头巷尾“如春莺百啭,竭抑扬顿挫之妙”的“陶真”、“弹词”等说唱音乐;还有“始繁终促,嘈杂难辨”的“十番鼓”;柔媚清丽的越剧艺术;纯朴真挚的南方民歌小曲;优雅细腻的江南丝竹音乐等等。同时,颇负盛

名的还有江南地区古琴音乐的高度发展和古琴艺术流派的产生、竞争及他们的创作和演奏,由此可窥见吴越音乐艺术之繁茂。

琴是中国一种古老而富有民族特色的弹弦乐器,以其独特的音色、丰富多变的技法和极其宽广的表现力——尤其是擅长抒发峭洁清远、遗世独立的情感意蕴而为历代文人所钟爱。东汉时的《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最初可能是广陵地区(今扬州一带)的一首民间乐曲。大约在汉末三国之际,它已是一首有“曲”和“乱”的大型乐曲(三国·孙该:《琵琶赋》),同时也是琴的独奏曲。琴曲《广陵散》一直保存至今。《琴苑要录·止息序》指出:这首乐曲在表达“怨恨凄感”之时,曲调非常凄清轻脆,而在表现“拂郁慷慨”之处,又有“雷霆风雨”、“戈矛纵横”的气势。现存《广陵散》的音乐与这一评说也是相吻合的。南朝五代士族文人中善弹者不计其数,如戴逵、戴颙、宗炳、柳世隆、王敬则、王仲雄、柳恽、谢庄等<sup>①</sup>。我国现存记谱年代最早的一首古琴曲《幽兰》(又名《碣石调幽兰》),据谱前小序,知此曲是梁代会稽人丘明的传谱<sup>②</sup>。唐代琴家赵耶利曾认为《幽兰》“声带吴楚”,即它的旋律具有吴楚地方音乐的风格特征。这也说明隋唐时期,江南地区的古琴音乐艺术已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所谓“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延徐逝,有国土之风”。<sup>③</sup>

宋元明清之际,各种琴派异彩纷呈。北宋时,有京师(汴梁)、江西、两浙等琴派,其风格各不相同,当时琴家成玉铉评论说:“京师过于刚劲,江西失于轻浮,惟两浙质而不野,文而不史。”<sup>④</sup>浙派还汲取各琴家之所长,整理发展了大量传统作品并创作了许多新琴曲(史称“浙谱”),成为雄踞琴坛之首的主要流派。

① 徐孟东:《论吴越音乐文化的延续演变》,《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

② 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

③ 朱长文:《琴史》。

④ 成玉铉:《论琴》,后收入明蒋克谦所编《琴书大全》。

南宋后期浙派琴家的代表者是郭沔(字楚望),浙江永嘉人,创作有《潇湘水云》、《泛沧浪》、《秋风》、《步月》、《春雨》、《飞鸣吟》、《秋鸿》等著名琴曲。其中《潇湘水云》是他在南宋末年为避兵乱移居湖南衡山附近的小山村里所创作的,作者感慨时势,“一种愤怨悲切之情,逐拍伤心之慨,形诸指下”<sup>①</sup>,全曲“古音委婉,宽宏澹茂,轻音缓度,天趣盎然,……幽思深远”<sup>②</sup>,成为浙派经典性作品,明清时刊传此曲达50种以上,是最受欢迎的琴曲之一。

宋元时浙派著名的琴家还有郭沔的弟子刘志方,浙江天台人,作有《忘机曲》、《吴江吟》等曲;再传弟子毛逊,浙江三衢人,作有《樵歌》、《渔歌》、《山居吟》、《观光操》(又名《禹会涂山》)、《列子御风》、《广寒游》等曲;还有徐宇,浙江严陵人,作有《泽畔吟》等曲。

明代的琴派,前期有江派(松江)、浙派(又称之“徐门琴派”);明后期有虞山派、绍兴派等,尤其是明嘉靖万历年间的虞山派“独树一帜于海内”(《重修常昭合志·人物传》)。

虞山派以江苏虞山(常熟)而得名,其创始人为严澂(字道彻,号天池),他在家乡虞山与陈星源等琴家结成了“琴川琴社”,编印了《松弦馆琴谱》,还辑有《琴川谱汇》,一同流传海内。严澂倡导“清微淡远”的琴风,他琴艺的特点是音必当正律,清润悠扬,含蓄而不露,重音而轻辞,一任自然,这在当时迎合了文人士大夫的欣赏要求,因此,虞山琴派兴起后很快地成为独步明末琴坛的重要琴派。《松弦馆琴谱》也被誉为“古乐正宗”。

此派中的琴家还有沈音(字太韶),作有《洞天春晓》、《溪山秋月》、《凤翔霄汉》等琴曲。其中《洞天春晓》有一种“温舒广大”、“淡雅不群”之美。

① 《五知斋琴谱》中《胡笳十八拍》后记。

② 《大还阁琴谱》中《潇湘水云》后记。



不容忽略的虞山派另一位大师是徐上瀛(号青山),江苏太仓人,他吸纳众家之长,技艺高超,撰有《大还阁琴谱》(六卷),《万峰阁琴谱指法》(一卷)。此外,徐上瀛在琴学理论方面也卓有建树,他的《溪山琴况》(一卷)是较为全面而系统地论述琴的表演艺术的著作,该书对严徵“清微淡远”的审美观作了详尽的阐释,并认为只有兼备“和、静、清、远、古、澹、恬、逸、雅、丽、亮、采、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速”这二十四况,才是合乎理想的。这些都促进了琴学的发展。

清初虞山派的代表在常熟、苏州一带有徐上瀛的学生夏溥,在金陵(南京)则有庄臻凤等。而此时,在扬州又兴起一个以徐俊为首的新的琴派,称之为“广陵派”。徐俊是康熙雍正间的著名琴家,他的重要贡献在表演艺术以及传统琴曲的加工等方面。他所编的《五知斋琴谱》也被后代琴家所推崇。

清乾隆年间还有“新浙派”的崛起,主要以苏璟、戴源、曹尚纲等人为主,合编有《春草堂琴谱》,并著有《鼓琴八则》。此派风格清丽柔和,代表了江南的特色。

在近代,虞山琴派在江浙一带仍相当活跃。1937年,今虞琴社成立于苏州,入社者均为琴坛名流,并出版《今虞琴刊》,保留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近代较为注目的吴越音乐艺术除了上述的琴家、琴谱和流派之外,还有江南丝竹和琵琶。江南丝竹指流行于江苏南部、上海、浙江西部一带的器乐演奏形式,它以丝弦和竹管乐器相结合进行演奏,著名的乐曲有所谓“八大曲”之称,即《老三六》、《慢三六》、《中花六》、《慢六板》、《欢乐歌》、《元庆》、《四合如意》、《行街》等等。其曲调爽朗、节奏明快、细致含蓄,表现了江南地区人民的文化性格特点。

琵琶独奏自唐宋以来,一直在吴越民间流传,及至近代则涌现了不少流派,据《中国音乐史略》介绍,较著名的有:

华文彬传派。华文彬(1784—1859年),江苏无锡人。曾编有《南北二派秘本琵琶谱真传》(简称《华氏谱》)和牌子小曲《借云馆小唱》,刊行于1819年,是我国最早刊行的琵琶谱。曲谱中介绍了在他以前民间流行的琵琶大曲七套,小曲大十二套,并把指法分成右手指法和左手指法两大类,规定了指法符号。此后无锡的传派大都以《华氏谱》为依据。

平湖李祖棻传派。李氏生卒年不详,浙江平湖人。编有《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简称《李氏谱》),刊于1895年。李氏所传的曲谱,有几曲是《华氏谱》所没有的,在标记指法方面也较为细致。他的弟子有张子良、吴梦非、朱行菁等。吴梦非编有《怡怡室琵琶谱》(抄本)。

浦东派。江苏浦东地区一直有演奏琵琶的传统,近代则有著名演奏家陈子敬(1837—1891年),他的曲谱有1898年的传抄本。陈氏善于演奏《十面埋伏》、《霸王卸甲》、《平沙落雁》等曲。浦东派所传乐曲有沈浩初(1889—1953年)编的《养正轩琵琶谱》,刊行于1926年。乐谱前对所记的乐曲和浦东派演奏指法有较详的介绍,序言中还对《华氏谱》记谱的过于简朴和《李氏谱》的花指繁加有所评议。《养正轩琵琶谱》比这两谱更为详尽和准确。

上海汪昱庭派。汪昱庭(1872—1951年)的演奏兼取平湖派与浦东派之长,所传弟子也较多。《夕阳箫鼓》、《十面》、《卸甲》、《阳春古曲》、《月儿高》等是汪派经常演奏的曲目。

此外,还有崇明瀛州古调派,以1916年海门沈肇州编印刊行的《瀛州古调》曲谱为依据,其弟子有施颂伯、徐立孙等。浙江温州还有琵琶演奏家侯国器、潘老秉、张幼明及其弟子殷北海等,他们演奏的乐曲更为古老,多为各派刊行曲谱所未收,如《宋玉悲秋》、《琵琶行》、《滴水摆莲》等,均系大曲。

总之,江南地区众多的音乐艺术家、精彩纷呈的音乐流派以及真

知灼见的音乐理论,足以显示吴越音乐艺术的魅力。

---

## 第二节 舞 蹈

---

舞蹈造型的本身即是一种深刻的、富有内涵的文化表现。据史学家推断,最初的舞蹈是伴随着原始先民的生产劳动和精神生活而产生的,原始人甚至在产生语言及语言的符号之前就借助于手舞足蹈和人体动作来传递情感、沟通信息。河姆渡遗址中的骨哨、陶埙等乐器,则明显地有着娱乐的功用,依据乐舞同源说,新石器时代的吴越先民已出现用乐器伴奏的原始舞蹈活动。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积淀、形成了丰富多采的舞蹈艺术。

### (一) 含有宗教祭祀因素的巫舞和傩舞

巫舞最初主要是用于娱神和求雨,恰如汉郑玄在《诗谱》中所说:“巫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

古代的吴越之地巫风盛行,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云:“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春祭三江,秋祭五湖”,“立东郊以祭阳……立西郊以祭阴……祭陵山于会稽,祀水泽于江州。事鬼神二年,国不被灾。”<sup>①</sup>任昉的《述异记》有“越俗祭防风神……三人披发而舞”的记载,虽然叙述的是梁代时期越地的一次民间祭祀活动,舞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不详,但所祭的是防风神,所演奏的是防风古乐,舞蹈也应大体表现防风氏的有关内容,舞姿也应模仿传说中夏禹时代的形态动作,“披发而舞”透露出原始、狂野、粗犷的风韵。

汉魏南北朝之际,巫舞趋于技巧化和富有“魔幻”色彩。浙江海宁长安镇原觉王寺的一座画像石墓(年代属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中有

---

<sup>①</sup> 《吴越春秋》卷九《勾践阴谋外传》。

耍刀喷火的巫师施行幻术的形象,以及反映秦汉时期巫祝内容的“东海黄公”等舞蹈。武义桐琴果园还发掘到三国时期的五罐堆塑瓶,其上有巫师表演的形象。而文献方面,据《建康实录》载:东吴的孙皓为其父办丧事,借祭神的名义而观赏巫伎昼夜歌舞娱乐。可见巫舞既祭神又娱人。六朝巫风更是大盛,刘宋朝的几个皇帝都信巫教。浙江吴兴女巫严道育“自言通灵,能役使鬼物”(《宋书·二凶传》),并使宋文帝的长子刘劭和东阳公主深信不疑,在宫中日以继夜地歌舞咒诅<sup>①</sup>。而陈朝张贵妃“好厌魅之术,假鬼道以惑后主,置淫祀于宫中,聚诸妖巫,使之鼓舞”(《陈书·张贵妃传》)。居然以巫舞迷惑陈后主(陈叔宝)。这一时期产生的《神弦歌》即是江南(以建业为中心的一带地区)的巫觋祭神的歌舞曲,共有11曲,类似《楚辞》的《九歌》,舞蹈和场面的结构富有变化。还有著名的吴越古舞《白紵舞》,“最早可能是个民间舞,也许和巫舞还有些关系”<sup>②</sup>。晋歌诗描述该舞曾有“清歌徐舞降祇神,四座欢乐胡可陈”之词。总之,吴越的巫舞在六朝时期最为活跃。此后逐渐散落到民间歌舞中,或融入戏曲,或演化为地方上的民俗活动。

傩舞是驱疫赶鬼仪式中的舞蹈,是古老的假面舞。吴越地区傩舞的起源也是较早的,而盛行当推南宋时期。南宋偏安江南后,临安(杭州)的“瓦子”、“勾栏”中的舞蹈文化异常繁荣,其中许多舞蹈均含浓重的傩舞韵味。据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南宋时杭州在每年的十二月,“自此入月,街市有贫丐者三五人为一队,装神鬼、判官、钟馗、小妹等形,敲锣击鼓,沿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傩之意也。”而在每年的除夕之夜,则举行“大驱傩仪,并系皇城司诸班直,戴面具,著

① 《南史》卷十四《宋宗室诸王列传》。

② 彭松:《中国舞蹈史》(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

绣画杂色衣装,手执金枪、银戟、画木刀剑、五色龙凤、五色旗帜,以教乐所伶工装将军、符使、判官、钟馗、六丁、六甲、神兵、五方鬼使、灶君、土地、门户、神尉等神,自禁中动鼓吹,驱祟出东华门外,转龙池湾,谓之‘埋祟’而散”。显然,这纯粹是一种辟疫驱鬼(祟)的傩舞仪式。同时元宵节日出现在杭州街头的“舞队”中也有许多傩舞,如《抱锣装鬼》、《硬鬼》、《舞鲍老》、《舞判》等等。

《抱锣装鬼》,这是一种假面舞,还有喷火的特技。舞者扮作鬼神的模样,披发戴假面,口露獠牙,吐着烟火;穿着贴有金花的短衣和皂色裤,赤足,随身携带大铜锣绕场边敲边舞。《舞鲍老》很像是滑稽舞蹈,动作是模仿傀儡舞。但“假面假发,口吐狼牙烟火,如鬼神状”,这又似乎与傩舞相关联。而流行最广的傩舞是《舞判》或称《跳钟馗》,也叫《跳判官》,从宋代流传到明、清,乃至近代京剧《混元盒》、《乌盆计》都保留着《跳判》一场舞蹈。所谓《舞判》,《东京梦华录》曰:“又爆仗一声,有假面长髯,展裹绿袍靴筒,如钟馗像者,傍一人以小锣相招,和舞步,谓之《舞判》。”传说中的钟馗面貌丑陋,但在戏剧、舞蹈中,这个鬼神形象却深为人们所喜爱。在明、清,从元月初八开始,在杭州的大街小巷,还能看到三五成群的乞丐涂抹变形,化装成钟馗和小妹,跳起了《钟馗嫁妹》的舞蹈。其后还跟着神仙、判官等,敲锣打鼓,边叫边跳,驱赶疫鬼,俗称“跳驱傩”<sup>①</sup>。《清嘉录》曰:“(腊月)二十四日,丐者涂抹变形,装成男女鬼判,噉跳驱傩,索之利物,俗呼跳灶王。”吴曼云《江乡节物词》序称:“杭(州)俗跳灶王,丐者至,腊月下旬,涂粉墨于面,跳踉跄街市,以索钱米。”另外还有昆曲中的《钟馗嫁妹》、明杂剧中的《闹钟馗》、流传在江西的傩舞《判官醉酒》以及浙江至今保存完整的傩舞《跳魁星》(又名《魁星点斗》,是金华婺剧传统剧目《踏八仙》

<sup>①</sup> 杨子华:《南宋以来的杭州民间舞蹈》,中国吴越文化民间艺术研讨会论文,1993年6月,浙江慈溪。

中的一出)等等,可见,这种古老的舞蹈在吴越的民间和戏曲中都得以保存和流传。

## (二) 包孕图腾文化内涵的鸟形舞蹈

摹仿动物的神态也是原始舞蹈的形式之一。吴越之地首推鸟形意象的舞蹈,其肇始于文献多有记载的吴地古舞——《白鹤舞》。《越绝书》曰:“舞鹤吴市,杀生以送死。”而在后汉赵晔的《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记载得更为详尽:“吴王有女滕玉,因谋伐楚,与夫人及女会蒸鱼,王前尝半而与女,女怒曰:‘王食鱼辱我,不忘久生。’乃自杀。阖闾痛之,葬于国西阖门外。凿池积土,文石为椁,题凑为中,金鼎玉杯,银樽珠襦之宝,皆以送女。乃舞白鹤于吴市中,令万民随而观之,还使男女与鹤俱入羡门,因发机以掩之。杀生以送死,国人非之。”在唐陆广微的《吴地记》中则记录为:“其女化为白鹤,舞于吴市,千万人随观之。”另在《列女传》、《地志》、《太平寰宇记》、《吴郡志》、《桐桥倚棹录》、《吴郡图经续记》中均有类似的载录。这说明《白鹤舞》既是有关丧葬的祭祀舞蹈,也是一种化装舞,即摹拟鹤的形态动作而翩翩起舞,所展示的是一种鸟舞的形象。这也是化为白鹤的确切的含义,恰与文献及考古资料中有关“羽人”(“羽民”)的神话传说相契合<sup>①</sup>。至今江浙地区还流行《跳仙鹤》舞,以人扮成仙鹤形而翩然起舞。

《白鹤舞》包孕着图腾文化的内涵。鸟是古代吴越地区主要的图腾物,《鹤经》曰:“鹤,阳鸟也。”在江苏发掘的古文物中也有鹤鸟形象。如1985年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出土的铜盘、铜匜上有许多立鹤、飞鹤的纹饰<sup>②</sup>。因此,《白鹤舞》可以说是吴越先民图腾意识的一种艺术表现。

<sup>①</sup> 金水平:《羽人神话:鸟图腾崇拜的变异》,《中国民间文化》第1集,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

<sup>②</sup> 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文物》1987年第2期。

与《白鹤舞》相关,吴越还有几则展示鸟形意象的舞蹈,如《拂舞》中的《白符舞》(或曰《白鳧舞》)和《白纁舞》等等。

《拂舞》是执舞器“拂子”而舞的一种舞蹈,是江南吴地的民间舞<sup>①</sup>。《晋书·乐志》曰:“《拂舞》出自江左,旧云吴舞。检其歌,非吴辞也。亦陈于殿庭。”从《晋书·乐志》所列《拂舞》歌诗五篇来看,其一《白鸪篇》;其二《济济篇》;其三《独禄篇》;其四《碣石篇》;其五《淮南王篇》。就舞辞内容看,《济济》、《淮南王》为吴地实事,《独禄》、《碣石》为曹魏旧词,而“《白鸪篇》亦《白鳧舞》,以其歌且舞也”(《通志》)。因此,《晋书·乐志》曰“(晋)杨泓《拂舞序》云:‘自到江南,见《白符舞》或言《白鳧舞》,云有此数十年矣。察其辞旨,乃是吴人思孙皓虐政,思属晋也。’”细读《白鸪篇》辞,也只是以白鸪(白雀)为比兴,表达歌功颂德、怀恋君德、君惠之意而已。

在这些舞蹈中,影响最大的是《白纁舞》。据《古今乐录》(《初学记》卷十五引)说:《白纁舞》“起于吴孙皓时作”。《宋书·乐志》曰:“《白纁舞》,按《舞辞》有巾袍之言,纁本吴地所出,宜是吴舞也。晋俳歌云:‘皎皎白绪,节节为双。’吴音呼绪为纁,疑白绪即白纁也。”“纁”即是吴地的苧麻,用“白纁”制成舞蹈者的服饰,在当时称为“丽服”,既象征纯洁美好之意,又体现轻盈艳丽之趣。因此,《乐府解题》诠释说:“古词盛称舞者之美,宜及芳时为乐,其誉白纁曰:‘质如轻云色如银,制以为袍余作巾。袍以光躯巾拂尘。’”<sup>②</sup>

《白纁舞》真正的兴起是在西晋的永嘉南渡之后,当时政治中心的转移、经济的发展、南北乐舞文化的交流冲撞,使《白纁舞》的舞式和舞容得到了极为完善的充实。

晋、宋、齐、梁及隋、唐各代都有大量的《白纁舞歌辞》<sup>③</sup>,从这些

① 彭松:《中国舞蹈史》(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第102页。

②③ 《乐府诗集》卷五五、卷五六。

歌辞来看,《白纛舞》确是个优美的舞蹈,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同时,《白纛舞》对舞式及舞者的手、眼、身、步的表现都有严格的要求和规范,对中国舞蹈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六朝对《白纛舞》的舞式,已粗具独舞、双人舞、五人舞和群舞等多种样式。如《白纛舞》辞“娇怨独立特为谁”是独舞的神态;“将流将引双雁行”是双人舞的舞图;“俱动齐息不相违”是群舞时的情景。宋代龙辅的《女红余志》中有这样的记载:“沈约‘白纛歌’五章,舞用五女,中间起舞,四角各奏一曲,至‘翡翠群飞’以下,则合声奏之,梁尘俱动。舞已,则舞者独歌末曲以进酒。”这一乐舞表演的情景,已粗具大型乐舞之雏形。这也显示了《白纛舞》舞式的多样化。<sup>①</sup>

从《白纛舞》的舞辞中,可见其相当高的舞蹈技巧水平:第一,以手或手袖为容。“高举两手白鹤翔,宛若龙转乍低昂”,“仙仙徐动何盈盈,玉腕俱凝若云行,佳人举袖耀青娥,掺掺擢手映鲜罗”,“罗袂徐转红袖扬”,“珠履飒沓纨袖飞”,“扬眉转袖若雪飞”,“回眸转袖暗催弦”,“长袖拂面心自煎”。中国古代的乐舞历来注重手或手袖的姿态,故有所谓“长袖逶迤”、“长袖善舞”、“以手袖为容”之说,《白纛舞》的手舞或手袖舞,具有丰富的表现力。第二,以眉目传神。“凝停善睐容仪光”,“短歌流目未肯前,含笑一转私自怜”,“流目送笑不敢言”,“含情送意遂相亲”,“扬蛾为态谁目成”。这些描述说明舞者面部表情的多变,使眉目也配合舞蹈动作,起到了传情达意妩媚动人的功用。第三,以身躯表情。“轻躯徐起何洋洋”,“如推若引留且行”,“体如轻风动流波”,“妙声屡唱体轻飞”,“轻身起舞红烛前”,“将转未转恒如凝”。这些徐舞翩跹之姿,体现了在委婉曲折之中寻求动静和谐一致,表达了一种圆柔的动作风格。第四,以踏足为节。“趋步生姿进流芳”,“趋步明月舞瑶裳”,“舞女趁节体自轻”,“飞瑄促节舞少年”。舞

<sup>①</sup> 殷亚昭:《从〈白鹤舞〉到〈白纛舞〉》,《文史知识》1990年第11期。



步的趋缓徐转,节奏极为鲜明。第五,关于舞者的佩饰。“璧带金釭皆翡翠”,“垂珰散珮盈玉除”,“堕钗遗珮满中廷”,“躡珠履”,“珠履飒沓”。这些都显示了舞伎装饰的豪华奢侈。第六,关于《白纛舞》的伴奏。“情发金石媚笙簧”,“凝笳哀琴时相合”,“秦筝赵瑟挟笙竽”,“青娥弹瑟白纛舞”。可见《白纛舞》有多种乐器的合奏。因此,《白纛舞》标志着古代乐舞表演已成体系和粗具模式。

从《白鹤舞》到《白纛舞》,跨越了漫长的历史,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内蕴。鸟形舞蹈的意象,形成了清丽委婉、优美细腻的吴越舞蹈文化品格。而这一风格始终贯串于吴越舞蹈的发展和流变之中,可见吴越图腾乐舞文化的影响力之深远。

### (三) 富于地域色彩的民间舞蹈

据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就有民间舞女的出现。《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越王)乃使相者国中,得苧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毅,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所谓“容步”大体应是一种优雅舒缓的行走姿势,带有舞步的意趣。西施入馆娃宫后在为吴王献舞时,常率众宫女脚穿木屐,裙系小铃,在木板上跳舞。这一史实,明传奇《浣纱记》中曾加以渲染,同时明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录了这演出的场景:“西施歌舞,对舞者五人,长袖缓带,绕身若环,曾挠摩地,扶旋猗那(婀娜),弱如秋药,女官内侍,执扇葆璇盖、金莲、宝炬、纨扇、宫灯,二十余人。”

吴越民间歌舞的盛况,在浙江海宁长安镇画像石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其乐舞百戏场面大、种类多。南壁墓门东侧第二层表演的似是“鞞(鼙)舞”。画面表现的是一舞者挥动双臂及巾袖,正婆娑起舞;对面一人,右手执鞞鼓,为舞者作导引。南壁墓门西侧第四层刻的也是鞞舞。其上第一层有四人作舞的场面,一人持翟,余三人中有一左手执巾右手握羽扇而舞。这种舞蹈属文舞。东壁南侧第一层中间有一舞者,双手执长绸前后挥甩,双脚腾空跃起。其北侧两舞者,一人双

臂上举,身躯后仰,双腿作大劈叉;另一人和他对舞,双臂向左侧举,大体依步法的变化而前倾,左腿向前斜伸,右脚微曲。在绸舞的南侧,一人也侧身举臂踏足而舞。再南,还有一人在跳丸。第二层是百戏表演。其北是一组“七盘舞”。舞者身着窄袖舞衣,向左后方微仰,腾踏于盘上。北侧还有一人跪坐,左手似握一乐器,右手执锤,似正为舞者伴奏<sup>①</sup>。另外,汉代盛行的“总会仙倡”、“东海黄公”等故事情节的乐舞,在此墓中也有描绘。总之,海宁画像石刻画的舞蹈,题材丰富,场面宏大,表演者的神态栩栩如生(身姿依步法变化,随动势俯仰侧躬),显示了汉末吴越民间舞蹈的风貌。

西晋时,流传于长江下游的《吴声歌曲》中有《前溪》舞曲<sup>②</sup>。“前溪”系村名,在今浙江湖州德清南。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于竞《大唐传》:“今尚有数百家习音乐,江南声伎,多自此出,所谓舞出前溪者也。”“前溪歌舞”是依据前溪人西晋车骑将军沈充作《前溪曲》而创编的,这个舞自西晋流传至唐代。许多诗人加以吟咏赞美,陈朝刘删诗:“山边歌落山,池上舞前溪。”唐代诗人王维诗:“双舞前溪歌白纈,曲几书留小史家。”崔颢诗:“舞爱前溪妙,歌恋子夜长。”李群玉诗:“越艳罢前溪,吴姬停白苎”。由此可见在唐代《前溪舞》仍盛传不衰,并且保存了江南民间舞柔婉抒情的风格。

南宋时期的吴越民间舞蹈,在元宵灯节的“舞队”活动中得到了充分而集中的反映。《梦粱录》:“舞队自去岁冬至日,便呈行放。……姑以舞队言之,如清音、遏云、掉刀鲍老、胡女、刘袞、乔三教、乔迎酒、乔亲事、焦锤架儿、仕女、杵歌、诸国朝、竹马儿、村田乐、神鬼、十斋郎各社,不下数十。更有乔宅眷、汗龙船、踢灯鲍老、驰象社。……至十六夜收灯,舞队方散。”其欢歌狂舞的情景,宋周密《武林旧事》也有描

① 岳凤霞、刘兴珍:《浙江海宁长安镇画像石》,《文物》1984年第3期。

② 《乐府诗集》卷四五引《乐府解题》:“前溪,舞曲也。”

述：“诸舞队次第簇拥前后，连亘十余里，锦绣填委，箫鼓振作，耳目不暇给。”周密还罗列了舞队所演节目七十余，并叹道：“其品甚夥，不可悉数。”

在“舞队”活动中，有许多舞蹈富有江南地域特点和生活气息，且与吴越民俗民风相联结。《村田乐》是描写农家生活的民间舞蹈，表演时，舞者扮成江南水乡农民的模样，头戴笠帽，身披蓑衣，表现出田间耘作、浇水、放牛等动作。这种《村田乐》歌舞形式，后代有所承袭和发展，清代杭州元宵表演的《秧歌》乃是“南宋灯宵舞队之《村田乐》也”。此外，还有表演打夯或舂米的《杵歌》，反映龙舟竞渡和水乡划船的《划旱船》，表现民俗风情的《龙舞》（又称“龙灯”，主要有《草龙舞》和《蟠龙舞》、《扑蝴蝶》）以及依据民间故事、传说而创编的《耍和尚》（也称《大头和尚》）等等，这种“舞队”活动的群众性、娱乐性及广场艺术表演形式的特点，奠定了南宋以来江南“社火”民间舞蹈大会演的基础。

明清时期，江浙涌现许多民间舞蹈，如浙江青田《鱼灯舞》据传是明刘基以舞鱼灯的形式演习兵阵；温州《藤牌舞》乃明将戚继光为抗倭练兵所编；德清《扫蚕花地》是清时表现蚕乡民俗活动的民间舞蹈；《采茶舞》原为《采茶歌》、《采茶戏》，起源于明末清初的浙南括苍山区。还有太湖地区的《渔篮花鼓》、江阴东郭的《渔篮虾鼓》、苏州太仓的《矛子舞》、无锡宜兴的《男欢女喜》、无锡的《百鸟灯》等等，这些民间舞蹈均洋溢着地域文化的气息。

1949年后，吴越舞蹈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作品得到欢迎和首肯，如《采茶舞》、《织网舞》、《剑舞》、《丰收歌》、《二泉映月》、《高山流水》、《采桑晚归》、《担鲜藕》、《碧荷涟涟》、《乡柳》、《百叶龙》等等。尤其是在1993年，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的江苏、上海、浙江等分卷的编纂出版为代表，标志着吴越舞蹈艺术步入新的辉煌时期。

### 第三节 绘 画

从三国时的东吴至当代,江南旖旎的山水景致,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画家;吴越地区深厚的文化土壤,滋润出无数的艺术巨匠。尤其是南宋以后,经济发达而文风炽盛,画坛巨擘辈出。这不断涌现的一大批艺术大师既有师承,又不断创新和突破,形成了群星璀璨的局面。同时,宋元之后,或以画家的里籍,或以绘画旨趣及表现方法之类同,从而凝结成一定的群体(或称“画派”),如“元四家”、“明四家”、“浙派”、“吴派”、“松江画派”、“苏州四王”、“扬州八怪”等等,在画坛上造成了相当的冲击力,呈现出极为繁盛的态势。

据文献记载,吴门画家的始创者是三国时东吴的曹不兴(一作弗兴),吴兴人。南齐谢赫《古画品录》载,“吴时事孙”。曹氏擅长画人物、佛像和龙。传说他曾奉命为孙权画屏风,巧妙地利用误落的墨迹绘成一蝇,孙权竟举手弹之,方知为画。他的画迹,谢赫认为:“殆莫复传,唯秘阁之内,一龙而已。观其风骨,名岂虚成”(《古画品录》)。

继曹不兴之后的名画家是东晋的顾恺之,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他博学多才,能诗擅赋,精书法,尤工绘画,时人称“三绝”(才绝、画绝、痴绝)。顾氏绘画艺术的贡献和成就主要有四,其一是在宗教、史实、肖像等人物画方面,他特别是善于通过人物外形的描绘,进而表现人物的内在品格和精神气质。其二是实地观察自然,赋予山水画以写实手法,从而推进山水画的发展。其三是提出了“点睛传神”、“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等一系列绘画理论。其四是创立了“游丝描”的技法。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对顾氏的画法评论说“紧劲联绵,循环超忽,格调逸易,风趋电疾”。元代夏文彦称他的绘画“笔法如春蚕吐丝,初见甚平易,且形似时或有失,细视之,六法兼备,傅

染以浓色，微加点缀，不求晕饰”<sup>①</sup>。因此，顾氏的绘画艺术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晋书·顾恺之传》）的评价。在画史上，他与南朝的陆探微、张僧繇并称“六朝三杰”。

陆探微、张僧繇均系吴（今江苏苏州地区）人。他俩的特色是以书法入画，使书法与绘画相融合。陆氏师法顾恺之，作画周密，称为“密体”，但他是有所发展的，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说，陆探微在顾氏春蚕游丝线条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东汉张芝草书的体势运用于绘画，从而演变成为一种锐利挺拔、刚劲有力的线条，有“劲利如锥刀”之誉。而所绘人物“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凛凛，若对神明”（《历代名画记》卷六）。尤其是他创立了“一笔画”法，笔势连绵不断，整幅画一气呵成，令人叹为观止。谢赫在《古画品录》中称赞陆的绘画“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

张僧繇在绘画上，佛像、人物、肖像、风俗、花鸟无所不能，又擅画龙，民间还流传着他画龙不点睛、“点睛即飞去”的传说，可见其作品艺术形象的栩栩如生。张氏变顾、陆的“密体”画法为“笔不周而意周”的“疏体”。他还借鉴外来艺术的技法，运用晕染法来增加色彩的表现效果，使画中物像有“凹凸”的立体感。初唐的李嗣真高度推崇张僧繇的绘画，并说：“请于顾、陆同居上品。”（《历代名画记》卷七）

唐时，吴越绘画继续发展，吴郡（今江苏吴县）人张璪（或作藻）为杰出的代表。张氏工书画，尤精山水松石，其画作被誉为“满是生气，满是诗意”，唐人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称其“惟松树特出古今，能用笔法。尝以手握双管，一时齐下。一为生枝，一为枯枝。……生枝则润含春泽，枯枝则惨同秋色”。诗人元稹也认为：“张璪画古松，往往得神骨。”五代山水画家荆浩论唐山水画家时对张璪推崇备至，谓其“树石气韵俱盛，笔墨积微，真思卓然，不贵五采，旷古绝今，未之

<sup>①</sup> 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二。

有也”。

山水画经六朝顾恺之以后呈独立的趋势,在唐代已具有完整的形式,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山水之变,始于吴(道子),成于二李。”所谓“二李”即指扬州李思训、李昭道父子。李思训的山水作品是采用写实的手法而更具有传神的力量。明代曹昭认为:“(李思训)善画着色山水,笔法尖劲,……尝作金碧山水图障,笔格艳雅,有天然富贵气象。自成一家法。后人所画着色山水多宗师之。然至妙处,不可到也。”<sup>①</sup>至于李昭道的山水画,张彦远评论说:“变父之势,妙又过之。”可见他既继承了其父的青绿重彩法且更精细,又能有所创获。

中国山水画在五代至宋时分为南北两大流派,江南画派的开山祖正是董源。董氏的山水画取法自然,着力表现南方雾霭烟霞、峰峦出没、溪桥洲渚的风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sup>②</sup>。诸如《潇湘图》、《夏山图》、《夏景山口待渡图》、《龙宿郊民图》等,恰似米芾《画史》所说的“平淡天真”、“一片江南”。而其后南唐江宁(今南京)开元寺僧人巨然也工画山水,他“祖述董源”,善为烟岚气象与山川高旷之景。当然,巨然山水画的异常之处,“在于山头上的卵石,即米芾所说的‘瓣头’和破笔浓墨错落的苔点。水边的风蒲,屈曲的树木,山涧的奔流,这些都是不可混淆的巨然特征”<sup>③</sup>。基于董巨“平淡”、“趣高”而“奇绝”的风格,因此,在山水画上有“董巨”并称之为誉,同时对后世江南的山水画影响深远。

宋代,江南善写山水人物的画家有刘松年、马远、夏圭,均为钱塘(杭州)人,也是南宋院体画的代表。刘氏的作品“色新法健,不工不

① 曹昭:《格古要论》,转引自李裕:《中国美术史纲》下卷,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130页。

② 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七。

③ 谢稚柳:《董源、巨然与江南画》,《上海博物馆集刊》(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页。

简，草草而成，多有笔趣”（吴其贞：《书画记》）；马远的山水，多不着色，以深远意境取胜；而夏圭画山水好用秃笔，“笔法苍老，墨汁淋漓”，显示出雄浑与写实的功力。

元代画家大多为文人。元初以赵孟頫的影响最大。赵氏原本宋宗室，南渡后，其祖先世居吴兴（湖州），故赵孟頫为湖州人。赵氏多才多艺，但最能显名于世的当推书法和绘画。《元史·赵孟頫传》：“其画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尤精致。”欧阳玄在《魏国赵文敏公神道碑》中认为：“公……画入逸品，高者诣神，四方贵游及方外士远而天竺、日本诸外国咸知宝藏公翰墨为贵。”赵孟頫的绘画作品，既具有唐或北宋人的传统之情致，即他所倡导的富有“古意”的作品，如《人骑图》、《秋郊饮马图》、《洞庭东山图》等，同时，在传统的基点上又有独创性。如以《鹊华秋色图》、《水村图》来表达自由放逸的旨趣。具体体现在：一是以水村山野为题材，描绘出和平宁静的境界；二是充分运用水墨的调子，使艺术表现向平淡清逸发展；三是以渴笔画法，发展宋人的皴染<sup>①</sup>，在技巧上，为当时及后世的山水画，开拓了新的路子。这正是赵孟頫既着力于传统，又有功于文人画之处，使他成为画坛巨匠。

元代的绘画深受文人画思潮的影响，山水画特别兴盛，并达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最能代表这一时期山水画风貌的是“元四家”。黄公望（字子久，号一峰，又号大痴），常熟人。他在山水画上“师董源。晚年变其法，自成一家。山顶多岩石，自有一种风度”（夏文彦：《图绘宝鉴》）。明张丑的《清河书画舫》也评价道：“大痴画格有二，一种作浅绛色者，山头多岩石，笔势雄伟，一种作水墨者，皴纹极少，笔意尤为简远。”因此，他的苍秀雅逸的“浅绛”山水画风，被明清文人画家奉为典范而极力仿效。他的作品，见于著录的约六十余件，在传世画迹中，确切可信的约十余件，如《富春山居图》等便是其代表作。倪瓒（字元镇，

<sup>①</sup> 王伯敏主编：《中国美术通史》第五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号云林子),无锡人。他的作品意境清幽萧疏。如他的《渔庄秋霁图》、《汀树遥岑图》等描写了深秋的山峦湖泊,营造了一种清空凝静的意境。王蒙(字叔明),吴兴人,系赵孟頫外孙。他的绘画,既“秀润清秀”,又“纵逸多姿”。如他的《青卞隐居图》,董其昌誉为“天下第一”。吴镇(字仲圭),浙江嘉兴人。他的画法有两个特点,其一注重用笔,以秃笔中锋勾勒树石,笔力雄劲,苍古沉郁;其二是多用湿墨。关于“元四家”各自的山水画风格,明清人有不少评说。如说黄画山头多髻头,余三家便不是如此。又如说王画为密体,倪画为疏体。更如董其昌所说:“吴仲圭大有神气,黄子久特妙风格,王叔明奄有前规,云林古淡天真”等等,这些评论,说明了“元四家”既师法董巨,又从自然和生活中汲取灵感,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

除了山水画之外,元代的画家还有一突出的特点,即充分运用水墨来画花鸟。其墨花(梅、竹)墨禽,显得清淡秀逸、墨趣天成。就吴越地区而言,主要的代表者有:陈琳、王渊、张中、王冕、陈立善、吴大素、竹庄、管道昇(赵孟頫妻)、柯九思、顾安等等。这种“不施采而纯以墨色”的绘画表现方法,既使元代的花鸟画别具一格,又体现了士大夫崇尚自然、不假雕饰的审美情趣。

明代江南的绘画,更是一片繁盛气象。据陶元藻《越画见闻》载,仅浙江绍兴就有明代画家 52 人。鱼翼所撰《海虞画苑略》及《孙遗》一卷共收明清画家 391 人。汪蘊《扬州画苑录》共收画家 519 人。而明代又是画派丛生之际,不仅有“院体画派”、“浙派”、“吴派”之别,而且据统计明末清初的派别达 26 个之多。<sup>①</sup>

浙派系由南宋院体派脱胎而出。浙派之说,始见于董其昌《容台集·画旨》:“国朝名士,仅戴进为武林(杭州)人,方有浙派之目。”戴进的一生遭遇坎坷,但从未中断过绘画创作,山水、人物、花卉翎毛,

<sup>①</sup> 李浴:《中国美术史纲》下卷,第 731—732 页。



无不精湛。在山水画上,他既对前代诸大师的艺术有过刻苦的研习,又“妙处多自发之”。如《风雨归舟轴》、《洞天问道图轴》、《春山积翠图轴》均能“变南宋浑厚沉郁之趣,成健拔劲锐一体”。王世贞称其“我朝最高手”、“国朝第一”;董其昌也认为“国朝画史,以戴文进为一家”。简言之,以戴进为首的浙派画家,在笔墨上多崇尚马远、夏圭,作山水多用斧劈皴,行笔有顿跌,铺叙远近,疏豁虚明,使水墨画法变得更加雄浑壮观。

而吴派的代表者是“吴门画派”和“松江派”。明代前期,当统治者提倡南宋院画、浙派风靡之际,苏州、无锡等地一些画家继承董、巨及“元四家”的传统而分庭抗礼。到了明中期沈周、文徵明,逐渐形成新的山水画派。苏州古称吴门,前人言吴门画派,即以沈周为开山祖。他长于山水,也画水墨花鸟和杂画。在山水画上,刻苦研习“元四家”,基本是以吴镇为主兼及王蒙和黄公望。其章法有气势,笔力苍老、雄健、凝重、生辣、粗率,用墨圆润。他的画有粗笔和细笔两种,名之“粗沈”和“细沈”。《湖山佳趣图卷》、《雨意图轴》、《秋林话旧图轴》等,为粗笔中之佳品;而《庐山高图轴》、《两江名胜图册》乃“细沈”中至精之作。沈周的家族中有继承他的画风者,他的学生也很多,然能自成一家的,是文徵明(初名璧,后以字行,更字徵仲)。他的山水,多作细笔画,如《兰亭修禊图卷》、《万壑争流图轴》、《石湖清生图卷》、《绿阴长话图轴》等“得意之笔,往往以工致胜”。也有人认为文徵明的作品文雅秀逸有余,淋漓磅礴不足。值得一提是文氏家族中传文徵明画风的,绵延到清代,见于著录者达三十余人,形成阵容庞大的书画世家。他的学生和学他画风而见于著录者则更多,在画史上可谓空前。与沈、文并称为“吴门四大家”的另两位画家是唐寅和仇英。唐寅(字子畏,一字伯虎),吴县(今属江苏)人。初学画于周臣,多取法南宋院画,且重视自然造化,作品富有生活气息。明韩昂《图绘宝鉴续纂》说:“唐寅山水、人物,无不臻妙,虽得刘松年、李希古之皴法,其笔姿秀雅,青于蓝

也。”《清河书画舫》也认为“枯木小帧，全师李成笔意，清逸秀美，当为子畏绝品”。如《看泉听风图轴》、《山路松声轴》、《落霞孤鹜轴》等等，自成秀润、缜密、流丽的风格。而仇英，江苏太仓人，后移居苏州。传为漆工出身。他的人物画，纤细巧密，精丽艳逸，与吴门画派在表现形式上迥然不同；他的山水画发展了宋代院体的“青绿工整”，常见的是细润而风骨劲峭的青绿之作<sup>①</sup>。代表作品有《玉洞仙源图轴》、《莲溪渔隐图轴》、《剑阁图轴》、《桃源仙境图轴》、《园林清课图轴》等。总之，“吴门四家”以其特有的风格在明代画坛上独树一帜，主要表现在不为当时山水画趋向形式主义的风尚所限，敢于上追唐、宋名作，在画法上有所发展和创新。

自明万历以后，江南画坛的盛势转至松江，崛起以董其昌为首的“松江画派”。董其昌，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史·文苑传》说他的画“集宋元诸家之长，行以己意，潇洒生动，非人力所及也”。他强调画面的温润、柔和、含蓄，讲究笔致墨韵。主要作品有《升山图卷》、《遥峰泼翠图轴》、《夏木垂荫图轴》等。此外，松江派的其他主要成员有：陈继儒、莫是龙、赵左、沈士充、顾正谊等。

在明中期以后的花鸟画中，徐渭的水墨大写意，对后世影响极大。他的作品不拘于物象，“不求形似求生韵”；笔简有力，势如急风骤雨，有时还以泼墨为之，追求水墨淋漓的效果。

明末越地还有一位影响较大的画家——陈洪绶（字章侯，号老莲），浙江诸暨人。他工人物、花鸟、山水，风格雄奇，然最为时人所推重的是他的人物画。在他的人物画作品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线条的运用：中年的作品线条略具粗壮，方折有力，如《女仙图轴》；晚年的作品线条清圆细劲，凝练沉着，如《笼鹅图轴》。其人物造型夸张变形，古拙中见俊美，设色清淡，背景简洁，有浓厚装饰味。

<sup>①</sup> 《中国美术通史》第五卷，第329页。

董其昌“松江派”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清初,代表者为苏州“四王”——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翬。王时敏的山水,笔墨圆润醇厚,风格苍秀,然丘壑缺少变化,多模拟之作。王鉴的山水,多摹拟宋元,“精通画理,摹古尤长,凡四朝名绘,见辄临摹,务肖其神而后已”<sup>①</sup>。作品风格沉雄古厚。王原祁的山水喜用干笔焦墨,层层皴擦;设色长于浅绛,其重彩之处,青绿朱赭;具有“熟不甜,生而涩,淡而厚,实而清”的艺术特色。功力颇深,惟丘壑缺乏变化。王翬师承之广及艺术功力之深,为其他“三王”所不及。作品虽多仿古,但能把临古与写景相结合,有一定的生活气息与感受。风格清丽深秀。总之,“四王”的山水画,成为有清一代的正统。至清中叶,分为两派,尊王原祁的称“娄东派”,宗王翬的为“虞山派”,两派从学者甚众,一直统治画坛到清中晚期。

与“四王”合称为“清六家”的另两人是吴历和恽寿平。吴历,江苏常熟人。他的作品,除一部分仿古外,不少是在写生基础上的创作,虽创造性不很大,但比起“四王”却有些新意。恽寿平(初名格,字寿平,后以字行),江苏武进人。他的山水画,笔墨洒脱秀峭,得元人之致。但影响更大的是他的花鸟画,他的“没骨”花卉画被视为花鸟正宗。他绘花卉,极重视写生,概不用勾勒细线,在准确造型的基础上,以色染水晕来丰富“没骨”花卉的自然表现,开创了一代新画风。学他的画法者甚众,如缪椿、马元驭、范廷镇、恽冰等,总计不下四五十人。故有“常州派”或“恽派”之称。

明末清初,在南京地区聚集了一大批画家。龚贤《题程正揆山水册》云:“今日画家以江南盛,江南十四郡以首郡(南京)为盛,郡中著名者数十辈,但能吮笔者奚啻千人……”这中间有“金陵八家”之说。尽管关于“金陵八家”有三类说法(9种记载),涉及12人,然其中最

<sup>①</sup> 张庚:《国朝画征录》卷上。

值得称道的是龚贤(字半千,号柴丈人),原籍江苏昆山,迁居南京。龚贤山水画的艺术特点主要有:其一,善于中锋运笔。一般中锋运笔不如侧锋变化多样,但龚贤则认为:“笔墨中锋为第一,惟中锋可以学大家,若偏锋则不能见重于当代,况传后乎?”(《柴丈人画说》)其二,喜用“积墨法”。龚贤在继承宋人“积墨法”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实践又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用墨法,“一遍点,二遍加,三遍皴,使歇了,待干又加浓点,又加淡点一道”(《柴丈人画说》)。通过这般层层点染皴擦,使画面薄中透厚,厚重之中又见丰富活泼的层次变化。其三,黑白对比分明。龚贤的山水画,山峦树石常以墨色层层点染,显得浓润而厚重;河湖、云气、飞瀑则留出空白,以表现清新白洁和运动之感。其四,画面注重“光线感觉”。在龚贤的作品中已体现这方面的追求,如以光的照耀来决定墨的色调的浓淡变化。总之,龚贤以独特的画风傲然于世,在中国绘画史上应占有重要的地位。

清代的绘画,以花鸟画最为发达。除了恽寿平与“常州派”外,还有“扬州画派”,其中表现出与当时宫廷派和正统派画风相左的,是所谓的“扬州八怪”。“八怪”的具体人物说法不一,大约有六说,累计达15人之多。一般采用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所说的罗聘、李方膺、李蝉、金农、黄慎、郑燮、高翔、汪士慎8人。名之为“怪”,主要表现在他们借笔墨诗跋与正统派唱反调。当时画坛流行的是以摹仿古人为能事的绘画,言必称“荆关”,画必“董巨”。而异军突起的“扬州八怪”追求以造化为师,在作画上自立门庭,推崇新奇真实的意境,讲究泼辣奔放的笔墨,给画坛带来了一派生机。因此,在当时,“八怪”是贬斥之词,而到近现代,“八怪”的地位才有了提高,“怪”意味着创新精神。

“八怪”中影响较大者为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他的绘画以兰、竹、石为主要描绘对象,其次是松、菊、梅等,曾自谓:“板桥专画兰竹五十余年,不画他物”(《板桥题画·靳秋田索画》)。他的

墨竹,笔、墨、水的巧妙运用,“忽焉而淡,忽焉而浓”,浓淡相宜,干湿并兼;其竹竿是“见繁削尽留清瘦”。名曰:“细竹”;其枝叶颇简,显示竹子的“劲节”。他的兰花,一反以往画家所画的叶较细长、有憔悴之感的庭园盆中之兰,多写“极富而劲”的山中之兰。他画石,强调骨法用笔,寥寥数笔,便勾出坚硬的山石轮廓,显示了疏朗劲峭的风貌。

清末,江南花鸟绘画名家有赵之琛、张熊、任熊、任薰、任颐、赵之谦、吴昌硕等。任颐(1840—1896年),初名润,字小楼,后改字伯年,浙江绍兴人。他擅长人物和花鸟画。有论者认为:诗的意境和音乐节奏感的构图,是构成任伯年花鸟创作的两大特色<sup>①</sup>。他的主要作品有《白头牡丹图轴》、《孔雀图轴》、《天竹白头图轴》、《幽鸣春图轴》等。赵之谦(1829—1884年),浙江绍兴人。他是清末中国画坛上一位杰出的写意花卉画家。他将花卉的题材扩大到日常生活的瓜果蔬菜(后成为近代花卉画家经常描绘的对象);在花卉构图上,最善于运用力的平衡规律;在笔墨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书法的笔来表现绘画的各种形体,充分发挥线条的艺术效果;在花卉画的色彩上,喜用浓艳明朗、对比强烈的色彩,因而在画面上,气势逼人。这在近代花鸟画的色彩上,开拓了新的程式。吴昌硕(1844—1927年),原名俊、俊卿,字昌硕、仓石,别号缶庐、苦铁等,70岁后以字行,浙江安吉人。他的绘画以极简练之笔墨表现深邃的意境,气魄厚重,风格雄健泼辣、气势磅礴。其绘画的特点是运用书法,尤其是篆体与刻印手法入画,成为具有金石味的写意花鸟画家。有论者认为文人画至吴昌硕而至极,可见其成就之高与影响之深。

现代江南著名画家有黄宾虹、徐悲鸿、潘天寿、刘海粟等。

黄宾虹(1865—1955年),名质,字朴存,号滨虹,予向,中年更号

<sup>①</sup> 蔡若虹:《读书札记》,载龚产兴编著的《任伯年研究》,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宾虹。原籍安徽歙县，出生浙江金华。他在绘画上最突出的成就是山水画，“黑、密、厚、重”是其独特的风格。也作花鸟画，奇崛而有致。徐悲鸿（1895—1953年），江苏宜兴人。擅长油画、中国画，精素描，风格简练明快，富有生气，尤以画马而驰誉中外。潘天寿（1897—1971年），原名天授，字大颐，号寿者，浙江宁海人。他的绘画不仅笔墨苍古、凝练老辣，而且大气磅礴、雄浑奇崛，同时，又充盈着强悍有力的现代意识。他的绘画既是诗书画印交融的传统中国画的一个总结，又是对旧时代传统中国画的超越。此外，潘天寿还从事中国画教学达半个世纪之久，是现代中国画教学奠基人之一。画作收编成辑的主要有《潘天寿画集》、《潘天寿画选》、《潘天寿画辑》、《潘天寿书画集》等。刘海粟（1896—1994年），名槃，字季芳，后自号海粟，江苏武进人。他是中国的杰出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为中国近代美术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擅长中西绘画，精工山水、花鸟，尤爱画黄山，以大量的作品来描绘黄山绝秀危奇之壮美，其绘画风格阔大奇肆，呈现出大与力的美。

综上所述，吴越地区的绘画，无论是在画家数量之多、大师巨匠辈出方面，抑或在丰富多采的内容题材、精湛奇妙的艺术技巧上，都为中国绘画艺术史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

## 第四节 书 法

---

吴越书艺能直指姓名的第一位书法家是三国时期吴国的皇象，广陵江都（今扬州）人。他幼小工书，尤善章草、八分，相传章草《急就章》为其书。另外，《天发神讖碑》（又名《天玺纪功颂》）也相传为皇象所书，该碑立于吴天玺元年（276年），碑在江苏江宁岩山。清张廷济云：“吴《天玺纪功碑》雄奇变化，沉着痛快，如折古刀，如断古钗，为两

汉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迹”(《清仪阁题跋》)。康有为称之为“篆隶之极”。

与此同时的另一块吴碑是《禅国山碑》，碑在江苏宜兴张朱镇西南董山，为圆幢形，俗名“囿碑”。传为苏建书。其风格朴质浑厚，圆转丰腴。这两块碑非篆非隶，均为篆书的变体。

我国现存书法家真迹中，年代最早的一件珍贵书品是西晋陆机的《平复帖》。陆机，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陆氏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且工书法，善行草，尤擅章草。他的墨迹草书《平复帖》，明代书法鉴赏家张丑曾评论说：“《平复帖》最奇古，……笔法圆浑，正如太羹玄酒，断非中古所能下手。”董其昌也跋云：“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代宝”(《清河书画舫》)。

皇象和陆机的风格质朴，可谓吴越书风的萌芽时期。及至东晋，二王的出现和崛起，使吴越书风由古质浑朴一变为妍美秀逸，从而开辟了书法艺术的新境界。

王羲之(字逸少)，原籍山东临沂。曾入仕为官，直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又称王会稽)。辞官后，定居山阴(今浙江绍兴)，晚年隐居，卒葬于浙江嵊县金庭。因此，王氏虽不出身在吴越，但长期生活在吴越文化区内，寄情于明山秀水之间，深受江南风土人情的濡染，这在陶弘景《论书启》中就曾有阐述，王羲之自吴兴以前，诸书尤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可见吴越文化风物滋润了王羲之秀逸的书风，也钟毓了吴越书法崇尚王派书系的特点。

有天下第一行书美誉的《兰亭序》，便是王羲之在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与友人在会稽兰亭临山流觞、酒酣兴逸时所书，被称为“道媚劲健，绝代所无”。《兰亭序》的真迹，后为唐太宗所得，并殉葬昭陵。幸有唐人的摹本。其中以冯承素的勾摹最忠实于原作。

王羲之的书法虽既有家学渊源，又能吸纳众家之长，草书多取于

张芝,真书得力于钟繇,并精研笔法体势,开创了遒媚流便的行书与今草,“兼撮众法,备成一家”(马宗霍:《书林藻鉴》),被奉为“书圣”。对他的书法,历来评价甚高。《晋书·王羲之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流云矫若惊龙。”梁武帝《古今书评》曰:“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唐太宗在《晋书·王羲之传》后对他的书法赞不绝口,并喟叹道:“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

与王羲之齐名而并称“二王”的是他的第七子——王献之(字子敬),他自幼学书于父,又能“改变制度,别创其法”,故有“破体”之说,即打破楷、草之界限,形成了亦楷亦草的“新体”行草,这种字体,既保留楷书的工稳,又兼有草书的流畅,所以《文章志》云:“献之变右军法为今体,字画秀媚妙绝时伦。”此外,王献之在草书上,具有连绵不断“一笔书”的风格。米芾《书史》在评论王献之《十二月帖》时说:“运笔如火筋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历代对王献之的评价,褒贬不一。然既并称“二王”,理应各有所长,两人为中国书坛的双星巨子,彼此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以王氏为代表的秀逸书风,不仅在整個中国书法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也奠定了吴越书法风韵的基调,代有传人,亘古不绝。东晋时,王氏一门有数十人,均善书,风气之盛,古今莫二。南朝宋时,有会稽山阴人孔琳之,其书法“天然绝逸,极有笔力”(王僧虔:《论书》)。南朝梁时,有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陶弘景,其“书师钟、王,采其气骨”(张怀瓘:《书断》卷下),《隐居本起录》云:“别作一家,骨体遒媚。”《宣和书谱》认为其书法“骨力不至,而逸气有余”。同时代还有晋陵郡(今江苏常州)人萧子云,他的“小篆飞白,意趣飘然”(《书断》卷中)。凡此均体现了二王的书风。而陈、隋间的智永和尚则是传递二王笔法至唐朝的关键人物。智永,会稽人,王羲之七代孙。他长期居吴兴永欣寺,人称“永禅师”。相传曾临写真草《千字文》八百本,凡



浙东诸寺各施一本。其书风格守家法,清代何绍基曾说:“右军书派,自大令已失真传,……至于楷法精详,笔笔正锋,亭亭孤秀,……唯有智师而已。”此外,智永还深研楷势,厘定八法(“永字八法”),既传递了王派笔法,又为唐代楷书的定型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唐朝初年的书坛,也为王羲之的书风所左右。唐太宗是推崇王羲之书法的第一位帝王,近人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说:“唐初太宗笃好右军之书,亲为晋书本传作赞。”他命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等人摹《兰亭序》,赐给朝中显贵以为恩赏。上行而下效,由此引起当时海内文人竞相学之。初唐大书法家很多,佼佼者是“初唐四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其中虞、褚皆为吴越人。虞世南,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早年曾学书于智永,“妙得其体”,并由此而上溯王羲之,“继承二王小楷书的风格,又开创了更为接近晋人楷书的‘唐楷’——虞体楷书最是唐人时代风格的代表作。”<sup>①</sup>其笔致可谓外柔内刚,圆润冲和,遒劲妍丽,以韵取胜。褚遂良,钱塘(今杭州)人。因其父褚亮与虞世南同为太宗时文学馆学士,少时学书于虞,“长则祖述右军”(《书断》),并融会魏晋隶书和隋唐正楷,书风疏瘦劲炼,丰艳流采。米芾《褚临兰亭序跋》称之“百代之秀规,一时之清鉴”。黄庭坚认为“豪劲清润”,王世贞称“其一钩一捺有千钧之力,虽外拓取姿,而中厚有法”。此外,得王羲之笔法的还有陆柬之和孙过庭。陆柬之,吴郡(今江苏苏州)人。他的行楷飘逸和畅,草书笔意古雅,项穆《书法雅言》称陆书《兰亭诗》“无一笔不出右军”。孙过庭,自署吴郡人,一说富阳(今浙江富阳)人,一说陈留(今河南开封)人。作品以行草名世。孙氏草书全是二王之法。米芾《书史》云:“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乃过庭法。凡世称右军书有此等字,皆孙笔也。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由此可见孙过庭守二王之笔法而力求有

<sup>①</sup> 陈云君:《中国书法史论》,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页。

所变化。他又是一位书法理论家,著作《书谱》(二卷),是我国书法史上第一部书文并茂的重要论著。

此时能“出入”二王之法的书法家是李邕,广陵江都(今扬州)人。曾任北海太守,世称“李北海”。《宣和书谱》称:“精于翰墨,行草之名尤著,初学右军行法,既得其妙,复乃摆脱旧习,笔力一新。李阳冰谓之书中仙手。”李邕是学二王而又不一味守成,力图有所变通。董其昌说:“右军如龙,北海如象。”这也说明了他们书风的差异。对李氏的求变之举,后人也颇有微词,李后主评曰:“得右军之气,而失于体格”;米芾说:“如乍富小民,举动强倔,礼节生疏。”尽管如此,李邕书法具有高超的艺术,他的用笔雄健,“干将莫邪,难与争锋”。尤其是他开创了大字“行楷”,外见舒展放纵,内寓遒劲收敛,犹如“华岳三峰,黄河一曲”。

上述的一些书家书法虽因个性不一而面貌略异,但由于“不偏山阴家法”(包世臣:《艺舟双楫》),终未能超越王派书风,均以温文蕴藉、中和秀逸为旨归。此时既承袭王派书风而又突破秀逸风格的是张旭,吴郡人。其性格狂放不羁,好嗜酒,与李白等为“酒中八仙”。据《新唐书》记载:“(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这似乎为张旭的“狂草”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其实,他酒酣之际的狂走颠笔,是“技法极为成熟以后的‘神境’”。这种出神入化的境界,是建立在坚实的书法功底之上。张旭不仅有楷书传世(如《郎官石记》),而且在草书上也受王羲之草书的影响。黄庭坚曾认为:“张长史行草与王子敬不甚相远,其书极端正,字字入古法,人闻张颠之名,不知是何种语,故每见猖獗之书,辄归之长史耳。”同时,张旭的狂草富有创新之意,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灵感,他自言:“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倡公孙舞剑器,得其神”(《新唐书·张旭传》)。张旭又兼之以笔墨愤泄胸中积郁之气,使草书独具颠狂新奇之趣。张旭也被誉称“草圣”。传世

的书迹有《古诗四帖》、《千字文》、《肚痛帖》等。

宋人书法一变晋唐面目，弃王羲之笔法而追踪颜真卿。所以，“二王这一系统的笔法在宋朝受了挫，到元朝才又恢复。这一恢复的力量几乎是赵孟頫一个人的力量”<sup>①</sup>。《元史·赵孟頫传》称他：“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天竺（印度）有僧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书林藻鉴》亦曰：“元之有赵吴兴，亦犹晋之右军（王羲之）、唐之鲁公（颜真卿），皆所谓主盟坛坫者。”赵氏的书艺特点为尚古尊帖，他不仅力追二王，并且力追远古，对古篆及隶书、章草无不刻苦学习。元人虞集说他：“楷法深得《洛神赋》而揽其标，行书诣《圣教序》而入其室，至于草书饱十七帖而变其形，可谓书之兼学力天资精奥神化而不可及矣。”赵孟頫勤于临习，善于师从，敏于领悟，博学众家而又能融会贯通，兼之他特有的舒长柔和的撇捺，饱满婷立的横竖，洒脱自然的钩点，稳健生动的笔姿，从而创立了俊逸典雅的“赵体”楷书，成为中国楷书“四体”之一，与“欧（阳询）体”、“颜（真卿）体”、“柳（公权）体”相提并论。元朝卢熊曾对赵氏书法艺术作了言简意赅的概括：“本朝赵魏公识趣高远，跨越古人，根柢钟王，而出入晋唐，不为近代习尚所窘束，海内书法，为之一变，后进咸宗师之。”

元代的书法，在吴越地区最具特色的是文人画家书法，如杨维桢、柯九思、倪瓒、王蒙、黄公望等。他们既是画家又是书家，“书画互相浸润，遂使书入画、画入书，形成了我国书法史上的最清空、灵透的书法。”<sup>②</sup>

有明一代，崇尚帖学。明初书坛有“三宋”之说，其中宋克、宋璘、均为吴越人。宋克，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擅长章草，在明代吴越书

<sup>①</sup> 潘伯鹰：《中国书法简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29—130页。

<sup>②</sup> 陈云君：《中国书法史论》，第206页。

风中别开一格,开松江华亭“二沈”书派之先河。宋璩,浙江金华人。他致力篆隶且以篆隶笔法入草书,作品显示出华丽典雅的特征。明高皇帝曾说:“小宋(璩)字画遒媚,如美女簪花。”明陶宗仪在《书史会要》称:“璩大小二篆纯熟姿媚,行书亦有气韵。”此外,明初承赵孟頫书法衣钵且能乱真的是钱塘(今杭州)的俞和,陈善的《杭州志》云:“(俞和)早年得见赵文敏运笔之法,临晋唐诸帖甚夥,行草逼真文敏,好事者得其书,每用赵款识,仓卒莫能辨。”

明朝书画评论家王世贞曾说过:“天下书法归吾吴,而京兆祝允明为早,文待诏徵明、王贡士宠次之”(《艺苑卮言》)。今人启功也认为:“华亭二沈之风始衰,吴门书法继起,祝氏适当其会,遂有明代第一之目。”<sup>①</sup> 这些评语概括了明中后期吴越地区两个著名的书派,其一是松江华亭地区的以二沈和董其昌为代表的“松江书派”;其二是苏州地区以祝允明、文徵明、王宠为代表的“吴门书派”。他们都近承元朝大书法家赵孟頫,远溯晋唐二王书法源流,成为清朝碑学书派兴起之前传统帖学的又一个兴盛时期。

被书坛誉为“吴中三子”的祝允明、文徵明和王宠,号称明朝书法的中兴之臣。《明史·文苑传》称祝允明:“五岁作径尺字……尤工书法,名动海内。”祝氏的书法,遍临魏晋以来诸大家,真、行、草均精益求精之,兼有吴地书风平和清逸及狂放颠逸的风格。文徵明的书法以小楷最为精妙,淡雅隽秀;而行、草书,遒劲婉丽,颇得智永笔意;大字仿黄庭坚,略见奇崛。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曾有全面的评述:“待诏以小楷名海内,其所沾沾隶耳。独篆笔不轻为人下,然亦自入能品;所书《千文》四体,楷书绝精工,有《黄庭》、《遗教》笔意;行体苍润,可称玉版《圣教》;隶书亦妙得《受禅》三昧;篆书斤斤阳冰门风,而皆有小法,可宝也。”王宠的书法比祝、文更为专门,兼之人品高雅旷达,其作品

<sup>①</sup> 《启功丛稿·题祝枝山草书杜诗秋兴八首卷后》。

亦能“神韵超逸，迥出诸人上”（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此外，还有沈周、唐寅、吴宽、李应桢、陈淳、文彭、文嘉等人，他们不仅共同生活在苏州地区，而且彼此有师生亲友之谊，其书法风貌均受赵孟頫的影响，未曾逾出晋唐王派书系，因此，形成了颇具实力的吴门书派，一时也有天下书法皆归吴中之语。

与吴门书派相对峙的是松江华亭书派，最初起自于“二沈”兄弟俩。其兄沈度擅“篆、隶、真、行、八分书”，尤妙于楷书，故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称：“太宗征善书者试而官之，最喜云间二沈学士，尤重度书，每称曰我朝王羲之。”而沈粲的书法真行皆佳，擅草书，以风流飘逸取胜。“二沈”之后，继之以张弼、陆深、莫是龙等人，至明末华亭人董其昌的出现，超越诸家，书名远播海内外，俨然成为这一书派的首领。《明史·文苑传》称其昌书“始以宋米芾为宗。后自成一家，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其实，董氏博采晋唐各家，自诩以学二王为最有心得。同时，他又十分敬佩赵孟頫，他曾喟叹道：“余年十八学晋人书，得其形模，便目无吴兴（赵孟頫），今老矣，始知吴兴书法之妙。”他的书法，深得帖学衣钵。笔势飘逸，善于裹锋；章法疏朗潇洒，渗透出书卷气；擅用淡墨，表现出韵味冲乐、清新淡远的意境；结字宽和自然，显示了均衡宁静的美学品位。简言之，他的书法“给后人以多种观感，或喜其轻巧秀媚，或爱其圆劲苍清，或惠其天然真趣”。<sup>①</sup>

明代越地还有一位大书法家徐渭，他自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就其书法风神而论，确实非同一般。徐渭面临的当时书坛现状，是一种既趋于“僵化”、又隐伏突变的状况，在这样的境地中开辟新路，一方面要拥有精湛的书法基本功底，另一方面又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具备创新意识，而更重要的还要有横冲直撞的创作实践。徐渭

<sup>①</sup> 《中国书法史论》，第237页。

的一生坎坷,既怀才不遇,又穷困潦倒,他只能借书画诗文以抒发心中的块垒,淋漓酣畅的书法恰是郁勃不平之气的体现。正如黄汝享所说:“按其生平,即不免偏宕亡状、偃仄不广,皆从正气激射而出,如剑芒江涛,政复不遏灭。其诗文与书画法,传之而行者也”(《徐文长集·序》)。袁宏道也指出:“强心铁骨,与夫一种磊落不平之气,字画之中,宛宛可见。”因此,徐渭的书法,看似天马行空,狂放散乱,其实,在纵逸恣肆的书艺上表达了一种“精伟奇杰”的“意气”。袁宏道曾精辟地评论道:“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袁中郎集》)。这是对徐渭书艺最生动的写照。

清朝书坛初学董其昌,再学赵孟頫,及至碑学兴起,吴越书风也随之而变化,丧失了崇尚王派书系与注重清和秀逸的特点。“在这时期一直到民国初期,写篆隶和北碑的风气一天天广阔了”<sup>①</sup>,出现了一批善作篆隶的书家,而开创清代隶书风气的则有郑簠(号谷口,江苏上元人)和朱彝尊(号竹垞,浙江嘉兴人)。据《履园丛话》云:“国初有郑谷口始学汉碑,再从朱竹垞讨论之,而汉隶学复兴。”郑簠隶书主要是出自《曹全碑》,兼得《刘熊》、《史晨》、《郭有道》气息,并掺以行草笔法,绮丽飘逸。朱彝尊将汉隶划分为三种类型:方整、流丽、奇古。他主要取法于流丽一类,楷法宗欧阳询,所以他的隶书严谨而秀逸。此后,清代中期有“分隶冠绝一时”的金农,其书法号称“漆书”,即墨浓似漆,用笔方扁如刷,具有漆简的笔趣。至清末则有俞樾、翁同龢、沈曾植等。

碑学发轫于隶书,至清中晚期,篆书、北魏书才全面铺开,出现了以玉筋篆作篆的王澐、江声、钱坫、孙星衍、陈潮等,还有以隶作篆的吴让之、杨沂孙、徐三庚等,以及以缪篆、金文作篆的吴大澂、吴昌硕

<sup>①</sup> 《中国书法简论》,第142页。

等。其中吴昌硕擅写石鼓文,他曾自跋云:“予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符铸也认为:“缶庐以《石鼓》得名,其结体从左右上下参差取势,可谓自出新意,前无古人,要其过人处,为用笔道劲,气息深厚”(《书林藻鉴》)。吴昌硕用笔豪肆,在结体上将原来方正疏朗的《石鼓》写成长方形,上紧下松,左低右高,形成茂密峻伟、浑灏雄阔的风格。<sup>①</sup>

近现代吴越地区较著名的书法家有沈尹默、沙孟海等。沈尹默(1883—1971年),浙江吴兴人。其书法专工楷、行、草书,尤以行书闻名,深得晋人笔法,笔画圆润,结字妍美。同时,他又从事书法教学,其弟子遍及江南。沙孟海(1900—1992年),原名文若,浙江鄞县人。他的书法兼擅各体,广泛涉猎魏晋南北朝碑帖,综览唐宋以来名家书迹,注重地下出土的文物和民间的砖铭石刻。晚年常作真草行书,形成独具特色的缜密雄健、凝重敦实的阳刚风骨。

总之,吴越书风在王派书系的影响下,形成了清和秀逸的艺术特点,同时,又生发了狂放不羁的书法品性,代代升华出彪炳千秋的艺术硕果,矗立了一座又一座艺术丰碑。

<sup>①</sup> 《中国美术通史》(第六卷),第341页。

## 第四章 江南水乡风采

古称吴越为东南僻远之邦、蛮夷之地。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达,兼之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江南逐渐成为富庶、繁华的所在地。在葱茏秀丽的名山佳川和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泊之间,有庭院幽深的古典园林,有越波跨空的民间桥梁,还有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等,凸现了江南水乡的文化风采。

---

### 第一节 江南的园林特色

---

中国园林在世界园林中独具东方文化的神韵,它“是由建筑、山水、花木等组合而形成的一个综合艺术品,富有诗情画意”<sup>①</sup>。同时,园林还能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展示出人们的心态及审美情趣。江南的园林,既荟萃了我国园林的菁华,又充溢着吴越文化的特质,尤其是苏州、杭州、无锡、南京、扬州等地的园林,迄今仍享誉中外,闻名遐迩。

早在春秋时代,当吴越称雄东南之际,其君王就先后构筑了供游

---

<sup>①</sup> 陈从周:《说园》,同济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



乐栖息的苑囿别馆。吴国大致有夏驾湖、销夏湾、姑苏台、长洲苑、华林园、吴宫、梧桐园、馆娃宫、响屐廊、流杯亭、居东城等；而越国则有怪游台、驾台、美人宫、乐野之类。

童隽在论述江南园林的沿革时认为：“楚灵王之章华台，吴王夫差之姑苏台，假文王灵台之名，开后世苑囿之渐”<sup>①</sup>。吴王夫差时期确乎建筑了许多苑囿台榭，史籍称之“一夕之宿，台榭陂地必成，六畜玩好必从”（《国语·楚语》）。但是，吴越地区较早的苑囿则推夏驾湖。唐《吴地记》：“夏驾湖，寿梦盛夏乘驾纳凉之处。凿湖为池，置苑为囿。”一些志书还认定夏驾湖在吴县西城下吴趋坊西。据《吴郡志》载，宋代夏驾湖已湮为民居，“不复有湖。民犹于河之傍种菱，甚美，谓之夏驾湖菱云”。

吴王阖闾时，筑有大量的宫室园林。《越绝书》、《吴越春秋》都有形象的描述（审核两书，略有异文）：“（阖闾）自治宫室，立射台于安里，华池在平昌，南城宫在长乐。阖闾出入游卧，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治姑苏之台，旦食鼍山，昼游苏台。射于鸥陂，驰于游台。兴乐石城，走犬长洲”（《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其中苏台，即姑苏台（一名姑余，一名胥台，亦称之为姑胥之台）。“吴王阖闾十一年，起台于姑苏山，因山为名，西南去国三十五里。春夏游焉。后夫差复高而饰之，越伐吴，遂见焚。”<sup>②</sup>台址一般认为“在吴县西南三十里横山西北麓姑苏山上”（《史记》正义）；还有认为“台本在横山绝顶”<sup>③</sup>。从记载可知，姑苏台具有相当的规模，“阖庐起姑苏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见三百里”<sup>④</sup>。“周环诘屈，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殫耗人力”<sup>⑤</sup>。

① 《江南园林志》，中国建设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

② 《艺文类聚》卷一。

③ 李根源：《木渚小志》，转引自《吴地记》曹林娣之注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

④ 《史记》集解引《越绝书》。

⑤ 《太平广记》卷二三六引《述异记》。

《国语·吴语》中申胥曾劝谏吴王(夫差)不要“疲民于姑苏”。姑苏台不仅是吴王休憩游乐的场所,还有监视百姓、抵御入侵的功用。《越绝书》:“胥门外有九曲路,阖闾造以游姑苏之台,以望太湖,中窥百姓。”

长洲苑(亦称之“长洲林园”)是“阖闾所游猎处也”(《吴地记》),在苏州西南、太湖北岸。汉代的枚乘说吴王濞云:“汉修治上林,杂以离宫。佳丽玩好,圜守禽兽,不如长洲之苑”(《吴郡志》)。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曾极言上林宫苑的寥廓和壮观,然而,在枚乘眼中,堂堂的上林苑居然不如长洲之苑,可见长洲苑之广袤和宏大。

夫差时,吴宫有“前园”和“后园”之别,前园“横生梧桐”,史志称为“梧桐园”,《吴郡志》:“梧桐园,在吴宫,本吴王夫差园也。”而后园则高树参天,《吴越春秋》中记载了太子友(夫差之子)“怀丸持弹,从后园而来”的一则逸事,从而敷衍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典故。而“馆娃宫”则是夫差为西施所营建的离宫。《吴地记》:“吴人呼西施作娃,夫差置。”《吴郡志》:“今灵严寺即其地也。山有琴台、西施洞、砚池、玩花池,山前有采香径,皆宫之故迹。”此外,还有“响屐廊”,“相传吴王令西施辈步屐,廊虚而响,故名”。总之,“据统计,吴国苑囿共有30多处”。<sup>①</sup>

与此相应,越国的勾践也有不少离宫台榭,仅《越绝书》就记录了十多处。诸如:“龟山者,勾践起怪游台也。……高四十六丈五尺二寸,周五百三十二步,今东武里。”而美人宫,是“勾践所习教美女西施、郑旦宫台也”。至于乐野,则是“越之弋猎处”等。《越绝书》中还有一段关于勾践起居游乐的总括性的记载:“勾践之出入也,齐于稷山,往从田里;去从北郭门,炤龟龟山。更驾台,驰于离丘,游于离丘;游于美人宫,与乐,中宿;过历马丘,射于乐野之衢;走犬若耶,休谋石室,食于冰厨。”可见越国苑囿的数量和规模与吴国相比是不分轩輊。这些离

<sup>①</sup> 魏嘉璠:《苏州园林史漫录》,《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合刊。

宫别馆皆可视为江南园林之滥觞。

倘若从总体上概括数千年来江南园林的特征,当推私家(宅园式)园林的兴盛和数量之多。童隽在《江南园林志》中认为:“吾国凡有富宦大贾文人之地,殆皆私家园林之所荟萃,而其多半精华,实聚于江南一隅。”可谓一语中的。然而他又认为:“此时(西晋)江南未闻有私园”,此言未必确切。据文献记录,东汉时笮融在苏州曾建有“笮家园”。同治《苏州府志》:“笮家园,在保吉利桥南,古名笮里,吴大夫笮融所居。”而“晋辟疆园,自西晋以来传之。池馆林泉之胜,号吴中第一”(《吴郡志》卷一四)。关于“辟疆园”,晋唐人有许多题咏。李白云:“柳深陶令宅,竹暗辟疆园。”陆羽云:“辟疆旧林园,怪石纷相向。”陆龟蒙云:“吴之辟疆园,在昔胜概敌。不知佳景在,尽付任君宅。”从诗中可知,辟疆园有茂林修竹、怪石假山点缀其间。同时,在唐代,其园林已易主。“考龟蒙之诗,则在唐代为任晦园亭”(《吴郡志》)。因此,宋代直接称为“任晦园池”。

与辟疆园同时的还有戴颙的宅园,在今之拙政园一带,此园“聚石引水,植林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然”(《吴郡图经续记》),这也是吴地较早的私家名园。

唐代苏州的私园,见诸史志的约有十多处。孙园,位于桃花坞西。元微之诗云:“孙园虎寺随宜看,不必遥遥羨镜湖。”清人有诗云:“辟疆东晋日,孙园盛唐时。”可见其胜状。还有陆龟蒙宅在临顿里(即今之拙政园一带),是一处具有田园风光的园林。而唐褚家林亭,《松陵集倡和》云,在震泽之西。皮日休诗云:“茂苑楼台低槛外,太湖鱼鸟彻池中。”其地“当在松江之傍也”(《吴郡志》卷一四)。至于大酒巷(今讹为大井巷)“唐时有富人修第其间,植花浚池,建水槛风亭,酝美酒以延宾旅,其酒价颇高”(乾隆《长洲县志》)。另外,位于横山下的颜家林园、凌处士庄、韦承总幽居,皆为当时著名私园。

“江南园林,创自宋者,今欲寻其所在,十无一二。”(《江南园林

志》)。因此,童隽在论述江南的私家园林时,侧重勾画了宋代以后江南园林的发展脉络:宋时江南园林,萃于吴兴(今湖州);南宋以来,园林之盛,首推四州,即湖(州)、杭(州)、苏(州)、扬(州);明代除以上四地外,更有金陵、太仓崛起;清初,李斗的《扬州画舫录》称“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肆市胜,扬州以园亭胜”。而江南园林,论质论量,无出苏州之右。

苏州的园林,有人认为发端于春秋,形成于五代,成熟于宋元,兴盛于明清。据不完全统计,明代以前,苏州历代所建园林共 271 处,清代构筑 130 处(同治《苏州府志》)。但迭经兴废,五代以前的园林早已荡然无存,宋元的也寥若晨星,多数属明清构筑。较著名的有:

**沧浪亭** 在城南。吴越孙承祐筑园其地,宋苏舜钦得之,傍水筑“沧浪亭”,后归韩世忠。元、明之际,变为僧院。嘉靖时,释文瑛复建沧浪亭。清康熙间重修,后毁于咸、同兵火。同治十二年(1873 年)再建。现占地约 16 亩,园门前有石桥临水,古树郁然;园内筑贤祠,镌刻泰伯、仲雍以来的有关苏州名人画像 594 人。

**网师园** 在阔街头巷。宋史正志归老姑苏,筑园名渔隐,清初归宋宗元时称网师。现占地 9 亩,全园可分三部分:南部屋宇紧凑,回廊蟠曲;中部一池绿水,濒水环筑廊、轩、亭、榭,缀以石梁、丘壑、花木,具有水色天光映如画的意境;北区有五峰书屋等建筑,园宅兼具,典雅古洁。

**狮子林** 在城东北隅。元至正二年(1342 年),称菩提正宗寺,僧维则请画家倪云林等共商叠成。“斯园主体,全在叠石,堆凿鬼工,湖石奇绝,盘据蜿蜒”(《江南园林志》)。现占地 13 亩,假山占全园面积 13%,计有山洞 11 个,上中下三层,路线九条,高低盘旋,曲折迷离。

**拙政园** 在娄、齐门之间。本唐陆鲁望故宅,在元为太宏寺。明嘉靖初,御史王敬止因寺基为别业,名拙政园。现占地 72 亩,为苏州市内最大的古典名园。园由东、中、西三部分组成,各具特色。池水占面积的 1/3,荇藻如茵;池旁山石亭榭,花木掩映,间以桥廊堂宇,形

成水陆交错的布局。一重陆地，一湾池水，层层相隔。“径缘池转，廊引人随，移步而换景”（《说园》）。“其经营位置，引人入胜，可谓无毫发遗憾者矣”（《江南园林志》）。

**留园** 在阊门外。明嘉靖间，徐泰时东园故址。清嘉庆时，园为刘恕所居，名寒碧庄。道光三年（1823年），经营始成，人呼之为刘园。园中聚奇石为十二峰。光绪二年（1876年），盛旭人购之，易名留园。现占地50余亩。园分三部，中部为涵碧山房，老树荫浓，楼台倒影，山池之美，堪拟画图；东部以冠云峰为主，两侧又用形体稍小的“瑞云”、“岫云”两峰相陪衬；西部有丘陵小溪，便于登临，富有野趣。

**环秀山庄**（亦称颐园）在景德路。本五代广陵王钱氏金谷园故址。现有假山，出自戈裕良手。下有洞，上置亭。其所作洞，“顶壁一气，成为穹形。环以小池，微似拳勺，而风味殊胜”（《江南园林志》）。

此外还有西园、艺圃、耦园、鹤园、听枫园、惠荫园、羨园、拥翠山庄、遂园、乐草园、靖园等等，“而私人宅第之附有园亭者，盖比比皆是矣”（《江南园林志》）。苏州的园林大多具有曲折幽邃、小巧玲珑的特色，亭台楼阁，叠石凿池，追求艺术与自然美的和谐。

杭州的园林，童隽认为：宋南渡后，湖山歌舞，粉饰太平，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杭州蔚为园林中心。除聚景、真珠、南屏、集芳、延祥、玉壶诸御园外，私家园亭，为世所称者，据《湖山胜概》所载，不下40家（《江南园林志》）。较著名的有：

**皋园** 在清泰门北。本明隆庆间金学曾别业，故又名金衙庄。清初，严沆割其半而筑园，自称“古树当轩，流泉绕户”。

**红桥山庄** 在花港观鱼侧。为高云麟别业，故称高庄。或云园系彭玉麟为高氏所筑，以酬旧谊者，故匾额题咏，年代均在同治十年（1871年）以后。

**汾阳别墅** 在里西湖西岸，卧龙桥堍。原为晚清杭州人宋端甫所筑端友别墅，俗称宋庄。后归郭姓，改名汾阳别墅，亦称郭庄。庄内有

船坞；西式住宅，仅占一角；环水为台榭。整个园林被称为“武林池馆中最富古趣者”（《江南园林志》）。

**水竹居** 在丁家山下。即光绪年间广东人刘学询别业，定名水竹居，俗称刘庄。庄背山面湖，竹树葱茏。现水竹居已改为西湖国宾馆。

**小万柳堂、兰陔别墅** 清代末年，江苏无锡人廉惠卿在原花港观鱼南侧建造了一座二层楼房，名小万柳堂，后易主为江苏上元人蒋国榜，改名兰陔别墅。兰陔是孝子养亲之义，俗称蒋庄。

**汪庄** 大约 1924 年前后，安徽茶商汪自新在西湖南岸夕照山麓兴建了一所别墅，称为汪庄，现改为西子宾馆。

**罗苑** 原平湖秋月景点仅有康熙年间建造的御书楼、御碑亭和楼前水面铺筑的平台，而两边沿湖一带，为上海哈同洋行老板、英籍犹太人哈同给妻子罗迦陵营建的别墅，名罗苑，俗称哈同花园。现已并入平湖秋月景点。

与苏州园林相比，杭州园林的主体是秀丽多姿的自然景色，是



图 4-1 杭州的汾阳别墅

“山”(包括阜、坡与远山)和“水”相依的山水园林,具有空灵淡秀的自然美。

扬州的园林,童隽也有概括性的叙述:“扬州自六朝徐湛之筑园,至宋有欧阳修之平山堂;宝祐间,又有壶春园、万花园。明末郑氏兄弟有四园,而以郑元勋影园为最著。扬州因清初康、乾二帝数次临幸,又兼地当交通之冲,为文人大贾之所萃。上巳修禊,十里栽花,歌管遏云,园亭夹岸,一经驻蹕题咏,引为殊荣,踵事增华,历时四纪。所谓八家花园者,除影园外,即王洗马园、卞园、员园、东园、冶春园、南园、筱园是也。八园之外,尚有二十余园。九峰园(即南园)、倚虹园、趣园,最邀高宗睿赏。然扬州园林,纯属点缀太平之物,以乾隆四五十年间为极盛。时八方无事,淮海宴如;二十四桥之红药犹繁,十二楼之新声未罢。《扬州画舫录》:‘乾隆二十二年,高御史开莲花埂新河抵平山堂,两岸皆建名园。’《浮生六记》:‘平山堂离城约三四里,行其途有八九里,虽全是人工,而奇思幻想,点缀天然,即阆苑瑶池,琼楼玉宇,谅不过此。其妙处在十余家之园亭,合而为一,联络至山,气势俱实。’自来园林蔚兴,未有如斯时扬州之蓬勃突然者。而其衰灭,亦有如转瞬。至道光中叶,扬州又荒凉如故”(《江南园林志》)。童氏的这番描述,已大致将扬州园林的沿革、称谓以及兴盛衰败的原委,剖析得一清二楚。同苏、杭的园林相比,“扬州以名园胜,名园以叠石胜”(《扬州画舫录》)。如扬州的万石园、个园、小盘谷、寄啸山庄等,都是以石争奇的名园。个园竟能以叠石表现四季景致:临门石笋参差,是为春汛;园北有湖石叠成的假山,涧水潺潺,秀木繁荫,犹如夏景;园东乃黄石垒砌的假山,夕阳下呈金黄一片,象征秋色;园南又有一假山横亘,纯系宣石,远望似皑皑白雪,给人以严冬之感。扬州的叠石名园,确实匠心独具,诗意无限。

江南其他地区的园林,如南京有愚园、瞻园、颐园、煦园等;常熟有燕园、壶隐园、虚霏居、近园等;无锡有寄畅园、梅园、锦园、蠡园、渔

庄、鼋头渚等；上海有豫园、也是园、九果园等；南浔有宜园、东潜园、宜园、小莲庄、丁园、潘园等；绍兴有兰亭、始宁园、小隐山园、府山、东湖、沈氏园、青藤书屋等，无不独具情趣、各有芳姿。

江南园林的兴衰与经济的发展相交织。园林为休闲养性、风花雪月之地，建之不易。如果缺乏雄厚的经济实力，则难以承受。唐宋以降，江南经济的发达，为园林的兴盛创造了条件。北宋的苏州“井邑之富，过于唐世”（《吴郡图经续记》）。而明代的“吴中富豪，竟以湖石筑峙，奇峰阴洞，至诸贵占据名岛，以凿琢而嵌空妙绝，珍花异木，错映阑圃，虽闾阎下户，亦饰小小盆岛为玩……”<sup>①</sup>。这使得苏州园林以数量之多、构筑之精、艺术水平之高而驰誉中外。又如清初扬州园林之所以盛极一时，除帝王的临幸外，主要得益于商贾云集，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而它的衰败，“盖帝王之踵不至，盐商中落，江淮泛滥，以致歌舞销歇，珠帘泥土”（《江南园林志》）。可见，园林的产生、兴盛乃至衰灭同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从另一角度而言，园林的大量兴建也会推进经济的发展。叠石造山是园林营建中一项高难度的工程。汲取雄、奇、幽、险、清、秀等山川丘壑之形态，从而追求奥妙无穷的自然意象，这需要“专家”的大手笔。因此，出现了专门从事叠石者，“朱勔子孙居虎丘之麓，尚以种艺垒山为业，游于王侯之门，俗呼为花园子”（《吴风录》）。苏州称花园子，而湖州称山匠，扬州称石工，浙中称假山师或叠山师，上海（旧松江府）称山师，名号虽不一，但都是对叠石名家的特定称谓，他们凭技艺自成体系，形成帮派，且名噪一时。“云间（松江）名手张涟（南垣）、张然父子，人称张石匠，名动公卿间，张涟父子流寓京师，其后人承其业，即山子张也”（《说园》）。

假山的主要材料为石，“石有聚族，太湖为甲，罗浮、天竺之石次之”（白居易《太湖石记》）。真太湖石出自两洞庭湖，“石性坚面润，而

<sup>①</sup> 黄省曾：《吴风录》，见《百陵学山》。



嵌空穿眼,宛转险怪”(《博物要览》)。但是真太湖石并不多见,既难罗致,又不易辨识,因此有制以赝品者,谓之“种石”。“平江太湖工人,取大材,或高一二丈者,先雕置急水中舂撞之,久久如天成,或以烟熏,或染之色”(林有麟:《素园石谱》)。这些从种石牟取利益者,人称“石农”。“太湖石玲珑可爱,凡造园林者所须,不惜重价也。湖傍居民,取石凿孔,置波浪冲激处,久之斧斤痕画化,遂得天趣。实则瘦、皱、透三者,皆出于人工,以售善价,谓之种石,其人可称种石农”<sup>①</sup>。种田、种花、种树之类,自古有之,而种石户的出现,则前无古人,这完全是园林大兴的产物。<sup>②</sup>

当然,园林属消费性文化,对经济的发展有负面影响。那些园林的主人,多数人为造园几乎把自己的腰包掏空。上海潘允端修豫园历时十八载,倾囊尽资;绍兴祁彪佳建园时,“摸索床头金尽,略有懊丧意,及于抵山盘旋,则购石庀材,犹怪其少,以故两年以来,囊中如洗”。仅一个假山,“土石毕具之外,倩一妙手作之,及舁筑之费,非千金不可”(《祁彪佳集》卷七)。整个园林耗资之巨,也就可想而知。“无怪乎谢国桢教授生前常说,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生长缓慢,是因为商业资本全漏到园林中去了,消耗殆尽。这个看法未必精确,但用以说明江南园林费资之多,以及对历史进程所起的消极作用,则仍是发人深思的”。<sup>③</sup>

江南园林也是文化的产物。从园林的构筑、布局命名及园主的文化心态来看,江南园林显示了“道”的思想,蕴含着“回归自然”的文化意识和审美理想。

“中国园林文化的哲学之精魂,则无疑是老庄之‘道’。这一巨大而美丽的文化现象所涵蕴的,是老庄‘道法自然’的自然哲学与所谓

<sup>①</sup> 张霞居:《红兰逸乘》,转见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册。

<sup>②③</sup> 王春瑜:《论明代江南园林》,《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

‘穷则独善其身’的‘自由’生活境界。”<sup>①</sup> 江南园林的构筑崇尚自然，其模山范水讲究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环境为基本框架，追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园冶》）的境界。以园艺的形式，体悟浑然天成的自然之道，揭示“返朴归真”的文化底蕴，“它体现了对宇宙幽玄本体的领悟，淡泊人生的品味与人格修养的自觉”<sup>②</sup>。江南园林的布局，也致力于对道家境界的阐释，象征“以小喻大”、“悦志亲意”的文化内蕴。上海豫园在空间布局上则表现为步步深入、渐入佳境。豫园乃明嘉靖间潘允端所构，“园东面，架楼数椽，以隔尘市之器”，取陶潜所谓“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之意，此乃推尘嚣于园外，为第一境界；“中三楹为门，匾曰‘豫园’，取悦志亲意也”。进入人与自然亲和之“豫”的第二境界；第三境界：“西可二十武，折而北，竖一小坊，曰：‘人境壶天’”。园境虽属“人境”，已是“壶中天地”，身居有限之园境而心灵已入豁然开朗、大悟大彻之境界。曰：“寰中大快”<sup>③</sup>。“这不是一般的喜悦与欢乐，而是体悟到‘道’的真正属于原朴层次上的、渗融以宇宙意识的愉悦”。<sup>④</sup>

江南是文人学子云集之地。园林则寄寓着他们的心态。苏州园林的一些命名及有关的诗文，即为明证。“沧浪亭”，原本唐五代孙承祐池馆，至宋庆历年间，苏舜钦“以罪废，无所归。扁舟南游，旅于吴中”，一日，过郡学东（“沧浪亭”所在地），看到此地“草树郁然、崇阜广水，予爱而徘徊，遂以钱四万得之”。此后，苏氏“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归，觞而浩歌，踞而仰笑，……返思向之汨汨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苏舜钦：《沧浪亭记》）“沧浪亭”之名，正是苏氏取“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楚辞·渔父》）之意来表白清高洒脱的心境。更有甚

①②③ 王振复：《中国园林文化的道家境界》，《学术月刊》1993年第9期。

④ 潘允端：《豫园记》。

者,北宋的王禹偁为长洲令时,常携客醉饮于苏州的南园,且有诗曰:“他年我若功成后,乞与南园作醉乡。”虽身在仕途,却对园林的生活羡慕之至。另据《吴郡志》记载,还有“隐圃”、“小隐堂”、“中隐堂”、“乐圃”等园名,朱长文自撰的《乐圃记》曰:“虽三事之位,万钟之禄,不足以易吾乐也。”苏州的拙政园,即以晋潘岳的“筑室种树”、“灌园鬻蔬”、“拙者之为政”为名。苏州的网师园,宋代时名渔隐,清初改称网师。网师者,渔翁也,暗寓山野渔樵之隐。苏州的怡园,即以“颐性养寿”、“自怡怡人”而得名。

然而,园林的形式所表现出的文人心态又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确实鄙视功名利禄,以醉逸山野、坐忘林泉来完善自己淡泊澹远的人格理想;有的为显耀自己的身份、地位和财富,修筑园林来奢侈享乐和招徕宾客;有的是仕途失意者,深感宦海浮沉、官场钩心斗角之“苦”而退隐园林之中。他们都将园林作为人生休憩之所和精神上的“安乐窝”。诚然也不乏将园林视为“终南捷径”者,身居林泉而“心存魏阙”,总之,其所包含的文化心态是错综复杂的。

就江南园林水平之超凡奇绝而论,充分体现了造园者(园主)深厚的素养和艺术创造能力。江南园林,大都能因地制宜,师法自然。吴越地区山川映发、水木精华、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湖光山色,启迪了许多文人画家将山水画意融入江南园林的营建之中。甚至一些江南名园,本身就直接由他们自己设计并构筑。《扬州画舫录》称狮子林乃维则(元末高僧)延(邀请)朱德润、赵元善、倪元镇、徐幼文(均为当时山水画名家)共商所叠。明代吴兴俞子清园中的假山,周密之所以认为“秀拔有趣”,是因为“子清胸中自有丘壑,又善画,故能出心匠之巧”(《癸辛杂识》)。上海豫园黄石大假山,古拙高峻,开合有致,富于林泉野趣,被视为以石叠山的佳例。这假山即出自明代叠石大家张南垣之手。张善于绘画,以画法叠石成山,运用武康黄石的石纹石理和刚劲有力的块面,造成颇似山水画中斧劈皴法和山势,自然有峰壑苍

古之趣。清代扬州的方石园叠石,出自大画家石涛之手。还有苏州尚书里顾文彬之怡园,由任伯年等画家参与规划,博采他园之长,又自成一格。正所谓:“叠山之艺,非工山水画者不精。如计成,如石涛,如张南垣,莫不能绘,固非一般石工所能望其项背者也”(《江南园林志》)。

至于其他文人所营建的、充满诗情画意的园林,则不计其数,同样体现出深厚的美学功力和非凡的艺术匠心。引人注目的是,江南一些造园大家还撰写了有关园林艺术的专著,明代吴江人计成《园冶》一书,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造园的基本技法及理论,这是迄今仍蜚声中外的园林史上的经典著作。计成在少年时代,便以善画闻乡里,诗作也颇具功力。唯其如此,他才能成为造园专家,并能写出《园冶》这样的力作。同时代的文震亨(也是吴江人)的《长物志》将山水画的原理,运用于园林的设计之中,富有独到的见地。而明末山阴人祁彪佳,既是一位文学家,又是一位造园名家(有依山而建的祁家花园),并著有《越中园亭记》六卷,其中不乏造园的经验之谈。这些园艺专著极大地提高了江南的造园艺术水平。

园林不仅是文人聚集的所在,而且还是戏剧活动的中心。上海豫园内即经常有松江、苏州、浙江、安徽等地的剧团演出,管弦之声不绝于耳,而大放异彩的昆山腔更是“众皆称美”,显然,江南园林对文化的繁荣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

## 第二节 水乡的古桥风貌

---

中国夙有“多桥古国”之称,而东南沿海的吴越地区名之曰“水乡泽国”,山区溪涧密布,平原河网纵横。杭嘉湖有“鱼米之乡”的美誉,苏州有“人家尽枕河”、“水港小桥多”的旖旎景致。《吴地记》:苏州“虹

桥三百有余”。《吴郡志》：“唐白居易诗曰：‘红栏三百九十桥’，本朝杨备诗亦云：‘画桥四百’。则吴门桥梁之盛，自昔固然。今图籍所载者，三百五十九桥。”这一记载恰与宋绍定二年（1229年）刻绘的《平江图》碑相契合。南宋时的苏州称平江府，《平江图》是关于苏州城市的碑刻平面图，也是世界上独具风格的地图。该碑原嵌苏州城南文庙壁间，今移存苏州市博物馆内。据《平江图》标识，苏州城内外共有桥梁359座之多，而且桥的名称也很别致：有花桥、虹桥、胭脂桥、凤凰桥等等，不一而足。

越地绍兴一带凌空越波的桥梁也是星罗棋布。南宋《嘉泰会稽志》记载“当时仅府城内比较著名的桥梁就有99座”，及至“清光绪年间，城内有大小石桥229座。目前绍兴城中尚有100多座桥梁，乡间更是不计其数”<sup>①</sup>。因此，在吴越这块土地上，历代民间桥梁的数量是极为可观的。据浙江省交通厅1963年的普查和典型调查，仅浙江省的民间桥梁约10万座。平原集镇附近每隔几百米就有一座桥梁。吴兴菱湖有“三里十桥”之称。无疑，水乡的古桥是吴越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

吴越民间桥梁的建筑也有较早的历史。《吴地记》曰：“都亭桥，寿梦于此置都驿，招四方贤客，基址见存。”“定跨桥，阖闾于行苑内置，游赏之处。基址见存。”《吴地记》中还记载了阖闾时的“鹤舞桥”、“苑桥”，以及吴时的“炭渚桥”、汉时的“皋桥”、“乘鱼桥”、“百口桥”等等。《吴郡志》中也记载了许多桥名，据笔者统计有339座。至今尚有一些现存的桥梁，其建筑年代可远溯宋朝。如武义县的熟溪桥，始建于宋开禧三年（1207年）；杭州的忠义桥，始建于宋嘉定十年（1217年）；德清的寿昌桥，始建于咸淳年间（1265—1274年）；还有绍兴的八字桥和广宁桥、吴江县的思本桥、无锡惠山的金莲桥等，均为宋代桥梁的

<sup>①</sup> 杨新平：《绍兴古代石桥述论》，《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

遗制。

从吴越民间桥梁的造型来看,主要有石拱桥、石平桥、亭屋桥和其他桥型。

石拱桥大多分布在平原河网地带,由于通航的原因,需要较大的桥孔跨径和净空。桥孔一般多为奇数,注重对称,中孔跨径大,边孔跨径小,两端桥头设石级,或在桥面上建成台阶。如杭州拱宸桥、余杭长桥、嘉兴长虹桥均是跨越南北大运河的三座石桥,桥形宏伟,气势雄壮。还有吴兴县双林三桥,即吴兴县双林镇的万魁桥(长 51 米)、化成桥(长 46.6 米)、万元桥(长 53.5 米),相继于明清时期建成,均为三孔石拱桥,彼此相距仅 50—100 米,桥型配跨基本相同,从远处眺望,似桥中有桥。绍兴还有一种平桥与拱桥结合的桥梁,如绍兴太平桥,跨越萧绍运河,建于清咸丰八年(1858 年)。这是一座单孔净跨 10 米的石拱桥与九孔净跨 3—4 米的石平桥相组合的古老桥梁,拱桥南端落坡中设平台再折向两侧下桥;拱桥北端落坡以相邻的三孔平桥逐级下降。全桥布局处理既兼顾水陆交通,又节省工料。拱桥的望柱、栏板、抱鼓的图案与雕琢都精致美观。平桥与拱桥相联而横卧在水面上,显示出水乡的优美情调。



图 4-2 杭州的拱宸桥

在建筑艺术上石拱桥是颇具特色的。其拱圈大都采用截面半圆拱,还有弧拱、尖拱、五边形拱、多边形拱等等。它们在序列组合、空间安排、比例尺度、造型式样等方面,都讲究均衡、对称、变化与和谐,唐朝文人誉石拱桥为“初月出云,长虹饮涧”,确乎既形象又贴切。

吴越民间较为普遍的另一种桥型是石平桥,其上部结构有石板、石梁、梁板结合三种类型;其下部结构有石墩、石柱等。德清长桥(原名阜安桥),跨东苕溪大港。初建于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为九孔石平桥,全长85米,中孔跨径1.6米,其余各孔为6—7米,桥面宽6米,桥墩为条石并列(高达5.5米)。而温岭的李婆桥和绍兴的八字桥,是两座建构独特的石平桥。李婆桥建于三条河道的交叉点上,桥梁平面呈“Y”形。八字桥系单孔条石平桥,在绍兴县城东南隅。《嘉泰会稽志》卷十一记载:“八字桥,在府城东南,两桥相对而斜,状如八字,故得名。”这说明八字桥至迟建于南宋嘉泰年间(1201—1204年)。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曾经重修。该桥也建在三条河的汇合处,桥面用条石并列,微微拱起,净跨4.5米,桥面净宽3.2米。全桥的设计因地制宜,精心筹划,造型别致,水陆交通均甚便利,体现了我国古代匠师在处理桥梁结构构思上的精湛技艺。

最富有特色的石平桥是绍兴古纤道桥(又称纤塘、运道桥,俗称百孔官塘和铁链桥),位于萧绍运河之中。纤道桥至迟在唐代已经修筑,据史籍记载,绍兴府山阴县的运道塘,为唐元和十年(815年)观察使孟简筑(《新唐书》卷四一)。明朝,已从府城延至萧山县,“弘治中(1488—1506年)知县李良重修,甃以石”(万历《绍兴府志》卷一七)。现存的纤道桥多修筑于明清时期,而保存较完整的主要有“宝带桥段”、“十八洞头”、“玉带桥段”等三处。尤其是古镇柯桥以西的一段,从阮社太平桥到余诸板桥,全长约3公里。据凿刻于光绪九年的《纤道桥碑记》载:“自太平桥至板桥止,所有塘路及玉、宝带桥,计贰佰捌拾一洞。”这水上长堤的规模和气势确实壮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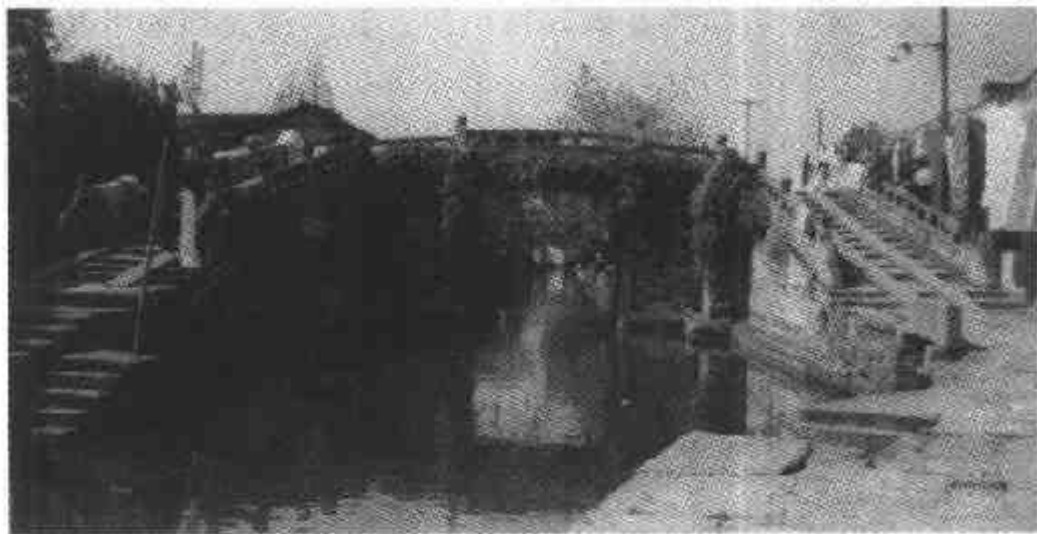


图 4-3 绍兴的八字桥

由石墩和石梁结合构成的纤道桥是一种纵贯河中与运河平行的特殊长桥。运河的有些地段河面较宽，或风急浪高之时，或逆水行舟之际，则须步行拉纤。修筑纤道桥，便于拉纤者循塘直行，同时，还能供船只避风之需。纤道桥的构筑以众多的低架桥梁为主体，间以高敞的拱桥或梁桥组成。低架梁桥一般每孔净跨约 2 米；桥面用三根条石拼成，宽 1.5 米，桥面贴近水面；桥墩系条石干砌，厚 1.5 米；约隔数百米，建有一座高耸的大桥，以沟通纤道两侧的水上交通。这种江南水乡特有的、蔚为奇观的水上长桥，有“白玉长堤路”之誉。此外，在江苏省吴县大运河之旁，还有元代的古纤道。<sup>①</sup>

亭桥或屋桥，即指在桥上建亭或建屋的桥梁。既可供行人歇息与避雨，又能增强桥梁的稳定性和延长桥的使用寿命。桥上建亭（屋），以亭（屋）护桥，桥亭（屋）一体，具有实用、坚固、美观的效果。早在宋代，绍兴就建有许多亭桥，《嘉泰会稽志》云：“西跨湖桥，在县西六里，上有亭。”“洞亭桥，在县东一十五里，阳明洞前，架小亭其上。”扬州瘦西湖的五亭桥（又称莲花桥），桥呈工字形，

<sup>①</sup> 梁白泉：《初论运河文化》，《东南文化》1990 年第 5 期。



桥长十余丈,宽二三丈,“上置五亭、下列四翼,洞正侧凡十有五,月满时每洞各衔一月,金色滉漾”(《扬州画舫录》)。其造型奇特和精巧,让人赏心悦目。



图 4-4 武义的熟溪桥

至于屋盖式的木桥(分平桥和撑桥两类),具有民族色彩。屋盖式木平桥,有武义熟溪桥、永康西津桥、鄞县鄞江桥等,均在城镇附近,一般用硬木作梁,桥墩上架枕木垛,层层挑出。桥面上全部建有屋亭,两侧有风雨板保护。如武义熟溪桥,在武义县壶山镇,创建于宋开禧三年(1207年),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重建为五孔六墩。隆庆二年(1568年)扩建为九孔十墩。全桥总长140米。万历四年(1576年)添建桥屋(长廊)49间,即成为现有结构形式,1963年进行过一次全面修理。该桥桥墩系条石干砌,砂砾填肚,宽3米,长7米,弹底以上高4.2米。桥面为木结构,系在桥墩上堆硬木垛(又名喜鹊窝)六层,两边层层挑出成双悬臂,上架圆木纵梁,梁上铺枕木,上再铺桥栅,覆以木板。桥宽5米。桥屋开间为2.85米,高4.6米,上覆青木瓦,中间一孔建“法角亭”,桥头两端建门墙。全桥两侧外衬木板以蔽风雨,外形壮丽雄伟。其桥面中间为通道,两旁为商贾店肆聚集之处,

俨然为水上长街。

屋盖式木撑桥,有泰顺营岗店桥、泰顺泗溪东桥、泰顺泗溪下桥、云和梅漂桥、宁海前郭桥等,均在大山区。该类桥有的地方称为“鹊桥”,大概是指其两端犹如鹊之两翼,泰顺则称之“蜈蚣桥”。其结构是用硬木梁加八字撑,最大跨径可至40米以上,皆为单孔桥。这种桥型的特点是桥高跨大,山洪暴发时所夹带的大量漂流物可以顺利通过。如泰顺泗溪东桥,建于清道光七年(1827年),全长38米,净跨27米,桥面宽5米。桥屋中部建有高大的飞阁,桥头亦为挠角门楼,使全桥显得极为壮观。

还有一种竹木便桥,散见于山头、田间。或用木板和圆木拼成跳板,下部结构为木支架(亦称马凳);或用硬木密铺在支架上,上面铺筑一层石灰三合土;或用杉圆木和毛竹密铺于支架上,上面加铺黄土和稻草;或用圆木、毛竹为梁,上面覆以一至二层竹垫;或用毛竹弯成拱形作为下弦,上面全部用毛竹构成,这些都是轻型简易的桥梁。

其他类型的桥有浮桥、碇步等,都是代替桥梁的简单跨河设施。浮桥虽没有“小桥横截,缺月初弓”的造型美,但它们高跨低榷,简朴古拙,与水体及周围景观构成和谐的整体,给人以美的感受。相比之下,浮桥的观赏功能远不如碇步。碇步也称堤梁桥,是跨越浅水河流的一种漫水建筑物,自然朴素,人在碇步上跳跃着行走,富有情趣。

古桥,作为吴越大地上的凝固艺术,除了交通纽带功能之外,还包孕着一定的文化内容。其一,古桥成为文人雅士题咏的场所和对象。枫桥“在阊门外九里道傍。自古有名,南北客经由,未有不憩此桥而题咏者”(《吴郡志》卷一七),而唐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尤使枫桥声名鹊起,妇孺皆知。扬州的名桥颇多,且为墨客骚人唱和的场所。横跨于瘦西湖上的红桥(又名虹桥),始建于明代崇祯年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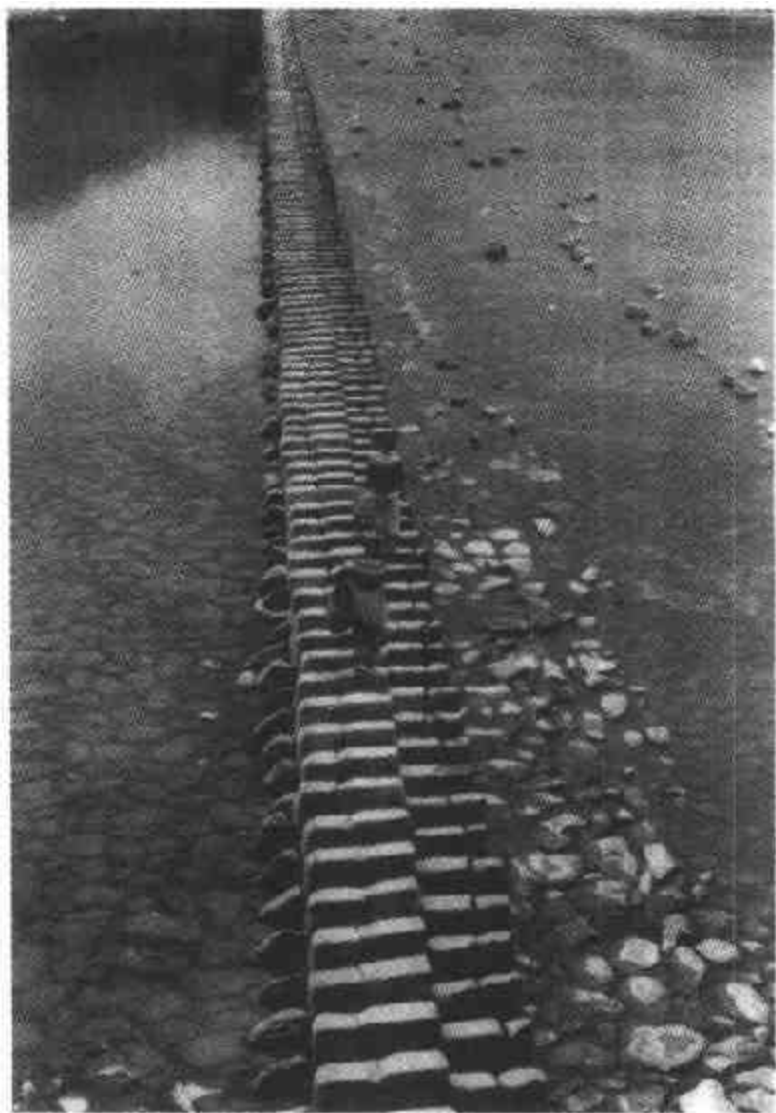


图 4-5 泰顺的仕水碇步桥

原为木质，至清乾隆年间，改建成拱形石桥，遂更名大虹桥。虹桥是清朝文人雅士吟诗结社之地，清代早中期曾举行过一系列具有相当规模的“虹桥修禊”活动。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禛（别号渔洋山人）于康熙元年（1662年）与一些名流聚会虹桥，举行虹桥修禊活动。康熙三年（1664年），王士禛又作虹桥修禊，参加者众多，仅载入《扬州画舫录》的就有30多人。当时参与者冒巢民说：“渔洋诗酒流连，文章结纳遍天下。”徐钊说他“日与诸名士游宴，于是过广陵者多问虹桥”。虹桥从此声名大振。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孔

尚任也在扬州作过“红桥修禊”。他的“红桥修禊”诗云：“杨柳江城日未曛，兰亭禊事共诸君。酒家只傍红桥处，诗舫偏迎袖翠群。”孔尚任还为“红桥修禊”作了序，序云：“余今者大会群贤，追踪遗事。”孔尚任在扬州期间写成的《湖海集》中有“红桥修禊诗”和“红桥诗”等，仅“红桥竹枝词”就写有20首。清乾隆时，山东德州卢见曾任两淮盐运使于扬州，他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举行过一次“虹桥修禊”，规模相当浩大。据《扬州画舫录》载，卢见作七律4首，“和韵者七千余人，编次得三百余卷”，可谓洋洋大观。同时虹桥两岸也是群众性文艺、娱乐场所。桨声歌声，灯光船影，通宵不息。据《扬州画舫录》载，往来于虹桥的有“歌船”、“灯船”、“酒船”、“花船”等等。两岸的“说书”、“棋弈”、“放风筝”、“西瓜灯”等文化活动，也是丰富多采。当时的虹桥成为清代扬州文化活动的—个集结之地。

至于扬州二十四桥，也是由于唐代著名诗人杜牧的吟咏而天下闻名，其《寄扬州韩绰判官》诗云：“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二十四桥为一座桥，抑或二十四座桥，历代有不同看法。宋代的《方輿胜览》云，隋代有二十四座桥，且以城门及坊市命名，至五代后周韩令坤筑州城，别立桥梁，二十四桥即或存或废，难以查考。在沈括的《梦溪笔谈·补笔谈》中，则一一列出各桥的位置和名称，但总数还不足二十四座桥，因而认定它是扬州桥梁的总称。清《扬州画舫录》则判定二十四桥是一座桥，“即吴家砖桥，一名红芍桥”。二十四桥可谓人言人殊，但无论如何，它因诗而传诵至今，是文人的描述对象。

其二，古桥与山水相依，组合为秀丽的人文景观。如利往桥，“即吴江长桥也。庆历八年，县尉王廷坚所建。有亭曰垂虹。而〔世并〕以名桥。《续图经》云：‘东西千余尺，前临太湖、洞庭三山，横跨松江。行者〔晃漾天光水色中〕，海内绝景。唯游者〔自知之〕，不可以笔舌形容

也’”(《吴郡志》卷一七)。又如行春桥,“《续图经》云:‘在横山下越来溪中。湖山满目,亦为胜处。桥甚长,跨溪湖之口,……胜概为吴中第一’”(《吴郡志》卷一七)。还有宝带桥(又名长桥),在吴县长桥乡。该桥始建于唐元和十一年(816年),以苏州刺史王仲舒捐宝带建桥而得名,它是我国现存古桥中最长、最精美的一座石拱桥,共有桥洞53孔,南北两端行道全长达370米。远眺恰如玉带浮水。明代有诗云:“春水桃花色,星桥宝带名。鲸吞山岛动,虹卧五湖平。”每逢明月之夜,五十三环洞各衔一月,月影随波起伏,水中明月成串,此即“串月”奇景。另外,绍兴的纤道桥、扬州的五亭桥等,都是独具一格的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地的标志。

其三,古桥蕴涵着优美的故事与传说。乘鱼桥,“在交让渚。郡人丁法海与琴高友善。高世隐不仕,共营东皋之田。时岁大稔,二人共行田畔,忽见一大鲤鱼,长可丈余,一角两足双翼,舞于高田。法海试上鱼背,静然不动,良久遂下。请高登鱼背,鱼乃举翼飞腾,冲天而去”(《吴地记》)。而鹤舞桥得名于“夫差女滕玉出葬日,仙鹤舞引,群鸣于市,因号此桥曰鹤舞”(《吴郡志》卷一七)。还有渡僧桥,“在阊门西,跨运河。孙吴时民为舟以济商,有僧呼渡,舟子弗应,僧折杨柳枝浮水而渡,众惊异罗拜,愿藉神力成此桥,遂募建,不日而成,以渡僧名”(《吴县志》)。此外,吴县的宝带桥、绍兴的题扇桥、杭州的断桥以及夏履桥、覆盆桥等等,都滋生出一系列的故事与传说,为吴越古桥增添了迷人的色彩。

吴越民间桥梁的美,在于它的建筑艺术的美,仅建筑材料的不同给人的感觉就不一,石桥的凝重坚实,纤道桥的蜿蜒绵长,亭屋桥的伟岸壮丽,竹木桥的轻盈流动,碇步的古朴自然,都别有一番风情。至于古桥的一些内涵因素,比如统一、均衡、韵律、比例、尺度等等,无不表明古桥不单单是建筑,更是一门艺术和一种文化,显示了吴越民间工匠的智慧与灵巧。

### 第三节 吴越的民间工艺

吴越地区山川秀丽,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加以人民的勤劳智慧,数千年间创造了许多精湛的民间工艺。诸如泥塑、陶瓷、刺绣、编织、石雕、木雕、竹刻、制扇、湖笔、宝剑等等。这些琳琅满目的工艺品,展示了吴越民间工艺的奇妙和其独具的匠心。

#### (一) 泥 塑

泥塑以无锡惠山泥人和瓯塑(又称油泥塑)最为著名。惠山泥人创始于何时,已难以查考。据说惠山泥人最初是这一带农家的一种副业。农闲时节,几乎家家户户都做泥人,故有“家家善塑、户户会彩”之说。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文学家张岱曾到过惠山,在他的《陶庵梦忆》中有对当时情景的描述:“无锡去县北五里为锡山,过桥店在岸,店精雅,卖泉酒、水坛、花缸、宜兴罐、风炉、盆玩、泥人之类。”可见,泥人已成为店肆中陈列、销售的商品之一。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年),惠山出现袁、蒋、朱、钱等姓的专业作坊。同治至光绪年间(1851—1908年),是惠山泥人历史上最昌盛的时期,有作坊、店铺四十多家,专业匠师三十多人。如善塑神仙的周阿生(1832—1912年),其所塑的“蟠桃会”堪称惠山泥人之精品;还有善捏戏文人物的丁阿金(1839—1922年),他采用“放头缩手去颈根”的手法,夸大头部造型,突出人物神态,使作品极为生动传神。

惠山泥人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泥玩具,俗称“粗货”、“耍货”,用模具翻制,大批量生产;另一类是手捏塑而成,题材内容多为戏曲人物,俗称“细货”,又称“手捏戏文”,属艺术欣赏品<sup>①</sup>。而早期的惠山泥人

<sup>①</sup> 柳家奎:《吴地的乡土艺术——惠山泥人》,《文史知识》1990年第11期。

多为粗货,具有线条粗犷、造型浑朴、简练夸张的特点,并包孕着吉祥、喜庆、辟邪等寓意。“大阿福”、“花囡”、“寿星”等象征健康幸福、吉祥顺心的生活;“春牛”是祈求农事顺利和五谷丰登;“蚕猫”、“花猫”是用于养蚕时节守护蚕茧,以防鼠害;“车老虎”则用于镇妖;“文武财神”、“观世音”、“罗汉”、“福禄寿三仙”等则期望神灵保佑和延年益寿。

图 4-6 无锡的惠山泥人

手捏戏文泥人的题材除主要表现戏曲外,还有市民生活、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以及青狮、麒麟等。它依据自身的彩塑特点,对戏曲内容进行概括、提炼,以最典型的情节和人物动态来表现戏曲的主题思想。因此,这类泥人在艺术上注重人物面部、形象、性格、神情的刻画。譬如:仕女的窈窕娇美,有杨柳细腰的柔美之态;武士的挺胸凸肚,呈威武雄壮之势;而小丑则屈膝、低头、缩脖,给人以卑微之感。在形体

多为粗货,具有线条粗犷、造型浑朴、简练夸张的特点,并包孕着吉祥、喜庆、辟邪等寓意。“大阿福”、“花冈”、“寿星”等象征健康幸福、吉祥顺心的生活;“春牛”是祈求农事顺利和五谷丰登;“蚕猫”、“花猫”是用于养蚕时节守护蚕茧,以防鼠害;“车老虎”则用于镇妖;“文武财神”、“观世音”、“罗汉”、“福禄寿三仙”等则期望神灵保佑和延年益寿。



图 4-8 无锡的惠山泥人

手捏戏文泥人的题材除主要表现戏曲外,还有市民生活、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以及青狮、麒麟等。它依据自身的彩塑特点,对戏曲内容进行概括、提炼,以最典型的情节和人物动态来表现戏曲的主题思想。因此,这类泥人在艺术上注重人物面部、形象、性格、神情的刻画。譬如:仕女的窈窕娇美,有杨柳细腰的柔美之态;武士的挺胸凸肚,呈威武雄壮之势;而小丑则屈膝、低头、缩脖,给人以卑微之感。在形体



上,由于不受模具制约,因而泥人的姿态生动,衣纹线条流畅。

在彩绘上,惠山泥人常用大红、正绿、金黄、云青等原色,对比强烈,具有独特的色彩效果。

至于温州的油泥塑则将绘画、浮雕和泥塑融合为一体,它用具有可塑性的五彩油泥堆塑人物、山水、花卉、禽兽等,色彩鲜艳,瑰丽夺目,也不愧为艺术珍品。

## (二) 陶 瓷

陶瓷包括陶器和瓷器。这里仅叙述陶器中的珍品——紫砂陶,这是江苏宜兴的特产。紫砂陶品类有壶、杯、盆、瓶、盘、碗等等,其中紫砂壶为佼佼者。

宜兴紫砂自身的历史,据宜兴羊角山的发掘可以确认始自北宋中期。而真正可考的历史,是明代正德以后,十六世纪初,著名壶人供春的出现。传说他是吴颐山的书僮,又是最早用丁山的紫砂泥作壶者。而万历时期的时大彬,则是一位关键性的继承者,前者开基,后者弘业,而且当时在紫砂工艺上也是英才辈出,有四大家(董翰、赵梁、元畅、时朋)和三大妙手(李茂林、李仲芳、徐友泉)之说。到嘉庆时期,又有杨彭年、杨凤年、陈曼生等。陈曼生是书法家和金石家,他与杨彭年合作,由杨氏制壶,由他题刻,此后,曼生壶的名气愈来愈大,以至时人只知陈曼生而不知杨彭年。在紫砂壶上题刻,融诗、书、画、刻于一壶,使文学艺术与紫砂工艺相结合,从而提高了紫砂壶的文学艺术价值,同时也提高了紫砂壶的身价。

在陈曼生以后,宜兴紫砂名家,仍是代不乏人。当代最著名的紫砂大师是顾景舟,他既是制壶大师,又是名刻手,而且还大大发展了紫砂的造型和工艺水平。他的高徒高海庚、徐汉棠、徐秀棠、周桂珍等的壶艺,也已妙入堂奥,技艺精湛。<sup>①</sup>

<sup>①</sup> 冯其庸:《紫砂漫话》,《文史知识》1990年第11期。

紫砂壶是中国传统的陶文化和茶文化结合的产物。作为世界茶具之首,紫砂壶具有很强的实用功能,有很多的优越性;嘴鑿结构,舒出自然且口盖处置得体,紧密无隙;泡茶不走味、贮茶不变色;耐烧不炸、提握不炙手;而且使用时间越久,其色泽越光润古雅等等。紫砂壶集实用性 with 艺术性于一体,深受人民喜爱而驰誉海内外。

### (三) 刺 绣

刺绣的品种繁多,仅江南地区,就有苏绣、顾绣、锡绣、扬州刺绣和温州的瓯绣,而以苏绣和顾绣最为著名。

从文献记载看,吴地刺绣的历史久远。《说苑》:晋平公使叔向聘吴,“吴人饰舟以送之,左百人、右百人,有绣衣而豹裘者,有锦衣而狐裘者”。而三国时,据王嘉《拾遗记》载,东吴丞相赵逵之妹赵夫人善刺绣,以针绣出“山川地势图”作为军用,形象逼真,时称“针绝”。西晋光熙元年(306年),日本曾“遣吴求缝绣女工”。宋代以后,苏州地区“家家养蚕、户户刺绣”,苏绣技艺日臻精善。“宋绣,针绣细密,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物具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嗚啞之态”(《长物志》)。特别是清以来,苏绣已形成自己完整的风格和特点。“精、细、雅、洁,称苏绣”(《姑苏志》)。苏绣的题材宽泛,山水、亭台、花鸟、人物皆能入绣且无所不工。正如乾隆时所修的《上海县志》云:“苏绣之巧,写生如画,他处所无,小民亦习以糊口,略与纺织等。其法辟丝为之,针细如毫发。”苏绣的绣品多为被面、枕片、靠垫、坐垫、幃幔、凤冠霞帔、戏剧行头,乃至官服等等,既为日用品,又是精致的艺术品。

苏绣在用色上追求和谐文静,不露生硬跳动痕迹;行针力求平匀熨帖,无参差之处;其针法非常讲究,有齐针、抢针等18种之多,以期达到“平、光、齐、匀、和、顺、细、密”的艺术效果。苏绣制品中,最具观赏价值的是双面绣,这是正反两面图案同样工致的刺绣,艺人在刺绣时,以记针的方法代替打结,藏起线头垂直刺绣,不刺破反面的绣线,

使正反两面具有同样的效果。著名的绣品有小猫、金鱼、牡丹之类,其色彩和顺、丝缕分别,堪称苏绣艺术之精品。苏绣因其精美、细腻、雅致而享誉中外,与湘绣、蜀绣、粤绣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绣。

苏绣在明、清时的长足发展,是与顾绣密切相关。顾绣则源于明代松江府上海县顾名世家中。1936年,徐蔚南在《顾绣考》中说:“今天下称刺绣为顾绣者,以上海顾氏刺绣之名震溢海内故也。”顾氏家中的女眷擅长刺绣,尤其是他的孙媳妇韩希孟在丈夫顾寿潜的密切配合下,绣品名震海内,世称“露香园顾绣”,简称“顾绣”。

在顾绣问世之前,传统绣品造型较单一,图案刻板。顾寿潜擅长书画,并且极珍视刺绣艺术,他认为“古来一技神绝,每自不朽,针丝也足以千秋”。他在构图设计上大胆突破,刻意求新,把传统绘画艺术运用到刺绣工艺的设计中去,熔传统绘画艺术与刺绣技巧于一炉,使绣品的面目为之一新,被人们称之为画绣。顾绣的出现,使时人竞相仿制,但终究与露香园制品有差距。直到顾名世的曾孙女、清初才女顾玉兰广招刺绣女生,传授顾绣技艺,从此,顾绣之名,几乎成了长江下游地区丝绣行业的统称,“顾绣之专称,代替刺绣之通名,江南至今如此也”(徐蔚南:《顾绣考》)。

尽管刺绣艺术至清代已有极大的发展,但尚未从理论上加以整理和总结。清嘉庆、道光年间,松江人丁佩不但精通绣艺,而且著成《云间丁氏绣谱》,该书于道光元年(1821年)印行问世。该书总结了绣品能、巧、妙、神、高超等经验,提出了齐、光、直、匀、薄、顺、密作为检验绣品质量的标准,还阐发了刺绣工具与原材料选用等一系列问题。丁氏的著述,首次将刺绣工艺的具体操作升华到理论的高度。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清代江南的刺绣技艺更为精湛,从业者数量极多,所谓“闺阁家家架绣棚,妇姑人人习针巧”,当时的苏州曾被称为“绣市”,涌现了许多刺绣的名家高手,其中以沈寿最为著名。沈寿(1874—1921年),原



图 4-7 沈寿绣制的《全世界救世主耶稣像》

名云芝,字雪君,号雪宦。出生苏州吴县。沈氏 8 岁学绣,15 岁即以技艺精巧而名扬苏州。其夫余觉,是位举人,能书善画。1903 年,沈氏接受农工商部单束笙(其夫好友)建议,为慈禧七十寿辰绣制寿屏“八仙上寿图”和“无量寿佛”。1904 年进呈宫中,慈禧惊为绝世神品,御笔赐书“福”、“寿”二字。夫妇俩遂更名为余福和沈寿。慈禧还颁谕在农工商部设立绣工科,任命沈寿为总教习。由此,沈寿之名遍闻全国,誉为“神针”。1904 年 11 月,农工商部派沈寿夫妇赴日考察,沈氏不仅对日本的美术绣,西方的素描、油画、摄影等悉心研究,而且对工艺美术教育颇为重视。她认为:“日美术绣,千形万态,但入吾目,无不可入

吾针,即无不可入吾绣。”(《雪宦绣谱》叙)并决心以绣自立于世。沈寿将西方艺术(油画之法和摄影原理)与中国传统刺绣技法结合起来,创造了“仿真绣”(亦称“美术绣”、“沈绣”),并留下许多传世的珍品。其中代表沈寿刺绣艺术水平的并曾经在国际上引起轰动的绣品有三幅:一是1909年绣制的《意大利皇后像》,曾先后在南京南洋劝业会上获一等奖,在意大利都朗举办的世界万国博览会上获“世界至大荣誉最高级之卓越奖凭”。二是1915年绣制的,同年在美洲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被评为最高奖一等大奖的《全世界救世主耶稣像》。该像高53.3厘米,宽38.1厘米,呈椭圆形。其绣稿是一幅原名为“荆棘冠冕”的油画,沈寿依据油画的摄影件光色之异,巧用色线,绣成了这幅珍品。三是1916年开始制作,1919年完成的《美国歌舞女明星倍克像》,该像高31.7厘米,宽25.4厘米,呈长方形,这是沈寿呕心沥血的最后遗作。《耶稣像》和《倍克像》现珍藏在南京博物院<sup>①</sup>。此外,沈寿还著有《雪宦绣谱》(由她本人口述,张睿记录整理)一书,着重论述了仿真绣的针法,将苏绣归纳为18种针法,这些都为刺绣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 (四) 编 织

江南的编织业以竹编、草织业为主,其中有嘉定的草编织、嵊县的竹编、鄞县的席草编织等。

嘉定素有黄草之乡的称誉,黄草具有光滑、柔软、坚韧等特点,据《嘉定县志》记载:“黄草立夏时种植,立秋时成熟,拔而整之成束,力揉之,使柔韧,曝之于日,待其半干半湿,再揉之曝之,以干为度储而藏之。应用时沅之于水,用小刀剖开表皮,匀分成缕,染以色,花以援,编制鞋帽、提包等物。”

嵊县出产的水竹质地坚韧,纹路细密,可劈至细如发丝、薄如纸

<sup>①</sup> 王玉桐、刘伟东:《中国刺绣艺术的瑰宝》,《南京博物院集刊》1987年第9期。

片,适宜加工成各种精巧优美的工艺品。而鄞县生产席草,人们用它编织成草包、草袋、草垫、草篮、草帽、扇子、门帘、地毯、席子等工艺品。

### (五) 石 雕

主要指浙南的青田石雕,开始于宋代,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青田石雕的原料是该县山口、方山等地所产的叶蜡石,它质地松脆、晶莹瑰丽,是金石篆刻、工艺美术的极好材料。石雕艺人因材施艺,依据青田的不同色泽、花纹和形态,雕刻出各式各样的人物、蔬果、山水、花木、器皿等工艺品,不仅形似,而且精巧传神。在“冻石”的俏色利用上,艺人的技艺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譬如刻一松树,外层常石,里面忽见一白冻,即刻为白鹤或明月;见一红冻,即刻为红日;见一黑冻或苍冻,即刻为乌鸦、山鼠之类。变化之妙,在于其人”<sup>①</sup>。这确实是青田石的自然美质和雕刻家的“神工艺精”的高度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元明之际青田石印章的崛起,使治印艺术得到了重大发展。青田石不惟色泽光润,且松脆细嫩,篆和刻均能遂人意,可使治印意念达于圆满境界,艺术效果最为理想。同时,青田石章有石、硃、三性调和柔融之优点,吃油附色性能好,既不像木质等松软印材吸收过量,又不像金属等硬质印材易使印油印色凝聚不匀。更妙者,石材质脆,遇撞击易于破损碎落,断边缺角,恰被有心的艺术家所巧妙利用,顺其自然,增加天趣。青田石雕确是不可多得的艺苑奇葩。

### (六) 木 雕

江南木雕以东阳木雕和黄杨木雕最为著名。东阳木雕始于唐,发展于宋,盛行于明清。尤其是在明朝已有适应各种建筑物(住宅、宗祠、寺庙)的技艺,且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如牛腿、琴枋、几、拱、斗桁梁的屋架装饰上,不但有各种不同的雕饰,而且布局协调统一。天头、

<sup>①</sup> 《[美]万国巴拿马赛会说明书》。转引自《东南文化》1989年第1期。

锁腰板的门窗装饰也已门类齐全。清代则是东阳木雕的鼎盛时期，务本堂的《耕织图》、让善堂的《西湖十景》等雕刻其技艺已达到鬼斧神工的地步；极为繁丽的“千工床”、“百子图”等至今仍不失为木雕艺术的珍品。

黄杨木雕主要是在温州、乐清等地，也有数百年的历史。黄杨质地坚韧，纹理细密，表面光洁，色彩黄亮。最宜于雕刻人物和动物等小件案头陈设品。如清末温州著名黄杨木雕艺人朱子常，有“五子嬉弥陀”、“布袋和尚”、“捉迷藏”等作品，形象刻画细腻，形神兼备。《虞初新志·巧工记》称赞道：“子常……雕刻绝精，尤擅佛像，神态如生，了无斧凿痕。”

### （七）竹 刻

竹刻即在竹制实物上雕刻字画的一种工艺品。江南的竹刻在明代形成两大流派：嘉定派和金陵派。

嘉定是我国的竹雕之乡。据《嘉定县志》载：“竹刻为艺术之精品，吾邑最负盛名，其为他处所不能媲美者，则为刀法。”明时嘉定派的著名竹雕艺人有朱氏祖孙三代以及秦一爵、沈大生等。祖父朱鹤（字松邻），《竹人录》说他的作品，“所制簪奩，世人宝之，几于法物，得其器者，不以器名，直名之曰朱松邻”；儿子朱小松则以刻古佛闻名；孙子朱三松作品刀不苟下，结构精巧。嘉定竹刻以深刻和透雕见长，另一大特色是皮雕（又名留青），即以竹的外皮作花，以竹肤为底，兼用阳刻、阴刻等技法，作品既能曲尽画理，又有国画书法的笔墨气韵，极其工细精致。嘉定竹刻最盛时期是清代。当时的嘉定画家亦多，竹刻随之互为影响提高，名家辈出。著名艺人有吴之璠，其刀法圆润，布局疏朗，以薄地阳刻最为工绝；封锡禄和其弟封锡璋，均善雕竹根人物；施天章，长于圆雕。此外，还有沈兼、尚勋、周颢等，尤其是周颢能画擅刻，在平刀雕技方面有所创新，刀法变化，效果臻善尽美。

金陵派竹刻的特点是不耐精雕细琢，往往只就其天然形态，稍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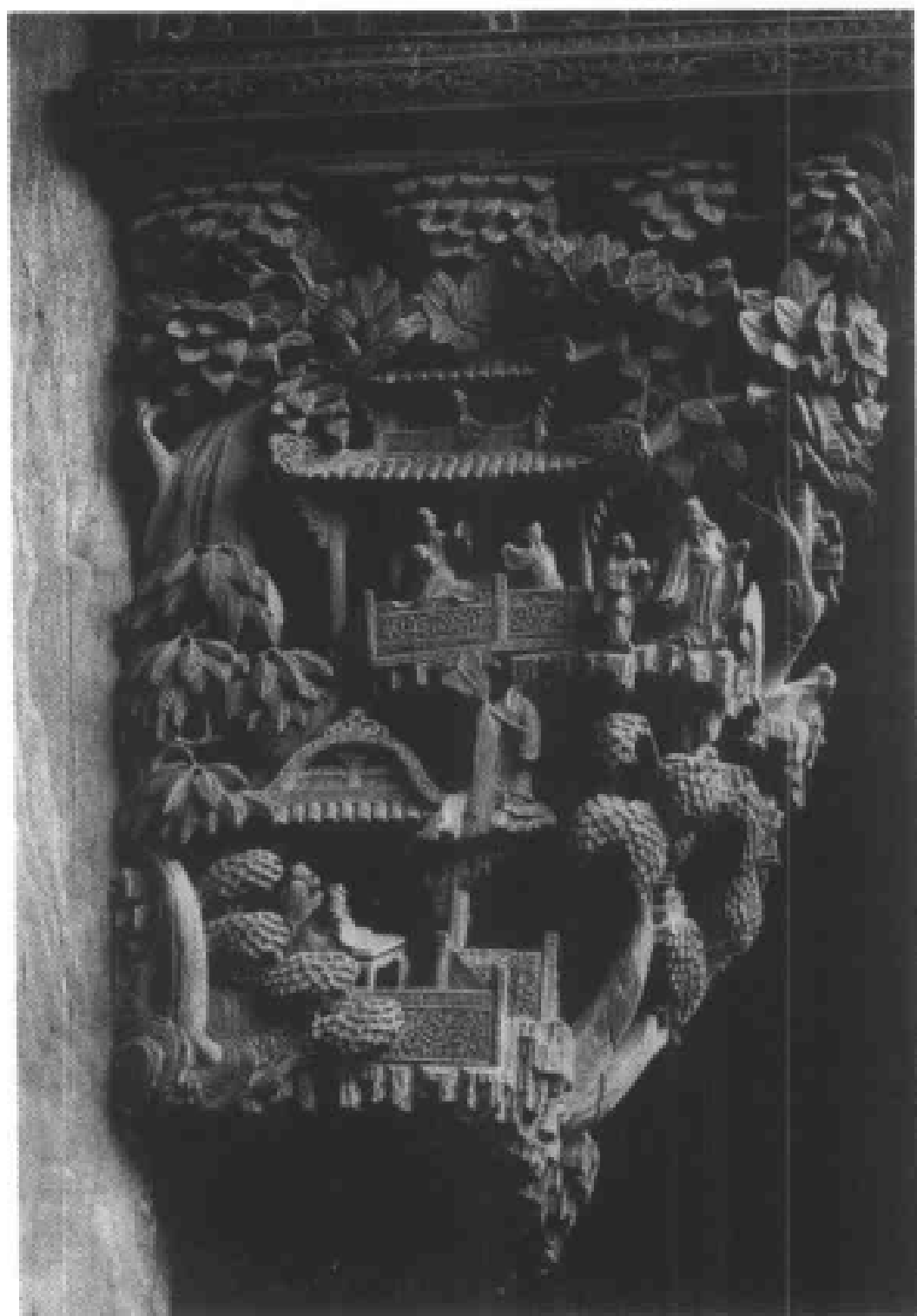


图 4-8 东阳的木雕



凿镂即已成器，自然而有天趣。明时金陵派著名艺人有濮仲谦，他的作品据《初月楼闻见录》记载：“用竹之盘根错节，以不事刀斧为奇”；“勾勒数刀，便与凡异”。其风格是用刀较浅，刀法简洁。至清代，金陵派虽不如明之兴盛，仍有竹雕名工潘西风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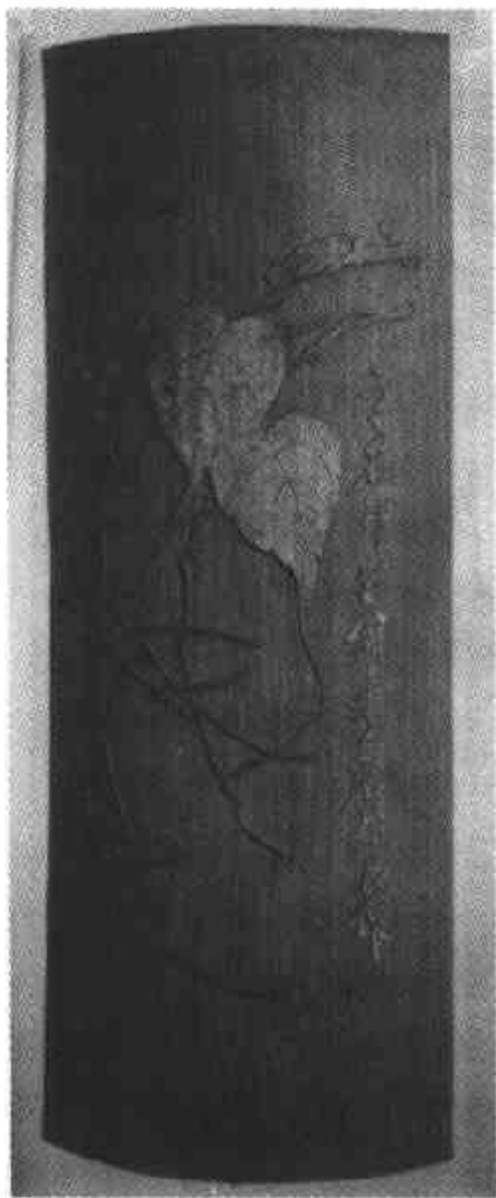


图 4-9 钟山隐的竹刻

金陵、嘉定虽各有千秋，但清中叶以后的文人学者都以濮仲谦的“大璞不斫”和浅刻为高古独绝。如晚清兴盛的浙江文人竹刻，其刀法简率拙朴，以自然和再现书画笔情墨趣为最高追求。其主要的代表作家有方絜、张开福、文鼎等，尤其是方絜（嘉道时黄岩人）乃浙江文人竹刻崛起的关键人物。他的竹刻小像最有名，人称“方竹”，凡山水、人物，小照皆自为粉本于扇骨、臂搁及笔筒上，心手相得，运刀如用笔。方氏晚年寓居嘉兴，对嘉兴竹刻艺术的发展影响颇多。

浙江文人竹刻经民国后期大衰落之后，至当代始有振兴，尤以桐乡竹刻影响较著。乌镇的钟山隐，早年在沪上从名家篆刻，后致力于刻竹，擅长浅刻和留青。刻名家画稿，精微极致，层次丰富，作品为荣宝斋所重，经其介绍，影响遍及海内外。<sup>①</sup>

<sup>①</sup> 叶瑜荪：《浙江文人竹刻》，《浙江画报》1992年第5期。

### (八) 制 扇

早在明代,江南的制扇业十分兴旺,如南京的折叠扇已名扬天下。清朝时期,江南的制扇业主要在苏、杭、宁等城市,形成了一些有特色的名牌产品。苏州檀香扇以檀香木为原料制成。制扇艺人辅之以“四花”(画花、拉花、烫花、雕花)等工艺,使檀香扇既芬芳四溢,又造型优美。还有杭州的王星记扇子,主要生产各种折扇,较名贵的有檀香扇、孔雀羽扇、象牙扇等。

图 4-10 苏州的檀香扇

### (九) 湖 笔

“文房四宝”中的毛笔,向称湖笔。它的主要产地在吴兴县的善琏镇。历年来,善琏镇笔工辈出,被称之为“笔都”,又有“毛颖之技甲天下”的美誉。湖笔的品种如按笔头的原料分,主要有羊毫、狼毫、紫毫

### (八) 制 扇

早在明代,江南的制扇业十分兴旺,如南京的折叠扇已名扬天下。清朝时期,江南的制扇业主要在苏、杭、宁等城市,形成了一些有特色的名牌产品。苏州檀香扇以檀香木为原料制成。制扇艺人辅之以“四花”(画花、拉花、烫花、雕花)等工艺,使檀香扇既芬芳四溢,又造型优美。还有杭州的王星记扇子,主要生产各种折扇,较名贵的有檀香扇、孔雀羽扇、象牙扇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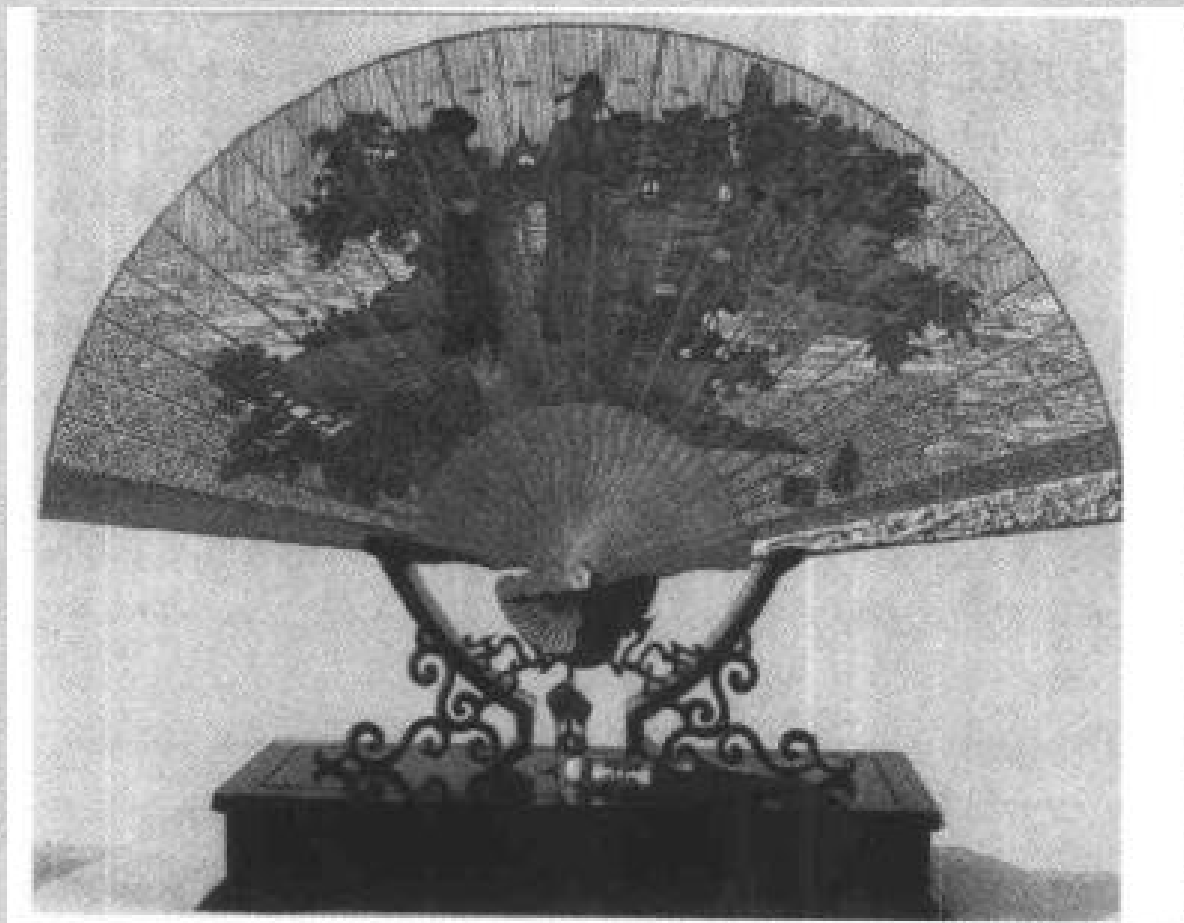


图 4-10 苏州的檀香扇

### (九) 湖 笔

“文房四宝”中的毛笔,向称湖笔。它的主要产地在吴兴县的善琏镇。历年来,善琏镇笔工辈出,被称之为“笔都”,又有“毛颖之技甲天下”的美誉。湖笔的品种如按笔头的原料分,主要有羊毫、狼毫、紫毫

和兼毫等四类。如从锋颖长短又可分作“长锋”、“中锋”和“短锋”。湖笔具有“尖、齐、圆、健”四大特色。所谓“尖”，就是笔锋不偏不倚成尖锋；“齐”，就是笔头展开，锋端整齐；“圆”，就是笔身丰硕圆满，呈圆锥形；“健”，就是书写时，既劲健有力，又富有弹性，刚柔相济<sup>①</sup>。因此，湖笔与端砚、宣纸、徽墨同为“文房四宝”中的珍品。

### （十）宝剑

宝剑是江南特种工艺产品，尤其以龙泉宝剑名闻遐迩。龙泉铸剑的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时代，当时的吴越之地，已有许多著名的剑匠，欧冶子便是其中之一。相传欧冶子曾受越王之聘为楚王铸剑，访遍闽越的名山大川，最后选择了龙泉的秦溪山麓作为铸剑之地，并铸成“龙渊”、“泰阿”、“工布”三把精美绝伦的名剑。自此，龙泉宝剑名扬天下。龙泉宝剑不但具有坚韧锋利、刚柔相济、寒光闪烁等特点，而且装饰精美，剑身均有七星标志和龙凤图案，剑鞘和剑柄均由当地的珍稀木材“花梨木”制成。

---

<sup>①</sup> 《浙江风物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54 页。

## 第五章 学术思想与宗教

---

### 第一节 学术思想

---

秦汉以后,吴越地区的学术思想在先秦吴越先贤思想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受到中原学术思想的渗透和影响,而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后,全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南移,吴越地区的学术思想日趋繁盛。明清时期,这一地区又由于经济的发展而率先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由此带来了意识形态领域内新与旧的激烈冲突,形成了众多代表新兴力量的学术派别,产生了极具吴越文化特色的地域文化效应,像反程朱理学思想的阳明心学派、泰州学派,主张经世致用的清初经学派、浙东史学流派等等,都显示出近代文化的气息。由于清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主义高压政策,学术文化又一度出现万马齐喑的沉闷气氛,学者们埋头故纸堆,从事历史考据,吴越地区的学者们又在考据学领域内做出了不朽的成绩,出现了扬州学派、乾嘉历史考据三大家等。地方志是地域文化的象征,吴越地区地方志的编纂一直站在全国的前列,并出现了古代方志学说的奠基人章学诚。据统计,自清初至近代以前(1644—1839年),全国126位著名学者中,吴越地区即多达78位(其中江苏省52位,浙江省26位),

占 62%<sup>①</sup>,可见吴越地区的学术在清代已遥居全国领先地位,这不仅是吴越地域文化的一大特色,在整个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史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前后,古老文化开始向近代化转变,吴越地区又领全国风气之先,并产生了龚自珍这位近代文化的揭幕人。而后来的夏曾佑、王国维、章太炎、何炳松等则是近代学术思想的代表人物。顾颉刚的古史辨派、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则反映了近现代科学历史学的确立和成长过程。

## 一、经学与哲学

### (一) 汉魏南朝吴越地区之经学与玄学

两汉时期,儒学渐兴,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以后,经学成为禄利之路,儒生能通一经者,皆复其身,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故当时有“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之语,经学遂大兴。吴越一带,经学兴起则稍晚。开始主要是由一些外地经学名儒在这一地区任职治学,逐渐将经学传播开来。如曾任会稽太守的琅邪人鲁伯,是《易》经施氏学的重要人物;曾任扬州牧的平陵人士孙张,是士孙氏经学的代表;曾任广陵内史的鲁人徐襄,是《礼》经徐氏学的代表;曾任广陵太傅的山阳人张无故、曾任丹阳太守的张驯,是《尚书》小夏侯氏学的重要人物;曾任扬州刺史的欧阳歙,是《尚书》欧阳氏学的重要人物。真正吴越地区人士以治经著名的有包咸父子等。会稽曲阿(今江苏丹阳)人包咸,字子良,以习《鲁诗》、《论语》出名,光武帝时曾至京都洛阳授皇太子《论语》。其子包福继父之学,曾以《论语》授和帝刘肇。

<sup>①</sup> 黄绍海:《试论清代学术的地域分布特点及其对近代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近代文化问题》,中华书局1989年版。

三国东吴时期,治经人数渐多。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当时吴人所撰经学类著作有11种之多。其中尤以韦昭和虞翻为著名。韦昭,字弘嗣,吴郡云阳(今丹阳)人,是东吴研经良才,著有《孝经解赞》、《毛诗答杂问》、《国语注》、《官职训》等,其中《国语注》,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国语》注本。虞翻(164—233年),字仲翔,会稽余姚(今属浙江)人,家学世传西汉孟氏《易》学,为当时治《易》名家,撰《周易注》九卷,又曾注《论语》、《国语》、《老子》等,被少府孔融誉为“东南之美者”(《三国志·虞翻传》)。此外,有吴兴姚信《周易注》,海盐陆绩《周易注》和《京房易传》,又有山阴(今绍兴)阚泽以“经传文多难得尽用,乃斟酌诸家,刊约礼文及诸注说以授二宫”(《三国志·阚泽传》)。

东晋南朝时期,吴越地区有会稽谢沉《尚书注》、《毛诗注》,余姚虞喜《尚书释问》、《孝经注》,武康沈麟士《易经要略》、《尚书要略》、《礼记要略》、《孝经要略》,海盐顾欢《尚书百问》、《论语注》等。祖籍南阳顺阳(今河南淅川东南)、从父辈起即移居江南的范宁,先后任余杭令、临淮太守、中书侍郎、豫章太守等职,晚年居丹扬,一生“所务惟学”,“犹勤经学,终年不辍”(《晋书·范汪附范宁传》)。所著《春秋穀梁传集解》十二卷,“其义精审,为世所重”(同上),为现存最早的《穀梁传》注解,收入《十三经注疏》。当时家住豫章的范宣,也以讲授经学为业。在他俩的影响下,当地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同上)。自南朝梁武帝“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后,吴越地区经学大兴,四方“怀经负笈者云会矣”(《南史·儒林传》)。其中吴兴沈峻、会稽贺场便曾担任过五经博士之职,在经学方面颇有成就。此外,尚有贺场之子贺琛《五经滞义》、《三礼讲疏》,山阴孔子祛《尚书义》、《集注尚书》、《续朱异集注周易》、《续何承天集礼论》,武康沈文阿《礼记义记》、《孝经义记》、《论语义记》、《经典大义》,海盐戚衮《周礼音》、《三礼义记》,武康沈重《毛诗义疏》、《周官礼义疏》、《礼记义疏》、《仪礼义疏》、《丧服经义》、《周礼音》、《礼记音》等。

玄学是魏晋时代思想的主流。原籍会稽上虞(今属浙江)、祖先即迁居谯国(今安徽宿县西)的嵇康是当时玄学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崇尚老庄哲学,反对虚伪的名教之治,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的主张,善清谈辩论,为“竹林七贤”之一。著作有鲁迅辑校的《嵇康集》。更具有地域文化色彩的是,东晋初吴越地区的建康(今南京)成为玄学的中心。皇帝带头尚玄,史载晋元帝“餐服玄风”,简文帝“尤善玄言”(《晋书·简文帝纪》)。丞相以下官吏更是“唯玄是务”,清谈之风极盛。如丞相王导在南渡后,对嵇康、欧阳坚石等人的玄学著述清谈不止(《世说新语·文学四》)。

但当时吴越地区思想领域的一大特点是,玄学与反玄学思想并立。在玄学极盛的时期,也产生了反玄学清谈的思想家。如范宁即曾指出,玄谈之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晋书·范汪附范宁传》)。吴处士杨泉更抨击当时的“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无异春蛙秋蝉,聒耳而已”(《困学纪闻·评诗》引《物理论》)。特别是祖上即流寓定居于吴越地区的范缜,“博通经学,尤精三礼”(《南史·范云从兄缜传》),著有《神灭论》,提出“形神相即”,“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朴素唯物论观点,批判灵魂不死的谬论。

## (二) 唐宋元时期吴越地区之经学与理学

唐宋时期,吴越地区有不少学者试图摆脱传统的经师旧说,创自由解经风气。如唐朝的啖助(724—770年),虽为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却长期任职临海(今浙江临海东)、丹阳(今南京)主簿,流寓吴越地区。他以治《春秋》出名,撰有《春秋集传》、《春秋统例》,不顾《春秋三传》,喜以己意说经,开宋儒怀疑经传之风。他的两个著名弟子陆质和施士匄,均为吴越地区吴(今苏州)人,陆质著有《春秋集注》、《辩疑》、《微指》等,施士匄治《左氏春秋》、《毛诗》,唐玄宗读过他们的著作,斥之为“穿凿之学”(《新唐书·啖助传》)。到了宋代,这种学风演变为了一股新儒学思潮,并最终形成为理学。宋初吴人范仲淹(989—



1052年),在吴越地区任职时,重视办学,培养人才,开宋代兴学风气。“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993—1059年),海陵(今属江苏)人,曾先后受范仲淹等人的聘请,在苏州、湖州讲学二十余年,创造了别具特色的“苏湖教法”,采取分科教育方法,立“经义”、“治事”两科,重视经义与时务相结合,把“明体达用”作为“政教之本”,启宋代理学思想之先河。著有《春秋要义》、《春秋口义》、《周易口义》、《中庸义》等。

这一时期吴越地区的两浙路更成为理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地区,学者思想家不断涌现,人数之多,遥居全国各地首位。据《宋史》列传及《循吏传》统计,宋代两浙路共产生文臣248名,名列全国第一位<sup>①</sup>。而据《宋元学案》等统计,北宋全国共有儒者431位,仅两浙路中的浙江一地即达106位,占25%;南宋全国共有儒者918位,浙江一地更多达421人,占46%,几近一半<sup>②</sup>。著名的即有庆历年间的“明州杨杜五子”和“永嘉儒志、经行二子”,元丰年间的“永嘉九先生”,以及南宋时期的“浙东事功学派”等几个极具地域文化效应的学术群体。

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士刘诸儒学案》中说:“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师仁,皆与安定(即胡瑗)湖学相应。”所谓“明州杨杜五子”,是指北宋庆历年间明州(今宁波)的五位儒者: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五位学者相互为友,潜心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皆直接受到过胡瑗的影响。治经,不守章句,黜浮屠老子之说,又“志操高厉,学以穷理为先”,“善言治道,穷历代治乱之原”。王说还曾和他的季父王致,招邀楼郁、杨适、杜醇诸人在妙音院立孔子像,“讲贯经史,倡为有用之学,学者宗之”(《宋元学案·士

① 程民生:《略论宋代地域文化》,《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② 《浙江文化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188页。

刘诸儒学案》)。“一时牧守来浙者,如范文正公、孙威敏公,皆捭衣请见,惟恐失之。最亲近者,则王文公。乃若陈(执中)、贾(昌期)二相,非能推贤下士者也,而亦知以五先生为重”(全祖望:《鮑埼亭集外编·庆历五先生书院记》)。可见当时影响之大。经过“五先生”的共同努力,浙东明州一带儒学极盛,号称“邹鲁”。正如全祖望所说:“有宋真、仁二宗之际,儒林之草昧也。……而吾乡杨杜五先生者,骈集于百里之间,可不谓极盛欤!”“数十年以后,吾乡遂称邹鲁”(同上)。

所谓“永嘉儒志,经行二子”,是指与“庆历五先生”同时,在浙东、永嘉地区的两位儒者:王开祖(字景山,号儒志)、丁昌期(字逢辰,号经行)。他俩都在永嘉讲学著书,“从其学者,常数百人”。后人评价“永嘉师道之立”、“永嘉后来学问之盛,盖始基之”(《宋元学案·士刘诸儒学案》),而推王开祖为“永嘉理学开山祖”(陈谦:《儒志先生学业传》)。

稍后于儒志、经行俩人,又出现了“永嘉九先生”,他们是周行己、许景衡、沈躬行、刘安节、刘安上、戴述、赵霄、张辉、蒋光中。他们在神宗元丰年间,曾同游太学,周行己说:“元丰作新太学,四方游士,岁常数千百人。温州去京师阻远,居太学不满十人,然而学行修明,颇为学官先生称道。一时士大夫,语其弟子,以为矜式。四方学者,皆所从服而师友焉”(周行己:《浮沚集·赵彦昭墓志铭》)。“九先生”的学术,主要学于程门,传洛学,又兼容关学,无门户之见,特别是在强调存心养性进德求知的同时,重视实用,反对空言性命,并认为“义利之心,人兼有之”(刘安节:《刘左史集·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已有义利兼顾的倾向。这些思想为后来浙东事功学派的出现提供了思想基础。

### (三) 浙东事功学派

南宋时期,全国形成许多学派,其中影响最大的为朱学、陆学和浙东地区形成的事功学。朱学讲格物致知,陆学讲明心,二者皆注

重于心性义理研究；而浙东事功学则在言性命义理的同时，强调实事求是功，注重经世致用，这是一股具有反传统经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潮。清代浙东学人黄宗羲评价事功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宋元学案·艮斋学案》）。

事功学以浙东为中心，大致可以分为三派：一是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二是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三是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sup>①</sup>

薛季宣(1134—1173年)，字士龙，号艮斋，官至大理正。他在学术思想上进一步发扬北宋早期永嘉学者注重实用的精神，提出“求经学之正，讲明时务本末利害，……无有空言，无戾于行”的主张（《浪语集·答象先生侄书》），把治学的重点放在研究“实事实理”上，“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事功”（《宋元学案·艮斋学案》）。这一学风得到陈傅良、叶适等的进一步发扬。陈傅良(1137—1203年)，字君举，号止斋，乾道八年进士。他是薛季宣的学生，继承乃师的事功学说，极重《周礼》研究，认为《周礼》“其意要与时务合，不为空言”（《宋元学案·止斋学案》），南宋李心传称他是“最为知今”<sup>②</sup>的学者。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学者称水心先生，淳熙五年进士。他在薛、陈基础上，最终将永嘉事功学推向高峰。其主要特点是，用事功剖析义理，强调义理必须见之于事功，反对虚文空言。用“以物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去反对程朱“以理为本”的哲学，强调《六经》的史学意义，主张经史结合。他说：“经，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经而实史也。专于经则理虚而无证也，专于史则事碍而不通”（《叶适集·徐德操春秋解序》）。他还关心时事，联系实际，提出社会改革方案。对于永嘉学派在当时学术界的重要地位，全祖望曾指出：“乾、淳诸老既歿，学术之会，总为

① 叶建华：《宋代浙江事功学派述评》，《浙江学刊》1989年第6期。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昔人著书多差误》。

朱、陆二派，而水心(叶适)断断其间，遂称鼎足”(《宋元学案·水心学案》)。

永康事功学派的代表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学者称龙川先生，一生主要从事讲学著述。在学术思想上，他肯定“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陈亮集·六经发题·书》)，强强“实事实功”，要求人们“有为”(有所作为)(《陈亮集·上孝宗皇帝第一书》)，认为孔子是学以致用用的圣人，《六经》是孔子的经世之作，所载无不切于实事。又指斥那些专尚义理、脱离事功的道学家们，“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只是“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更“不知事功为何物”，“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是一群“终于百事不理”的“腐儒”(《陈亮集·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又《癸卯秋书》)。他还与朱熹针锋相对展开过长达三年之久的“天理人欲”与“王霸义利”大辩论。他本人一生关心时事，胸怀“经略四方之志”(《陈亮集·中兴论跋》)，把学术研究与当时的“中兴”、“复仇”等实事实功结合起来。他的事功思想曾一度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甚至朝廷。清人黄百家说：“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尘，亦遂为世所忌，以为此近于功利，俱目之为浙学”(《宋元学案·龙川学案》)。当时朱熹连声惊呼：“陈同甫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伯，……可畏，可畏！”(《朱子语类》卷一二三)

吕祖谦(1137—1181年)，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他曾与朱熹、张栻齐名，号称“东南三贤”，并以其独立的学派即金华学派(又称吕学或婺学)，与朱学、陆学相鼎立。全祖望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宋元学案·东莱学案》)。吕祖谦的学术特色是，由经入史，在治性命理学的同时，能继承“文献之学”的家学传统，吸取永嘉、永康事功学说思想，形成了极重“务实”的经世致用学术特征，而与整个浙东事功学相一致。他

曾提出“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的著名学术教育主张(《太学策问》)，强调“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左氏传说》卷五)。史载当时“四方之士争趋之”(《宋史·儒林传》)，“聚学者近三百人”(《东莱文集·与刘子澄》)。朱熹曾以非议的口吻说：“伯恭之学合陈君举、陈同甫二人之学而一之。永嘉之学理会制度，偏考其小小者，惟君举为其所长。……同甫则谈古今，说王说霸。伯恭则兼君举、同甫之所长”(《宋元学案·东莱学案》)。

宋代浙东事功学派在当时产生了轰动的地域文化效应。但由于后来的统治者选择了朱子理学作为官方哲学思想，从而使得这一地域文化思潮没有能产生全国效应。至宋元之际，朱学已一统天下，浙东地区亦传朱子理学，主要代表人物有慈溪的黄震、金华的“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等。浙东事功学派的学术思想在明末清初以后，被以黄宗羲为首的浙东史学流派所承接和发展，再度产生鲜明的地域文化效应。

#### (四) 阳明心学派

吴越地区既是事功学的集中地区，又是心学传播的一个中心。早在南宋时期，即有张九成(钱塘人)提出“心即理，理即心，内而一念，外而万事”(《孟子传·离娄下》)的观点，曾被朱熹攻击为“阳儒阴释”、“洪水猛兽”。陆九渊的心学传入后，这一地区更出现了以陆九渊的高足杨简、袁燮、舒璘和陆九龄的弟子沈焕为代表的心学传播者，因他们都是浙东明州人，史称“甬上四先生”、“四明四先生”或“四明学派”。元明时代，又出现了刘基、宋濂、方孝孺等具有心学思想的学者，如宋濂曾提出“六经皆心学”的著名命题(《六经论》)，认为天下之物“心为大”，“天地之所以位，由此心也；万物之所以育，由此心也”(《凝道记·天下枢》)。到了明中叶的王阳明，则集我国古代心学之大成，创立了完整的心学体系，建立了一个“阳明心学派”。

王阳明(1472—1529年)，名守仁，字伯安，余姚(今属浙江)人，

因曾隐居会稽阳明洞，又创办过阳明书院，故世称阳明先生。官至兵部尚书。他的学说经历“三变”：始由经学入手，又学习程朱理学；后转而出入于佛、道之学；最后“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转向陆学，为明代心学所宗。他继承发展了陆九渊“心即是理”、杨简“道与心一”以及宋濂“六经皆心学”等思想，进一步把“心”视为宇宙万物之本原，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的心学基本命题（《王文成公全书·与王纯甫书》），认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上》）。“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中》）。“知心即知道、知天”（《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上》）。又倡言“知行合一”说，谓“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察精觉处即是知”（同上）。后又专主“致良知”说，反对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说，认为“良知”即“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中》）。同时又融合经、史，以心学去贯穿，提出“《春秋》亦经，五经亦史”（《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上》），“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王文成公全书·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的观点。所有这些思想观点都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产生很大的震动。

阳明心学的流传范围十分广泛，当时及后来以主讲阳明心学为主的姚江书院，“旧人新世翕然咸来问学”（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姚江书院传》），其著名者则先后有许璋、王文轵、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韩孔当、史亲复、王朝式、禹元璞、邵元长等，被称为“姚江学派”，产生强大的地域文化效应。阳明后学更是波及全国南北东西各地，仅黄宗羲《明儒学案》中收录的王门学者即达 100 多人，大致可分为“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以及“泰州学派”等。其中又以吴越地区的“浙中王门”、“泰州学派”为著名。《明儒学案》中列入“浙中王门”的学者有 19 人（其中 1 人附），其代表人物为王畿、钱德洪、黄绾、张元忬等；列入“泰州学派”

的 21 人,以王艮为代表。

### (五) 泰州学派

王艮(1483—1541 年),原名银,王阳明更其名为艮,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今属江苏东台)人。出身盐丁,当过小商贩,又在官府服过役。后发愤自学儒家经典,38 岁时投奔王阳明门下为弟子。王阳明死后,他回乡自立门户,授徒讲学,将心学加以改造,创立“王学左派”——泰州学派。

王艮弘扬王阳明的心学,提倡心为宇宙之本体。又大谈“格物”,以“格”为“格式”之格,即絜矩之谓;以物有本末,身与天下国家为一物,身为本,天下国家为末。他说:“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絜矩则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矩正则方正矣,方正则成格矣,故曰物格”(《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他还提出“百姓日用即是道”的新命题,认为吃饭穿衣便是“圣人经世”。又谓“即事是学,即事是道”,道即“中也,良知也,性也,一也”。强调“愚夫愚妇皆知所以为学”,故重视平民教育。又主张尊身立本,爱己及人,明哲保身,所谓“君子之学,以己度人,己之所欲,则知人之所欲;己之所恶,则知人之所恶”(《王心斋先生遗集·语录》)。

王艮创立泰州学派,“开门授徒,远近皆至”(《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其门徒的成分十分复杂,有大官僚布政使徐樾、教谕王栋、吏部主事林春,也有樵夫朱恕、陶匠韩乐吾、田夫夏叟等,他们奔走四方,影响很大。其中颜山农、何心隐、李贽等学者又发扬王艮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成为反明朝专制统治的新兴力量。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中称:“诸人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王世贞在其《弇州史料后集》中则说:“盖自东越之变为泰州,犹未至大坏;而泰州之变为颜山农,则鱼馁肉烂,不可复支。”清理学家陆陇其更说:“自阳明王氏倡为良知之说,以禅之实而托儒之名,且辑《朱子晚年定论》一书,以明己之学与朱子未尝

异。龙溪、心斋(即王艮)、近溪、海门之徒,从而衍之,……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三鱼堂文集·学术辩上》)。可见泰州学派的社会影响之大。

### (六) 顾炎武与清初经学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剧烈,学术思想界则显得异常活跃,并产生了号称“清初三大思想家”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其中顾、黄均生活在吴越地区,顾为清初经学之祖,黄为清初史学之祖。

顾炎武(1613—1682年),昆山(今属江苏)人,因居亭林镇,学者尊称亭林先生。于经史百家、方志舆地、音韵文字、金石考古等均有研究。其学术思想最显著的一点,在于从经世致用的目的出发,对宋明理学展开了批判。认为理学的“空谈误国”,其罪“深于桀纣”(《日知录·朱子晚年定论》)。所以,他重新对理学作出解释,提出了“理学即经学”的新命题,试图以朴实经世之经学取代哗众取宠之理学,成为清初“通经学古”、“治经复汉”、“信经求是”的经学研究之先导,并迅速激起共鸣,回声四起,特别是在吴越地区的江浙一带,产生强大的地域效应。吴江经学家朱鹤即指出:“经学之荒也,荒于执一先生之言而不求是,苟求其是,必自信古始”(《愚庵小集·毛诗稽古篇序》)。常熟冯班也说:“经学盛于汉,至宋而疾汉如仇;玄学盛于晋,至宋而诋为异端。注疏仅存,讹缺淆乱,今之学者,至不能举其首题”(《钝吟文稿·经典释文跋》)。流寓扬州的四川新繁籍学者费密,则以表彰“古经定旨”为职志,主张“学者必根源圣门,专守古经,从实志道”(《弘道书·古经旨论》)。萧山毛奇龄,淹贯群书,博学多能,著述宏富,计有经集 51 种二百三十六卷,文集 66 种二百五十七卷,汇为《西河合集》刊行,于黄宗羲等大师谢世后,俨然浙学盟主。而其最自负者为经学,特点是对既往经说进行彻底批判,“不惮取儒说之祸经者,力为考辨”(《经问》卷一四),被梁启超誉为“清学界最初之革命者”,“一冲锋陷



阵之猛将”<sup>①</sup>。德清胡渭，著《易图明辨》一书，给宋学来了一个釜底抽薪，被梁启超称为“思想之一大革命”<sup>②</sup>。又著《禹贡锥指》一书，集中体现其注重实学、关心时务的经世思想。仁和（今杭州）姚际恒，熟通诸经，积四十年之精力著成《九经通论》一书，又著《古今伪书考》等，对诸经及其他典籍提出大胆的怀疑和考辨，被梁启超称为清初“疑古的急先锋”<sup>③</sup>。此外，尚有万斯大、黄宗炎、朱彝尊等经学家。

总之，清初由顾炎武开辟的经学研究思潮直接影响了吴越地区整整一代的经学研究实践，使这一地区的经学研究一直站在全国的首列，取得的成就也最大，直至清末。诚如梁启超所言：“清学（主要是指清代经学——引者注）之发祥地及根据地本在江浙。”<sup>④</sup>其“最后之壁垒”亦在江浙。<sup>⑤</sup>

#### （七）扬州学派

清乾嘉时期，学术转入考据，考据的重点在经学。当时形成许多既有联系又各具特色的学术派别，吴越地区的吴派、皖派以及稍后出现的扬州学派等，都是著名的经学流派。

吴派的创始人是江苏吴县的惠栋（1697—1758年），他家世传经学，曾祖有声、祖父周惕、父亲士奇都是有名的学者。祖父号“老红豆先生”，父号“红豆先生”，他本人号“小红豆先生”。其治学特点是尊信和固守汉儒经说。他曾在门上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曰“六经宗服（虔）郑（玄）”。梁启超用“凡古必真，凡汉皆好”<sup>⑥</sup>八字概括惠派的治学方法。所著有《周易述》、《易汉学》、《九经古义》、《古文尚书考》等。在他

①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2页。

③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76页。

④ 《清代学术概论》，第59页。

⑤ 《清代学术概论》，第6页。

⑥ 《清代学术概论》，第26页。

影响下的吴派经学家主要有吴江沈彤,长洲余萧客、江声,甘泉江藩,嘉定王鸣盛、钱大昕等。

皖派的创始人为皖南休宁人戴震(1724—1777年),他反对宋明理学,不拘泥于一家之言,长于考据,精于声韵。其弟子大多为吴越地区人,特别是他曾为吏部尚书王安国(扬州人)之子王念孙授读,又于乾隆二十二年开始,留寓扬州七年,故其学术思想直接影响了扬州的经学家,并逐渐形成为一个颇具地域文化特色的学派——扬州学派。近人刘师培在《南北考证学不同论》中说:“戴氏弟子,舍金坛段氏外,以扬州最盛。”金坛段氏,即段玉裁(1735—1815年),其学主声韵训诂,所著《说文解字注》被誉为“自有《说文》以来,未有善于此书者”(卢文弨:《抱经堂文集·段若膺说文解字注序》),“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王念孙:《王石臞先生遗文·段若膺说文解字序》)。而当时扬州学派的经学家则有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汪中、汪喜孙父子,焦循、焦廷琥父子,刘宝树、刘宝楠兄弟及宝楠之子刘恭冕,刘文淇、刘毓崧、刘喜曾祖孙父子,以及阮元、任大椿、黄承吉、李惇、程晋芳、刘台拱、贾田祖、江德量、凌廷堪、秦思复、钟怀、罗士琳等。其中又以王念孙、汪中、焦循、阮元为主要代表。他们的学术特色和治学风格是,继承和发展了吴、皖两派的考据学,在专、精的基础上,强调融会贯通。当代文献学家张舜徽在《清代扬州学记》一书中评价吴、皖、扬州三派学术及其作用说:“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然吴学专宗汉学遗说,屏弃其他不足数,其失也固。徽学实事求是,视夫固泥者有间矣,而但致详于名物度数,不及称举大义,其失也偏。扬州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专精汇为通学,中正无弊,最为近之。”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经义述闻》,汪中的《明堂通释》,焦循的《易通释》,阮元的《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等著作,都是专精会通之作。到近代刘师培,“以绍述先

业,昌洋扬州学派自任”<sup>①</sup>,被张舜徽誉为“清代扬州学派的殿军”。<sup>②</sup>

### (八) 常州学派

常州学派,又称“今文经学派”、“公羊学派”,是形成于清代中后期吴越地区的一个重要经学流派,在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政治影响。其创始人为庄存与、刘逢禄两位常州人。

庄存与(1719—1788年),乾隆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等。为学不分汉、宋,喜公羊家言。曾宗法公羊义例,著《春秋正辞》,专求所谓“微言大义”。著作汇辑为《味经斋遗书》。刘逢禄(1776—1829年),嘉庆进士,官礼部主事,庄存与外甥,自幼得庄存与之传,后又向从舅庄述祖问学,为常州学派的奠基人。精于《公羊春秋》,著《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等,阐发公羊“微言大义”,宣扬“张三世”、“通三统”等思想。同时还有宋翔凤,亦庄存与外甥,治西汉今文经学。稍后则有戴望(德清人),从宋翔凤治《公羊春秋》阐发“微言大义”。

常州学派的出现,使衰落一千多年的今文经学得到再兴。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常州学派的今文经学得到了大大发展,并与社会政治密切联系。龚自珍、魏源等皆曾从刘逢禄治今文经学,并引公羊义论政,阐发社会改革之政治观点。尤其是龚自珍(1792—1841年),吴越地区仁和(今杭州)人,进一步将公羊哲学中“据乱—升平—太平”的三世说历史观,加以改造发挥成“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用来论证当时的封建统治已陷入危机,从而鼓动变革。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亦受常州学派今文经学的影响,以公羊历史哲学作为他们的改良与变革主张的哲学依据。戊戌变法失败后,今文经学议论时政的风气衰落。民国初则有崔适(浙江吴兴人),专治今文经学,著有《春秋

<sup>①</sup> 尹炎武:《刘师培外传》,《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册,1936年宁武南氏排印本。

<sup>②</sup> 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页。

复始》等。

### （九）清末三大儒

在近代今文经学派崛起并与传统经学发生冲突的时候，吴越地区还出现了三位传统经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他们就是俞樾、孙诒让和黄以周，在戊戌前后，号称“三大儒”。其中俞、孙又被梁启超称为传统经学“最后之壁垒”。<sup>①</sup>

俞樾(1821—1907年)，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道光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等，长期主讲吴越地区杭州的诂经精舍、苏州的紫阳书院和上海的求志书院等。在经学研究方面，完全继承扬州学派的路子和方法，以王念孙、王引之为宗。仿王引之《经义述闻》体例，著成《群经平议》一书；又仿王念孙《读书杂志》体例，撰成《诸子平议》一书；还总结传统的校勘、音韵、训诂方面的知识，写成《古书疑义举例》一书，成为传统经学后期的代表作。

孙诒让(1848—1908年)，字仲容，号籀廌，浙江瑞安人。同治举人，官刑部主事，后主温州师范学校，任浙江教育会长。致力于《周礼》研究，又治先秦诸子及文字学。所著《周礼正义》一书，坚守古文经学立场，是传统经学家《周礼》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被梁启超誉为“清代经学家最后的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sup>②</sup>。而《墨子间诂》一书，更被梁启超誉为“古今注《墨子》者固莫能过此书，而仲容一生著述，亦此书为第一也”。<sup>③</sup>

黄以周(1828—1899年)，字元同，号傲季，浙江定海人。同治举人，历任分水训导、内阁中书、处州府教授等。曾主讲江苏南菁讲舍、浙江宁波辨志精舍等。少受父亲黄式三教导，为学不立门户，认为三

① 《清代学术概论》，第6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08页。

③ 同上书，第360页。

代以下之经学,惟汉郑玄、宋朱熹最精审。代表作《礼书通故》与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一起,被梁启超誉为“清代经师殿后的两部名著”。<sup>①</sup>

## 二、史学与方志

### (一)《越绝书》与《吴越春秋》

注重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是吴越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秦汉时期产生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是吴越地区现存最早的地方史志著作。

《越绝书》,共十五卷二十五篇,现存十九篇,余散佚。是书作者,或称战国时子贡或子胥撰,《四库全书总目》等根据书末隐语,定为东汉会稽人袁康撰、吴平校定。一般认为,此书非一人一时所作,而是战国时人所为,汉人附益,东汉时袁康、吴平整理而成<sup>②</sup>。主要记述春秋时期吴、越二国交兵争霸的史事。叙事注重追根溯源,交待事件的前因后果。又重视对吴越山川、湖泊、都邑、道路、物产、亭台、宗庙等的记载。这些史料可与《左传》、《国语》、《史记》等有关记载相互印证,并可补其不足。有些记载,如《越绝外传记宝剑》篇记载吴越宝剑,锋利无比,这已为现代的考古发掘所证实。

《吴越春秋》,东汉初著名学者、会稽山阴(今绍兴)人赵晔所著。原十二卷,后经晋杨方刊削、皇甫遵改定成十卷。成书时间大约与《越绝书》相当。前五卷记吴国历史,后五卷记越国历史。每卷记事基本上按年代顺序排列,体例完整统一,叙事本末咸备,比《越绝书》更完整系统地记载和反映了吴越民族起源、发展和衰亡的历史全过程。对

<sup>①</sup>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25页。

<sup>②</sup> 叶建华:《浙江史学探源——论〈越绝书〉、〈吴越春秋〉的文化意义》,《浙江学刊》1989年第1期。

古吴越地区的民族语言文化、风俗民情、生活方式以及信仰迷信等社会风尚,也有较多的反映。

由于《越绝书》和《吴越春秋》都采用了许多传闻异说,于道术、魂魄、阴阳等虚妄之事亦有记载,鲁迅曾指出它们“虽本史实,并含异闻”。<sup>①</sup>

## (二) 王充与《论衡》

王充(27—约97年),字仲任,东汉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年轻时受业太学,师事著名史家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后汉书·王充传》)。勤于著述,自称平生所著有《讥俗》、《政务》、《养性》、《论衡》四部,皆疾俗情、闵治政、疾虚妄之书。现仅存《论衡》一书,共三十卷八十五篇(内缺《招致》一篇),约二十余万字。

王充生活的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内充斥着虚妄迷信,史学领域里则是神学史学泛滥成灾,虚妄不实风气浓厚。《论衡》就是为揭露和批判这种虚妄学术而作。据王充自言:“《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文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论衡·对作》)。又说:“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论衡者,论之平也”(《论衡·自纪》)。并公开以“疾虚妄”一语概括全书的中心内容(《论衡·佚文》)。

书中认为,当时的学术思想虚实混淆,真伪莫辨,是非不分,已到了“是反为非,虚转为实”,“浮妄虚伪,没夺正是”的绝境(《论衡·对作》)。那些“短书小传”,固然“虚不可信”,而诸子百家“传书之言”亦“并失其实”,更不用说那铺天盖地横行蔓延的“伪书俗文”了(《论衡·书虚》、《自纪》、《正说》)。而一切虚妄不实的根源,在于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所以,王充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对加在历史真实之

<sup>①</sup> 《鲁迅全集·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上的种种虚妄说教,作了全面清算,并进而批判了中世纪的官方哲学以及世俗风情等。据今人统计,《论衡》一书中,使用“实”字(包括“非实”、“不实”、“失实”等,但不包括“果实”之实)凡 431 次;用“虚”字(包括“不虚”)凡 169 次;用“妄”字凡 59 次;用“误”字凡 11 次;用“信”字(包括“不可信”)凡 17 次;用“伪”字凡 8 次;用“非也”凡 17 次。共计使用这些字眼达 741 次。这在古代任何一部著作中,都是极少见的,可见其批判锋芒的犀利、战斗性之强。因而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批判史学著作”,并对后代刘知幾、郑樵、章学诚、梁启超等批判史学家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sup>①</sup>。同时,书中也反映了王充本人“元气自然”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以及历史发展的观念等。

### (三) 魏晋隋唐时期吴越地区之史学与方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朝代更替频繁,反映社会变化的史学却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尤其是地区史学更为发达。吴越地区也是史才辈出,史著纷呈,并主要表现在国史、当代史的编撰,以及地方史志的编纂和地方文献的整理两个方面。

国史当代史的编撰,在当时有全国影响的有:东吴山阴人谢承的《后汉书》,位居“八家后汉书”之首;吴郡武进人华覈、薛莹与吴太史令韦昭共撰的《吴书》;东吴太子太傅张温的《三史略》。东晋会稽人谢沉的《后汉书》、《晋书》、《汉书外传》;余姚虞预的《晋书》,谢灵运的《晋书》;祖父起即定居吴越地区的袁山松《后汉书》,袁宏(袁山松族叔)《后汉纪》;东莞姑幕(今江苏常州)人徐广的《晋纪》。西晋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人陆机的《晋纪》。南朝梁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沈约的《宋书》、《晋书》、《齐纪》、《高祖纪》;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人吴均的《齐春秋》、《后汉书注》。南朝陈吴郡吴人陆琼的《陈书》;吴兴武康人姚察的《汉书集解》、《梁书集解》等。

<sup>①</sup> 叶建华:《王充与中国批判史学》,《浙江学刊》1993年第5期。

人物传记及地方史志著作主要有：会稽上虞人慧皎的《高僧传》，嵇康的《圣贤高士传赞》，余姚虞通之的《后妃记》，彭城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徐州先贤传》、《江左名士传》，谢承的《会稽先贤传》，谢沉的《吴越记》，虞预的《会稽曲录》、《诸虞传》，贺循的《会稽记》，吴均的《钱塘先贤传》，孔灵符的《会稽记》，杨方的《楚国先贤传》，吴郡吴人陆澄的《地理书》，吴人顾野王的《舆地志》等。这一时期，《吴越春秋》颇受当地人的重视，加以整理研究的有杨方的《吴越春秋削繁》、皇甫遵的《吴越春秋传》等。

隋唐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皆在北方，吴越地区史家不多。主要有吴兴陈叔达的《隋记》，盐官褚无量的《史记至言》、《帝王纪录》、《帝王要览》，海盐顾允的《汉书古今集义》，湖州徐坚的《晋书》、《注史记》、《大隐传》，富阳凌准的《汉晋春秋》，嘉兴陆贽的《玄宗编遗录》、《道使录》，海宁顾非熊的《妙女传》等。特别是武康姚思廉参加唐初正史修撰，在父亲姚察所撰梁、陈史的基础上撰成《陈书》、《梁书》，均名列“二十四史”。余姚虞世南著有《帝王略论》一书，是中国史学史上较早系统评论历代帝王得失贤愚的历史评论专著，从中反映出作者卓越的史识和进步的历史观以及历史比较研究方法等，在唐代乃至古代历史评论史上，都具有代表性。

#### （四）浙东史学流派

浙东史学流派，是吴越地区乃至古代中国出现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史学派别，为中国文化史上所罕见。它的形成时间，严格来说是南宋时期。当时所谓的“浙学”，即浙东事功学的三个中心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其代表人物皆注重史学，在言性命义理的同时，“必究于史”，注重从现实出发研究历史，强调学术必须经世致用。叶适的代表作《习学记言序目》绝大部分为论史文章，陈亮则有《酌古论》、《汉论》、《三国纪事》、《史传序》等，吕祖谦更有《大事记》、《历代制度详说》、《东莱左氏博议》、《史记详节》、《通鉴译节》等，都是宣扬



事功实学的史学著作。其他还有浙东绍兴地区陆游的《南唐书》，高似孙的《史略》、《剡录》；宁波地区黄震的《古今纪要》、《黄氏日钞》，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证》、《汉制考》、《通鉴地理考》、《通鉴地理通释》、《困学纪闻》等。

元明时期，史学的理学化现象严重，浙东史学受其影响较大。但元初的几位浙东史家如胡三省、袁桷、金履祥、许谦、柳贯、张明卿等依然在史学上做出了一定成就。至明初修《元史》，浙东史家有宋濂、王祎、胡翰、张孟兼、朱廉、张文海、傅恕、陈基、朱右、陶凯、宋禧等 11 人参加编写，其中宋濂、王祎还担任总裁。到了明末清初，由于时代的变迁，学术思想的演变，浙东史学再度崛起，出现了以黄宗羲为首的史学新流派。他们远承宋元以来浙东史家的优良传统，近受王阳明、刘宗周等哲学思想的启蒙，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并通过著书讲学，师友相传，为浙东地区培养了一大批有识之士，并逐步将浙东史学推向鼎盛。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东余姚人。父遵素官御史，为东林名士，撰有《隆万两朝列卿记》等史书，于明天启朝被宦官魏忠贤党徒所害。年轻的黄宗羲为报父仇，曾参与复社反宦官权贵的斗争。刘宗周在蕺山讲学，他从之游。清兵南下，他积极组织地方武装抗清，并参加了南明鲁王政权。明亡后，一直从事著书讲学，屡拒清廷征召。黄宗羲学问渊博，是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其影响后来最大者是史学。所著《明夷待访录》，是一部通过研究明朝兴亡的教训，“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sup>①</sup>，并表现出浓厚的近代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经典之作。所编撰的《明文案》、《明史案》、《明文海》、《明儒学案》等，是对明代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之作。尤其是《明儒学案》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学术思想史著作，为中国史学创立了一种新史体——学案体。黄宗羲先后主讲过绍

<sup>①</sup>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146 页。

兴证人书院、余姚姚江书院等，通过授徒讲学，教育学生博究经史，从事经世实学。前来受业者络绎不绝，翕然从风，从而为浙东地区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史学人才。如万斯大、万斯同兄弟是黄宗羲的高足，邵廷采也曾问业于宗羲，全祖望则私淑黄宗羲、万斯同，其后出者则有邵晋涵、章学诚等，虽未直接受业于宗羲，却承继了浙东史学的统系，而章学诚实为浙东史学流派的殿军。诚如梁启超所云：“浙东学风，从梨洲、季野（万斯同）、谢山（全祖望）起以至于章实斋（学诚），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sup>①</sup>

万斯同（1638—1702年），字季野，号石园，鄞县人。黄宗羲最得意的门生。他立志要弘扬宗羲的学术，并认为，黄氏学术的真谛在于“经纬天地”、经世致用。他说：“经世之学，实儒者之要务，而不可不宿为讲求者”（《石园文集·与从子贞一书》）。其经世致用史学突出表现在重视明史研究和历代制度研究以及表彰宋明忠义之士三个方面。他以布衣参史局，主撰了长达五百卷的《明史稿》，又著有《宋季忠义录》、《两浙忠贤录》、《明季两浙忠义考》，以及《历代史表》、《明代河渠考》、《昆仑河渠考》、《儒林宗派》等史著。

邵廷采（1648—1711年），字念鲁，余姚人。服膺王阳明、刘宗周的事功节义学说，并先后主讲姚江书院达17年之久。又曾问学于黄宗羲，亲承黄氏之史学。仿黄宗羲《行朝录》著成《东南纪事》和《西南纪事》两部史书，专门记述南明政权匡复始末的历史，被梁启超誉为“有系统的著述”<sup>②</sup>。又作《史略》、《治平略》、《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以及《阳明王子传》、《蕺山刘子传》、《姚江书院传》等。为学“以经世自负”（《思复堂文集·赠秘湖山人张五皋序》），主张“文章无关世道者可以不作，有关世道者不可不作”（《思复堂文集》王揆序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00页。

② 同上书，第412页。

引)。其学术思想对后来邵晋涵、章学诚影响很大。

全祖望(1705—1755年),字绍衣,号谢山,自署鮑埼亭长,鄞县人。一生读书、著书、讲学,承黄宗羲、万斯同之遗绪,在晚明清初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以及学术史的编纂和乡邦文献的整理刊布方面,做出了较大成绩。特别是续补黄宗羲的未竟之书《宋元学案》,进一步完善了学案体学术思想史著作的新体裁。被近人誉为“浙东史学大柱”。<sup>①</sup>

邵晋涵(1743—1796年),字与桐、二云,自号南江,余姚人。邵廷采从孙。曾任四库全书馆纂修官,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提调。其学术不仅深受邵廷采影响,而且还受到刘宗周、黄宗羲等浙东学术先辈们的影响,又与章学诚为挚友。有志于改编《宋史》,又帮助毕沅审定《续资治通鉴》,在四库全书馆期间,负责《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的编写,还辑有《旧五代史》,参加过《杭州府志》、《余姚县志》的编修。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绍兴)人。一生坎坷贫困,以著文讲学为生。向慕浙东史学先辈黄宗羲等的学术思想,且其“根底则出邵氏(廷采)”(《文史通义·家书三》),对邵廷采的学术思想推崇备至,又十分景仰万斯同、全祖望,更与邵晋涵结为挚友,相互讨论勉励。他弘扬浙东史学的学术思想,突出地表现为强调学术必须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义理和专事考据。他大声疾呼:“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文史通义·浙东学术》)。又说:“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烦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文史通义·与史余村》)他又高唱“六经皆史”,并进而提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的著名命题(《文史通义·报孙渊如书》)。还强调“作史贵知其意”,主张良史要具备“史德”等等。所著《文史通义》是古代最

<sup>①</sup>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4页。

著名的史学理论专著,又著有《校讎通义》、《史籍考》(未刊行),以及多部地方志书。晚年所作《浙东学术》一文,不仅追根溯源,论述了清代浙东史学流派的发展脉络和统系,更总结了它的一系列特点和主要精神,“标志着浙东史学流派已发展到了自我反省总结的阶段,是浙东史学流派发展到极盛时期的产物”。<sup>①</sup>

作为时代产物的浙东史学流派,在清代达到了繁荣顶点之后,到近现代已不复存在。但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现象,其产生的地域效益和影响却是深远的,近现代许多吴越地区的思想家、史学家都或多或少受到过它的影响。

#### (五) 江浙野史

野史,即私人撰述的史书。有明一代尤其是明末清初,社会发生变革,官史记载严重失实,于是民间私人写史成风,野史盛行。虽经清廷多次禁毁,很大部分已化为灰烬,但幸存数量仍十分可观。当代学者谢国桢先生曾著《晚明史籍考》一书,加以搜罗考载。当时江浙吴越地区一带,野史特盛,蔚然成风,成为一大地域文化特色。现存明清之际野史,著名的几乎均为江浙人士所著。如王世贞、焦竑、徐紘、项笃寿、谈迁、张岱、查继佐、计六奇等所著,皆属野史中之上乘,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王世贞(1526—1590年),字元美,号凤洲、弇州山人,太仓人。嘉靖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在史学上赞成“六经皆史”说,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主理者”的论点(李贽:《续藏书·尚书王公传》)。所著《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是一部当代史传记之作,共八卷,记载明世宗、穆宗、神宗三朝阁臣事迹,以示明朝积弱之由来。还写过《明野史汇》一百卷,可惜已失传。另著有《弇山堂别集》、《弇州山人四部稿》、《艺苑卮言》等。长子王士骐,万历进士,著有《馭倭录》、

<sup>①</sup> 叶建华:《浙东史学流派简史》,《浙江学刊》1990年第6期。

《武侯全书》等。

焦竑(1540—1620年),字弱侯,号漪园、澹园,江宁(今南京)人。万历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博极群书,于经史、稗官、杂说,无不通晓。属泰州学派学者,又笃信李贽之学。所著《国朝献徵录》、《焦氏笔乘》为明代野史笔记之作,另著有《玉堂丛话》、《澹园集》、《俗书刊误》等。

谈迁(1594—1657年),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署“江左遗民”,海宁人。立志编撰明史,历二十余年撰成六易其稿的《国榷》百余卷,后不幸全稿被窃,又发愤重写,前后花在该书的时间达30多年。全书共一百零八卷,其中卷首四卷,分门别类汇辑明代朝章典制,正文按年月日编载史事,上起元文宗天历三年(1328年),终于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史料丰富,尤其是所载万历以后明与后金之史事,为它书所不及。另著有《北游录》、《西游录》、《海昌外志》、《史论》、《枣林杂俎》、《枣林集》等。

张岱(1597—1676年),字宗子,号陶庵,山阴(今绍兴)人。认为“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谏,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石匱藏书·自叙》)。遂立志编一部明史。历27年完成纪传体明史《石匱藏书》共二百二十卷,分本纪、志、世家、列传四大部分,《自叙》云:“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阙勿书。”记事从明初到天启而止。后又补撰了崇祯朝纪传及南明史事六十三卷,称《石匱书后集》。另著有《古今义烈传》、《张氏家谱》、《史阙》、《琅嬛文集》等。

查继佐(1601—1676年),字伊璜,号奥斋,明亡后改名省,字不省,海宁人。崇祯举人,长期授徒乡里,清兵南下,参加浙东抗清斗争。鲁王监国,任兵部职方郎中,参与保卫钱塘江的战斗。兵败隐居海宁。晚年讲学于杭州铁冶岭,名其居曰“敬修堂”,学者称敬修先生。庄廷铨“明史案”发生,被牵连入狱。获释后改名左尹,号非人。著有纪传体明史《罪惟录》一百零二卷,始太祖迄安宗,南明诸王以附纪形式列

于安宗纪后。《自序》云：“手草易数十次，耳采经数千人。”材料来源较广，所载晚明史事之详超过其他典籍。另著有《鲁春秋》、《东山国语》、《国寿录》等。

计六奇(1622—?年)，字用宾，号天节子，别号九峰居士，无锡人。以教书为业，蓄意著述。著有编年体晚明史书《明季北略》二十四卷、《明季南略》十八卷。前书记事上自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下迄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记北都时事大略；后书始福王弘光元年(1644年)，迄康熙四年(1665年)，记南明四王兴亡史迹，依年叙次，又各标事目，合编年与纪事本末为一体。在明清野史中属较有条理的史著。另著《南京纪略》、《粤滇纪闻》、《金坛狱案》、《辛丑纪闻》等。

此外，武进(今常州)徐纮著《明名臣琬琰录》、唐顺之著《广右战功》、《荆州稗编》，嘉兴项笃寿著《今献备遗》，长洲(今吴县)祝允明编《九朝野记》，兴化李清编《南渡录》，以及陈仁锡、王在晋、王光鲁等，均撰写过大量野史。

#### (六) 乾嘉历史考据三大家

清初开辟一代新学风的顾炎武，青年时代即已钻研史学，后来他将所搜集的史料千余卷全部借给吴越地区吴江的吴炎和潘柽章两位青年史学家，时吴、潘正在全力合撰《明史记》一书。康熙二年(1663年)，庄廷铨“明史案”发生，吴、潘均遭牵连而被杀，顾炎武所借史料也全都散失，成为古代史学上的一大悲剧。顾炎武对两人之死十分悲痛，写诗挽之云：“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顾亭林诗文集·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

清明史馆成立后，网罗学者参加，吴越地区有朱彝尊、潘耒、毛奇龄、万斯同等，为《明史》编写作出了贡献。

到了乾嘉时代，考据学大兴。吴越地区出现了三位著名的历史考据学家王鸣盛、钱大昕、赵翼及其考史名著《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

王鸣盛(1722—1797年),字凤喈,号礼堂,又号西庄,晚年改号西泚居士,嘉定(今属上海)人。乾隆十九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解官居苏州。始以诗文出名,后由治经转而治史。所著《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对《史记》以下十九种正史(因宋人习惯称十七史)一一加以校勘考证,“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释蒙滞,审核踳驳”(自序)。又著有《尚书后集》、《蛾术编》等。

钱大昕(1728—1804年),字晓徵,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晚称潜研老人,嘉定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历官詹事府少詹事、广东学政等。后定居苏州,不复出仕,先后主讲钟山、娄东、紫阳书院。所著《廿二史考异》一百卷,是其毕生心血之结晶,着重考订年代、官制、地理沿革及文字校勘、名物训诂等。另著有《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等。

赵翼(1727—1814年),字耘松,号瓯北,阳湖(今常州)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预修《通鉴辑览》,历官广西镇安知府、贵西兵备道。后以亲老乞养归,不复出仕,曾主讲安定书院。工诗善文,尤长于历史考据。所著《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实际上是对二十四部正史(书名沿旧称,未把《旧唐书》、《旧五代史》计入数内)加以考证。内容不局限于文字校勘、名物训诂等,还着重将分散的史料加以分类综合归纳,评论了历史治乱兴衰之迹、古今风会之变化,以及各史编纂体例得失等。故其价值和影响在《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考异》之上。另著有《陔余丛考》、《皇朝武功纪盛》、《檐曝杂记》以及诗文集等。

### (七) 方志与方志学说

我国地方志经汉魏地记、隋唐图经的发展演变,至宋代基本定型成熟,到清代达到鼎盛。吴越地区在宋以后方志编修一直站在全国的前列,而清代章学诚则是方志学说的创立者。

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所载,宋代纂修省志、府志、县志 50 种

以上的有7省,浙江名列第一,为129种;江苏第三,为73种。而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加以统计,全国现存南宋方志共28种,浙江即占17种,江苏占6种。著名的有被誉为“世所罕传”之佳作的“临安三志”(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堪称古方志“双绝”的“会稽二志”(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被称为“著书之创体”、“地志之善本”的《吴郡志》,乡镇志之“嚆矢”《澉水志》,以及《剡录》、景定《建康志》、嘉定《镇江志》、咸淳《毗陵志》等。当时许多著名学者如陆游父子、高似孙、谈钥、薛季宣、陈傅良等都参加过修志论志。

元代现存方志11种,浙江占4种,江苏3种。著名的“四明六志”有三种修于此时,即大德昌国《州图志》、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特别是延祐《四明志》为著名学者袁桷所修,是现存元代方志中最为后世推重的佳作。当时温州平阳的章彝(字德元,号春谷)在至大、延祐年间,曾接连纂修了《温州路志》、《瑞安州志》、《永宁志》、《东瓯志》等四部府县志,这在方志史上是不多见的。

明代现存方志989种,浙江占115种,位居第一;江苏100种,居第二位。当时出现县县修志的局面,有的府县志是一修再修,如湖州府凡9修,处州7修,杭州、嘉兴、宁波、绍兴、衢州、严州各6修,台州、温州各5修,萧山县8修,海宁县7修等。著名的志书有《姑苏志》、《维扬志》、嘉靖《浙江通志》、万历《会稽县志》、崇祯《海昌外志》等。还出现了许多专志,如《南船志》、《龙江船厂志》、《万里海防图说》、《两浙江海防类考续编》、《筹海图编》等。

清及民国时期的方志现存7330种,其中浙江为463种,江苏445种,均位居前四名。这一时期不仅方志种类增多,体例也逐步走向近代。尤以川沙(今属上海)人黄炎培的《川沙县志》,龙游人余绍宋的《龙游县志》最具近代特色。这一时期方志学理论的探讨正走向成熟,当时方志学界针对方志学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形成所谓的地理派和文献派。其代表人物均集中在吴越地区的江浙一带。阳



湖(今常州)洪亮吉、孙星衍、李兆洛等极力赞同戴震的地理派观点,主张修志重在考证地理沿革,故又称考据派、厚古派。而以会稽章学诚、仪征阮元、江阴缪荃孙等为代表的文献派,力主编修方志应经世致用,以保存一方文献资料,详于当代,故又称详今派。就对古代方志学理论的贡献来说,以章学诚最为突出。

章学诚一生参修或主修过《天门县志》、《顺天府志》、《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多部志书,在不断的修志实践中,运用自己丰富的史学理论,总结吸取前人修志经验,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方志学说,建立起方志学。如关于方志的起源、性质和作用,章学诚认为,方志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地方史书,故方志的性质应属史体,只不过是一方之史而已。其作用亦与史书一样,既要起到经世致用的作用,又要为国史编修提供资料。关于方志编纂理论,章学诚提出了著名的方志分立三书主张,“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并特别对作为方志主体的“志”的体裁和内容作了详细说明,认为应包括纪、传、考、图、表等部分。他还对各类方志记载的范围、界限作了辨析,又建议州县设立志科,专门掌管搜集地方文献,为编好方志创造条件。

#### (八) 王国维与“新史学的开山”

进入近现代以后,吴越地区又出现了多位史学大师,他们的学术和思想在国内外都具有重大影响。其中如王国维的新历史考据学、章太炎的国粹主义史学、顾颉刚的古史辨派史学、范文澜的新通史学,以及夏曾佑、何炳松、孟森、萧一山、吴晗、陈梦家等史家,都在近现代史学上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王国维(1877—1927年),字静安,号观堂,海宁人。初受康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学说思想的影响,研究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后

主攻文学,撰有《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辛亥革命后,随罗振玉(上虞人)东渡日本,并在罗的影响下开始致力于甲骨文、金文等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进而运用近代西方史学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方法相结合,对中国古代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研究,得出了许多新的结论。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古史研究的自我批判》中称王国维为近代中国“新史学的开山”。1927年王国维在北京颐和园投昆明湖自尽。生平著作繁富,汇为《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其史学成就主要表现为:

第一,对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有关甲骨文的搜集、整理著作主要有:《戩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殷墟书契考释序》、《殷墟书契考释后序》等。有关敦煌文物和汉晋简牍的搜集、整理著作主要有:《屯戍丛残考释》、《流沙坠简》及《考释》《补遗》《附录》(与罗振玉合编)、《敦煌汉简跋》、《罗布淖尔东北古城所出晋简跋》等。有关金文、石经的著录考证有:《两周金文韵读》、《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魏石经考》、《明拓石鼓文跋》等。此外,其他史料整理著作还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齐鲁封泥集存》、《圣武亲征录校注》、《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以及《水经注校》等等。

第二,利用新史料对古史进行考证研究。王国维十分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他利用甲骨文资料研究商周历史和典章制度,著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古史新证》等影响整个近代学术的著名论著。首先考定了商代的先公先王和帝王世系,以及商朝的重臣及地理位置,证明商代历史的信而有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商周两代制度之异同,敏锐地发现了商周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与此同时,他还利用铜器金文考究商周许多重要的具体史实,著有《说商颂》、《洛诰解》、《生霸死霸考》、《明堂寝庙考》、《周书顾命考》、《古礼器略说》、《毛公鼎铭考释》、《散

氏盘考释》、《孟鼎铭考释》、《克鼎铭考释》等论著。他又结合汉晋简牍,对秦汉历史特别是汉郡和西陲古地理进行了考证研究,著成《秦郡考》、《汉郡考》、《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后汉东部侯官考》、《汉魏博士考》、《流沙坠简序》等文,既对秦汉郡县设置沿革变化及汉魏博士官制度的演变历史作了一次清理考证,又对我国西北边塞的许多古城遗址、西域道路交通等作了精确的考定。他还利用敦煌文书资料对唐代的历史地理和制度沿革进行研究,如根据唐写本职官书残卷考证了唐代职官制度中的许多问题;依据敦煌户籍文书考证了唐代均田制的具体内容;根据收集到的有关碑文考证了唐代于阗等镇的有关史实。王国维还利用新发现的许多少数民族遗文,对蒙元史、匈奴史以及突厥、回鹘等北方少数民族历史进行了广泛细致的研究,著有《鞑靼考》、《萌古考》、《蒙古札记》、《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耶律文正公年谱及余记》、《鬼方昆夷獯豸考》、《西胡考》及《西胡续考》、《胡服考》、《高昌宁朔将军鞠斌造寺碑跋》、《九姓回鹘可汗碑跋》等等论著,考定并解决了许多历史问题,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提出“二重证据法”的史学研究方法。王国维在《古史新证·总论》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这个“二重证据法”,就是以地下发现的新材料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以求得事实之真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它比传统的单纯以文献证文献的考证方法无疑是大大前进了一步。

### (九) 章太炎与国粹主义史学

章太炎(1869—1936年),名炳麟,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余杭人。少从俞樾学习经史,后投身政治活动。生平著作众多,今人汇

为《章太炎全集》行世。其学于哲学、文学、史学、语言学等均有贡献。而尤以阐发“国粹”史学，强调史学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极端重要性为最突出。其史学论著主要有《尊史》、《征七略》、《焚书》、《哀清史》、《信史》、《征信论》、《与邓之诚论史书》、《论今日切要之学》、《台湾通史题辞》、《历史之重要》、《论读史之利益》、《略论读史之法》、《史学略说》等。并曾立志编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惜未成)。

章太炎是“国粹”史学(民族主义史学)的倡导者和鼓动者，其史学自始至终贯注着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他以史学为“国粹”之灵魂，说：“国粹以历史为主”<sup>①</sup>。将国民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历史的关系生动形象地比作庄稼与灌溉及土壤的关系：“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sup>②</sup>“历史上之陈迹即为爱国心之源泉，致用时之棋谱。其系于一国之兴亡为尤巨。”所以，历史知识应成为每个国人都必须掌握的基本常识。史学不仅是国粹主义的核心，也是近代“最切要之学”，“若一国的历史已没有了，就可知道这一民族的爱国心亦一定衰了”。<sup>③</sup>

在章太炎看来，民族主义史学与爱国主义、国粹主义史学是一致的。他在1906年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的演说辞中，明确提出要“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并说：“为甚么要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汉种的历史。这历史，就是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如果不重视祖国的历史，“就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

① 章太炎：《印度人之论国粹》，《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6页。

② 章太炎：《答铁铮》，《章太炎全集》(四)，第371页。

③ 《章太炎论今日切要之学》，《中法大学月刊》第5卷第5期。

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sup>①</sup>。直到晚年,他哀痛国土沦丧,还到处反复强调研究历史和学习历史对于挽救民族危机、增进国民爱国心的重要作用,大声疾呼读史。他说:“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即如吾人今日欲知中华民国之疆域,东西南北究以何为界,便非读史不可;有史不读,是国家之根本先拔矣。……不讲历史,昧于往迹,国情将何由而洽?”“昔人读史注意一代之兴亡,今日情势有异,目光亦须变换,当注意全国之兴亡,此读史之要义也。”<sup>②</sup> 民族主义精神必须时时牢记胸中,不可须臾忘却,“惟民族主义日日沦湮胸中,虽积之十百年,终有爆发之一日。宋亡民不能救也,逾七八十年而香军起;明亡民不能救也,逾二百七十年而民国兴。此岂揭竿斩木之为力哉?有民族主义在其胸中,故天下沛然响应也”。甚至说:“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以民族主义所托在是。”<sup>③</sup>

章太炎还十分注意运用历史直接为当时的反帝国主义侵略和推翻清朝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服务。他曾直言不讳地自称:“鄙人提倡读史之志,本为忧患而作。顷世学校授课,于史最疏,学者讳其伧陋,转作妄谈,以史为不足读,其祸遂中于国家。”<sup>④</sup>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响应,推翻了清朝,章太炎认为,这就是历史民族主义观念深入人心之故,他赞扬道:“炳麟不佞,始以历史民族主义提倡光复,……逮乎辛亥,大义举于武昌,十有四省应如反掌。夫惟历史民族主义,足以为全国斗杓,故举兵不为犯顺,推亡不为篡盗。”<sup>⑤</sup> 面对当

① 章太炎:《演说录》,《民报》1906年第6期。

② 章太炎演讲:《历史之重要》(诸祖耿记录),《制言》第52期。

③ 章太炎:《答张季鸾问政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60页。

④ 章太炎:《与邓之诚论史书》,《制言》第51期。

⑤ 章太炎:《致袁世凯书》,见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57页。

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章太炎运用史学武器,揭露和鞭挞侵略者的罪行。他以大量的史实证明“台湾者,实中国所建置”,对中日《马关条约》的“割台”深表愤慨<sup>①</sup>。他还发表宣言,“以历史及掌故等言,证明东三省属中国”,指斥“日本攻东三省,实明知取非其有,故遁其辞曰自卫;又不可,乃文其罪而造满洲国。人民不服,而有义勇军,非明明伪造耶?”又“根据史实,证明热河与满洲无关”,并“电达日内瓦,昭告世界”,义正辞严地宣告:“东三省为中国领土,不容分割!”<sup>②</sup>

章太炎对“国粹”史学的研究和阐发,在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

#### (十) 顾颉刚与古史辨派

顾颉刚(1893—1980年),原名诵坤,字铭坚,苏州人。1923年他在胡适办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著名学说。认为传统的所谓中国古史,完全是后人一代代垒造起来的,并非客观真实的历史。而且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古史辨》第一册中编)。这一观点一发表,立即引起学术界的轰动,钱玄同、胡适、傅斯年、周予同、罗根泽等积极响应,共同发扬疑古精神,以“辨伪”、“考信”为职志。特别是吴兴(今湖州)钱玄同(1887—1939年),为表示坚决怀疑古史,干脆直称自己为“疑古玄同”,连姓都不要了。在顾颉刚等的影响和带动下,疑古学者日益增多,在史学界形成了一股颇具声势的疑古思潮。同时也遭到刘炎藜、胡肇人、柳诒徵等信古派学者的激烈反驳,双方展开了一场古史论战。到1926年,顾颉刚把论战双方的文章、信函汇集编成《古

① 章太炎:《台湾通史题辞》,《太炎文录续编》卷二。

② 《马相伯、章太炎联合宣言》,《申报》1933年2月10日、2月20日。

史辨》第一册出版。一个以“疑古”为旗帜,以考辨古史资料为职志的学派——“古史辨派”终于形成。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收录这长达二十年间考辨古史资料的文章约三百五十篇 325 万字。

在论战中,顾颉刚等不仅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古史辨派的基本理论为基础,而且又提出必须打破四个传统观念:(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依据这些古史辨理论,他们对大量的古籍和古史作了分析考订,特别是对长期以来人们迷信的《尚书》、《易经》、《诗经》等儒家经典进行了认真系统的考辨,推翻了尧舜禹文武周公的传统上古史体系,在上古史料的考证、批判和利用方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 (十一) 范文澜与《中国通史简编》

范文澜(1893—1969年),字仲沅,号芸台,绍兴人。1940年春,受中共中央委托,着手编写中国通史,于1941年出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1943年出版中册,内容从原始社会到清朝中叶止。这是第一部完整系统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通史著作,取得了与以往旧史书截然不同的意义:第一,肯定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否定了旧史书以帝王将相为历史主角的观点;第二,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充分肯定了历代农民起义和民族斗争;第三,探求社会发展规律,把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阶段,又将封建社会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并说明历史处于螺旋式发展过程;第四,重视经济生产状况和科学技术成就;第五,说明中国古代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

同时,本书夹叙夹议,文字简洁,通俗易懂。出版后又屡次修订再版,日趋完善。在数十年内累计发行量达几百万册,成为我国一部主要的通史读物。

范文澜原计划将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史作为《中国通史简编》的

下册,1943年至1945年已写到义和团运动,1946年改名《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出版。当时治中国近代史的人很少,范著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系统叙述了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过程,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此书也是一再修订再版,至1956年已印了第九版。

范文澜是现代史学界中国通史研究领域的主要代表。直到逝世之前,他仍在筹划通史的撰写工作。

---

## 第二节 宗教与信仰

---

汉代以前,吴越地区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原始的对多种自然神灵的崇拜。东汉时期,道教与佛教传入吴越地区,迅速改变该地区的宗教信仰,并产生许多派别,其中道教派别有葛洪的金丹派新道教、陆修静的南天师道、陶弘景的茅山宗、张伯端的南宗等;佛教宗派有天台宗、禅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等。在民间,尤其是一些僻远地区,则仍保留着较多的信鬼尚巫等原始信仰。伊斯兰教、摩尼教、罗教、袄教等也在民间一定范围内流传。元明清时期,西方基督教中的景教和天主教传入中国,在吴越地区活动频繁,其传播又往往与近代政治斗争相联系。

### 一、道 教

#### (一) 葛洪与金丹派新道教

东汉时期,原始道教的两大教派太平道和天师道(又称五斗米道)在吴越一带流传。史称献帝建安中,有道士自称于吉,避乱江东



吴、会郡，“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在今江苏高邮邵家沟东汉末年村落遗址中，曾出土当地道教的遗物“天地使者”封泥和符篆木牍。符篆木牍的左上端画有符，右下端书写“天帝神降，已如汝名，疾去三千里”等咒文<sup>①</sup>。据《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记载，天师道“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邵家沟出土的这一符篆木牍，大概就是当时天师道或太平道为人治病请祷而“埋之地”的“三官手书”之一。

到了魏晋时期，在上层士族中已有许多原始道教的信徒和道士。如吴越地区的王羲之、王凝之父子，是五斗米道的忠实信徒。《晋书·王羲之传》载：“羲之次子凝之，为会稽内史。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东晋穆帝时大官僚郗音、郗昙兄弟也是崇尚五斗米道，与当时另两个信奉佛教的官僚何充、何准兄弟对立，故当时有“二何佞于佛，二郗谄于道”之讥（《建康实录·孝宗穆皇帝》）。

魏晋时期也出现了原始道教加以改造的人物，其代表是吴越地区的葛洪。葛洪（约284—364年），晋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好神仙方术，后从郑隐受炼丹术，撰成《抱朴子》一书。咸和五年（330年）后，携子侄至广州居罗浮山修道至卒。在《抱朴子》中，他提出“道者，儒之本；儒者，道之本”的思想，宣称“元”（或称“玄”、“道”）为宇宙精神性的本体和附于人体的灵物，将儒学的纲常名教融注进道教之中。又追求长生不死，认为长生不死的方术唯有炼成金丹“仙药”，所谓“夫长生仙方，则唯有金丹”（《抱朴子·地真》）。他还指斥民间道教

<sup>①</sup> 《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的清理》，《考古》1968年第10期。

为“妖道”、“邪道”，主张用严刑峻法，“以杀止杀”。这一派道教被称为金丹派新道教。

## （二）陆修静与南天师道

陆修静(406—477年)，字元德，南朝宋吴兴东迁(今浙江吴兴东)人。他致力于对原始道教天师道的改革，吸收佛教思想、仪节，创立了比较系统的道教斋戒仪范，以“斋直”为求道之本，以“礼拜”、“诵经”、“神思”三法，洗心净行，被称为“南天师道”。泰始三年(467年)，又奉命在建康搜集整理道经，集经戒、方药、符图等书凡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分为洞真、洞玄、洞神三洞。后又撰定《三洞经书目录》，为我国最早的道教经书总目。其弟子有孙游岳(399—489年，东阳人)等。当代学者任继愈在《中国道教史》中称：“在道教史上，陆是融合天师道与神仙道教，使早期民间道教发展为以奉持三洞经典科戒为特征的官方新道教的大师。”

## （三）陶弘景与茅山宗

陶弘景(456—536年)，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士，南朝齐梁之际丹阳秣陵(今江苏江宁)人。年10岁即得葛洪《神仙传》，及长，研读不已。曾被引为南齐诸王侍读，后退隐句容之句曲山，又从东阳孙游岳受符图经法。因传说西汉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在句曲山修道成仙，号“三茅真君”，故句曲山又称“茅山”。陶弘景在此筑馆修道，尊“三茅真君”为祖师。晚年又皈依佛教，其教徒既有道士，又有道人(僧侣)。著有《真灵位业图》、《效验方》、《肘后百一方》等。其思想源于老庄及葛洪的金丹派理论，又杂有儒、佛，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他虽退隐，却又积极参与朝廷政治活动。曾援引图讖支持梁武帝萧衍篡夺齐帝位。国家有吉凶征伐大事，也常找他咨询，被时人称为“山中宰相”(《南史·陶弘景传》)。

## （四）杜光庭与《道教真经广圣义》

隋唐五代时期，南方道教盛于北方。吴越地区的茅山、天台山成

为道教中心,同为道教十大洞天之一。道士有徐刚、周息元、甘泉先生、司马贞、吴筠等,而最著名者为杜光庭。杜光庭(850—933年),字宾圣,号东瀛子,唐末五代时处州缙云(今属浙江)人。原为儒生,应试不第,遂入天台山修道。后随唐僖宗入蜀。前蜀时,赐授“广成先生”、“传真天师”等封号。著述繁多,主要有《道德真经广圣义》、《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道教灵验记》、《道门科范大全集》、《广成集》、《历代崇道记》等,对道教经典、思想源流、历代崇道、神仙怪异、洞天福地、道门科范、斋醮忏仪等多有论述。特别是《道教真经广圣义》一书,依据唐玄宗御注,发挥微言大义,总结历代《道德经》注疏,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成为当时道教学者研究《道德经》的代表作。他援儒入道,调和儒、道,提出“修道即修心也,修心即修道也”的主张,进一步将道家生命学说与儒家道德学说结合起来。

#### (五) 张伯端与南宗

宋以后,吴越地区道教益盛,道观日多。据《松江府志》所载,当时建于松江(今上海)的宫观道院就有仙鹤观、丹凤楼等十余所。宋代道教史上最有意义的是道教南宗思想的创立,其创立者为吴越地区天台道教学者张伯端。

张伯端(984—1082年),字平叔,后名用诚,号紫阳。幼学儒学,有志科举。屡试不第,乃浪迹山水,访求大道。丹成又返天台,传道授徒。并于熙宁八年(1075年)著成《悟真篇》一书,以诗词的形式,对北宋以前的内丹方术加以系统的总结,提出自己的炼丹理论。认为儒、佛、道“教虽分三,道乃归一”,宣扬“三教一理”思想,强调要长生成仙,只修金丹是不够的,而必须探究“本源真觉之性”,只有先明心见性,才能体无上至真之道。这种先修性后修命、性命双修的思想,是对道教生命哲学的重大发展。张伯端因而被后世推为道教南宗的开创者,或称紫阳派祖师。与北方王重阳所传的主张先修命后修性理论的道教北宗,并传于世。

## 二、佛 教

佛教于东汉晚期传至江南吴越地区,桓、灵时期,安息(今伊朗)僧侣安世高,曾到过丹阳、会稽等地传教。丹阳人笮融是一个大搞佛教活动的官吏,他在献帝时,“聚众数百”,从丹阳往依徐州牧陶谦,贪污广陵、彭城、下邳三郡漕运的“委输”,在彭城“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三国志·刘繇传》)。可见其影响之大。

三国时期,吴都建业(今南京)成为一大佛教重地。许多高僧都来此讲学、译经、传教。如大月氏人支谦汉末避乱居吴地,被孙权拜为博士,令他与韦昭同辅太子孙登。他在三十余年间,共译经数十部,成为江东的译经大师。此外,江东译人还有维祇难、竺将炎、康僧会等。其中康僧会曾建议孙权立塔以储舍利,赤乌十年(247年)孙权为之立建初寺(一名大市寺),这是江东第一座佛寺,也是吴越地区建佛寺之始。

魏晋时期,佛学与玄学相表里。吴越地区的建康(今南京)既是玄学中心,也是佛教中心。当时皇帝皇后大臣都带头信佛、建佛寺。如康帝时褚皇后立延兴寺,中书令何充立建福寺。穆帝时何皇后立何皇后寺,彭城敬王立彭城寺,镇西将军谢尚造谢寺(一名兴严寺)。哀帝时僧人慧力造瓦官寺。废帝时中书令王坦之造临秦、安乐二寺。简文帝时自立波提寺。建康还是当时中外佛教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名僧法显自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去取经,然后取海道东归,于义熙九年七月至建康,在建康道场寺与名僧宝云、觉贤等共同翻译从印度、斯里兰

卡带回的佛律、佛经,又将西行经历写成《佛国记》(又名《法显传》),成为佛学名著,对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

南朝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梁武帝定佛教为“国教”。建康仍是南方佛教中心,佛寺最多时达七百多所,僧尼十余万。故唐代诗人有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说明唐代建康佛寺仍保存很多。著名的如同泰寺,是梁武帝三次舍身出家的寺院,道场寺和华林园,是佛经翻译中心。当时著名的佛经翻译家有真谛、竺道生等。最著名的佛教学者则首推慧皎(497—554年),会稽上虞人,著成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僧人传《高僧传》。全书共十四卷,收录自东汉至梁初共257名僧人事迹,又附见200余人,分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亡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等十门,每门之后,加以评论,成为研究中国佛教史乃至魏晋南北朝历史文化的重要典籍。

隋唐以后,尤其是五代两宋时期,吴越地区佛教兴盛不衰,佛寺广建。扬州的大云寺、升州的功德寺、天台山的国清寺、牛首山的仙窟古寺,都是著名的佛教胜地。当时的杭州,更是寺院林立,有“东南佛国”之称,北宋苏东坡有“西湖三百六十寺”之词句。其中灵隐寺在吴越国王钱俶时期,僧徒已达三千多人。还有净慈寺,前后有大小十余座寺院,成为杭州最大的寺院群。雷峰塔、保俶塔则在西湖南北两岸,相映成趣,俗谚有“湖上两浮屠,雷峰如老衲,保俶如美人”之称。

最能体现吴越地区佛教文化特色的是,中国佛教的几大宗派如天台宗、禅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牛首宗等,均在吴越地区有广泛的影响,有的是创立于该地区,或以该地区为传播中心。

### (一) 智顓与天台宗

天台宗是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它初创于南北朝,形成于隋唐时期,以智顓为实际创始人,因以天台山为根据地,故名。

智顓(538—597年),俗姓陈,字德安,18岁出家。陈太建七年(575年)入天台山修炼,讲《法华经》十余年,人称“天台大师”,又受

隋晋王杨广赐号“智者”，故又称“智者大师”。死后，杨广为其建寺，初名天台寺，因相传老僧定光曾说过“寺若成，国即清”之语，隋炀帝即亲赐寺额，名“国清寺”，为中国佛教四大丛林之一。

智顓融合当时南北佛教的特点，以《法华经》为佛的最高最后说法，故又称“法华宗”。其教义宣传“真如缘起”、“一念三千”、“一心三观”、“三谛圆融”，特别强调“止观并重”、“定慧双修”。由他口述、弟子灌顶（561—632年，浙江临海章安人，一说江苏常州义兴人）集录成书的《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等书，统称为“天台三大部”。而灌顶本人为智顓创建天台宗的得力助手，自著有《涅槃经说》、《观心论疏》、《国清百录》、《涅槃玄义》、《天台八教大意》等，人称“章安大师”，被尊为天台宗五祖。到唐中叶，常州人湛然（711—782年，世居晋陵荆溪）进一步发展天台宗教义，提出“无情有性”观点，认为草木砖石也有“佛性”，被称为“湛然中兴”，他本人则被称为天台“九祖荆溪尊者”。五代吴越国时，天台第十五祖义寂（919—987年，温州人），通过当时信奉佛教的吴越王钱俶，遣使到高丽（今朝鲜，一说去日本）访求天台教典。北宋初，义寂死后，天台宗内部逐渐演成“山家”、“山外”两派。山家派的领袖知礼（960—1028年），四明（今宁波）人。山外派的代表人物智圆（976—1022年），钱塘（今杭州）人。两派分别以浙东四明和杭州天竺为传播中心。南宋后，山外派渐弱，山家一派代表天台正宗。

天台宗在朝鲜、日本，传播也十分广泛。特别是日本，形成了以京都比睿山为中心的天台佛教文化圈，现约有教徒400余万人，寺院3200所，还办有大正大学、睿山学院等，并出版《天台宗报》。

## （二）禅宗三派

禅宗是中国佛教重要宗派之一。创立于南朝宋末年，自六世祖慧能以后，分为二系（南岳、青原）、五家（南岳系下的沩仰、临济两宗，青原系下的曹洞、云门、法眼三宗）、七宗（上述五家，合临济下的黄龙、

杨岐两宗)。其中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均为吴越地区僧人所创,其流传范围亦多以吴越地区为主。

曹洞宗为唐会稽诸暨人良价(807—869年)与弟子本寂共创,立君臣五位说,以君臣、功勋、王子等封建伦理范畴,比附佛教的体用、真俗、理事等关系,又以“理事圆融”为中心,主张即事见真。宗风细密稳实。流传久远,宋时传入日本。

云门宗为唐末五代时姑苏嘉兴人文偃(864—949年)所创。因住韶州(今广东韶关)云门山弘扬禅宗,自成一系,世称“云门文偃”。以“函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为宗旨,称“云门三句”或“云门剑”、“吹毛剑”。宗风简洁高古,辩锋险峻,注重一切现成。北宋时,从者甚众,其中灵隐主持契嵩(1011—1072年)在杭州一带广传云门宗,使当地禅寺林立,禅风极盛。南宋后,云门宗逐渐衰微。

法眼宗为唐末五代时余杭人文益(885—958年)所创。文益自幼出家,后住金陵(今南京)清凉院,因称“清凉文益”,卒后被南唐中主李璟谥为“法眼大禅师”。他以禅宗的基本主张,兼取华严宗“六相”(总、别、同、异、成、坏)教义,宣传“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唯心,万法唯识”的宗旨。提出“具理具事”、“理事相资”、“即心是佛”等观点。其宗风倡导“对病施药,相身裁缝,随其器量,扫除情解”,表现出禅教并重的趋向。著有《宗门十规论》。门人众多,盛于五代末北宋初。吴越末年,高丽王读到法眼宗僧人延寿(904—975年,钱塘人)所著《宗镜录》一书,遂遣使来华赍书叙弟子礼,延寿为随使前来的智宗等三十余人印可记莒,从而使法眼宗传入朝鲜。

此外,禅宗临济宗的支派杨岐派,在南宋时由虎丘绍隆、大慧宗杲领衔,在吴越地区活动频繁,并进而发展为临济宗“正脉”。南宋庆元五年(1196年)日本僧人俊芿赴杭州径山从该宗第六世佛智元聪(1136—1209年)受法,临济宗始传入日本。清光绪年间,普陀山僧人慧根,在上海建佛寺,后临济宗第四十六世可成将寺改为玉佛寺,成

为修习禅法之处。

另外,唐时,法融禅师曾在吴越地区的牛首山(一称牛头山、天阙山)仙窟古寺,设禅开教,成为佛教牛首宗的发祥地,在佛教中称“江表牛头”。

### (三) 道宣与南山律宗

道宣(596—667年),唐润州丹徒(今属江苏)人,一说湖州长城(今浙江长兴)人。16岁出家。因常住陕西终南山弘传戒律,世称“南山律师”。曾参加著名的玄奘译场。提倡“四分律”,以号召佛教徒明戒、守戒为宗旨,立戒坛,制定中国佛教的受戒法仪,自此戒坛始有定式。一生著述宏富,主要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羯磨疏》、《戒本疏》、《拾毗尼义钞》、《比丘尼义钞》,被称为南山律宗的五大部疏。弟子千余人。

宋时,律宗的中心移于杭州。当时著名的律宗僧人是赞宁(911—1001年,吴兴德清人),他在杭州祥符寺出家。吴越国时曾被吴越王钱俶任命为吴越国的僧统,主管全国僧众和宗教事务。宋初又得法宝律师传承。精于南山律,时人誉为“律虎”,很受帝室推崇,宋太宗赐号“通慧大师”,官至左街僧录。著有《宋高僧传》、《三教圣贤事迹》等。当时钱塘的允堪和余杭的元明等,又以注解道宣著作而出名。

自唐宋至元,律宗兴盛不衰。唐天宝十三载(754年),又由鉴真传入日本。

### (四) 澄观与华严宗

澄观(738—839年),唐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11岁出家,21岁起遍寻名山,广学经论。先诵天台《法华经》,后又遍学三藏。唐大历中入钱塘天竺寺专研华严宗的《华严经》。又曾从天台宗湛然学天台止观学,向牛头山惠忠、径山道钦等咨南宗禅法。晚年居五台山清凉寺专讲《华严经》。贞元十一年(795年),应诏赴朝廷,被礼为“教授和尚”,赐号“清凉国师”,参与般若译场,译出四十卷本《华严经》。澄



观以弘扬华严正宗为己任,提出“理事无碍观”、“真空观”、“周遍念容观”,成为华严宗的集大成者,被推尊为华严宗四祖。著作有《华严经疏》、《华严法界玄镜》、《三圣圆融观门》等。至宋代,华严宗在吴越地区的主要代表是玉睿(?—1038年),嘉禾(今浙江嘉兴)人,其门徒甚众,达一千余人。

### (五) 省常与净土宗

净土宗,亦称“莲宗”,因教义简单,方法易行,称只要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之名,即可往生西方“净土”,故深受广大下层群众的欢迎。宋元以后,渐成为中国佛教流传最广的教派。吴越一带,净土宗也盛行,很多其他宗派的僧人也往往联系净土宗信仰而念佛修行,如天台宗的知礼、遵式,律宗的元照等。而最著名的净土宗人物是省常(959—1020年),钱塘(今杭州)人,他在西湖结净行社,集合千余人,提倡念佛。一时影响吴越各地,各地结社集会念佛日益增多,使净土宗广泛流传于民间。省常因被列为“莲宗七祖”之一。当时吴越地区的禅门法眼宗僧人延寿,也因提倡净土信仰,被列为“莲宗七祖”之一,这就直接影响到净土宗与禅宗的融合。

## 三、其他宗教信仰

汉末以后,道教、佛教在吴越地区的广泛传播,迅速改变着该地区的原始宗教信仰。但在民间尤其是一些僻远地区,却依然较多地保留着原始的信鬼尚巫宗教信仰。《淮南子》曰:“荆人鬼,越人鬻。”《说文》:“鬻,鬼俗也,从鬼,幾声。”《史记·封禅书》亦载:“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至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耗。”魏晋南北朝时期,吴越地区民间鬼神崇拜受到儒家敬事天地、祖先与圣贤崇拜礼仪的影响,对吴越祖先夏禹、泰伯、季札以及吴国大臣伍子胥等奉祀特盛,敬为神灵。同时又流传着吴王夫差女儿死后鬼

魂从墓中飞出与情人相会的人鬼故事,以及越女西施化为神女的传说等等。当时还有巫师驱使鬼神为人代行诛伐的“诅咒”风俗<sup>①</sup>。南朝宋明帝曾成为被诅对象,《宋书·明帝纪》云:“咒诅祷请,谨事邪巫,常披发跣足,稽首北极,遂图画朕躬,勒以名字,或加之矢刃,或烹之鼎镬。”隋唐以后,民间的信鬼尚巫风俗,进一步与佛、道信仰融合,巫师多为道士、和尚。元朝袁桷即说:“吴越旧俗,敬事鬼神;后千百年,争崇浮屠、老子学,栋薨遍郡县”(《清容居士集·陆氏舍田记》)。

除道教、佛教、原始鬼神信仰外,伊斯兰教、摩尼教、袄教等,也曾在吴越地区一定范围内流传过。如唐后期,扬州伊斯兰教势力一度较盛。摩尼教则于唐代宗大历年间传至江淮一带。袄教于九世纪前后传至润州、苏州等地。此外,吴越地区的运河两岸,在明代还有民间罗教的传播,入清后,被视为“邪教”,教徒遭捕杀,经卷被焚毁,庵堂被拆除。

元明清时期,除道教、佛教外,影响最大的宗教是西方基督教。基督教于唐朝首次传入中国,后遭禁绝。第二次传入中国是在元代,元文献称之为“也里可温”,主要包括景教和天主教两大教派。当时吴越地区的杭州、温州等地都已建有基督教堂,时人又称“十字寺”。杭州基督教堂始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4年),全称是“祥宜忽木刺大普兴寺”。1290年游历过杭州的马可·波罗曾在其游记里记载这一教堂的情况。北非摩洛哥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304—1377年)在游记中也记载,当时杭州城厢区的居民中,犹太人、基督教人和土耳其人很多。温州在元代不仅有基督教堂,而且还有专门管理教士的机构“崇福司”。<sup>②</sup>

明清之际,基督教大规模传入中国,其中以天主教一派影响最

<sup>①</sup> 参见《浙江文化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页。

<sup>②</sup> 陈垣:《元典章校补》卷三三。

大。早在明嘉靖年间,葡萄牙人便在吴越地区的宁波建立了两座天主教堂,开始传教布道。万历年间,又在南京建立了教会,接着苏州、扬州、丹阳、常熟、嘉定等地也都相继建立了教会。先后在吴越地区传教的有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郭居静、殷泽铎、龙华民,葡萄牙教士罗如望、伏若望、阳玛诺,西班牙教士庞迪我,法兰西教士金尼阁,匈牙利教士卫匡国等。当时信奉基督教并接受洗礼的除一般士民外,还有许多朝廷官员和社会名流,如杭州的李之藻、杨廷筠,上海的徐光启,盱眙的冯应京,常熟的瞿太素、瞿式耜等,均是中国上层社会中较早的著名天主教徒。李之藻还编纂了中国第一部天主教丛书《天堂初函》共五十二卷。

天主教的广泛传播,也引起一些官僚士大夫的反对。其中最著名的是万历年间礼部侍郎署南京礼部尚书沈淮,力主排斥天主教,说传教士心怀叵测,阴谋不轨,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七月令巡城御史孙光裕逮捕传教士王丰肃、谢务录及华人教徒二十余人。十二月,明神宗颁布驱逐外国传教士的谕令,导致天主教在明末传教史上第一次大教案——南京教案的发生。当时李之藻、杨廷筠、徐光启等均上书保教。外国传教士也纷纷避居杨、徐等人家中。

# 第六章 科学技术

---

## 第一节 汉魏六朝时期的吴越科技成就

---

### 一、汉代的化学知识与科技思想

秦汉时期吴越地区的科学技术一度停滞不前。秦始皇征服越族后,曾推行强制性的移民政策。在其统治下,吴越地区的人民四处流徙,一时地旷人稀,科技人才缺乏,科技成就远不如先秦。到了西汉时期,该地区总体科技文化水平仍徘徊不前。直至东汉才因北方人口南移,先进科学与生产技术的传播,本地的科技文化逐渐走出低谷,进入了较快的发展时期。

#### (一) 魏伯阳炼丹术中的化学成就

魏伯阳,名翱,号云牙子。东汉会稽郡上虞人。是活跃于东汉桓帝时期(147—167年)的炼丹术方士、我国炼丹术之祖。

炼丹术是化学的原始形式。大约兴起于战国时,秦汉时更盛,楚、吴等郡国有不少烧丹炼汞的方士。江苏仪征石碑村东汉墓曾出土铜过滤器、铜量器、铜阳燧、铁杵、铁臼等炼丹工具。魏伯阳曾以其所撰炼丹修仙著作《周易参同契》传授弟子徐从事、淳于叔通等人,并率弟

子多人在江南山中炼“神丹”。

《周易参同契》是世界炼丹史上最早的著作。共 6000 字,以韵语写就。对炼丹理论与方法作了系统阐述。主要内容为炼制还丹。原文记载过程共三变。一变将 15 份金属加 6 份水银加热,生成铅汞齐。二变为将铅汞齐增火加热,水银蒸发后,铅被氧化为一氧化铅与四氧化三铅,反应完毕主要生成黄丹。三变则将黄丹与 9 份水银研匀,先加文火,后加武火,反应完毕得到还丹——氧化汞。

魏伯阳在炼丹过程中,了解到不少物质的化学性能。在阐述炼丹术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时,魏伯阳指出物质变化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炼丹过程亦“自然之所为”。他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炼丹术,认为万物之生与变皆“五行错王,相据以生”。他还提出了相类学说。“同类”物质才能相变,异类物质则不能相变。已含有化学亲和力理论的某些因素。魏伯阳观察到胡粉(碱式碳酸铅)在高温下遇炭火可还原为铅的现象,由此认识到发生化学变化时各种物质有一定的比例。魏伯阳的炼丹理论亦有不少荒谬可笑之处,例如饵服黄金与还丹使人长生不老等,但并不妨碍他在化学方面取得一些成就。

## (二) 王充《论衡》的科技思想

东汉早期的思想家王充(27—约 97 年)出生于浙江上虞。在其代表作《论衡》中,他以科学知识为利器,批判“天人感应”说与谶纬迷信,并就科学技术问题提出了精辟见解。

王充对古代元气说作了继承与发展,提出元气自然说。认为“天地,含气之自然”(《论衡·谈天》)，“天地含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论衡·自然》)。这一理论是他说明许多自然现象的出发点。

针对董仲舒“土龙致雨”说,王充指出:“雨露冻凝者,皆由地发,不从天降也”(《论衡·说日》)。“先是云气发于丘山”(《论衡·感虚》),后是“初出为云,云繁为雨”。王充批驳雷电为“天怒”说,指出雷

电系由“太阳之激气”与云雨一类阴气“分争激射”引起,只是一种自然现象。他将潮汐与月亮盈亏相联系,指出“潮之兴也,与月盛衰、大小、满损不齐同。”

王充曾观察虫之特性与生长条件,注意到“甘香湿味之物,虫常生多”,“然夫虫之生也,必依温湿,温湿之气,常在春夏,秋冬之气,寒而干燥,虫未曾生。”谈到干暴麦种、煮马粪汁浸种与驱赶蝗虫入沟内加以消灭等防治病虫害的方法。

王充认为“阴阳之气,凝而为人,年终寿尽,死还为气”,“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形体朽,朽而成灰,何用为鬼”(《论衡·论死》)。对人的死生变化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

王充的科技思想虽不尽正确,但其涉及天文、物理、生物、冶金、医学诸领域,反映了当时的科技水平。

## 二、东吴的天文地理与生物学知识

### (一) 陈卓等人的天文成就与沈莹等人的地理著作

陈卓系三国吴人,善于星占,精通天文星象,有《天文集占》、《四方宿占》、《天官星占》、《万氏星经》等星学著作。其最重要的天文成就是综合甘、石、巫咸三家学派所定星官,并同存异,构成一个有 283 官、1464 颗恒星组成的全天星官系统,并绘成圆形盖天式星图,成为后世制作星图浑象的标准。唐代王希明曾作《丹元子步天歌》介绍全天星官名数,并将全部天空分区划为三垣二十八宿。这一分区法沿用到近代,陈卓的全天星官系统也因此沿袭了一千多年。

吴人陆绩亦善观天象,“星历算数无不该览”,曾作《浑天图》。葛衡曾制浑象仪,人居其中,可以形象演示星宿的出没运行,系近代天

象仪的雏形。东吴时著名的天文历法著作有阚泽的《乾象历注》、姚信《昕天论》、王蕃的《浑天象注》。

东吴时期地理学著作颇多,撰述各地州郡山川、四时节候、文物古迹、风俗物产的“地记”大量出现。当时丹阳太守沈莹撰《临海水土异物志》,其中有关台湾诸地的地理风貌及孙美探求夷洲的事迹颇具价值。顾启期《娄地记》、贺循《会稽旧记》、朱育《会稽土地记》、周处《阳羨风土记》亦能反映这一时期吴越地方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风貌,具一定科学价值。

## (二) 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的古代生物学知识

陆玑,三国吴郡世族之子。曾为东吴太子中庶子、乌程令。他师承郑学,着眼于《诗经》名物训诂,参考文献并实地考察,对《诗经》中动植物进行研究,著成《毛诗草木虫鱼疏》。

此书分列上下卷。上卷为植物,收录草本植物 60 种,木本植物 47 种;下卷为动物,包括鸟类 27 种,兽类 12 种,虫类 24 种(内有鼠类、两栖类),鱼类 11 种(含兽类贝类)。陆玑对这些动植物的形态、特征认识清晰,描写详细生动,为后世生物学家提供了判别古代动植物种属的依据。如鹁鸽“颌下胡大如数升囊”;鹭,“水鸟”,“洁白”,“青脚高七八寸,尾如鹰尾,啄长三寸余。头上有长毛十数尾,长尺余,毳毳然与众毛异”。他依据植物形态特征对《诗经》中同名异实的植物进行辨析。《毛诗草木虫鱼疏》不仅记载了动植物的地理分布,还记载了动物的种群生态现象,如鸛“树上作巢,大如车轮”。鸛、苍鹭群栖共食。鸛“取茅莠为巢,似麻絜之如刺袜然,悬著树枝,或一房或二房”。他对动物分布,颇具生态地理的认识。如“魴,今伊、洛、济、颍魴鱼也”。细鳞薄肉,然渔阳、泉州及辽东梁水,魴特肥而厚。

陆玑对动植物的考察具有一定的深度与科学性,他使生物学从经学中分列出来,对古代生物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 三、两晋的天文历法、化学与医学

#### (一) 虞喜的《安天论》与岁差现象的发现

虞喜(281—356年),字仲宁,会稽余姚人。父亲虞察为东吴征虏将军。然其终生不仕,耽于学问,以《安天论》与发现岁差两项成就跻身天文学家行列。

虞喜《安天论》作于成帝咸康中(340年左右)。原著已佚,《晋书·天文志》上引摘其文,片断如下:“天高穷于无穷,地深测于不测。天确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静之体。当相覆冒,方则俱方,员则俱圆;无方员不同之义也。其光曜布列,各自运行,犹江海之潮汐,万品之有行藏也。”他认为宇宙无边无际;天地无方圆不同,所有天体均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并非依附固定之体。此说反对浑天论与盖天说,否定了天圆地方说与天球具有固体壳层的思想。系古代天文理论的重要成就。

虞喜发现岁差约在公元330年,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所谓岁差,即太阳在黄道上运行,经过一岁之后未回到原处,尚差 $1/50$ 度(赤经差)。此岁差与现代赤道岁差概念相同。《宋史·律历志》引北宋周琮《论历》说:“虞喜云:‘尧时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年,乃东壁中,则知每岁渐差之所至。’”可见虞喜主要通过冬至昏中星对比发现岁差。虞喜之前天文学界皆以为周岁(即冬至到冬至)与周天(太阳在恒星中运行一周)相同,节气与星度相等同。虞喜则弄清了两者的不同,提出天自为天,岁自为岁,并求出了周天与周岁的具体差数为50年退1度,即每50年冬至点在黄道上要西移1度,此数值比实际值稍大,在我国天文学史上属重大理论发现。

#### (二) 葛洪的化学与中医学成就

葛洪,字稚川,别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祖父葛



系、父亲葛梯均为东吴官员。建武元年(317年)葛洪写成其代表作《抱朴子》，包括《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其《内篇》全面概括总结西汉至东晋中国炼丹术的早期活动与成就。其中的《金丹》篇与《黄白》篇集中反映与记述炼丹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种种化学现象与反应结果。如《抱朴子·金丹》叙述各种神丹大药的炼制，系统介绍汉代《黄帝九鼎神丹经》与《太清神丹经》。《黄帝九鼎神丹经》介绍丹华、神符、神丹、还丹、饵丹、炼丹、柔丹、伏丹、寒丹等神丹9种，皆由一种或多种矿物加热起化学反应后炼成。如丹华即升炼丹砂而成的升华硫化汞，“神丹”系混合雄黄与雌黄升炼成的升华硫化砷。他在《金丹》篇中还介绍了另外28种“仙丹”的炼制秘诀。从中可见中国古代方士——包括葛洪本人在内的大量炼丹化学实验，不仅有完整的操作规程，还采用了多种矿物原料，制取到许多化学制剂，积累了许多化学反应与生成的知识。如《黄白》篇说：“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即硫酸铜溶液中的铜离子与铁起置换反应生成金属铜。此篇还记述了中国方士所做的变铜、锡、汞、铁等金属为黄金、白银的实验，这是炼制合金的前身。

葛洪医术精湛，系东晋杰出的医学家。曾著有百卷本《玉函方》，此书广泛收集各地验方、各家医著，但早佚无传。流传至今的是《肘后备急方》。此书收集各种简便易行的医疗技术与单验方，范围涉及急慢性传染病，各种内科急慢性病、外科、儿科、眼科、皮肤科及六畜病，方中“率多易得之药”，即使须买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深受百姓欢迎。

在中国，葛洪最早记录天花、流行性钩端螺旋体病、黄疸性肝炎、结核病、恙虫病等急慢性传染病。其中恙虫病的记载比日本桥本伯寿早千年以上。他反对将慢性传染病归入伤寒，提出“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此说为温病学之先导。此外，葛洪还发现了恙螨、血吸虫等寄生虫，对寄生虫病的病源体进行了详细观察。他对脚气病、角弓反张病(与现代破伤风相同)的症状有细微观察。

在治疗学上,葛洪有杰出贡献。他针对狂犬咬伤,提出“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已有免疫治疗思想的萌芽。他提出许多具有特殊疗效的药物。如用大豆、牛奶、蜀椒与松节松叶治疗脚气病,与现代利用维生素B治脚气的方法不谋而合。葛洪用青蒿绞汁治疗疟疾,取得显效。

《肘后备急方》记载不少传统治疗技术,如捏脊疗法、食道异物法至今仍为临床所用,还记录大量食物、药物中毒的治疗方法,行之有效。葛洪的医疗技术与方法对中医学影响深远,其医术被后世誉为“简便验廉”。

#### 四、南朝的自然科学成就

南朝吴越之地人才荟萃,不少科学家继承与发展了前代的科技成果,在天文历算、医学、药学、化学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其突出代表人物为祖冲之、祖暅父子与陶弘景。

##### (一) 祖冲之、祖暅的科技成就

祖冲之(429—500年),字文远。祖籍河北,曾祖时移居江南。自小“专攻算术,搜炼古今,博采深奥”,每每“亲量圭尺,躬察仪漏,目尽毫厘,心穷筹策”,不囿于古人成说,将我国数学与天文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祖冲之在青年时代,便对刘歆、张衡、郑玄、阚泽、王蕃、刘徽等人的工作成果进行研究,在他们的基础上驳正推演,导出许多有价值的结果。其数学上最有价值的成果为求得准确到小数点后七位数值圆周率: $3.1415926 < \pi < 3.1415927$ 。这一结果须对九位数字的大数进行包括开方在内各种运算130次,在当时采用算筹运算的条件下极为艰巨。祖冲之求得的圆周率在世界占据领先地位约有一千多年。直到十五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才求出比他更精确的数值。

为了计算便利,祖冲之还求得用分数表示的两个圆周率数值,一为 $355/113$ ,称作密率,一为 $22/7$ ,称为约率。密率是分子、分母一千以内表示圆周率的最佳渐近分数。在西方直到十六世纪,德国的奥托和荷兰的安托尼兹才得到这一数值。

据《南齐书》与《南史》记载,祖冲之曾“注《九章》、造《缀术》数十篇”。《缀术》内容深奥,除包括圆周率与球体体积计算外,据专家推断可能还包括二三次方程求解问题,开宋元高次方程解法之先声。《隋书》评价它是“算氏之最”,唐初被列入“十部算经”之内。

祖冲之天文学成就卓著,他的成就大都包含在他编制的《大明历》及为《大明历》所写的驳议中,他首先将岁差的存在应用到编制历法中去,提高了历法推算精度。祖冲之给出了赤经岁差数值为45年11个月退行1度,《大明历》中使用的岁差数值为 $860/39491$ 度,两者极为接近,其岁差常数虽不够精确,但此后回归年与恒星年两个概念渐为人接受,成为制定历法必须考虑的依据。

祖冲之在《大明历》中实行了闰周的改革,提出391年置入144个闰月的新闻周,这在唐以前诸家历法中是最接近科学的闰周。他给出的回归年长度为365.24281481日,朔望月日数为29.5305915日,在宋以前这些数值都是最好的。祖冲之的《大明历》给出了中国历法史上第一个交点月日数——27.2122304,与现代理论数值27.2122152相比,每交点月误差仅为1.3秒。他给出的金木水火土星周期数据也相当精确。

祖冲之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物理机械发明家。曾“追修古法”,造成指南车,“圆转不穷而司方如一”。“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于乐游苑中造水碓磨,武帝(萧贲,483—493年在位)亲自临视”。他还制造过“欹器”,用来盛水“中则正,满则覆”。

祖暅系祖冲之子,字景烁,又称祖暅之,南朝齐梁间人。其数学主要成果是用立体几何法求得正确的球体积公式并提出祖暅原理。早

于西方一千多年。他精通天文,经过多次观测发现北极星并不在正北方,与北天极相差“一度有余”,这个重要发现打破了“北极星即天球北极”的传统观念。祖暅曾修订祖冲之的遗作《大明历》,510年被梁统治者采用。

## (二) 陶弘景的医药学、化学成就

陶弘景字通明,号华阳隐居。齐高帝时为诸王侍读。《梁书·陶弘景传》称其“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阅为务”。后辞官隐居茅山,专心修道炼丹,行医访药,著述立说。共有著作 80 余种,“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在医学、药学、化学、天文历算、地理学方面贡献甚多。

陶弘景医药学造诣尤高,主要著作为《神农本草经集注》。此书“苞综诸经,研括烦省”(《本草经集注·序》),除对《神农本草经》365 种药物进行勘订整理外,又增补药物 365 种,合计 730 种。“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区畛物类”,用红笔书写原有药品,用黑笔书写新增药品。《神农本草经集注》改变本经上、中、下三品药物分类法,代之以按药物的自然来源和属性分类的方法,将 730 种药分成玉石、草本、虫兽、米食、果、菜、有名未用等七大类,前六类再分为上中下三品。《神农本草经集注》对药物的性味、产地、形态、鉴别、炮制以及应用等方面均有新的论述。将药性分寒、微寒、大寒、平、温、微温、大温、大热八种。陶弘景最早提出“诸病通用药”名词,列举 80 余种疾病的通用药物,开创了按药物主治作用进行分类的先例。他还首次记录了部分特效药物,规定了中成药制作规程,考订了药用的度量衡。

陶弘景还作有《名医别录》,是总结两汉、魏、晋、刘宋时期药物学成就的专著。他把疾病的病因归于邪气、恶气、毒疠之气,发展了传统六气致病说。在养生学方面,他作有《养生延命录》、《导引养生图》。

陶弘景曾炼丹 20 年,经历 7 次以上大规模炼丹实验,每次开鼎,“皆获霜华”。丹虽未成,却发现了不少化学奥秘。他首先明确区分氧

化汞与硫化汞,区别人工炼制的水银与天然产水银,区别硝石与芒硝。他采用火焰法鉴别硝石,实际与现代化学钾盐的火焰分析法相同,古代不少医药家铅锡不分,他则对铅作了量定。陶弘景曾细致观察了许多化学变化现象,如他记述了石灰的制法与化学作用——“今近山生石,青白色,作灶烧竟,以水沃之,即热蒸而解末矣”。

陶弘景在天文历算与地理学方面颇有贡献。曾制浑天象一台。检校 50 家历书异同,撰成《帝代年历》。还著有《天文星经》、《天仪说要》、《古今州郡记》等。

---

## 第二节 隋唐五代宋元时期吴越科技的繁荣

---

### 一、隋唐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及其他

#### (一) 陆羽《茶经》与陆龟蒙《耒耜经》

隋唐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农业走上了精耕细作之路。茶树的栽培加工技术与农业耕作技术迅速发展,江南的农业科学水平大幅度提高。

陆羽(733—804年),字鸿渐,唐代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幼为竟陵龙盖寺陆僧收养之弃儿,无父无母。公元760年,他到江南名山寺院寻访师友,此后隐居苕溪(今浙江吴兴)40余年,直到去世。陆羽早年曾活动于巴山峡川,对川陕鄂湘间的茶树有相当研究。定居苕溪后,更喜论茶品茶。他所著的《茶经》,对茶的植物学特性、采制、烹煮与饮用进行了系统考察与研究。是一部历史与实际考察相结合的茶叶技术专著,共分十经,7000余字。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茶树的植物学特性以及加工制造技术;第二,烹茶技术与饮茶方法。

陆羽对茶树的植物学特性有深入观察与描述,最早提出茶树有

灌木型与乔木型之分别。茶芽的性状可辨别品种之优劣。他指出土壤、日照、温度、湿度与坡向等生态条件对茶树生长与品质的影响。他首先主张茶树是“南方嘉木”，并划分八个产茶区，大致与今茶树地理分布区相近。《茶经》还记载了唐代人工栽培茶树方法有种子繁殖法与移植法，还有种瓜法。陆羽《茶经》反映了唐代江南茶叶栽培技术的发展水平，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唐代农学家陆龟蒙(?—约881年)，字鲁望，长洲(今江苏吴县)人。他与陆羽一样，对茶叶颇有研究，曾著有《茶书》一篇，今已亡佚，作为农学家，他的贡献主要是撰写我国最早的农具专著《耒耜经》。其时江南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首先表现在整地技术的提高。耕地主要农具——犁的结构已大为改进。《耒耜经》共记载江东犁、爬(耙)、砺碛和碌碡四种农具。其中江东曲辕犁由11个部件组成，犁铧用以起土；犁壁用以翻土；犁底与压镵用来固定犁头，策额保护犁壁；犁箭与犁评控制耕地的深浅，犁梢控制宽窄、方向与平衡；犁盘便于转向，犁建用以限制犁辕犁评，犁辕承受牵引。陆龟蒙对各种零部件的形状、大小、尺寸有详细记述。江东犁的出现是我国耕地用的铁农具成熟的重要标志，爬与砺碛是破碎、平整土地工具。爬兼有除草功能。《耒耜经》对江南“耕、耙、耨”为核心的耕作技术体系作了总结，指出“耕而后有爬，渠疏之义也，散垆去芟者。爬而后有砺碛焉，有碌碡焉”。他据此提出“深耕疾耘”原则。

陆龟蒙著有《和添渔具五篇》与《渔具十五首并序》，对捕鱼之具与捕鱼之术作了总结，弥补了前史之阙如。

## (二) 窦叔蒙与《海涛志》

唐代宝应与大历年间浙东出了一位海洋潮汐学家——窦叔蒙，他所著《海涛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系统论述海洋潮汐的著作。

《海涛志》共分六章，第一章为总论，第二章论涛数，第三章论涛时，第四章论涛期，第五章论朔望体象，第六章论春秋仲涛涨解。

窦叔蒙对潮汐变化与月球运动之间相应关系有深入观察，指出“月与海相推，海与月相期，苟非其时，不可强而致也，时至自来，不可抑而已也”。潮汐随月球运动而变化，“轮回辐次，周而复始”。他在论述潮汐的周月不等现象时，阐明每月有两次大潮出现于朔望时期；有两次小潮出现于上下弦时期。不仅如此，一日之内亦有两次潮汐的年度变化，详述了“分潮点”发生的时间。他还精密计算了自唐宝应二年（763年）冬至，上推79379年冬至日之间潮汐循环次数，得出“积日28992664”，“积涛56021944”，以积涛除日数可得一个潮汐循环周期所需时间为12小时25分14.02秒。两次潮汐循环比一个太阳日推迟50分28.04秒，此数据与现代计算正规半月潮每日推迟50分钟相差很小。实质上，他是根据潮汐与月亮同步原理，用天文方法推算太阴日的长度——24小时50分28.04秒，与现代科学家所定24.8412024小时相当接近。

窦叔蒙在《论涛时》一章中，创立了高低潮时推算的科学图表表示法，采用了坐标法，横轴列月相变化，纵轴标明实测高低潮时，并以斜线相连，图示潮汐周而复始的循环规律，这一图表比欧洲最早的“伦敦桥涨潮时间表”（1213年）早450年。

《海涛志》反映了八世纪中叶我国潮汐学的先进水平，不仅对潮汐成因与变化规律作了科学定性的说明，且对潮汐时间有精确的定量分析。

## 二、宋元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高峰

宋元时期，吴越之地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各民族间与中外间科学技术的交流，为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宋元时期江南人才辈出，既有博学多才、兼擅众长、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沈括，又有专

精一门,在农学、数学、活字印刷术、天文学、地理学、纺织技术、中医学方面有杰出造诣的科技专家,如陈旉、楼琬、杨辉、毕昇、杜绾、范成大、黄裳、周达观、黄道婆、朱震亨等等,正是他们将吴越之地宋元时期的科学技术推进到高度发展的水平。

### (一) 沈括——中国科技史中最卓越的人物

沈括(1031—1095年),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出身于士大夫家庭,幼承家学,博闻强记。嘉祐八年(1063年)进士,为扬州司理参军,历官昭文馆校勘、提举司天监、右正言、权发遣三司使、知延州兼鄜延路经略安抚使等职。晚年移居润州梦溪园,专心著述。一生论著甚多,仅《宋史·艺文志》所录即达22种一百五十五卷。流传至今有《梦溪笔谈》二十六卷、《补笔谈》三卷、《续笔谈》一卷、《长兴集》十九卷、《苏沈良方》十五卷。

《梦溪笔谈》及《续笔谈》、《补笔谈》是一部综合性的科学著作,书中属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条目为255条,占总数609条五分之二强。内容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地质、气象、水利、建筑、冶金、兵器、生物及医学等许多科技领域。《宋史·沈括传》评论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著”。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称沈括为“中国整部科技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他的著作《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 1. 数学成就

《梦溪笔谈》中属于数学类的条目共有12条。其中第301条首创隙积术与会圆术,开创中国传统数学的新领域。隙积术是一种求解垛积问题的方法,属于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具体涉及累棋、层坛和积罍等问题。他创立了一个正确的求解公式,将南北朝以后停滞不前的等差级数求和推进到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的新阶段。“会圆术”涉及已知弓形的圆径和矢高求弧长的问题,沈括推导出我国数学史上第一个求弓形弧长的近似公式,元代郭守敬等所著《授时历》中“弧矢割



圆术”即用此公式。

沈括用组合数学方法研究过围棋棋局系数,计算出棋局总数为 $3^{361}$ 。他提出的“运粮法”,将数学知识用于军事,含有运筹学思想的萌芽。

## 2. 物理学成就

沈括《梦溪笔谈》涉及物理学相关内容的有 40 条,涉及物理学各分支学科。在磁学方面,他记载了“用磁石磨针锋”制成指南针的人工磁化方法,介绍了指南针的四种安置方式:水浮法、置指甲上、置碗唇上、悬丝法。他观察到磁针“常微偏东,不全南也”的现象,发现了地磁偏角的存在,而西方直到 1492 年哥伦布首次航行才知道。

在光学方面,沈括作出凹面镜成像实验,并试图用小孔成像原理解释物在焦点外成倒像的现象。他用表面一半涂上白粉的弹丸形象地演示月亮的盈亏现象。记载了中国古代滤光运用的实例——红光验尸。

声学方面,沈括用纸人实验揭示了共振原理,西方类似实验直到十七世纪才出现。

## 3. 天文学成就

沈括于天文历法有很深造诣。提举司天监任上,对历法与天文仪器进行了系统研究与改进。其天文学突出成就有五:其一是针对传统阴阳合历在历日安排上的欠缺,首倡“十二气历”,在节气与月份间建立稳定关系。以立春为孟春(正月)初一,惊蛰为仲春(二月)初一,余类推。大月 31 日,小月 30 日,“一大一小相间,纵有两小相并,一岁不过一次”,这样便可“岁岁齐尽,永无闰余”。这是一种纯阳历制度,简便易行。其后 800 年英国气象局采用的《萧伯纳历》与之相似。其二是他以黄道与白道“如两环相叠而小差”来说明日、月食成因。测出“交道每月退一度余,凡二百四十九交而一期”。与现代天文学测出的数值大体相吻合。其三发现晷漏“冬至日行速”、“夏至日行退”,即真

太日有长短的事实,得出前人未知的结论。其四,历 900 余次观察,“凡为二百余图”,测出极星与天北极的真实距离为“三度有余”。其五,对测量天体位置、时间与日晷长短的三种天文仪器提出改进意见与设计方案,并制成新型浑仪、浮漏、景表,提高了观测精度。

#### 4. 地学成就

《梦溪笔谈》有关地学的记载约 37 条,涉及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许多分支学科。沈括对“峭拔险怪,上耸千尺,穹崖巨谷”的雁荡山地貌,及中国西部成皋、陕西大涧中“立土动及千尺,迥然耸立”的地貌进行考察分析,提出了流水侵蚀作用的成因说,与现代地貌学解释完全一致。他最早用海陆变迁的科学原理解释华北平原等冲积平原成因,比西方达·芬奇假设亚平宁山中螺蚌壳为海中古生物遗迹早 400 年。

沈括对地图学贡献甚大。曾创以溶蜡、木刻制作河北边防立体地形图法,这种立体地图比西欧的立体地图早 700 年,后为各地所仿效。熙宁九年(1076 年),沈括奉旨编制《天下州县图》(《守令图》)。他继承与发展了西晋裴秀“制图六体”绘图法,将以往 8 个方位扩大到 24 个方位,特别注意水平直线距离的测量。共绘得《天下州县图》20 轴,其中总图大小各 1 轴,分路图 18 轴,大大提高了地图的精密度。我国元明航海罗盘划分为 24 个方位,实受其影响。

#### 5. 生物学医药学成就

《梦溪笔谈》中涉及生物学、医药学的条目约有 88 条。在自然科学条文中占有 1/3 以上的比例。沈括注重考察动植物的生理、生态、种类与地理分布,对生物防治、古生物学颇有兴趣。如《梦溪笔谈》第 485 条论述了植物的成熟期因品种、地形、气候、土壤、人工管理不同而异,不可一概而论。他对当时药物名称存在一物多名与多物一名的情况,进行了系统辨正,纠正了许多谬误陈见。沈括十分注意搜集整理验方,必“目睹其验”,方取其方。他编著成《良方》、《灵苑方》二书,

科学实用,通行后世。沈括在《良方》中记载了“秋石方”,这是现知世界上最早提取荷尔蒙性激素的方法,受到国内外科技界的高度评价。

此外,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了当时许多重大科技成就,如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信州湿法炼铜法、高超堵塞黄河的“三节压埽法”、青堂羌族的冷锻铁甲法、喻皓的《木经》等等,为中国科技史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史料。

## (二) 雕板印刷的盛行与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

宋元时期,雕板印刷术处于鼎盛时期,江浙的印刷业十分发达,雕板高手云集杭州,刻印了大量经史子集的著作。浙本书字体方正,刀法圆润,刻工众多,技术熟练,如1132年王永丛仅费时一年,就在湖州刊刻佛经5400卷。当时共有上百人参加雕板,可见其时雕板印刷水平。宋版书的雕刻技术优良,纸墨装潢精良,颇得好评。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杭州雕板良工毕昇创造了活字印刷术。其基本原理与现代铅字排印法完全相同,沈括《梦溪笔谈》记毕昇用胶泥刻成泥活字,“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每一字皆有数印”。“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炆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一版印毕,可加热“令药熔”,取下泥活字以备再用。一般备两块铁板,一板印刷,一板排版,交替使用。活字印刷术省时省力,使印刷工效成倍提高,成本下降,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影响十分深远。

## (三) 农业技术的进步与陈旉的《农书》、楼璘的《耕织图》

宋元时期江浙的农业生产技术发展迅速。土地开垦利用已有相当水平。人们已知根据不同自然条件来扩大耕地面积,与水争田,变山为田。吴越太湖地区五代的圩田技术为宋元所继承发展。圩田规模更大,仅浙西路即达1400多处。元时,江浙负担了全国租赋的十分

之七,充分反映出江浙农业生产水平的高度发展。梯田在丘陵地带亦大大扩展。

江浙农作物以水稻为主,蚕桑为辅。宋以降,水田耕作栽培技术与蚕桑技术已大大发展。宋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年),躬耕于江苏仪征的农学家陈旉写成了《农书》,这是现有最早论述南方水稻区域的农业技术与经营的农书。

陈旉《农书》分上、中、下3卷。上卷阐述水稻及豆、麦、粟、麻、芝麻、蔬菜等农作物的生产技术及管理。如《耕耨之宜》谈整地技术,《粪上之宜》专论肥料,《善其根苗》专论水稻育苗技术。中耕除草技术与烤田、灌溉技术也论述甚详。中卷论述水牛牧养技术及牛病防治。下卷阐述种桑养蚕技术。

陈旉《农书》首创用专篇讨论土地利用、统一规划。《地势之篇》论述土地利用规则相当详细明确。始说土地自然面貌与性质之各各不同,故治理各有其法。其论述地形与温度、肥瘠、水旱之间关系颇合科学道理。再论高田、下地、坡地、葑田、湖田五种土地的具体利用规划,以高田为最详,其规划合理巧妙,兼顾集约经营。陈旉《农书》首次明确了两个有关土壤利用的基本原则:一是土壤好坏肥瘠虽不一致,但治理得宜,均能长出好庄稼。其二,只要使用得当,增肥施肥,则地力就可常保“新壮”。陈旉在《天时之宜》篇中还提出种稼须知天时地宜,“则生之、蓄之、育之、成之、熟之,无不遂矣”。较系统地讨论了天时变化的规律及其掌握的基本原则,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精耕细作的传统思想。

陈旉《农书》是江南农学专著,也是私人所著地区性农书的典型,中国农学家万国鼎认为陈旉《农书》可以与《汜胜之书》、《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并列为我国第一流农书之一。

楼璘(1090—1162年),字寿玉,浙江鄞县人。《宋史·艺文志》“农家类”著录“《耕织图》一卷,楼璘撰”。《耕织图》有耕图21幅,内容

包括浸种、耕、耙耨、耖、碌碡、布秧、淤荫、拔秧、插秧、一耘、二耘、三耘、灌溉、收割、登场、持穗、簸扬、舂、舂碓、籼、入仓等；织图计 24 幅，包括浴蚕、下蚕、喂蚕、一眠、二眠、三眠、分箔、采桑、大起、捉绩、上簇、炙箔、下簇、择茧、窖茧、缂丝、蚕蛾、祝谢、络丝、经、纬、织、攀花、剪帛等。《耕织图》“图绘以尽其状，诗歌以尽其情”，每图皆配一首五言律诗，系统而生动地描绘了江南农耕与蚕桑生产的各个环节，目的在于介绍与传播农业生产技术，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楼璩的《耕织图》与陈旉的《农书》互为补充，相互辉映，成为江浙宋代农学成就的双璧。

#### （四）天文地理学成就及水利水文学的进步

苏州文庙保存的苏州石刻天文图与苏州石刻地理图代表了宋代江南天文学、地理学绘制技术水平。两图均为南宋绍熙年间嘉王府翊善黄裳于 1190 年所制。1147 年由浙江永嘉人王致远请石工摹刻于石碑上。

苏州天文图碑高 2.16 米，宽 1.08 米。上半部为一圆形全天星图。下半部为说明文字，全图以天球北极为圆心，共画三个同心圆，内圆标志北纬约 35 度处的恒星圈，中圆为天球赤道，外圆标志恒隐圈。28 条辐射状线条与三圆正交，分别通过二十八宿的距星。外标二十八宿宿度数据以及与之相配的十二辰、十二次和十二分野等名称，与赤道相交的黄道为偏心圆。全图共刻恒星 1436 颗。图下文字略述太极、天体、地体、赤道、日、黄道、月、白道等等天文知识。此图系依据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 年）一次恒星测量结果所制。是世界最古老的石刻星图之一。

苏州石刻地理图高 2.21 米，宽 1.06 米。系全国总图，图中标注山脉 120 多座、江河 60 多条、行政区 410 个左右。水系与海岸线精确度较高。内容丰富，标注清晰，要素处理及符号设计别具一格，反映了当时制图学的较高水平。

宋元时期江浙的地理学也有新的发展，取得不少成就，代表人物有范成大、周达观等人。

范成大（1126—1193年），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平江府吴县（今属江苏）人。他著有《揽辔录》、《骖鸾录》与《吴船录》等地理游记，《桂海虞衡志》、《太湖石志》、《吴郡志》等地理著作。他的自然地理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对各地地貌、气象气候、植被及三峡水文考察上。他对海南、广东、广西、湖南、云南、福建等地动植物的种类、形态与分布的记载颇具科学价值。在人文地理学上，范成大也有建树。其著《揽辔录》记述他出使金国时对沿途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的考察。《骖鸾录》对沿途人文景观描述细致入微。《吴船录》详细描述眉州、嘉州、恭州、泸州、万州、归州、鄂渚等地聚落与城市地理。《桂海虞衡志》“志蛮”篇记述广西的民族地理分布、发展历史、风俗习惯、社会结构、经济、婚姻、人口、物产等。晚年所写《吴郡志》亦是地志善本、人文地理学佳作。

周达观，自号草庭逸民，浙江温州永嘉人。元成宗元贞元年（1296年）出使真腊（今柬埔寨），在柬埔寨居留一年余。归国后著有《真腊风土记》一书，记载十三世纪末柬埔寨的自然与社会风貌。内容共分41项。其中总叙、城郭、正朔时序、耕种、山川、出产、贸易、草木、飞鸟、走兽、蔬菜、鱼龙、蚕桑等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相关。《真腊风土记》是元代重要的域外地理著作，且可弥补柬埔寨正史之阙失。

宋元江南水利学成就突出者首推北宋郑亶与单锷。郑亶，字正夫，江苏昆山太仓（今江苏昆山）人。熙宁五年（1072年）任司农寺丞，提举兴修两浙水利，其主要科技成就为负责治理太湖下游塘埔水利及全面规划、整体治理水患的有关论述。代表作为《吴门水利书》，今已佚。然其熙宁三年论苏州水利奏章及论治田利害文则流传至今，郑亶曾对苏州水患作综合考察并提出全面整理规划。他的观点，如开挖

塘浦与修筑圩岸并举、治田与排涝交举,具有独创的价值。单锷(1031—1110年),江苏宜兴人,曾作《阳羨风土记》,议论宜兴荆溪、吴中水利,他主张全力疏排洪涝,废田还湖。所作的《吴中水利书》颇有影响。

宋代浙江捍海塘是沿海重要水利工程,十一世纪初,浙江征集民工数百万,在短短一年时间中修成捍海塘,挡住了海潮的破坏,保障了农业生产。1034—1037年、1041年又两次修建石塘。

水文学方面,吴江两座水则碑的建立颇具价值。其一记载一年之内每旬每月的水位变化;其二记载各年水位变化。该碑上记有“横七道,道为一则。以下一则为水平之衡,在一则高低田俱无恙,过二则极低田滄,……过七则极高田俱滄”。并刻有1194年和1286年最高水位处。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水位站”遗迹,可见宋代江南已建立了水位观测制度。

#### (五) 杜绶的矿物学著作《云林石谱》

杜绶,字季阳,号云林居士。北宋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云林石谱》成书于1118—1133年。是我国古代石谱的代表作。全书记载全国82个州府所产石品116种,各记其产地、采法、形状、光泽、颜色、质地、敲击声、纹理、晶形、透明度、吸湿性、用途等等,杜绶用甚软、稍软、稍坚、不甚坚、坚、颇坚、甚坚、不容斧凿8个等级区别石头硬度。用粗涩枯燥、矿燥、颇粗、微粗、稍粗、甚光润、清润、温润、坚润、稍润、细润区别石头粗细程度。《云林石谱》对矿物岩石的性状描述颇具科学价值,继沈括后对风化作用与侵蚀作用等地质现象成因有明确阐述。该书记载了鱼化石、石燕(海洋腕足动物壳体化石)的采集情况与化石本身形态,解释其成因,在中国地质学史上是很有价值的观点。

#### (六) 杨辉的数学成就

在中国古代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传统数学发展过程中,宋

元时期的数学成就登峰造极。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先后出现了秦九韶、李治、杨辉、朱世杰四大数学家，将宋元数学推进到世界先进水平。

杨辉，字谦光，钱塘（今杭州）人。1261年至1275年间著有《详解九章算法》十二卷。他的著作中收录了许多早已失传的古代数学著作中的算题算法，如贾宪的“增乘开方法”与“开方作法本源”等。杨辉的数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是他在沈括隙积术（即垛积术）基础上发展了垛积术。他研究垛积与各类多面体体积关系后，由多面体体积公式导出了相应的垛积术公式。其二，在捷算法与素数研究上取得一些进步，加快了运算速度。其三，探索纵横图规律，给出三、四阶乃至十阶纵横图的构成规律，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否定了宋明理学家给纵横图蒙上的神秘色彩，对后世数学家深有影响。其四，讨论勾股容方问题，提出一条重要的面积定理，在平面几何中有广泛应用，后人称之为杨辉定理。其五，提出因法推类原则，突破了《九章算术》分类标准不一的缺陷，按算法不同，将全书重新分成九类，每一大类由总算法演绎出各种具体方法，体现了演绎思想。其次发展了实用数学与民间商用数学，十分重视数学普及工作。其著《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算法通变本末》等等皆为普及数学而作。

### （七）医家医著与朱震亨

宋元时期，医学分科愈细，钻研愈精，江浙医学的实践与理论水平上升到一个新高度，出现了一些医学名家与名著，代表人物有许叔微、朱震亨、倪维德、滑寿、葛乾孙、戴思恭、王履等人。

许叔微，字知可，真州（今江苏仪征）白沙人。南宋名医。真州瘟疫时，他“遍历里门，十活八九”。有《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仲景三十六种脉法图》、《类证普济本事方》等医著。其著最早记载指纹诊法，提倡推广对伤寒的辨证论治。

朱震亨（1281—1358年），字彦修，号丹溪，元代婺州义乌（今



属浙江)人。与刘完素、张从正、李杲并称医学“金元四大家”。朱震亨是刘完素三传弟子,又旁通张从正、李杲之学,故能结合三家学说,倡导“阳有余而阴不足”论。他的“相火论”发展了刘完素的火热理论。主张泻火养阴之法,即以补阴为主,多用滋阴降火之剂,并创制了“越鞠丸”、“大补阴丸”、“琼王膏”等养阴成药,故后人称他为“养阴派”。他反对泥守宋代《局方》,主张治病须寻找病因,分别病邪的虚实轻重,再按标本缓急施行医治,灵活用药。朱震亨杂病证治亦有特点,他提出用药大法有三,即气之病用四君子汤,血之病用四物汤,痰之病用二陈汤,气血痰三病多兼郁症,故要另加开郁药。他认为气血之病要严加区别,分别治之,其气血痰郁之论很有价值,为后世所推崇。

朱震亨医著甚多,有《乙方发挥》、《格致余论》、《本草衍义补遗》、《伤寒论辨》、《外科精要发挥》、《丹溪心法》、《脉因证治》、《金匱钩玄》、《丹溪医案》、《丹溪秘方要诀》、《朱氏传方》等近20种,流传至今的为前3种书。

#### (八) 纺织技术与黄道婆

宋元纺织技术高度发展,织具先进,纱罗锦缎等织物的织造方法与提花工艺均有较高技巧。1979年江苏金坛南宋周禹墓中出土的衣物,皆以2—3根经线制成的绞纱为原料,织成的亮地提花纱,稀经密纬(15×21),透明飘逸。还有两种牡丹芍药山茶蔷薇罗,花回循环达60厘米,织物精细,通丝数增加。宋代织锦技术发展很快,南宋锦品种达40多种,其中“苏州宋锦”用色典雅,“南京云锦”采用重纬组织,浓艳厚重。

宋元时棉纺织业在松江发展起来。其中松江乌泥泾(今属上海)人黄道婆功不可没。黄道婆约南宋末年生,元初卒。少年时远客黎州(今海南崖县),掌握了黎族制棉工具的构造与操作技术。元贞年间(1295—1296年)自崖州返回故乡。将崖州轧棉车、弹棉椎弓、纺车、

织机的制造与使用方法结合江南的纺织工艺以改进,创造出捍、弹、纺、织等新技术。黄道婆创制了轧棉去粒的搅车,较之手工,效率成倍提高。她将线弦小弓改制成绳弦大弓,以弹椎击弦开棉代替手拨弦弹棉,每日弹棉达6—8斤。她发明的三锭脚踏纺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纱机械。黄道婆总结出一套错纱、配色、综线、提花的棉织工艺,风行江浙,松江亦成为当时全国棉纺织业中心,“松郡棉布,衣被天下”。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吴越地区科学技术的缓慢发展 及西方科技的传入

---

明清时期中国科技的发展因受封建体制之阻碍显得缓慢,在总体上渐渐落后于西方,然而此时的江南地区却出现了有成就的科学家群体,如徐光启、汪士性、徐霞客、宋应星、方以智、吴有训、叶桂、李之藻、李善兰、潘季驯、陈潢等等,他们在农学、地理学、中医学、数学、水利学等方面取得了相当成就,为相对停滞、落后的明清科技界注入一股生气。这时期西方近代科技的传入,在天文、数学、化学、物理学、地图学等方面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大量创造性的译介活动中,江浙科学家的成就卓著,功不可没。

#### 一、医药学成就

明清两代,江南地区医药学成就斐然,在传染病学、外科学、针灸学、性病学、临床医学、药物学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进步,名医辈出,他们以自己的医学实践与医学理论,丰富了中国古代医药学的体系。

### （一）传染病学与温病学说的创立

中国古代医学家对传染病的认识在明代以前一直没有超越《伤寒论》的范围,在理论与治疗技术上有相当的局限。明清两代江南医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对传染病等热性病发病原因、特征及治疗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温病学说,并提出了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论治的医疗理论。

元末明初江苏昆山名医王履(1332—1391年),是率先从病理学上将温病与伤寒区别开来的人。他著有《溯洄集》一卷,载论二十一篇,就《伤寒论》及其他医书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不同见解,在传染病问题上突破了《伤寒论》的陈说。

温病学说的奠基者是明末江苏吴县名医吴有训(1592—1672年)。明永乐六年(1408年)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200余年间瘟疫大流行次数达19次,许多医者泥于古法,“误以伤寒治之”,使患者“不死于病,乃死于医”。吴有训对此深感沉痛,遂着手对温病进行观察研究,在病原学、传染途径和方式、流行的特点、治疗原则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观点,并于1642年著成《温疫论》一书,对传染病的病因、传染途径以及治疗验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将发病急重、传染性强的致病因素称为戾气,将导致许多不同病证的病源称为杂气,认为疫病即人感染不同戾气与杂气引起的。他非常注重针对发病的原因而进行医治。

清代中叶,温病学说又有了新的发展。其中叶桂、吴塘与王士雄贡献较大。

叶桂(1667—1746年),字天士,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出身名医世家。他所著《温热论》一书对温热病的发生与发展、诊断与治疗以及预后的顺逆,从原则到具体,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法方药,在温病学说中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对后世医家产生深远影响。他的主要贡献是将外感温病的发病与传变规律归纳为卫气营血四个病期,创

立了卫气营血辨证论治大法。叶桂对温病诊断学积累了察舌、验齿、辨斑疹白痞的丰富临床经验,为后世医家所重视与沿用,叶桂被视为温病学派的创始人。

吴璜(1736—1800年),字鞠通,江苏淮阴人。他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总结吴有性、叶桂等人的学术思想,建立了以三焦辨证为纲的温病学说体系。他的学术成就集中体现在《温病条辨》一书中。王士雄(1808—1868年),字孟英,浙江盐官人。他留心温病诊治,吸取历代寒凉学派与温病学派众家之长加以融会贯通写成《温病经纬》一书。书中阐明了王士雄对温病的独到见解,明辨六气,对暑气颇有独到见解。他明确提出治温病以保阴为第一要义。《温病条辨》与《温病经纬》标志着温病学说达到了成熟阶段。

## (二) 内科学成就

明清时期在内科学上取得成就的医家众多,如戴思恭,薛己、缪希雍、张景岳、赵献可、吴尚先、恽铁樵等人,均为当时名医。

戴思恭(1324—1405年),字原礼,婺州浦江(今浙江诸暨)人。为元代名医朱震亨弟子。他能采摭前代医家要旨,“触而伸之,类而长之,精研覃思,明体适用”,治疗诸病,常得奇效。其著述有《证治要诀》、《证治要诀类方》、《类证用药》、《推求师意》等等。戴思恭还校补了朱震亨《金匱钩玄》。戴思恭对朱震亨“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阐述其所未尽,在杂病的辩证论治上,对治疗气血痰郁之症多有新见。

薛己(1488—1558年),字新甫,号立斋,江苏吴县人。出身医门,其父薛铠精医理诊疗,擅长儿科。薛己初为疡医(包括外科与皮肤科),后精于内科及妇、儿、骨、五官科。正德年间为太医院御医及太医院判。其医著有《内科摘要》、《疡痍机要》、《外科枢要》、《女科撮要》、《正体类要》、《口齿类要》等多种。《内科摘要》论述内科杂病多种,其中又以脾肾亏损病证为主,内附薛己所治200余例医案。他是明代“温补派”创始人。临床善用张仲景之八味肾气丸与钱仲阳之六味地

黄丸,认为此二方是直补真阴、真阳的要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其治病多用老方,而出入加减,俱有自理,多在一两味间见神妙变化之巧”。

赵献可,字养葵,号医巫闾子,浙江宁波人,约生活于明万历、崇祯年间(1573—1644年)。以医名著称于明末,治病每每应手而效,喜用六味、八味二方。一生著述甚多,有《素问注》、《内经抄》、《经络考》、《正脉论》、《二一例》、《邯郸遗稿》、《医贯》等,今仅存《医贯》及《邯郸遗稿》。《医贯》一书阐述命门学说,论述了内科诸多疾病的证治,认为真阴不足、真阳虚衰是疾病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并针对病情提出一系列治则治方。此书后世流传甚广。《邯郸遗稿》则为妇科专书,记载不少赵氏经验方与有效单方。

吴尚先(1806—1886年),字师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出身于文学世家,清道光(1834年)中举人。此后淡于功名,绝意仕途。曾客居扬州,学医为业。吴尚先大半生行医于民间,喜用内病外治法。在吸取前人经验外,多加变创发明,开创了一系列外治方法,疗效显著,深受民众欢迎,人称“外治法之宗”。他撰有《理渝骈文》,对外治法的历史作了回顾总结,又参考前贤有关理论,将内病外治法充实提高。他认为医生既应掌握常法,又应随症状采用变通治法。外治与内治,理相通而法不同,亦应审阴阳、察四时五行、求病机、度病情,进行辩证论治。《理渝骈文》详述膏药熬制法,共记载以内科为主的膏药方137种,其中以清阳膏、散阴膏、金仙膏、行水膏、云台膏、催生膏最为灵验。对诸种药方与敷药配伍使用方法、功效、临症加减、宜忌及注意事项,书中亦有详述。《理渝骈文》还记载了火热疗法、水疗法、填塞法、嚏法等许多外治方法,吴尚先为后人开辟了内病外治的广阔道路,在中医临床学发展史上独树一帜,是清代卓有成就的医学家。

### (三) 医学文献的整理与医学理论的发展

中医学自唐宋以降,出现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及验方验法,后学者

苦于文献浩博,往往不知如何求索。明清时期江南不少名医曾于行医之余潜心钻研典籍,对大量的医学文献作出或百科全书式或专题性的总结整理,融会贯通之际,又结合自己的医学实践,对中医学理论多所阐发,卓有所见,其中成果斐然者当推楼英、高武、杨济时、王肯堂、张景岳、李中梓、魏之琇等人。

楼英(1334—1400年),字全善,萧山(今属浙江)人。自言“上自《内经》,下至历代圣贤书传及诸家名方,昼读夜思、废食忘寝者三十余载”。曾为朱元璋治病,疗效显著。后坚辞太医院太医不就,归家写成《医学纲目》四十卷。此书为简明百科全书式著作,分阴阳脏腑、肝胆、心小肠、脾胃、肺大肠、肾膀胱、伤寒、妇人及儿科等九部,总括600余种常见人体病证。每一种病证均摘录《内经》以下历代著名医家对该证病因、病理、证候、治则、方药的阐说,并间以楼英本人的评注与论述,论说精辟,颇有见地。现代中医诊病的纲领,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就是楼英提出来的。《医学纲目》检索方便,实用性强,读者只须按九部找出病症,即可看到历代各医家的有关论述与治疗方剂。

高武,字梅孤,四明(今浙江宁波)人。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十六世纪。年少文武双全,嘉靖年间中进士。后因怀才不遇返回乡里,钻研医理,习成一代名医,尤擅针灸之术。曾监制针灸铜人以试穴位,再推之于人,所验不差毫发。著作有《针灸节要》、《针灸聚英》、《针灸大成》、《痘疹正宗》等。《针灸节要》系节录《内经》、《难经》之要义编辑而成,着重于《医经》针灸专题之研究。其贡献与影响仅次于现存最早的针灸专著《针灸甲乙经》。《针灸聚英》系高武汇集明以前《铜人》、《明堂》、《子午》、《流注》等诸家针灸精华的文献汇编性著作。书分四卷,卷一论五脏六腑、仰伏人尺寸、手足阴阳流注、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及所属经穴的循行及主病,附有经脉经穴图;卷二为诸家针灸取穴法;卷三为煮针、温针、火针等针灸法;卷四为针灸要穴歌、经脉歌、补泻

手法歌、禁忌歌等等。高武在书中以按语阐述己见,用问答体说明针灸治疗的一些问题。此书选编精审,要言不烦,便于读者学习使用,一改其时针灸著作粗简杂乱的状态。其体例为后世所仿效。

杨济时(约1522—1620年),字继洲。三衢(今浙江衢州)人。生于名医世家。精于针灸,通内、外、妇、幼诸科。嘉靖至万历年间任太医院太医及医官,医术精湛,名重一时。杨济时曾遍阅古今针灸医籍,参合指归,汇同考异编成《玄机秘要》。后又广搜博采,选录《素问》、《难经》等三十二部有关针灸的著述,撰成《针灸大成》十卷。此书对明以前针灸学作了系统总结,卷一、二、三录入穴位图、针道源流、针灸经文与歌赋。卷四、五、六、七为针灸手法与穴位。卷八、九论述诸科疾病的针灸治疗、治症总要与各家针灸法。后附杨氏医案。卷十为陈氏《小儿按摩经》。此书对穴位名称、体表定位、取穴方法、进针深浅、主治功能考订详细,杨济时总结出爪切、持针、口温、进针、指循、爪撮、退针、搓针、捻针、留针、摇针、拔针等12种针刺手法,并进一步归纳成揣、爪、搓、弹、摇、扞、循、捻等八法,易记易学,很有实用价值。他主张“用针之法,候气为先”,首倡“宁失其穴,勿失其经;宁失其时,勿失其气”等学术主张,对于针灸学的发展有指导意义。《针灸大成》撷取古代医家针灸学精髓,整理充实发展,承前启后,为后世针灸学者所推重,在国内外流传甚广。

王肯堂(1549—1616年),字宇泰,镇江府金坛(今属江苏)人。年少习医,万历十七年(1589年)考取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检讨。后因上书抗倭被贬官,称病归家重操医业,颇有盛名。王肯堂在医学上的最主要贡献是编辑成一部医学全书——《证治准绳》。因其包括杂病、类方、伤寒、疡医、幼科、女科等六科,亦名《六科准绳》。全书四十四卷,包括《杂病证治准绳》八卷、《杂病证治类方》八卷、《伤寒证治准绳》八卷、《疡医证治准绳》六卷、《幼科证治准绳》八卷、《女科证治准绳》五卷。《杂病证治准绳》主要论述内科病症的证治。其中最有价值

的是对多种精神神经疾病所作的认真观察与记录。《杂病证治类方》收集包括王肯堂在内的医家诸方 2925 首。《疡医证治准绳》辑外科成方 1170 余首。总之,该书采摭繁富,详明实用,故有“三百年来承学之士奉《六科准绳》为宝山玉海”之评说。王肯堂还著有《医镜》、《郁风斋笔麈》、《灵台要览》、《医学穷源录》等。又曾辑刻大型医学丛书《古今医统正脉全书》行世。

张景岳(1563—1640 年),字会卿,会稽山阴(今属浙江绍兴)人。14 岁时随父赴京,拜名医金英为师。习医数年。壮年时曾东出榆关,投笔从戎。后返京师继续行医,以医术高超名满京城。1620 年返会稽埋头著述,先后写成《类经》三十二卷、《类经图翼》十一卷、《类经附翼》四卷、《景岳全书》六十四卷、《质疑录》一卷。《类经》系张景岳多年研究《内经》,辨疑发隐,补缺正讹之作,殚精极微,丝毫不漏。《景岳全书》论述作者温补命门阴阳的主张,对金元以降影响颇大的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各家学说进行探讨,提出不同见解。张景岳对传统中医理论有所突破发展,他将《周易》理论与中国医学理论结合,阐发了医《易》同源的思想,倡导命门阴阳学说等等,均有参考价值。

李中梓(1588—1655 年),字士材,号念菽。南汇(今属上海)人。出身官宦家庭。科举失利后,转而习医,50 年间于疑难杂症之治疗颇具良效,名擅一方。他撰有《内经知要》、《医宗必读》、《雷公炮制药性解》、《伤寒括要》、《颐生微论》与《士材三书》。《内经知要》为《内经》分类选辑本之善本,多次重印。《医宗必读》为明代重要的临床医学代表作。对医学源流、医学理论、病理病因及诊治方法均有精要中肯之阐述,间有新见。《士材三书》包括三种著作:《诊家正眼》为脉学专著,《本草通玄》为药物著作,《病机沙篆》介绍中风、虚劳等 12 种病症的病因、病机、证治方法与处方。李中梓宗法《内经》,并受薛己、张介宾、王宇泰等名医影响。他擅长于归纳总括前人之学术精华,并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经验加以阐发评注,在医学普及推广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赵学敏(1719—1805年),字恕轩,号依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年少时曾攻读《灵枢》、《素问》等医学典籍。一生著述甚多,现仅存《本草纲目拾遗》、《串雅》二种。《本草纲目拾遗》系赵学敏费38年心血编撰而成。为此,他在素养园中设置药圃,亲自种植与观察药物。该书十六卷收药908种,较《本草纲目》增716种。在一些方面对《本草纲目》之讹误与疏漏加以订正与补充,可视为《本草纲目》之续编。

魏之琇(1722—1772年),字玉璜,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著有《续名医类案》,系在对明代江瓘《名医类案》进行全面校订基础上,收集江瓘以后200年间的上百名医家临床验案,进行增补记载而写成的书。开创了我国医学著作上以病为纲汇集多人医案的体例。其医学论述见于其著《柳州医话》。

#### (四) 外科学、性病学的进步

明代外科学之宗当推陈实功。陈实功(1558—1636年),字毓仁,江苏南通人。生平以医为业,专精外科,治疗疑难重症每获奇效。40多年的行医生涯使他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晚年写成《外科正宗》一书,系统论述外科大小疾病150多种,在病因、病理、症状、治法、护理、典型病例、药方等方面论述清晰、记载详尽,其理论水平与临床技术明显胜于前人。《外科正宗》记载的取鼻痔秘法、(自杀)断喉吻合术、下颌骨脱臼整复术、咽喉与食道铁针取出术、痔瘻的治疗与挂线疗法、脱疽(闭塞性脉管炎)、截趾等等大多为陈氏所创。从中可见陈实功的外科临床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外科正宗》是中国外科学史上一部承前启后的著作,它改变了外科只重技巧不重医理的状况,在发展外科上起有重要作用。

明代性病学亦有发展,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梅毒病专家陈司成便是其中代表。陈司成生活于明后期,字九韶,浙江海宁人,出身于中医世家,在三吴行医20余年。见梅毒之疾害人极深,故潜心钻研治疗方法,并写成《霉疮秘录》,按脏腑经脉分类系统论述梅毒病因、症状、治

法、方药、服药与饮食宜忌,反映出他对梅毒病的认识与学术成就,有不少独创的见解,如用丹砂、雄黄等含砷药物治疗此病,手段堪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对后世性病治疗有很大影响。

## 二、数学成果

明清时期的中国数学与西方数学相比,处于落后状态,宋元高度发展的数学方法未被继承发展下去,数坛相对沉寂,但引人注目的是,此时江南地区却是中国数学家最集中的地区,出现了吴敬、程大位、李之藻、阮元、李锐、项名达、董佑成、徐有壬、戴煦、李善兰、华蘅芳等在明清数学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中国明清数学的成果主要出自江南。

明代商业数学与珠算发展较快,其代表人物为吴敬与程大位。

吴敬,字信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曾任浙江布政使幕僚,从事全省田赋和税收的会计工作。1450年完成其代表作《九章算法比类大全》十卷。卷首论及大数、小数、度量衡、乘除法、整数与分数四则运算等,并给出194个例题。卷一至卷九为1000多个应用题的解法汇编,卷名与分类悉遵《九章算术》。卷十专论开方,包括开平方、开立方、开高次方以及二、三次方程解法。全书共收入1329个应用题,其中包含不少与商业有关的问题,如价格、税务、利息、就物抽分等,此书是他在数学应用题的搜集与研究上取得的成果。

珠算术约产生于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曾记载珠算盘。明代珠算术逐渐取代筹算,其中安徽休宁人程大位(1533—1606年)影响较大。他在1592年写成的《算法统宗》“风行宇内”,习算者“莫不手藏一编”。《算法统宗》按九章体例分类,使用珠算方法计算全书595个应用题与开平方、开立方。卷三记载自制量田工具——丈量步车,并绘有图。末附“算经源流”载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到明万历年间刻本

数书 51 种,是一本完备的珠算及应用数学著作,代表明代数学的水平。

清代数学家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对传统数学成果的挖掘整理以及运用较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一些经典课题上推演出新的成果上。

乾嘉年间,阮元(江苏仪征人)任浙江学政时,曾邀李锐(江苏苏州人)共主《畴人传》的编纂工作。此书共收入中国古代数学家天文历法家 275 人。将他们的著作、成果、学术源流择其精要加以评说,此书搜集的数学、天文史料弥足珍贵,在中国数学史及天文历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李锐还先后校勘与整理了李治的《测圆铜镜》、《益古演段》,王孝通的《缉古算经》,秦九韶的《数书九章》。嘉庆年间撰成《弧矢算术细草》、《勾股算术细草》、《方程术新草》、《开方说》等书,后均被收入《李氏算学遗书》中。

项名达(1789—1850 年),字步莱,浙江杭州人。他与同乡戴煦(1805—1860 年)对三角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进行研究,采用了董祐诚(1791—1823 年,江苏常州人)开创的连比例法与明安图,得出了两个计算正弦值与正矢值的公式。项名达还推求得椭圆周长的正确公式,著成《椭圆求周术》,附刊于其代表作《象数一原》之后。1857 年,戴煦曾为《椭圆求周术》补了图解,并用求  $n$  分之一分弧之长,逐渐令  $n$  无限增大的方法证明了椭圆周长公式。戴煦的代表著作为《求表捷法》。他独立取得的主要成果有二项定理展开式、对数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三角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等。与戴煦同时代的还有徐有壬(1800—1860 年),浙江乌程(今湖州)人。他撰有《割圆八线缀术》四卷,系统总结了三角函数幂级数展开式研究,给出八线互求十二式、大小八线互求十八式,使三角函数展开式大体完备。

清代最著名的数学家李善兰(1811—1882 年)生于浙江海宁。他与戴煦过往甚密,切磋数学,1852 年曾赴沪参与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工作,8 年间译书八十余卷。1868 年入京任同文馆天文学算馆总教

习。其数学研究成果主要见于《则古昔斋算学》。其中《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探源》等研究幂级数展开式。他的数学主要成就有尖锥术、垛积术、素数论。尖锥术即用尖锥的面积来表示  $X^n$ ，用求诸尖锥之和的方法解决各种数学问题。由此法他得出了一些重要积分公式，其中包括定积分公式，而此时微积分公式尚未传入中国。他由此法还创立了二次平方根、各种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与对数函数和幂级数展开式，取得了十九世纪中国数学的最重要成果。其尖锥术蕴含着解析几何思想与微积分方法。其素数论成就体现于 1872 年发表的《考数根法》上，此为我国素数论史上最早的学术论文。

李善兰与他人合作翻译出版的大量数学、天文学、力学与植物学著作，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其数学著述“仰承汉唐，荟萃中外，取精用宏，兼综条贯”，“业畴人者，莫不家庖一编，奉为圭臬”（汪煦：《听雪轩诗存·序》）。

李善兰之后有华蘅芳（1833—1902 年），他与英国人傅兰雅合作翻译了《代数术》、《三角数理》、《积分溯源》、《代数难题》、《决疑术》、《合数术》。在中国近代数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华蘅芳数学成就主要在开方术、积较术、数根术方面。他关于数学理论、数学思想和数学教育等方面的评论性著作《学算笔谈》被广泛采用为新式学堂与学院的数学教材，再版多次。

### 三、天文学的停滞与发展

明代天文学几乎处于停顿状态，盖其时严禁民间研究天文历法所致。但官方的天文观测活动仍在进行。明初定都南京，鸡笼山上建起一座“钦天台”，装置观测天象仪器，对星象进行定期观测。常熟现存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元年（1506 年）石刻天文图，比宋代苏州天文图更为精确。郑和下西洋时，使用牵星术为代表的航海天文学来确定地

理纬度。此时编译介绍国外天文学著作的工作亦早已开始,其中贝琳与李之藻的工作较为突出。

贝琳(1420—1490年),字宗器,江苏江宁人。明天顺年间因精通天文历法被荐入钦天监工作。明成化六年(1470年)受命编译伊斯兰天文学著作《七政推步》。贝琳将此书中的《回回历法》重加整理编译,加入注释,充实诸如中国闰月的求法、中西星名对照表、历算表(10份)、黄道坐标的星图等等内容。在明代《回回历法》与《授时历》并用的情况下,贝琳的工作显然很有意义。

李之藻(1565—1630年),字振之,浙江杭州人,他曾编辑介绍《浑盖通宪图说》、《寰有诠》、《经天该》、《历指》、《日躔表》等,并将其时传入的西方著作,编成《天学初函》20种,分为器、理两编。对近代西方天文学在中国传播起过重要作用。

清初由于西方天文学译著的传播,传统天文学在受到冲击的同时,亦吸取了其中若干精华,并繁衍出新成果。王锡阐与梅文鼎为其中代表人物,成果斐然。

王锡阐(1628—1682年),字寅旭,号晓庵,江苏吴江人。梅文鼎(1633—1721年),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人。两人于天文学皆“考正古法之误,而存其是,择取西说之长,而去其短”。学术成就上“王氏精而核,梅氏博而大,各造其极”(《畴人传·王锡阐》)。

王锡阐对中西天文学方法均有深入研究,其代表作《晓庵新法》使用中国传统天文学结构框架,同时,采用西方天文学技术成果,吸取两者精华并有所发明与创造。他的主要成果有:提出了日月食初亏和复圆方位角计算的新方法,发明了计算金星、水星凌日的方法与计算月掩行星和五星凌犯的初、终时刻的方法,在当时堪称先进。他所撰《五星行度解》系为改进与完善西法中行星运动理论而作,在此书中他建立了自己的宇宙模型,并对行星运动的物理机制进行讨论,其改进尝试为清代天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王锡阐天文学著

作还有《历说》、《历策》、《日月左右旋回答》、《推步交朔序》、《测日小记序》、《大统历法启蒙》、《历表》等等。梅文鼎对他评价为“从《历书》悟入，得于精思”，系“能知西法复自成家者”，“近世历学以吴江（指王锡阐）为最”。<sup>①</sup>

梅文鼎生于宣城望族之家，其天文研究承先启后，毕生殚精著述，生前手订《勿庵历算书目》列入其天文学著作 62 种，数学著作 26 种。梅文鼎对传统天文学研究是从历法沿革方向展开的，曾自撰《古今历法通考》五十八卷，考述传统天文学之源流演变。他曾致力于元代《授时历》与明代《大统历》的研究，比较两者异同，并正误补缺，开辟了通过《大统历》来解读《授时历》的研究途径。他对西方天文学采取“平心观理”、“义取适用”的态度，故能综论中西历法的异同得失，并为中西历法的融会贯通做了许多工作。他在《恒星纪要》中将《崇祯历书》及其他书籍中的有关西方星表作了系统整理。《历学疑问》比较回回历中行星的本轮运行与传统天文学中顺、留、逆等状态的一致性。《五星管见》调合托勒玫和第谷两种体系的“围日圆象”说，实现了其行星运动理论模型和谐自洽的目标。

王锡阐与梅文鼎的工作，使清代传统天文学重获生机，功不可没。

#### 四、徐霞客等地理学家的成就

明清地理学界的杰出人才多出于江浙，如郑若曾、王士性、徐霞客、顾祖禹、齐召南等人，他们将中国地图学、人文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及历史地理学等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作出了显著成绩。

郑若曾（1503—1570 年），字伯鲁，号开阳，江苏昆山人。出身于

<sup>①</sup>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485 页注④。

书香世家。平生无意仕进,专心学问。主要著作有《郑开阳杂著》、《筹海图编》、《江南经略》、《四陲图论》与《尚书集义》等。《郑开阳杂著》是以地图为主的论著。《筹海图编》是一部全面论述中国海防的图籍,计图 172 幅,文字 30 余万,全面论述中国沿海地理形势、倭乱、明代海防策略与设置等等。郑若曾曾绘成“万里海防图”两种,一种由 12 幅组成;另一种由 72 幅组成,见于《筹海图编》卷一“沿海山沙图”;图上所绘沿海山川、海湾、港口、岛屿、礁石以及设置的堡、塞、营、卫、所、烽墩均清楚详明。《筹海图编》是中国海防图之代表作,在地图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明代后期,江南地理学家王士性与徐霞客分别在人文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了堪与比肩的成果。

王士性(1547—1598 年),字恒叔,号太初。浙江临海人,万历五年(1577 年)中进士,此后宦游四方,南北各省,通都大邑,足迹几无不至者。著有《五岳游草》、《广游记》、《广志绎》诸书,对大量地理现象作了纪实描述,并进行理论归纳与分析。他在地理学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人文地理学方面,兼及自然地理。《五岳游草》中他以自然山川与习惯为依据,将中国东南部划分为 14 个自然区,并概述其特点,较之明以前的划分更科学。他晚年写成地理笔记《广志绎》,卷一简要分析中国各地历史沿革、物产、燃料、交通、人才、习俗等方面的地域差异。卷二至卷五分论各地区地理及差异,其区域思想与区域划分相当精彩,对经济地理与社会文化地理的研究记载颇具价值。王士性对传统山系学说作出详细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三大龙说”,“以水为断”划分山系,把复杂山脉分布条理化、系统化,有些山系划分与现代划分的山系几乎一样。其划分虽与现代地理学按地质构造、地质时代划分山系的标准不同,但仍具有积极意义,因为,他不仅发展了中国山系学说,且使之完整化条理化,便于人们掌握全国山脉的大致情况。王士性在自然地理方面的考察记载与分析研究亦颇具科学价值,

如对喀斯特地貌与长江源头的探寻,对长江黄河流量差别原因的探讨,对各地气候特点与成因的分析等等。

与王士性同时代的徐霞客(1586—1641年),名宏祖,字振之,号霞客,江苏江阴人。虽出身于诗书仕宦之家,博览群书却绝意仕进,一生唯以旅行考察为业,其足迹遍及华东、华中、华南与西南诸省。他据此写下的著作《徐霞客游记》,内容丰富,详细记载了他所游历地方的山脉、河流、岩石、地貌、气象、生物、物产、交通、工农业生产、商业贸易、城乡聚落、风俗习惯等,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他在地理学上的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是对西南、中南地区岩溶地貌与溶洞的考察与研究,他准确地描述与分析了岩溶地貌的分布、类型、特征与成因,将20多种岩溶地貌特征进行分类定名,他考察过250个洞穴,对其形状、大小、深浅、洞口朝向皆有准确记载,并对溶洞、钟乳石、石笋成因作出科学解释;其二是对各地河流的分布与特征有详细记述,《徐霞客游记》共记载大小河流500余条,对发源地、流域面貌、流速、含沙量与侵蚀作用有生动与科学的描述,纠正了“岷山导江”的谬误,在《江源考》一文中指出金沙江是长江上游,他将福建建溪与宁洋溪作比较,得出流程与流速关系为“程愈近而流愈急”,河流侵蚀作用愈大的结论;其三是植物地理分布与形态观察成果,《徐霞客游记》记载了150多种植物,对植物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取得了规律性的认识,对海拔高度、纬度与气候影响植物分布与形态的观察相当细致;其四是记载了腾冲火山与云南地热。其五是记录了大量人文地理资料,涉及手工业、农业、商贸、聚落、民族、交通运输、风俗等等,徐霞客的地理考察成就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顾祖禹(1631—1692年),字景范,学者称宛溪先生,江苏无锡人。出身明代官宦世家。明亡后,顾祖禹隐居读书,立志著述,积30余年之功写成《读史方輿纪要》,共一百三十卷,280余万字。概述历代州域形势及明代行政区域之历史沿革、地理形势。收入历代地理书中



的河流的记载与史书中各地星宿分野的记载。顾祖禹治学注重军事地理,此书详于全国州域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并引证大量历史事件,推论成败得失,提出地利与人为之关系问题,主张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因素。《读史方輿纪要》广征博引、考订精详,为研究古代军事史与军事地理提供了详细史料,在古代地理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齐召南(1703—1768年),字次风,号琼台,浙江天台人。江南名士,官至礼部侍郎。先后任《大清一统志》、《大清会典》、《明鉴纲目》、《续文献通考》等书纂修官及副总裁官。一生著述颇多,地理学方面代表作为《水道提纲》。此书系统记述了十八世纪中叶中国水道的源流分合,首次清晰勾勒出中国海岸线,详细记述了自东北鄂霍次克海往南直到南海的沿岸城镇、关隘、河流入海口、岛屿,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

## 五、潘季驯、陈潢对治理黄河的贡献

明清时期的治黄工程与过去不同,采用了“以水治水”、在下游“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方法以代替传统“分流”法,黄河泛滥之灾减少,流域之内广大农田受益匪浅,其中贡献最大者为潘季驯与陈潢,二人均为浙江人。

潘季驯(1521—1595年),字时良,号印川,浙江乌程(今湖州)人。30岁中进士,后为官于江西、河南、广东等地。因黄河下游河道分岔紊乱,主流迁徙不定,受命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27年间4次出任总理河道,主持治理黄河、淮河、运河。他改变了前期分流方法,提出了束水攻沙的一系列主张,经他总督大规模的治理,黄河主槽逐渐固定,形成了稳定行水达300年之久的黄河河槽,出现了“流连数年,河道无大患”(《明史·河渠志》)的局面。潘季驯治河理论与方法主要反映在其著作《总理河漕注疏》与《河防一览》上,潘

季驯“以河治河,以水攻沙”的治黄方略核心在于治沙,具体采用筑堤固槽,以堤治河,遥堤防洪,缕堤攻沙,减水坝泄洪等工程措施。他改变了明代前期“北堵南疏”“分流杀势”,只重治水,不重治沙的局面,以束水攻沙、蓄清刷黄、淤滩固堤三项措施解决黄河泥沙问题,并完善了堤防修守的制度与措施,如修筑缕堤、遥堤、月堤与格堤四道防线防止河决。洪水期实行四防(昼防、夜防、风防、雨防)与二守(官守、民守)等,潘季驯提出治黄方案即使在今天仍具有科学性与实用性,当代国际水利学界曾就治黄提出种种方案,均没有超越潘季驯早已论述的原则,他的治黄成就标志着中国十六世纪水利科技已达到相当先进的水平。

陈潢(1637—1688年),字天一,号省斋,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平生好农田水利之学,科举失利后北上京师漫游,归途遇安徽巡抚靳辅,知遇之下任其幕客,康熙十六年(1677年)靳辅升任河道总督,陈潢辅助他治河10年,先后修复黄淮故道,堵塞黄河北岸杨家庄决口、疏通骆马湖、南运河口、清水潭漕运,并修筑中河保漕运。他继承与发展了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理论,发明了开引堵决法、放淤固堤法、测水法等。测水法系测量流速与流量的方法,“即用土方法,以水纵横一丈,高一丈为一方,计此河能行几方”,流速、流量的测得可使工程设计更准确、更合乎要求。他还创造了减水坝、坦坡等科学方法,以调节水量。陈潢有关治河著作有《河防摘要》、《河防统纂》、《治河策》等。现存《天一遗书》、《河防述言》系后人编成,保存了陈潢部分治河理论和工程技术知识,是水利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 六、地方性农书与综合性农书的增多

明清时期江南农业生产与农业技术均有发展,不少知识分子受

“经世致用”思想影响,注重于农学研究,其中佼佼者为马一龙、黄省曾、徐光启、张履祥,他们撰写的农书分地方性与综合性两类,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影响。

马一龙(约生活于十六世纪),字负图,号孟河。江苏溧阳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因母病辞官归家“力田养母”。《农说》是他根据自己农事经验写成的著作。他对前代农学理论作了系统化的叙述,以“畜阳”、“足气”、“固本”为中心阐说其农学理论,虽创见不多,但《农说》以其为纯农学理论性专著而自立于古代农书之林。

黄省曾,字勉之,号五岳山人,江苏吴县(今苏州)人。约生活于明中期。科场失意后,隐居著述。有《稻品》、《蚕经》、《鱼经》、《艺菊书》、《芋经》、《兽经》等农学著作问世。《稻品》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水稻品种专志,记载了以苏州地方品种为主的34个水稻品种的性状、播种期、成熟期、经济价值及别名。《蚕经》是第一本江南地区栽桑养蚕技术的专书,受其启发,此后出现的专著达180余种。《鱼经》则是一本集养鱼和鱼品为一体的养鱼专书。《艺菊书》着重于种植菊花的方法,为种菊专书。《芋经》则为中国唯一的一部种芋专书。

徐光启(1562—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官至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博极群书,主张经世致用,崇尚实学,是明末优秀科学家,曾与利玛窦合作翻译许多西方科技著作,为介绍西方科学之先驱,他主持明代唯一的历法改革工作,借鉴西法,融会中法,编译成一百三十卷《崇祯历书》。他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对中国近代数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徐光启精于天文、历法、数学,也精于农学水利。他的学术著作《农政全书》是集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大成的综合性农书,着重于农林牧副渔各项技术知识的系统记述。全书共六十卷,70多万字,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

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与荒政等 12 项,大部分篇幅转录包括明在内的古代 300 多种农业文献,并附有自己的评论,自撰文字约 6 万。《农政全书》主要包括农政思想与农业技术两大类。徐光启主张用垦荒与开发水利相结合的方法发展北方农业生产,提出“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的备荒救荒方针,他发展了古代农学的风土论思想,对棉花栽培技术及南方旱作技术均有总结提高。他注重选种,推广甘薯种植、栽培经验,研究蝗灾发生规律与治蝗的方法,是详实描述白蜡虫习性与蝗虫生活史之第一人,这些专论与见解均具较高科学价值。

张履祥(1611—1674 年),字介夫,号杨园,浙江桐乡人。青年时科举落第,遂教书乡间。明亡后,决心隐居终身,教学之余亦躬耕学稼。顺治十五年(1658 年),得《沈氏农书》,大为赞赏,受启发撰成《补农书》,这是《陈旉农书》后又一本关于江南稻区生产技术的农书。全书包括水稻、蚕桑、家畜饲养三部分,对《陈旉农书》与《沈氏农书》作了补充,如开磷作沟技术、小麦移栽技术等。张履祥重视农桑,发明了松棚木架养蚕法、治桑虫法,《补农书》中蚕桑占篇幅最大,因为“蚕桑利厚”,“多种田不如多治地”。反映在明清商品经济发展下,讲求经济效益的思想。张履祥总结出一套农业经营管理技术,对于家畜、水稻、蚕桑的投入与产出均有精确计算,提出在桐乡“多畜鸡,不如多畜鹅”,“雌鸡之利稍厚于雄鸡”等等结论。这些结论也是他主张“农事随乡”、“土壤不同,事力各异”思想体现,在这种因地制宜的思想指导下,他主张多种经营,在一块土地上采用间种轮种方法,农村林牧渔兼顾的规划使人尽其力,地尽其用。《补农书》记述苧麻、萝卜、甘菊、百合、山药、芋艿、白扁豆的种植方法及鱼、鸡、鹅等养殖方法,有些为古农书未载或未详,他的经验总结详细实用,丰富了古代农学的内容,为江南与桐乡地区的农业生产提供了借鉴经验。张履祥有《杨园先生全集》行世。

## 七、化学及其他科技成就

明清时期在化学、物理学、造船技术、军工技术、建筑学、海洋动物学、食品工艺技术方面作出贡献的江南学者有徐寿、徐建寅、赵士桢、茅元仪、屠本峻、计成、朱彝尊等。

徐寿(1818—1884年),字雪村,号生元,江苏无锡人。他与同乡华蘅芳曾赴上海,搜求西方近代科技书籍,并与李善兰结交,三者均为译介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著名学者。徐寿最早将西方近代化学知识系统介绍到我国,他在江南制造局参加西方科技书籍的编译工作达17年。他与傅兰雅等合作先后译书二十多部,专论九篇。其中《化学鉴原》、《化学鉴原续编》、《化学鉴原补编》、《化学考质》、《化学求数》、《物体遇热改易记》等六部化学著作,系统介绍了近代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及工业化学知识,为中国近代化学与化学工业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在翻译过程中,为化学元素确定了统一的汉译名原则,即以西文名字第一音节造字命名原则,至今为中国化学界沿用。徐寿曾参与编写《化学材料编写名目表》、《西药大成中西名目表》,为译介工作提供了极大方便,徐寿“能晓制造与格致”,曾与华蘅芳在安庆制造我国第一艘汽船“黄鹄号”,时速达40余里。1874年前后,他主持创立了我国最早的科学教育机构——格致书院。我国最早的科技期刊《格致汇编》也是他创办的。

徐寿之子徐建寅(1845—1901年),字仲虎,在近代科技史上也有诸多贡献。他与傅兰雅合作翻译了25种西方科技著作,大多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欧美科技名著,如《化学分原》、《声学》、《电学》等,最早将近代分析化学、声学与电学的基础知识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1879年至1881年期间,徐建寅对欧洲近代工业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考察,共考察德、法、英国企业80余个,归国后写成《欧游杂录》、《水

雷录要》两书介绍西欧近代先进工艺技术、军工企业与管理制。徐建寅也是近代造船、制酸、军火等民族工业的创始人之一。1901年他在武汉试验无烟炸药时，不幸遇难。

赵士桢(1553—1611年)与茅元仪(1570—1637年)在火器技术研究上各有侧重。赵士桢为浙江乐清人，少经倭乱，故留心军事与火器技术之学。曾先后制成火绳枪等十多种火器，其中包括西洋铳、鹰扬铳、掣电铳、震叠铳、迅雷铳等等。他著作的代表作为《神器谱》，系统反映了赵士桢关于火器制造与使用的理论，将明后期火绳枪的研制推进到较高水平，对明末清初火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茅元仪为茅坤之孙，浙江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博学多才，文武兼备。主要著作《武备志》为军事百科全书，采录引用历代兵书、史书2000余种。此书《军资乘》所记载军械、战船、火药、火器、水利、漕运、医药、马匹等均与科学技术有关。其中《火器图书》全面总结火药火器制造技术，这些火器大多是明代发展起来的火器与外国引进的火器，反映了中国古代传统火器技术的最高水平。《占度载》内容包括方輿、海防、江防及航海等，涉及地理学、航运技术与火器使用。其中《郑和航海图》是我国现存最系统完备的海图。《武备志》现已成为学者研究火药、火器技术的必读书。

明清的园林营造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江南一带私家园林相当多，如苏州留园、拙政园、狮子林，无锡寄畅园等。明末出现了一部重要的造园理论方面的著作《园治》，系统地总结了江南园林营造技术的成就。此书作者计成是江苏吴江人。他曾营造常州东第园、仪真寤园、扬州影园。计成认为造园应以“巧手因借，精在体宜”为原则，以山水为变化之内涵，力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之境界。这种天人合一，情趣自然的思想贯穿《园治》全书，是中国园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万历年间，浙江鄞县(今宁波)人屠本峻在海洋动物学、植物学

研究领域取得成绩。他著有《闽中海错疏》、《海味索引》、《闽中荔枝谱》、《野菜笺》、《离骚草木疏补》等书。《闽中海错疏》共记载福建沿海海产动物 200 多种,对其生态、习性、形态有不少精彩描述,屠本峻采用的动物分类法揭示了动物自然种群,当时居先进水平。此书为世界上最早的海产动物志,在生物学史上有重要意义。

清初著名文学家朱彝尊(1629—1709 年)也是研究食品科学著名学者。他生于浙江秀水(今嘉兴),字锡鬯,号竹垞。著有《食宪鸿秘》及《日下旧闻考》等。《食宪鸿秘》共著录了 400 多种饮料、调味品、点心、主食与菜肴。分饼之属、饭之属、粉之属、饵之属、肉之属、鱼之属、禽之属、蔬之属、酱之属等等。《食宪鸿秘》较全面地记载了中国古代饮食的生产工艺技术,如腐乳、糟腐乳、太仓糟油、金华火腿等等。其中有不少属首次记载,为传统食品的研究与仿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食宪鸿秘》还系统总结了我国古代饮食之“宜忌”,在中国营养学研究上作出了贡献。

## 第七章 民俗

由于吴越地区的历史、文化、地理的特异，所产生的民俗文化也具有自己的独特色彩。这里是越人活动的地区，他们剪短发，身刺花纹，吃蛇蛤为生。民间迷信鬼神，巫术流行，是一个蛮夷之邦。秦汉时，华夏人入主吴越。魏晋南北朝以后，北方大批士族和劳动民众南迁，带来了中原文化。南北文化广泛交流，南北民俗融合，使这里的民俗更显丰富多采。

唐宋以来，随着农业手工生产的发展，社会稳定，城市繁荣，特别是宋室南渡以后，中原臣民的大量南迁，市民阶层的扩大，在思想文化上带来较大影响。在城镇习俗方面，逐步由古朴、淳厚，转为奢侈。“俗习于燕安，以浮侈相高，靡衣鲜食，崇饰庐，嫁娶丧葬大抵无度，坐是贫窳不悔”（林季仲：《竹轩杂著》）。但在广大农村仍处于封闭状态，习俗仍旧，无多大变化。

明清时期，吴越民俗基本定型，辛亥革命前后，风气渐开，改革潮涌，民俗又经历了一次变化，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旧俗进行了猛烈的冲击。虽然在婚嫁丧葬、信仰、服饰上有所触动，但封建习俗在民间仍占主导地位。直到近代，还有许多古俗遗留。1949年后，有些陋俗已被革除。

吴越民俗的基本特点是：一是丰富性。吴越地区不仅历史悠久，



文化古老,而且幅员广阔,物产丰饶,人口众多。境内有山区、平原,又有海岛、湖泊,使民俗丰富多采。二是地方性。吴越民俗除了一般汉族共有的民俗外,还由于本地特点,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情,“山川有殊,民情各异”。如在饮食、居住、服饰、灯彩、过节、娶亲、丧葬等方面,有不少民俗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三是融合性。吴越民俗在产生、发展过程中,接受了楚及闽越等地习俗的影响,并大胆吸收融合了南北民俗。因此,使吴越民俗更具复合型。

---

## 第一节 节日民俗

---

### 一、岁 时

#### (一) 元 旦

宋代,在临安(今杭州),正月初一谓“元旦”,俗称“新年”。清晨,各家开门放爆竹,以求“开门大吉”。士大夫相互祝贺新年。但大多不亲往祝贺,令人持名刺前往,留下名刺即回,表示已到。民间各家男女,均穿新衣,往来亲友间拜节,时称“拜年”。街坊以食物、冠梳、领袜、缎匹、花朵、玩具等物沿门叫卖。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绝。家家饮宴,笑语喧哗<sup>①</sup>。在苏南吴县,以汤圆、春茧为节食。爆糯谷于锅中,名“孛娄”,亦曰“火花”。每人自爆,以此卜一岁之吉凶。<sup>②</sup>

明代,在临安,鸡初鸣,各家在神、宗庙影堂前罗列花彩、糖果等物。先以米团、糖豆祀灶,名曰“接灶”。祀毕,以米团饷众,谓之“欢喜团”。再迎岁神,次拜各神暨祖先,然后家众聚立中堂,按卑幼次序拜

---

①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正月”。

② 宋刻本《吴县志》“岁时·正月”。

贺尊长。礼毕,男子出访宗党亲友,谓之“贺节”。拜节帖用红单书姓名,曰某某拜贺,例无称谓;不亲到而遣人投刺,谓之“飞帖”。贺客沓至,设门籍书姓名簿供签名之用,签标曰“留芳”,或曰“题风”。铺家设籍门外,以红笔束葱段、松段供人书写,取葱茏、松茂之意。在出行时,烧吉方喜神纸。凡出行者,先兜喜神方,后随意命驾,吉无不利。该日游戏甚多,有吹太平箫、吹鸡儿、放纸鸢、玩赶鱼儿、踢毽子、相思版、春对、十样景、面具以及掷升官图等<sup>①</sup>。架松柴于炉中,再放上栗炭使炉火猛旺,谓“旺相”。各置柏枝二大束于神前。也有在柿饼上,签柏枝,以大桔承之,谓之“百事大吉”。贴青龙于左壁,谓之“行春”;插芝麻梗于檐头,谓之“节节高”<sup>②</sup>。在宁波,男子出拜亲族、亲戚、邻里,谓之“贺岁”。各家以酒食款待。三日,谓之“小年朝”,卜筮占年。四日祀灶,谓之“接灶。”

清代,元旦食糕,同时,又食粽,谐音为“高(糕)中(粽)”,含祝贺之意。嘉兴,六月六日取马齿苋蒸熟而食,其次序则自最幼至最老,为古人饮屠苏酒的遗意。并制椒柏酒款待亲戚邻里,以春饼为上供<sup>③</sup>。在安吉,人们出拜亲友,谓之“拜年”,家设茶果、蒸糕,客至先饮茶后留饮酒。虽历数家,必一即席始退<sup>④</sup>。在定海,元旦五鼓即起设香烛,男女礼服拜上下神祇;列饌酒馔,祭拜祖宗。

民初,将先辈及祖父遗像悬挂别室,曰“神子”或“容子”,朝夕燃香,供蔬果、酒食,至“落灯”(正月十八日)才收下。戚族贺岁者先拜神子,后向主人贺年<sup>⑤</sup>。男子出拜亲邻,女子不拜,惟口道吉语,大多备酒宴饮,谓之“岁饭”、“年酒”。

① 《古今图书集成·杭州风俗考》。

② 民国十一年《杭州府志》转引《西湖游览志余》。

③ 明万历十八年《嘉兴府志》“岁时·正月”。

④ 清同治十三年《安吉县志》“岁时·正月”。

⑤ 民国十一年《杭州府志》“岁时·正月”。

## (二) 元宵节

在临安,唐代已很盛。宋初,张灯三日夜,吴越钱王归宋后改为前后五夜张灯,街巷悬卖各色花灯,谓之“灯市”,灯品极多,以苏州、福州灯为冠。其名称有“珠子灯”、“戏马灯”、“无骨灯”。从官巷口至苏家巷,还有二十四家傀儡戏,分场表演<sup>①</sup>。家家开宴,装放烟花以娱宾客。民家粘灯谜于灯上,谓之“猜灯”,射中者赠以巾、花爆、果核、杖头钱等。俗以五夜晴明为五谷丰登之兆,乡村妇女在十五夜请厕姑神占卜,以测一岁吉凶和蚕田丰歉,俗呼为“三姑”。

明代,每逢元宵节,全国弛禁十日,越地亦颇盛。在宁波,自十三日夜始,至十八日止。四街各设竹棚、彩障,悬灯其上;祠庙皆盛张灯,游观达曙;或以焰火为锦树之戏。并筛粉作圆,名“灯圆”,或设宴飨客,谓之“元宵酒”<sup>②</sup>。在绍兴,每至正月十三夜,民间每户人家搭竹棚悬灯,有麦秆灯、料丝灯、羊皮灯、夹纱羊角灯、云母球屏灯等。在市区还设烟楼月殿、鳌山火架,集珍聚奇,凡人家有珍丽器具古玩者,必参差陈列,供人欣赏。箫鼓歌讴之声,喧阗达旦。十五、十六夜灯市最多,十七则稍稀,十八、十九渐趋冷落,二十日则谓“残灯”了。<sup>③</sup>

清代,在湖州,正月十五日,村落间束草把于杆,上挂彩帛。夜则金鼓、流星、花爆,侑以赞词,群聚而焚之,曰“烧田蚕”,也是一种祈年。后来沿袭,发展为“甩火把”,人们边甩边祝,“火把攒至西,风调雨顺笑嘻嘻,火把攒到南,国泰民安人心欢……”<sup>④</sup>。在玉环,设盛饌以供祖先,每室皆燃烛,曰“间间亮。”墓上插竹悬纸灯。村落各制龙灯,鸣锣击鼓,旋绕为戏,有制禽兽、鳞鱼花灯,入人家串户戏阵,环观如堵。在乐清,通

① 周密:《武林旧事》卷二“元夕”。

② 民国十一年《杭州府志》转引《西湖游览志余》。

③ 明万历《绍兴府志》“岁时·正月”。

④ 清乾隆四年《湖州府志》“岁时·正月”。

衢结彩幕张灯(或放烟火),庙宇尤盛,自初九至元宵,笙歌达旦,烛为之贵。十七、八落烟之夕,多以芝麻、绿豆撒之,焚灯放爆。<sup>①</sup>

### (三) 端午节

吴越地区的端午竞渡,有源于“勾践于此日操练水军”(高承:《事物纪原·竞渡》)之说。明万历《温州府志》仍载:“竞渡起自越王勾践,永嘉水乡用以祈赛。”至清才有纪念屈原之说。另有纪念伍子胥之说。史载伍子胥尽忠于吴,后被吴王夫差杀死,抛尸于江,化为涛神。南朝时,五日在钱塘江上举行迎潮、弄潮,人们逆涛而上,表示接子胥归来,俗称“迎潮神”(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另有纪念孝女曹娥之说。曹为会稽上虞人。其父于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迎波神溺死,娥缘江号哭七日,遂投江而死,后人以五日为“曹娥节”。端午辟邪驱毒习俗,则历代传承。

宋代,在临安,门首各家设大盆,杂植艾蒲、葵花,上挂五色纸钱,排钉果粽,虽贫亦然。人们还佩赤灵符,采百草制药以辟邪。<sup>②</sup>

明代,该日为“天中节”。人家包黍稷为粽,束以五色彩丝,或以菖蒲、通草,雕刻天师驭虎像立于盘中,围以五色蒲丝,并剪皮金为百虫之像铺其上,或以葵榴、蒲艾,或以彩绒杂金线缠结经筒、符袋,互相馈遗。家家买葵榴、蒲艾,置于堂中,标以五色花纸,并贴画虎蝎或天师之像,或朱书“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灭”之句,贴在楹间。或采百草以制药品,觅虾蟆以取蟾酥,书“仪方”二字倒贴于楹,俗信可以辟蛇驱虺。是日,西湖竞渡尤盛。画舫齐开,游人如蚁。有龙舟六只,都扮十太尉、七圣、二郎神杂剧,饰以彩旗、锦伞、花篮、闹竿、鼓吹之类。立标竿于湖中,挂锦彩、银碗、楮币以赏划得最快的龙舟。彩

<sup>①</sup> 清光绪二十七年《乐清县志》。

<sup>②</sup> 《武林旧事》卷二“端午”。

旗一举，诸舟竞发，先至者取赏而退，其余犒钱而已<sup>①</sup>。在绍兴，农村有“竞渡会”，农民穿绯衣，歌农歌，数十人划一舟，相互追逐为戏，观者如堵。

清代，在象山，民间取菖蒲及艾插门户，或将小彩幡佩在身上。杂菖蒲、雄黄和酒饮之，以辟邪攘毒，制食角黍和骆驼蹄糕，并用以祀其先，亲戚间互相馈赠。妇女剪黄荼蘼枝，取其中白瓢染作花草插戴，谓之“端午花”。各地均有龙舟竞渡。在西湖，有龙舟四五只，其船长约四五丈，头尾均高，彩画如龙形，中舱分上下两层。首有龙头及秋千架，均有小孩装扮人物。秋千上下推移，旁列十八件武艺和各式旗帜。中央有高低五色彩伞，尾有蜈蚣旗，中舱下层敲锣鼓，旁坐水手划船。看船停泊湖中，并在龙舟四周围转，鱼贯而行。如抛物件，各龙舟水手下水抢取，最难者抛钱鸭二物，各舟争胜，大有可观。游船之中，或打十番锣鼓，亦有吹弹歌唱。五月初一起，至初十止。

民初，在东阳、浦江一带，妇女佩符艾，或以茧作虎。小儿以彩绳系臂，名曰长命缕，缀绣符于衣带，谓可消灾。采药合药者，俱以是日为最效<sup>②</sup>。在浙南操龙舟竞渡之风甚为盛行。

#### （四）七 夕

宋代，妇女至夜对月穿针，谓之“乞巧”。节物多尚果实，玩茜草制作的小鸡及泥孩儿，并以蜡制鳧雁水禽之类，浮之水上。其日晚，倾城儿童妇女，不论贫富，皆着新衣过节。富贵家于高楼危榭安排筵会，以赏节序外，又于广庭中设香案及酒果，令女郎望月瞻斗列拜，“乞巧”于牛女，取小蜘蛛放在金银小盒内，次早开盒，结网圆正，俗谓“得巧”。市井儿童多穿着半肩荷叶，又手持荷叶，效摩睺罗状<sup>③</sup>。明代无

① 民国十一年《杭州府志》转引《西湖游览志余》。

② 民国三年《东阳县志》“岁时·端午”。

③ 《梦梁录》卷四“七夕”。

穿针之俗,妇女以针投之盂中,翌日,视其针影形状,以占巧拙。民间以土木雕塑孩儿,穿起彩服,当街出售。殷富之家,摆列各种水果,还配佳肴宴饮,有的家还采荷花养水盆中,放置高处接露水,次日用来洗手。<sup>①</sup>

清代,在云和山区,“七夕”不礼牛女,而是“护国夫人诞”。女巫以彩缕系小儿项臂,谓可长命,曰“长命丝”。在太平,七月六日夜,妇女摘时花置盆水中,放天井,谓为织女接泪,次日用来净目,并采篙槿渍水洗发。

民初,在定海,妇女以槿叶片濯发。是夕,妇女陈瓜果向牛女“乞巧”,于眉月明星下穿针,度过者为得巧,或以盂盛水,映星光观之,以辨目力之强弱。<sup>②</sup>

### (五) 中元节

宋代,在临安,道家谓之“中元节”。各有斋醮等会。僧寺都在这天作盂兰盆斋,人家亦都在此日祭祀祖先,供品用新米、新酱、冥衣、时果、彩缎等。<sup>③</sup>

明代,此日俗传为地官赦罪之辰,人家多持斋诵“甘露经”,荐奠祖考;僧家建“盂兰盆会”,并用素馔祭祀先祖,召僧道焚楮衣。<sup>④</sup>

清代,或剪纸为衣,谓施给鬼魂,曰“冥衣”;或将纸衣系树以香燃之,枝叶皆旃檀气,曰“香树”。在嘉兴,除延僧诵经荐亡外,夜放焰口施食,沿河放灯,曰“照冥”,以素食祀先,曰鬼节。僧舍作“盂兰盆会”。在诸暨,有塔处皆燃灯,人家或燃灯于树,或放水灯,儿童则造瓦塔燃灯为乐。各寺长老披袈裟说法,谓之“坐台”,俗谓之“斋孤魂”。

① 民国十一年《杭州府志》转引《西湖游览志余》。

② 清康熙《定海县志》“岁时·七夕”。

③ 《武林旧事》卷三“中元”。

④ 民国十一年《杭州府志》。

民初,在双林,祀祖以素饌,磨绿豆杂以米粉作饼,曰“豆灼饼”。有丧之家,孝子衰麻执香迎于门外,妇女哭于帐中,谓之“接亡人”。后改在三十夜,延僧坐船放焰口,船头焚纸,沿路放灯。

### (六) 中秋节

宋代,八月十五日,谓之“月夕”。富家巨室登楼临轩玩月,琴瑟铿锵,酌酒高歌,有通宵达旦,彻夜不眠者。中等人家,亦登月台,安排酒宴,全家团圆以酬佳节。有些贫苦之家,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此夕。天街买卖直到五鼓,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至晓不绝<sup>①</sup>。乾淳时,在西湖,放“一点红”羊皮小水灯数十万盏,浮满水面,烂如繁星,俗谓此江神所喜。民间以月饼相互馈赠。

明代,月饼以酥果为馅。是夕,人家有赏月之宴,或携榼湖船,沿游彻晓。苏堤之上,人们联袂踏歌,好似白日。<sup>②</sup>

清代在中秋夜祀月,糊纸斗,炷香其中,其斗四方,上大下小,纱绢糊造,上缀月宫,走马灯景,四角挑灯。大者四方各二尺许,谓“斗香”。琵琶街有出售。除大街店面供奉外,人家设于天井,还配以各式灯景<sup>③</sup>。

民初,民间以月饼相赠遗,有的人家载家挈子出游,清歌妙曲,往往彻曙而罢。或架桌于庭中焚香,名“烧天香”。在四明,以十六为中秋,并有竞龙舟之乐。相传越王母夫人以十六日生,故以是日为佳节,并以龙舟娱其亲,其俗一直传承至今。<sup>④</sup>

### (七) 重阳节

宋代,在临安,店肆或人家以糯面蒸糕,上以猪羊肉、鸭子为丝簇钉,插小彩旗,名曰“重阳糕”。明代,以糜粟粉和糯米拌蜜蒸糕,铺以

① 《梦粱录》卷四“中秋”。

② 民国十一年《杭州府志》转引《西湖游览志余》。

③ 《杭俗遗风》“时序类·中秋斗香”。

④ 清光绪三年《鄞县志》“岁时·中秋”。

红缕，标以彩旗，问遗亲戚。并供神和祖先，曰栗糕。登高都为富贵家和士人。<sup>①</sup>在绍兴，重阳登高，并蒸米作五色糕，亦裹角黍。府城剪纸旗供小儿嬉戏。在诸暨，则饮茱萸酒，必配以豆荚<sup>②</sup>。清代，在浙江各地，多有登高饮酒之举。惟余姚，重九不登高，但为花糕饮食而已。在杭州，人们纷纷赴城隍山、紫阳山登高，吃糖炒栗子、鸡豆，游斗坛、文昌、关帝、火德等庙，摆设灯谜，为一时雅会。<sup>③</sup>

民初，在东阳，重阳与端午并重。民间亦制角黍相馈，并以茱萸酿酒。养菊者饮菊花酒。人们提壶挈榼，登高览胜，如下雨则以十二补之，谓之“赛重阳”。

#### (八) 除 夕

十二月始，谓之“腊月”，各地均办年货。宋代，在苏南吴县，于腊月力春一岁粮，藏之土瓦瓮中，经岁不蛀，谓之“冬春米”<sup>④</sup>。腊八日，在临安，各寺院及人家用胡桃、松子、乳蕈、柿、栗之类作粥，谓之“腊八粥”。医家亦多合药剂，佐以虎头丹、八神屠苏，贮以绛囊，免费馈送，谓之“腊药”。二十四日，谓之“交年”。不论穷富皆备蔬食、花饧、米饵等进行祭灶，并作糖豆粥，谓之“口数”<sup>⑤</sup>。该日，各地扫除尘土，谓之“掸尘”、“掸新”、“换新”、“除残”。除夕，士庶家不论大小，都要洒扫门闾，换门神，钉桃符。家家灯烛辉煌，香烟不断，爆竹鼓吹之声，喧阗彻夜，谓之“聒听”，小儿女终夕博戏不寝，谓之“守岁”。<sup>⑥</sup>

明代，人家多换桃符、门神、春帖、钟馗、福禄、虎头、和合诸图，粘贴房壁。至夜，家庭举宴，长幼咸集，燃灯床下，叫“照虚耗”，

① 民国十一年《杭州府志》转引《西湖游览志余》。

② 明万历《绍兴府志》“岁时·九月”。

③ 《杭俗遗风》“时序类·重阳登高”。

④ 宋刻本《吴县志》“岁时·十二月”。

⑤ 《武林旧事》卷二“重阳”。

⑥ 《梦粱录》卷六“除夜”。



以赤豆作粥，猫狗皆食之。清代以竹灯制轿，以箸作杠，在祀灶时焚烧，俗谓灶神上天之舆，买必配双，吉号谓善富。在嘉兴，该日曰“小年”。<sup>①</sup>

民初，仍有此俗，惟时间多改于二十三日，灶神像有用刻板印染一男一女之形，但无口。除夕，在室内燃巨烛，直至天明，谓之“岁烛”。儿童度岁，长者用红绳，穿铜钱放在枕边，曰“压岁钱”。该夜必留火种，号曰“隔年火”。还在家堂、庙并各神前供饭一盂，上置小桔，中插柏子，旁放年糕，又用锡孟式小篾箩，中插竿杆及柏子一封，旁置葱一对，并年糕、桔子、菱肉、元宝花之类，供于大厅，名“聚宝盆”。杭俗，以“除夕”为鼠娶妇日，在床下放饭一碗，插花其上，曰“鼠饭”。“除夜”封门，必至“元旦”始开，索债人来也不敢叩门。封门，束甘蔗竖立门侧，取渐入佳境之意，曰“封门甘蔗”。并以柑桔、荔枝置枕旁，翌日取食，叫“吉利”。后又有封井、封仓库诸俗。家人拜贺尊长，谓曰“辞岁”。在奉化，用牲祭祀神，谓之“送岁”。同时明烛烧香，炽炭燔柴，全家人聚集待旦，谓之“守岁”。并在该夜蒸米为糗，新岁时复炊而食之<sup>②</sup>。民初，在绍兴，自过年即洒扫堂屋，到天晚在庭中聚杂柴燃烧，古谓“火山”，俗曰“笙盆”，光焰烛天。燃纸炮以代爆竹，设祀曰送神。全家老小欢饮，曰“分岁”，有终夜围炉坐者，曰“守岁”。

## 二、农 事

### (一) 立 春

宋代，在临安，民间以土制小春牛相馈，配以彩杖、耕人，以求“丰稔”之兆。明清时，“立春”前一日，官府迎春，迎春牛和句芒神，老幼填

<sup>①</sup> 清嘉庆六年《嘉兴府志》“岁时·十二月”。

<sup>②</sup> 清乾隆《奉化县志》“岁时·十二月”。

集衢路观看,谓之“看春”。所过处,各设香烛、楮币,并用五谷抛掷,以祈丰年。迎至府衙后官民鞭碎土牛,农民争取春牛之土,谓宜蚕。<sup>①</sup> 该日,妇女各以春幡、春胜、彩燕等物,相互馈赠。烧七种菜款待宾客,也有以薄饼裹肉、缕葱、茭、萝卜等,谓之“春饼”。焚松柴或栗炭取兴旺之意。明代在杭州,每年仍迎奉句芒之神于吴山太岁庙,曰“太岁上山”。在平湖,有祭芒神,鞭土牛,家造春饼,进春酒等俗。民初,在衢县,迎春之俗虽废,民间犹有鼓吹送春牛图于人家者,并于春至之时备香烛、摆春菜接春。在温州,则有喝春茶、煇春(以樟叶束炬焚烧)之俗。<sup>②</sup>

## (二) 清 明

宋代,逢“清明”、“寒食”两节,家家以柳条插门,名曰“明眼”。此日又有龙舟可观,不论贫富倾城而出,鼓吹喧天,到晚才次第回城。每家上坟扫墓。南北两山间,车马纷然,野祭尤多。归来时买木鱼、龙船、花篮、闹竿等玩物,送给亲朋邻里<sup>③</sup>。明代,在绍兴,前后数日,家家插柳祠堂,或全家行赏郊外,曰“踏青”。苏堤一带桃李荫浓,红翠间错,走索骠骑,飞钱抛钹,踢木散沙,吞刀吐火、跃圈、翻斗、舞盘及诸色禽之戏,纷然丛集表演,又有买卖赶趁,出售香茶细果及各种酒菜,还有彩装傀儡、莲船战马、琴箫鼗鼓、琐碎戏具等以供儿童玩乐。各家设奠拜祀祖先,出郊扫墓,并以纸钱挂树上,其米食皆用青白团子,亦寒食遗意。在楹梁间贴“清明嫁九娘,一去不还乡”之句,认为可使夏无青虫扑灯之扰。僧道采桐杨叶染饭,谓之“青精饭”,以馈施主。吴兴以四月为蚕月,家家闭户,连官府的考试、阅兵、办案、征税等事务也不得不为之停办,谓之“蚕禁”。<sup>④</sup>

清代,在湖州,俗重墓祭,亦有祀于室者。男女戴柳,亦插柳檐上,

① 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八。

② 《温州民俗》第五章第二节“时令习俗”。

③ 《梦粱录》卷二“清明节”。

④ 民国二十八年《嘉兴府志》“岁时立春”。

农民浸谷种,晚则育蚕之家设祭以禳白虎。食粽子,取寒食之义;食螺谓之“挑青”,云可明目,并以其壳撒于屋瓦上,谓之“赶白虎”。

民初,在德清,除扫墓祭神外,有赛会,观社戏及举家踏青之举,届日家家仍插柳于门。

### (三) 立 夏

宋时,有新茶、新笋、朱樱、青梅等物,杂以桂圆枣核诸果,镂刻花卉、人物,极其工巧,各家传送,谓之“立夏茶”。民间食物有腊肉、烧酒、海蛸、烧饼等<sup>①</sup>。明代,以诸果品杂茗碗,亲邻彼此馈送,名曰“七家茶”,取八家同井,比邻相馈之义<sup>②</sup>。清代,食青精饭,杭人呼为乌饭,亦有制以为糕者,于“立夏”食之。儿童席地为炊,薪、米、豆、肉皆向人家讨取,亦厌胜之意。家家悬大秤,男女皆称身重,以测一年肥瘦<sup>③</sup>。在黄岩,擀面为薄饼,裹肉菹而食,谓之“醉夏”。老幼食青梅,云能明目<sup>④</sup>。在宁波,则炊五色米为“立夏饭”。民初,在萧山,摘蚕豆尝新,食螺笋谓可健脚骨,忌坐门阶,谓不利于脚。

### (四) 夏 至

宋代,在苏南吴县,作角黍祭神,以束粽之草系手足,云能令人健壮,名“健粽”。又以李核为囊带之,云可“疗噎”<sup>⑤</sup>。清代,在武康,祀先农,农夫插秧,谓之“开秧阡”。在萧山,多供茶曰夏至茶。民初,在东阳南郊山区,有“拜斗会”之俗,“夏至,凡治田者,不论多少,必具酒肉,祭土谷之神。”在晒谷场上,将稻桶装扮一番,置台坛上受祭。供品为百谷、百果、百花。参加者为壮年妇女,先列队从火上跨过,妇女扮谷神,在坛前起舞,后齐声歌唱“十二花名”,继之群舞和串唱戏文,直

① 《古今图书集成·杭州城风俗考》。

② 民国十一年《海宁州志》“岁时·立夏”。

③ 民国十一年《杭州府志》引。

④ 明万历刻本《黄岩县志》“岁时·立夏”。

⑤ 宋刻本《吴县志》“岁时·夏至”。

到深夜。<sup>①</sup>

### (五) 立 秋

宋代,都人饮水,食赤小豆。满街叫卖秋叶,妇女小儿剪如花样,插于鬓边<sup>②</sup>。明代,男妇都头戴桃叶,并以煎汤沐浴。或以石楠红叶刻剪花瓣插鬓。民初,则以井水吞赤小豆七枚,妇女或食秋桃一枚,谓可辟疫。在定海,以莱菔子、蓼曲和窰糕、炒米粉等捣碎之,以供儿童食用,谓可去积滞。

### (六) 冬 至

宋代杭都风俗,士庶均重此节,如送馈节仪及祭享宗祠,举杯相庆,比平常节日更加隆重<sup>③</sup>。乾淳时民间祀先用馄饨,故有“冬馄饨”之谚。贵家求奇,名色花样更多,名之“百味馄饨”<sup>④</sup>。明代,“冬至”谓之“亚岁”,官府民间各相庆贺,如“元旦”之仪,并春糍糕以祀先祖<sup>⑤</sup>。清代“冬至”头一夜,须扫隔年地,供隔年饭,燃年火。是晚吃包头鱼熬豆腐。<sup>⑥</sup>

## 第二节 生活民俗

### 一、饮 食

吴越民族地处太湖流域,临于江海,有三江五湖之利,因而好食腥味。“东南之人食水产……龟、蛤、螺、蚌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臊也”(《博

① 民国三年《东阳县志》“岁时·夏至”。

② 《梦梁录》卷四“七月·附立秋”。

③ 《梦梁录》卷六“十一月·冬至”。

④ 《乾淳岁时记》“冬至节”。

⑤ 民国十一年《杭州府志》转引《西湖游览志余》。

⑥ 《杭俗遗风》“时序类·年市喧哗”。

物志·五方人民》)。秦汉时人们已以稻米为主食,能制作以鱼类为原料的多种羹汤,并以羸蛤作为佐餐食品。“楚越之地,饭稻羹鱼……果蔬羸蛤,不待贾而足”,“食无饥馑之患”(《史记·货殖列传》)。

魏晋南北朝时,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步南移,南北民俗交流,吴越饮食民俗更为丰富。当时民间流行羹脍之类菜肴,其中有一名菜,以莼菜作羹,在南食中曾名扬四方,“千里莼羹,岂关鲁卫”(《南史·崔祖思传》),即指莼菜羹,一直传承至今。在海滨,能以鱼类作佐料,采取脍、炙、烹、臠四法,制作各种佳肴,即所谓“脍鲙鮓,炙鳖蛄,烹石首,臠鲨鳖”,有“东海俊味,至妙肴膳”之称(《舟山市志》转引)。

晋时,饮酒之风甚盛,如在绍兴地区,酿酒之风较盛,绍酒被列为贡酒。民间生女酿酒,嫁女必用酒,“南人有女数岁,即大酿酒。……女将嫁,乃发陂取酒,以供贺客,谓之女酒”(晋嵇含:《南方草木状》),俗称“女儿酒”。当时,北方某些饮食民俗也传入浙江。

隋唐时,越酒行天下,享有盛名。浙茶也十分流行:“茶,浙西以湖州上,杭州晓州下;浙东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陆羽:《茶经》)。当时会稽杜济,能辨百味,他创制的“石首含肚”,味道鲜美,名噪一时(《大业拾遗记》),后用作贡品。

五代十国时吴越国,经济繁荣,食品丰富:“……南之蝓蠓,北之红羊,东之虾鱼,西之粟米,无不毕备”(《宋史·吴越世家》)。

北宋末年,宋室南迁,杭州成为南宋都城。北方大批王公贵族渡江南下,形成了又一次南北民俗交流,促进了饮食民俗大发展。南宋时,在临安,酒楼林立,食店、点心店遍布街巷。著名的官、私豪华酒家就有二十余家。前者有和乐楼、和丰楼、中和楼、春风楼、太和楼等,后者有熙春楼、三元楼、赏心楼、花月楼等。每楼各分小阁十余间,当时供应的美酒有琼花露、蓬莱春、蓝桥风月、浮玉春、丰和春等,名菜有“玉鲙丝莼”、“鲈鱼”、“玲珑牡丹”、“百味羹”、“笋焙鹌子”、“银鱼炒鳝”、“五味炸鸭”、“酒蒸鸭”、“酒炙青虾”、“酒烧香螺”等等,不胜枚

举。其中“酸熘鱼”，相传为卖鱼羹人宋五嫂所创，故又叫“宋嫂鱼”（陆游：《菽园杂记》）。它最早是用活青鱼切成大块“用油灼之，加酱、醋、肉烹之”，以后改“灼”为蒸；后又将活草鱼清水饿养，使它吐净泥质，再用沸水氽过，最后以各种调料烧汁烹制。再如金华、义乌一带的“南肉”，已脍炙人口，后发展为金华火腿，均至今不衰。

至于小吃经营，更为兴隆。“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梦粱录》卷一六）。所卖点心有煎白肠、烧饼、蒸饼、糍糕以及五味粥、肉合粥和血脏羹、羊血、粉羹之类。其名店小吃有鹤鹑儿、羊脂韭饼、澄沙团子以及鸡肉面、鱼桐皮面等（《武林旧事》卷六·市食）。杭人嗜蟹若命，食单有炒蟹、蟹糟、“洗手蟹”、蟹肉包儿等。当时各种小吃有百种以上。北方食品亦传入浙江，如李婆婆羹、张家团子、酪面、胡饼、胡羊粳等。

明代，饮酒之风甚盛，有越州的蓬莱酒，绍兴的豆酒、薏苡酒、地黄酒、鲫鱼酒以及东阳酒等。“两浙之茶，日铸第一”，民间饮茶之风亦盛（明张岱：《陶庵梦忆》）。在烹饪技术上也进一步提高。当时杭州菜肴有“台羹烂肉”、“蜜火腿”、“家乡肉”、“醋搥鱼”、“酱炒甲鱼”、“干蒸鸭”、“土步鱼”、“鳊面”、“烧鹅”等二十多种。各地小吃有“点心谱”，可见当时的饮食丰富。泮清渠（清代慈溪厨师）的《饕餮谱》，记载了412种精美食品的制作方法。童岳荐的《调鼎集》，也记述了不少江南风味菜的菜谱。

清末民初，吴越地区在主食、副食、风味小吃等方面，均已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饮食民俗。在主食方面，杭嘉湖等平原地区与城镇以大米为主，其米种甚多，如早米、晚米、白米、粳米、糯米、红米等，其中比较有特色的为冬春米、黄米、蒸米。如黄米，由白米囤制而成。其法，用羊叶（桔叶）、米糠、浮萍掺和一起，置锅内边炒边翻拌，翻匀后用稻草裹扎，做成囤心，将囤心放在米囤中心，然后灌满白米，上铺苍糠，以吸收米中潮气。一般需两个月，俟潮气全部吸干，米色就变黄，即成

黄米,其米胀性大,松脆不粘口,清香爽口。山区和渔乡以玉米和番薯为主,习惯以番薯和饭粥合,杂以高粱饼、高粱粥、麦碎饭、荞麦糊等。在金华丽水等地区居民,还以粉干和土束面代替主食。粉干亦称“素粉”,以大米为原料。经过水浸、磨粉,再拌和适量的水煮熟,放在木制工具里,经密布细孔的金属板压挤成线,晒干即成,具有白、细、韧、食用方便的特点。土束面用面粉加适量的水与盐,人工拉制而成。部分山区还有各种羹类和多种糕类,如山粉羹、麦粉羹、芋羹、糖糕、发糕、番薯糕等。临海洋糕为米粉发制,其形大如盖,其上放橙瓣、红绿丝,中间一层红糖栗子,既香且软,糯不粘牙。历代人们根据不同的爱好和口味,从各地的实际出发,精工细作,还创制了多种多样的风味小吃。其烹饪技法,主要有蒸、煮、煎、烤、烧、炸、氽、冲,各地风味各异,咸甜荤素,香脆软糯俱全,且造形美丽,绚丽多姿。其中著名的有:嘉兴莲子羹、杭州肉包儿、绍兴千层饼、宁波汤圆、金华酥饼、温州鱼丸汤、舟山虾饺等。

在菜肴方面,创立了越菜体系,成为我国著名的八大菜肴之一。它的特点是:料香时鲜,制作精细,色彩鲜艳,味道鲜美,品种繁多,讲究营养。烹调方法大都来自民间,以爆、炒、炸、熘、烩、烤、和煎为主。主要原料是:鱼虾、猪肉、禽蛋、蔬菜、豆类和部分野味。尤其以鱼、肉、禽、笋类所占比例最大。越菜中有以杭州、宁波、绍兴以及温州等几种地方风味为代表的菜系,它们又各具特色,风味迥异,其中著名的有:西湖醋鱼、生炒鳝片、清炖甲鱼、龙井虾仁、清汤越鸡、咸菜大汤黄鱼、三丝敲鱼等。吴越饮食风俗在发展过程中,又受到外来影响,从而有所变异,如烹制鳝鱼,原来浙江人习惯用油酱炒,后参考了北方的制法,才改炒为炸,并配以蒜泥,即成了南料北烹的“生爆鳝鱼”了。其他,如用胡桃、松子作腊八粥,上元夜饮屠苏酒,育儿的“汤饼会”等,也都渗入了中原旧俗。

在饮食心理上,还反映了各种心理状态,主要是祈求吉祥,驱邪

消灾,祝愿丰收等,其中以食品的谐音、谐意、象形、双关语等方式,象征喜庆、得福、祥瑞、兴旺最为普遍,如“年年有余(鱼)”、“讨聪明(清明饼)”、“年年高(年糕)”、“节节甜(甘蔗)”、“早生贵子(红枣、花生、桂圆、荔枝)”等等。为孕妇催生,用“快便肉”,肉要切得端正;祝老人长寿,用“长寿面”,面煮时、食时不要折断等等。不少食品还伴随美丽的民间传说,以丰富的想象力寄托了人们的爱憎和祝愿,如“东坡肉”、“油炸桧(秦桧)”、“宋嫂鱼”、“青团子”、“戚公饼”等,有些地方的特殊饮食民俗,则和当地重大的事件相联系,如舟山的“屠城羹饭”,为纪念清顺治八年九月初二定海城陷,军民死于战火之事;海宁的八月二十三日烧红糖芋艿吃,是纪念清咸丰十年太平军攻下硤石之事。

## 二、服 饰

秦汉时,浙江生产越布(葛布或诸杂细布),民间士庶俱穿越布单衣(《后汉书·马后传》)。还用葛绁、黄草布制衣。南朝陈、隋间,以绢葛罗纨制衣,其中耀花绫,有纹突起,特有光彩。南朝有木屐和穿芒屨之习。谢灵运为永嘉太守时登躩木屐,上山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后世称“谢公屐”。

唐代,越罗已很著名,并以宝花罗为最佳。褚遂良在杭州创机织绸绫,后世奉为始祖。风行的有马眼绫(湖州)、自编绫、绯绫、纹绫(杭州)、十样花纹(剡县)等名绫。在杭州,男子白纻轻衫、妇女已行窄袖露臂(《张祜:《观杭州柘枝》诗)。并以吴绫为裳,能在暗室中,以手摩之良久,火花直出,俗呼“油绫子”。当时,“都民仕女,罗绮如云”。文宗间,民间还流行穿高头草履棕屨。

宋时,会稽剡县出绉纱,极精好,夏时服之如挂冰雪(《嘉泰会稽志》)。民间衣葛服以及山梭布、茧布。南宋时,杭州已出现绒线铺。元代,杭州居民多穿丝绸(《马可·波罗游记》)。其中湖州细色孔雀锦较



著名。民间戴方顶大巾、并有穿鞞鞋之俗。“西浙之人，以草为履而无跟，曰鞞鞋。妇女非缠足者通曳之。”

明初，士庶粗衣细布，不论贫富，顶平定巾，衣青直身。穿皮靴鞋，极俭素。后渐侈，士大夫峨冠博带，而稍知书为儒童者，亦方巾，彩履，色衣。富室子弟亦仿服。成化弘治间，多衣文绣，女子五彩衣，饰金珠。惟在新昌，小民粗布白衣，并戴白巾帽，绝不见有青色者，因其价廉方便也<sup>①</sup>。万历间，衣服多务为宽博，民户无贵贱，皆方巾裙裾，垂地长服，高年者制深衣幅巾，少年竞为唐巾鹤氅。乡镇间皆以纮为服。<sup>②</sup>

清代，男子正服皆以布服，纱缎者少。妇女首饰，金银珠翠；衣裙，绫罗缎蟒，贫家常服衫裙皆用布，绝无靡饰。民间御寒之服，或布或绸，皆著以绵，少有著木棉者。皮裘惟富家有之。夏以麻纮布为常服。同治间多衣葛。城市衣纱罗者颇多。在乡镇，一般服饰尚质朴，虽殷富之家男女皆衣布素，只有做客、赶喜事才穿绣衣。1840年以后，俗趋奢靡。通常衣服，亦喜穿绮罗。清末，浙处各地士绅多两接衫，上截用漂白洋布，下截以罗或绸，民初遂绝。少数青年学子留学海外，剪发烫发，风气已开。民国后，始大加改革，但乡间人仍有蓄辫者。

### 三、居住

秦汉以来，浙江民居大多为上栋下宇式。杭州自为行都，商贾辐辏，有塌房的建筑。在城郭内北关水门里，有水路周回数里，于水次建造塌房数十所，为屋数千间，四面皆水，不但可避火烛，亦可免偷盗，极为便利。专以租赁给市郭间作铺席宅舍，以及客旅寄藏物货之用。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定。大小铺户，院落纵横。官私房屋

<sup>①</sup> 明万历《新昌县志》“生活·衣”。

<sup>②</sup> 明万历十五年《绍兴府志》“生活·衣”。

及基地,多是赁居,还做金或地钱。<sup>①</sup>

当时,园林建筑已很著名,全省名园甚多,如杭州有琼华园,梅庄园等。湖州有南园,绍兴有沈氏园、小隐园、督氏园等,吴兴有尚书屋、嘉林园、明园等。以梅庄园为最大,占地多至一百三十亩<sup>②</sup>。时陆游在山阴有一居室,颇有特色。其位于所居堂之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东西十有七尺,东西北皆为窗,窗皆设障,视晦暝寒暖,舒卷启闭。南为大门,西南为小门。冬则析堂与屋为二,而通其小门以为燠室;夏则合为一而辟大门以受凉风(《陆游居室记》)。

明初居室无厅事,高广帷式,至成化弘治间,屋有厅事,高广倍常,大都仿品官第宅。在新昌县,“城中富宦之家多高堂广厦,杂用诸色木植,周围绕以砖墙,檐阿紧革,丹雘相望。村乡多草房土屋,仅庇风雨,楼屋仅一二”(明万历《新昌县志》)。

当时在绍兴,大的府第,以门面的“间”和深院的“进”是否有气派为标志。前者以屋椽多寡而定宽度;后者以前与后间之间隔天井作标志。有“九间十三进”、“七间十一进”、“五间三进”等,内有大门、厢房、大厅、花厅、侧厅、后厅等。尤其是“台门”,屋宇高大,气派宏伟。门口有旗杆、第额、照墙、踏道、明堂等,其名称甚多,按官衔分,有“阁老台门”、“尚书台门”等;按行当分,有“锡箔台门”、“药店台门”、“当店台门”等;按建筑形式分,有“石箍台门”、“黑漆台门”、“铁板台门”等,故民间有“十庙百庵八桥亭,台门足有三千零”之谚。以后逐渐演变为大杂院形式。<sup>③</sup>

清代至民初,在农村,多为土墙茅屋,城镇民居皆砖墙。富家多架高堂,颇事壮丽。多楼屋或三间、五间不等,其平无楼者谓之“堂屋”,

① 《梦梁录》卷一九“塌房”。

② 《旧浙江通志》引。

③ 《绍兴风俗志》“居住民俗”。

中门曰“门道”，必慎择方向。其墙脚皆用石砖叠成，甚为坚固。造之日，主家必筵款名匠，谓之“待匠”<sup>①</sup>。在嘉兴，城内中产人家住宅，或为楼房一幢或两幢，或为平屋数间，多系瓦屋砖墙，其门分而为三，中间之门常开，两旁之门上半嵌以窗格，下安板扉，为临时启闭之用。还尚雕刻，寺庙民屋，皆雕刻人物草木鱼虫，丹朱贴金，璀璨夺目，富家的门楣卧床，有费数百工，进行精雕细刻者。

在杭州，有称为“墙门住宅”者，以城市富裕阶层居住为主，一般是三间楼房加左右两厢，前面有一天井、照墙；墙上书一大“福”字；少数有“四合五天井”的布局，前面为客厅，中间为书斋，后面为住房，还有天井、花园。此类房屋大都坐北朝南。<sup>②</sup>

在杭嘉湖一带水乡，则有“水阁”（屋后半部延伸到水面）、“鱼簖竹楼”（防鱼群外流）、“鱼池舍”（供养鱼人住宿）等。在青田等山区因常有水患，故多建楼以防。在沿溪居民中，有以卵石筑墙。楼皆矮楼，也多垂檐出檐，称“畚斗楼”或“风楼式”。缙云县一带，则用大石在山坡上建屋。在新安江等地，有不少以捕鱼、运输为生的居民，则以船为家。

在海岛渔村，其村落都选择在背阴向阳或倚北朝南的山坳或岬口，其总体结构，在平原或山脚平地采取平展式，比邻排列。在岗峦及海边港口，则采取依叠式，拾级筑路，渐次升高，原料均就地取材，有以泥土或块石垒墙。为了防风雨袭击，一般多用矮石墙，嵌接极工巧，并用泥灰合缝。屋顶作高斜度，以利走水，茅草盖顶，用草绳结网覆盖，也有压上许多小块石以免风吹掀，在海边临时搭建的旧房叫“渔寮”。架竹为人字形，稍加矮墙，上覆茅草到地，并披以草网加固。

① 清同治《安吉县志》“生活·住”。

② 《浙江风俗简志·杭州篇》。

---

## 第三节 礼仪民俗

---

### 一、生育

#### 一、孕 期

妇女怀孕,俗称“有喜”、“坐月”。产房产妇头缠黑纱巾,平时关闭。长辈外人均不能进入,唯丈夫和“出窝娘”(助产妇)可入内。并忌放铁器、快口(刀类)。在温州,产妇家要向多子人家乞讨婴儿衣物,对方必给单衣和夹衣各一件,束以红头绳,缚以万年青柏,叫“利市衣”;也有向邻居乞取碎布,制成婴儿衣,称“百家衣”。在宁波,凡孕妇想吃之物,公婆要设法采购,俗称“依耳朵”。各地在食物上禁忌颇多,如禁食生姜,以防生下子女为六指;禁吃兔子肉,以防兔唇;忌食螃蟹,以免胎横难产;忌食腥辣,认为会使婴儿胎垢多等。在行动上,孕妇不能到新房看新娘,俗信孕妇是“双身人”、“四眼相”等等。<sup>①</sup>

#### (二) 催 生

宋时,在临安,孕妇坐月时,于月初,舅姑家以银盆或彩盆盛粟秆一束,上面盖着锦绣或红纸,上插花朵、通草,贴套五男二女花样,用盘盒装用物饰作眠羊、卧鹿羊,取其卧眠之义。并以彩蛋一百二十枚、膳食、羊、生枣、栗果及孩儿绣棚彩衣,送至婿家,名“催生礼”。<sup>②</sup>

清末民初,在杭州,当孕妇产期将届,外婆家备喜蛋、桂圆及襁褓,于临产月的初一日,派人送往男家,并携笙一具,吹之而进,以表

---

① 《浙江风俗简志》综合转引各地“生育篇”。

② 《梦粱录》卷二〇“生育”。

催生之意。也有用红漆筷十双，或用竹筷以洋红染之，一并送往，取快生快养之意。在宁波，孕妇临产之月，娘家送“催生担”有衣食两项。衣有婴孩穿的黄棉袄、黄夹衣、黄单衣、涎兜及尿布等；食有鸡蛋、红糖、食面、桂圆、核桃、黄鱼鲞等。催生衣物用包袱包扎，从窗口丢进床上，以包袱朝向预卜生男或生女，认为包袱朝里朝下为男，朝外朝上为女。在温州，则由母亲送“方便肉”给女儿，肉约一寸足方，切得端正，不偏不倚，烧熟送去，认为产妇吃了，临产方便，故名。在太平，若女子孕过期，亲戚送暖饭催生，曰“过洋饭”。在安吉，女将生，母亲先送食物、果品，谓之“解缚盆”。在绍兴，娘家要把炖熟了的鸭放在罐子里送去，进门时连喊：“鸭(阿)罐(官)来哉！”以预兆女儿生男孩。另外，用红绸布包裹若干枚红蛋送到女儿家中，马上解开包裹，让红蛋滚动出来，祝愿女儿顺利分娩。<sup>①</sup>

### (三) 报喜

俗谓初生为“头生”，故其礼甚费。清乾隆年间，凡初生子者，先以羊酒报于外亲，谓之报喜。其外家则具襁褓衣及金银铃、钱、牲礼等作回礼。同治年间，外家送盘，兼备婴儿裙袄诸物。民国初，在瑞安等地，子既生，用熟鸡蛋以及果物往外家通知，曰“报生”。外家送果物，谓之“挨奶果”。在寿昌，儿初生时，亲朋以鸡蛋、糖、枣等物相赠，表示祝贺“开生”之义<sup>②</sup>。在汤溪，凡初生子，曰红男，先驰报外家，外家以酒肉、馒头等物回赠，亦谓“报生”<sup>③</sup>。在金华地区，婴孩出生后，要备酒一担，往岳家报喜，称为“报生酒”。

### (四) 三朝

宋时，儿生三日，与儿落脐灸凶。七日曰一腊，十四日谓之二腊，

<sup>①</sup> 《浙江风俗简志》综合转引各地“生育篇”。

<sup>②</sup> 民国十九年《寿昌县志》“礼仪·生育”。

<sup>③</sup> 清康熙五十五年《汤溪县志》。

二十一日名曰三腊，女家与亲朋俱送膳食，如猪腰肚，蹄脚之物。<sup>①</sup>

乾隆年间，三日洗儿，抱见舅姑，唤以乳名。诸族人及亲友各送米蛋之类看望产母，并表祝贺，女家邀亲友吃三朝酒。光绪年间，在嘉兴则作“汤饼会”。弥月，令工剃胎发，以彩缕悬帷，周岁为辟盘，杂置各物，让儿随意抓取，据所取物以占一生趋向。<sup>②</sup>

民国时期，儿初生三日，必集女宾聚宴，谓之“三朝酒”。在双林地区，外家又送福物和圆子祀太君或送钱，谓之“拜三朝”。桐乡乌青等地，邀亲友吃馄饨。在杭州，儿生三日，要往吴山太均送子殿祀神。在汤溪，三日，拜祀祖先，尊长为小儿命名，置酒宴亲族，曰“红男酒”。外家每亦以是日馈小儿文葆饰品，曰“当三朝”。在湖州，要给孩子乳名，用红纸写“命名大吉”四字，再在四角写“长命富贵”，贴在家堂土地神龕的旁边。在丽水，洗生婆会以针线放在女婴手中，认为长大后精于女红。若是男婴，就把笔、算盘放在婴儿手中捏捏，认为长大后能精通算理，善于翰墨。<sup>③</sup>

### （五）满月

宋时，儿满月外家要送彩线、金银钱、杂果及彩缎、珠翠、凶角儿、食物等。并邀集亲朋举办“洗儿会”，煎香汤于银盆，内下洗儿果、彩线等，仍用色线绕盆，谓之“围盆红”。尊长以金银钗搅水，名曰“搅盆钗”。亲宾亦以金钱、银钗撒于盆中，谓之“添盆”。盆内有栗子、枣子，少年妇女争食之，认为生男之征。浴儿、理胎发毕，将发放入金银小盆，以色丝结络之。抱儿遍谢诸亲坐客，即抱入姆婶房中，谓之“移窠”。<sup>④</sup>

清代嘉庆年间，儿满月，剃胎发，亲友礼贺，曰“贺满月”。光绪年

①④ 《梦梁录》卷二〇“生育”。

② 清光绪三十四年《嘉兴县志》“礼仪·生育”。

③ 《浙江风俗简志》综合转引各地“生育”。

间到民初,在鄞县,外家送绣冠、金饰、文葆、杂衣及诸食品,谓之“满月”。在太平地区,儿弥月剃发,剃工送画鹰,取英俊之意。外孙初到外家,以墨点额。在温州,俗有“大满月(四十天),“小满月”(三十天)之分。亲友要送礼,封包上写“汤饼之敬”。主家要挂灯结彩,摆宴请客,还要唱弹词庆贺。在杭州,婴儿剃发令他人抱之,父母不得在侧,脑后要留一撮头发,叫“百岁发”。剃下之发,须搓成团,用红线穿之,挂于堂屋高处,谓使儿有胆量。在衢州,则挂在门后压邪。在台州,邻居要给小孩脖子上挂由红黄蓝白黑五色线组成的长命线,祝愿小孩一生穿红着绿,长命富贵。也有的挂白线,祝孩子长寿,意谓胡子和这线一样长一样白。在苏南,富家设宴娱宾,谓之“汤饼会”,寻常人家则染鸡鸭卵分赠亲友,谓之“分红蛋”。

#### (六) 百日周岁

生子百日和满周岁,亦开筵作庆。宋时,列锦席于中堂,烧香炳烛、在席上放置果几饮食及父祖诰敕、金银七宝、玩具、文房书籍、道释经卷、秤尺刀剪、升米戥子、彩缎花朵、官楮钱陌、女工针线、应用物件并儿戏物等,以后,将周岁小儿置于中座,观其先拈者何物,卜儿一生命运,谓之“拈周试晬”。其日,诸亲馈送礼物,主家开筵以待亲朋<sup>①</sup>。清时,该日以酒食招客,也举行晬盘之礼,称“试儿会”,“做周岁”、“拿周”。在安吉,把孩子坐于竹匾中央,周围放上各种东西,让其抓取,以卜未来,叫“抓晬”。外家还用金银饰帽或制项圈、手镯等物装盘,送到婿家<sup>②</sup>。在嘉兴,如生独子,怕儿夭折,多令拜樟柏树及社神为父母,曰“寄名”。<sup>③</sup>

民国初,在汤溪,为小儿试履,曰“学步鞋”。在杭州,百日谓“百

① 《浙江风俗简志》综合转引各地“生育篇”。

② 清同治十三年《安吉县志》“礼仪·生育”。

③ 清光绪三十四年《嘉兴县志》“礼仪·生育篇”。

禄”，俗称“百罗儿”，须斋王母寿星，用神马一对，供以素菜十碗及菜与面。在金华，外婆家担“周岁粽”，其中一对特别长和大的，以红绳系缚，名“长寿粽”，还送由小到大分为五级的馒头，叫“五代馒头”，最大的一双做成桃形，称“寿桃”。

## 二、成年礼

### （一）冠 礼

在明代以前，男子行冠礼，即成人礼。大多行于士大夫家。男童三四岁即戴帽，十四五岁留顶发，扎成总角。年满十六岁，择日选宾，告于家庙，拜天地、祖宗、父母，行三加礼。行礼时，冠多用唐巾、晋巾，甚至用进贤冠（无翅）。

到明代，男子年十六以上而冠，但不召宾，不三加，多于冬至或元旦或清明，束发加网于首，戴冠盛服，拜天地、祖宗及尊长。不戴方巾，只戴圆帽<sup>①</sup>。在苏南吴江等地，冠之日，蒸糕以馈亲邻，名“上头糕”。<sup>②</sup>

清代，剃发垂辫，襁褓中已冠儿首，古冠礼遂废。男年十六岁以上，择日谒家庙或拜祖先神主于堂，祭拜后加冠，设宴席，由长者命字。清末到民初，多于娶妇日，俟相以乐鼓导，设位中堂，父母冠而命字，遂亲迎。后仪式从简，成年时加帽，入学时命字即可。

### （二）笄 礼

明代时，女子十五岁至二十岁，于临嫁前行古笄礼，拜天地、宗祠及尊长，以簪盘发固髻，表示成年礼。清代，笄礼废，女子成年，于嫁前数日，父母邀诸姑姆婶，设宴谒别，为女梳理头发，在发上加钗饰，谓

<sup>①</sup> 明万历《绍兴府志》“礼仪·冠礼”。

<sup>②</sup> 明嘉靖《吴江县志》“礼仪·冠礼”。



之“上头”。并以炊糕遍馈亲邻,谓之“上头糕”;食汤饼,曰“上头圆”。

民国初年,男女发髻均剪,冠笄礼徒具空文。女子不论年岁,均于出嫁前一日或当日行之,延请亲族中夫妻长寿和有子者为之梳拢剃面,饰珠簪于首,谓之“上头”。在嘉善、海宁、秀山等地,女将笄,先期沐身,长者为镊面毛,曰“开面”。在嘉兴,年满十六岁,给孩子吃鳊鱼(“花鱼”),表示进入成年期。

### 三、婚 姻

秦汉以后,在浙江民间基本按周代规定的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程序,进行缔结婚姻和举行婚礼;直到辛亥革命后,在城市稍起变化,乡间仍按古礼进行。

#### (一) 婚 礼

在宋代临安,先凭媒氏以草帖子通于男家,男家经问卜或祷神,得吉无克,方回草帖。女方亦卜吉,媒氏通音,然后再过草帖,谓“定帖”,方为定论。然后男家择日备酒礼到女家“相亲”,如男方中意,则以金钗插于冠髻中,名曰“插钗”,若不如意,则送彩缎二匹,谓之“压惊”。既已插钗,男家备定礼盒往女家报定,女家接定礼于堂,备香烛,告三界,然后请女方亲眷中夫妇双全者开盒。女氏即于当日备回定礼物,除紫罗、缎匹、珠翠、金玉帕环等外,更以一对空酒樽投入清水,盛回金鱼,并以簪一双,葱两根安于樽内,谓之“回鱼”。自送定之后,双方遇节序,互相赠送诸物,谓之“迎节”。男方先日预令媒氏以鹅酒(或羊酒)送聘。聘之后,节序不送。择吉迎亲成礼。婚日,男家选定时辰,去女家迎新人。回至男家,行牵巾、拜堂及坐床、撒帐、交香诸礼。婚后三日,女家送冠花、彩缎,鹅蛋及茶饼果合等去婿家,谓之“送三朝”。两新人于三日或七日、九日往女家行拜门礼,女家广设华筵款待新婿,名曰“会郎”,礼毕,女家备礼送婿

回宅,婚礼至此结束。<sup>①</sup>

明代,婚姻必择门第,用士人为媒,女家治酒则为允,谓之“许亲酒”,或用银牌写“允许”二字。后具猪、鹅、茶饼之类馈送,继行定聘礼。娶之日,不亲迎,用乐迎妇成婚,杂用踏薰、牵红、传席、交杯诸仪。即日拜公姑,以次及其家众,富家妆资从厚,贫家则竹筍练裳,不嫌寒素<sup>②</sup>。在苏南,婚礼有知节、跨鞍、迎龙、牵彩、传宝、坐床、升座、掠鬓等目。订婚时,男家以双鸡送女家,谓之“合啼鸡”。每奩筐中,系彩钉胶杂布,取婚姻胶固之义。

清代,在杭州,士大夫家以门第相尚。迎亲用彩轿,华灯鼓吹前导。迎至中堂,婿妇行交拜礼。合盃后,盛服出拜翁姑,次及尊长。一般细民,多从简约。在温州,凡士庶之家,先议婚,以男女生辰互易卜算,名曰“合婚”。既吉,然后媒妁通好。其纳采曰“起帖”,具礼仪外,多致饼果馈遗女氏宗戚。纳币曰“大定”,有聘金,备钗钏、色缯、羊酒、糕饼之属,并订婚期。婚前数日,具仪多致粉糍(名“麻糍”),曰“上头礼”。至吉日,妇至门未下轿,衣冠者掌灯引婿导妇入房。既合盃,亲属宴于堂(名“闹筵”)。三朝庙见礼成,谒舅姑,次及亲属,长者皆有所赠遗,妇亦馈献有差<sup>③</sup>。在诸暨,新婚日,女家亲友有以拳打婿为戏,俗谓“新郎拳”<sup>④</sup>。在苏南,行聘之前,媒氏先开采帖,将衣服、环珥各若干商之女家,定后又取绒线缠果实,以胶粘瓜子、桐子为花鸟走兽,共成数十盒,分馈亲友。将婚,女家行嫁,自八橱十六箱至一橱两箱不等,均用鼓乐导之。男家迎娶,亦导以鼓乐,家中宴乐有数日不已者。<sup>⑤</sup>

① 《梦粱录》卷二〇“嫁娶”。

② 明万历《绍兴府志》“礼仪·婚嫁”。

③ 清光绪《永嘉县志》“礼仪·婚嫁”。

④ 清宣统二年《诸暨县志》“礼仪·婚礼”。

⑤ 清乾隆《青浦县志》“礼仪·婚娶”。

民初在诸暨，相亲之举，由女之父母兄弟私相其婿，如亲事和合，男家下定或女家回定，都重在定帖，其聘物虽富家亦从简，有用茶瓶、酒樽者，俗谓“男茶女酒”。导日之礼从简，不用鹅酒、羊酒，仅请媒氏以红封于行聘日、亲迎日（也有并作一次）送至女家，其男女家礼物皆于行聘日致送，俗谓“下合”。行礼后，在洞房内交盥，俗名吃交杯酒。婚后送三朝，曰“三朝盘”。两新人往女家行拜门礼，有以三朝或七朝或九朝同偕回家，曰“望静”。也有为求简便在亲迎之日夜间回去，均为古代会郎之遗意。在平湖，婚礼告成，男家长辈从新娘箱子中取出两碗合在一起的冷饭，上各有几根咸菜，让新夫妇并肩坐在一起吃，这叫“吃小夜饭”，含夫妻患难与共之意。

民国之时，因欧美影响，男女成年婚姻，往往自主，征得父母同意，先订婚，后结婚。辛亥革命后，婚礼缩为一天，叫“单日喜事”。举行婚礼时，有介绍人、证婚人等，有换戒指，盖印章诸仪节，谓之“文明结婚”。但亲迎、回门、见礼诸事，仍然旧礼为多，惟将拜跪改为鞠躬。在苏南吴县等地，仍沿古礼，初则请帖，帖至而卜。卜既吉，或拜门，或缠红，或即送礼一次，名曰“允盘”，男家求允，女家允吉，而婚始定，嗣后再送礼两次。一次名“大盘”，其礼最盛。二次名“催妆”。三次皆先送导日帖，共六次，为六礼。礼之盛者，有大礼，呈女之祖父母，有代仪送训女之师和乳女之嫗。盘中所送者，男家则聘金、礼金、钗环、纱缎、羹果、茶叶之类；女家所答者，书墨、笔砚、靴帽、袍套、糕果之类。送大盘时，女家必回庚帖。庚帖之盒或用八人，或用四人舁送，富贵之家必有执事鼓乐。其盒有架，架上围绕结串或金或银，盒内用金银制作男女二人并坐（俗名“夫妻孩儿”），加以金银小锭、制钱、果、米之类，中以金银制女命八字，红绿绸缎裹之，他物掩护其旁。<sup>①</sup>

<sup>①</sup> 民国二十二年《吴县志》“礼仪·婚娶”。

## （二）其他婚俗形式

**荒亲** 宋代以来，有荒亲之礼，亦称“霍亲”，“耗亲”、“忽亲”、“猝亲”。父母病危，于垂死之日，乘凶娶妇，男家派人亲迎已下定女子进行完姻。有的家庭父母去世，为了举办喜事，暂禁家人举哀，草草成亲，三日后即披麻戴孝。<sup>①</sup>

**冲喜** 亦叫“打喜”，清代，凡父母病危，草草迎娶，拜堂时由新郎弟妹代替，故曰“冲喜”，意谓将病魔冲走。也有吉期将近，父母病危，有先婚嫁而后成服者，俗名“冒名做亲”。民初，结婚尚未行聘，以父母病笃，数日内成婚者，曰“猝亲”，礼多从简，有些地方，父母新丧，或因门户零丁，支持乏人，既婚乃讣，谓之“撒亲”。

**赘婚** 清时，有婿就婚于女家者，谓之“入赘”，赘后归婿家，谓之“卷帐”、“回门”<sup>②</sup>。民间生女无子，招婿进门嗣续者，谓“招赘女婿”。礼如娶妇，惟不用花轿。

**守寡** 妇女年轻失偶，立誓不再改嫁。守寡女规矩很严，如终身穿素服，头戴小白花，不能大声谈笑，不能与同辈男人讲话和同桌吃饭等。

**进舍** 寡妇有田产，上无公婆、子女幼小，需一男子协理田产，便招婿入门，俗称“进舍”（“舍”和“婿”同音），新婿多为独身穷汉或兄弟众多，无力娶妻者。

**再醮** 妇人夫死再嫁，亦叫“改嫁”，俗称“二婚亲”。有些地方规定寡妇要守孝三年期满方可改嫁，离婚后再嫁的女人，叫“生人妇”。一般不举行婚礼，夜间由人作伴，悄悄领到男家，吃汤圆后即同宿。<sup>③</sup>

**续弦** 丧妻再娶，谓“续弦”。续娶妻，谓“填房”。填房者，或为年

① 郎瑛：《七修类稿》。

② 清乾隆《湖州府志》“礼仪·婚嫁”。

③ 《浙江风俗简志·温州篇》。

轻寡妇,或为大龄姑娘,或为翁婿关系密切,长女出嫁亡故,可续娶次女。

**娶妾** 年老无子,或有女无子,妻在而纳女,曰娶妾。

**转房婚** 双方订婚后,男方突然死亡,经双方同意,可让亡者之弟或兄续婚,也有已婚之兄或弟,年轻亡故,经家长做主或双方愿意,弟与嫂或兄与弟媳妇可正式同居<sup>①</sup>。有些地方叫“插花婚姻制”,俗称“长布衫改短衫”。

**童养媳** 清末,贫家有聘定或买得小女自养于家者,谓之“童养媳”、“养新妇”。长大成婚,俗称“合亲”、“合枕”、“并亲”。有些地方,鳏夫和寡妇结婚,其子女如年龄相当,亦同日结婚,也谓“并亲”。

**等郎媳** 也称“押子媳”,有些有女无子急想得子者,抱养人家女孩以引子,叫“招弟”、“引窝子”。如“引”出儿子,此女长大即为媳妇。如男女岁数相差过大,或引不出儿子,也有作为女儿看待,另行择婿出嫁。

**抢婚** 男子订婚,无力迎娶,用小轿一顶,赴女家抢新娘随行结婚礼者,曰抢亲。在苏南,曰“劫婚”,婿家侦女每日所经之处,潜备彩舆及鼓乐候于途,婿先截女,亲族助之纳于舆,鼓乐而归,同亲迎。<sup>②</sup>

**换亲** 双方父母为节省财礼,各以自己的女儿配对方的儿子,俗称“换亲”、“姑换嫂”,亦明媒正娶,唯婚礼从简,多贫苦人家为之。

**捉岁婚** 在浙南贫家娶嫁,有在除夕夜举行。据传除夕夜不犯凶神恶煞,实则为了节约开支,省了选日钱,不用留客,办点吃的东西可作过年两用。童养媳亲,多采取这种方式。

**招夫养子** 青年或中年女子丧夫,子女尚幼小,坐堂招夫,以抚养子女,叫“招夫养子”。应招者和此后生下的子女,改姓女子原夫的

<sup>①</sup> 《浙江风俗简志·杭州篇》。

<sup>②</sup> 清《昆新两县续补合志》。

姓氏。

**冥婚** 男女均夭,有专门为男女死者撮合,将已死男女互婚并合葬,谓之“冥婚”。女夭而迎柩者,谓之“娶字”。

**抱牌婚** 男女双方订婚后,男亡,女方抱神主牌成亲。有的以雄鸡代新郎。个别地方也有女死男娶的婚俗,亦叫“抱主成婚”。

**早婚** 清时,男女于孩提时联为婚姻。民国逐步革除。

**指腹为婚** 男女双方尚未出世,双方父母指腹为媒,为“腹婚”。

**典妻** 至迟在宋代,浙江已有典妻习俗。“比因饥馑,民有雇鬻妻子”、“质妻卖子,父子不保”(《续资治通鉴长篇》)。宋人《京本通俗小说》中,描述南宋临安城里的典妻,已有典雇双方必须写文书,有典有赎,赎时不仅要归还典价,还须加上利息等俗规。“吴越之风,典妻雇子成俗久矣,前代未尝禁止”(《元典章》)。此俗一直传至清末民初。《清稗类钞》记载:“浙江宁、绍、台各属,常有典妻之风。”其名称有“租妻”(绍兴)、“租肚皮”(金华)、“典水面”(仙居)、“招夫养夫”(松阳)、“坐堂招夫”等。发生在中下层社会中较多。大都典者为家境窘迫,或因病、因债、因子女多生活无着,为养家保命,无奈将妻子典给对方,承典者多数无子女,为了生儿接代去典妻,也有因没有能力娶妻者去典妻的。典妻要有契约,写明典价、典期、子女归属和媒证。典期一般三年至十年,时间长者称“典妻”,短者称“租妻”。有住在典夫家的,也有招夫进门的。典期内所生子女归承典者,期满后典妻即归家,所生子女留给承典者,一般有财产继承权。

## 四、丧 葬

### (一) 葬 式

**土葬** 汉代以来,吴越大部分地方沿用土葬,士大夫之家崇厚葬,葬用朱漆木棺,尸体盖丝绵被。明时,在绍兴、严州,建德等地,其

坟多砌砖为椁,家饶者乃以石<sup>①</sup>。清代,在临海,营葬多以砖石为椁,荫以松柏<sup>②</sup>。乾隆间,在杭县,贫寒之家,每于深夜潜窆,谓之“偷葬”。

其墓式有土墩墓(地面掩土埋等)、砖石墓、龟壳墓等。在整个浙南和浙中(杭州、绍兴、金华地区的部分县),大都是“椅子坟”。其坟用砖石,水泥在地面砌筑墓穴,外观似太师椅,故称。其他尚有稻桶坟、四方坟、平坟、塌床式坟以及观音坟、二柱一字坟等修筑于地表的各种坟墓。

历代以来,吴越地区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检骨再葬”的复葬习俗。人们对逝者遗体先行安置,或送至坟山“暂厝”不葬,或造厝存放在田边、屋边。在苏南吴县也有此俗,有些富家欲求吉地,停柩因循不葬;贫困之人力不能葬,也久厝不葬。一般要若干年后,再移棺或剖棺检骨,改葬他处。

**火葬** 宋元时期民间曾流行火葬习俗。在乡村,人死,虽富有力者,亦不办土葬,“亦致焚如”(《清波杂志》)。贫下之家死于葬地,故以“火化为便”。当时在钱塘门外,设亭火化死尸,时人称“化人亭”或“焚人亭”。明清时期,虽然统治者屡发火禁,但贫者多用火葬,官设义冢为墟。有将骨火焚,拾骸骨入瓮埋之者。在苏南吴江,“无力之家,亦从火厝”。

**瓶葬** 在温州市的泰顺、平阳一带,有瓶葬之俗。有些人家在办完丧事,停棺数年,等待尸体腐朽后,就拾骸骨入瓶。在湖州,称之为“揭生骨”。

## (二) 丧 仪

宋代,人始卒,男以布广一寸,从项中而前交于额上,又向后绕于髻,女用麻束发髻,同时向亲友发讣告,亲朋唁吊,多致赙奠。七日一

<sup>①</sup> 明万历《绍兴县志》“礼仪·丧葬”。

<sup>②</sup> 清康熙《临海府志》“礼仪·丧葬”。

祭,好做佛事。葬时,灵柩前陈列方相、铭旌,导以鼓吹仙梵。在墓所,亲友执紼毕集,下葬后始归。三日后再去展祭新阡,谓之“覆墓”。

明代,大都用文公“家礼”。在绍兴,不行小殓,不用布绞,既卒哭,孝子去掉衰衣草冠,换用旧麻布服出谢吊客。有停棺缓葬至二、三十年者。丧礼亦做佛事,逢七祭奠谓之“做七”,历四十九天而毕<sup>①</sup>。在苏南,发引之日,亲友相率祭于道,退各设宴享余,不烦丧主。

清代康熙年间,在临海,大殓不用魂帛。先殡于中堂。吊奠者具祭仪、楮钱、香烛,丧家答以帛,择吉出殡<sup>②</sup>。乾隆间,在杭县,俗信风水,尚厚葬。吊者临门,丧家给其吊币,厚其犒赠,乡里则以酒食为贵。俗有终丧之后,停棺于室,或积数世淹殡于野者<sup>③</sup>。但在富阳地区,少停丧厚葬之弊。丧礼崇佛教,大殓、回神、做七、出殡,俱用浮屠氏导引。窆后请年高德劭之人题主。礼成,送主入祠,乃除灵。但无论祥期、禫期,皆穿白。至功缞之戚,亦以着白为敬。甚至有身着衰麻出门从事者。在鄞县,初丧,至亲密友俱送被,红表杂色里,布帛随宜,衬以薄棉纳棺中,谓之“重被”或“情被”。并有术士盖棺,必全家避之于外,曰“避煞”。到清时此俗已消亡<sup>④</sup>。在永嘉,大殓时,亲友素服至,曰“送殓”。逢七则力具仪奠,亲友致祭(俗尚缙黄,多做佛事)。终七除灵,士族亦有百日者。及葬,戚友皆送礼。先期请宾长题主,主成出殡,皆素服。送葬日,先祀土,葬毕迎神主归,曰“还山”,家人换吉服出迎。<sup>⑤</sup>

民初,在余杭,丧之一二日成殓,殓必用单日,殓毕成服受吊,或二日或三日掩灵。七日做次佛事,至七七四十九日止,俗称“做七”。或

① 明万历《绍兴府志》“礼仪·丧葬”。

② 清康熙《临海县志》“礼仪·丧葬”。

③ 清乾隆《杭县志》“礼仪·丧葬”。

④ 清光绪《鄞县志》“礼仪·丧葬”。

⑤ 清光绪《永嘉县志》“礼仪·丧葬”。



逾岁年,择日发引。丧吊之仪,一如初丧<sup>①</sup>。杭俗丧礼,尤重回煞,俗称“回神”,为浙地少见。以死之日干支推算应某日回煞,则亲朋赙吊者毕至。岁支冲者咸避。届时,于床前为位,陈死者衣服,设蔬果,召巫(俗名阴阳生)作法,取鸡蛋、鸡血盛瓷碗中,以厨刀碎于中庭。言煞神凶恶,以此祓除不祥。

### (三) 随葬品

在吴越人民观念中,地界冥府位于地下,认为人死后仍然生活在另一世界,因此历代有送冥器之俗。如汉代随葬之物包括衣食住行等一切生活用物,随葬品有鍍金饰物、漆器、铜镜、铜壶、铜奩、铜剑、铜矛、弩机、铁剑、铁刀、铁戟、水晶珠、五铢钱以及厨房用具等。宋代后纸质冥器开始流行。至清代又演变为“灵前纸扎”,其花样繁多,如纸扎的楼房称为“灵屋”,还有装有各式冥币的“枕头箱”和盛放纸制的单夹皮棉衣物、被褥枕、鞋帽袜、布料的“库箱”等等。

---

## 第四节 祭祀、信仰民俗

---

### (一) 家祭

在明代,逢祖先生日忌辰与岁时节令,皆以时食在家举行隆重祭祀。牲肴酒醴,备极丰洁。小户只列羹饭、香烛,家长一人口请祖先而已。忌日必素服哭祭,终身不废。<sup>②</sup>

在清代,逢祖先忌日,捧主祭于家。贫者用羹饭,富者用僧道,谓之“荐亡功德”。岁时之祭(亦称“节祭”),凡旧历元旦、小年朝、上灯、元宵、落灯、清明、夏至、中元、十月朝、冬至,或供糕团,或用蔬菜,或

---

① 民国《余杭县志》“礼仪·丧葬”。

② 明万历《新昌县志》“祭礼”。

设酒食等,于堂前陈设,对空遥拜。除夕,有悬先人遗像,供设茶果,约至落灯撤像,也有捧木主(俗谓“牌位”)祭于家者。

民初,士大夫家庙木主,大都高、曾、祖、祢,称为四亲。岁时伏腊、忌辰,奉主祭于中堂,陈鸡、豕、鱼、菽,并荐以时果。仪用三献,祭毕还庙。<sup>①</sup>

## (二) 墓 祭

在明清时期,元旦必拜墓,清明、冬至日,必祭墓,俗谓“上坟”。十月朔,祭于墓,谓“扫松”。也有分春秋两祭。春祭在清明后,秋祭在十月朝后,凡祭墓,大族则子孙成丁以上都赴墓展拜,用鼓乐,如祠祭礼。祭毕则散给祭胙,并视看墓域,除草添土,悬纸幡树上,谓“飘白”,也有系纸球于穴,谓之“招魂”。民初仍盛行。<sup>②</sup>

## (三) 祠 祭

各地城乡多聚族而居,处处有宗祠,祖先神主皆藏祠内,春荐食则祭于祠庙。明清时期,遇祖先生卒之辰,公祭也集拜于庙。也有七月望,十月朔,冬至日皆祭于祠,谓之“统祭”,也称“合族会”。族中家谱越数十年续修,谱成择日奠于祠,谓之“圆谱”。新正元日,子孙都入祠拜主。冬至日,奉谱祠前祭之,谓之“祭谱”。族有祭田者,祭则通族咸集,推族长主祭,其余随拜而仪。祭毕,以齿序坐,团饮馐余,分胙子孙,有违教令则于祠侧训饬。族有一切喜庆事,多醮金存于宗祠,以作岁修费。民初仍行此俗。<sup>③</sup>

## (四) 杂 祭

吴越好鬼神,信巫祝,由来已久。汉时,“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赋敛受谢……是以财尽以鬼神,产匮于祭祀”(应劭

① 民国十年《秀水县志》“祭祀”。

② 清乾隆二十一年《严州府志》“祭祀”。

③ 清道光八年《德清县志》“祭祀”。

《风俗通义》)。四时要祭灶及祭中霤神(即住居土地神)之俗。又设家堂,立一木主曰“家堂香火之神”,或曰“天地君亲师”,以神主置两旁。祭用糕糍、粉茧之属。清明荐粉团,端午用角黍,年终贫家用年糕,富者用豕、鱼、鸡及果品,寻常一脯、一鱼、一鸡子而已。古代,以能辟邪的神荼、郁垒为门神。明代多画将军朝官,复加爵鹿、蝙蝠、宝马、瓶、鞍等状,皆取美名,以迎祥祉。清代,门神一年一易。民国后贴门神者渐少。

明代,在杭州,于深夜,用菜酒、果饼祀床神,以祀儿女安寝。从清代到民初,民间妇女以婴儿夜卧不宁,祷祝于床公、床婆。<sup>①</sup>

宋时腊月,杭城祀万回哥哥,说能使人在万里外亦能回来。其像蓬头笑面,身着绿衣,左手擎鼓,右手执棒,云是和合之神。民初,婚姻喜庆俱祀和合二圣,即此遗俗。在金华、永康等地,祭胡公大帝(胡则),并举行斗牛,以娱胡公。东南沿海各地,建“天妃庙”,渔民多祀奉妈祖为神,每逢船出海、修船或避风都备牲礼致祭,祈求海上平安。

清代信鬼巫,好淫祀。农家养蚕时,事蚕花五圣极虔,每眠饷必祀,至大眠饷或杀鹅祀之。甚有遍礼诸神者,兼祀猛将,祭马头娘,一切总管,堂子、门神、水神,无处不拜。各地遇疾病,不讲医药,多信巫卜。如霍乱等症,乡民谓土祟,延道士数人鼓乐讽咒,谓之“谢土”;也有巫婆神汉之类,托为神附,借治病以哄人,俗称“灵菩萨”、“灵姑”。在海宁赞祀者曰“烧纸”,以俚俗歌词侑神,节以锣鼓,牲用猪首,俗谓“吃猪头”。在浙南,焚所书之符于一孩童身上,经片刻,孩童跳跃作神语,求者叩问休咎,俗称“灵童”。也有到庙宇问神、佛祷请赐梦,以析梦(亦叫“圆梦”)来卜吉凶。至于求签、相面、算命、测字更为普遍<sup>②</sup>。在苏南,俗重五通神,家为立祠,乡村则建小庙于门外,有病则祷之,

① 民国十一年《杭州府志》转引《西湖游览志余》。

② 《温州民俗》“巫卜”。

甚至罗列酒筵，割牲献爵以娱其神。上述诸俗到民初仍盛。

民间迎神赛会，历代均盛，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庙会祭祀活动，唐代有马涛墓和庙，每年春秋二祭。明成化末年，在杭城褚塘，为纪念褚候降生，各方出资，装饰各样台阁及诸社火，备极华丽。祭祀后，导以鼓乐，通衢迎展。后千胜庙、华光庙、晏公庙，均仿效依期迎赛。清代民初各地城乡村落，庙会极盛，难以数计。

## 参 考 文 献

- 吴越史地研究会编:《吴越文化论丛》,1937年版。
-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张荷:《吴越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 江苏省吴文化研究会编:《吴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 高燮初主编:《吴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第一、二辑,苏州大学出版社1994、1995年版。
- 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 蒋炳钊等:《百越民族文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
- 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 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百越民族史论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朱俊明主编:《百越史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彭适凡主编:《百越民族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 王懿之、李景煜主编:《百越史论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
- 魏桥、董楚平主编:《国际百越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 何光岳:《百越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 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 容庚:《鸟书考》,《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
- 马国权:《鸟书论稿》,《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 曹锦炎:《吴越青铜器铭文述编》,《古文字研究》第17辑,中华书局1989年版。
- 张光裕、曹锦炎主编:《东周鸟篆文字编》,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版。
- 徐建春:《杭嘉湖平原生态演替与古文化兴衰的关系》,《历史地理》第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彭适凡:《中国古代南方印纹陶》,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 林华东：《河姆渡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 余杭市政协等编：《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 南京博物院编：《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中心 1996 年版。
- 陈剩勇：《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谜破译》，湖南出版社 1994 年版。
- 董楚平：《防风氏的历史与神话》，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
- 杨善群：《越王勾践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 方杰主编：《越国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
- 王文清主编：《江苏史纲》（古代卷），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 沈嘉荣等主编：《江苏史纲》（近代卷），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 滕复、叶建华等著：《浙江文化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 韦庆稳：《试说百越民族的语言》，《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2 年版。
- 韦庆稳：《越人歌与壮语的关系试释》，《民族语文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 萧元川：《暹汉辞典》，曼谷，中山公司 1934 年初版，1950 年七版。
- 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史语所集刊》第 7 本第 1 分，1936 年。
- 丁邦新：《吴语中的闽语成分》，《史语所集刊》第 59 本第 1 分，台北 1984 年。
- 丁启阵：《秦汉方言》，东方出版社 1991 年版。
- 傅国通、蔡勇飞、鲍士杰、方松熹、傅佐之、郑张尚芳：《吴语的分区》，《方言》1986 年第 1 期。
- 傅国通、方松熹、蔡勇飞、鲍士杰、傅佐之：《浙江吴语分区》，浙江语言学会《语言学年刊 3. 方言专刊》（《杭州大学学报》增刊），1985 年。
- 合肥师范学院方言调查工作组：《安徽省方言概况》，合肥 1962 年。
- 何耿镛：《汉语方言研究小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 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语文出版社 1988 年版。
-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
- 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 徐云扬编:《吴语研究》,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1995年。
- 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四种,北京1928年。
-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
- 中国俗文学学会:《俗文学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 郑张尚芳:《中国语言地图集·B9 吴语、B10 安徽南部的方言分布》,香港朗文(Longman)1987年版。
- 郑张尚芳:《浙南和上海方言中的紧喉浊塞音声母ʔb、ʔd初探》,《吴语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 郑张尚芳:《温州方言源流探索》,温州社科联《温州探索》1990年第1期。
- 郑张尚芳:《温州方言研究简史》(上)(中)(下),《温州探索》1993年第3期、第4期、第5期。
- 郑张尚芳:《赣、闽、粤语里古全浊声母今读浊音的方言》,《吴语和闽语的比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 郑张尚芳:《浙西南方言的tc声母脱落现象》,《吴语和闽语的比较研究》。
-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 《王国维先生全集》,台北大通书局1976年版。
- 《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986年版。
-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 魏桥等:《浙江方志源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
-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 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 陈久金:《天文学简史》,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 钱宝琮:《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
- 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赵匡华：《中国炼丹术》，中华书局（香港）1989 年版。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中国农学史》下册（初稿），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岳麓书社 1983 年版。

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3 年版。

童隽：《江南园林志》，中国工业出版社 1963 年版。

游修龄：《中国稻作史》，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5 年版。

洪光住：《中国食品科技史稿》，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4 年版。

《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下册，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中医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杜石然主编：《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上下集，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